

IGAL HALFIN

斯大林主义者的 忏悔



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
弥赛亚主义与恐怖

斯大林式的忏悔

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弥赛亚主义
与恐怖统治

伊戈尔·哈尔芬

目录

导言 革命吞噬其子女	1
• 1 清洗之风	24
• 2 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逼供	115
• 3 共产主义大学的混乱.....	179
• 4 弥赛亚时代.....	262
• 5 终幕	301
尾声 牺牲的真相	353
注释	372

导言 革命吞噬其子女

对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大清洗标志着一场重大的个人审判的开始。为了确定他是否有资格进入无阶级的天堂，最忠诚的革命者必须面对一个根本问题：谁来审判他的思想纯洁性，是他自己还是党？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一种心态，其特点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审问。

很少有人会否认，大清洗至今仍是苏联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谜团。1934年至1938年间，不仅上演了莫斯科大审判，还有大量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调查，最终导致无数党员被处决或内部流放。¹ 历史学家很难解释斯大林及其副手为何执意要摧毁国家的行政和军事精英，尤其是在战争阴云日益逼近之际。² 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大清洗所引发的群体性精神病，大量告密将苏联社会变成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混乱的相互指控的跷跷板游戏。³

违背一切社会逻辑，社会地位的回报往往被逆转——地位越高，越可能被枪决。从这个角度看，大清洗似乎是一场病态的狂欢，底层吞噬上层。白军少将 A. 冯·兰佩在 1937 年 6 月观察到，党已将暴力转向自身：“布尔什维克有二十年没有互相残杀。他们统治的下一个二十年，便以这样做开始。自相残杀是每一场革命的正常结果。”⁴ 尼古拉斯·沃特在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宣称，斯大林的清洗“使人不再理解。人们构建假设，试图寻找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将其与理性相符。但一无所获。只剩下谜团。”

1936-38 年苏联发生的事情，无法通过诉诸个人利益和野心等典型解释来理解。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为社会而行动，而非为己谋利。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主任尤里·皮达科夫曾有名言：“我愿意牺牲我的骄傲、自尊以及其他一切。我知道普通人无法瞬间改变、逆转或放弃他们的信念……但因为我们浸淫于暴力的理念，我们布尔什维克知道如何将暴力指向自身。如果党有这样的要求，如果这对党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我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通过意志行为，从我的头脑中根除我珍藏多年的观念……重新调整方向，并从内心、从整个思想上认同党。”⁶

对其主体性的彻底工具化，使得党员们变得无私。作为现代苦行僧，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放弃了财富和娱乐——回想一下斯大林著名的节俭，以及共产党领袖们朴素的衣着。⁷ 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大清洗的实施者们将自己视为历史的载体。摆脱了所有小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他们自豪地进行告密、拷打和杀戮。这一切在道德上是正当的：“砍柴时，木屑飞溅”（*Рубят лес — щепки летят*）。⁸ 在此区分由利己主义煽动的不道德行为与为了人类利益而越轨的共产党人的超道德行为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将历史构想为一个剥削与徒劳的永恒循环，陷于阶级斗争的无情必然性中：唯一的出路是一场暴力的社会剧变——革命——其否定力量打破了社会枷锁，使新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⁹ 具有泰坦般破坏力的共产党人超越了善恶之分。他首先摧毁了数百年沙皇统治建立的制度，瓦解了每一个国家机构。但这只是开始：他的下一步不仅是废除成文法，还要废除道德法，以及传统的信仰、惯例和社会组织的熟悉路径。¹⁰

当然，想要实施一种激进意识形态，弥合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并非共产主义所独有。在许多案例研究中，学者们已经确立，一旦激进分子夺取国家控制权并开始按照他们的形象改造社会，暴力便会随之而来。¹¹ 而那些试图将人类范畴限定于自身同类的人，往往会对少数族裔、种族和宗教群体施加剧烈痛苦。对差异的专注，似乎会滋生仇恨与残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病态特征的起源使其区别于其他看似可比的事件。¹²

共产主义者宣扬普世主义，信仰普世人性，自诩为启蒙价值的继承者与完善者。¹³ 他们

诛灭的是相似者，而非差异者。异见者永远不可能构成巨大威胁，因为他们可以被改造；而来自内部的叛徒与间谍——无处不在且难以察觉——才会真正玷污革命本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者们以骇人暴力扑向这类嫌疑者，唯恐敌人因与忠诚者无法区分而难以辨识。而共产主义囚徒反过来认同审讯者——除了党赋予的思想体系和语言外，他别无精神世界。即使行刑队举起步枪，受难者仍在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共青团前书记尼古拉·查普林在审讯中遭受野蛮殴打时，仍不断重复：“党，党，党……”¹⁴

有时很难区分民粹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毕竟他们宣扬相同的革命价值观，使用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遵循相同的解放方案。许多挑战党的人，包括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列夫·托洛茨基和尼古拉·布哈林，曾经不仅是革命阵营中合法成员，更是备受尊敬的人物——难道他们现在反叛主要是出于恶意吗？¹⁵ 他们的指控者如此断言，并以不受约束的暴烈行径回应其“罪行”。阅读这些审判记录时，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共用的语言体系跃然纸上。正因语言不断自我复制，几乎没有真实论辩的空间，政治斗争便呈现出重复性特质，极易演变为暴力。革命者们针锋相对，拼命争夺谁才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些分歧如今听起来或许教条、学究、荒谬至近乎可笑，但其影响始终是严重的。

末世论时间线

决心传播普世解放福音的共产党，在愿意消灭数十万本党成员方面独具一格。在很长时期里，反对派承受了主要攻击，其异议似乎构成社会主义进步的主要威胁。对反对派内心世界日益强调表明，危机核心并非传统权力斗争，而是一种特殊国家工具性形式，即现代式的灵魂牧养。¹⁶ 在早期研究中，我曾追溯官方共产主义对错误行为概念的渐变过程——从强调“培育”的重要性转向坚持“天性”的首要性。¹⁷ 多年来，党从将错误视为可在纯净社会环境中修正之物，逐渐转向视其为个人根本内在特质——一种永不可转化、只能被掩盖的品质，因此唯有通过审讯手段才能根除。

弥赛亚时间的概念为理解这种逐步走向肉体消灭内部敌人的进程提供了关键。¹⁸ 苏联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与现实观由线性的时间目的论所塑造，其中未来总是被不断延宕。这种永恒的延宕使许多革命者对新经济政策的让步产生阴郁的反应，并驱使许多失望的追随者离去。但它也允许官员对社会不适格者及反对派展现宽容。倘若完美的时刻尚远，人的弱点就必然会被预期，因此个体被给予更多时间去拓宽思维、完善自我。

然而，随着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历史时间开始加速运转，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时的人们将这场大转变（1928-1934 年）视为远不止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大规模启动以及消灭富农与小商贩。在这些戏剧性事件背后潜藏着更深层的东西——与个人神化相关的、大规模的社会净化。¹⁹ 在党内陷入混乱之后，认为社会即将消除一切阶级差异的信念，便与官方话语中弥赛亚动力的降临相联系。²⁰ 一种大胆的末世论诊断将革命进程的完成描述为一切人对人剥削的终结，因而也是历史的终结。²¹ 这要求从自传中抹除叙事；超越肉体；并对隐喻、反讽及文字游戏施加死刑判决。²²

若内部冲突与多层次的意义表明个体的不完整，那么无阶级社会的居民则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任何匮乏或缺陷。²³ 卡济米尔·马列维奇在 1930 年代中期的肖像画描绘了“缺乏心理与自我”的个体；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的文字则勾勒出“可以在意识形态上界定、但全无独特外貌或个人心理痕迹的全新之人”。²⁴ 斯大林式的摩尼教二元论已然确立：每一个内在都已被外化，每一位同志的自我都宣称自己绝对纯洁或绝对邪恶。²⁵ 一条界线已被划定；历史的客观潜力已经实现；偏离者无可救赎。²⁶ 无论看向何处，都有证据表明人类主体已臻完美这一假设。党会上的同志们假定自我控制是绝对的、错误是不可能的，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声称行动使意图透明化。²⁷ 分析可以被抛弃：文本与言论不言自明，只接受一种解释。那些曾被视为口误的东西，只能是隐秘颠覆意图的征兆。

人们或许会描述当时斯大林主义话语的平面化，但其表面的简单伴随着冗赘与强迫性的重复——

为防止哪怕最微小的误解可能性，同一内容必须被一遍又一遍地言说。与此同时，话语变得肤浅：当每句话只有一种含义时，可谈论的内容就少得多。当向世界宣告他们的成就时，共产主义者采用了口号与陈词滥调。对党员干部意识的试金石不再是犀利的论证与理论洞察力，而是“热情”——一种超越政治参与、近乎肉体狂喜的精神状态。²⁸

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否认了真相，而这些反对者被所有人认定为叛徒和双重间谍。心智正常的人怎会拒绝党的路线，转而拥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那些法西斯主义与国际资产阶级的走狗？审讯者们开始工作，他们努力产生的文字成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里堆积如山。“是的，”许多人供认，“我曾计划暗杀斯大林。”其他人则供认了不同的罪行：“是的，受托洛茨基的指使，我曾向德国人（或波兰人、拉脱维亚人）许诺割让苏联的西部省份。”但这种倾吐使其自身变得多余，因为对话的一方——被审讯者——的话语被忽略了。即便引出了他的话语，也被扁平化并被迫纳入一个预设的框架。酷刑、嘲弄和仪式性的羞辱是与囚犯沟通的唯一方式——这些被截断的交往形式假定真理可以被烙印在对方身上，而不是传递给他。

很少有人质疑斯大林关于每个错误背后都隐藏着恶意企图的论断。1937年，财务主管们坚称：“虽然我们过去认为炼油厂爆炸是疏忽所致，但被告最近已供认那是蓄意破坏行为。”²⁹同年晚些时候，一位高级红军军官指出：“空军遇到了如此多的困难局面，这背后必定有敌人的黑手。”³⁰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承认：“我所看到的优柔寡断和心不在焉之处，实际上隐藏着有意识的反革命活动。”³¹每一次崩溃的责任都不在于体制，而在于邪恶个体的诡谲伎俩。尼古拉·叶若夫一被清洗，他自己就立刻被指控犯有他曾归咎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那些罪行：“敌人有意识地搅乱了一切。大型工厂被故意剥夺了工作人员。”³²

党的会议基调也发生了变化。早期，在激烈的集会上常常能听到笑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党的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显示，参与者在彻夜辩论政治和经济问题时互相争吵、开玩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视角来看，那些俏皮话和讥讽该显得多么令人毛骨悚然。³³毕竟，许多曾被拿来开玩笑的人，后来都因其昔日同志的证词而被处决。语言实现了自我，曾经的戏言威胁现在被当真并付诸行动。³⁴

这种新的透明度也与家庭纽带发生了冲突：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关系，保证着完美的意识形态理解。血缘忠诚已然消亡，党宣布在夫妻、兄弟姐妹或父母子女之间不能有秘密。时间已经终结的感觉甚至在想象力的行为上也付出了代价。被剥夺了幻想和欲望的“新人”在思想与成就之间看不到任何障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幻想终结”的幻想被证明异常顽强，该政权永远在警惕那些胆敢继续做梦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我让党感到困惑。谁真正拥护共产主义信息？谁在内内心深处鄙视它？灵魂的最深处对官方眼光是隐蔽的，别无选择，只能倾听个人自己对其信仰和倾向的说法。通过在每一个苏联机构中实施的同志审判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仪式、接连不断的揭发运动、反复试图挖掘嫌疑人最隐秘的希望和倾向的盘问等一系列调查实践，共产主义的自我诠释学得以具体化。但在大清洗盛行的语义条件下，诠释学失去了其大部分锋芒。即使粗略翻阅当时的党务记录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记录也能看出，官员们不再为如何区分真正的革命者和冒名顶替者而绞尽脑汁——他们直接就知道。

政治异端不再被归因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困难或任何其他外部环境，而是被视为一种内在的性格特征。因此，它必定在过去的不同节点上有所显现。因此，人们对政治传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个人必须竭力回忆，精确回想在这次或那次党内斗争期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是否曾为这位反对派领袖或那个宗派主义纲领说过哪怕一个字？调查人员翻阅了大量旧档案和速记记录以试图查明。这暴露了其他罪行，无论多么不相关，都证实了当前的指控。几乎每一个曾被指控有丝毫政治违逆行为的共产党员现在都面临被开除出党的风险。

当杰出的党务工作者 V·R·卡尔波夫的案件在 1937 年 2 月和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时，所有人都同意他们需要理解卡尔波夫自我的本体论：

波斯蒂舍夫：我的想法是：在那些曲折迂回的岁月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一些同志被击垮了，一些屹立不倒，还有一些叛逃到了敌人那边。谁能想到，那些挺过所有这一切的人，

后来会加入敌人的阵营？所以现在他们告诉我，卡尔波夫从 1934 年起就掌握在我们的敌人手中。我个人觉得很难想象在游戏后期改换阵营。你怎么能与党共度最艰难的岁月，然后转投托洛茨基分子？奇怪！……

莫洛托夫：你觉得很难相信卡尔波夫在 1934 年成为敌人？他可能从早期就是我们的敌人。

波斯蒂舍夫：是的，他内心必定一直住着一只蛀虫。它最早出现在 1924 年，或者也许是 1926 年，或 1930 年。很难说具体何时，但它肯定一直都在那里。³⁵

卡尔波夫不幸的态度并非后来发展的，只是后来才被发现的。

没有任何算法能告诉我们大清洗的受害者是如何被选中的。可以谈论可能性：孟什维克先被抓，然后是前托洛茨基分子，接着是前季诺维也夫分子。但越往后，就越难以理解。传记有污点的共产党员被逮捕了，但革命英雄也被逮捕了。斯大林的老对手死了，但他的朋友也死了。许多受害者有着无可挑剔的记录。在这场现代猎巫运动中，任何人都可能被证明是女巫。³⁶ 合适的术语是“人民公敌”，但它指的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对派，甚至也不是已被神话化的破坏分子和间谍。语用学至关重要——该术语将一种根本性的他者性铭刻在被排除于政体之外的那些人身上。因此，“人民公敌”既不是一个术语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在由不断变化的言说语境所塑造的指涉链中的一组标记。³⁷

暴力在共产主义政体中是常态：制度化的暴力，与国家、其法庭和军队活动相关的暴力。但破坏分子和破坏者的随机暴力无法被法律所遏制。这里我所指的法律不仅仅是国家的司法框架，还包括其合法化话语——即以其历史发展铁律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知道如何谈论资产阶级和富农，知道如何分析社会力量。但当官方语言转向抽象的道德范畴时，身份的客观指标结果不过成了主观道德本质的索引；它们不再预测道德选择，只是在事后记录它。一旦党开始依赖同义反复来定义善与恶，它就短路了马克思主义论证，苏联社会学剩下的只是其科学词汇的空壳。敌人变化多端，无法固守单一原则，因此无法从内涵上被定义。这是否可以解释大清洗中逻辑的缺失？一个逻辑基础不一定必然导致决定论结果，也不能免除斯大林狂热分子的罪行，但如果没有一个关于谁是他们的人、谁是反对者的有效定义，他们陷入杀戮的混乱就

变得更加可能。内部敌人，那个“新人”的险恶阴影，无处不在又处处逃脱追捕。斯大林对这个造物的追逐，执拗地重演着内部与外部、忠诚同志与叛逃者之间的界限。污染源不断变换面孔，从富农到孟什维克，再到前反对派人士，再到看似普通的官员，但污染源始终繁衍不息。仿佛在承认弥赛亚工程的不可能性，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围绕着一场针对模糊界定的致命敌人的不懈斗争来构建自身。³⁸

大清洗的随机性，其可怕的反复无常，并未使这一现象变得神秘。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清洗是超理性的，是将一切现实纳入共产主义秩序的钢铁意志的结果。党克服超越性的决心使语言本身变得弥赛亚化。³⁹ 在声称完全描述了现实的同时，语言触及其外部极限：一切留在外部的东西都必须被排斥、谴责和消灭。吊诡的是，即使它拒绝修辞、语用学以及所有通常暗示词与物之间差距的东西，斯大林主义的语言还是变本加厉地展现了其施为性维度：毁灭源自于指认的行为——这是一种边界性的语言现象。

有罪叙事

大清洗语言的指控性特征在阅读审讯记录时一目了然。1937-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人员完全放弃了任何试图理解囚犯、根据动机解释其行为的努力。只有一种压倒性的好奇心主导着他们的提问：囚犯认识谁，还有谁可以被算作反革命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雄心再清楚不过：创建一份包含所有好人与所有坏人的完整名单。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语体系中，区分真话与谎言没有意义。一旦革命工程完成，每一个念头都能立即毫不费力地实现。当所欲之物与现实变得无法区分时，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就采取了逻辑必然性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被推向了荒谬的极致。⁴⁰ 可能性的领域被抹去了——发生了的就必定发生，必须发生的就发生了；一种事态成为另一种事态的充要原因。在安全机关的宇宙里没有意外或非预谋犯罪：所有事件都是有条件的，因果链条牢不可破。一旦偶然性作为解释的可能方面被排除，它便重新以语言守门人的身份出现；语言的界限（什么有意义、什么无意义，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谁该生、谁该死）变得任意，成为一种没有动机或解释的事态，一种没有意图的延伸。

既然罪犯被认为已经发挥了其潜能，敌人的行动路线就变得可以预测——反对主义、破坏和间谍活动的行为可以被预见。那么，为什么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自己来准备供词呢？⁴¹ 未来的叛徒变得与真实的叛徒同一——而他在行动前还是行动后被抓获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完全暴露了他一直是的那个邪恶造物。他的反革命本质必须被紧急挖掘出来，以便能够解除更多罪犯的武装——因此档案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一个人牵连出好几个人。个性化的供词仍然是首选媒介：无论是否已经实现，破坏性冲动仍然是一个主观态度问题，并且只能通过这个媒介来捕捉。但一旦自我浮现到表面，组合工作就变得容易了。

如果审讯者因此成了一个洞察本质的预言者，更不用说一个凭空创作的艺术家的话，那么他的创作就可以用文学理论来审视。存放在安全机关档案库中的无数证词，呈现出病态艺术品的面貌，应被作为整体来阅读，而不是被切成“不太可能的影射”和“零星的真实片段”。一种考察囚犯供词形式的整体性方法，在某些方面比仅仅专注于其内容更为有效。⁴² 情节通常是恐怖但抽象的——其形象被放大但未被展开。这是一部刻写在斯大林石板上的虚构犯罪学作品。其生硬的特征和缺乏具体背景设定，反映了大部分情节实际上发生在调查人员脑海的密室中。其情境并非被告实际存在的情境，而是基于一个充满邪恶联系、阴谋和噩梦般形象的世界。因此，反革命情节被从平凡中剥离出来，被抛入一个冰冷、但极其缺乏灵感的间谍小说的空气中，其中恶棍的身份是预先知晓的。

审讯记录揭示了共产主义主体性的某些核心假设：将其视为无意义的杂乱信息而不予理会，等于对我们关闭了一个关键信息来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供词借鉴了共产主义自传的许多叙事特征，应根据该体裁的演变来加以审视。⁴³ 必须考虑某些诗学上的连续性，尽管也必须注意到差异。两种类型的文献都声称讲述真相，都试图对其作者的道德本质有所言说，并且都是为诠释性凝视而创作的。⁴⁴

以自传体形式出现的供述性叙述并非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们的发明——它们在 1920 年代的清洗中就已广为流传，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都曾忏悔自己的罪行。但如果早先的自传性陈述是为了减轻罪责，那么在

大清洗期间，它们则采取了自我揭发的形式，这种形式几乎注定了谴责和处决。皮达可夫在 1937 年审判结束时宣称：“此刻我满身污秽地站在你们面前，被自己的罪行压垮，因自己的过错而一无所有，一个连自我都已丧失的人。”⁴⁵

共产主义人生故事总是在作者遵循官方脚本并将自己嵌入革命叙事的意义上是编造的。作者总是希望尽可能以最佳形象呈现自己，不仅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但是，经过修剪、去除有损细节并加以美化后的党的自传，在其包含的具体细节与现实相符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人们从中发现了一定的叙事自由，但这种自由很少延伸到事实层面。充斥着令人毛骨悚然罪行叙述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地牢里写就的人生故事，与现实关系甚微。编造已变成了伪造。⁴⁶

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转变既重要又复杂，只能断断续续地描述。在初步阐述这些材料时，我想通过审视一份 1931 年审判期间由一位孟什维克高级经济学家撰写的自传来摸索门道。该文本以一种或多或少典型的革命叙述开始，然后突然转向了令人震惊的欺骗与破坏的故事。⁴⁷

存放在党的档案中的入党申请卷宗、清洗记录和其他文件使我们能够识别共产主义自传体裁，揭示了党的自传作者通常如何将其一生叙述为直到他重生那一刻的精神成长过程。实现共产主义的完美需要一个不完美的起点：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上幼稚的状态。在决定性时刻，当自传作者声称已看到光明时，他的意识与体现无产阶级意识的党的路线合而为一。个人思想与集体意识融合，个人情感与集体无意识融合。本文讨论的作者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遵循了这一模式，但在内容上明显偏离了标准叙述。⁴⁸ 几乎成为革命者，几乎成为布尔什维克，这位主角却选择了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一场秘密战争。

雅库博维奇讲述了两个并行的故事：他如何加入革命阵营，以及他如何反对它：“我在 1908 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当时我十七岁。我的政治意识是由 1905 年的革命风暴塑造的，但革命因素的崩溃也让我感到震惊。这种政治反应使我对深化俄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如同他的政治思想一样，他的家庭背景也将他推向两个方向：“我成长在一个深受俄国知识分子政治激进传统浸染的家庭，但从未有人直面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些矛盾的影响导致了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党的自决时期，我加入了孟什维克派。”⁴⁹

革命后，雅库博维奇留在了苏联，并在国家贸易机构担任要职，但一切都感觉不对。由于在“专家”职位上无法得到更高晋升而感到沮丧，他在1920年代中期考虑加入布尔什维克。但这从未超过短暂的政治调情；当雅库博维奇开始回避他的共产党员朋友时，他放弃了自我改造的一切希望。⁵⁰“我感到孤独，”他宣称，“并开始寻找恢复旧日同志情谊和友谊的途径。这使我来到了孟什维克党的废墟……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我被卷入了一种对苏联生活结构、其经济和政治形式、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党组织活动的组织方式的敌意氛围中。”

“复兴的孟什维克党应采取什么策略？”自传作者在一段反革命的内心独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忘记了自己不再生活在沙皇统治之下，他求助于旧的地下工作习惯：“聚集干部，统一他们的思想……同时等待布尔什维克党的垮台。”这样的供认在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但别忘了其作者是一名囚犯。这使得一些细节变得合理：孟什维克的活动预示了后来托洛茨基破坏分子和间谍的行动，这显然是审讯者们喜爱的一个主题。而雅库博维奇的目标对安德烈·维辛斯基后来高调声明的任何读者来说都不会陌生：“苏维埃政权的终结，民主的建立，以及在现实基础上重建经济生活——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部分复兴。”

尽管叙述者的每一句话都传达着深刻的悲观态度，但他克制着自己，等待事件自行发展：“群众行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早期苏维埃国家安全机构]会立即阻止它。因此，社会民主组织起初的策略是被动的，无非是建立个人、小组和支部之间的联系，然后是与国外孟什维克中心——‘国外代表团’——的联系。考虑到国家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这种策略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为公开的政治斗争做好充分准备。”在这些字句中，人们找不到革命自传中典型的主人公。雅库博维奇是恶毒且处心积虑的；他心中只有破坏和背叛：“在1917年至1930年的革命岁月里，孟什维克分子背信弃义了多少次？难道对他们来说，背信弃义不是家常便饭吗？”然而，叙述与大清洗时期那种供词有所不同。雅库博维奇尚未完全信服，试图在道德和理论上为其行为辩护。“重要的是要停止工人阶级的痛苦——医生有时会用强效毒药来拯救病人。”这种对个人破坏计划的“心理前提”和“意识形态理由”的强调，在1936-38年将是不可能的。

典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记录也不会包含内省的插曲。”主观上，“雅库博维奇指出，“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革命者，甚至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自认为如此。但即使我曾经是，那也只是断断续续的。我的政治教育肤浅；我没有在列宁的党里受过训练……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伪社会主义者——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来说，我是一个反革命者。”接着是一声哀叹，这也让人回想起 1920 年代的自传：“直到现在，在监狱里，我才认识到这一切。理解来得太晚了，当一切都无法挽回，当我的政治生命无法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雅库博维奇证词的最后部分已经非常接近叶若夫所推崇的那种就事论事的供述。在这里，内省的沉思让位于一连串 dates 和姓名：年表取代了叙述。我们现在读到的是一份法律文件，而不是一个生命故事。读者得知许多专家被卷入工业破坏，“资产阶级资金被用来资助破坏活动。”⁵¹ 当工人阶级在饥饿和匮乏中坚持时，反革命者的最后手段是“国际干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群像东方暴君一样行事的篡位者，必须被扫除。”雅库博维奇承认放弃了所有的顾虑：“干预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绝望手段，但是……经济和政治形势只能通过外科手术来解决。”

在随后的审讯中，雅库博维奇详细说明了地下组织与农民党以及其他虚构的社会革命党组织之间的联系。⁵² 如果要定罪，他的罪行必须个别化。“我在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包括在 1927 年下半年和 1928 年初减少工业商品的分配，”他顺从地说，“然后在 1928 年和 1929 年，我组织了贸易危机。”⁵³

这份冗长而详细的叙述，展现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困难和社会主义政党最终丧失合法性的背景下，布尔什维克所想象的孟什维克政治思想的细微差别。但我主要感兴趣的是雅库博维奇的自我叙述如何连接了 1920 年代的革命诗学和 1930 年代的斯大林式供词。在标准的革命自传——其主题是精神发展、磨难与怀疑、皈依共产主义——旁边，是就事论事、枯燥地提及每一种可能想象到的破坏活动。雅库博维奇的文本一半是自传，一半是审讯记录，具有过渡性：对事件的解释逐渐让位于对事件的虚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证词中

就事论事的部分读起来像纯粹的虚构，而富有诗意的早期部分则包含了关于神奇自我转变的可信故事。⁵⁴

要理解像雅库博维奇这样的供词，必须理解其认识论基础。⁵⁵ 这里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关于真理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逼真性的知识：一个被叙述的事件可能没有发生过，但它确实属于可能发生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证词的接受与其生产一样能说明问题；就我这里的目的而言，当作者撒谎时，他的文本与他讲真话时一样重要。重要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强迫囚犯所说的话对同时代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并且被付诸行动。

斯大林式的供词呈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独特结合；它们是产生了现实世界效果的文学文献——毕竟，大多数主角都是根据他们讲述的故事被枪决的。雅库博维奇的证词（他的叙述在尼古拉·苏哈诺夫、伊萨克·鲁宾和其他在同一审判中被起诉的孟什维克理论家的叙述中得到了呼应）以及许多其他例子表明，对斯大林式供词的研究必须将政治-法律方法与文学方法结合起来。审视这些供词的形式、语言和风格，将揭示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象征性预设。

我们必须超越那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即安全机关与共产党组织联手消除抵抗和自由思想。秘密警察不仅仅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它还体现了革命精神。这削弱了将雅戈达和叶若夫的清洗视为苏联法律体系崩溃之可怕后果的观点。驱动这些事件的不是法律程序的缺失，而是道德议程的存在——即相信历史需要帮助来区分好人和坏人。⁵⁶ 在展示安全机关如何重新诠释对党至关重要的诠释学项目时，我希望能证实我的论点：灵魂的诠释学在从一个机构环境迁移到另一个机构环境时，保留了其基本特征。

比苏联法学本身更好的大清洗导论，是由布尔什维克即席的良心法庭提供的。⁵⁷ 即使粗略审视 1930 年代初的证据，也表明清洗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被评判个人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员被“警告”、“训斥”、“清洗”，这些信息被仔细记录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虽然谴责不带有法律制裁，但必须强调的是，基层党支部会议具有许多正式法律程序的特征。当一个支部讨论一个“个人案件”（个人案件）时，会传唤证人作证，对抗性程序是常规做法。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同志扮演

检察官的角色，无情地逼迫被告。其他人则扮演辩护律师的角色。”最后陈述”被记录在会议记录中。整个过程中展示的诠释程序触及了革命项目的核心——一个人对革命的忠诚程度。而一个不利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那些不愿或不能承担人类解放任务的人会被羞辱、回避，并且可以预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随时会出现在他们家门口。

只有当斯大林主义关于罪责的话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审视时，苏联机构为何可能依赖于一种革命”直觉”，而不是法律训练，才会变得明显。⁵⁸ 并且，在共产党人诉诸刑法典的范围内，他们求助于第 58 条，该条涵盖了可能涉及几乎任何言行的模糊罪行：“反革命”。⁵⁹ 法学没有特定的领域，没有精心划定的应用范围，正是这一点使得对斯大林主义罪责观念的研究如此引人入胜。⁶⁰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审判渗透到所有社会机构，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正式法院到中央委员会全会，从参与者激动地高喊判决的群众集会（“将季诺维也夫分子从地球上抹去！”；“人民公敌去死！”）到更私密的聚会，朋友和同事互相揭露对方是“不可靠”或“两面派”。甚至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法庭，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那里，个人审视自己的良心，判断自己是否配得上共产主义。⁶¹

激发党纪调查的问题后来萦绕在法庭审判之中：被告是可矫正的还是不可救药的？当然，1936 年与 1930 年大不相同：法律与行政国家机器在大清洗期间成为审判共产主义者的场所，因为透明主体的个人特质如今已被法学家的审视所把握。⁶² 然而，若说 1936 年党输给了法律体系，未免过于简单化。这些领域在无数方面相互交织，任何试图将其分离的努力都会过度简化复杂的图景。如果苏联社会已臻完善，法律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教育和改造的实验室被司法与行政委员会取代，诊断被审判取代。如果说在党的会议上，关键问题是环境与自我或身体与自我的关系，那么在法庭上，问题不是谱系学的，而是本体论的——这个或那个个体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受弥赛亚式法理学的启发，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法庭宣布他们已破解灵魂之谜：判决成为终局。

大清洗的话语

为了解被称为“大清洗”的非凡事件，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考察了共产党精英层的权力斗争以及清洗遭遇的抵抗程度。⁶³许多学者质问：斯大林为何策划摧毁老布尔什维克，而支持他进行这种病态努力的人又是谁？是否有领导人反对大规模屠杀？⁶⁴总体而言，解释已趋同于两种基本解读：极权主义解释将大清洗归咎于斯大林，修正主义解释则归咎于党内精英层的派系冲突。

⁶⁵

极权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聚焦于斯大林的生平、个性及其领导风格。⁶⁶一位研究者声称：“恐怖的所有方面之所以统一，在于它们都为斯大林的目标服务，即摧毁所有似乎对他或其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另一些人则强调，莫斯科审判秀“基本上是独角戏，旨在将斯大林本人的偏执倾向合理化”。⁶⁷

但为何大清洗的范围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逐渐收尾反而扩大？尽管1929至1931年间对有产阶级的根除和对知识分子的运动确实可能引发了反对派的爆发，但一个悖论性的事实依然存在：随着斯大林法庭内部安全的改善，杀戮反而增加了。⁶⁸令人费解的是，一小撮疯子，无论是否有迫害妄想，竟能成为如此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组织者”、“制片人”或“舞台监督”。即使成功实施，对个人异常的研究也只能给我们带来心理学的洞见，而非真正的历史性理解。⁶⁹关键问题，即整个国家如何能参与到一个人的疯狂之中，在个性研究的框架内甚至未被提出。⁷⁰

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了极权主义观点的空白。他们摒弃意识形态和心理学，在混乱且自我分裂的政府机构中看到了能动性。那些坚持修正主义解释路线的人，在寻找理解“构成苏联历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时，宣称他们致力于从“日常、经验性政治”的角度来解释1930年代党员的流血事件。⁷¹尽管修正主义者公正地批判了斯大林疯狂的形象，却不经意地将这一标签转移到整个苏联体制上。对他们而言，利益驱动的政治动摇了苏联政体的骨架，使俄罗斯回归到一种系统性的自然状态。所剩下的只是普遍的、历史性的权力斗争的又一表现——权力总是相同的权力，个体

也总是相同的个体。⁷² 尽管修正主义者教会了我们许多关于苏联政府的知识，但他们最终却将斯大林政权最重要的方面——其杀人特质——变得无足轻重。任何政府内部都会发生争吵，但通常不会留下一串尸体。⁷³

由于坚持将苏联政体视为一个机械运作的结构，修正主义者未能理解语言如何为其使用者创造一个世界。难怪这一学派无法解释苏联历史中有目的的变革。一个完全缺乏意义的体系可以无规律地变化，但无法表现出自我实现的倾向。1917 年不同于 1927 年，1927 年也不同于 1937 年：如果说 1917 年带来了街头示威和公众集会，1927 年则开启了对反对派前所未有的冲击，而 1937 年带来了叶若夫时期——迄今为止苏联和平时期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年。为何暴力会在每一个革命周年实现质的飞跃？显然，革命会定期盘点其成就，并充满激情地跃入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利用暴力推动自身前进。

斯大林主义的暴力不能被归结于环境因素。尽管有必要理解杀人机构运作的背景，但共产主义的千禧年主义——即将历史视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善对抗恶的斗争，并确信结果必然是积极的——先于斯大林主义，并作为一种世界观拥有独立的存在。⁷⁴ 本研究拒绝将大清洗比作拜占庭宫廷阴谋的模式，后者将大清洗视为一个现代、进步但不幸过热的政府机器的一次偶然中断。本研究试图在共产主义话语本身中寻找死亡人数的解释。⁷⁵

这种话语的新颖性在基层党组织的记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记录是党组织制度大厦的基础。在描述争取被选入“选民兄弟会”的权利斗争时，会议记录记录了塑造斯大林主义身份的过程。很少有人怀疑工人和农民必须被提拔，资产阶级残余分子不受欢迎，或者选民兄弟会必须不断净化，以免反革命分子挫败 1917 年的成就。但身份该如何确定？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戏剧性在笔录中得以传达。

但本研究采用的最重要资料或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记录。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以冷酷的公正记录了据称由共产党人针对斯大林和苏联国家策划的阴谋。迄今为止，这些资料大多禁止研究者查阅，这几乎无关紧要，因为读过少量可用资料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其内容是无用的伪造。无论是虚构与否，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笔录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证词体裁。因此，审视其形式和内容，可以揭示当代对敌人认知的重要方面。例如，一份指控清单告诉我们斯大林主义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囚犯遭受折磨和羞辱的病态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使我们超越了关于施虐的陈词滥调，触及了大清洗的行为语法。

本研究的后半部分通过审视推荐信和检举信、求助信和自述报告（均以一种独特的斯大林主义风格写成）来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供词置于具体情境中。在此期间，一切皆为政治：人们诋毁他们所爱的人，因为党要求他们离婚，便抛弃了忠诚的配偶，并展示自己的罪孽。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审视了斯大林主义的恶魔学。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揭示了审讯人员如何将绝对的恶加以操作化，用以判定谁该死，以及这种死亡是否可以作为赎罪。

此处考察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这所新的革命化教育机构的旗舰。位于乌里茨基宫（1917年的革命指挥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微观研究斯大林主义所必需的时间、地点和行动的统—。⁷⁶ 我依靠大学期刊、党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的材料以及主要教师的个人档案来让这所学校栩栩如生。与仍活跃于旧都的传统学术机构不同，共产主义大学几乎完全由入会者组成。只有经历过集体化或工业化、受信任的同志才能入学；对教职员工的标准更为严格。红色教授在地方和全国党代会上脱颖而出；其中几位被选入声名显赫的列宁格勒科学院分院。在他们的指导下，拥有上千成员的大学党组织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列宁格勒的产业工人中，并将其专业知识带到了农村。

共产主义大学的内部结构错综复杂：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金字塔，被划分为越来越小的单元，存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等级制度。年度学生会议选举出大学党委会；这个顶层小组（包括十到十二名同志）提名党委书记、大学宣传部长和大学期刊编委会。但更有效地监督学生行为的是更小的单元和子单元——学生被划分为若干“小组”（*kruzhki*），依据入学年份和学科划分。每个小组由大约二十名学生组成，由一名党小组长——一名负责基层纪律的学生——管理。⁷⁷ 这些小组内紧密的相互监督建立了横向的观察线。

在每一层级——以及在较低层级警惕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形成了相互监督的线；庞大的考试系统追踪着个人的学业和政治表现。从早晨刮胡子到睡前阅读指定作业，每一项行动都是作为集体的一部分进行的。任何偏离这种相互监督机制的人都会受到批评，有时甚至被排斥。由党小组长负责处理问题，这可能涉及向最高监督者——党组织负责人甚至大学校长——报告。这个复杂的金字塔被编织进一个更为精细的结构中，将大学接入更庞大的共产党机构。因此，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弥赛亚秩序的组织与作为斯大林主义权力微观世界的大学相互重叠。通过其党委和校长，大学隶属于斯莫尔尼列宁格勒党区委。区委监督普通成员的行为，评估地方名流的忠诚度，通过从列宁格勒党组织总部延伸下来的下行权威链强化党的统治。

聚焦于少数行动者、几个关键冲突以及将行动者与情境联系起来的修辞，我在微观层面考察了大清洗的具体运作。在共产主义大学，平凡之事亦为非凡，因为个体与社群被视为加速变革进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为无阶级社会的降临做着最后的准备。⁷⁸ 其他地方的学生为了世俗的理由而学习和工作；而这里的学生则为了彻底铲除邪恶而劳作。学生对朋友和同事的日常逮捕作何反应？他们对受害者表现出怜悯，还是要求深化清洗，揭露最后一个托洛茨基间谍？审判秀是如何被接受的？有赞扬吗？有反对吗？是否存在非官方的语言替代品（即使非公开场合），如果有，是谁推动了它们，如何以及何时推动的？⁷⁹ 以及对于死亡的态度呢？在弥赛亚时代，这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为何自杀不被视为体面的退场？

当分析学生的自我呈现和互动策略时，发现它们与一系列问题相交，从理想的斯大林主义自我到观念、情感和幽默在政治暴力中的作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术语成为存在的坐标，定义着对与错、纯洁与污染、忠诚与背叛。党员不应被设想为易受年龄、性别和金钱影响的社会或族群成员——新人已超越所有这些。相反，个体在这里显现为语言过程的产物：学生和教员作为末世戏剧中的代理人而存在，作为马克思所勾勒的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共产主义身份的种类

不断变化：如果说在 1930 年代初，学生以在达到完美之前各自需要走过的距离来定义自己，那么到了这个十年末，他们只能属于两个范畴，要么得救并被分配到斯大林的天堂，要么作为反革命被定罪。⁸⁰

在大清洗期间，学生们被迫做出几周前他们无法想象的行为：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揭发朋友，将父母送上绞刑架，为自己未曾犯下的罪行认罪。斯大林主义的语言战胜了他们的意志。不同于政治史家和传记作家经常偏爱的那种实质性的、有血有肉的细节，我在此收集的是词语、修辞、论述。倾听我的主角们自己如何谈论其动机，我用他们能够认同的术语来丰满这些历史行动者。

无需赘言，我并非否认历史现实的存在，但我坚持认为，接触这种现实总是已经经过语言的中介。语境就在文本之中，揭示了人们能够想什么和说什么，以及他们认为何种行动方针是合法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转向其他资料——公开证词被拿来与私人信件对照，党的决议与其基层解释进行比较——然而，这些并非被视为暗示隐藏情况和秘密议程的线索，而是视为进入语言宇宙的补充窗口。因此，在研究学生的公开演讲、流言蜚语、回忆时，我审视的是其中所包含叙事的方式，而非原因。并置同一个体的多种不同表述——自传或供词的不同版本、被撤回的推荐信及随之而来的检举、对某位领导人热情支持的表达被替换为对该领导人的激烈谴责——显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旋的余地如何缩小。

在此，我有时会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更罕见的——省份的其他学术机构中举出例子。我会偶尔跳出学术圈子，聆听诸如尼古拉·布哈林、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等截然不同人物的言论。在某个短暂瞬间，读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军事高层指挥会议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乡间别墅之中。这里浮现出一个重要观点：基层党组织的文书档案、中央委员会层面的审议记录、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备忘录，乃至学生信件和日记，都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词汇、习语、措辞方式，甚至笑话几乎完全相同。这种可互换性突显了斯大林主义语言的通用性，它能在不丧失内在连贯性的情况下应对任何听众。

共产主义大学如同任何其他党的机构一样，依赖于从高层传来的信号。地方话语在 1930 年代每几年（在大清洗期间则是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突然而深刻的变化，并且

这些变化并非起源于本文所关注的小型社群。尽管话语分析通常排除强大的、引领潮流的中心，但共产主义话语总是有着清晰的源头。⁸¹ 诸如“托洛茨基分子走私品”、“季诺维也夫分子破坏者与怠工者”、“法西斯-日本间谍”等术语，是由斯大林及其核心圈子引入流通的。⁸²

然而，警惕者们的角色远远超出了服从：他们从不“被动”，从不“沉默寡言”，而是必须表现出识别敌人的足智多谋与机敏。⁸³ 斯大林在 1937 年 6 月 2 日对军事高层指挥官的讲话中，毫不含糊地阐明了他们的职责：“每个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去告发……告发机制必须更好地发展……以便每个人都能观察、记录每一个缺点、每一个故障，找出敌人……有些人认为中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完全不是这样。中心只看到一部分；其余的只能在基层看到。中心提名干部，但并不能百分百了解他们。当地人必须对他们进行评估。”⁸⁴

莫斯科或许是话语的触发器，定义了议程，但基层必须在阐释、扩展和即发挥规定主题方面表现出热忱——这些考量使得通过话语视角审视斯大林政体具有合理性。中心可以发明抽象的邪恶范畴，但基层为这些范畴填充了内容。前者进行理论化，后者进行指认，例如反复要求增加逮捕配额。⁸⁵ 即使当 1938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信号，表明警惕运动已失控时，列宁格勒的学生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再清洗任何人。相反，最近的决定帮助我们区分了真正的敌人和冒牌货。”⁸⁶ 莫斯科试图停止清洗的努力适得其反。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主体与国家关系的问题。⁸⁷ 极权主义方法论谈论威权主义、暴政和压制，将全能的总书记与无力的个体对立起来。⁸⁸ 按照这种论证路线，私人领域，即表达真实自我的神圣空间，被国家侵犯并最终完全占据。个体相互隔离，被阉割并变得毫无防备。难怪他们变得偏执并开始相互告发。⁸⁹ 修正主义者反驳说，仅强调压制的场景偏离了靶心，它将官方话语呈现为外在于个体的东西。虽然一些党员确实害怕深夜的敲门声，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是国家强制力能够加速共产主义神圣化的热情信仰者。

我个人对于大清洗期间能动性问题的研究路径，源于对史学中个体处理方式的不满。

质疑只将能动性归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极权主义解读，我表明行政法令实际上被基层积极接纳。同时，我也对修正主义的解释提出异议，它唯独聚焦于利益作为动机因素。塑造斯大林主义自我形成的力量并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运作，而是构成了一片由共产主义信仰体系所界定的博弈场域。⁹⁰ 通过考察官方话语如何被挪用，而非谁产生了它以及为何产生，我意在表明新的自我观念——诠释学、本质化的道德品质、诱导忏悔，以及所有这一切——在整个苏维埃体系中被付诸实践。⁹¹

但是，将学生与国家、主体与其语言相融合的观点，是否有可能掏空大清洗最显著的特征？“恐怖”这个术语本身——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它表征了那个时期——是否并非预设了个体与某种恐吓他的力量之间的某种分离？⁹² 苏联的氛围是否配得上“恐怖”一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一些人而言，“恐怖”代表“对法外强制力的广泛使用”，即国家作为一种外部施动者对个体所做之事。然而，在对民众的普遍恐吓与笼罩着大清洗诸多方面的隐秘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尽管有莫斯科公审，但大多数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死刑被伪装成“十年监禁，不得通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汽车，俗称“黑乌鸦”，实际上被漆成浅色，并印有“肉类”或“面包”等字样。⁹³ 参与逮捕和调查工作的共产主义学生签署了“保持沉默”的特别文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1937 年要求“对执行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全面且彻底的保密”。⁹⁴ 这一矛盾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些人质疑人们是否真的害怕国家这一假设。⁹⁵

在不断从解密苏联档案中涌出的新材料推动下，这场争论鲜有平息的迹象。然而，远不能确定问题本身取决于证据，档案揭示本身就能厘清事实。更确切地说，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术语本身：我们所说的“恐怖”究竟意指什么？即使我们假设共产党人确实恐惧某些事物，恐惧本身也是一个需要更仔细审视的心理范畴。虽然人类情感显然取决于历史语境，但断言共产党人因被剥夺和死亡的威胁而感到恐怖，所依赖的是一种非历史的观念，即一个不变的、普通的施动者总是渴望和恐惧相同的事物。⁹⁶

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埃德蒙·伯克指出，恐怖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它唤起了“崇高”——那种奇特的

将恐惧与狂喜熔铸为单一情感的人类境况。⁹⁷ 正如伯克所见，恐怖的两个方面紧密相连，因其都易偏向各自的对立面——每份希望都承载恐惧，每份恐惧又通过转向相应希望来自愈。1937年8月一群农民写道：“斯大林的宪法令我们陷入狂喜〔俄语：Восторг〕。”“没有哪个国家比苏联更知晓幸福”，另一些人在1938年6月附议道，并力主同时“无情铲除那些将手伸向宪法成果的内部敌人”。⁹⁸ 作家亚历山大·阿菲诺格诺夫声称自己生活于弥赛亚时代。“你想成为这个目标的参与者，还是无生命的物体？”他在日记中自问。下一句早已注定：“当然是参与者！”阿菲诺格诺夫甚至欢迎被党碾碎的前景，只要他能为历史的终极圆满贡献力量。⁹⁹

那么，斯大林的信徒们是否可能既为彻底清洗的前景所振奋，又因被划入反革命阵营的恐惧而战栗？这种对恐怖的理解，调和了关于大清洗的矛盾评估——有人视其为充满极度恐慌的时期，有人则视其为精神昂扬的岁月。确实，一种意外、奇异却又无处不在的焦虑，弥漫于当时共产党人的自我呈现中。这种自上而下授意的、在此历史发展阶段被期待的同志间对自身纯洁性的信心，从来都不是绝对稳固的。

每位共产党员都理应宣扬无产阶级真理并迫害异端邪说。通常，这两项使命并行不悖，因而不会引发道德冲突。但疑虑有时会潜入人心：某些官方政策可能大错特错，使革命陷入危机。由于没有党员能免除道德责任，某些同志便愿将自己的命运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命运相连。这绝非自利之举——共产党人目睹太多友人遭清洗流放，不会自欺欺人地幻想成功可能——反对派立场表达了一种根本性焦虑：斯大林错了，日后真相大白时，那些知情却袖手旁观者，终将在历史面前承担责任。

个人的良心与对党的机构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大清洗中达到了高潮。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殉道史膨胀到了恐怖的程度，因为那些对官方政策持有一些批评态度的同志们被命令自我谴责。大多数人同意这样做，希望能拯救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或者给党留下一份临别礼物。其他人，一小撮，坚持他们的个人真相，并争辩说他们宁愿死也不背叛他们对政治局势的理解——

政治局势的理解，但这样做也是为了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

通过审视共产主义关于殉道的观念，可以构建一种不同的大清洗现象学。我怀疑仅靠酷刑和粗暴的外部力量能否产生如此丰富且幻影般的忏悔。一种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甚至可能邪恶的个人的焦虑，在共产主义者内心深处折磨着他们，有时会引发古怪的供认。共产主义者担心他们确实是审讯者指控他们的邪恶敌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恐怖存在于灵魂中。

• 1 清洗之风

在边缘

1930年代，苏联历史进程不断加速。万物皆非原貌；一切皆受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利刃裁切。¹ 经济首先被改造，继而是社会。最终，在该年代后半叶，斯大林领导层决意通过变革人类思想本身来巩固胜利。共产主义身份具有可塑性，由内心修炼塑造，而非法律或任何其他惯例赋予。传统毫无意义：年轻共和国的每位公民都被要求与过去决裂，作为自由主体进行自我改造。² 这绝非易事。“人的重生不同于修理拖拉机，”亚历山大·阿菲诺根诺夫 1932 年戏剧《恐惧》中的主角如是说，“站在流水线上的贵族并不完全是无产者。”³ 数年后，另一位著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庆祝了一项成就：“虽然我们可能借鉴了美国拖拉机的型号，但我们的拖拉机手无疑是世间前所未见的新人。”⁴

为打破困扰俄国经济数代的工农业部门僵局，中央委员会于 1929-30 年押注快速工业化，以求斩断戈尔迪之结。⁵ 急速集体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自上而下引发的最剧烈社会变革——同时实施。集体农庄吸纳了工业开始大批量生产的拖拉机，实现了耕作现代化，并将农民送往城市。⁶ 抵制者被划为“富农”，或遭流放或被枪决。⁷ 都市中心的小商贩遭遇类似处置——即使是仅拥有几只鸡或一个香烟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亦被宣布为非法。⁸

至 1930 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专政已相当自信。

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宣传员声称，他们知晓在斯大林巩固对国家掌控的年代里，哪个阶级已占据上风——“谁击败了谁”（*kto kogo*）。⁹ 学生们被要求背诵一系列源自集体化与工业化“史无前例成就”的老生常谈，诸如“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失业现象已被彻底根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创纪录时间完成”。¹⁰ 宣传员宣告，社会主义已在各条战线取得胜利。从其公开声明判断，大学领导层满意甚至自满。无人预见即将摧毁当地党组织的大屠杀。

1936 年春，在整个领导层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前数日，共产主义大学计划举办精心设计的展览会，以纪念对社会主义胜利的贡献。描述展馆布局的档案为大清洗正式启动前该校的自我认知提供了珍贵缩影，展出的各类文物代表了 1930 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价值观的全面清点。据官方宣传，社会建设的胜利已将国家从数百年的落后中解救，并开创了一个进步、开明的社会。

展览墙壁上的文字将苏联历史与共产主义大学历史并置，呈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阶段。激励苏联事业的著作被精炼成简洁的格言、箴言和口号，并与编纂这些文本或赋予其权威的党的领导人的照片并列展示。题词与照片之间的空间关系，直观地传达了相关的政治与学术等级体系。

展厅中央墙壁覆盖着红色绸缎，上面钉有记录社会主义建设里程碑的表格。靠墙放置的玻璃柜内陈列着大学教员撰写的书籍。展览目录中提供如下描述：

墙壁中央：列宁旗帜，大幅版本。

左右两侧：马克思与恩格斯浮雕像。

下方：斯大林半身像置于基座上。半身像环以鲜花，刻有“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同志）。

面板左上角中央部分：基洛夫肖像。肖像下方格言：“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胜利学说的旗帜”（基洛夫同志）。

中央右侧：日丹诺夫肖像。肖像下方格言：“让社会主义干部成长、壮大并繁荣”（日丹诺夫同志）。

每条格言的真理性都通过后续格言得以传递和阐释，最后几条格言传达出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关注个人、意识与纯洁性的新焦点。

观众在依次浏览这些图片与格言时，将看到共产主义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沿三个轴线展开：在普世层面从马克思到列宁；在国家层面从列宁到斯大林；在省级层面从基洛夫到日丹诺夫——后者是 1930 年代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两位领导人。这些轴线自然是相互关联的：斯大林如今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而列宁格勒则是世界革命的摇篮。

展览的主要目标是教育性的，每件展品都被构想为自我塑造的载体，帮助学生融入大学集体乃至整个斯大林主义社会。在创建展览时，党委将自己视为熟练的雕塑家，以大理石（政治体）为材料，剔除多余部分（旧思想残余），雕琢出具备共产主义所需品质的个体。社会建设的隐喻占据主导地位。

展览暗示，若非共产主义大学成功培养了几代杰出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近来的胜利将不可能实现。党承认了这一点：在面板中央，安德烈·日丹诺夫——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肖像下方，悬挂着列宁旗帜授予大学时拍摄的照片。题词引用中央委员会的话：“大学已为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培养了数千名忠心耿耿的管理者。”下方是大学毕业生晋升至领导岗位的照片；再往下是按职业分布的毕业生统计表。相邻的面板通过将大学当前的荣光与其神话般的诞生相联系，阐释了这些经过大学培养者的非凡成就。一份日期为 1918 年夏的地方报纸头版复制品，标题为：“北方公社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工农大学。”附录列出了早年曾就读于该大学的著名男女。

两个面板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开拓者致敬，其中有些已逝，有些尚存：这些是学生应效仿的榜样。其中突出的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肖像——“1918 - 21 年间大学领导人之一”——他在作品中生动描绘了“新人”。高尔基左侧悬挂着“大学首任领导人 V. 沃洛达斯基”的照片，他是 1918 年在彼得格勒遇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右侧是鲍里斯·波泽恩，这位传奇校长将大学从反对派手中拯救出来，并成为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主要行刑者之一。但任何更仔细的审视都会发现这幅图像叙事中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季诺维也夫——大学直至 1927 年仍以他命名——后来被证明与托洛茨基结盟，在展览中明显缺席；S. K. 米宁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是波泽恩之前的大学校长，在 1925 - 26 年的政治摊牌中站错队后，被从大学名人堂中除名。

在这些图像正下方悬挂着最后一幅肖像，对观看的学生而言或许是最具启发性的。上面题写着：“里哈德·雅科夫列维奇·普雷德。我们现任校长。”中央委员会于1931年3月15日任命普雷德。¹¹ 在参与大学事务期间，普雷德获得了许多荣誉。1932年，他被提名为最高苏维埃下设的知名教育委员会成员。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鉴于其“杰出工作”，授予他荣誉证书。1934年，校长获得了极为荣耀的列宁旗帜，并当选为第十七次党代会代表。因此，普雷德作为政治人物的显赫地位超越了其在大学的职位：他既是列宁格勒地区 and 市党委委员，也是区委常委会成员，同时还出现在全国《干部名册》上。此外，普雷德在审视失足共产党员灵魂方面的卓越表现，使他在负责审查列宁格勒市清洗申诉的委员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¹²

普雷德肖像的左右两侧是“大学与宣传员学校的十位领导人”的照片。等级稍低一层的是十五位被标记为“我们主要的教学人员”的教员。这些人中几乎都将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十位“领导人”中至少有八位，十五位“教学人员”中有九位将在年内被捕，其中大多数人此后再无音讯。¹³

但在展览举办之时，大学要员们正忙于培养学生，而非试图自保。¹⁴ 共产主义大学将自己视为更广泛的苏联教育实验的缩影。展览的第三部分题为“大学：社会主义建设的干部熔炉”，利用大学更名来阐述国家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讲述了大部分故事。该大学原名季诺维也夫大学，1929年更名为斯大林国立共产主义大学。¹⁵ 随后，正如一份展览海报所述，“1932年9月，我们成为‘斯大林国立高等共产主义农业大学’——‘社会主义农村的党干部熔炉’。”¹⁶ 这一部分还突出展示了负责教授科学农业和农村经济学的教师姓名，以证明该大学为其对集体化所做的贡献感到自豪。

尽管这一群体在展览叙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成员体现的是集体化理念，而非其创造者。展览中关于农业的众多格言均归功于党的领导人：

“有真正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掌舵集体农庄，我们就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能在经济建设领域创造奇迹。”（斯大林同志）

“让我们为新的乡村——集体农庄的乡村和农业农场——培养专业的革命者。”（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们的任务是铲除城乡矛盾的最后残余。”（日丹诺夫同志）

在 1933-34 学年，约有 1200 名学生正在接受培训，准备担任集体农庄主席和至关重要的拖拉机分配站站长。约一百名研究生正在“丰富他们在农学和土壤耕作方面的知识”。¹⁷ 一个姊妹机构，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于 1930 年成立，旨在向高级学生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保存了集体化运动已从常规大学课程中剔除的学科。¹⁸ 只有拥有至少六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大学毕业生才被允许入学；1935 年，该学院的注册人数增加到一百多名男女学员。¹⁹

尽管为自己的学生感到自豪，党仍然密切关注他们的资格。远非展览参观者所见，学生个人档案中的文件包括一份经核实的调查问卷和自传；证明党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证书；表明该学生已成功通过 1929 年和 1933 年大清洗的印章；以及最后，“详细的个人评价”（*kharakteristiki*）。这最后一类文件尤为重要，通常会断言学生的智力、集体主义态度和政治可靠性。然而，归根结底，是否适合成为党员是一个涉及纪律、坚定、决心和忠诚等品格特征的问题。

当集体化的推进势头减弱时，普雷德看到了重塑大学的机会。他提议将其“转变为一所宣传员学校。学生课程负荷严重偏重社会经济科目，这使我们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域知识。”²⁰ 1936 年，该大学重新获得了其作为意识形态堡垒的地位。²¹ 随着其教育使命的趋同，共产党员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它们共存的最后一年里，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展览的第四部分，致力于重振宣传学校，反映了对意识形态、历史和理论的重申承诺。简短的格言标志着从经济学向政治的转变：

左边，在一幅红色游击队员照片后面，悬挂着格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真正的科学，教导劳动者如何战胜敌人。”（基洛夫同志）

旁边的框架解释道：“不全面研究党史，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党的当代政治。”（中央委员会决议，1935年3月29日）

共产党员大学在不同层面教授党史：十三个学生学习小组、十二个面向工人和雇员的圆圈，以及一个“致力于研究列文”的高级圆圈，在其出色的图书馆里竞争书籍。²² 此外，1934年12月，普雷德创立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讨会，“旨在提高我们教师的政治水平。”²³

展示大学阅览室及党史角落照片的玻璃展柜，以及详细说明学术课程的图表，位于展馆中央由四块展板形成的方形空间中间。参观者应该直面最近成为必修课的两门学科：“列宁主义”和“党史”。他或她也被邀请浏览每位学生在结业考试前都应掌握的书目。日丹诺夫的两条诫令毫无疑问地表明，斯大林的教导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党的教条：

“更高地举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可战胜的学说的旗帜。”

“我们的胜利缔造者、我们睿智和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²⁴

斯大林主义乌托邦人类学的兴起体现在庄严的官方宣告中：在完成基本经济任务后，苏维埃国家现在将关注个体。展览的设计者没有错过这一转变。致力于“争取学业优秀斗争”的第四块展板的关键部分，展示了斯大林的另一句格言：“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干部。”根据该大学的期刊，在资产阶级国家，工人是“机器人，会走路、会说话的机械玩偶……而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干部真正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的，‘由人引导的技术能够而且必须创造奇迹。’”²⁵ 这一陈述凸显了193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信念，即“新人”可以从自身内部汲取无限的资源。²⁶

展馆墙壁传递的信息必须放在官方不断进行的自我提升运动的背景下来理解。首先，学生必须学会如何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共产党员是

其党的战士，”一条大学横幅如此教条地说。“他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在执行党的决议时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力量。”万能的突击工人在这里显然是榜样：由于卓越的团队合作和重组，安德烈·斯达汉诺夫设法将煤炭产量提高了十四倍，引发了一场生产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工人和学生都参与其中。²⁷

描绘在展馆左上角画框中的日丹诺夫，敦促学生效仿这位伟大的生产英雄：

让我们响应斯大林的号召

以更快的个人成长，更快地发展胜利社会主义的干部

1935年11月，该大学的党组织开会讨论斯大林在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当生活幸福时，工作就轻松了’——这句格言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核心，”学生们宣称，呼应他们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家，公民工作不是为了让恶棍致富，而是为了自己的阶级。”²⁸

斯达汉诺夫的理想预示了“身心合一”，并被该大学热情接受。²⁹普雷德在强调其适用性方面毫无困难：“学生必须为学业上的辉煌而奋斗，”他宣称。³⁰“我们都将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合唱团誓言回应，“目标不是‘良好’而是‘卓越’。”³¹大学发起了以最佳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竞赛。“我们的学生必须通过突击工作方法吸收主要理论文本，”历史教师伊万·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宣称。³²党委引入了“个人鉴定”，描述每位学生的学业进展、“日常行为以及纪律水平”。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大学宣布拥有23名“优秀学生”（отличники）和101名学业“突击工作者”（ударники）。³³

作为斯达汉诺夫式自我塑造的启蒙教学，共产主义大学的期刊从1936年初开始刊登描绘值得赞许行为的文章。这些短篇素描，每位参观展览者都被邀请重读，其趣味并非在于对日常大学生活的准确描述，而在于其作为灌输个体成长典范叙事的启发性工具。请看那位承诺以优异成绩完成第二年学业的学生季托夫是如何细致规划其一天的：“通常，我在课前复习笔记。课后，下午四点到六点，我读报和吃饭。六点开始复习课堂笔记，确保记住要点……我承诺今年至少帮助我小组里的一名同志成为更好的学生；这项活动提升了

我对材料的掌握。”³⁴ “我的工作日从早上九点开始，午夜结束，”另一位学生指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的办公室里。”“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知识，”第三位学生说，“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学习。”大学党委相信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够帮助党推翻狭隘、保守的工作模式，打破旧规范，并代之以新的规范。”³⁵

展览不仅庆祝教育上的成就，也庆祝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大学的一幅横幅宣告：

共产党员是其党的战士：

他无畏且毫不妥协，展现布尔什维克的能量，执行党的决议。³⁶

学生们被要求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棱镜来解读世界，成为历史发展的催化剂，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图表记录了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书籍和参加戏剧表演的频率。³⁷ 其他展览展示宿舍内的娱乐活动和体育赛事：党最优秀的儿女不仅知道如何工作，也知道如何享受闲暇。

但“新人”只是故事的一半。³⁸ 展览的设计不仅是为了祝贺成功的毕业生，也是为了动员学生投入对抗敌人的战争。如此盛大的展览，若缺少对那个邪恶的“他者”——破坏者和意识形态异端——的展示，就不算完整。一幅巨大的横幅写道：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习十月革命后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及其他反党分子进行斗争的最重要阶段。

显然，通向纯洁的道路是滑溜的。³⁹ 日丹诺夫的评论，“如果不掌握党与其内部敌人斗争的细节，我们就无法确保革命警惕性”，经常被大学的宣传人员重复。⁴⁰ 武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直觉，学生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参观者不被允许忘记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的智慧和警惕因此向所有人证明：1927年，左翼反对派被击败，托洛茨基被流放。⁴¹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乞求原谅，并暂时被归还了党证。不久之后，由布哈林和李可夫领导的右翼反对派也被解职。⁴² 1929年，斯大林庆祝了他的五十岁生日，这一事件与他一人统治的巩固相吻合。⁴³

一个标有“我们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奋斗”的醒目展板，重新概述了党与反对派的斗争。在标语“我们的任务是捍卫列宁主义教导的纯洁性”下方，展示了一些剪报，这些剪报传达了“我们的大学是如何清除异己分子的”。一块固定在展板上的笔记本，记录了党委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是针对在反对思想错误的斗争中投票反对重要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学生。那些勤奋阅读笔记本的人因此追溯了顽固反对派的故事，他们拒绝接受官方政策的智慧，并目睹他们被剥夺党籍。⁴⁴

其中一位反对派是帕维尔·谢苗诺维奇·波波夫，一个脆弱而悲剧性的人物。波波夫的内心反省表明，与大清洗相关的态度和实践实际上早于高度斯大林主义，并在革命传统中有深厚的根源。

个人背离

1930年10月末，一封最不寻常的信被发送到列宁格勒大学党组织的局，信中学生波波夫宣布他拒绝继续支持五年计划。这种厚颜无耻是闻所未闻的；对于一个有九年党龄的党员、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

但信件及其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这封信今天读起来是一份惊人详细和深刻的文件。⁴⁵ 对斯大林和政治局最近着手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批评，证明波波夫对此非常认真，并因他决心认同共产主义理想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而遭受了相当大的痛苦：

在对党整个历史进程中遵循的政策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后，我得出了解释性的关键点：要么党的政策目标——实现社会主义——是可能达成的，那么现行政策就是正确且一贯的；要么社会主义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党的政策自始至终都是错误且谬误的。

在这两种选项中，我最终选择了后者：社会主义工程在我看来在原则上是不可行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一个许多人怀揣却无法企及的梦想。即使我们绞尽脑汁去尝试，依然无法建成社会主义。诚然，我们可以继续认为自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实践中我们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摧毁了旧事物，却未能创造任何新事物。最终我们回到了原点[（谚语：竹篮打水一场空）]。⁴⁶

在这份惊人的声明之后，波波夫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使他形成当前观点的思考过程。虽然信件的大部分内容读起来像一篇经济学论文，但这项分析具有非常个人化的特质。其冷静而坚定的语气——波波夫非常清楚他的想法是彻底的异端——就像一个人在审视自己绝症的发展和最终结局。他偶尔提到“我们”错误的政策，揭示了赌注对波波夫个人而言有多高，他经历苏联僵局的过程有多切身。在发展他对社会主义的愿景时，波波夫明确表示他仍然非常依附于它。他的社会理想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剥削、阶级斗争、战争和革命都不存在。”波波夫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根除作为连接人们的纽带的市场原则，以及社会分化为阶级的现象：“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体系：人们将有意识地共同劳动，首先按能力获得所需的一切，然后按需分配。

”⁴⁷

波波夫的风格有两个突出的方面。首先，他频繁使用连词“因为”，这表明存在一个强烈的因果原则，并反映出他假设历史是不可避免地前进的。⁴⁸ 同时，与他对客观性的信念似乎矛盾的是，波波夫的文件显示出他对他所描述之事的人性后果的浓厚兴趣。在他看来，他的分析中这两个方面在共产主义思想中是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者批评欧洲悠久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并非因其目标——平等、正义和自由——而是因其未能发展出实现这些目标的科学手段。马克思主义将提供这种手段。因此，波波夫将冷冰冰的经济分析与对完美社会的理想化描述结合起来，而他现在认为共产主义无法创造这种社会。

这封信既不武断也不具有攻击性。其文本枯燥、分析性强，充满了科学术语——没有流露出个人情感。然而，由于共产主义神话赋予了个人自我作为历史推动者的突出角色，个人化的语调确实会不时浮现。党员被期望将革命内化，并赋予它一个不仅由历史的客观进程定义，而且由他们自身个人精神发展定义的诠释。波波夫心碎的原因，恰恰在于他的信念与他完全认同的政权所倡导的政策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为什么我会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波波夫问道。然后他通过描述大约十年左右布尔什维克在生产管理方面的实验来回答自己的问题，仿佛在讲述他个人的历史：“在内战期间，我们有机会或多或少平静地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然后我们遇到了战时共产主义。

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政策，无论多么符合社会主义，都阻碍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我们走了一条迂回路线，引入了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旧的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复兴，即通过市场中介运作的资本主义。一切都回到了老路，唯一的例外是，现在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国家取代了生产和贸易中的大所有者。”当新经济政策繁荣到开始威胁苏维埃政权时，它迫使国家陷入了一个不可能的境地：“国家本应维护新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和逆转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必须被提出。”⁴⁹

然后是决定性的时刻。党最近开始的政策本应显示“社会主义抱负是否可行”，但波波夫回忆起自己当时有严重的疑虑：“在纸面上，党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首先是收缩，然后是挤压，最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要素——先社会主义，然后共产主义。”⁵⁰ “展示力量’并攻击所有资产阶级要素”，党曾谈到“在全面集体化地区清除和消灭资本主义要素。如果国家允许富农和小商贩自由行动，他们将阻止无产阶级按时实现其目标。”但国家与苏联社会许多阶层之间的一场巨大冲突即将来临。⁵¹ “一旦开始尝试提高社会主义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权重，”波波夫发现，“正常的贸易平衡就被打乱了，商品被囤积，物价上涨。”⁵² 纯粹的经济干预未能改善局面。于是施加了行政压力：必须用武力从农村榨取商品，以产生工业扩张所需的资本。⁵³ 当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谈判让位于——比如说——禁止面包投机或“拍卖”无法缴纳税款的富农的财产时，国家机构发现自己“无法确保正常的经济运转”。波波夫认为，最近几个月的事件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无阶级的社会永远不可能通过渐进方式实现。⁵⁴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宣称，“相互排斥，无法和平共存：其中之一必然消亡。”⁵⁵

波波夫并没有发现斯大林的威权措施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确实，我们党追随他们的脚步。然而，现在难道不是拉马克思胡子的时候了吗？尽管他给我们留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辟分析，但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⁵⁶

削弱波波夫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与其说是富农对党的抵抗——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最终会克服这一点——不如说是连那些预期会被集体所有制的好处轻易说服的、更弱势的农民，也拒绝抛弃他们

过时的经济理性。⁵⁷

作为一名好马克思主义者，波波夫知道他在印刷品上遇到的每一个理论都必须“在实践中检验”，他自愿参加粮食采购工作，以便观察农民的行为。正是在那时，他亲眼目睹“他的结论得到了证实：为实施计划所做的巨大努力并未产生结果。亘古不变的农民不会停止觊觎可以买到一切东西的私人市场。”⁵⁸ 农民们团结起来对抗国家，对城市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今年夏天我目睹了一个多么奇特的情景！我与部分地方领导一起播种和收割谷物，而农民——这些谷物的所有者——却袖手旁观。尽管谷物正在腐烂，他们只是旁观。”作者无法忘记这令人不安的景象。⁵⁹

农民拒绝按照党为其制定的规则行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回想一下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消灭的：今天富农被铲除，明天就轮到在此期间富裕起来的中农。任何教科书都会告诉你，资本主义起源于小农经济。”波波夫继续写道，不消灭他们，就不会发生真正的经济变革。但一旦农村资本主义受到威胁，那些“害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受害者、即害怕被列入富裕阶层而遭消灭的农民，就会拆分家庭并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仅仅为了生存。由此他们将社会主义存在的物质基础削减至零。”⁵⁹ 这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可走：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榨取剩余物资”——即没收当局认为超出直接消费所需的一切粮食。波波夫认为，如果能在几年内完成这一政策并达到改善的生活水平，或许还不算太可怕：“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农民阶层已证明它能让经济扩张陷入停滞。想想今年夏天发生的无数次工业生产中断吧。”⁶⁰

为平息这种政治需求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冲突，党组织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合并农户。⁶¹ “这些措施的实际结果是什么？”波波夫问道。“有些人会说，是集体化。”有人会这么说，但波波夫不会。尽管关于平等主义农民公社的讨论不绝于耳，农民依然是私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农民经济无法完全集体化。首先，每个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民必然将自己贡献的牲畜和工具视为私有财产而非社会主义财产。若当初放任不管他会更自由的想法将始终萦绕其心头。其次，社会主义分工无法为农村提供所有必需品，这是另一个让农民与集体农庄疏离的因素。”

“在市场上农民本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在集体农庄里他只能领取分配到的物资。”⁶² 苏联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与“我国工业庞大的资本支出”使本已复杂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无论党多么努力建设重工业和大型农业企业[国营农场]，结果必然与党的意图相冲突。我们正在砍断自己所坐的树枝。”⁶³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波波夫被迫与共产党的政策决裂。在波波夫叙述“当党干预经济生活时会发生什么”的较为阴郁段落中，他不再使用“我们”，转而采用被动语态。这不是一个抵抗的斗士，只是一个灰心丧气的信徒。⁶⁴ 波波夫并非同情那些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对他而言，农民是愚钝、心胸狭隘的生物，是受本能而非理智驱使的野兽——他毫不掩饰对农民心智的蔑视。但他已对党能否将农民从乡村的愚昧中拯救出来失去了信心。

然而，波波夫逐渐意识到，他关于农民的结论可能适用于普遍的人性。他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是受普遍主义驱动的观点。最终，他阴郁和厌世的观念扩展至全人类：“人是被驱使去行动的——这里我说的‘人’是指工人——不是出于意识，而是出于需求。随着建筑工地四处涌现，每个人都开始寻找最温暖的地方。”其隐含意义令人震惊：“人永远无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⁶⁵

最终，波波夫甚至质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对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他担心社会主义对个人的要求与“自然法则”相矛盾。波波夫从达尔文主义中汲取隐喻，主张人类是动物王国的一部分。通过抹除本能的野兽与人类之间的主要区别，他揭示了进步史观是一种神话。根据波波夫悲观的看法，社会是一片丛林。⁶⁶ 他认为，历史变迁总是为特定个体服务，却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但从不为全人类服务：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并非遵循特定个体的意志，而是通过意志的冲突来实现的，这种冲突源于普遍的生存驱动。若非这种生存斗争，人类的生产力就无法得到发展。

相信历史遵循一个预先制定的计划，意味着要求历史以某种特定方式发展。但时钟无法倒转。生产关系最终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恰恰相反，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它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

历史只能沿着一条路径发展，这条路径基于个体之间的冲突和残酷斗争，有时量变转化为质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必须让开，否则将被践踏。⁶⁷

波波夫的结论是异端邪说：“人们应该适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试图改变它们。不仅如托洛茨基所言，社会主义无法同时在一个国家建成，而且它根本无法在任何地方建成……，因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考虑到波波夫的基本假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如此接近，这一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作者继续相信经济支配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即使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社会斗争是变革的催化剂——对他来说也依然不容置疑。但波波夫却接受了落后的资产阶级观念，即经济科学与人类解放毫无共同之处。科学分析与伦理理论的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已将其抛弃。⁶⁸

值得注意的是，波波夫自认为是一个有意识的无产者，却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正是因为他的背离如此理性、如此自觉，波波夫才能解释其起源：“我上面描述的那些想法在我脑中酝酿已久。”苏联近期的困境引发了决定性的决裂：“或许，我自言自语道，最新的僵局源于试图做不可能的事。”

波波夫并未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但他的思想力量使他偏离了党的路线。尽管他采用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设，但他意在说服读者，自己并未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意义，而非利润：

倘若我确信社会主义终究仍能建成，我定会坚定执行党的政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我和共青团员们一同进入矿井，使矿井免遭水淹之时，我难道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再举一例：当我在（国内战争期间）抓起步枪，无畏地向匪徒发起进攻时，我难道不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吗？同样，1923年德国（革命）爆发时，我也是首批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加入红军的人之一。那时，我明白自己为何准备冒一切风险。但现在我已失去那份信仰，也不再知道自己究竟该为何牺牲。⁶⁹

在这一段中，波波夫的性格与生平细节得到了最强烈的展现。这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尽其所能地拖延，直到最后才显露其戏剧性的背弃；他曾“试图改造自己”，但徒劳无功。最终，他决定“承认一切。我的想法迟早要公之于众。”

这封信以一次戏剧性的自我开除达到高潮：“我完全清楚，我的举动使我置身于党外。但我别无选择——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既然说了 *a* 就必须说 *b*。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随信附上我的党证，编号 0651850，由顿巴斯党组织于 1922 年 11 月 4 日颁发。”⁷⁰

波波夫的信充满了伦理与存在主义的反思，反映了其作者对绝对正义的追寻。当然，一个自我不能仅仅通过诗意的隐喻和精心构建的叙述来实现。实践同样重要，对于一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而言，这包括自我约束和对自我的审慎审视。波波夫必须弄清自己是谁；理解自己最私密的思绪、疑虑和动摇的根源与本质；纠正并改造自己，使之成为党军队中的一名战士。

下文我将考察一组自我揭露的实践，此时波波夫的自我成为了被告与其审讯者之间对话的主题。这里需要区分共产主义自我叙述的诗学与政治学。诗学驱使波波夫将他的信构造成一个献身的（尽管深感幻灭的）革命者的自画像。政治学则驱使他与批评者进行一场口头交锋，以捍卫他的自我呈现。

“波波夫事件”于 1930 年夏季发生在朱拉尼希诺村（丘马什地区），当时波波夫和其他苏联大学生被派往农村，帮助从桀骜不驯的农民手中征收粮食。党需要在农村（特别是西伯利亚西部，激进的粮食征收技术最初就在此试验）拥有可信赖的使者。⁷¹ “始终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列宁格勒党组织宣布了“七百人动员”，将忠诚的积极分子派往农村，为集体农庄制度奠定基础。⁷² 来自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 120 名志愿者（均为高年级学生）被分成五到十人的小组。

与当时的一般案例不同，波波夫的案子最初由他的同伴审理。1930 年 10 月 23 日，他所在的工作队在下班后召开会议，讨论他因“与党的政策存在尖锐分歧”而请求免除粮食征收工作的申请。每位学生都陈述了波波夫生平的概要，然后他们全体开始了一场简短的审讯，就其思想和意识形态立场对波波夫进行盘问。案件严重到需要长时间商议——波波夫在场并保留发言权。适时，工作队对波波夫的心理状态和意图做出评估，起草了一份文件，该文件将作为上级党委作出裁决的依据。

关于波波夫的真相是在他与他的告解者之间长时间的口头和书面对话中逐渐浮现的。在一次详细但相当随机的盘问过程中，波波夫透露了他的部分思路：

问：你对贸易有何看法？

答：我赞成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只有贸易不受束缚，社会 and 经济发展才有可能。

问：你对党所依靠的支柱有何看法？

答：在（关于农村阶级分化的）任何问题上，我与党都没有一致之处。我认为无需闪烁其词：粮食征收配额影响了中农和贫农家庭，而不仅仅是富农。

波波夫对斯大林革命的根本原则提出了异议。“那么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执行党的决定？”学生们质问道。“我只是在形式上执行，屈从于党的纪律，”波波夫回答。但党员不能仅仅依靠纪律生存：内在的奉献至少同等重要。

由于从未受过审问异端的训练，波波夫的审问者们（只有五名学生在场）无法胜任盘问他的任务。他们对他们简短问题给出的冗长回答很快确立了他的理论优势，并使他掌握了议程的主导权。他口若悬河地引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陈词滥调：“没有斗争，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发展中的平衡，平衡中的发展——这是唯一的道路”；“一个没有斗争的王国？不存在这样的事！”并且他表现出非常愿意提供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诠释。例如，波波夫论阶级斗争：“人们可以谈论和书写它的废除，但在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论党史：“列宁从开始组织党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及：“党的路线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错误的。”波波夫甚至拒绝接受革命这一关键概念：“列宁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相反，我只相信革命能够改变生产方式。一旦这个目标达成……社会就必须通过进化来改变。指导进化的法则是：‘强者以弱者代价生存。’”

学生们显然被其异端邪说的全面性所震惊，不知如何回应。接着，一位代表整个工作队发言的学生，名叫图奇科夫，反驳了波波夫的奇怪理论。“你对

社会主义竞赛的理解是机会主义的，”他争辩道。“你把（社会主义）竞赛（*sorevnovanie*）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简单（资本主义）竞争（*konkurentsia*）。”波波夫被指控未能理解由私利驱动的特殊行动与经由普遍意识调节的行动之间的区别：“难怪他无法将集体化与粮食收购联系起来。”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并非自私行为，而是对农民进行再教育的必要步骤。根据图奇科夫的说法，波波夫的困惑也解释了为何他无法对“在新基础上重建农业”说出任何可理解的内容，以及为何他声称“用固定的粮食配额加重富农负担”是错误的。

不管波波夫是否思维混乱，其颠覆性观点都不能被轻视，工作组很快恢复了清醒。在波波夫首次受审次日，一份官方简报被送往西伯利亚党委员会。简报部分内容如下：“特此告知，波波夫已与党彻底决裂。鉴于其已不适宜参与粮食采购工作，不宜继续留在热卢尼希村。”⁷³考虑到这名学生可能影响他人“捍卫非共产主义立场”和“支持富农”，工作组希望将波波夫立即召回。⁷⁴简报指出，“目前我们已将波波夫孤立”，认定他是“对共产主义家庭有害的人”。

叙述文本透露出某种焦虑。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波波夫是如此彻底的异端，为何没有更早揭露他？答案需要在两种困境间抉择——承认他们遗漏了所有异端迹象，或是承认他们明知此人格格不入却仍招募了他。他的同学们指出：“直到现在，波波夫似乎毫无特殊之处，除了明显颓废悲观的情绪。”工作组发言人强调，波波夫本人承认“过去两年他一直在隐藏反共产主义观点”——即自党的政策转变以来：“我们说‘隐藏’[*скрывать*]是因为他在这期间表面遵守纪律——正是这点长期保护他免受怀疑。”

他从未在现实政治问题上暴露观点：“在大学参加政策简报时他沉默不语。私下交谈中也不发表意见，除了些模糊抽象的理论思辨。”但在“最近几次零散发言”中，波波夫的异端思想找到了出口。例如在丘马什区委共产党人会议上，他竟荒唐建议“应根据实际播种面积而非春季播种计划来征收富农余粮”。更严重的是在面向农民的非正式会议上，他声称集体化将无法消除农村生活中的竞争。然而当波波夫首次宣称“同志们，我无法在当前条件下继续工作，因为我明显在每个政策项目上都与党存在分歧”时，对我们而言这宛如晴天突降暴雪。”

该如何处置波波夫？普通训斥或不光彩地将他逐出集体化前线都不够。毕竟将他送回列宁格勒，实质上是批准了他解除职务的请求。此外，意识形态挑战必须正面应对。必须剖析波波夫的观点，仔细诊断其政治本质，才能实施惩罚。

他所表达的观点被细致审查：“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波波夫持有生物学观点。他说‘强者依靠弱者生存’。”这里直接引用波波夫原话，可能表明工作组不愿仓促下结论，对其信仰的评判持审慎态度。但通常他的观点由他人转述：“波波夫认为现行政策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的专政”；“在流通贸易问题上，波波夫持布哈林主义立场”。虽然这些转述反映其论述主旨，但波波夫从未提及“党的专政”或右翼反对派。学生们与其说歪曲波波夫，不如说是在诠释他，将他的言论与各种流传的陈词滥调相联系。通过这种异端言论分类法，工作组采用了一种家长式但未必完全敌视的审视；必须先理解波波夫，才能说服他。

75

这些稚嫩的工作组成员最关切的是党内革命意识的退化。尽管许多反对派支持者进入大学前是工人，但据称他们在学习期间因脱离实际劳动而退化。⁷⁶波波夫本人沉思学术研究如何导致他陷入当前困境：“正是在那里我接触到一系列助长我疑虑的哲学体系。”他怀疑自己是否病了。一度他辩称意识暂时蒙蔽：“我思维方式的原因可能是疾病，或许是环性气质（躁郁症精神障碍）。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经科医生该查的事。”⁷⁷

虽然波波夫从不找借口，但他确实提出身体腐化导致异端思想的可能性。他暗示即使坚定的同志在经历身体疾病后也可能转变心志。这类同志的思想如同太阳——意识的重要象征——暂时被月球遮蔽。可称之为“日蚀防线”的说法描述了短暂失常：日蚀后太阳重现，正如健康恢复后意识复苏；这描述的是生理而非精神困境：月球代表使思维蒙蔽的生理障碍。

波波夫初步坦白引发的震惊数日后，诠释过程继续。为诊断同志的“病症”，工作组成员撰写了另一份备忘录，此次致巴尔瑙尔党组织。在这份题为《行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文件中，工作组表达更为自信。虽因与波波夫并肩工作时间有限，尚不能完全剖析其意识形态立场，但已能描述其道德人格。在工作组更新的评估中，波波夫呈现为“逃兵伪装者……利用三年级学生身份谋取私利、保全自身”。他是“无用之徒”，“堕落分子”。⁷⁸

备忘录始终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如同当时苏联小说中典型的英雄—恶棍对比，文本以大量懦夫描写开篇。将讨论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伦理层面后，学生们开始瓦解波波夫关于自我是冷静追随理性直至最后的个体叙述。这份措辞激烈的备忘录描绘的并非小资产阶级或富农，非系统性反对党的顽固敌人，而是不堪共产主义挑战的可悲生物：

新经济政策最近阶段伴随激烈阶级斗争的复杂氛围……已暴露暗藏的机会主义者。那些遭遇日常斗争艰难现实却公开逃避责任的人，再也无法用空洞的口头表态掩护。他们彻底惊慌失措的懦弱、预示不可避免毁灭的幼稚尖叫，暴露了自身本质——只配得到蔑视的渺小生物。他们涕泪横流地乞求准许放弃与富农日益激烈的斗争，将历史车轮倒转。⁷⁹

这幅肖像的主体仅在第二段才出现。即便在那里，具象独特的个体也不如可悲的类型受关注：“不幸在我们学生工作组核心发现了一个右派机会主义态度的透明例证，一个名叫帕维尔·波波夫的恶棍。”

需要交代背景，于是讲述故事：“我们花了十天才抵达西伯利亚最落后地区之一。”尽管面对恶劣气候和田间日常劳动的要求，工作组从一开始就热情工作。无论当地农民多么不信任他们，无论当地“富农”如何抵制，学生们都坚持推进使命。他们知道必须启迪村庄，推动集体化。⁸⁰但波波夫不是如此：“工作三四天初遇艰难后，他暴露了真面目——机会主义者。”道德准则认为，阶级斗争的激化揭示人的真正品格。波波夫看似忠诚奉献的共产党员，实则是装病逃避者。尽管有害，这种控诉路线阻止了工作组将波波夫妖魔化。他软弱，但并非邪恶。⁸¹

工作组终于有信心更仔细地审视波波夫世界观，以其自身条件与这名顽固学生交锋，用其政治词汇反击，突显其思想来源：

波波夫试图以理论信念为自己的脱队辩护；他试图“论证”其反党观点，这些观点极其混乱，是各种反革命立场的杂烩。他的观点是什么？首先，波波夫认为党在掠夺独立农户。他否认农民积极性高涨，否决数百万支持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农民的热烈行动。在他看来，农业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布哈林和康德拉季耶夫理论之上，这些理论假设农村经济最好通过自由贸易和面向富农的合作社发展。⁸²

换言之，学生们总结道，波波夫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复辟。

他的第二条信条更令人震惊：“在他狭隘的市侩思维中，进化优于革命，他差点否定了社会主义理念本身。波波夫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理论家一边，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发展：‘这些教授声称’强者依靠弱者生存’”。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被单向度的社会力学取代。社会形态持续演化、稳步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趋势，让位于从资产阶级教科书借来的永恒不变、相当悲观的社会组织观：“他的研究导致他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本质上错误’！”⁸³

随后是轻松评论：“今天给他柏林签证，明天他就会成为佐尔格贝尔警察中第一批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人。”这里指卡尔·弗里德里希·佐尔格贝尔，1926至1931年柏林警察局长（社民党人）。共产国际指控他骚扰共产党人而非对抗真正敌人：德国资产阶级。学生们尖刻指出佐尔格贝尔甚至比波波夫略胜一筹：“佐尔格贝尔口头赞同马克思学说，而波波夫全盘否定马克思。”⁸⁴

,

“我们能说什么？”工作组恼怒叹息。“一个工人和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竟变成真正的法西斯！”这种转变的教训很清楚：“任何始于右倾偏差的反共行动，都会演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运动。”

但做出这些直白评估后，工作组有所退缩。最终它无法给波波夫贴确切标签。他的思想过于混杂多变，难以归入简洁公式：“波波夫的观点似乎混合了各种机会主义，从右派立场到反革命法西斯主义。他的言论缺乏连续性、缺乏连贯性。一切都极其混乱，没有具体纲领使我们能将其与特定反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挂钩。”波波夫似乎“同时拥护所有反无产阶级纲领”。

理论延伸后，作者们试图连接对波波夫人格的各类评论。归根结底，他的动摇源于不稳定的自我认知：

波波夫身上显现的特质并非偶然。本质上，我们面前是一个目光短浅、市侩的愚钝之辈……惊慌失措地左右摇摆，无法安定。被其复杂的“哲学”蒙蔽，波波夫看不到经济建设成就。他看不到社会主义在我们周围阔步前进。一旦吞下各种机会主义菜肴的奶油，他觉其味美而变得迟钝。波波夫是疯狂的蠢货，随时准备舔舐每个社会主义敌人——无论是富农、商人、破坏分子、白卫军、汤姆叔叔还是法西斯——的靴子。⁸⁵

“仔细审查证据后，”工作组断定失败的是波波夫的性格而非思想：“驱使波波夫进行这种恶作剧的并非某种信念，而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幻灭、无力感以及面对每个大学毕业生必须从事的艰苦工作时的懦弱。”这就是为何他觉得必须“尽早逃离战场。他必须缴械撤入平静生活，以免眼睛目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与动荡’”。⁸⁶

工作组成员宣布“准备好迎接波波夫的挑战”，庄严宣誓不受同学腐化影响：“我们将以布尔什维克方式坚定继续社会主义农村改造工作”——不像波波夫。这个集体也吸取了政治教训：“我们将对当前阶段构成主要危险的右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无情斗争，为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战。”⁸⁷

波波夫的消息传到列宁格勒后，1930年11月3日共产主义大学召开了特别党会。⁸⁸波波夫被宣告为耻辱：“鉴于社会主义建设关键领域的实际党务工作是对一个人思想稳定性、纪律性和理解党的路线的最佳检验，波波夫表现出机会主义态度，有时甚至暴露出他的反革命核心。”在正式批准西伯利亚支部免除波波夫所有职务的决定后，与会官员将“这个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党和大学，宣布他的罪行是提供了“对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解读”。

当然，波波夫在大学生中是例外，而非常态：“我们向斯大林同志保证，我们的学生将完成他们的任务。”由于感到有义务弥补过错，大学庄严地表示“听从中央委员会调遣”。许多学生深信“对两面派和绥靖者的斗争必须是无情的”，很快自愿接替这位犯错的同学前往西伯利亚。

尽管这些声明很重要，但不足以使秩序恢复。为了履行其作为理论堡垒的功能，共产主义大学必须将调查推向更深层次，以便告知列宁格勒党组织，一个机会主义者如何能在如此受信任的机构中找到庇护所。此时，讨论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大学党委委员会毫不费力地将波波夫归类为右翼反对派的典型成员。一位发言人提到右翼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李可夫最近发表的“两面派讲话”时指出，“右翼在理论上同意党的总路线，但在实践中坚持其机会主义立场”。

89

波波夫档案中的许多空白使得重构他这一阶段的苦难变得困难。我们不知道西伯利亚党组织对他的声明作何回应，他确切何时被从村庄召回，或者是否有人试图强迫他放弃观点。无论如何，波波夫最终回到了列宁格勒，显然是作为自由人，并被要求解释他傲慢的立场。

当他最终面对审判者时，大学党委委员班杰列托诺夫对他进行了严密审问：

问：你对社会主义有何看法？

答：社会主义违背自然法则。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因素是完全不可能的。

问：那么你如何解释我们的经济规模相比战前时期增长了三倍，我们在一年内就实现了几乎完全的集体化（36%的土地由集体农庄播种），……集体化农业使我们能够出口谷物，等等？

答：嗯，资本家也发展[他们的国家]，不是吗？他们比我们做得规模更大、更好！这里许多建设项目已经停滞。关于集体化种植，我们还得等等看实际收成多少。许多谷物损失在田地里。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⁹⁰

“很清楚的是，”有人讽刺地插嘴道，“波波夫持有党证八年，其中两年作为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度过，却根本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⁹¹

既然班杰列托诺夫已经铺好了审讯之路，其他学生也加入进来：

问：尽管你有这些信念，你仍然是一名党员和这里的学生。这难道不是欺诈和伪善吗？

答：我入学大学是希望能证实我的疑虑或彻底消除它们……我希望被官方路线说服到不再有任何疑虑和动摇。但在大学里，谁能证明党是正确的？学生吗？他们对理论的掌握并不比我更确定——你知道，在学习方面我可不差。讲师吗？他们受到课程大纲的限制。此外，他们如何能证明无法被证明的事情？

问：你是否曾尝试与讲师或同学分享你的疑虑？

答：早在1929年，我学习的第一年，当我们在小组中讨论《一个经济学家的笔记》时，我说布哈林无疑是正确的。大多数参与者持相同意见。后来我从未听到过对我所捍卫的立场有任何严肃的反对。即使是大学党组织的秘书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⁹²

面对同学们，波波夫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迹象。他对支部“揭露”他的说法感到愤怒：“不，一旦我下定决心，我就会主动站出来。我主动说我的工作毫无意义，因为我对粮食采购的可行性没有信心。斯大林本人不是说过，‘如果我们的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失去了信心，那么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就不可能了’吗？”⁹³

即使在反叛中，波波夫也不认为五年计划本身是一项经济政策——在这一点上，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明白，没有一场文化革命，国家的经济转型注定失败。集体化的主要目标是转变农村人口的政治思维，向落后的农民灌输新生活。如果波波夫不能热忱地投身这项工作，他坚持认为，他的贡献将小于零。除非他树立个人榜样，向西伯利亚农民证明他们应该拥抱革命的生活方式，否则粮食采购将退化为赤裸裸的勒索。

波波夫无法完全切断与党的联系。即使他抨击细节，他也接受框架。他时常深入研究琐碎的政策制定：“我们应该做的是回到 1925 年之前执行的路线，当时第十四次党代会宣布快速工业化当务之急。如果我们能刺激生产力……工业和农业将会不太费力地增长。”波波夫本质上建议回归经典形式的新经济政策（1930 年，党仍在声称它正在重塑新经济政策，而非放弃它）。⁹⁴

作为工人阶级的坚定拥护者，波波夫无法相信 1917 年的革命是徒劳的：“党的政策中资产阶级民主的方面——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和农民接管所有工厂、作坊、铁路和土地——都是值得的成就。”尽管苏联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人掌权了，他们至少可以确保“社会主义部门的收入落入他们手中。”确实，苏联工人的境况“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好”。

诚然，波波夫承认，新经济政策并非完美的社会秩序。市场力量继续使工人阶级受害。“我非常清楚，”他说，“取消贸易限制将导致失业卷土重来，但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里拉出来。”苏联的福利机构可以改善失业者的生活：“我指的是真正失业的人，而不是那些不想工作的人。”⁹⁵

波波夫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幻灭的布尔什维克，其弱点在于他无法诋毁革命。因此，既然他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布尔什维克真理，审讯者就利用这些逐步瓦解他的推理：

问：那么权力呢？如果事情按你的方式发展，例如，谁将控制外交事务？

答：我们应该回到 1925 年之前的情况。[工业]国有化不应改变。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工人会对他们的收入和报酬感到满意，并不介意谁拥有工厂。外交政策将直截了当，激烈的冲突和抵制将会消失。

问：所有这些与你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的理论相符吗？你难道不熟悉因犹豫不决导致最黑暗的反动和全面恐怖的历史事例吗？

答：我不能让自己想象在我们的苏维埃俄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工人们绝不会允许它发生。⁹⁶

波波夫承认，工人的经济诉求可能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相冲突，这种认识阻碍了他培养异端意识：“我从未参与宗派主义斗争，并承诺将来也绝不做那种事，”他强调说。

一次又一次，被告被问及他是否与信念相似的人通过信。不，他回答，他从未“与反党集团合作”。他甚至否认与反对派有任何个人（*единоличные*）接触。他那些永远多疑的审讯者观察到，“他不太愿意过多谈论这个问题。”⁹⁷当然，波波夫避免右派标签的做法与那些已获得该头衔的人并无不同。右翼反对主义主要是一个外在的标签——一个人不太可能自称如此。

在与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交谈几天后，波波夫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有责任通知党委会，”他在1930年11月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完全彻底地收回我关于党的政策的言论。”他接受了党委委员会的诊断：“我无法承受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压力，结果证明意志薄弱。让我的[忏悔]行为成为那些试图在党的政策上平衡两种相互排斥观点之人的榜样。”⁹⁸那些意识到自己暂时偏离或失去信仰的共产党员，被强烈建议提交此类忏悔。忏悔信通常写给基层党支部委员会或地方党委，通常声明作者与错误观点划清界限，并完全衷心地支持官方政策。尽管波波夫的信在细节上是个人化和独特的，但它也是一种成熟文体的样本。⁹⁹

现有文件并未揭示是什么压力促使波波夫忏悔。通常的报复——开除学籍、流放、逮捕——大体上可以排除。在向西伯利亚的支部成员吐露只言片语之前，波波夫已经预料到所有这些，甚至更糟。毕竟，新闻充斥着关于集体化破坏者受审、富农及其据称的支持者遭受政治迫害和处决的消息。每个人都知道，阻挠斯大林的革命，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都意味着加入反革命。¹⁰⁰像波波夫那样，以一种示威性的、挑衅的姿态交出党证，就是在冒一切风险。然而，尽管波波夫事件的大部分背景已缺失，他转变态度的根源肯定在于精神层面。他深怕被排斥、被朋友蔑视、在为行动赋予意义的斗争中失败；经济困难和牢狱之灾则远不能令他担忧。¹⁰¹

波波夫最终皈依的现象学方面与其叛教过程一样有趣。例如，他继续怀疑集体化所依据的前提。但他宣布忠于他曾经如此严厉批评的许多东西，这种转变归因于他愿意深入钻研布尔什维克世界观的更深层次，在那里他最终为其基本假设找到了正当理由。正如我们所见，波波夫能够巧妙地重新阐述甚至颠倒布尔什维克的陈词滥调。这次他反抗的不是官方语言，而是他自己先前对它的诠释。为此，他援引了他唯一从未抛弃过的神圣力量——无产阶级。至于党，无论是斯大林的还是布哈林的，在他眼中具有权威，只因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牺牲了仅仅一天前他还珍视的信念，波波夫现在决心拯救他的革命自我。“听起来很奇怪，”他在一段充满悲怆和恐惧的文字中写道，“我差点就加入了反革命阵营！”“但我没有经历……矿井和工厂十年的严格训练，只为了忘记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四年倒戈。”当他即将背叛他所代表的一切时，波波夫经历了一个清醒的时刻。“我的整个一生在我眼前闪过，”他写道，仿佛在描述他最后的时刻。但随后他转身离开，选择了不同的命运。

他的记忆，他身份的构建基石，是一个无产者的记忆，而非资产者的记忆，他的忠诚也必须相应塑造：“我的生命在污秽的顿巴斯定居点度过，那里如煤灰般黑暗。我生动地记得[罪犯]如何被锁链铐住、焊死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如何被迫在我们的水银矿、工厂和矿井中劳作。我也记得 1916 年顿涅茨克四万工人如何罢工，资本家如何惩罚他们，工人集会后如何出现十七具尸体，哥萨克如何鞭打其他工人的头部。”这不是一个超然观察者的陈述：“为顿河上某个富农工作时，我亲身体验了剥削的‘辉煌’。像骡子一样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我吃的只是粥和炖菜。”¹⁰² 在这段回忆链中，个人与集体无法分离：波波夫将自己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重新连接他的记忆——那些被剥削工人的记忆——波波夫重新发现了他生命的意义。在对其布尔什维克身份的这种重构中，关于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陈词滥调起到了使积极参与斯大林主义建设合法化的作用。

波波夫承认，“党完全有权对我的每一个举动保持怀疑。目前，既然我已经表明了自己在思想上可以多么不稳定，我就不能继续留在党内。”可悲的是，他必须找到力量在政治组织化无产阶级队伍之外，至少暂时如此。但脱离工人阶级运动，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我决心竭尽全力防止过去重演，并誓言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争取新生与启蒙生活的斗争。”在激烈否定现状后几乎面目全非的他，此刻温顺恳求道：当那一刻来临时，将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波波夫在忏悔信中所确立的自我——那位无产阶级回忆录作者、受剥削工人转型革命者的自我——在情感与政治层面都充满力量，尽管这仅是无产阶级整体中微小的碎片。如今他的身份认同围绕着双重自我之间的张力构建：一个曾反抗沙皇国家异己权力的自我，与当下顺从的、作为党战士的自我：“尽管我无法再率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战线战斗……我将至死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工地上，我将把全部力量与才能投入建设规划的成功实施。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需要我重返前线，我将置身于争取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斗最前沿。”¹⁰³ 唯有当社会主义集体确信其绝对忠诚时，“唯有当我感到已赎清对工人阶级的罪责时，才会请求恢复布尔什维克党籍。”¹⁰⁴ 以上是波波夫信件的结语。

波波夫的自传文本，他的本真自我，是在与审讯者的互动中不断建构与重构的。无论其内省多么不可或缺，若无同侪的积极参与，波波夫无法形成自我认知：党将为他提供自我塑造的范式。我们很容易从他极具辩证色彩的独白中看到私人领域与集体壁垒已然崩塌的证据。

据此案例判断，布尔什维克的“自我实践”包含双重维度：当内在的私人自我被审视时，该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波波夫从资产阶级世界的表象、从其提供的庸俗享乐中解放出来，寻求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自我，在作为骄傲无产者的自我认知中寻找幸福。正当他将自身意识提升至新高度时，他重新发现了自己作为建造新世界的弥赛亚阶级成员的角色。作为将个人回归集体与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相联系的要求的一部分，他开始撰写超越个人历史、追溯整体革命运动轨迹的自传文本。尽管布尔什维克厌恶自由派对个人独特性的追寻，个体在 1930 年代初期的苏联似乎仍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每位工人都被认为应通过独特方式走向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的自我呈现因此从未完全雷同。

posed to find his own way to Stalin, particularizing his life story, Communist self-presentations were never absolutely identical.

反对派形象的嬗变

随后两年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几乎平静度过,对意识形态偏差者的态度有所缓和。¹⁰⁵ 如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左派带来了和平,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将这种和平扩展到右派。忏悔过错的前反对派成员——除顽固托派分子外——重返经济管理要职。共产主义大学也不例外:近年校方编年史宣称,“这里没有任何派别反对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一旦党转向“广泛的社会主义攻势,我们的组织便展现出高度意识形态成熟性,对任何扭曲列宁主义的企图都予以猛烈抵制。”¹⁰⁶

然而 1931 年末,共产主义大学成员被迫重新审视其态度——对反对派的新一轮抨击实为莫斯科授意。当年夏天中央委员会决定“改进意识形态培训体系”后,便对理论领域唯一劲敌托洛茨基主义发起攻击。¹⁰⁷ 中央委员会书记帕维尔·波斯蒂舍夫强调新干部需“扎实掌握理论。有人认为既然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那么我们队伍中就不会出现反对派式的摇摆不定。”但他坚持此观点错误:怯懦的敌人只是换了伪装:“如今反对派尤其懦弱,不敢……公开表态。”¹⁰⁸

秋季,中央委员会决定谴责所有将托洛茨基主义偷运进历史文献的企图。这场新运动的第一炮是斯大林致主流历史期刊编委会的信函。《无产阶级革命》该信于 10 月 28 日刊发。斯大林武断宣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误入歧途的派别,而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任何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容忍都是近乎叛国的愚蠢行为。”¹⁰⁹ 随着信函发表,斯大林创造的表述——如“托洛茨基主义走私犯”和“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成为流行的辱骂用语。¹¹⁰

响应斯大林号召,共产主义大学于 1931 年 12 月 14 日发起反对意识形态偏差运动:“我们中间的托派分子质疑党的历史事实,从而对我们已采纳的政策播下怀疑的种子。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完全正确:‘打倒暗中兜售观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研究生们呼吁净化师资队伍。校长普雷德因未能履行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教育督导职责而遭到猛烈攻击。当列宁格勒机构认定理论教学存在某种“形式主义”时,他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教室内——这个充满反列宁主义恶臭脓疮的溃疡——的监督确实存在诸多不足。”

education. When the Leningrad apparatus identified a certain “formalism” in the teaching of theory, he had to concede, “Our super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 ulcer filled with disgusting anti-Leninist pus, does indeed leave a lot to be desired.”¹¹¹ 1932年1月7日，共产主义大学党组织召开会议“重新审议”斯大林信函引发的问题。¹¹² 时机已到——应降格“右派”（集体化年代的巨大梦魇），让“托洛茨基主义者”重回头号公敌之位。

但新敌人的具体身份有待厘清：整个冬季，“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主导着讨论。若干极端分子坚持认为，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学术的抨击迫使大学启动领导班子更替，而应对现状负主要责任的教师群体必须承受改革冲击。一位激进发言者坚称：“我们面临这些困境是因为教师理论水平持续下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领导岗位并非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担任，而是由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德波林派的知识分子占据。我们的教学大纲亟需重新审视，必须在意识形态战线上保持高度警惕。”其他人则提出不同诉求。沃罗宁、费德琴科与潘秋欣——这三位注定在关键冬季辩论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年轻研究生——谴责“领导层对自我批评的压制”以及“党委工作的其他缺陷”。¹¹³

不可避免地需要替罪羊，极端分子矛头直指两位政治经济学教员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夫与赖恩戈尔德·伊扎克，其工作此前看似颇有前途。德米特里耶夫被单独指出易受“机械论偏差”影响。此外，尽管参加其苏维埃经济学讲座的学生曾抱怨德米特里耶夫的非正统观点，研讨课负责人伊扎克却“未就德米特里耶夫的孟什维克私货追究责任”。¹¹⁴

“我们首先该向哪个团伙开火？”沃罗宁问道，“我认为必须查清哪些教研室正在传播反列宁主义理论与策略。”费德琴科——或许是极端分子中最直言不讳者——已准备好与校长本人对峙：他发誓将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一份又一份请愿书，“直到撤换普雷德”。普雷德难道不是“其反党态度导致沮丧情绪蔓延的托派分子”？他的“软化”（*razmiagchennost'*）——即不愿清洗——难道不是众多托派分子能在大学找到庇护的原因？现在是时候进行“大学革命，用年轻且严守意识形态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替换渗透进来的托派分子”——这些人将毫不犹豫直言不讳。¹¹⁵

在 1932 年 1 月初异常混乱的一周内，研究生们似乎即将迫使校领导去职。费德琴科的慷慨陈词在同侪心中引发深刻共鸣，极端分子因此成功推动通过了措辞强硬的谴责教师决议。但在掌权者中，第一个五年计划平等主义方面引发的初始兴奋早已消退。列宁格勒机构明确表示无意废除“一长制”（*edinonanchalie*）并削弱校长地位。普雷德竭力转动庇护网络，数日内便集结足够支持压倒批评者。¹¹⁶

政治钟摆回摆后，普雷德得以向下属伸出援手。“应当肯定青年教师在揭露反革命渗透者中的积极作用，”他表示，“确实犯过错误，但无人顽固坚持。”德米特里耶夫领会校长暗示，对“本人文章中的机械论错误深表遗憾”。¹¹⁷既然能够走出战壕，校领导立即发起反击：“近来此间的指控实为我们党集体的诽谤。那些托派言论——极左主义的化身——是针对领导层的典型打了就跑的攻击。”¹¹⁸

谁能预料意识形态风向如此骤变？极端分子如今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自己的反噬之言。教师中最直率的反击者之一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主张，所有近期指控都应回敬给指控者：“费德琴科不是说这里在以托派方式召开党会议吗？照他说法，我们整个党委都是托派！”其他人纷纷附和：“三天前费德琴科还面目模糊，如今我们从[其对党组织的诽谤中]看出了狂热托派的行径。”那些急于造反者反驳道：“不能仅因费德琴科批评领导层就给他贴上‘托派’标签。指控者必须提供确凿材料。”

校方自然不同意。“要求用过往文件判断费德琴科是否托派是错误的，”他们坚称，“费德琴科反复断言一切都错，这种论调正是典型的托派悲观主义。”这场辩论反映出“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万能污名术语的重要演变：此前仅 1920 年代讨论中支持反对派者配得此标签，但斯大林 1931 年信函意味着，当下任何政治上不可接受的行为——任何所谓对官僚机构的不负责任的谩骂——都会让人沦为“托洛茨基主义者”。¹¹⁹

哲学系研究生兼兼职教员潘秋欣的案例，揭示了以托派之名污人变得何等容易。尽管在与联合反对派的讨论期间，潘秋欣曾批评中央委员会，但 1929 年审讯记录显示当时对政治偏差的回应是纠正而非惩罚。当被问及是否反对派关于“我国经济中两个调节者”的观点时，潘秋欣宣称他从未全心相信“农民阶层据说是无产阶级殖民地而非无产阶级盟友”。1929 年，这些回答使党委得出结论：“潘秋欣存在理论偏差而非政治偏差。”¹²⁰ 归根结底，此人仍是位可信赖的共产主义者，教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在两条

哲学战线——即左右翼——都卓有成效斗争的积极分子”。

然而，就在斯大林的信件发表、潘秋欣正被推荐授予勋章之际，他的好运到头了。同学们现在将他描述为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批评一切，将一切描绘成漆黑一片，潘秋欣也是如此。”此外，“他的教学过于紧张，过于跳跃”，这暴露了他残余的反对立场。远在许多英里外工作的瓦申科通过电话谴责潘秋欣：“潘秋欣在 1923-25 年期间嘲笑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时，就已证明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理论上是一个自治机构，在实践中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邮政局，’潘秋欣过去常说。‘他们只是对来自上面的命令盖橡皮图章。’”瓦申科的口头证词继续说道：“在共产主义大学，潘秋欣再次暴露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不相信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也附和道：“即使在今天，潘秋欣也不明白托洛茨基主义错在哪里。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¹²¹

迫于适应日益强硬路线的压力，潘秋欣于 1931 年 11 月 23 日提交了一份新的忏悔书：“确实，过去我的分析未能遵循历史方法——这是我已承认的错误，”他陈述道。“但声称我是一个‘前托洛茨基分子’是没有依据的。”但他声称自己从未因是托洛茨基分子而受到审查，“因为只有派系主义才定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一说法援引的是过时的标准。到 1932 年，异端理论——而非在前十年激烈的党内争论期间实际参与地下反对活动——已足以构成“托洛茨基主义”。¹²²

诚然，适应托洛茨基主义不断变化的定义并非易事。其他讲师也抱有与潘秋欣类似的、不合时宜的观点：上一年春天他个人评估的作者们在观察到这位讲师既“遵守纪律”又“曾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持反对观点”时，并未看到任何矛盾。虽然一些同志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像潘秋欣这样的前麻烦制造者通过拥护总路线证明了他们已经改过自新，但那些更理解斯大林信件主旨的人反驳说，由于其理论信念，这样的人必须被描述为托洛茨基分子。¹²³

在进一步审视自己的政治良知之后，潘秋欣设法写出了又一份忏悔书，承认自己在声称“没有参与派系主义工作的同志不能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时“偏离了方向”。显然，这第三份忏悔并未在他的指控者中激起多少信心。如下文指控所示，他的支持者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在潘秋欣 1931 年 12 月写的信中，他承认在党民主和“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偏离了党——这些正是将我们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分开来的基本问题。不知何故，

这并未阻止他洒下鳄鱼眼泪，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据他说无法适应我们经济政策的变化。“发发善心吧！我算是哪门子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搞过派系！”他以故作无辜的口吻这样说。潘秋欣是傲慢的。他怎敢在未正确掌握该主题的情况下定义托洛茨基主义？难怪潘秋欣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显然他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斯大林将托洛茨基主义定性为“国际反革命的领导支队”。¹²⁴

教训被大胆而清晰地阐述出来：“偏离党的路线与派系主义是一回事，是任何政治异见的实质。”潘秋欣声称“同志们不应仅仅因为发表意见就被贴上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这被嘲笑为“模糊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实质的声明”。潘秋欣被清洗了。¹²⁵

对于像潘秋欣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情况显然在恶化。1932年4月1日，大学党委正式承认对托洛茨基主义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普雷德，通常作为大学的发言人，总结了最近的发展：“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向我们表明了动员起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颠覆活动的重要性。革命十五年后，我们的队伍中——尤其是在理论工作领域——竟然还存在摇摆不定，这怎么可能？”

在1933年的政党清洗期间，对斯大林口头抨击托洛茨基主义的提及不会停止——其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¹²⁶ 普通共产党员被要求前来声明他们的政治活动并承认任何玩忽职守行为。然后传唤证人提供确证性陈述或揭露反对派的摇摆不定。戈尔巴乔夫仅因曾说“不相信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共产主义大学清洗；西季连科因说“社会化食堂确保集体挨饿”而获得了同样的称号。

一名叫阿尔捷莫夫的学生，他在日记中吐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主要教条是中世纪的教条”以及“不向右或向左偏就无法保全自己的好名声”，也被判定犯有托洛茨基主义罪。¹²⁷

不过，我们不应操之过急。尽管斯大林的信件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但对反对派的搜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来之事。虽然投入了大量精力来识别新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但这些人 在 1930 年代初期并非敌营中最令人畏惧的成员。从数量上考虑，“阶级异己分子”而非“托洛茨基分子”才是真正的威胁。1933 年从共产主义大学清洗的大多数学生被斥为“旷工者”（*progul' shchiki*）、“懒汉”（*lodyri*）和“投机钻营者”（*rvachi*）——这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生产率主义议程的理想形成了对比，简直是一群无赖。¹²⁸ 目标是那些难以适应国家令人眩晕的经济转型的人，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异端。

在 1933-34 年，每个人都在谈论“党内和解”，这是当时的秩序。根据约瑟夫·贝格——一位这些年在莫斯科度过的巴勒斯坦共产党人——的说法，对反对派态度的软化直接源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团结”，他回忆道，是普通党员要求的：“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团结——这是打击法西斯主义和阻止德国进攻苏联的唯一途径。”只要同意忏悔并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前反对派就会被容忍，即使是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人。¹²⁹

1933 年某个时候，著名的历史讲师 G. 贝科夫受委托撰写一部关于共产主义大学反对反对派主义斗争的简史。贝科夫拥有早于革命的革命经验，游历世界并参与过多个共产党，他撰写了一篇政治上符合最新情况、具有权威性的文本。¹³⁰ 他的著作值得注意，恰恰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十二个月后不再可能存在的矛盾心态。虽然贝科夫指出，在新方针争论期间，“托洛茨基分子试图将大学变成资产阶级、富农和孟什维克分子的堡垒”，但他没有将反对派与反革命主义联系起来。贝科夫勉强承认，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是由大学领导层进行的，而他们全是季诺维也夫派。然而，他通过坚持认为这些领导人虽然方向正确，但仍“与普通党员脱节”，从而淡化了他们的成就。不过，击溃托洛茨基分子仍值得赞扬，尽管这是通过“赤裸裸的警务手段”完成的——即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适当提高他们”对异端思想普遍危险性的意识。贝科夫对 1923 年事件的矛盾评价，如果考虑到背景，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在贝科夫写作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因 1925 年列宁格勒反对派的爆发而负有罪责，但被认为真心悔改，已逃过一劫。¹³¹

诚然，在经历了一场仪式性的羞辱之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 1932 年 10 月 9 日因未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非法传播的、马尔季米扬·柳廷的反革命纲领而被流放——这两位领导人获得了与斯大林的个人会面，被“正式赦免”，并被允许再次定居莫斯科。¹³² 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中，他们被邀请在第十七次党代会（1934 年 1 月至 2 月）——被称为“胜利者大会”——上发言，庆祝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他们确实发了言，赞扬斯大林富有启发性的党的领导，并对曾经设置障碍表示深深的遗憾。回顾反对派所助长的“多次小资产阶级浪潮”，加米涅夫庄重地接受了“不得不展开失败、错误和罪行编年史的悲伤职责——这是任何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伟大教导的团体或个人的命运。”¹³³

这难道不是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吗？他鼓起勇气站在代表大会前所依靠的意识是，“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生命中已经翻过一页。”¹³⁴ 季诺维也夫也脱胎换骨，仿佛被剥了皮。他宣称对“过去对斯大林同志进行的人身攻击次数”感到震惊。幸运的是，总书记原谅了他：“斯大林认识到我已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错误，并帮助我回到了党内。”¹³⁵ 斯大林扮演着宽宏大量、仁慈的领导角色，愿意不计前嫌：反对派的领导人在公开忏悔时被给予了重要的讲台，他们的演讲赢得了掌声。

党的领导层坚持认为反对派是可以改造的。共产主义大学研究生斯拉温撰写的一篇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通过劳动进行改造的政策”，以白海运河为例。¹³⁶ 1934 年，列宁格勒法学教授瓦茨拉夫·翁德列维奇批评了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位申请者 E. A. 彼得松，严厉指责她忽略了可挽救与不可挽救的违法者之间的关键区别。“该论文未能提及，在无情镇压敌人的同时，我们的法律允许异己分子和非阶级分子重新做人。”¹³⁷

这种态度使得 1933–34 年被称为“第二个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宣布反对派“士气已被彻底摧毁，已被粉碎”——“似乎已无需证明，也无人可战”——这一声明在报刊上被反复引用。¹³⁸ 苏联政权也随之获得了更大的法律稳定性光环。1933 年 5 月 7 日，政治局

下令负责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期间判处如此多农民的警察三人小组立即停止行动。第二天，下令大幅减少逮捕。¹³⁹ 新法规于7月废除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并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VD）取代之。与GPU不同，NKVD不能施加任何“行政”或严格来说非法的惩罚。¹⁴⁰ 卡冈诺维奇评论道，改革秘密警察“意味着随着我们进入更正常的时期，我们可以依靠法院来判处刑罚，无需像至今为止那样诉诸法外镇压。”¹⁴¹ 德国共产党难民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此期间居住在莫斯科，持乐观态度：“最糟糕的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事情一定会好转的。”¹⁴²

“列宁格勒中心”

1934年12月2日，对我家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名电工来给我们公寓安装收音机——一个黑色的纸盘，播放着列宁格勒广播电台的节目。在1930年代初，收音机——即接收各种短波和长波频率的盒子——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安装好收音机后，电工向我展示了如何调高和调低音量，然后他离开了。我试着听了一会儿收音机，但广播突然中断了。几秒钟后，一个庄严而哀伤的声音宣布：“苏联广播电台”：这通常是为某个极其重要的公告做准备的方式。在又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同样哀伤的声音宣布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卑鄙遇害——他是列宁格勒省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活动家。这次暗杀是由国际帝国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代理人实施的。”

波列季卡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的这段回忆虽然暴露出记忆易于失真的特点，但也捕捉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戏剧性时刻，它改变了苏联。基洛夫于12月1日下午四点半在斯莫尔尼宫走向办公室时，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暗杀。¹⁴³ 早期的报道将尼古拉耶夫描绘成一个极度沮丧的人——他是一名被共产主义学院开除、求职屡屡碰壁而蒙羞的党员——但并未提及任何政治异端思想。¹⁴⁴ 实际上，与波列季卡的描述相反，党花了将近两周时间仓促拼凑出一个将反对派与尼古拉耶夫罪行联系起来的叙述。

尼古拉耶夫被捕时被搜出的个人文件让党警觉到列宁格勒党组织内外存在许多不满分子，他们经常批评体制，即使并非总是公开批评。¹⁴⁵ 许多心怀怨恨的共产党人的声音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以及他为一本暂定名为《为了新生活》的自传所做的准备笔记中——两者都写于1934年5月和6月。¹⁴⁶ 10月，尼古拉耶夫写了一份“遗书”，其预定读者是中央委员会。他在其中抱怨冷漠的党组织官员：所有他接触过的人拒绝倾听他慷慨陈词，这让他感到“被玷污，在道德上被暗杀”。¹⁴⁷

12月2日，当斯大林在斯莫尔尼宫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时，并没有从他口中得到多少信息。¹⁴⁸ 之后，尼古拉耶夫据称告诉负责他牢房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警卫卡察法：“斯大林承诺给我一条生路……如果我供出同伙的话。[但是]我没有同伙。”¹⁴⁹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的口供始终如一：“我是独自实施恐怖行动的！”“我在实施报复！”¹⁵⁰ 斯大林召见了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暗杀是某种组织的行为，”他告诉他们。“但什么组织？现在很难说。”¹⁵¹

报界含糊不清的调子反映了中央对威胁党的领导层的性质感到困惑。12月2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一篇文章称：“我们敬爱的领袖S. M. 基洛夫被工人阶级的敌人用奸诈之手杀害了。”另一篇文章同样含糊，提到“卑鄙的刺客，我们阶级敌人的爪牙”。¹⁵² 在共产主义大学，早期解释这次暗杀的尝试同样不太清楚。一份当地期刊声称“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启发了刺客”。另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那些随时随地威胁着我们的富农残余势力。”¹⁵³ 故事显然尚未稳定下来，有好几个版本进行了彩排。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追查的第一条线索将尼古拉耶夫与一名据称经营间谍网络的拉脱维亚领事联系起来。¹⁵⁴ 12月4日，当地新闻声称“枪杀基洛夫是白卫军的绝望行为”。¹⁵⁵ 同样混乱的图景出现在内部公报中。例如，12月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科夫·阿格拉诺夫向斯大林和雅戈达报告，称尼古拉耶夫与波兰间谍有联系。¹⁵⁶

消息来源一致认为，尼古拉·叶若夫是利用基洛夫遇刺事件引导党的领导层反对残余反对派的人。即使以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看，叶若夫的崛起也是惊人的：从一个次要官员的职位上，到1934年他已跃升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跳过了通常的候补委员阶段。¹⁵⁷ 作为斯大林的亲信和得力助手（叶若夫1935年在总书记办公室待了66小时，1936年待了76小时），他说服总书记必须逮捕季诺维也夫分子。¹⁵⁸

按照叶若夫的引导，政治局询问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否在其档案中将尼古拉耶夫列为反对派分子”。12月21日，调查人员之一米罗诺夫要求“至迟明晚八点前，询问所有因暗杀事件被拘留者，尼古拉耶夫是否曾是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¹⁵⁹ 在审讯了列宁格勒两千名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后，叶若夫向斯大林抱怨说，地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无能使其未能建立可以挫败暗杀的情报网络。¹⁶⁰

一个月内，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菲利普·梅德韦杰夫和费奥多尔·福明被判定“忽视了关于计划暗杀基洛夫的线索”，并被判处十年监禁。¹⁶¹ 12月15日，在列宁格勒省和市党委的联席全会上，接替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职位的安德烈·日丹诺夫要求立即彻底改革该市的秘密警察活动。由特别热心的国内安全官员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负责当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这位拉脱维亚契卡人员开始了他后来赢得“列宁格勒刽子手”绰号的角色。¹⁶²

一些消息来源表明，扎科夫斯基的任命促使特别部门——斯大林个人办公厅的延伸——加紧了对前反对派分子的审查。¹⁶³ 地方特别部门接管了1934年被废除的工农检查院的许多职能，它们接收秘密信函，监督人事选拔，并拥有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¹⁶⁴ 在1935年期间，它们帮助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了据称“在该市活动的四个托洛茨基分子团体和八个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这些都是扎科夫斯基的前任们可耻地忽视了的。¹⁶⁵

与此同时，叶若夫的人揭露了“列宁格勒中心”——一个由一些官员和研究生、学生组成的恐怖组织——他们都是前反对派分子。在因基洛夫遇刺事件而在列宁格勒被捕的七十七人中，有五十七人被描述为“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其中四十人在1920年代被清洗，但后来恢复了党籍。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共青团中央委员I. I. 科托雷诺夫和V. V. 鲁缅采夫。¹⁶⁶ 被捕者之间存在职业联系：他们整个1934年都在会面，为党史研究所准备的列宁格勒共青团史工作。这些会议由党委机构监督，尼古拉耶夫也曾参加。但是，虽然一些人否认近期与其他人有任何接触，所有人都否认他们的研究有任何阴谋性质，但几名被告证实他们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保持非正式联系。

1934年12月28-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所谓的合作者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不公开审判。¹⁶⁷ 该机构成立于1924年，负责审判陆军和海军高级军官，现在又承担起审查特别危险罪行（如叛国、恐怖主义、间谍和破坏活动）的额外责任。¹⁶⁸ 通过禁止被告听取彼此的证词，军事审判庭表明了，在基洛夫死后的数小时内，苏联法律程序发生了多大变化：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脑亨里希·雅戈达起草、经斯大林修订、最高苏维埃发布的法令，平淡无奇地冠以《关于对刑法某些修改》，援引了自内战以来闻所未闻的紧急措施：反革命罪行的调查必须在十天内完成，案件的审查无需被告的任何干预，判决不再可以上诉。因为这一司法程序的目标是确定（革命的）真相，而非保护被告的权利，因此辩护是不必要的。¹⁶⁹

这种新的、简化的审判方法笼罩着被告。尼古拉耶夫对所有指控认罪：他实施了对基洛夫的暗杀，并且是列宁格勒中心活动的幕后主使。其他人承认了季诺维也夫主义的同情和参与非法颠覆集会，但不愿承认实际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暗杀。A. I. 托尔马佐夫不知道有任何恐怖行动正在准备中，鲁缅采夫说他不仅从未加入恐怖组织，而且“不知道它的存在”。沙茨基是被告中唯一一个不认罪的人：他与任何反革命组织都没有联系，也不知道任何针对基洛夫和斯大林的暗杀企图。短暂休庭后，宣读了判决：所有十四名被告均被判处死刑。

一些消息来源证实，对基洛夫未遂刺客的判决直接来自克里姆林宫。是检察院，并间接地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决定何时必须废除某些法律程序。任何进入审判的案件都已经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调查，并由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和斯大林（作为党的首脑）彻底审查。虽然理论上法院在审查证据后做出最终决定，但定罪是自动的这一事实表明调查机构拥有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几个月后向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解释说，严厉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行使权力必须强有力、坚定且无畏……因为法国的公社社员未能理解这个真理……他们失败了。”¹⁷⁰

判决于12月29日上午6:40执行。¹⁷¹ 一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雇员古谢夫回忆道，尼古拉耶夫曾一度喊道：“我做了什么！根本没有中心！现在他们会叫我流氓。一切都完了。”听到判决后他喊道：“我被耍了！”然后用头猛撞他面前的

围栏。¹⁷² 出席了处决的 A. 卡察法提供了以下证词——即使其事实有待考证，也表明了当时流传的那种传言的类型：“尼古拉耶夫、沙茨基、鲁缅采夫等人先被枪决。科托雷诺夫是最后一个。阿格拉诺夫和维辛斯基走近他说，‘你的死期到了。告诉我们真相：是谁组织了基洛夫的暗杀，以及如何组织的？’”整个审判都是垃圾，’科托雷诺夫回答道。’人们只是被处决了；下一个轮到我了。除了尼古拉耶夫，没有人有罪。’”¹⁷³

“反革命地下组织”

基洛夫的离去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围绕死者的各种关系被重新安排，死亡本身也被赋予了公共意义。党的领导层举行了正式的葬礼，但哀悼仪式必须涉及普通党员才能有效。因此，个人与公共领域在告别仪式中融为一体，无产阶级对被杀领袖的爱通过无休止的演讲表达出来。为了发起这样的运动，中央委员会向所有党组织发出了一封题为《基洛夫惨遭杀害的教训》的信。¹⁷⁴ 前言指出，季诺维也夫集团是党史上第一个“将两面派行为变成一种要求”的团体。“反对派公开地、系统地攻击自己的纲领……只是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这是独一无二的。”¹⁷⁵

大清洗的语言并非凭空发明——怀疑的诠释学植根于布尔什维克传统——但很明显，1935年1月18日的信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语义转变。¹⁷⁶ 或许最重要的是，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党现在不必为农村的富农和隐藏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烦恼，而必须对付与反对派有联系的两面派；这些不法分子往往被证明是“骗子”、“破坏者”和“挑衅者”。因此，这封信完成了反对派分子从合法辩论者向险恶敌人的转变。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忏悔必须重新考虑。惩罚方式将会改变：仅仅开除反对派分子已经不够了，他们今后将被“逮捕和隔离”。

¹⁷⁷

被指控犯有极端政治疏忽罪的列宁格勒党委学术机构在基洛夫遇刺后发现自己处境艰难。¹⁷⁸ 1934年12月8日，党委们聚集在一起“设计对抗挑衅谣言的方法”；已经有人在说“尼古拉耶夫曾是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¹⁷⁹（想象一下书记们得知这个谣言包含的真相多于虚构时的尴尬：尼古拉耶夫曾申请该学院经济学二年级课程，但入学考试不及格。至少有一名在该学院注册的学生，一个叫巴尔苏克的人，似乎在为尼古拉耶夫加油；据报道他说：“白痴，你应该申请一年级课程，那样你肯定能通过。”）¹⁸⁰

1934年12月中旬，红色教授学院的马蒙托娃表示，她听说省委秘书米哈伊尔·丘多夫“在恢复尼古拉耶夫党籍问题上提供过帮助”；这意味着列宁格勒的第二号人物“必然与基洛夫遇刺案有所牵连”。然而马蒙托娃很快便陷入被动。党委质问道：“你怎么能怀疑丘多夫这样的人？你怎么能认为丘多夫会支持尼古拉耶夫这类人？”马蒙托娃只能支吾道：“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重复了未经证实的传言”，但党委毫不宽容：“作为政治素养良好的人，你肯定知道不能与我们的报纸唱反调！”尽管马蒙托娃懊悔地承认“我不知不觉成了阶级敌人手中的武器”，她仍遭到清洗。直到她供出指控丘多夫的消息来源并指认一个叫比鲁科夫的人后，才得以恢复原职。¹⁸¹

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了一个为尼古拉耶夫提供精神与智识支持的集团：列宁格勒的教授们，这个被理论化的“列宁格勒中心”的智囊团，如今被指控加入“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人领导的列宁格勒反革命季诺维也夫派集团”。列宁格勒市政建设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莱文被认定为该集团成员，判处五年集中营监禁。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副教务长雅科夫·伊萨科维奇·博戈莫利和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泽利克森也受牵连，被判处“强制劳动”。委员会还让尼古拉耶夫的主要同谋科托雷诺夫作证，声称基洛夫遇刺背后的反革命组织还包括工业学院的其他学生：最终两人被定罪并流放至远北地区。

182

对于那些相信反对派夺权仅差毫厘的传言的人而言，这些措施似乎只是最低限度的应对。某日，谢尔盖耶夫在共产主义大学课间说：“我认为，从他的立场看，季诺维也夫谋杀基洛夫是个失误。季诺维也夫派在各个关键部门都部署了力量。他们已准备好在我们的组织中占据多数并接管权力。”¹⁸³一系列类似精神的控诉猛烈抨击了列宁格勒的高等院校：这些机构已成为季诺维也夫派的避难所。

一份特别详尽的控告书由十一人签署，他们自称为“矿业学院反反对派斗争领导者”，展现了中央委员会在转变反反对派话语方面的效力。文本开头写道：“我们有责任报告一个由二十五名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地方小组……所有人都浸透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机会主义世界观。他们声称1933年已脱离反对派，

这与事实不符。”这标志着本质化论调的确立：曾经是反对派，永远是反对派。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话语中的新贬称，如今将托洛茨基主义与联合反对派中的季诺维也夫派系——此前是各自独立且被原谅的——统一起来。

控告书继续写道，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眼皮底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已然形成：“以前的反对派成员不公开表态，不投票表决，形成舒适的阴谋集团。所有持相同观点的人都被纳入其庇护之下，他们精心筛选队伍。只有他们提名的人才能晋升至党委。”据称 1932 年反对派密谋用狂热的托洛茨基分子罗滕贝格取代矿业学院院长。斯大林派的科兹洛维奇被提为反候选人，“但事情被安排成他垫底”。当一名叫约宁娜的学生试图揭露该集团的活动时，她立即遭到清洗：“发现她对此决定提出申诉后，他们撕毁了记录并假装她的清洗是她凭空想象。”该集团使用的另一手段据称是告诉同志们：“‘你是我们的人！’以此方式引诱幼稚学生加入阴谋。”据称在掌控矿业学院后，前反对派成员利用权力将错误变为正确。他们重新审查数月乃至数年前的纪律处分，并将其撤销。例如，“他们取消了对希里亚耶夫（现已被监禁）的谴责，并施压区委批准此决定。”阴谋分子不仅未排斥被开除的反对派成员，反而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向其泄露党的秘密决定。”¹⁸⁴

将反对派描绘为披着羊皮的狼的母题在此处被推向高潮：控告书所描述的已不再是 1920 年代末托洛茨基小组那种与官方政党并行的第二党，而是一个已成功从内部接管党组织的机构。

“黑弥撒”母题捕捉到了将反对派描述为恶魔犯罪者的意象。暗指反对派与党的关系犹如魔鬼与上帝的关系，斯大林狂热分子在任何初生的反对派组织中都看到了对党组织活动的狂欢式扭曲。斯大林的机关暗示，这种颠倒基本组织生活原则、采用相反仪式和倒置语言的活动，正是敌人主要的组织形式。据称那些投身反革命服务的人在各方面模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赞扬托洛茨基或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正如忠诚同志赞扬斯大林。¹⁸⁵然而，即使如此复制正统党的外表，反对派却故意颠倒其意义：党组织变成了

“托洛茨基派或季诺维也夫派支部”，党的会议变成派系集会，而所有这些反苏活动都被巧妙地隐藏在强调“回归正统与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号召背后。通过伪党的诱惑，据称反对派威胁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魔鬼般的篡夺并掌控无产阶级的灵魂。¹⁸⁶

当上述共产主义大学历史学家贝科夫描述他应对类似阴谋的策略时，他使用的语言引人关注到个人摩擦与敌意所被赋予的意义。在收集到“关于‘前’反对派成员进行科学破坏的大量证据”后，贝科夫动员某学院学生“清洗这些彻头彻尾的右派恶棍”（贝科夫 1934 年 12 月 24 日的备忘录）。在另一所学院，他对付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渣滓，他们系统性地搜捕并驱逐有才华的学生”。¹⁸⁷

在整个叙述中，贝科夫将个人转化为类型：被捕的列宁格勒教授戈尔巴乔夫——作为列宁格勒中心成员——如今以其名字命名“戈尔巴乔夫习气”——一种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潮。其他被贝科夫揭发的教授——皮萨列夫、马克西莫夫、列维茨基和贝格——同样被归入将个人转化为类型的范畴：“米亚斯尼科夫习气”、“康德拉季耶夫习气”和“雷科夫习气”。¹⁸⁸ 这种类型化语言使贝科夫能将受害者塑造为无产阶级运动知名敌人的象征或缩影，而非个人私敌。

虽然容易将贝科夫的控告视为纯粹是敌对学术集团间粗劣的清算手段，但提交此控告既不被视为对同事的卑劣背叛，也不被视为对他人私事的不当干涉。¹⁸⁹ 诚然，揭发者自己也承认存在功利动机——“*争吵*”（склоки），他们认为，这是常见现象——但自然这些动机只影响反对派。贝科夫揭发的“反对派集团特征”是“自私狭隘的 [делачество] 【和】奴颜婢膝 [прислужничество]

】”——与共产党的普世精神完全相悖的卑劣特质。

搜捕季诺维也夫派

基洛夫遇刺后，政治局公开宣布存在一个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背信弃义的季诺维也夫派别”。在采用“从白卫军破坏分子、间谍和挑衅者那里学来的方法”后，1925-26 年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领导者必须被追捕归案。¹⁹⁰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 1934 年 12 月 8 日就在莫斯科提审了巴卡耶夫和叶夫多基莫夫，指控他们煽动反革命活动。

一周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身陷囹圄。政治局曾短暂考虑将他们作为普通恐怖分子移交苏维埃法庭，但党尚未准备好如此严厉。最终决定在莫斯科起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但审判不基于紧急立法。虽然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必须被枪决，但煽动他们的前反对派领袖不应受此严惩。检视莫斯科受审者名单可知，这实质上是对季诺维也夫时期列宁格勒党委会成员的审判。

在只能发生在苏联法庭的戏剧性举措中，检察官向被告寻求协助：“只有通过承担恐怖情绪存在的责任并谴责这些情绪，才能遏制其支持者并防止他们继续恐怖活动。”¹⁹¹ 尽管向昔日麻烦制造者的良知呼吁是标准套路，但未能说服任何被告。1月10日审讯期间，加米涅夫断然声明：“我不能为罪犯犯下的卑劣罪行认罪，我与他们没有任何、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季诺维也夫同样坚决：“我不能为反革命堕落分子的法西斯活动负责。”1月13日发布的起诉书中，政治局似乎接受了这些声明：“调查未发现任何事实能证明莫斯科中心成员参与组织针对基洛夫同志的恐怖行为。”¹⁹² 阿格拉诺夫报告称，他没有证据能证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直接涉案。¹⁹³

但次日，尽管调查已正式结束且审判程序已启动，嫌疑人再次被审讯。¹⁹⁴ 在同日由斯大林秘书处成员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重写的起诉书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称已认罪。¹⁹⁵ 当然，加米涅夫签署了一份与他早先声明有些矛盾的悔过书：“我与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谈话助长了对斯大林的强烈敌意氛围。这可能创造了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局面，正如克伦斯基创造了对列宁的暴力行为似乎正当的局面。”¹⁹⁶

1月15日，季诺维也夫提交了自己的悔过书，这份冗长文件揭示了随后数月列宁格勒事件的话语前提：

我的思维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彻底思考问题。起初

我认为基洛夫遇刺及随后我对我的指控就像崩塌的悬崖偶然将我埋在碎石之下。我逐渐才看清事件的真实意义。基本而言，

十五大之后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坚持，或者更准确说，作为一个地下组织，我们相信其 1925-27 年纲领的重要部分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党迟早会承认我们的贡献。虽然很难不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经济军事增长、社会主义文化、党员规模所触动，但我们仍然……“被证明正确”：我们认为党内体制依然“糟糕”，许多 1928 年后的措施“按照我们的建议”实施，只是“对经济代价更大”。因此我们对斯大林领导层的敌意情绪挥之不去。

回首往事，我必须说党对我们太过宽容了。它当然不该真正相信我们。我们继续培养特殊心态，遵循“孤立圈子”的发展“规律”——这个圈子据称由未被承认者、“受委屈者”组成，由那些“看得最清楚却被剥夺向他人展示机会的人”组成。我们的社交世界越来越局限于被驱逐出列宁格勒的前列宁格勒积极分子圈子。我在 1929 年调查期间声称我们没有“季诺维也夫派”中心。我经常自问这个“中心”是否配得上这个名称——只有季诺维也夫加加米涅夫，加叶夫多基莫夫，再加上两三人，而他们几乎不进行系统的派系活动。¹⁹⁷

但基洛夫遇刺后，季诺维也夫对这个核心问题的答案改变了：确实存在季诺维也夫派中心。¹⁹⁸

但果真如此吗？季诺维也夫随即否认了方才的供述：“我是从报纸上得知‘列宁格勒中心’的存在。”随后加米涅夫宣称：“这不是司法审判，而是政治审判。”若说他有任何过错，那便是政治错误，但他绝非恐怖分子。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仅对列宁格勒中心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他们承认尼古拉耶夫可能受到其言论的鼓动。¹⁹⁹

据某些资料显示，尽管叶若夫要求对反对派领袖处以死刑，但有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起草了反对该决议的请愿书：他们无法接受对老近卫军的肉体消灭。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在一封联名信上征集了大量签名，信中援引列宁临终遗言：“你们之间不应流血。”最终据传斯大林本人向政治局建议在本案中不适用死刑。²⁰⁰ 尽管如此，判决结果仍显轻微。1 月 16 日，被认定为莫斯科中心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分别被判处十年和五年监禁。²⁰¹

随着全国范围内搜捕反对派行动的扩大，政治局

政治局决定审查所有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的案件。“反对派没有解除武装，”斯大林坚称，“我们必须保护自己。”²⁰² 全国性的清洗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委的同时全体会议上启动——对亲密敌人的搜捕必须成为整个党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其准司法机构的事务。

党的基层被期望保持警惕，对警戒措施高声赞许，并表达批评。“我们应该更早地消灭这些堕落的怪物，”据报道，演讲者在公共集会上吼道。“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季诺维也夫主义者靠近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一千英里内。可惜的是，在1927年我们未能像对待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²⁰³ 一些人喊道，“对季诺维也夫派的恶棍进行无情的报复！”另一些人则简单地说，“把他们都枪毙了！”被煽动得疯狂，许多人谴责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软弱，并要求“复仇”。²⁰⁴

克鲁普斯卡娅大学的积极分子们用一连串的问题淹没了一位官方记者：“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前多久知道基洛夫刺杀正在策划中？”“即将颁布的宪法是否会规定必须孤立两面派？”“为什么法院没有判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死刑？”²⁰⁵ 反过来，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党的基层要求更多：“由于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团体正被重新归类为反革命分子，我们要求每个人坦白自己所从事的任何异端活动。我们必须了解每个人，以便追查前反对派成员。”²⁰⁶

被带到清洗委员会面前，克鲁普斯卡娅大学的学生鲍里斯·利夫希茨支支吾吾、坐立不安，然后才承认他个人认识列宁格勒中心的成员：“一位名叫瓦西里耶娃的人告诉我，前反对派伪造护照冒充工人。她还经常告诉我列宁格勒工厂的反革命活动。但我太迟钝了，什么也没说！”站在委员会面前的是一个滴答作响的季诺维也夫派定时炸弹，时间紧迫。从午夜刚过到凌晨四点半，一场紧张的审讯迫使利夫希茨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供认：在拜访列宁格勒中心的成员时，他受到了哈尼克关于土耳其政策的批评性独白，而索罗金则讲着下流笑话。前者是共青团的官员，后者在列宁格勒党的机构工作，两人都已被判为尼古拉耶夫的同谋。他与之交往的两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的污点记录，说服了他的同伴们，那些学生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肯定比利夫希茨透露的要多。

利夫希茨最近才来到这所学校，现在没有一个学生敢为他写个人评价。最终，他被清洗，一份文件

被送往内务人民委员部。只有当地政治教育部的负责人波波夫呼吁稍微克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清洗；利夫希茨从来不是反对派。”也许他只是没听说：拜访一位著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的公寓意味着了解恐怖主义计划。因此，在波波夫发言之后，那些人要求审查他不可接受的“调和态度”背后的动机（*primirenchestvo*）。²⁰⁷

所有人都认为，基洛夫遇刺事件彻底改变了共产主义大学的政治氛围。党委指出：“我们变得更加自我批评。1934年时我们相当自满：全年仅召开八次全体党员会议；而仅1935年上半年就已召开九次会议。”这些会议持续时间更长、争论更激烈，发言者也大幅增加。1934年全年，会议出席情况普遍冷淡，仅有50名学生和34名教员在空荡荡的会场发言；到1935年，发言学生增至135人，教员增至98人。当地报纸满意地指出：“曾经沉默不语的个体已开始积极参与。1934年12月前党的活动还枯燥乏味，如今每位党委书记会提前五六天公布议程，并确保报告人能引发热烈讨论。”²⁰⁸

随着内部敌对分子搜查行动的升级，列宁格勒的政治集会持续时间长达七至十小时。²⁰⁹如果说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大学会议的人还在审阅以经济议题（如农业、合作社、供应）和对外政策（如“奥地利的革命事件”、“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莱比锡审判中的斗争”）为主的议程，那么到了1935年，几乎每份议程都会提及学生反对派。某些议题会引发激烈爆发，尤其是“论我们大学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和“论某些同志的非党行为”。²¹⁰随着基层政治觉悟的提升，自我诠释学成为核心议题。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1934年3月至1936年10月期间召开的480次党小组会议共讨论了844个主题，其中201项涉及“自我报告”（*самостоятели*），另有108项涉及“个别批评”。²¹¹

基洛夫遇刺三周后，共产主义大学召开了一场为期三天的重要党小组会议，讨论针对地下反对派的措施。12月23日至25日期间，二十五名发言者向与会者发表讲话（几乎相当于此前十个月的总和），每个人都声称对季诺维也夫的政变感到“愤怒”。普雷德率先冲上讲台，为“列宁格勒无产阶级敬爱的领袖基洛夫同志”致了长篇悼词。²¹²普雷德的下属伊扎克和阿尔塔帕尔马科夫轮流宣誓，称季诺维也夫派犯下的“背信弃义罪行”增强了“我们的战斗意志”。前述

经济学指导员德米特里夫怒不可遏，要求立即流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或许可被视为会议演讲中最激昂的一篇。²¹³

领导们定下了基调，党内较低层级的同志现在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在这种气氛下，资深教授们遭受了暴风骤雨般的抨击：九人作为“前季诺维也夫派”被清洗，四人作为“异己分子”被清除。²¹⁴ 经过三天不断的呐喊、抗议、攻击和清洗，党委发布总结：“学习中央委员会来信对我校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自我批评提升到新水平；自满情绪被无情揭露；每个人的政治面貌被重新审视。”²¹⁵

效仿莫斯科的风向，无人犹豫要求开除党籍。甚至无人弃权。随着基洛夫的死亡，善与恶的界限已被鲜血划出：从此以后，一致同意将成为准则。

某些传统的辩护策略不得不改变。例如，“政治文盲”——1920年代常见的辩护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已大失其效。²¹⁶ 当红教授学院学生比留科夫承认“令我羞愧的是，1925年我曾列是列宁格勒共青团反对派局的成员”时，他援引了自己的政治不成熟：“我辜负了党，因为我尚未被锻炼成熟[*закалён*]；我的党龄才五个月。”²¹⁷ 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控诉者们承认：“也许，比留科夫当时在政治上确实是文盲。但为何他错过了在1929年和1933年清洗期间认罪的机会？”²¹⁸ 另一位试图以政治文盲为由辩护的是共产主义大学指导员M·A·季科娃。1935年1月31日，她解释道：“虽然今天我完全认识到反对派有多么卑鄙，但以前我无法在心中区分阵营。”然而党委打断了她的道歉：“这是一位车间主任，一个相当有教养的人；她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²¹⁹

共产主义大学同样对亚历山大·阿尔谢尼耶维奇·谢苗诺夫失去了耐心。在两次单独的审讯中（1934年12月28日和1935年1月8日），谢苗诺夫承认，他的季诺维也夫派朋友在1920年代未曾向他保证“并非一切皆输”，“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他们不断向我通报中央委员会内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秘密分歧的细节。”他被指控在1933年清洗委员会面前隐瞒了“他现在所说内容的大部分”，并被定性为一个“没有解除武装的人”。学生们拒绝考虑与“从背后捅党一刀的恶棍”共处。“如果尼古拉耶夫没有描述他那颗子弹的季诺维也夫派血统，”他们宣称，“谢苗诺夫及其同类至今还会向我们表忠心。”²²⁰

如果说在1920年代，捣乱分子可以被派往工厂去重塑

他们的意识，那么现在党的方针已经逆转：必须保护工人免受腐化影响。因此，当电力工厂的反对派局被解散时，时任该厂党委书记的谢苗诺夫表达了留在工业界的热切愿望。1929 年，基洛夫同意听取谢苗诺夫的申诉并认真考虑过。显然，基洛夫没有想到允许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或者送他去最负盛名的共产主义学术机构学习，意味着自招灾祸。将此与 1934 年 12 月 24 日不知疲倦的贝科夫信中弥漫的焦虑对比一下：“作为农学院院长，我曾让阿列克谢耶夫担任我的助理，他原是活跃的季诺维也夫派。”经过“长期斗争”，贝科夫设法解除了其助理的职务，却震惊地得知“通过其密友，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格勒某处的工厂找到了职位！”²²¹

季诺维也夫派们希望能被宽恕，提交声明重申他们坚决、完全地脱离反对派。1935 年，这种认错成为家常便饭。意识到党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反对派试图根据最近的揭露来修正他们的人生故事。认错不仅在无休止的党小组会议上被宣读；它们还被付诸文字，心中想着诠释学官僚机构的审视，作者们希望列宁格勒省委能将他们的名字从不可信任者名单上划去。基洛夫遇刺后写就的这些供词，其诗意般的结构（即使不是其逼供手段）预示了后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地牢中获得的认罪声明。

典型的反对派成员会在叙述中掺杂大量自我批判，恳请党组织接受其真诚悔过。他真切地感到懊悔，自觉与有缺陷的过往疏离。他在曾经误入歧途的另一个自我中认出了自己，为那个自我的过失承担责任，同时坚持与这个已被彻底超越的昔日自我决裂。忏悔要求反对派成员用现已提高的思想觉悟去反省过往过错，并承担破坏党组织的责任。标准的公开忏悔会叙述一个道德重生的故事并阐明其教训。

当发言者描述入党申请前的人生阶段时，他会将过错归咎于社会出身、成长环境或性格中的某些持久缺陷。然而在谈及入党后的失误时，其辩解空间就大幅缩减。考虑到向共产主义理想靠近的过程是单向的，很难解释一位经验丰富、经过理论训练且手持党证的同志，何以会加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阵营。因此听众倾向于认为，在这场徒劳的反党叛逆中，反对派成员的行为并非出于无知，而是纯粹出于恶意。²²²

面对重重困境，前反对派成员们抱着一丝微茫的希望，宣称自我否定或能有所帮助。这些叙述描绘了逐步堕落的过程，讲述有缺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如何转变为季诺维也夫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最终沦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当讲述者描述自己如何沿着反革命轨道滑落时，也暗含着下行者仍可回升之意。突然间，在这些叙事中，讲述者茅塞顿开，重返真理之路。标准忏悔叙事的核心通常聚焦于讲述者听闻基洛夫遇刺消息的时刻。但醒悟来得太迟：“倘若我能早些认清真相，”悔过的反对派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声称，“我们敬爱的领袖今天仍会活着。”

谁的忏悔可信？谁是不可饶恕的死敌？有人认为所有曾同情异端思想者都必须清除。“我们必须达到党内不留任何前反对派成员的状态，”极端主义者主张道。²²³ 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那些积极隐瞒政治过失者才是彻头彻尾的恶棍。

1935年初，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学生叶菲莫夫被要求报告他所能记起的全部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与其说谁曾是反对派成员，不如说当时谁不是更简单些，”他指出，随后交出了一份详尽得惊人的名单，列出了1920年代在他手下于列宁格勒共青团工作的反对派成员。然而叶菲莫夫反对不加区分的污名化：“许多反对派成员‘寻求宽恕’并继续与我们共事。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隐瞒其短暂的反对派经历，且之后工作表现良好，就不应因过去的‘小过错’ [*malen' kii grekh*] 而受责难。”当然，反对派的核心骨干必须区别对待。“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处置那些在1926年虚伪悔过、却在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又加入反对派的怯懦之徒。这类前反对派成员让我想起混乱时期图希诺的盗贼，”叶菲莫夫如是说，由此将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类比于伪季米特里于17世纪初建立的、几乎摧毁俄罗斯国家的僭越宫廷。²²⁴

少数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在1935年成功保住了党证。叶菲莫夫所提及的自我改造之路虽已大幅收窄，但原则上仍为开放。²²⁵ 历史教员布鲁克的过去带有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淡淡痕迹，因“主动揭露季诺维也夫主义的反革命实质”而得以逃脱清洗。“一旦我意识到讲师马西京在其参考书目中收录了季诺维也夫的著作，我立即检举了他。”²²⁶ 共产党大学讲师V·斯塔罗斯京在接受了自己九年前在共青团全体会议上赞同“季诺维也夫主义反革命余孽”[

]是“卑鄙罪行”的事实后也得以幸免。“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与反对派组织联系薄弱并不能减轻我巨大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他声明。在庄严承诺“将全部精力投入基洛夫为之牺牲的事业之胜利斗争”后，斯塔罗斯京获得了第二次机会。²²⁷

但那些采取较少自我贬抑策略者则注定失败。安娜·伊万诺芙娜·博格丹诺娃与斯塔罗斯京同辈，因试图将罪责轻描淡写而丧失了任何生存机会。“我只偏离过一次，”博格丹诺娃声称。“既然我在1927年之前从未拒绝接受推选职务，我的反对主义立场不可能长期存在。我不是反对派的重要成员。”随后，在她撰写的题为《拖拉机站：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一文中，博格丹诺娃似乎对是否应将一头母牛集体化都并非完全确定——这明显是意识形态异端思想残留的标志。清洗委员会在清除博格丹诺娃时宣称：“对那些不彻底坦白、反而试图自我辩解的前反对派成员，绝不姑息。”²²⁸

意识到1930年代初放任渗透进党内队伍的异己分子是多么天真后，党委现在重新审查旧人事档案和远古时期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记录，以更严厉判决为目标复审旧案。

例如在1924年，若指控军事学院学生普鲁皮斯在“新方针”论争期间是托洛茨基分子，本是绝无可能的。当时实际上并不存在“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在革命前辩论中短暂使用的术语仅在1925年才被重新启用）；普鲁皮斯最初被定性为“无纪律”。在一连串质问下，普鲁皮斯现在承认，他在1924年实际上因支持反对派纲领而受到斥责，并被开除党籍。²²⁹此外，即使最初的指控得以保留，惩罚也变得更加严厉。例如，潘科的过错并未改判：他曾无礼地指出“粮食收购搞得一团糟，农村重现强制劳役[*barshchina*]，这完全是中央委员会错误导致的直接后果”。1932年仅受到“简短斥责”的潘科，如今被清洗。²³⁰

从1930年代中期自觉性的立场来看，这种双重追责完全合理：党有权复审判决，因为其日益增长的觉悟为其提供了新的洞见。

坚持认为未能正视过往罪行比罪行本身更糟，表明标准的党会监督的是态度而非外部行为。尽管忏悔显然是犯错同志与其忏悔者协作的产物，但它们始终被塑造成第一人称叙述。在公开见证其私密[

]自我时，悔过的同志试图对其错误思想进行某种客观化，通过上演羞耻与愧疚，从而保留未来（若非现在）获得赦免与重新融入的可能性。

累犯者

假定沾染反对主义思想者必定在过去暴露过其真实本性，这解释了为何要对政治传记进行细致审查。1930 年代，相当数量的前孟什维克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历史或经济学，党组织对他们尤为严苛。一位警惕的教员如此表述：“如果一个人曾多年是孟什维克，他必然有某种具体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必将显现。”²³¹

每一位孟什维克皈依者通常都声称与过去的政治隶属关系疏远。当他坐下来撰写忏悔时，很难理解自己当初怎会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有任何瓜葛。他几乎不愿承认自己曾是孟什维克，只是犹豫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描述过去的政治活动。被告没有描绘其过去所有的起伏，只描述那些增强其区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能力的事件。他声称当政治紧张局势达到沸点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可怕错误，灵魂经历了飞跃。典型的 1930 年代自传会宣告，主人公目睹白军暴行后，认识到孟什维克的叛卖性，并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为唯一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

当传记缺陷交织时，清洗的十字准星便锁定在特别可怕之处：一名党员同时犯有反对主义和曾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前成员之罪。此类延续性被仔细记录：如此再犯无疑证明其意识存在根本性问题。在此，审讯变得格外激烈，存疑的听众决心表明忏悔者并不真诚。

因此，例如，人们一直知道，在共产党大学任教十余年、讲授苏联各民族历史的康斯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尔沙夫斯基，曾持有季诺维也夫主义同情；事实上，他曾支持共产党大学的反对派校长米宁。²³² 结果发现，这位身处困境的教员在 1916-17 年冬季也曾与孟什维克有关联——这为基洛夫遇刺后批判性重估其过去提供了另一理由。阿尔沙夫斯基希望他早期的政治殉难和加入红军能抵消他明显的缺陷。至于其孟什维克过失，他试图解释：“我不知道 [

布尔什维克地下公寓的地址，但我无法忍受完全脱离政治斗争——我采取的是机会主义行为，但无论如何我在 1917 年就与孟什维克主义断绝了关系。”

当然，阿尔沙夫斯基也必须解释其更近期的过失。他忏悔地讲述了自己堕落与随后恢复的故事。但他也提出了辩解：“季诺维也夫并非一次性展开他的纲领。起初，我被他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怀疑态度所吸引……我的[知识分子习气]显现了出来。”

通过将相对中性的“知识分子”转变为贬义的“知识分子习气”，阿尔沙夫斯基开始构建辩护。短暂涉足孟什维克和季诺维也夫主义，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某个不断摇摆的阶级特有的自然（尽管错误）倾向的结果？阿尔沙夫斯基以同样的精神继续道：“在第十四次党代会前夕，我处于沼泽[*boloto*]中；即，我既不支持党的路线，也不支持季诺维也夫。我如何解释这点？因为作为海军学院的学生，我与工人阶级群众隔绝。1918-19 年，我在红色教授学院直接在季诺维也夫手下工作，从那时起我个人尊敬他。”

但任何对季诺维也夫的有利提及都是不可接受的。“那么，”阿尔沙夫斯基的审讯者问道，“1917 年季诺维也夫破坏罢工，或其近期既是反党又是反革命的活动，难道没有让你感到尴尬吗？”阿尔沙夫斯基的回答很迅速：“我过去认为每个党员时不时都会犯错。”

“他被季诺维也夫的个性迷惑了？这算什么解释？”来自大学党委的库兹米诺夫怒斥道。“阿尔沙夫斯基明显缺乏任何党的坚定性！”阿尔沙夫斯基的同辈库普里亚诺夫也很愤怒：“你谈论‘前反对派成员的威望’——他们如今是反革命的先锋；我们最愤慨地驳斥这点！”贝科夫提醒阿尔沙夫斯基又一个过去的错误：“你过去常说托洛茨基分子是反革命者，但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是！”

或许在 1930 年代初，阿尔沙夫斯基不会遭遇如此顽强的质问，但标准提高了：现在他不仅被要求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揭露他人。当他承认自己“没有揭露任何前反对派成员，……忽视了反对季诺维也夫主义反对派的实际斗争”时，会场上一个声音喊道：“换句话说，你什么都没做！”阿尔沙夫斯基默认了这点，他的批评者断定他包庇反对派同伙的意愿仍在持续：“他没有动一根手指去揭露雅科夫列夫”——这位反对派成员因思想异端被军事学院开除；“他在私下谈话中称其为‘私人朋友’。”

阿尔沙夫斯基似乎并非一位能鼓舞人心的教师：“他讲课的质量，”德米特里耶夫评论道，“有待提高。”显然，这意味着阿尔沙夫斯基缺乏教学、学术和思想活力。“他的实际工作，”其他人补充道，“日常引起误解。”此外，他“作为科学工作者部门主席几乎无所作为，且备课不充分前来授课。”

阿福尼娜同样失望：“他有二十年党的经验，更不用说他的大学教育……但他未能确保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像红线贯穿他的讲座。”参与抨击的另一位年轻教员伊利亚诺夫的结论很严峻：“作为一名教育家，阿尔沙夫斯基毫无价值。他在讲座中回避批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尽管我们曾就此直接向他提问。‘我已经给了你们总体思想，’他会说，‘但我没时间在此展开。’”

党委另有两名成员发言：马尔特诺夫得出印象，“阿尔沙夫斯基对党委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叶列缅科同样感到不满：“无论我们把他安排到哪个岗位，他都会失败。”²³³ 党委书记阿德里亚诺夫同志总结道：“阿尔沙夫斯基同志已被证明无法根除在第十四次党代会期间显现的动摇性。事实上，整个中间时期的表现表明他恰恰走向了反面：……他敷衍塞责地履行职责。”

在最后陈述中，阿尔沙夫斯基请求更多时间：“尽管这里关于我的许多批评是正确的，我也需要思考所有被告诫的内容，但我并不认为自己与党疏离。诚然，我本应对季诺维也夫主义的乌合之众持更强硬的批判态度……我需要被严厉警醒。我必须提高觉悟并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生活……但我相信自己能在留在党内的同时实现自我救赎。”²³⁴ 阿尔沙夫斯基进行了自我诊断：他病了，但并非病入膏肓。²³⁵

他曾经的同僚，现在是他的法官，并没有被说服。伊扎克指出，早在1933年的清洗中，同志们就已经指出：“阿尔沙夫斯基消极被动，但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他的缺点。很难找到阿尔沙夫斯基在说什么——无论是支持党还是反对党。”他很难算是模范的积极共产党员，克拉索夫斯基指责道：“你落后于生活。我担心你内心有一条怀疑、不相信的蠕虫，总是迫使你采取中间立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你典型的思维是：‘我宁愿远离这场混乱。为什么要卷入？’”

阿尔沙夫斯基被清洗并非因具体罪行，而是其人格被认定存在缺陷；其主要过错与其说是实际行为，不如说是精神上残留的弱点。比科夫宣称：“我们

审判阿尔沙夫斯基，是因他未能理解时代节点，未能捕捉到信号，几乎未曾揭露反对派分子。”在再次被视为可靠的党员之前，阿尔沙夫斯基分裂的自我必须得到治愈：其优柔寡断——被同僚们称为“动摇”（*колебание*）和“摇摆”（*шатание*）——必须转化为坚定信念。

本案的核心在于个人意志。在践行意志与背弃信念之间做出抉择——此处基督教主题的挪用尤为明显——这决定了个人的政治立场。诚然，若无反向意志的诱惑，阿尔沙夫斯基根本无需坚强意志。但全心认同党的路线的时刻已然到来。基洛夫之死终结了疑虑时期。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此刻必须“意志坚定”（*волевой*）、“精力充沛”（*энергичный*）且“果断坚决”（*решительный*）。如果说阿尔沙夫斯基在忏悔中温顺地服从了未明言的官方准则，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尽管阿尔沙夫斯基自1914年起便是党员，“库普里亚诺夫指出，”但他仍机械地对待职责。”²³⁶ 据钦巴洛夫所述：“阿尔沙夫斯基已变质酸腐[*с кис*]；人们很容易看出他不相信党的使命。”²³⁷

如果相信党委的话，阿尔沙夫斯基算得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哈姆雷特。丹麦王子的悲剧源于同样的缺陷，这个缺陷阻碍了许多人全面参与革命活动：优柔寡断。著名的革命前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写道，哈姆雷特“在挑战面前脸色苍白，犹豫不决，除了空谈外无所作为。”²³⁸ 这个比较立即在共产主义大学被采用：“阿尔沙夫斯基问题的根源是他的哈姆雷特主义，他腐朽的内心[*腐朽的内心*]，”库普里亚诺夫评论道。“即使在今天，不信仰[*不信仰*]和怀疑[*怀疑*]正居住在他体内。”克拉索夫斯基同意：“阿尔沙夫斯基有两种特质。有时他瘫痪了，有时又谦虚地准备好行动。”哈姆雷特主义也是克拉索夫斯基嘲笑“阿尔沙夫斯基的沉思[*沉思*]如何看待季诺维也夫派的那些无赖。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贝科夫的激进态度如今在大学里已无人不晓，他带着某种总结性的口吻说道：“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你不是我们的人。所有摇摆不定的人，所有患有哈姆雷特式犹豫不决症的人，今后都将被清除。”党的委员会的决定中当然没有任何哈姆雷特式犹豫的痕迹：阿尔沙夫斯基被一致投票清除出党。²³⁹

由于无法做出决断，阿尔沙夫斯基未能以足够强调过去所犯罪行的方式重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透明等同于美德，不透明则等同于性格缺陷。忏悔式的自我叙述能发挥其净化作用，是因为人们相信恶是无意识且未明言的，难以表达。阿尔沙夫斯基的含糊其辞和有所保留，未能在其灵魂中重建光明与黑暗的区别。淡化过去的罪行比罪行本身更糟——唯有言语的表述才承载着真理的印记。

如果阿沙夫斯基的清洗是共产党教师中的当日故事，那么格里高利·所罗门诺维奇·扎伊德尔的突然垮台则在列宁格勒学术界掀起了波澜。他的垮台令人眼花缭乱，揭示了党内和职业生涯中可能发生的逆转：扎伊德尔是斯大林1931年信件的受益者，该信件清除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并将他确立为正统学者，却在1934-35年冬的意识形态转变中成为受害者。

有一段时间，扎伊德尔的声誉似乎无可辩驳：许多记录声称，这位经验丰富、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成功地从犹太社会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²⁴⁰ 扎伊德尔曾被列宁格勒的每一个历史学术机构争抢。除了在共产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研究所的任命外，他还在托尔马切夫学院任教。也许他最高的荣誉是前一年，他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确实，许多人将扎伊德尔视为培养了第一代苏联历史学家的人。²⁴¹ 安娜·潘克拉托娃，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和著名的科学院成员，这样写道：“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扎伊德尔是西欧革命运动历史的主要专家。他的书籍和文章，以及他的教学工作，都获得了极好的评价。”²⁴² 康斯坦丁·什捷帕，一位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并写下回忆录的苏联历史学家，将扎伊德尔列为“那些被清洗浪潮冲刷得无影无踪的西方历史学家之一。”²⁴³

如果说这位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从犹太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仅仅在几个月前还被描绘得非同凡响，那么到了1935年1月，他曾经的反对主义又回来困扰他。扎伊德尔从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瞬间转变为反对派闯入者的故事，详细描述了1935年中央委员会信件之后共产主义身份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对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的新恐慌态度也引发了对其他政治罪行的重新诠释，而曾经的犹太崩得成员身份也不再被轻视。先前被忽视为微不足道的传记细节变得绝对无法容忍，扎伊德尔突然被揭露为一个危险的敌人。

扎伊德尔从未试图掩饰他的背景。他在提交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自传中写道，他出生的犹太家庭有九个人：“我父亲是一名教师，我的一个兄弟是印刷工人。”他毕业于一所体育馆，并在法国度过了两年（1913-14年），这些事实表明他出身富裕，尽管一些有才华的犹太儿童——例如马克·夏加尔——确实设法获得了奖学金在欧洲学习。扎伊德尔在强调他青年时期的激进主义时很有说服力：“当我因为

“不可靠” [他曾参加一个地下崩得圈子] 而无法继续学业时，我在基辅大学旁听课程。”在革命期间，扎伊德尔写道，“我发现自己身处沙皇军队的第170营。”那时，扎伊德尔很激进，但也许还不够激进：“尽管我已经为2月27日[二月革命爆发的日子]的军事起义做了准备，但我没有正确回应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问题是扎伊德尔“没有失败主义情绪”；也就是说，他没有遵循列宁的号召脱离“帝国主义战争。”

然而，内战在俄罗斯南方的转向很快说服了扎伊德尔将他的命运与红军绑在一起。“我与革命有血缘关系，”扎伊德尔写道。“我的哥哥被白军处决，我的父亲被监禁。我的三个姐妹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德国人判处我的弟弟进集中营。在德国占领期间，我使用别人的护照躲藏以避免逮捕。”加入红军后，扎伊德尔迅速成为其政治人员的一部分，并最终承担了一些更令人不快的责任。1919年，他在基辅省的革命法庭担任人民调查员，1920年末被任命为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司法部负责人——这些任务使他卷入对“白军合作者”的报复。在1922年进入莫斯科红色教授研究所之前，扎伊德尔还在维尼察司法部短暂工作过。²⁴⁴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扎伊德尔致力于学术工作，他的同行们期待他完成一部关于现代法国历史的“重要专著”。趁着苏联研究人员还能出国的时期，他于1925-26年访问了法国和德国为他的书籍收集材料——这次旅行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²⁴⁵

当红色教授研究所和党史研究所于1934年12月23日召开联席党会议时，扎伊德尔有许多问题要回答，关于他的小资产阶级背景和他多变的政治过去。从1913年到1917年，他一直是崩得成员；1918年，他短暂加入了马尔托夫的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更糟糕的是，在新路线争议期间，扎伊德尔当时是莫斯科红色教授研究所的学生，他“表达了对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团结。”在卡尔·拉狄克煽动性演讲的影响下，他投票反对了中央委员会。²⁴⁶

扎伊德尔尽可能长时间地将他的错误归咎于他无法摆脱的知识分子恶习：“我的观点不符合任何派系的观点，”他承认。“我过去是狂野和冷漠的。”这里扎伊德尔指的是他的性格缺陷；这些缺陷在1930年代初无休止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已经被指出，但那时他的“急躁脾气”和“偶尔的不一致”总是在普遍赞扬中被提及。²⁴⁷ 在1934年，

扎伊德尔仍然以积极的态度结束他的政治资产负债表，坚持认为“1926年后，我积极打击所有偏差。”当他面对1929年和1933年的清洗时，他提醒听众，他安然无恙地度过而没有受到指责。他在列宁格勒红色教授研究所的个人评估写道：“扎伊德尔是一名积极而有纪律的党员。尽管他在1923年动摇过，但后来在历史战线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者表现出勇气。”²⁴⁸

清洗委员会中对扎伊杰利怀有敌意的成员不时提醒他职业生涯后期犯下的错误。于是，结果证明，他在1927年也曾动摇过，“甚至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对反对派的清洗。”²⁴⁹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对其声誉的损害更大：1930年12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得出结论：“扎伊杰利因批准了什切戈洛夫的书稿而有罪，该文本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扎伊杰利只读了书稿的最后两章，未能察觉什切戈洛夫在纵容“托洛茨基派将热月反革命概念应用于十月革命”。²⁵⁰

扎伊杰利还因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周围聚集了“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受到训斥：在鼓励安德烈·马雷舍夫、雅科夫·博戈莫利和其他列宁格勒中心成员的同时，他没有费心“用新干部替换他们”。²⁵¹博戈莫利的案例尤其严重，因为他出版了《饶勒斯与饶勒斯主义》（1934年），当时他还是扎伊杰利的门徒——“一本充满反革命违禁品的书，这确实与扎伊杰利本人的《第二国际史》的精神相符。”扎伊杰利甚至编辑了这位门徒的著作。²⁵²但这位历史学家总体上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好名声：他在列宁格勒科学院的挚友托姆辛斯基声称，即便扎伊杰尔犯了错误，他也以“在对抗君主主义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拉托诺夫以及‘弗林德利和扎霍尔之类的马克思主义伪造者’的理论战线上取得的成就”充分弥补了过失。²⁵³

基洛夫遇刺提高了赌注。在1935年1月党会议上发言的诋毁者们嗅到了血腥味：“我们必须反复调查那些过往带有反对派污点的党组织成员。”彻底忏悔的时刻到了。扎伊杰尔表示：“瞄准我们领导人的子弹，是由潜入党内的邪恶分子锻造的：这让每个人都反思自己对所发生之事应负的责任。党组织有权将我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反对派的人——置于合理的怀疑之下。”扎伊杰尔以自责的口吻总结道：“尽管这让我难以启齿，但党组织神经紧张，根本无暇顾及扎伊杰尔脆弱的神经。”²⁵⁴

这种含糊其辞的辩护激怒了某位克劳尔，他厉声斥责道：“‘党组织有权调查我们每一个反对派分子，’扎伊杰尔说。但何必

如此煽情？党组织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任何人这样做！扎伊杰尔本应发表不同的讲话，告诉我们科研干部队伍的情况有多糟糕。”学生和教职工们齐声叫好：“继续说！”“狠狠批他！”受到鼓舞的克劳尔继续说道：“接下来几天，我们应该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者替换我们的科研干部队伍。”²⁵⁵

喧嚣平息后，扎伊杰尔承认“理论家们的情况尤其复杂——他们是党组织最神圣的群体。因为我们忙于争论斯大林的信件[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我们没有彻底消灭敌人[1932年]：那些不被共产主义学院信任的人被开除出队伍，却在其他学术机构找到了庇护所。在那里，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残留的反感得以表达。是时候终结这些知识分子花招了。”然而，尽管他语带自责，扎伊杰尔还是被斥为“未能克服其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人”而被喝止。1935年1月16日，斯莫尔尼区委批准了对他的清洗。²⁵⁶

三周后，扎伊杰尔提交了一份谄媚的认罪书——一篇奇特的、近乎抒情而又恶毒的、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长篇抨击——请求列宁格勒党委秘书处考虑其情有可原之处：

综合所有情况来看，我似乎不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政党。但当我分析自己的全部过去，尤其是1924年以来的工作，我得出的结论是：清洗我将是过于严厉的惩罚：我从未参加任何派别，与那些沦为法西斯刺客的罪犯毫无共同之处。确实，我未能识破博戈莫尔尼对党忠诚的浮夸宣言，并为他的书撰写了序言。我知道这个堕落者、这个反革命分子（他目前在集中营）曾是反对派，但不知道他曾是活跃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真遗憾我没有及时认清他卑劣腐化的内心！该死的家伙，三次诅咒他！

但从我1934年7月31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刺杀饶勒斯》中——显然，我捍卫的是列宁-斯大林立场。此外，1934年春天，是我拒绝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第二国际》刊登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在那件事上，我足够警惕，认出了季诺维也夫言论中的危险，尽管他被允许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我的党务、学术和文学工作对整个列宁格勒党组织来说是公开的。当我犯错时，我会立即纠正自己。我为提高干部队伍质量而进行的斗争一直是认真、热情和执着的。

请记住，我与无产阶级革命血脉相连。我的父亲和兄弟在内战中牺牲。1927年，我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党俱乐部被一枚白军炸弹炸伤。那次爆炸使我

所有的牙齿脱落，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需要拄拐杖行走。我的伤口愈合了，但直到今天，我的腿几乎无法支撑我。对我来说，离开党组织的生活将是噩梦般的折磨。

扎伊杰尔的道歉充满了 1935 年的词汇和意象。大学被描绘成黑白分明的图景，敌人遭到诅咒。他的申诉谴责了一些同事和门徒，扎伊杰尔发誓自己一直是所有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敌人。如果他的话可信，扎伊杰尔是一位极其警惕的理论家，决心将苏联报刊的版面从那些试图暗中传播异端邪说的可疑作者手中拯救出来。他也关心学生的思想纯洁性，以至于经常监督课程并检查实际教授的内容。

他的请愿书未经审议便被归档，扎伊杰尔被起诉并被流放到萨拉托夫进行行政流放。尽管反对主义长期被视为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但它并非苏联刑法下的可惩罚罪行。只有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这样的法外机构才能流放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是一种预防性的行政措施，严格意义上不是法律判决。²⁵⁷

扎伊杰尔的许多同事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处对该市大学中政治可疑的学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搜捕。这次“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的行动”从 1935 年 2 月 3 日持续到 2 月 15 日，其范围远超过此前的反学术行动，如“学者案”（1930-31 年）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党案”（1933-34 年）。这两起案件都没有涉及逮捕和审讯手持党证的学者。²⁵⁸ 如此多的共产党员教员被送往东部或北极地区以至普雷德不得不向莫斯科乞求立即派遣替补人员，以便大学能够继续运作。

随着基洛夫遇刺后第一波镇压的展开，其焦点集中在“列宁格勒中心的周围人员——那些认识其被处决成员并曾被欢迎进入他们公寓的个人”。²⁵⁹ 如下表所示，受害者中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异常高。

不出所料，被捕的学者大多“出身资产阶级”。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事后看来，1935 年显然是阶级作为共产主义诠释学关键因素的绝唱——在此后，社会家系再也不会像在这次运动中那样被仔细记录。²⁶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被开除者中几乎一半被定性为土生土长的反对派。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方报告，在基洛夫遇刺后两个半月内逮捕的 843 人中，有 325 人在 1925 年支持过季诺维也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了一次性反对派和多次违规者——后者显然是本质无法改造的个人。²⁶¹

NKVD Cleansing Operation in Leningrad Higher Education I

Social Standing	Total	Including Women	Age				Social Origins												Education		
			1870-90	1890-1900	1901-10	1911-	Workers	Employees	Peasants (kol'khozniki)	Edinoliichniki	Peasants (undetermined)	Kulaks	Traders and Home Owners	Artisans	Nobles	Former Policemen	Servants of the cult	Other	Higher	Middle Lower	Lower
Scholarly workers	93	7	5	37	50	1	26	17	2	13	4	3	10	7	1	1	1	2	7	79	14
Students	90	8	1	27	58	4	32	13	4	20	7	1	2	5	—	—	1	4	26	64	—
Head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11	1	—	4	7	—	2	4	—	1	1	—	2	1	—	—	—	—	8	3	—
Other	649	39	106	260	278	5	281	70	11	116	54	3	25	43	4	2	2	43	77	142	323
Total	843	55	112	328	393	10	341	104	17	150	66	7	40	56	5	3	5	49	118	288	337

1935 年 2 月 18 日，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扎科夫斯基总结这次行动时，声称发现了大量“隐蔽的”反对派，对他们来说，放弃反对党的斗争“不过是一种反对派策略”。他声称，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正遵循指示，保存其干部、加强相互联系，并准备继续其颠覆活动：“搜查发现了大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和传单、反对派领导人的肖像、……反革命讽刺作品、小调和反苏漫画。”例如，在列宁格勒工程学院学生格拉科夫家中，藏有一份托洛茨基长达 19 页的秘密信件，是从君士坦丁堡偷运出来的。²⁶²

还有列文，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讲师，扎科夫斯基描述他是“特别热心的派别主义者”，对这些材料持“双重态度”。扎科夫斯基认为列文与其审讯者之间的以下对话尤其具有煽动性：

审讯员：你家中丰富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文献，与你声称已停止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两者如何调和？

列文：我想在教学中使用这些文献。它们能让我举例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本质，并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错误。

最终，列文被迫承认，他没有官方授权保留这些档案，并且他是擅自行动。²⁶³

扎科夫斯基继续说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揭示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兽性的仇恨有多根深蒂固”。他举了两个例子。被捕的某位扎卡托夫供认曾说过：“刺杀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无法逆转历史发展：领导人来了又走”，仿佛他根本不在乎基洛夫。同样无法抑制其煽动精神的托洛茨基分子赫拉普科夫曾断言：“现政权是纯粹的法西斯主义，隐藏在革命辞藻背后。”²⁶⁴

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被捕的党员人数空前之多，斯大林的安全机构运作极其有效。然而，1935 年冬天的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可以算是小规模。由于清洗和流放惩罚的是那些被视为不可靠而非不可救药的男女，这些镇压措施相当于一种社会政治预防措施，而非一场全面的反恐运动。²⁶⁵

更广泛的罗网

除了上述清洗活动，中央委员会还任命叶若夫领导“全国党员档案审查”。²⁶⁶表面上这是对“党员登记中不可容忍的混乱”的回应，这项审查计划实际上揭示了基洛夫遇刺后席卷全党的清洗狂热。档案管理从来不是简单的行政事务；它不仅仅是清点或计数，而是界定善恶并将两者分离。

党证——共产主义礼仪中的主要元素——每个成员必须时刻携带。²⁶⁷ 1935年1月，中央委员会发出一封信，声称敌人已获得许多此类党证：“我们如何解释，当刺杀基洛夫的凶手、怪物尼古拉耶夫在刺杀前三周因扑向基洛夫被捕时，他仅凭亮出党证就逃脱了？……难道很难理解党证可以被伪造或盗窃吗？”²⁶⁸ 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5月13日的另一封官方信件中更详细地回到了这个问题，标题是《整顿我们党的内部》。这封信警告了“对党证控制不可容忍的松懈”，并举例说明间谍“能够获得党员证”，并将其用作其“掩护”的一部分。²⁶⁹

在共产主义大学，党证文件的审查从1935年6月8日持续到6月25日。²⁷⁰ 程序始于当地党组织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党证登记和保管中的不当行为”。²⁷¹ 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册的1,045名同志中，有293人（28%）的身份文件存在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同志被发现篡改了他们的证件：例如，谢列达因“将其党籍延长了一年”而受到谴责。²⁷² 党委一本正经地说：“对党证文件的粗心和疏忽助长了工人阶级的敌人。”²⁷³ 学生们受到警醒，承诺“像珍惜最宝贵的财产一样珍惜党证”。韦列夏金开始把他的党证放在钱包里，而卢卡舍维奇则习惯把她的党证藏在一个“秘密地点”——她的内衣里。²⁷⁴

起初，列宁格勒党组织对审查结果表示满意。但在中央委员会对全国范围内审查程序的“官僚主义”方式表示不满后，对清洗工作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斯莫尔尼区委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审查的进行……准备不足；仓促且形式主义……区委书记与地方委员会局联手，没有集中精力发现异己分子，而是局限于将会员证与护照、

登记卡进行比对[登记卡]，以及同志们的教育和资格记录，没有努力全面考察他们的个性。”没有一个学生被“揭露”，只有十四张党证被收回，其中十二张很快被退还。没收党证的理由往往微不足道——例如，某某人未缴纳党费或“违规入党”。有些党证未注明持有人的处分记录；有些缺少持有人成功通过1929年和1933年清洗时所盖的印章；党证上的号码经常与登记表上的号码不符——这些几乎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在发现党内存在第五纵队时期望看到的开除理由。

斯莫尔尼区党委的夏季全体会议取消了对一些学术组织的核查结果。共产主义大学别无选择，只能在8月3日批准这一决定：“对多个案件的重新审查证明区党委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以布尔什维克应有的热情进行核查。”大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的党组织者没有积极参与核查，而是将自己置于公正观察者的位置。”²⁷⁵ 普列德认可了这种自我批评：“区委员会正确指出‘审查工作仓促而敷衍；只检查了记账中的个别错误，却没有对个人本身进行深入审查。’区委会局的成员一天要处理六十到七十个案件。”学生沃尔科夫对最后一点表示认同：“信不信由你，斯莫尔尼局让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²⁷⁶

为响应“深入了解（每个人的）本质”这一新的重点（俄语：实质审查），共产主义大学于8月25日至10月5日进行了新一轮审查。列宁格勒党组织指示地方委员会“确保每位共产党员都有个人评价和自传”。同年夏天接任党组织书记的工人、1915年入党的党员鲍里斯·普列姆，在这些指示基础上补充了自己的要求：“清除党内分子应成为日常工作。那些试图向党隐瞒自己‘罪过’的学生应当知道，他们不可能逃脱。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积极参与净化我们的组织，揭露伪装者、前反对派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斯莫尔尼区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巴拉基娜和安德烈耶娃，在一组研究生的协助下，重新核查了文件。²⁷⁷

鉴于过去的经验表明，大学领导不可能评估那些他们最多只是泛泛之交的人的资格，对党员文件的审查工作从他们的办公室撤出

并交还给了“基层组织”。列宁格勒党组织宣称：“这一次的审查才是它一直以来应有的样子——一场大规模的揭发运动。”²⁷⁸

核实速度的减缓，“从每天四五十名学生最多减至十五名”，伴随着清洗率的上升，从春季的 1.6% 升至夏季的 6%——略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对于共产主义大学这样一所招募高度核实候选人的机构来说，”这个比例高得令人尴尬。“这里确实混乱不堪，”斯莫尔尼党委会秘书科西莫夫总结道。关于“阶级敌人的阵线：位于我们地区的一大群大学首先经历了外来分子的压力，他们显然轻易地渗透进去，”得出了严厉但不可避免的结论。²⁷⁹

尽管如此，当共产主义大学核实的所有阶段被汇总时，结果并不那么血腥：997 名党员中有 27 人被永久清洗（2.8%），58 名候补党员中有 7 人（12%）；2 名同志从正式党员降为“同情者”；58 名同志的党证上增加了批评；以及“8 个案件在局里悬而未决。”²⁸⁰ 那些被筛选出来的人被描述为“富农”、“绿林分子”、“道德败坏者”、“逃兵”、“旁观者”以及“不配得者”；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人被描述为“阶级异己分子”，而非反对派。此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仔细地与“间谍”和“与前反对派有牵连的学生”区分开来。²⁸¹

随着清查的进行，官方的评论越来越多地渗透着审讯式的术语：故事被添枝加叶地加以充实和评判。在第一轮清查期间，大学刊物坚持认为，“许多学生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勇气，不敢向党报告有关亲属的情况。在第二轮中产生了更多的供词。”因此，如果在第一轮中，“巴兰多林没有提到他的岳父母曾被去富农化”，而“莫霍夫的自述只字未提他的刑事定罪”，那么现在他们的背景已被揭露。乌沙京据称不知道他父母的社会地位，审讯者尖刻地补充说，“这意味着他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出身。最终我们发现，即使在今天，乌沙京一家仍在集体农庄之外！”²⁸²

科罗特科夫被揭露为“一个乡村警官的儿子”，而谢苗诺夫原来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在 1929 年和 1933 年的清洗中隐瞒了自己的阶级出身。²⁸³ 当被问及父亲时，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博格丹诺夫回答说：“农民。”“说具体点：中农、贫农？”博格丹诺夫开始“闪烁其词，拐弯抹角，犹豫不决。”最后，他嘟囔道，“我父亲过去除了他的份地外，还拥有七十五 俄亩 土地，因此他需要雇佣一些劳动力。”调查人员以一种说教的口吻得出结论：“天真地相

信这个学生会主动、无缝地讲述整个故事是愚蠢的。不。博格丹诺夫撒谎并否认一切。只有被逼到墙角时，他才坦白了他的过去。”²⁸⁴ 自传被仔细审查，有时长达数小时。遥远的事件被深挖，导致了惊人的“揭露”。奥西波夫，一个“谦逊的家伙”，声称他的父亲是“一个死于 1918 年的乡村文书”。然而，清查委员会发现，“在革命期间，奥西波夫的父亲组织了镇压当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白军分队；他还告发了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当地人。”奥西波夫被描述为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因此被清洗。²⁸⁵

共产主义大学的农业专家彼得·叶列缅科遇到了麻烦，当时斯莫尔尼区收到了以下举报：

我有责任通知您，叶列缅科正在隐瞒他的社会出身；实际上，他是原斯塔夫罗波尔省一个地主的儿子（在旧地图上你仍然可以找到“叶列缅科庄园”）。作为沙皇军队的一名军官，叶列缅科积极参与了 1918 年 6 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在高加索一家[经营不善的]国营农场担任场长期间，叶列缅科被判了死刑；他因与最近失势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努基泽的关系而获赦免。

为避免报复，我不表明身份。这些人对复仇有着贪得无厌的渴望——只要看看他们从大学里清除了多少优秀个体。²⁸⁶

为稳妥起见，大学党委收走了叶列缅科的党员证，并派遣两组调查人员前往其原籍沃罗希洛夫省。在询问叶列缅科故乡尼科利斯科耶集体农庄成员时，其中一组查明：内战期间，叶列缅科的父亲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叛徒，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英雄——“因在红军进村时指认武装富农，他被当作高尔察克逃兵枪决。”

第二组证实：193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叶列缅科确实在亚速-黑海地区担任国营农场场长。因其收获的粮食超过采购计划配额，叶列缅科获得了国家奖金。但当罗斯托夫粮食信托机构为他的国营农场追加额外配额时，这些要求最终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叶列缅科被解雇；根据《刑法》第 58-14 条“反革命破坏罪”被起诉；并被判处“最高程度社会防卫措施”（死刑）。经上诉后，最高法院将其刑罚改为一年监禁，附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²⁸⁷

为稳妥起见，核实委员会还向沃罗希洛夫州内务人民委员部发送了关于叶列缅科的信息查询公函。回复称：“你们查询的个体我方并不知晓。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确曾存在一名地主，其子与白军作战；但其姓名应为

亚列缅科，而非叶列缅科。若贵方尚未确认该个体身份，请提供详细自传，我方将尽力核查。”

最后一轮电报交流表明，在 1935 年，NKVD 作为一个附属机构运作，仅在党特别指示时才进行调查。在大清洗期间，它会自行发起调查，经常针对党员。

288

尽管如此，验证的一些特征确实预示了未来的发展。例如，党法庭与国家调查机构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1935 年年中，党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适当合作的问题被正式提出。7 月 13 日，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了一项程序，允许后者监视党的清洗并“确保清除那些设法渗透进我们队伍的敌人”。²⁸⁹

随着调查的深入，叶若夫指示 NKVD 分支机构重新审查有关可疑共产党员的证据，并将其提交给党的委员会。在地区党委，三人小组在清洗行动中获得了新的突出地位；他们的活动以及类似准司法机构的活动暗示了某种可怕新事物的可能性。一份日期为 12 月 5 日的内部备忘录指出，NKVD 机构现在正积极核实党的文件，“集中精力快速部署行动和调查机构的工作”。²⁹⁰ 在 1935 年 8 月至 1936 年 2 月之间，列宁格勒 NKVD 逮捕了 1,173 名前党员。²⁹¹ 当扎伊德尔（Zaidel’）的清洗被列宁格勒党委员会批准时，他也被一个根据秘密警察指令运作的特别委员会标记为“应被开除”。²⁹²

多年以后，党的领导人抱怨道，在叶若夫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攫取了巨大权力；党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这一机构的集体控制。”²⁹³ 然而，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党实行专制”的时代错位论断，往往掩盖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党是相辅相成的机构。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谈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行动时，眼中曾噙满喜悦的泪水。他总是表示“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怀有温暖而真挚的感激之情”。²⁹⁴ 在这支部队的一名中尉看来，内务人民委员部并非在摧毁党，而是在净化它：“我们可能需要清洗多达一半的党员——各种死抱昨日思想的渣滓……以确保另一半得到再教育并追随我们。”²⁹⁵ 尽管确实存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仅举一例——列席列宁格勒党监察委员会会议的事实，但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从未完全脱离党的监督；真正的问题在于党内的哪个层级监督其工作，

是列宁格勒党组织机构（至少到 1936 年中期仍是如此），还是斯大林的办公厅（1937-1938 年）。²⁹⁶

虽然 1935 年全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数低于自 1929 年以来的任何年份，但政治逮捕的相对比例正在上升：1935 年因“反革命”罪行被逮捕的人数比 1934 年增加了 10%，因“反苏宣传”被逮捕的人数则增加了两倍半。²⁹⁷ 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区委的材料显示，越来越多的刑事调查针对的是“被揭发的”学生和教授：里夫金因是“大型林业企业家”之子而被拘留，沙塔洛夫则因曾是“参与处决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而被捕。还有一些人的罪行并未远去：希曼斯基和尼坎德罗夫因“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联系”而被拘禁；讲师戈列娃因“散布煽动性谣言”而身陷囹圄。²⁹⁸

有些人未经审判即被流放。1936 年 3 月至 4 月，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了一项行动，“将近期党籍审查中清除的敌人和恶棍驱逐出城”。当列宁格勒州委局于 3 月 13 日召开会议时，斯莫尔尼的基洛夫继任者日丹诺夫要求扎科夫斯基在两周内向他提交一份流放候选人名单；这些候选人应“根据区委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提供的信息”选出。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任负责人报告说，他的部门已准备了两千名此类“恶棍”的档案。扎科夫斯基抱怨说，如果某些区委的书记更及时地回复他关于反对派分子的信息请求，名单本可以更长；他声称“内务人民委员部目前正在审查一份包含另外四千名前党员的名单”。²⁹⁹

在打击学术人员的同时，扎科夫斯基也迫害了他们的亲属。截至 1935 年 2 月 20 日，已有 466 户被清洗的反对派家庭被驱逐出城。³⁰⁰ 对亲属的搜捕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秘密决议和行政措施得以系统化。秘密指令进一步规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妻子必须被流放。被认为可能采取反苏行动的儿童应被送往孤儿院和劳动营。

卡尔波夫家庭的经历在这里颇具启发性，卡尔波夫是新政论战期间共产主义大学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领袖。在担任列宁格勒教育学院苏联史系主任期间，卡尔波夫在基洛夫遇刺后被捕。卡尔波夫的妻子沃伊特洛夫斯卡娅被解雇并被她就读的研究生院开除，随后被传唤至内务人民委员部

总部，并被命令停止与卡尔波夫的一切联系。针对她向列宁格勒州委提交的请愿书，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最初被告知其权利将得到恢复。但在 6 月 25 日，警方没收了她的护照，并命令她在三天内离开列宁格勒。暂时地——我将在下一章回到这个案例——她在一所省立大学的教育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³⁰¹

矛盾信号

至此，我们的故事终于回到了 1936 年初以及本章开篇提到的展览馆。在过去一年中，重要变化打破了关于共产主义者灵魂的基本假设。粗略回顾这一时期的人事名单表明，事件进程正在加快：在基洛夫遇刺前当选的九名共产主义大学党委委员中，只有两人——普雷德和乌赫图塔——留任。一些党报编辑和期刊编辑已被更换，至少有六名经验丰富的讲师以及更多的年轻教员被流放。³⁰²但整个 1935 年，中央仍在发出相当矛盾的信号。虽然基洛夫遇刺无疑催化了重要的话语转变，但大清洗的势头尚未在列宁格勒积聚。因此，当地媒体仍可宣称“1935 年对于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来说可以概括为积极的一年”。该大学此后再未获得积极评价。³⁰³

尽管清洗运动从未停歇，但大清洗的几个特征尚未显现。³⁰⁴ 首先，阶级话语及其相关的劳动可作为再教育手段的信念尚未被摒弃。同样重要的是，诠释性党的法庭与国家司法机关的融合——这一将在大清洗中居于核心的致命组合——尚未得到政治局的认可。

共产主义大学党委在 1936 年春天采取温和立场，承认“现在到了结束赤裸裸的行政压制的时候了”。根据该委员会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在 1935 年 1 月至 1936 年 3 月期间，22 名学生被清洗（其中一半判决后来被撤销），95 项申斥被记录在学生的党证上。后者“意味着 10% 的学生以某种方式受到了申斥”——校领导对此类过激行为表示遗憾，并承诺不会再发生。³⁰⁵

在很大程度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仍受到约束。³⁰⁶ 1935 年 7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题为《如何实施逮捕》的通报规定，个人“只有在国家检察官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被拘留。³⁰⁷ 中央委员会还强调，“逮捕党员必须与区委第一书记协调。”³⁰⁸

确实，纪律行动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仍在党的机关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仍受1933年9月发布的《关于清党后被开除党籍人员清查工作》的指令约束。³⁰⁹共产党员除非已被正式清洗，否则不得被捕——党不允许秘密警察未经许可便使其成员蒙羞。此外，党的诠释性对抗程序仍然有效：所有面临清洗威胁的人都在基层进行讨论，被告始终保留为自己辩护的权利。³¹⁰

并非所有曾在过去某一时刻违反党的路线的人都被宣布为迷失的灵魂。该污名只自动附加于那些据称有意识欺骗苏联政权并继续隐瞒其政治罪行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犯错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完全交代，他仍可期望获得同情的听证。迟至1936年3月，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对那些违反党规的人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即使他们在与异己分子进行不懈斗争……我们的组织必须对每位同志表现出敏感和关怀。”³¹¹ 因此，这套诠释体系仍固守于无心之失与故意犯罪之间的区别：“当一位同志表明其不当行为并非出于对党规的故意违反，而是源于对布尔什维克组织与纪律基本原则理解不足，且党组织尚未对其提供充分政治教育时，应当予以宽免。”³¹²

这番话完全适用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这位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³¹³ 1936年7月《真理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详述了这位杰出数学家的政治懦弱、反动立场与失职行为。³¹⁴ 卢津的反对者将他描述为破坏分子，并称其为“法西斯学术界的右手”。其罪状包括：在海外发表最佳研究成果，用他自己所谓的“垃圾”充斥苏联期刊，以及肆无忌惮地剽窃学生作品。数学研究所书记、“列宁格勒数学战线”老将谢加尔指控道：“卢津视苏联为世界文化的腋窝。”³¹⁵ 另一位警觉学者费尔斯曼宣称：“政府对卢津抱有截然不同的期待——苏联学者理应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³¹⁶ 但“卢津主义”却奉行“要像蛇一样聪明”的信条。³¹⁷

而在所有罪状中，科学院同僚争论最激烈的是他对工业党审判（1930年11-12月）的冷淡回应——仅凭这一点能否证明他是苏维埃政权的隐蔽敌人？

³¹⁸ 当审判违规消息引发欧洲科学家

抗议时，莫斯科最著名的学者们起草了反驳信——卢津却选择不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³¹⁹ 当晚，一名叫拉比诺维奇的研究生前往卢津家中试图说服导师，但卢津以病重无法开门为由拒绝。³²⁰

1936 年，卢津再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他解释自己的错误源于思想短视而非蓄意作恶：“我无力有意识地伤害我的祖国——这个我倾注心血并将继续为之效力的国家，尽管我很快就会得到应有惩罚。”他否认懦弱是行为动因：“我拒签抗议信并非作伪，不能以所谓自保心态来解释。”在离开苏联研究两年后，“我只是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³²¹

这套辩护说辞成效如何？共青团领导人之一索博列夫表示：“很难判断这是蓄意破坏还是漠不关心的失职。”曾为卢津学生、现为死敌的施尼雷尔曼宣布：“这显然是犯罪行为。”³²² 科学院副院长格列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扮演起魔鬼代言人：“你的表述相当准确。正如你所言，你的行为是错误：是政治错误。”

形势急转直下。近乎绝望的卢津转换策略：“那我的病呢？我休养了两年。”这再次援引了“日食”辩护策略。³²³ 该策略此时发挥双重作用：既可声称过失是短暂现象，又可将崩溃归因于生理而非精神层面：

我的病痛绝非虚构。我患上败血症并成为独腿残疾人，必须拄拐行走。我的神经衰弱不堪。

莫忘我曾血液感染，身体系统严重虚弱。你记得我转入克里姆林宫医院时的状况。整整一年半我形同行尸走肉。那场病彻底摧毁了我。

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³²⁴

卢津暗示：即便完美心智也可能暂时受身体拖累。

这种近乎共产主义式的精神失常辩护——“日食”辩护——为“有限责任”概念提供了正当性。当彼得·卡皮察于 1936 年 7 月 6 日致信莫洛托夫为卢津说情时，坚称后者当时处于“精神崩溃”边缘。³²⁵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不敢苟同：“我必须强调，你离开大学不能仅用心理因素解释。”他厉声对被告说，“当时全校群情激愤，你却置身事外。”换言之，一个头脑清醒的理智之人背弃了自己的祖国。

索博列夫主张将裁决权交给医生。“若精神科医师认定卢津需对其行为完全负责……这便是蓄意破坏案；反之若专家确认其行为源于精神障碍……卢津则无需担责。”但对卢津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伯恩斯坦而言，风险过高，他建议采取更温和的辩护策略。他解释道，导师并非精神失常，仅是性格软弱：“或许无需精神科医师介入。尽管客观而言卢津的行为有害，但需考虑其性格特质：卢津是位特立独行、……易受他人影响的个体。这种性格虽不值得称颂，却与蓄意破坏无关。”³²⁶

卢津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的巨大悲剧在于职业生涯恰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如此深刻的变革要求我像所有人一样，竭尽全力调整适应。我并非总能成功。”他承认自己“未能协助党组织提拔合适人选”，这源于未改造的旧思维。“我的事业始于革命前，因此我秉持学者应完全超脱于生活的观念。所以我对那些把握革命机遇、和谐发展精神力量的年轻同志深感钦佩。他们出色地适应了我国发生的巨大变革。”³²⁷

在这些策略间迂回的卢津声称自己政治幼稚：“有些事我感到困难：虽为公民义务，我却不懂如何参与政治。”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驳斥了革命未在卢津身上留下印记的说法。他声称“苏联历史的每一年都相当于十年飞跃”，民众意识突飞猛进——唯独卢津除外：“作为大学首席数学家的大学者，你竟要我们相信……你找不到政治方向！”³²⁸

“没有任何个人是绝对邪恶的，”卢津回答道，这是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妖魔化话语时一次慌乱的尝试。“就连太阳上也有黑点，而我远非太阳，不是吗？”诚然，他重申道，“我犯过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足以构成破坏计划。我那无忧无虑、粗心大意、漫不经心的态度造成了客观损害，但我从未与我的同事作对，……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请求同志们体谅我的情感煎熬，帮助我驶向正确的方向。”³²⁹他呼吁党扮演牧羊人的角色，将误入歧途的教授赶回他离散的羊群。

斯大林在此接受了作为精神牧者的责任。在他秘密干预后，对卢津采取了温和路线。³³⁰当科学院再次讨论此事时，索博列夫强调卢津可以被挽救。他宣称，尽管这位数学家一直固守

危险、反苏的立场直至 1930 年，“但此后他已改变观点”。³³¹ 7 月 13 日发言时，日兹诺夫斯基收回了卢津是伪装敌人的说法：“我们不会清洗卢津，只会指出其行为不符合苏联学者的标准。”³³²

科学院花费大量时间解释异议思想为何在卢津灵魂中扎根。一套复杂的理论工具，涉及一系列将越轨行为心理化和病理化的知识体系，被用于理解他的异端。卢津的背叛行为是源于意识的缺乏，还是出于明确的反革命图谋？党应该试图治愈他还是将他清洗？将卢津视为经历漫长心理危机的个体，诠释法庭鼓励对这位老教授采取细致入微的个性化处理方式。

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惑与被纳入政治体是相容的，“反革命”一词尚未应用于每一个错误或异议表达。反革命本质化尚未确立，也就是说，仍允许一个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持有错误意见，但整体上对苏联社会仍有用处。就对卢津的诊断而言，关键在于党避免将他定性为无可救药的邪恶。直到叶若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掌权，以及围绕第一次莫斯科审判（1936 年 8 月 19-24 日）的揭露，才将每一个错误行为从疾病的症状转变为恶魔般的罪行。

弥赛亚式的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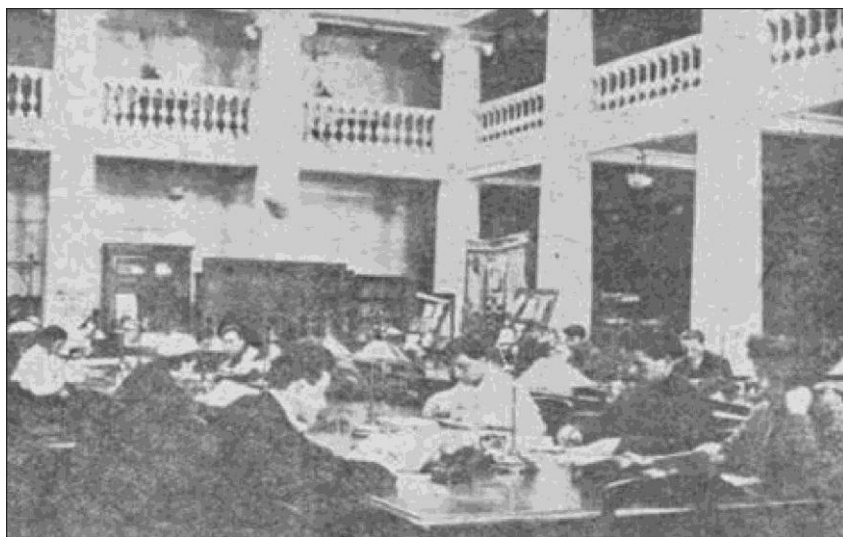
一幅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展板，庆祝共产主义大学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贡献。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5 年 9 月 23 日。



大学生在工作。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4 年 9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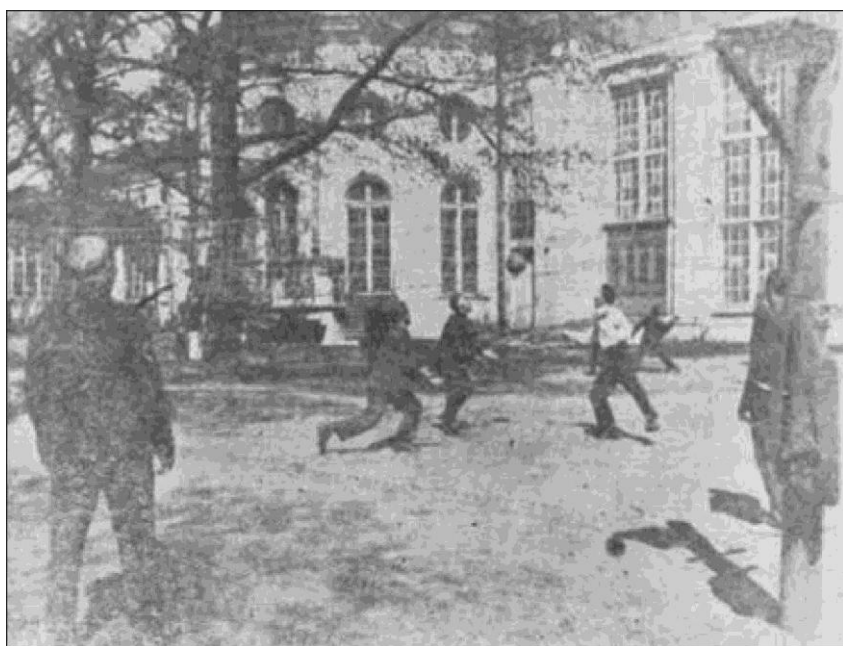
大学生阅读斯大林在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 年 12 月 19 日。



农业系学生在塔夫利宫——1917 年二月革命的总部，后被共产主义大学接管——的迷人环境中工作。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 年 9 月 23 日。



共产主义大学报纸的编辑委员会。党委特别努力从不同民族和各行各业招募编辑。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9月29日。



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度过闲暇时光。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5年6月27日。

大学领导层

普雷德同志，大学校长。《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12月31日。



普雷姆同志，党委书记。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12月31日。





德米特里耶夫同志，
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4 年 9 月 9 日。



伊扎克同志，共产主义
大学在斯莫尔尼区委员
会的代表。《斯大林主
义者》报1934年11月
19日。



叶莲梅科同志，农业系主任。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
12月31日。



瓦维林同志，党史系主任。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4年
6月29日。

历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违禁品

作为联合反对派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放弃信念的人，托洛茨基于 1929 年被驱逐出苏联。当时，他被描绘成一个狡猾的资产阶级同路人，而非暴力反革命分子。



“托洛茨基式的‘客观性’：[托洛茨基]：‘走开！别干扰我书写党史。’” 《鳄鱼》杂志 第2期（1932年）：第5页。托洛茨基被描绘为摒弃逻辑书和史实书。



“遵循托洛茨基主义小抄：‘对数百万人来说，

列宁是旗帜，对他而言——只是盾牌。’” 托皮科夫绘。

《鳄鱼》杂志 2
(1932).

这幅漫画配有标题
“在银行家的家中”
和对话“托洛茨基先生，我早已熟悉您的纲领，现在我确信自己成为托洛茨基派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鳄鱼》杂志 2 (1932).



自我诠释学

共产主义者被敦促寻求新的、科学的方法来触及内在本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意识运作的理论洞察与革命传统中典型的自我拷问结合起来。在苏联的每一个机构中，共产主义的自我诠释学通过一系列审讯实践得以具象化，如同志审判、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以及无休止的揭露运动——反复的审问试图触及嫌疑人最深层的希望和倾向。只有在所有表面现象表面上被超越，并且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辩证关系得到解决之后，这个新的、自我透明的个体才准备好接受审判。



“论警惕性” 甘夫绘。《鳄鱼》杂志 第14期（1937年）：封面。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灵魂变得透明，表象与深层之间的区别——共产主义诠释学的核心问题——大大缩小。斯大林主义诠释学的进步意味着其实践者可以在本质与表象之间自由穿梭；一个人的“党的面貌”（*partiinoe litso*）和“最深层的本质”（*glubokaia sushchnost'*）是可互换的。



Джурушник-троцкис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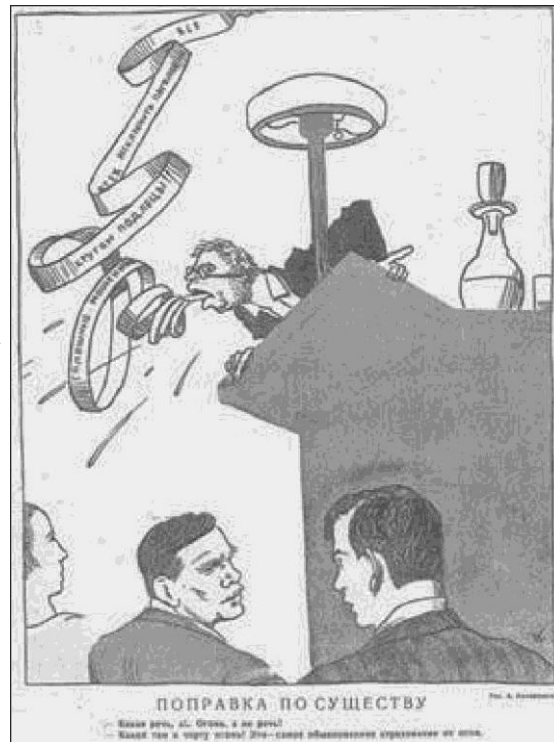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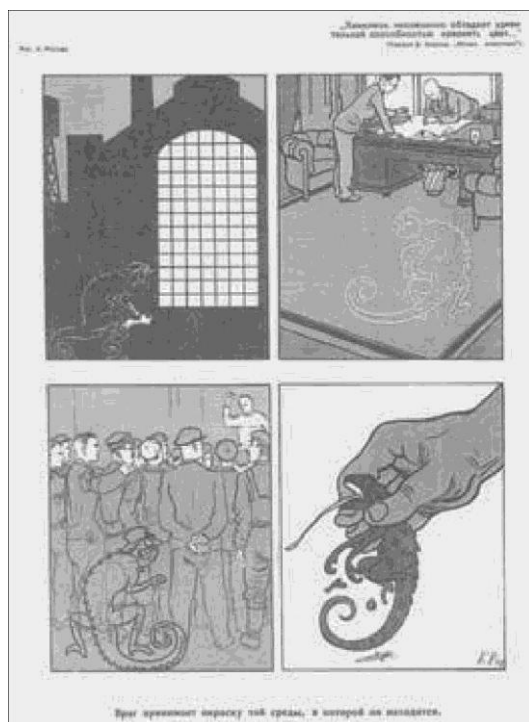
..И как его иногд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шпионы»

这幅漫画最初题为“双面托洛茨基分子，有时被我们的糊涂蛋[shliapy, 即俄语中的帽子]所见”。演讲者的右手被托洛茨基和其他法西斯分子抓住；旁观者的眼镜上写着“优秀工作者”和“模范布尔什维克”。shliapy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6年10月8日。

“一项重要修正：——‘这演讲，哈！是火，不是空话。’——‘什么火？这是最基本的防火保险。’” 卡涅夫斯基绘。《鳄鱼》杂志3（1938）：12.

演讲者正在说：“必须把所有人都清洗掉！”“到处都是无赖！”“到处都是罪犯！”当“自我保险”（podstrakhovka）在大清洗中被揭露时，其惩罚被认为不亚于警惕性疏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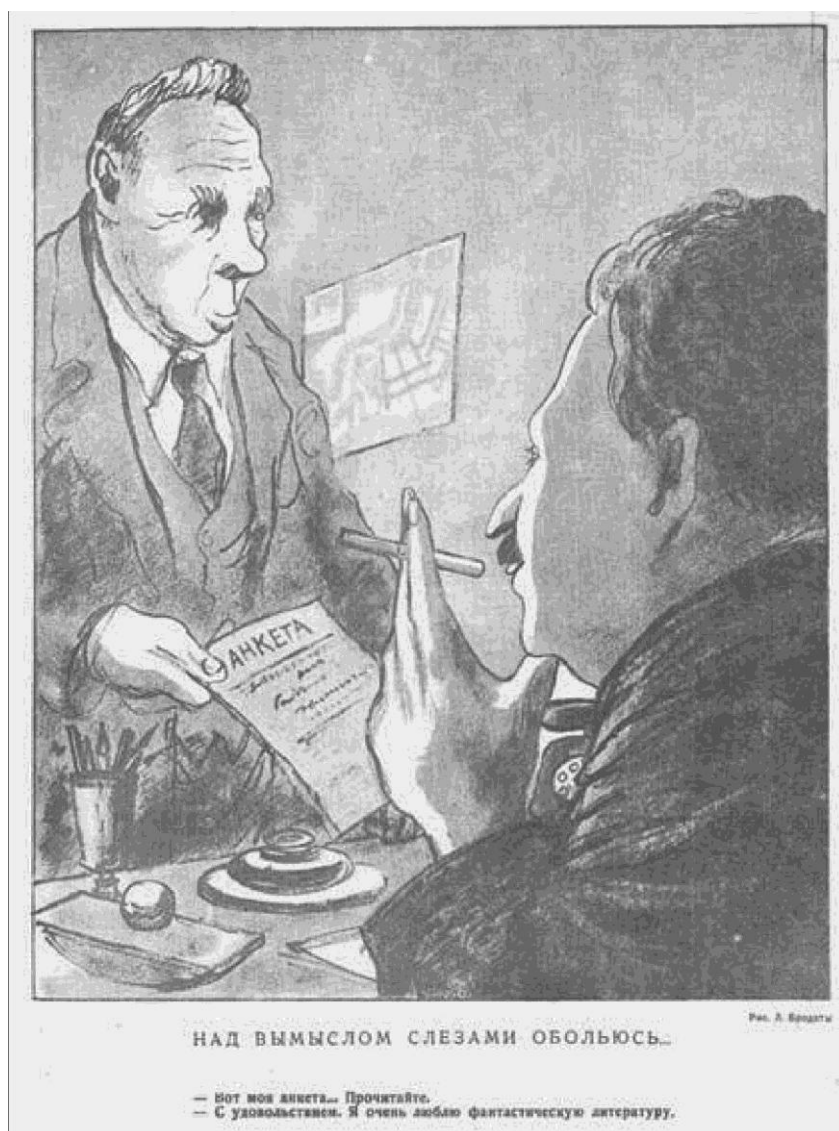




“敌人正在适应其环境：‘蜥蜴有非凡的改变颜色的能力。’ 出自科尼什，《动物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Animals.*” 《鳄鱼》杂志 第14期（1937年）：第13页。党以表明其对敌人因无法与忠诚者区分而无法被察觉这一观念感到焦虑的暴力手段，打击自己队伍中的“叛徒”和“间谍”。“当然，仅凭外表不可能识别一个间谍，”维辛斯基在1937年6月说。“事实上，要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如何识别巧妙伪装的敌人的配方是完全困难的。”

“诽谤：——‘他们说我们偏袒被清洗者……我们经常看不到他们。’” L. 布罗达蒂绘。《鳄鱼》杂志 第6期（1938年）：第16页。大清洗期间，地区党委书记们安排特别会议来审理被清洗党员的上诉。但每次这样的会议日期临近，上诉人被传唤到地区委员会时，会议就被推迟。





“而虚构作品让我流泪：——‘这问卷。读读吧。’——‘非常乐意。我真的很喜欢奇幻文学。’” L. 布罗达蒂绘。《鳄鱼》杂志 第6期（1938年）：第16页。漫画标题取自普希克1830年的哀歌，*nad vymyslom slezami obol' ius'*。灵魂的深处对官方之眼是隐藏的，别无选择，只能倾听个体本人对其信念和倾向的陈述。但党奉行怀疑的诠释学：并非一个人关于自己的所有陈述都直接见证真相。有时人们会撒谎，一个训练有素的诠释者必须识别出那些场合。

末世论时间

斯大林主义的末世论将历史描述为从阶级社会黑暗走向共产主义光明的道德进程，从而赋予时间一种历史目的论，为事件赋予意义。党自视为人类解放的工具，被赋予一套精细的符号诠释学来解释从现在到历史终点之间的距离。斯大林主义的时间计算让人想起基督教中弥赛亚已经降临与救赎尚未到来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末世希望的核心在于，随着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成就，救赎时间已向前跃进并进入了其最后阶段。

“火车从社会主义站开往共产主义站。” P. 索科洛夫-斯卡利亚绘，1939 年。



新人

共产主义大学周刊《斯大林主义者》报头版设计，*Stalinets* 捕捉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人”的概念的戏剧性变化。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4 年 4 月 15 日。1934 年，“新人”仍在建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拼贴画，要求观者从并置的多样图像中组合出一幅统一的画面。在这里，主体被期望是反思性和创造性的。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7 年 4 月 13 日。到 1937 年，“新人”已经实现。头版聚焦于最终产品而非过程，展示着完美的造物——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人。观者不再是画外人，不再是需要通过意志行为来完成画面的外部主体，而是被邀请进入画中。仿佛他必须与所描绘的英雄融为一体。



洞察一切的斯大林

在大清洗期间，官方报刊上诺斯替主义的母题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苏联关于人在资本主义下异化、通过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解放的叙述，重复了诺斯替神话的结构。在诺斯替主义中，“普纽玛”是将人转变为灵性存在的生命原则。一个由得救者组成的社群形成了，一个看见了光明的种族——属灵者（pneumatics）。在共产主义对这些主题的转译中，阶级救主必须拥有那种与人民精神认同并“鼓舞”

（*vdokhnovliat'*）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精神气息。如下列画作所示，斯大林被认为完美地契合了这一角色——注意他所散发的光芒。



“斯大林同志建议在第比利斯组建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组。” 伊琳娜·施滕贝格绘。
《苏联大学生》杂志 6（1937）：17.



“令人鼓舞的阿布哈兹人阅读他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的列宁来信。” I. 马里安绘。
《苏联大学生》杂志 6 (1937): 17.

• 2 内务人民委员部与逼供

教授中的逮捕

作为布尔什维克精英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对所谓的反苏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调查，导致共产主义大学许多教员被捕、审讯和定罪；大多数人最终被处决。此案的后果导致了列宁格勒整个党的教育机构的毁灭，并困扰着这所大学直至其解散。

大清洗期间，一套相当完备的政治理论、立法和实践体系——从反对派的定义和识别，到对付不悔改者和复发者的最终步骤——使得“反对派”一词及对其采取的措施，与前几年大不相同。¹ 过去的假设被抛弃了——总有比肉眼所见更多的灵魂内容的假设，党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受审的反对派、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审讯的假设。困扰着本十年初检察官们的疑虑现在让位于绝对的确定性。在大清洗中的人类主体是一维的，因此是透明的；因阶级背景和后来生活经历残留而产生的多层性消失了。同志们早先注意到的被告自我意识的差异也消失了——而这正是使党的清洗过程如此漫长和具有挑战性的原因。审讯者将人类自我的所有方面置于同一水平。

这种自我诠释学获得了一种狂热、不容妥协的形式。

由于被捕者被视为冷静算计的恶棍，没有考虑和同情的余地。考虑到党组织中同伴而撰写的认罪书本应在优点和缺点之间交替，但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撰写的认罪书中，优点消失了，恶行被归入其恐怖活动的历史。这种新型的“认罪”缺乏该词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没有一个自主的主体——一个对其内在秘密有特权访问权的主体——熟悉的自我诠释学几乎不可能进行。虽然前一章讨论的认罪书确实凸显了作者生活中的尖锐断裂，但叙述自我的基本连续性总是被假定的。后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者坐在他面前时，被告被迫放弃其自我。他必须被击垮、被剥夺，并被迫宣称：“是的，我是叛徒，我是邪恶的，我无可救药。”罪孽是深重的、不可饶恕的、无法上诉的。

大多数审讯过程的特点是逐步缩小审讯者版本与被告版本之间的差距。概略而言，这一过程包含四个阶段：(1)被告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季诺维也夫主义者；(2)被告承认自己是反苏维埃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活跃成员；(3)被告承认该中心确实是恐怖主义性质的；(4)被告承认自己曾亲自参与暗杀基洛夫。

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手段粗糙，但若区分作为对话主体的囚犯与在对话中作为主体的囚犯，这些审讯可以被描述为对话。²前者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调查组所编写的文学创作中的主角。后者是一个真实的个体，是参与撰写自己审讯笔录的作者，是在叙事流中引入裂隙的行为主体。当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常捏造被告的自我，将他从未有过的邪恶信念和从未考虑过、更不用说犯下的叛国罪行强加于他。正如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在1939年所说：“证词是由审讯者而非被审讯者提供的。”³但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记录被构造成供词——旨在不仅确定罪行，还要指明被告道德观的主观证词——而言，它们将一种声音强加给了被告，从这个意义上说，迫使他成为对话的主体。

在其他不太常见的案例中，被告保留了影响调查进程的能力，尽管方式非常有限。有时，被告会否认指控，声称记忆缺失，甚至要求修改笔录的某些部分。当被告扮演其审讯笔录的“共同作者”时，他就成为一个原因、一个行为主体，因而不仅仅是对话的主体，也是在对话中的主体。⁴如果说在党的听证会上，被告无论多么受限制，显然是在对话中的主体，那么在监狱中，他几乎被完全剥夺了能动性。⁵这种对自我戏剧性的简化必须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观念并列看待。如果说 1930 年代中期的事件预示着弥赛亚时代的来临，那么设计与其现实之间的鸿沟就被弥合了。苏联的男男女女现在被视为成熟的、完全实现了的个体，要么是无产阶级共和国值得尊敬的公民，要么是其阴暗狡诈底层世界的居民。

政府机构花了一些时间才适应关于敌人的新观念。内务人民委员部大约在 1935 年底准备了第一份关于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全面备忘录。政治部门负责人格奥尔基·莫尔恰诺夫在监督所有收到的监视材料后，于 1936 年 2 月 5 日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根里克·雅戈达报告：“我们已经追踪到托洛茨基分子惯于将其各个小组连接起来形成单一地下组织的链条。”四天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份秘密公报，声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组织[一直]试图在苏联境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反革命政党。”⁶随后对前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逮捕由斯大林的个人秘书处策划。⁷

3 月 25 日，雅戈达致信总书记：“根据在逮捕和搜查托洛茨基支持者住所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我们知道反革命活动正在加剧。”他接着提出若干旨在“系统性地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的措施。斯大林将雅戈达的备忘录发给维辛斯基，后者于 3 月 31 日提议，将最近被清除出党的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逮捕并隔离到“偏远的营地”。在得到政治局和司法部门的许可后，雅戈达电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分支机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揭露并根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中心和联络网。”⁸

立即受到攻击的是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各省的高等院校。⁹自 1935 年 7 月起，对学术界挥之不去的怀疑就已存在，当时一小群共青团员学生被指控企图暗杀斯大林并被带到莫斯科受审。在基洛夫遇害不到一年后，很少有人怀疑其结果。可以理解，当检方（显然是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授意下）要求“暂停案件以进行进一步调查”时，法官们感到震惊。根据“新证据”重新审理此案后，叶若夫设法在被告学生与政治学和党史教授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组装了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的第一批被告。¹⁰

第一个被逮捕的是瓦伦丁·奥尔伯格，一位在高尔基师范学院任教的德国移民。在他于1936年1月6日被捕后不久，奥尔伯格供认曾将托洛茨基关于开始准备恐怖行动的指示走私到苏联境内。这导致约一百名“托洛茨基分子”学者被立即逮捕。¹¹ 斯大林查阅了他们的供词，并隐约感觉到对基洛夫遇刺案的先前调查“有些不对劲”。因此，他指示叶若夫绕过常规的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机构，继续处理此案。¹² 到六月，政治局收到一份82名特别危险的“托洛茨基恐怖分子”名单，准备将他们提审。但斯大林不愿单独审判托洛茨基分子，遂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联合审判。¹³

对列宁格勒教授的围捕始于3月6日拘捕共产党大学讲师莫伊谢伊·叶菲莫维奇·奥尔洛夫。随后几周，列宁格勒科学院成员莫伊谢伊·瑙莫维奇·雅科夫列夫（3月23日被捕）和谢苗·尼古拉耶维奇·谢德赫（4月14日被捕）被指控充当莫斯科托洛茨基中心与其北方支部的联络人。4月29日夜间实施进一步逮捕，四名主要“阴谋分子”落网。本文将聚焦共产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德米特里耶夫案。其逮捕令背面留有签名——因逮捕多在夜间执行，令状正反两面通常显示同一日期。

德米特里耶夫面临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列昂尼德·赖赫曼及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处处长卡尔波维奇签署的指控。逮捕令称：“德米特里耶夫必须隔离，因其系统性地在所处环境中煽动对党的政策的不满”，且“曾与因基洛夫案被取缔的地下组织有联系”。5月2日，德米特里耶夫根据刑法第58-10条（“旨在破坏、削弱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煽动”）和第58-11条（“参与反革命组织”）被正式起诉。¹⁴ 国家检察官伊万·阿库洛夫的指令要求，凡处理“讨论实施恐怖行为必要性的集团成员……即便无直接参与恐怖行为的证据”，均可援引这两条法律条款。¹⁵

德米特里耶夫被捕后填写的调查问卷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党同样长期关注个人历史。关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内战经历等标准问题无一遗漏。德米特里耶夫“自1917年至今始终是共产党员……从未加入任何其他政党”。时年三十四岁，家庭成员包括兄长、在赫尔岑师范学院就读的妻子和十岁女儿。

我们首次遇见德米特里耶夫是在斯大林 1931 年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走私”的信件语境中。当时其教学思想纯洁性受质疑时，导师普雷德成功护佑了他：些许自我批评即化解危机。德米特里耶夫后以治安维护者身份再现：基洛夫遇刺后，他率先向昔日反对派发难。1935 年 6 月校方审阅其自传时予以普遍认可，主人公被誉为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真正儿子：“少年时即当车床工人，多年后被选为第十次党代会城市代表。十五岁参加普尔科沃战役抗击克伦斯基部队，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负伤并获颁红旗勋章。”

1923 年从莫斯科共产党学院毕业后，德米特里耶夫在苏联贸易机构担任要职，并曾出使英国（“1925 年英国将我驱逐”）和中国（“作为工会代表工作至 1929 年”）。普雷德知道德米特里耶夫在中国的经历可能引发麻烦：“在哈尔滨，德米特里耶夫参加酒宴并带妓女回家。”最终北满党委被迫解除其职务，甚至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愿“禁止其再从事海外工作”。¹⁷ 但少有工人不可救药。回到故乡红色普梯洛夫工厂后，德米特里耶夫迅速重获无产阶级意识，以至 1935 年被派往共产党大学深造，成为宣传工作者。¹⁸

这样一个人会是反革命？他的逮捕震惊了全校几乎每位师生。但当人们想起从其正式自传中精心删除的人生细节时，震惊渐消。党委遗憾指出，尽管经过党员干部细致审查，“仅有少数学生注意到其兄长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驱逐出列宁格勒”。¹⁹ 他们怎能无视在德米特里耶夫档案中闲置两年的检举？曾与德米特里耶夫共事的雷萨科夫无意中听到他“发表各种颠覆性谬论。例如，他常说‘同志们逐字逐句复述斯大林的话’、‘多数党员不经思考投票’，以及……‘党对民众进行实验’”。²⁰

鉴于这些揭露，同事和学生们关于其教学的认知都需重新审视。“德米特里耶夫在政治经济学课上总是回避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名学生突然忆起，“他将该议题拖到最后，然后含糊其辞敷衍了事。”²¹ 党委抱怨德米特里耶夫作为初级讲师发表成果不足，“更遑论正教授”。他们刻薄地列举其成果：“通俗期刊上关于北极的文章和

一本可疑的英文小册子（封面甚至未署其名）——这就是他所有所谓的学术成就。”²²

党组织副书记乌赫图塔急忙重写德米特里耶夫自传。他翻出陈年指控，暗示“德米特里耶夫的文学理论工作包含若干趋向机械思维倾向的曲解”。这暗示了与失势经济学家、被指控右倾情绪的布哈林可能的关联。除未能掌握辩证法外，德米特里耶夫还“试图诋毁集体化成就，1932年在课堂上声称党强迫民众加入集体农庄”。新评鉴坚称“他爱重复敌人的公式，称我们‘正在经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的方法论危机’，借此为其忽视辩证唯物主义辩护。”²³

7月20日，未经提交基层讨论，区委便开除了德米特里耶夫的党籍。鉴于他“目前因反革命活动被捕”，自然不能允许其继续留在党内。未作任何额外解释表明党组织负责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调查没有影响力，且显然对其具体情况知之甚少。斯莫尔尼区委能做的仅是盖章批准裁决。1936年9月，党的监察委员会最终完成了将德米特里耶夫除名的正式程序。²⁴

不确定德米特里耶夫在被捕时是否被告知所有指控。在许多情况下，内务部仅在调查过程中逐步披露指控。通过将嫌疑人称为证人，调查人员剥夺了法律赋予被告的保护。²⁵在此情形下也不可能进行有力的辩护：被告至少享有某些法律保护，而证人则被要求作证，否则可能因“隐瞒证据”受罚。违法者也可能通过“案件分解”成为证人——这种做法最终被赖赫曼和列宁格勒内务部采用，以十人以下小组审讯教员，从而利用一组被告作为指控另一组的证人。²⁶尽管如此，显然德米特里耶夫没有获得法律辩护的权利；作为政治犯，他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完全被隔离。²⁷

当怀疑存在反革命活动时，可以基于最广泛的理由启动案件；在此类情况下，“搜查”（*розыск*）与“审讯”（*дознание*）通常与正式的“侦查”（*следствие*）合并进行。1918-19年这些残酷规范确立时，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宣称革命无法承受“将本属统一程序的环节碎片化，并在链条断裂处安插无数律师——这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典型原则”。²⁸这些原则在内战结束后曾被暂时废止，如今却成为受欢迎的先例：毕竟敌人被视为正在抬头，国内冲突迅速加剧。

在完全掌控局势的情况下，内务部采用极其简单的程序确保定罪。用专业术语说，证据可以被“拉伸”（*натянуть*）以匹配指控。²⁹ “简报会”（*летучки*）普遍存在：当局竭尽全力协调各种“阴谋”和“认罪方案”的情节，使档案尽可能避免明显矛盾。³⁰ 尽管如此，甚至内务部也常意识到起诉书质量低下。“我们的材料从未达到能在法庭上绝对令人信服的程度”，列宁格勒调查员科热夫尼科夫承认，“这些不过是纲要性概略、草稿——实际上没有文书证据。案件从我们办公室转到检察院，又从检察院回到我们办公室，但没人能将其理顺。”³¹

现存内务部审讯记录是关于个人或嫌疑人群体的厚重卷宗。每份卷宗包含一份或多份逮捕令、个人问卷、审讯记录（有时手写有时打字）、起诉书、极简的审判描述及判决书。多数卷宗还包括 1950 年代的复查意见，每份都单调重复着旧判决缺乏证据、“指控必须被视为无效”的内容。曾几何时，这些卷宗包含更多个人材料逮捕后长夜搜查中从住所搜走的信件、照片和日记——但这些珍贵私人物品如今几乎无从寻觅。部分可能仍藏于内务部档案馆，但多数在 1940-1950 年代被焚烧，表面上是为释放档案空间。³²

德米特里耶夫的审讯记录大多呈现一种极度两极分化的权力关系环境：他的供述往往只是审讯者所提问题的重复。审讯者始终掌控着叙述权，陷入困境的经济学教员面临否认或认罪的二元选择，常通过否认来认罪。³³ 尽管偶然的记录中会出现令人惊讶的自主表述段落，但此类段落反而强化了审讯室中的权力关系。

由于审讯者的语言首先创造了对话的条件，当前任务与其说是批判性解读文本，不如说是对权力语言的必要剖析。理解被告与原告之声如何互动至关重要。审讯记录不仅应分析其内容，更应分析其功能——其文本性、建构原被告主体性的方式。不应将审讯记录视为被动且常被扭曲的过往事件记录，而应视其为话语场所、斯大林权威表演的产物。³⁴

德米特里耶夫首份审讯记录的日期显示，审讯者毫不拖延地投入工作。被捕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面对的是内务部中尉洛托舍夫的提问，此人专长“反对派阴谋案”。

与他此前经历的所有准司法性质的党组织会议不同，在内务部对其案件的“初步调查”中，无人能为德米特里耶夫说情。³⁵ 类似磨难的幸存者回忆，审讯者常数小时重复完全相同的问题，毫无变化。在哈尔科夫受审的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回忆道：“他每两小时对我大喊一次，持续数小时重复着精心准备的要求：‘交代你建立的反革命托洛茨基法西斯恐怖破坏间谍组织。’”被告变换回答“希望能让他哪怕略微改变问题形式，因为那种单调令人发狂”，但未能成功。

³⁶

德米特里耶夫同样遭受密集审讯，面对一连串重复质问：“你对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活动了解什么？”“你是否确认参与了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你何时何地与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联系？”诸如此类。³⁷ 在这些提问中，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阐释学某种程度上的非人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官并不像党派阐释者对待具体个人那样对待被告——会考虑其具体传记和个人特有品质。他只是国家接触敌人类型时的化身。³⁸

早些时候，审讯官就德米特里耶夫在列宁格勒及其他地方的“泛泛之交”（*znakomye*）提出了一系列模糊问题。德米特里耶夫列举了十五个人。³⁹ 被提及者包括他的兄弟尼古拉，以及数名前一年春天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被捕的共产主义大学讲师。他的策略似乎只提及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明确标记为前反对派的人士。这一伎俩并未逃过审讯官的注意。“你并未说出所有与你联系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洛托舍夫质问道，“给出完整回答。”德米特里耶夫扩大了他的熟人名单：“我还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季马纽克、潘秋欣（他曾是我们的研究生之一），以及普里戈任（他曾在共产主义大学拥有一个教席）。”⁴⁰

就在这第一次审讯中，洛托舍夫已确定德米特里耶夫活动于两个不得体的圈子：一群于 1935 年被流放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仍在列宁格勒逍遥法外的“同谋”。德米特里耶夫的名字必须与破坏者和怠工者的长链条联系起来：

审讯官：我们已确定，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的系统性交往，除了工作之外，还具有个人的、政治的性质，基于您政治上、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的一致性。我们坚持要求您说实话。

德米特里耶夫：我重申，我与上述人员的关系严格限于工作。

.....我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联系。

审讯官并非完全空手而归：尽管德米特里耶夫否认与反对派地下组织有任何个人牵连，但他承认了其存在，从而对官方的事件叙述作出了重要让步。

极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洛托舍夫是诠释而非逐字记录德米特里耶夫的证词；许多资料来源描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标准做法。⁴¹ 1936 年 12 月被捕的列宁格勒文人马泽尔抱怨道：“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审讯官坚决而断然地拒绝将我的任何解释记录在案。他提问的方式预设了其片面且偏颇的事实版本。”⁴² 而 1937 年，对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者约瑟夫·伯格的审讯官告诉他：“笔录不是你所见的客观事实，而是我们共同活动的产物。”⁴³ 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时承认，陈述被“重新表述”过，且被告的证词通常以简要摘要的形式记录下来。⁴⁴ 多数审讯没有笔录。相反，调查员做非正式笔记，只有经过数次审讯后才最终整理一份笔录，其中包含他认为囚犯必须承认的所有内容。⁴⁵

一看德米特里耶夫的审讯笔录，确实显示它几乎不可能是逐字记录。文本过于直白、过于润饰；语言枯燥且重复，句子总是完整的。这与用速记书写、包含许多省略、语法错误及其他实际口头交流转录迹象的党派笔录相去甚远。洛托舍夫没有留下任何让读者想象的空间：笔录的语言，如同任何良好法律文件的语言，是精心选择的，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歧义。

内务人民委员部最近简化了笔录准备指南：审讯结束时，调查员应用打字机转录其笔记；通常情况下，被告不在场。有时，审讯官强迫囚犯在一张声明其证词稍后将抄录在此页的空白纸上签字。⁴⁶ 叶若夫告诉中央委员会：“笔录先由调查员审查，然后由其上级审查；重要笔录可以到达政府首脑那里，他们可能会修改一些措辞。”⁴⁷

审讯官通常会根据首席调查员提供的“模板”（*maket*）“编造”（*sochinial*）目击者证词。⁴⁸ 研究过这些叙述风格的学者得出结论，它们受到报纸语言，特别是《真理报》上关于敌人阴谋的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影响。德米特里耶夫的证词也不例外。其最频繁使用的形容词是“反革命的”，紧随其后的是“反苏维埃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诸如“破坏”、“怠工”和“诽谤”等动词，以及诸如“动员”、“激活”和“告知”等官方用语也被广泛使用。⁴⁹

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各种形式的身体压迫来确保顺从。有时，100 到 150 名囚犯被塞进一个房间，脸朝墙壁。好几天，他们不被允许坐下休息。附近放着一张有书写工具的桌子。那些同意亲手书写供词的人被允许睡觉。⁵⁰ 或者，德米特里耶夫的审讯官可以依赖臭名昭著的“流水线”（*konveer*）——轮班工作十到十二小时，以便持续不断地向被告提问；在此期间，囚犯一直待在审讯室，不被允许移动。⁵¹ 这一技术的幸存者证明，它“自动且无声地运作。几天后，囚犯的四肢开始肿胀。腹股沟附近的肌肉变得极其疼痛，移动是一种折磨。”⁵² 那些倒下的人会被泼上整桶冰水并打耳光来唤醒。⁵³

然而，施加于德米特里耶夫以迫使其认罪的压力尚未达到顶峰。他的审讯官在 3 月 29 日被最高法院提醒：“初步调查必须完全遵守刑法进行。”⁵⁴ 负责确保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合法性的检察官办公室，在德米特里耶夫首次受审时仍在行使其特权。⁵⁵ 甚至叶若夫在其拟定的“调查员手册”中也不得不确认“必须遵守法律”。⁵⁶ 列宁格勒党组织要求调查过程符合法律标准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度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主管发现自己也在调查其安全部门工作中的违规行为。⁵⁷

诚然，由于 1936 年夏天斯大林对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施加的强大压力，一些限制被放宽了。⁵⁸ 即便如此，酷刑仍不常见。⁵⁹ 囚犯们证实“殴打尚未实施”。⁶⁰ 单靠高压手段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只是满足于通过殴打从被告身上逼出明显虚假的供词，为何要部署如此庞大且耗资巨大的机构？在大清洗高峰期有数百名审讯员在活动——这对国民经济构成沉重负担。另一重负担是将被告关押数月的开销，在此期间他们并未提供任何廉价的监狱劳动——这种劳动有时被视为镇压的经济理由。供词也未常规性地用于宣传活动。这些情况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审讯体现了“对毫无意义的形式的疯狂执着”。审讯员何必费心？毕竟被告完全可以不经这番可怕流程就被枪决或判刑”。⁶¹

然而德米特里耶夫的审讯员表现得仿佛一切都取决于获取供词。从未有人被派去搜集针对被告的补充证据。⁶² 对供词的痴迷——“证据之后”“*证据之后*” (*tsaritsa dokazatel' stv*)——实际上，这与他们的专业精神密切相关。⁶³ 获取自我定罪的能力，向党内忠诚者、外界以及调查人员自身展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价值。⁶⁴

获取口供远非毫无意义的小步舞曲，而是大清洗意义得以锤炼的熔炉。因为反革命是一种心态，而非仅仅是一种特定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心采用复杂的方法来探查德米特里耶夫良心，从而暴露其真实的内心思想。仅凭物证无法从行为推断意图：自我控告是必要的。军事运输教授普加乔夫在狱中抱怨道：“从审讯的第一步起，他们就告诉我……如果我不亲笔签署认罪书，就不许我睡觉。”⁶⁵ 维辛斯基赞成这种做法：“我更倾向于一份被告手写的半份认罪书，而不是审讯人员代写的完整口供。”即使是按照审讯人员提示写下的认罪书，也必须呈现为被告的真实声音。⁶⁶

因此，口供必须经过仔细认证；否则，它们就无法揭露关于被告的“真相”。 “以上内容反映了我的原话，”德米特里耶夫在最终文件的底部写道。贝格尔回忆道：“如果被告说，‘好吧，如果你坚持，我就签字，’或者，‘如果党要求，我就签字，’审讯人员会立刻跳起来反驳：‘什么？党不需要这种东西！危害革命的人必须说出真相，仅此而已！’”⁶⁷ 在审讯的某个时刻，韦斯伯格放弃了：“调查员同志，我已到极限。我身体上无法继续。你指控我的事情是荒谬的，但我准备承认它。”这些话激怒了审讯人员：“你无权承认不真实的事情！那将是挑衅苏维埃政权。”⁶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表，告诉韦斯伯格，他希望他在十五分钟内“用自己的话拟定你的认罪书，无需我的任何帮助。”⁶⁹

1936 年，大多数审讯不过是漫长的努力，旨在说服被告签字。⁷⁰ 保存在他或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任何一位共产党员指导员的各种签名，从笔迹学角度生动讲述了大清洗的故事。一份典型的预先打印好的认罪书上附着一个潇洒、有力、华丽的签名；最终审讯的记录则附带着一个更加不稳、犹豫的签名，现在不仅出现在笔录末尾，还出现在归因于被告的每项陈述之下。

点名

德米特里耶夫有记录的第二次审讯于 1936 年 5 月 5 日进行，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上尉戈尔德施泰因主持，他负责获取关于大学里煽动性活动的细节。同样，反革命关联是重点。此前，德米特里耶夫作证说，自 1917 年以来，他认识一个名叫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卢金的人，此人后来因其政治观点被流放——而且更具破坏性地——他还认识谢尔盖·奥西诺维奇·曼德尔施塔姆，此人是尼古拉耶夫的主要同伙之一；他曾与两人在纳尔瓦区共事。在 1934 年 12 月的审判中，曼德尔施塔姆承认参与了准备刺杀基洛夫的行动。“我坠入了怎样的深渊啊！”他曾转向法官们宣称。“你们的回应必须是枪毙我们所有人——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都会为这样的决定鼓掌！”⁷¹

虽然德米特里耶夫否认参与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恐怖阴谋，但他确实记得曾接触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谈话：“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曼德尔施塔姆直白地声称我们的工厂里存在剥削。关于农民，他说集体化是强制性的，农民正被推向集体农庄。”1932 年，根据新的农业合作社章程，列宁格勒市政建设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列文也在德米特里耶夫和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林面前表达了反革命观点：“他声称该章程复活了拥有财产的农民阶级，等于背弃了党的农业政策……其他人则说没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并谈到了扼杀批评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任命制]贯穿于整个指挥链。”尽管如此，德米特里耶夫坚称自己“不是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我与发言者有争论，”他告诉审讯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捍卫党的观点。”

但德米特里耶夫在此未能考虑到官方的要求，即必须报告任何看起来哪怕有一点点阴谋性的活动。例如，直到基洛夫遇刺后，他才告诉普雷德他与曼德尔施塔姆的接触。与已定罪的恐怖分子交往（当然，斯大林主义司法系统此前作出的判决不容置疑）足以彻底破坏德米特里耶夫的辩护。“我从 1930 年起就是个两面派，因为我向党隐瞒了一个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团体的存在，”他最终承认。“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这不重要。”⁷²

德米特里耶夫的政治履历在他的第三次审讯（十一天后，即 1936 年 5 月 16 日进行）中被详细讨论。现在，审讯者戈尔德施泰因再次确认，被告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反革命分子，并且在最近的党证核查期间，他系统地庇护了他们。

接着，审讯者开始仔细梳理德米特里耶夫早期的职业生涯：

审讯员：我们调查得知，1921 年你持有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关于这点你能作何证明？

德米特里耶夫：1921 年，作为为雅罗斯拉夫尔省委工作的宣传员，我在工会讨论期间捍卫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我作为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代表，被选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这里使用的时代错置的语言令人震惊：在工会讨论期间，“托洛茨基主义”并未作为一种党内政治派别存在，更不用说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运动了。托洛茨基的立场甚至还未被单独认定为异端；当时一些政治纲领在各种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路线不尽一致，但所有这些纲领都是完全合法的。⁷³ 例如，如果德米特里耶夫的审讯发生在 1927 年，他可能会被问及是什么思想导致他在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以及他是否仍认同他当时的立场。但他 1936 年的审讯者对理解不感兴趣，只对索引感兴趣。

最重要的是，戈尔德施泰因对了解德米特里耶夫认识哪些托洛茨基分子表现出浓厚兴趣。德米特里耶夫竭力回忆，挖出了十五年前他结交过的五位“雅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字：时任第三十六步兵师指挥官的佩热夫；时任波季夫指挥官的沙普林；前民航总局局长戈尔茨曼；德米特里耶夫“直到 1936 年还保持联系”的塔甘罗格工厂厂长科列斯尼科夫；以及拉夫连季耶夫，他最后一次见到此人是在 1933 年，“当时拉夫连季耶夫从美国回来”。尽管这些人显然只是些德米特里耶夫几乎记不起的小角色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甚至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或父名），戈尔德施泰因仍不断要求提供更多名字：“证明在基洛夫遇刺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的构成。”“你和谁有组织联系？”“你的同伙和谁有组织联系？”“谁把你和地下组织联系起来的？”“在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中，谁曾去过你的公寓？”⁷⁴ 戈尔德施泰因仔细研究德米特里耶夫的通讯录，时而哄骗、时而责备、时而威胁，决心让德米特里耶夫详细说明其中包含的每一个名字。⁷⁵

提到了许多阴谋家，以及这个或那个刺杀阴谋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本人了。特定的反革命计划被归于特定的学者，他们无数的同伙和联络人也被具体指明。然而，这些人物与该十年早期召唤出的立体人物形象相去甚远：审讯者不再赋予他们具体的性格，不再描绘可能激发其行动并区分彼此的个人心理。被告并未构成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相反，该阴谋集团才是叙述最初的主角，个人仅仅是其实例。

大清洗的审判变得漠视名字的含义；重要的只是名字是否被正确贴上标签。由于这种新的命名方式，审讯者面临的解释学挑战微不足道，完全剥离了诠释内容。德米特里耶夫没有被问及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意味着什么，而是被问及托洛茨基分子是谁。述谓，连同其对一般类型、抽象概念的指涉，被直接识别所取代。一个名字不是描述，而是指代其承载者：我们在德米特里耶夫、潘秋欣和曼德尔施塔姆（均被记录列为托洛茨基分子）身上徒劳地寻找被赋予的共同属性。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中，符号不被诠释，而是被识别：命名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识别行为。⁷⁶

因为名字的改变会改变其持有者的身份，称某人为“托洛茨基分子”就是将其消灭——因此，一个看似细微的语言调整至关重要，即审讯者将德米特里耶夫描述为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非“前”托洛茨基分子。早些时候，当“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个政治或理论指称，因而具有意义时，德米特里耶夫本可以质疑这一描述，并辩称他和他的同事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他们当然不是现在的托洛茨基分子。然而到了1936年，质疑这一标签就如同否认自己的名字一样荒谬。

戈尔德施泰因倾向于将德米特里耶夫的熟人重新命名为“托洛茨基分子”，这突显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趋向神话：神话的名字通过宣告自身即为行为，来呈现其内容。事实上，如果说自然语言中的变化是通过内部语义转变逐渐发展的，那么神话语言的移动则像一连串有意的、严格界定的重命名行为。在审讯者的语言中，新的名字对应新的存在状态——称某人为托洛茨基分子意味着揭露其为反革命分子。由于语义联系是通过名字实现的，一个称呼的改变——在此案例中，德米特里耶夫从“同志”转变为“托洛茨基分子”——必然要求所有其他称呼也发生改变。围绕一个新揭露的敌人的名字群，必须重新审视，以期也将其染上邪恶色彩。⁷⁷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员们似乎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那种弥赛亚式的假设，即名字与指代对象之间的鸿沟已被完全消除：名字不再是约定俗成的能指，而是被赋予了其自身的本体论本质。审讯员们的语言基于一种归纳-演绎思维所拒绝的逻辑循环：邪恶的名字将其持有者定义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归因于名字持有者的邪恶品质反过来又证明了该名字的邪恶。因此，它具有同音异义的特点：虽然该名字没有同义词——可能没有其他名字能通过描述其属性来丰富该名字的意义——但同一个名字可以有多个持有者。虽然没有词语能描述“托洛茨基分子”的属性，但许多个人都可以将此头衔作为他们的名字。

戈尔德施泰因的语言可以用隐喻的字面化来描述。当他提到“托洛茨基分子”时，他的定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定义毫无共同之处，那时“托洛茨基分子”隐喻性地指代那些像托洛茨基一样思考或行动的人。在 1936 年，托洛茨基分子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实际化身，一个分身。或许正是这种隐喻思维能力的丧失，解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何要执意证明本土的反革命分子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身体上，也与国外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有关联。

作为邪恶的标志性代名词，“托洛茨基”之名是禁忌。在这种语义环境下，提及某个已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戈尔德施泰因强迫德米特里耶夫所为——等同于自证其罪。尽管德米特里耶夫竭力诋毁他认识的人中最黑暗的那些，但为时已晚——他无法与他们划清界限。审讯对象并非一个案例、一个可归入一般范畴的特例；他反而是一种类型的化身；我们之前已遇见过布尔什维克类型学，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牢狱中，类型学与常规命名变得难以区分。⁷⁸ “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词从描述性称谓转变为头衔，介于形容词与头衔之间。⁷⁹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推行其弥赛亚式语义时并非未经试错。有段时间，这次特定审讯的进程陷入僵局，德米特里耶夫与戈尔德施泰因就“托洛茨基主义”一词的使用方式形成对峙。虽然德米特里耶夫已认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者标签，但他顽固否认自己“曾从事以反革命目标为导向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你没有说实话，”戈尔德施泰因反复反驳。在驳回德米特里耶夫的证词后，他发起了一系列挑衅性指控。连番攻势最终令德米特里耶夫难以承受，放弃抵抗。我们可以想象戈尔德施泰因俯身打字机前，用两根手指敲击出供词：“我更改此前虚假证词，承认 1930 年我重新开始反对党的斗争。我，德米特里耶夫·E.，直至被捕之日都是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

这是调查的转折点：在审讯员连番盘问与威胁的冲击下，德米特里耶夫在据称曾所属的托洛茨基派系与列宁格勒的反革命组织之间架起了桥梁。他早先指认为同事的那些姓名，此刻变成了共谋者的姓名。“我于 1932 年与共产主义大学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建立联系，”他供述道。

该段笔录的显著特点是被告声音在多大程度上染上了审讯者声音的全部色彩。事后将同事描述为充满“托洛茨基主义秘密”，谈论“托洛茨基主义捏造”及其他常规自证其罪，均指向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语言实践的被迫皈依。德米特里耶夫已全盘接收整套阴谋词汇：他不再“会见同志”而是“建立联系”。他此刻承认了仅数日前还描述为无害的关系的真实性质：“我赞同我参与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反革命表述。”⁸⁰

德米特里耶夫曾向来自财政经济学院的别林提供的帮助，在此背景下也获得了新的意义。由于德米特里耶夫是通过鲍里斯·科夫曼（前一年被定罪）结识别林，戈尔德施泰因由此认定自己揭露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反革命网络。⁸¹ 德米特里耶夫此刻为这场“阴谋”提供了背景：“1933 年 9 月别林来共产主义大学参加政治经济学系的会议。科夫曼热情推荐他：‘别林，’他对我说，‘将与我们共事’。我们变得亲近……因此别林毫无顾忌地向我透露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秘密。”

德米特里耶夫结识别林后，别林向他抱怨：1934 年在托尔马切夫学院工作时受到严厉训斥，证明了“党内令人难以忍受的体制。在（1935 年 12 月）的清党期间，他的党证被扣留，于是他来到我家表达愤慨。”这说明可以无故开除党员，’他说。对斯大林同志充满愤怒的别林，向我灌输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惯常的诽谤性捏造。”这并未阻止德米特里耶夫保护敌人：“当我被传唤到常委会听证时，我为别林提供了积极的个人评价，称他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仅与（最近被捕的）列温’在专业上有过交往’。我完全清楚这是虚假的。”这场戏一时很成功：“经我干预后，别林取回了党证。”

审讯自此以惊人的流畅度推进，很快产生了更多揭露。被开除党籍并担心被捕的“别林请我保管他公寓里的托洛茨基主义文献。[起初，]别林想焚毁它，但我们商定没有必要。”当被要求指认同伙时，德米特里耶夫提及红星工厂前党委书记涅姆佐娃（她将于7月5日被捕）。涅姆佐娃建议他们去找区委秘书舒利曼（“他拒绝见我们”），还有参与审查党员证件的列宁格勒党委会指导员拉比诺维奇：“据别林告诉我，拉比诺维奇向申诉委员会书记保证‘别林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本人‘自波罗的海工厂时期就认识’别林。”⁸²

当党的官员们忙于更换党证时，他们仍认为自己在搜寻孤立的敌人。但在此期间，敌人的画像已发生重要转变，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德米特里耶夫、别林和涅姆佐娃都是一个庞大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阴谋的一部分。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人物在幕后操纵，其中最主要的是扎伊杰利，他在前一年已被清洗。

扎伊杰利：托洛茨基九头蛇之首

格里戈里·所罗门诺维奇·扎伊杰利从“崩得”成员到布尔什维克的奇妙转变的故事，如今被一连串展示其邪恶个人本体论的行动所取代。我们上次见到他时，扎伊杰利已被清洗并作为隐蔽的反对派分子流放到萨拉托夫。一年多来，他被允许继续教授历史，但在1936年，他的案件被重新审理。⁸³ 或许是因为德米特里耶夫提到了他的导师，或许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这位流放的教授于5月6日在萨拉托夫被捕，此前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出了紧急请求。个人和专业因素促成了针对扎伊杰利的案件。据称，他的历史表述与不断革命论的反革命观念相符，而他的海外联系为他所卷入的阴谋混乱增添了国际维度。

“托洛茨基主义”是扎伊杰利调查的核心节点。被告爽快地承认他“过去曾发表过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言论，并在几次场合与活跃的托洛茨基分子有过接触”，但他强调他一直“在报刊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然而，扎伊杰利很快意识到，针对他的指控不会撤销。他的审讯官尖刻地告诉他：“就本次审讯而言，我们认为你正式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演讲是两面派、阴谋性的把戏。”⁸⁴ 在首次审讯结束时，扎伊杰利承认，在1935年列宁格勒的调查期间，他隐瞒了在1925-26年研究访问巴黎期间（他在那里收集了关于西方工团主义运动历史材料）曾与一些法国托洛茨基分子会面的事实。⁸⁵

当被要求说出“所有他曾与其交往过的托洛茨基分子”时，扎伊杰利列出了一大批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都是他以前的学生。⁸⁶ 他还承认，他是谢苗·格里戈里耶维奇·托姆辛斯基的“密友”。托姆辛斯基曾是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的知名成员，现已成为安全威胁，于1935年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36年4月29日，他再次被捕并被带回列宁格勒。为了与他那麻烦的朋友保持距离，扎伊杰利大声痛悔没有更早与他断绝关系：“我到萨拉托夫后，写信给我所知最近才被揭露的托姆辛斯基，告诉他我正使生活走上正轨。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张明信片——是对我在列宁格勒时收到的一封信的回复。”流放到阿拉木图后，“托姆辛斯基很嫉妒——他知道萨拉托夫更是一个文化中心。”⁸⁷

稍后，扎伊杰利利用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细节丰富了他的证词：“在与我的私下谈话中，托姆辛斯基说斯大林的坏话。”据称，托姆辛斯基告诉被告，斯大林1931年的信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拙劣模仿”，并且他本人无意为他历史著作中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只因为“斯大林的左脚任性了”。当党在1935年清除两面派分子时，托姆辛斯基恶意地对我说，斯大林是在蓄意杀害党的知识分子。⁸⁸ 扎伊杰利也希望与第二位朋友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马雷舍夫保持距离，后者的观点与托姆辛斯基一致。⁸⁹ 但致命的供认使这些努力付诸东流。“是的，”扎伊杰利说，“我现在承认我们组成了一个非法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集团。”⁹⁰

扎伊杰利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供认？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吗？分析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的挑战在于解释为何被告会这样危及他和他的同事的地位。显然，我们必须首先在囚犯于审讯过程中的无助状态中寻找答案。

一旦党内会议的基本对抗结构被移植到监狱环境中，紧张程度便急剧上升：如果说党内诠释学扩展了双方带来的叙述，评判和调整其语义系统，那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里，被告的语言几乎被完全剥夺。扎伊杰利的审讯官通过操纵言辞来操纵现实。通过坚持要求被告将其参加的“非正式聚会”重新命名为“地下组织会议”，他迫使被告接受新的词汇，从而接受新的罪名。词汇层面就足够了：一旦重新命名的过程完成，就不需要进一步更切实的证据了。⁹¹

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了前所未有的、鲜明的黑弥撒意象。在大清洗期间，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解释为相反仪式的事务，这是那些崇拜托洛茨基并准备对党的日常活动进行卑劣歪曲的人的主要组织方式。据称旨在从内部控制党的阴谋性集会随处可见。最随意的三人甚至两人相遇，都变成了“会议”（*sobraniia*）；稍大一些的团体则使会议变成了“协商会”（*soveshchanie*）；最终，最邪恶的集会被称为“聚集会”（*sborishcha*）。在此类场合说出的每一个词，即使是最随意和无辜的，都变成了“发表演讲”和“作报告”。1939年，列宁格勒高层会承认，“与敌联系”这一公式被随意运用；它并不区分普通的熟人、仅因工作中的官方职责而认识的人等。”⁹²

尽管扎伊杰利承认存在类似反革命黑弥撒的事情，但压力并未减轻。他必须供认——提供细节并承认个人参与煽动性活动：

问：在你离开列宁格勒之前，你的反革命托洛茨基集团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何时何地举行的？

a：尽管基洛夫遇刺后密谋会议已完全停止……但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1933年12月在科学院党支部秘书佩切尔斯基的办公室。

q：我们审讯人员还知道其他密谋会议。它们是在何处举行的？

a：由于我们在工作中时常接触，或因私人友谊，没有必要专门安排密谋会议。我们是在学院办公室或私人公寓里，顺便讨论与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相关的各种问题。作为我们相互关照的一个例子，我将提到在晋升时互相帮助的情况。例如，我曾力推马雷舍夫担任我的副手。⁹³

这一术语重命名的过程在此处尤为突出。一场关于何为密谋的短暂争辩，最终以被告的彻底败诉告终。蔡德尔别无选择，只能遵从审讯者的意旨，这意味着必须立刻重新诠释他过去所有的社会交往。他努力将旧有术语（“同事关系”、“友谊”、“聚会”）转换成新术语（“密谋会议”、“非法活动”），这种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人们可以将这些记录语言转变的审讯笔录斥为匆忙伪造的谎言、荒谬与矛盾的集合。但任何接触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材料的人都无法忽视其中展现的庞大翻译工程。⁹⁴ 这些档案很少将纯粹虚构之事作为事实引用。更多时候，调查人员会重构事件以适应斯大林主义的敌人观。历史学家或许会将这些异想天开的诠释行为视为篡改，但若忽视受害者的语言及其被审讯员的转译，便是忽视了大清洗的过程。

苏联司法体系能将任何人变成反革命分子，但这种转变不仅通过权力机制实现，更依赖于斯大林时代人们（即便未完全认同）所理解的意义体系。在此背景下，表象真实可能比事实真实更重要。审讯员显然参考了关键词表，竭尽所能将扎伊德尔塑造成主要反革命组织者。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尽管扎伊德尔不断做出供认，他仍竭力坚守 1935 年版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身份：他可能通过著述激发异端活动，但从未故意违法。“我们没有任何成型的目标，”扎伊德尔恳求审讯员相信，“从实际层面看”，他们的活动从未超越“在学术、文化和新闻界传播反革命论点”。⁹⁵

审讯员反复要求囚犯更明确地交代反革命组织的结构与方法，并用目光压制扎伊德尔。被告变得更坦白：“在我们的秘密会议中，我们常常讨论党内同志如何更好地自我保护……为防止暴露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包括共同责任契约[*к р у г о в а я п о р у к а*]。在别无选择时，我们会发表虚伪空洞的演说以避免真心忏悔[*п о к а я н и е*]。”

”。这场由扎伊德尔在审讯员协助下编织的欺骗叙事，其高潮发生在 1933 年 12 月列宁格勒农民运动会议的幕后。以下是扎伊德尔声称的回忆：“当托姆辛斯基坚称粮食短缺并非源于富农破坏而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时，我试图劝阻他发表可能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论点。反而建议他将异议表述为‘供未来讨论的要点’。”当专程从萨拉托夫前来参会的学者梅尔松承认对自己的报告感到忧虑，“因为他的托洛茨基-孟什维克立场已经遭受严厉批判”时，扎伊德尔帮他设计了规避策略。“不必捶胸顿足，”他告诉这位年轻专家，“完全避免谈论[政策]扭曲问题。”⁹⁶

接着涉及扎伊德尔在学术羞辱格里戈里·萨穆伊洛维奇·弗里德兰德事件中的角色——这位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因其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而被指责企图将托洛茨基主义走私进史学。扎伊德尔现在声称以弗里德兰德辞职告终的学术斗争实为一场盛大表演：“诚然，弗里德兰德不满我对他的批评。但当我向他解释我的发言实属被迫，且措辞已确保他不会被清洗时，他似乎满意了。”⁹⁷

随着维辛斯基本人监督对这起学术阴谋的调查并要求更多揭露，审讯员特别努力将扎伊德尔的团体描绘成将触角伸向全国：

审讯员：1935年6月你从列宁格勒抵达萨拉托夫后，接触了哪些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调查组已知，你此前在列宁格勒与梅尔松会面时，他向你告知了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

扎伊德尔：我无法按问题所提内容回答……梅尔松从未告诉我任何此类活动。⁹⁸

被告并未否认1935年10月在萨拉托夫师范学院附近偶遇梅尔松。但“我们单独会面仅持续五分钟，至多八分钟。”他带到萨拉托夫的唯一地址属于某位明金：“这地址能在搜查时收缴的地址簿中找到。但我未携带给明金的介绍信……抵达他家后才得知他不久前被捕了。”

人们不禁注意到，审讯进行至此，“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仍存争议：扎伊德尔去见的是“学者明金”，而审讯员感兴趣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明金”。⁹⁹叶夫根尼娅·金兹堡的回忆录揭示了此类情形。作为喀山著名党员干部的妻子，金兹堡在受审时注意到内务部审讯员连最常规问题的回答都在记录。当调查员递给她第一页要求签字时，金兹堡震惊了：“这是什么？他问我认识埃尔沃夫多久，我回答‘自1932年起’；但这里的问题和答案被记录为：‘你认识托洛茨基分子埃尔沃夫多久？’‘我自1932年起就认识托洛茨基分子埃尔沃夫。’‘这不是我说的，’”金兹堡抗议道。“‘但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审讯员坚持道。金兹堡要求审讯员逐字记录她的回答，而非用他自己的话，但她的请求“被阵阵大笑淹没”。¹⁰⁰

扎伊德尔或许也曾抵抗内务部的语言专政，但至少根据审讯笔录，每一轮追问都使他更深地卷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符号链。“至此我们只讨论了理论层面的托洛茨基活动，”有条不紊的审讯员对扎伊德尔说。他现在希望被告终于能“交代你所在团体犯下的反革命行为”。约一个月内，扎伊德尔坚持否认。“此事我无可补充，”他反复反驳。但6月5日，他崩溃了。¹⁰¹

在单独监禁中，缺乏任何法律援助，每个被内务部拘押的嫌疑人都被引导相信：自己正独自对抗由昔日朋友组成的险恶集团。在后来的回忆中，幸存者常追忆那种悲痛绝望，以至于将审讯员视为唯一能接触的人类、唯一获得同情与理解的机会。被告易受心理游戏影响：扎伊德尔的审讯员不时中断审讯，令他猜测事态进展，或交替进行漫长审讯与长期独处，直至囚犯再次要求解释机会。有时审讯似乎彻底中断；这旨在诱发对恢复某种人际联系的渴望。许多案件中，调查会在“严厉审讯员”（*плохо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与“温和审讯员”（*хороши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间交替，尽管扎伊德尔审讯员使用此方法的证据薄弱。¹⁰²

调查组手中的王牌是同案其他囚犯已签署的供词——这些供词被复印并仔细整理在扎伊德尔的调查档案中。在巨大压力下，大多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历史学家都曾证实同行可能参与恐怖活动，尽管无人能提供证据。1936年7月5日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卡列夫的证词很典型：“1932年我见到列宁格勒反革命组织负责人扎伊德尔，告知他我们……承认恐怖手段是对抗党的主要斗争方式。”¹⁰³ 托姆辛斯基进一步夯实证据，他证实“扎伊德尔收到执行刺杀基洛夫指令”。¹⁰⁴ 若这仍不足以动摇他，审讯员则出示雅科夫列夫的证词：“扎伊德尔告诉我他准备亲自参与组织刺杀基洛夫的恐怖行动。”¹⁰⁵ 内务部从“分而治之”策略中获取最大收益。1935年的一次简报会上，内务机关副主管雅科夫·阿格拉诺夫告诫年轻审讯员：“在顽固罪犯间播撒不和并非易事；这些凭借数十年反党斗争联合起来的狡猾骗子[*очковтиратели*]是紧密的团伙。我们必须迫使他们正面冲突，以激化其内部矛盾。”¹⁰⁶

这一策略屡试不爽。1937 年 3 月，前右翼反对派领袖布哈林承认，自称其同伙的同志们的破坏性证词构成了“反对我的有力论据”。确实，他的同僚为何要自证其罪？“既然他们被说成‘你已被揭穿，你是骗子，你是伪君子’，那么他们很可能盘算着：只要供认某事并诽谤自己，处境就会好些……而那些真正有罪并被当场抓获者，证据和他们自身的负罪感会沉重压垮他们。”¹⁰⁷

让被告与友人碰撞的更具法律色彩的方式是将其拖入证人对质。苏联法理学将“对质”（*Очная ставка*）定义为“就同一事实同时讯问两人”，使其成为粉碎被告任何残余抵抗的最强大武器之一。¹⁰⁸ 面对不合作的嫌疑人时，审讯员常宣称一旦同僚作证，所有空缺与沉默都将迅速填补。

叶夫根尼娅·金兹堡最初似乎期待与证人对质：“给自己签一堆谎言是一回事，”她想，“但当面重复这些背叛同志的话必定是另一回事。”当一位老朋友走进审讯室，金兹堡冲动地拥抱了她。调查员跳起来愤怒咆哮这是“史无前例的违规。囚犯竟扑向指控者怀抱！”他分开两位女性，要求严格遵守审讯室礼仪。¹⁰⁹

当他将宽泛指控的摘要交给被称为“甲方”的证人签字时，“乙方”金兹堡介入。“签这个你会害死数百名同志，”她告诉昔日朋友。但审讯员插话：“你怎敢胁迫证人！我立刻送你去惩戒室。至于你，”他转向甲方，“昨天你单独在此时已签了同样内容。现在却反悔！我将以提供伪证罪立即逮捕你。”¹¹⁰

继续坚持清白已无意义。一旦两名证人指控被告，其陈述就正式“被揭穿为虚假”。根据重视证词胜于证据的内务部诠释学，对质是供词的绝佳替代。例如 1934 年 12 月审讯员对基洛夫刺客尼古拉耶夫说：“我能安排十至十二次极具定罪效力的对质，根本不需要你的口供。”¹¹¹

间接证据表明内务部依靠对质击垮扎伊德尔，迫使其供认参与恐怖组织。“若如你所言，你确实坚决反对对党的领导层进行积极斗争，”调查员6月5日对扎伊德尔说，“你如何解释托姆辛斯基和马雷舍夫多年来确信可以向你表露反革命态度？”当发现他认为可信任的人们均已认罪，扎伊德尔放弃了一切抵抗：“是的，我一直在撒谎。”

于是扎伊德尔接受了唯一可供选择的身份——刺杀基洛夫的支持者，并供认“因害怕个人责任，去年我企图向调查员隐瞒托洛茨基组织最重要的活动——使用个人恐怖手段”。布尔什维克皈依的熟悉特征在此以高度夸张却残缺的形式呈现。扎伊德尔突兀而突然地背弃了旧我，却未找到可依附的新合法身份。其供词是事实性的，完全缺乏心理维度。没有净化或忏悔的迹象——这些根本不为审讯员所关注。

受害者的声音

此时，让我们暂停对扎伊杰尔案件的分析，来审视一些非官方记录，这些记录为我们揭示了审讯官迫使被告招供所使用的手段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私人记录，有些是事后撰写的，必须谨慎审视，以免陷入时代错置的风险，然而其价值之大，即便有限的使用也能成为重建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的无价补充。¹¹²此处的材料源自一个时期，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某些阶层人员的失势引发了批评的洪流：一批申诉信在1936年末寄出，当时叶若夫正忙于诋毁雅戈达的手下；另一些则在1939年，当拉夫连季·贝利亚对叶若夫及其同伙如法炮制之时。其余的请愿书和回忆录则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之后写成的。

1936年春天因卷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而被捕的众多学者中，只有少数人一年后仍然幸存。即使是那些刑期仅为十年劳改营的少数幸运儿，也在叶若夫时期（从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被枪决。¹¹³A. L.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是幸存者之一，她在申诉信中提供的细节弥足珍贵。这位年轻的西方历史学家，沃伊特洛夫斯卡娅首次出现在我们的叙述中是在1935年，当时她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卡尔波夫的妻子”被流放到沃尔霍夫。

1955年12月，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向苏联总检察长请愿，请求为她和她的丈夫洗清旧日的“捏造”指控。“1934年我丈夫卡尔波夫被捕时，我才三十岁，”她在请愿书的序言中写道。“如今我五十二岁了。在此期间，检察院竟抽不出时间审查材料，揭露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中使用的手段。”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渴望再次讲述她的故事。“1936年4月1日，”她写道，“我被捕并被从流放地带回列宁格勒。我那四岁和八岁的孩子被丢在我父母公寓楼的门口，而我则被扔进了沃伊诺夫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

审讯她的场景是一个高天花板的房间，唯一的大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盖。负责审讯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的是赖赫曼，就是那个签署了德米特里耶夫逮捕令并将监督扎伊杰尔案调查的赖赫曼：“他当时二十七、八岁。我在他面前坐下，押送人员离开了。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毫无羞耻，狡猾地微笑着。他的眼神飘忽不定。”¹¹⁴

我没有任何罪过。我的审讯是虚假和无礼的诡辩，是对事实和伪证的玩弄。每当我开始抗拒，赖赫曼就开始辱骂我，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侮辱和威胁会持续一整夜。我回答的要点是，我没有参与任何反革命活动，而且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我和卡尔波夫都与反革命无关。赖赫曼刻薄地厉声回应说，他有贬损卡尔波夫和我的材料。我要求他给我看。“啊哈！”他会爆发。“那么你是不相信我们了！你不相信苏维埃司法、苏维埃政权、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这意味着你暗中走了反革命的道路！”等等，诸如此类。

赖赫曼不断追问：“你以调动科学干部为借口去莫斯科时，从扎伊杰尔或[萨穆伊尔·绍洛维奇·戈尔洛夫斯基（列宁格勒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当然没有。戈尔洛夫斯基指导我的论文；我们只谈论这个。我不认识扎伊杰尔。”然后赖赫曼会吼道：“谁教你那些背后暗杀者使用的方法？这是扎伊杰尔的证词。”他假装非常激动，翻找一些文件，抓起一个文件夹，疯狂地翻动书页，读着。无论我还是扎伊杰尔，都不可能编造出他读的那种胡言乱语，其中我的名字和扎伊杰尔的名字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如此不可信，赖赫曼如此慌乱，伪造的痕迹非常明显。¹¹⁵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愤慨地讲述了持续数天毫不留情的审讯。当调查人员晚上离开或因其他事务分心时，他会把她锁进一个“笼子”（*思考笼*）。在那里，一个守卫持续监视她，不让她睡觉：“从相邻的房间我常常听到男男女女撕心裂肺的尖叫和窗户破碎的声音——我的神经备受折磨。”即使她被送回牢房，也只有半小时左右：“然后我就会被送到‘狗屋’[*隔离箱*]”——一个隔离间。¹¹⁶ 最终，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在劳改营服刑五年。”（签署判决书等同于认罪。）¹¹⁷

1956 年，沃伊特洛夫斯卡娅被传唤到莫斯科作证，指控她昔日的折磨者，此人因大清洗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而正在接受调查并被监禁。领导调查的波格拉尼茨基上校对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特别感兴趣，称她为“赖赫曼堆积如山的尸体中一个偶然的幸存者”，并向她解释说被告是“一个庞大而可怕的动物，经验丰富，精于算计，手段老练。”¹¹⁸

虽然其中的悲怆感相当明显，但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对审判的回忆同时是克制和实事求是的。法庭是一个“有大窗户和拉起窗帘的、灯火通明的大厅……声音在这个近乎空旷的圆形空间里回荡。”当赖赫曼被带进来时，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几乎认不出他：“二十年前，1936 年，他还是个年轻、健壮的军人类型，病态地专注于他的职责，一个被赋予权力的调查员，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捏造案件，使得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进监狱然后去劳改营，或者进监狱然后被处决。”如今已步入中年的他，站在一个许多被他送去赴死的人曾经占据的位置。

审判长开庭时警告在场人员，法庭程序必须绝对保密。下一步是宣读指控；这花了几小时。最后，赖赫曼的质询开始：“出生日期？”“1908 年。”“社会地位？”“我父亲是个手艺人，后来是雇员。”“教育程度？”“两年职业学校；……其余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审判长对赖赫曼以这样的教育背景竟能成为中将感到大为震惊。“有些重要的学者甚至没从古典中学毕业，”被告挖苦地回应道。质询无休无止地继续：“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1924 年。”“什么职务？”“从最低到最高，……最终是特别处处长。”当被问及是否曾获得过勋章时，赖赫曼回答：“红旗勋章和其他……包括列宁勋章。”

法庭随后开始询问证人，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出庭作证：“我陈述了 1936 年我所面临的调查细节。赖赫曼打断我，有时得到审判长许可，有时从他座位上直接发言。”当她告诉法庭她被单独监禁时，被告尖声打断她：

赖赫曼：你在那里面待了多久？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六十四天。

赖赫曼：我在单独监禁中待了一千两百天，什么事也没有，而你——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你竟敢拿我们相提并论！我们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是无故入狱，而你是因为最严重的罪行。你要为死亡、劳改营、屈辱负责。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告诉法庭，1936 年的审讯在特殊房间进行，一对一，除非审讯员需要助手进行额外询问。甚至押送人员也需要按铃召唤。她调查初期被带去的房间在顶楼，采光良好，陈设齐全。后来，她在塞满杂物、窗户被封死的小房间里被审讯：“赖赫曼没有对我进行肉体殴打或酷刑，但他在调查期间对我使用了精神酷刑……他不停地向我灌输：‘你知道你的大学是什么吗？一个巨大的破坏者团伙！’”¹¹⁹

关于赖赫曼秘密助手的敏感话题迟早会浮出水面。“赖赫曼，”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回忆道，“利用密探和两面派的研究生：弗拉基米尔·罗夫，现任列宁格勒大学系主任，以及在座的克娃。”克娃是语言学研究所的同事，是雅科夫列夫的妻子，后者在莫斯科公审中被牵连进恐怖活动。¹²⁰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克娃过去常来我们家，表面上是帮助家庭，实际上是为了博取信任。根据她所见所闻，她指控了我家庭的所有成员。1936 年我已经在监狱里了，才得知克娃对科学院许多其他雇员也提供了类似的证词，并帮助编制了一份长长的所谓不可靠人员的名单。

克娃（从座位上）：这是谎言！谎言！

审判长：克娃公民，允许我在法庭上宣读你当时提供的证词：1935 年某日，在……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母亲的公寓里召集了一次反革命集会。参与者，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反革命分子卡尔波夫的妻子，她的妹妹埃拉及其丈夫德雷林，讨论了他们所谓的对人民公敌的非法逮捕。

当克娃被法槌敲击以示沉默时，沃伊特洛夫斯卡娅要求“将赖赫曼的同谋，告密者和密探罗夫绳之以法。”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承认她从未与罗夫对质过。然而她知道，赖赫曼自己并没有撰写罗夫的证词，“因为我日常生活的某些细节只有罗夫知道，他

过去常来我家。然后他以扭曲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呈现出来，以迎合赖赫曼。”

这是对告密者世界罕见的一瞥，一个至今仍被保密的棘手问题。（包含告密者报告的档案被视为“内部文件”，至今仍不向受害者家属公开，更不用说历史学家了。）¹²¹ 在大清洗期间，“告密行为”与“举报行为”有许多连续性。虽然所有政治上觉醒的公民都应该举报异己分子，但只有更专业的间谍才是“线人”（*источники*），通常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支付报酬。¹²² “我们可以把任何人变成告密者，”雅戈达吹嘘道。“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他就不得不屈服。”¹²³ 例如，1936 年被捕并被控反革命活动的莫斯科纺织学院的米罗什尼琴科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被释放出狱……我承诺定期提供关于学生态度的信息。”¹²⁴ 1936 年，当列宁格勒告密者“扎东斯基”（化名）没有按约定与他的控制人员会面时，他被解雇，被捕，最终以“法西斯阴谋家”的罪名被判处死刑。¹²⁵

通过间谍活动获得的材料最初出现在囚犯档案中，尽管他或她从未被允许查看。在调查和审判结束，就在档案被送交存档之前，这些材料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仔细取出并整理成称为“线人线索”¹²⁶ 的特殊档案夹。这些档案夹通常包括秘密特工的代号、内务人民委员部控制人员与他们会面的日期以及他们递交的备忘录。¹²⁷

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秘书乌曼斯基的一份陈述，可以让人对这类文件的样子有个概念。1936 年 9 月 9 日，乌曼斯基就物理学家鲍里斯·黑森被捕后的事件致信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天黑森的妻子雅科夫列娃来到系办公室。她相当坚持地要求与兰茨贝格教授交谈。兰茨贝格不在，但她碰上了塔姆教授，两人匆匆离开了。”雅科夫列娃希望她丈夫的同事可能为他求情，这向乌曼斯基暗示了系里隐藏着一个反革命网络。为了支持他的说法，他向控制人员提供了“未经核实的信息”，称塔姆是老牌孟什维克，“可能是该党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代表。”¹²⁸

以“特别密探”（*сексоты*）身份秘密工作的人定期评估其工作场所的政治构成。¹²⁹ 除了事实之外，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特工去嗅探“情绪”（*Умонастрояния*）。¹³⁰ 1933 年，来自空军军事学院的普霍夫斯基收到以下命令：“提出反党和反苏的问题，并试图引诱敌人出来。”当然，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行动，正如内务人民委员部操作员明确表示的那样：“确保没有目击者；否则很难让你脱身。”¹³¹

一旦基层线人将一条信息传递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部，它就会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的办公桌上，然后转到列宁格勒党委员会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那里；最敏感的信息会送达日丹诺夫的办公室。在那里，“行动命令”被附加，信息开始返回到控制机构。最终，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会收到指示，对某个学术机构的某位教员“建立监视”。

关于这个复杂警察网络在地方层面的关键枢纽的运作，我们知的不多，但在大清洗期间，列宁格勒的大学确实存在“特别部门”。这些部门独立于校长和党组织书记，将所有“敏感信息”直接发送给中央控制委员会在列宁格勒的全权代表鲁贝诺夫。这种通信渠道不受区委员会机构的监督，允许线人直接向中心告发教职员工。¹³²

保密是国家安全问题。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回忆说，她不被允许当面与诽谤者对质。最高苏维埃在 1922 年 10 月 16 日规定，“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传唤到法庭作证”；在 1930 年代，他们的身份保护得更好。¹³³ 尽管在 1936 年，赖希曼尽职地遵守了刑法第 206 条，并让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熟悉了对她收集的证据，但很少有嫌疑人听到过线人对他们提供的证词。¹³⁴

休息之后，K 瓦出庭作证关于她 1936 年作为线人的活动：

主席：你还记得调查期间你的证词吗？

K 瓦（拉长声音）：多-多-多-少-少-少或-少-少-少。

主席：那么我将向法庭宣读：我的丈夫雅科夫列夫与科学院的某某学者一起进行了秘密反革命工作。

然后 K 瓦关于科学院的“态度”和“谈话”的证词被宣读：

主席：这是你提供的证词吗？

K 瓦：我不再支持我那时写的内容，因为从那以后我学到了很多，理解了很多。

主席：直接回答。

K 瓦：是的，我证实这是我[二十年前]证词的准确记录。

当赖希曼坚称他与 K 没有暗中交易时，瓦，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恳求不同意：“法庭难道不清楚为什么 K 瓦，她深深卷入了她丈夫的活动[雅科夫列夫被定为反革命]，只被判了萨拉托夫流放三年，而我，对任何反革命活动一无所知，却被判了五年劳改营？”根据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的说法，这时 K 瓦“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大喊我在全苏联玷污她的名声，不得不被送往医院。”

第二天，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被询问。大部分盘问由赖希曼本人进行。第一位证人，一名在列宁格勒与赖希曼共事两年的国家安全上校，简要地表示：“赖希曼被认为是一名有才华的调查员，但也是一个野心家。我们有一种感觉，他很懂得如何让上司高兴。”下一位证人，另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更加直率。“赖希曼会不择手段，”他作证说，“像摊煎饼一样炮制案件，违反程序规范。”

狂怒的赖希曼大喊：“我要的是事实，不是空话！……你们忘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的职责是无情地揭露和摧毁反革命恐怖分子。”愤怒且“对周围环境漠不关心”的赖希曼咆哮说他的指示来自最高层。¹³⁵ 法庭主席命令他保持沉默。由于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此时被护送出法庭，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她曾经的审讯者。¹³⁶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的回忆有助于揭示是什么引起了对学者如德米特里耶夫和扎伊杰尔的怀疑：许多逮捕是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线人准备的“不可靠”名单进行的。沃伊特洛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也揭示了用于获取供词的方法：虽然 1936 年没有广泛使用酷刑，但监狱的日常条件会让除了最强壮的被告之外的所有人都难以想象反抗。囚犯的孤立感明显可见。线人——有时是最亲密的朋友——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解开”列宁格勒学术界的人际关系网络。

标准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的地位也被澄清：在某种意义上全能，在另一种意义上软弱。1956 年的法庭诉讼程序明显表明，赖希曼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榨取尽可能多的快速定罪。幸存者回忆说，审讯员“被驱使”，他们“必须驱使别人，否则自己会被摧毁”。¹³⁷ 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一再被警告，拖延“将导致对他们提出刑事指控”。¹³⁸ 接受被告无辜的审讯员立即取代了受害者的位置。¹³⁹ 其中一人回忆起他一直害怕被“带进地窖”（斯普申·弗·波德瓦尔）——这是处决的委婉说法。¹⁴⁰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和她被捕的朋友及同事从监狱写的上诉信是他们的主要求助方式；在 1930 年代后期，这些信件充当了申诉的渠道。¹⁴¹ 日丹诺夫的办公室每天收到 150 到 200 封信。¹⁴² 每月一次，列宁格勒监狱的囚犯会收到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以便他们倾诉心声。柳巴尔斯卡娅，在押一年半（1937–38 年），她的时光“不断写信——写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部门的负责人、省检察官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任何人——抱怨[她的]调查过程。”¹⁴³

作为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行为，请愿有着一段历史，被捕的共产党人无法完全视而不见。革命精神使得向沙皇政府写恳求信成为禁忌。在宪兵面前卑躬屈膝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另一方面，对减刑的上诉被容忍，因为它们承诺能早日回归革命活动。这种传统在 1917 年后也延续了下来。虽然许多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憎恶上诉，但苏联当局认为拒绝上诉是蔑视的表现。有趣的是，在大清洗的年代里，大多数囚犯，据说“相信他们即使在思想上也与苏维埃政权完全一致”，毫不犹豫地写信给当局。¹⁴⁴

当然，那些信任中心会纠正错误的人只是抓住了一根脆弱的稻草。从 1937 年 1 月到 10 月，仅列宁格勒检察院的投诉局就收到了大约 10 万封信，抗议“虚假指控”和“调查期间的不当行为”——几乎所有的投诉都被判定为“无根据”。地区防御委员会，在大清洗期间收到了 154,500 份请愿和上诉，拒绝调查“政治案件”；地区检察院的刑事司法部门也拒绝考虑它们。无数其他请愿书，许多寄给中央委员会或直接寄给斯大林，也无人理睬。¹⁴⁵

这些上诉的语气从恳求到哀怨再到咄咄逼人不等。例如，1937 年 3 月发给人民委员会理事会的一封上诉指出，对东北营地（Sevostlag）的一些政治犯的指控“令人震惊的荒谬和完全毫无根据”。投诉以对抗性的口吻结束：“我们抗议斯大林主义法庭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使用的非法司法程序。”¹⁴⁶

但很少有上诉如此挑衅。某位 K. 坚信“在国家某处一定有一个可以伸张正义的中心”。由于他相信把正确的上诉送到正确的中心会确保他被免罪，他不断告诉“受过良好教育的囚犯”他所遭受的不公，恳求他们以尽可能“优美”和“有说服力”的语言为他写请愿书。当没有收到回复时，K. 推断他的信一定没有送达目的地。后来，一旦他开始收到类似“你的上诉已审查，发现无根据”的否定答复，他仍然安慰自己：回复是用官方信头打字的，不是手写的，意味着它们属于“同时给予数千人的标准、正式答复”。K. 得出结论，他的上诉没有根据其本身价值进行评估。¹⁴⁷

控告者和被告都假设斯大林惩罚系统的两端之间会继续某种形式的对话。一些囚犯，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回忆说，“像疯子或疯人一样一封接一封地写请愿书，耗尽所有精力。当然，请愿书直接寄给全知的斯大林，期望他立即查明一切并伸张正义。”在这方面，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提到了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主任拉尔采维奇教授：“拉尔采维奇多么迷茫，多么可悲，他多么疯狂地想要增加他的请愿书。”¹⁴⁸

上诉越晚，作者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语言的距离越大。例如，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将她 1936 年的审讯描述为一场彻底的战争。她诽谤调查员，以拒绝在丈夫被捕和流放后与托洛茨基主义丈夫断绝联系为荣，并且没有承认她不想承认的任何事情。她提供的关于调查员如何根据预设计划重新解释她的证词的描述值得特别注意。通过虚构一个虚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赖希曼，她说，是在施加“道德压力”。然而，尽管双方激烈冲突，但似乎都共享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某些方面：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提到 R 瓦是“两面派”让人想起，她描述丈夫为“尽责的革命者”也是如此；使用这些术语相当于接受了官方语言的至少某些方面。

更早的叙述甚至更强烈地宣告了其作者在內务人民委员部推理中的共谋。例如，在沙茨金于 1936 年 10 月 22 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对他的折磨者的矛盾心理显而易见：

我就是这样被审讯的。首席调查员向我提交了一份四页的供词，承认参与恐怖主义。当我拒绝签字时，他威胁要枪毙我，要么不审判，要么在军事委员会正式听证后立即执行，就在调查员的办公室里，持续十五分钟。“在审判期间，”他告诉我，“你只能回答‘是’和‘否’。”……有两次我被整夜保持清醒——“直到你签字”。在一次持续十五小时的夜间审讯中，审讯员突然开始咆哮命令：“站起来！眼镜摘下！”他在我面前挥舞着拳头命令道：“拿起笔！签字！”

虽然沙茨金证实了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对残酷审讯的描述，但他对谴责产生这种残酷的系统不感兴趣，只关心它如何应用于他。“我无意根据某些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抗议对我所做的事情，”他向斯大林保证。“我只想说，这种方法可能鼓励虚假证词。虽然我不质疑对我的行动提出怀疑的合法性，虽然我理解调查不能仅依赖我的话，但我坚持所收到的信息必须客观核实，并且必须提供给我机会反驳虚假证词。”¹⁴⁹

一些被定为所谓的俄罗斯民族党（1933 年揭露）成员的列宁格勒学者的上诉说明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的一些对话方面。通过利用被告和国家共享的那些假设，审讯员能够提取惊人的供词，而无需过度依赖血腥、骨裂的压力。

例如，格列布·阿纳托利耶维奇·邦奇-奥莫洛夫斯基，列宁格勒科学院的一名讲师，年轻时曾拥护布尔什维克政权，于 1933 年 11 月 29 日被捕，以反革命罪名被定罪，并被送往劳改营——这段经历使他晚年转向民族主义阵营。1936 年获释后，邦奇-奥莫洛夫斯基仍将自己描绘成一个献身于革命价值观的人，并请求获准返回列宁格勒，以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他在请愿书中附上了一份题为《关于我的调查情况说明》的文件，希望能说服叶若夫，使他相信自己从未是苏维埃政权真正的敌人。

邦奇-奥莫洛夫斯基的叙述预示了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后来探讨的某些主题。这封请愿书开篇便简短控诉了单独监禁、“剥夺食物、读物、娱乐”等境遇。然而叙述的核心却是一个忠诚苏联公民如何在与调查员的交涉中经历希望与失望的故事。经历了 1934 年的挫败后，邦奇-奥莫洛夫斯科伊此刻仍怀揣着新的期盼。这位学者撰写《情况说明》时，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公民与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应当建立双向互信的关系。

最令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痛心的是审讯者拒绝以同志式的质询态度对待案件本质：

“我始终对调查完全信任，但审讯者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确凿的敌人。他不断暗示我的处境毫无转机。当我坚持拒绝在他拟定的认罪声明上签字时，他竟说出‘你这是固执己见自取灭亡！’你自认清白简直是堂吉珂德式的幻想！’……调查员声称我的同事已经指证了我，并断定我是个不知悔改的顽固敌人，至少将在劳改营度过五年刑期。他东一句西一句地逐步渗透，最终让我在脑中拼凑出他的逻辑：‘好吧，就算你是被冤枉的……难道你以为我们非要定你的罪不成？我们又不是按人头领赏！相反，我们清楚知道你的成就使你成为极其珍贵的学者。但我们无法潜入你的灵魂深处，不是吗？我们采取这种调查方式，正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手段。’”

审讯者与受审者或许会争论谁在审讯中占据更多结构性优势。苏联总检察长审讯长谢因在培训年轻审讯员时曾如此建议：“记住审讯是一场竞赛，受审者拥有先手优势：唯有他确切知道真相。你们只能模糊猜测真相所在，寄希望于从他口中套取答案。”¹⁵⁰ 当然，受审者对此强烈反对。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将调查描述为“一场审讯者早已暗中篡改所有纸牌的不公平游戏”。¹⁵¹ 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的记述表明，审讯者凭借其作为革命真理官方代言人的地位，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对受审者说：“党与整个苏维埃社会都站在这次调查背后！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审讯者或许难以窥探受审者的思想，但在作出裁决时却从未犹豫或出错。正如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的审讯者所言：“你必须完全信任我们。通过审讯，我们将查明你的真实面目。”¹⁵²

审讯者巧妙地揭露了邦奇-奥索洛夫斯基盔甲上的裂痕：“将命运完全交到我们手中并签署供词，将证明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完全信任。”他假设被告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秉持相同理念，反复强调只有承认真理不在于被告而在于苏维埃国家机关，邦奇-奥索洛夫斯基才可能获得个人成长的机会。邦奇-奥索洛夫斯基回忆道：“‘我们的调查具有教育作用，’审讯者曾对我说，‘每个人都会犯下日后渴望弥补的错误。签署声明将使你在心理上摆脱那些阻碍你进行不间断革命性自我批判的障碍。’”¹⁵³

最终，“我决定自己无权怀疑调查人员”，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在写给叶若夫的信中说，“当然，如果我真是敌人，绝不会相信他关于‘在当前条件下他的方法是权宜之计’的保证。”在承认审讯者代表整个苏维埃秩序后，他使用了审讯者所倡导的“强大的革命语言”写下了第一份供词。¹⁵⁴

在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内心可以辨别出两种声音之间的一场痛苦对话——他原始的声音，仍带有些许怀疑，与审讯者的声音交谈，而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内化：“我必须承认，随后严酷的自我批评时期——我谴责了我的过去和所有错误——加深了我认识到必须接受并信任调查方法。然而，有时我感到那些关于在‘辩证法’思维模式和‘形式主义’思维模式之间不断切换的疑虑……反映了我对调查进程正确解读的不安。这种内心冲突几乎将我逼疯——我丧失了对所发生一切进行批判性审视的能力。”

当他几乎要对自己解释学能力的疑虑屈服时，他灵魂的这本书已变得对他来说相当难以辨读。¹⁵⁵ 他的审讯者占据了上风，邦奇-奥塞洛夫斯基越来越接近抛弃他过去的自我。他被邀请签署第二份认罪书，然后是第三份，“每一份都比前一份列举了更多罪行”。没有回头路可走：“我相信一旦踏上某条道路，就应该走到底，拒绝签署更多声明毫无意义，因为各种供述之间的差异与第一份声明和现实之间的差异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我全都签了。”

尽管同志审判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邦奇-奥塞洛夫斯基仍期望审讯能保留其熟悉的对话特征。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他感到困惑：“审讯者时不时对我说，‘你不理解我们所做事情的政治重要性。’由于我无法把握整个案件的意义和目标，我渐渐相信整件事是一场对我进行评估的演习，而非对一桩罪行的调查。在调查的任何阶段，都没有任何具体罪行被归咎于我。”在功能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未区分阐释性法庭和刑事法庭、思想罪和实际罪行，邦奇-奥塞洛夫斯基不得不注意到由此产生的模糊性。¹⁵⁶

尽管“审讯者利用了他的职位”，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并未对共产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如果他指望新任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会同情他那受到克制的上诉显得异想天开，这是基于我们今天对叶若夫的了解，而在 1936 年，这样的希望尚未破灭。信的结尾是一个情感强烈的声明：“即使今天我也可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真诚地献身于革命的学者。为什么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指控我……犯有我未曾犯下的罪行，并用第 58 条[反革命]给我打上烙印，然后将我流放于世？我无法理解或接受这一点。尽管如此，我相信革命是公正且有目的的，这种信念帮助我忍受一切。”

即使在他坚称自己无罪的同时，邦奇-奥塞洛夫斯基仍试图理解他的审讯者。他的上诉从未暗示调查过程受到敌意污染；受害者表现出愿意付出极高的代价以达到理解。随着失败而来的是他感到自己“永远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罗盘”。¹⁵⁷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也证实了“调查的复杂性以及被告自身的心理复杂性”。¹⁵⁸ 她承认自己经常“被审讯者所吸引，尤其是在开始时。被告认为审讯者可以帮助他建立真相[真理]，找到正义[真实]。”¹⁵⁹ 毕竟，她是被“苏联政权审讯。指控来自一个被我们视为与自己无异的政府——我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偶像化了。”¹⁶⁰

通过将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重新诠释为一种对对话的渴望，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和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暗示了一种与熟悉的阐释性框架背道而驰的解读方式。当布哈林于 1937 年 4 月 15 日夜间从狱中写信给斯大林时，他表达了类似的愿望：“科巴！过去几晚我一直想写信，因为现在我觉得你离我如此之近。”信的后半部分写道：“我在这里的处境如此矛盾：我把每一个契卡看守都视为自己人，而他却视我为罪犯。”¹⁶¹

季诺维也夫 1935 年写给高尔基的信——希望后者能为被告在雅戈达面前说情——更具启示性：

请您想一想，这对一个身处苏联监狱中的人意味着什么。请具体想象一下——如果你认为自己面对的是另一个阶级的代表，你能够忍受任何事情——但如果情况相反，如果你感到自己方方面面都有罪（对谁有罪？对那个你身处其行列三十年的党！），如果你感到自己面对的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如果在每个红军卫兵的注视中你读到的是对你心爱祖国的斥责，如果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每一行字、每一个词——简言之，如果一切都提醒着你那巨大的罪责，还有什么能支撑你活下去，你又如何能幸存？¹⁶²

下面这段由一位囚犯在布特卡监狱向另一位囚犯吐露的建议，在这种背景下就说得通了：“如果你想结束你的道德苦难[精神折磨]，就别再把你的审讯者视为你的同志。除非你放弃这种态度，否则你注定会过上可怕的生活和艰难的死亡……把他们当作你的敌人对待，你会感觉好得多。”¹⁶³ 尽管被告们尖锐地谴责审讯者的方法，他们的语言却使他们无法与这些自命的革命理念代表者保持批判的距离。¹⁶⁴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种方法抹去了撰写此类上诉书时的历史背景：在一个由叶若夫、扎科夫斯基或日丹诺夫主导的环境中，存在何种话语选择？但这里被审视的是自我的话语表征，而非真实的人。很可能在不同情况下，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和季诺维也夫会写出不同的东西。然而，重要的是，他们与当局协商的语言触及了自我，呼唤着援引个体、他的磨难和疑虑的言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与邦奇-奥塞洛夫斯基同时被捕的列宁格勒学者在多年后撰写的《1934 年 4 月我被定罪情况的真实报告》，仍固守着许多赋予大清洗意义的假设——即便支撑斯大林体制的支柱已然腐蚀。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巴拉诺夫斯基的这份文献以非凡细节展现了审讯者如何说服被告自证其罪。

当被告首次在审讯室落座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说着陌生语言的人；经过无数次提问和多得多的回答后，一种通用语言逐渐形成：

在早期审讯中，阿尔特曼对案情的理解与我的理解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令我震惊[拉扎尔·萨穆伊洛维奇]阿尔特曼坚持将我与其——依我看来——荒诞不经的反革命组织的参与联系起来。他声称我不知怎的就无意间成为此类组织的成员，这在我看来是某种可怕妄想的产物。但夜复一夜的不断宣称，将我推入绝望与无助的深渊……我丧失了正常理解事物的能力。

就在我的神经即将崩溃之际，审讯中使用的方法变得更人道、更精妙、更无懈可击。首先，阿尔特曼询问我与哪些熟人存在公务、专业及友谊关系。我自然列举了大量曾与我进行过批判性讨论的同事。随后他提议我对提及的部分人员提供个人评价，并说明我与他们关系的性质；我认为这不会危及任何人。

接着，阿尔特曼对谈话内容提出了以下解释

我在工作中听到：“从当代苏联政治的角度来看，”他说，“由相似理念团结、拥护相似思想的专家群体，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竭力要揭露的那类政治小集团。”他告诉我，对我所听内容的任何其他解释都只能是我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我接受他的解释为真，则表明我的意识已提高，并且我已悔过。

为了证明这一构想无可辩驳，阿尔特曼告诉我：“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不一定需要在某处登记备案，甚至不必了解其组织的具体形态、任务与领导人。某种亲近感与共情、共同的利益与理念——即使仅限于专业领域——也可能滋生政治抗议。志同道合者相互联系形成链条，思想借此传递，这链条令人想起输送电火花的绝佳导体。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便是探查此类组织并将其扼杀于萌芽。”

尽管巴拉诺夫斯基拒斥此类观点，但他很快发现狱友们并非如此。其中一人是前共产党员、西方政治活动家，因越境进入苏联被捕：“与我不同，他政治上相当成熟；与他的日常交谈不可能不影响像我这样的新人。”决定性时刻来临于巴拉诺夫斯基阅读列宁格勒教授瑟谢夫的供词时，此人承认曾担任反革命组织领导：“这对我认知的最后一击。我的意志与精神被摧毁。那虚假谰妄的构想开始显得像真理。阿尔特曼利用我的异常心理状态，立即提议由他将我写的‘市民阶层表述形式’ [*obyvatel'skie formuly*] 翻译或转写为规范的政治语言。”¹⁶⁵

巴拉诺夫斯基将审讯过程呈现为一场关于阴谋定义的漫长谈判。他很少试图质疑案件基本事实：他确实与提及的人物关系密切，列宁格勒学者也确实惯于尖锐批评国家政策。但这又说明什么？当阿尔特曼首次从巴拉诺夫斯基无害证词的原始材料中构建叙事时，曾引发强烈抗议。但巴拉诺夫斯基从未将彻头彻尾的威权主义归咎于审讯者；他承认所有行为都旨在促成“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拉诺夫斯基逐渐确信：若不承认审讯者反复讲述的故事之准确性，过错将在于他自己。即便在牢房中，他仍被意识水平据称高于自己的人包围（大多数大清洗幸存者报告称狱友中必有“眼线”[*podsadnaia utka, nasedka*]），并在审讯者反复训导下，被告最终声称获得了某种启示。

166

在此语境下，关于“翻译”(*perevod*)的言论——从被告的原始语言转为审讯者的复杂语言——变得极具启示性。¹⁶⁷ “我只记得，”巴拉诺夫斯基在申诉书末尾写道，“这种‘从一种表述转为另一种表述’的翻译耗时极长——每行字都似酷刑。”叙述者还提到阿尔特曼的“理论”(*teoriia*)、“阐释”(*tolkovanie*)与“处理”(*traktovka*)——这些精英阶层词汇表明，在更高智力与政治层面进行的重新措辞和表述付出了巨大努力。文件拟定后，巴拉诺夫斯基首次在其中以一个喧嚣反革命阴谋成员的身份出现。无论他未能洞察自己常参与的非正式学术讨论之真实性质，未能领会他曾按字面理解的词句思想之深刻政治意涵，还是完全清白无任何刑事过错，这一根本事实未曾改变。¹⁶⁸

通过行使参与自身审讯的权利，巴拉诺夫斯基试图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评估其品格。这种情况源于斯大林主义关于自我只能在个体与党集体交汇处得以表达的观念。当调查在他们看来出现偏差时，囚犯会打断审讯者或向当局发送紧急信件，以期注入个人见解使事情重回正轨——毕竟从他们视角看，他们最了解自己灵魂深处的动态。与此同时，他们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观点——即该机构最能实现囚犯的真实价值。

一位名叫费尔德曼的军官以自我担保，换取内务人民委员部宽恕的渺茫希望。1937年5月31日，他向审讯者乌沙科夫恳求：“我按自己理解写了供词的开头和结尾……中间部分由你来决定——重写些内容很容易。”审讯者无疑能为费尔德曼自我构建的更好版本提供配方。另一次场合，他向同一位乌沙科夫恳求：“转告叶若夫……我准备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人坦白，我会交代所知的关于军事阴谋的一切。首次审讯时你已正确看出，费尔德曼并非顽固不化的敌人[*zakorenelyi, neispravimyi vrag*]，而是值得你付出再教育努力的人[*chelovek nad koim stoit porabotat'*]。若进行这种努力，他将会悔过并协助调查。”¹⁶⁹ 无论其全面忏悔与改造的努力多么不可或缺，没有外部帮助，费尔德曼无法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为他提供自我构建的模板。自由主义理想——自主自足的自我——在斯大林主义世界中是种罪过。费尔德曼因此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将自我转化为外在之物，使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都能观察和评估。¹⁷⁰

上述案例的核心表明：在整个 1930 年代中期的审讯中，原告语言与被告语言很难割裂。且几乎不可能逃脱官方参照框架：即使坚持主张自己无辜，共产党员囚犯也只能依靠党的价值观来为自己辩护。正如内战英雄、后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的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著名案例所示，囚犯更担忧其定罪可能带来的历史影响，而非个人自我得失。

1917 年，时任莫斯科党委秘书的捷尔-瓦加尼扬策划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旧都的行动。革命蔓延至外高加索时，他在故乡亚美尼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¹⁷¹ 1920 年代，捷尔-瓦加尼扬对理论产生浓厚兴趣，致力于完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他与异端思想的长期纠葛屡次引发麻烦：1927 年（因卷入联合反对派）和 1934 年（因柳亭纲领）两次被开除出党，但均获恢复。基洛夫遇刺后再次被开除，1936 年他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

“在十月那些日子，在街垒战中，在内战期间，我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捷尔-瓦加尼扬对审讯者、国家安全高级少校鲍里斯·别尔曼说，“现在我也不惧死亡。但如果要我签署要求我提供的证词，我必须首先确信这确实是党和革命的利益所需。”捷尔-瓦加尼扬不关心肉体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死亡之无意义性令他震惊。当别尔曼轻描淡写地断言“布尔什维克必须依靠党的最高机关决定”时，他回应道：“亲爱的别尔曼，你是在建议我放弃思考，盲目依靠比我看得更清楚的中央委员会。但问题在于，停止思考并非我的本性。当我思考时，我得出无可回避的结论：指控最老的布尔什维克沦为凶手团伙将给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

捷尔-瓦加尼扬冷静的驳斥削弱了“被告必须放弃个人诚信或党派信念”的预设。就他的情况而言，共产党员的自我理解与个人诚实并非对立，几乎同义。被告坚持认为，他拒签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供词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异端，而是出于忠诚的党的思维，但别尔曼回应称“其推理表明反对派的根源仍深深植根于他头脑中，他已完全忘记党的纪律意味着什么。”¹⁷²

尽管捷尔-瓦加尼扬最初固守良知指令，最终他接受了别尔曼的论点。对共产党员而言，真理唯一来源是党。“确实，审讯中使用的方法，特别是持续数月或数年时，能够摧毁最坚强的意志，”两位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期调查的幸存者写道，“但决定性因素是大多数坚定的共产党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们对苏联的信仰。背弃它超出他们的能力。”¹⁷³或许正因如此，军官乌里茨基（昔日权倾一时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之侄）在1938年4月向审讯者恳求：“我会交代一切并写下所有。我想成为那种协助当局的囚犯。”¹⁷⁴

党外的生活比死亡更可怕。布哈林在法庭上的陈述精妙表达了这种感受：“三个月里我拒绝开口。然后我开始作证。为什么？因为如果至死不悔，死亡便毫无意义。”¹⁷⁵军事学校高级教员罗森堡写道：“我曾全心全意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尽责且忠诚。我[作为法西斯分子]的定罪将是我国常见的过度热情[*peregib*]的结果。虽然我将无法活着见证其实施，我仍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¹⁷⁶

据受害者自己承认，大多数供词是通过“劝说”(*ugovor*)而非肉体压迫获得的。¹⁷⁷内务人民委员部经常诉诸囚犯良知，要求他们为革命牺牲。1938年，一位审讯者对莫斯科共产党人盖莱什说：“我知道笔录中写的一切纯属虚构。但你必须接受指控。国际形势要求如此。”¹⁷⁸审讯托洛茨基分子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时，审讯者如此描述其策略：“我让姆拉奇科夫斯基开始哭泣。当我们得出结论——一切都已失去，希望与信仰荡然无存，唯一能做的是为阻止不满群众未来起义而孤注一掷时，我也与他一同哭泣。为此，政府必须获得反对派领导人的公开供词。”¹⁷⁹在科雷马度过八年归来后，某位穆拉洛夫（与被处决的托洛茨基分子无关）在致斯大林的信中道歉：“我未能抵抗……那位审讯者，他对我说，‘如果你爱党，就必须签署这份调查笔录’，‘我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供词。’”¹⁸⁰即便是代号“雪花”的资深莫斯科告密者，1938年也同意对虚构罪行认罪，以便诱使危险的间谍网络自我暴露：“我盲目相信审讯者，视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落入了他的陷阱。”¹⁸¹

众所周知，并非每位共产党员都被哄骗招供。“我不能、不会、也不应……因加入右翼-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而被定罪，实际上我始终与之斗争，”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1938年1月写道。¹⁸² 工人反对派领袖谢尔盖·梅德韦杰夫自1920年代初便与党的领导层龃龉，也拒绝编造虚假供词。1935年，他拒绝屈尊进行“卑鄙的自我羞辱”(*gnusnoe samooplevanie*)，但也未要求恢复党籍，并非因他对伟大理想幻灭——他仍自述为“列宁的党”的一员——而是因为“斯大林时期的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已使他对党的贡献成为多余。¹⁸³

无论是如大多数人般自责，还是如最激烈的托洛茨基分子般指责党，此类囚犯始终禁锢于共产主义殉道者的框架中。自愿扮演替罪羊角色，为革命牺牲自我。无论这是反对派坚韧的姿态，还是为中央委员会自我贬抑的享乐主义，他终究以英雄之名死去。¹⁸⁴

米兰·昆德拉通过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捕捉到了共产党受审者特有的困境。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案例是“无法承受罪责之重，为求得内心安宁而自愿接受惩罚”。在此罪过寻求惩罚。而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是颠倒的：“受罚者不知惩罚缘由。惩罚的荒谬性令人难以忍受，为求安宁，被告需要为所受刑罚找到理由：惩罚寻求罪过。‘自我归罪’的机器开始运转。”¹⁸⁵

恐怖主义

现在，一位目击者所谓的刽子手与其受害者之间奇特共生关系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当季米特里耶夫和蔡德尔签署认罪书，为他们未曾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时，他们已超越了悬在头顶的警棍：他们要么认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其至少部分行为的解读，要么将供词作为其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后贡献。这并非否认皈依主要依赖于胁迫——肉体压迫、勒索、虚假承诺等等。然而——这正是我论点的核心——每当审讯者与被告陷入话语交锋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地牢里发生的，仍可被描述为皈依。无论皈依原因为何，其意义均源于并嵌入于革命话语之中。

到 1936 年初夏，大多数一年前因与反对派有牵连而被扎科夫斯基流放或关入劳改营的人，已被遣返回原居住城市接受进一步调查。6 月 1 日，一支特遣队将蔡德尔押送到列宁格勒。萨拉托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扎科夫斯基发了一封简短电报：“兹将被捕者移交你处处置。附一袋相关文件。”¹⁸⁶

在列宁格勒，这些材料照例由赖赫曼审查。1936 年他仍只是一名中士，担任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政治处的行动全权代表，正是他签署了必要的文件，将蔡德尔的审前羁押期再延长两个月，“鉴于在逮捕居住于苏联各城市的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所有假定成员之前已浪费的时间。”¹⁸⁷

重申过去的定罪和大规模叛国指控是由莫斯科授意的。高级官员回忆道，指示要求将恐怖主义归咎于每个人，“无论调查期间收集的具体证据如何”。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三处副处长博洛廷证实：“我们被命令从每个囚犯那里获得对恐怖主义的供词。”送交上级批准的弱化版本草案受到严厉批评：“‘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哪里？’我们不断被这样质问。”¹⁸⁸

赖赫曼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顺应新的风向，花费大量时间探究蔡德尔是如何被引向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在其文学性的努力中，审讯小组有时近乎逐字复制了中央委员会描述反对派如何转变为恐怖组织的信件部分内容。当然，这个故事现在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恐怖主义图谋必须个人化。

当被问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起源和活动时，据引述蔡德尔解释说：“我们转向恐怖主义并非一蹴而就，也非独立决定。”他补充道：“我是从捷尔—瓦加尼扬那里得到关于恐怖主义的指示的（我们自 1924 年起就相识……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战友）。我们过去常在莫斯科见面，当时我们都在《*战斗唯物主义者*》编辑部任职。”弗里德兰德收到一封从喀山寄给他的信，捷尔—瓦加尼扬当时在那里流亡，信是写给他和蔡德尔的，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全国会议开幕那天给蔡德尔看了这封信。据报道，捷尔—瓦加尼扬在信中讽刺地指出，与会者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崇高头衔，而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这些“唯一配得上此头衔的人”显然未被邀请。

捷尔—瓦加尼扬在莫斯科被监禁并审讯，他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要求有机会“揭穿这一赤裸裸的诽谤”，并开始绝食以加强其要求。¹⁸⁹ 有一次，他递给审讯者一张用自己的血写的便条；他告知看守者，如果不立即将其转交给斯大林和雅戈达，他将自杀。“那些指控我策划恐怖活动的人才是真正有罪的，”捷尔—瓦加尼扬说。“他们的诽谤卑鄙、可耻、无耻且拙劣；他们的动机相当透明……我凭列宁神圣的名义发誓，我与这些反革命匪徒和食人者的恐怖言行毫无关系。”¹⁹⁰

这两位囚犯被揭露了许多信息——蔡德尔对捷尔—瓦加尼扬的指控，以及捷尔—瓦加尼扬称蔡德尔为“食人者”的描述——但这些认知对他们毫无帮助。当作秀公审的大幕拉开时，捷尔—瓦加尼扬英勇抵抗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他以投降的语调确认，他曾在“1932 年与托洛茨基分子蔡德尔和弗里德兰德讨论过恐怖主义问题……”¹⁹¹

蔡德尔更详细地描述了他与捷尔—瓦加尼扬的关系：

1931 年，我与托洛茨基分子[格里戈里·萨洛莫诺维奇]季米扬斯基[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前哲学教授，当时在基斯洛沃茨克]通过格鲁吉亚军用公路前往第比利斯。我们在第比利斯与捷尔—瓦加尼扬的会面发生在东方酒店的大堂。在餐厅简短交谈后，捷尔—瓦加尼扬提议我们去参观该市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在街上游荡，最终来到了格里博耶多夫墓旁。在那里，墓旁，捷尔—瓦加尼扬向我阐述了他的观点体系，让我毫不怀疑他决心不择手段。

捷尔—瓦加尼扬薄唇紧绷，怒气冲冲：他说灾难正以巨人的步伐大步前进，饥荒正席卷城乡。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没人敢说一句话；最优秀的人被恐吓并驱逐。他接着说，党被堵住了嘴，显得无能为力。斯大林是唯一的统治者，所有决定都由上层强加。捷尔—瓦加尼扬还说，集体化是强迫农民群众加入集体农庄的政策，斯大林只能通过不当的行政手段来克服城乡之间的差距。他补充道，无论如何，即使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也无法挽救国家免于叛乱。斯大林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在将我们推向外国干涉和革命毁灭。

据捷尔—瓦加尼扬所言，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除掉斯大林。为此，他唤起了对历代革命战士的记忆，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详细阐述了——用他的话说——民粹派在斗争中使用的英勇恐怖手段。他说，骄傲地反对暴政的民粹派，随时准备为其理想而死。¹⁹²

这里，黑弥撒被戏剧性地上演：煽动性和好战的反革命分子模仿着前布尔什维克时代的革命团体。他们不仅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替代方案，而且准备公然叛乱。在一座革命者的墓前宣誓加入阴谋后，蔡德尔被反革命领袖们邀请，将自己视为刺杀沙皇的热利亚博夫的继承者。

到蔡德尔提供证词时，革命遗产中的恐怖主义成分已被彻底抹黑。卡冈诺维奇将一家历史期刊上刊登的关于 1881 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文章，解读为“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开始枪杀党的领袖”。¹⁹³ 此外，从基洛夫刺客尼古拉耶夫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恐怖分子的回忆录，并将自己的行为视为过去俄国革命者恐怖主义的续篇”。¹⁹⁴

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确认蔡德尔已将捷尔—瓦加尼扬的指示传递给他的同谋者，并且这个恐怖地下组织——其成员和结构已被如此费力地重构——确实已在列宁格勒建立起来。据称捷尔—瓦加尼扬的指令给蔡德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从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时，我将它传递给了……我知道是托洛茨基组织老成员的个人。在亲密交谈过程中，他们已向我透露了他们对党的领导层的恶意态度，现在他们接受个人恐怖主义的权宜性。”蔡德尔回忆说，1931 年底，作为对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的回应，在列宁格勒形成了一个反对派地下组织：“我们意识到，如果任其自然发展，我们的组织将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吸收更多干部，培养准备与党的领导层进行积极斗争的新一代。”在那些年，领导人“在季诺维也夫派方面是卡列夫和雅科列夫，在托洛茨基派方面是托姆辛斯基、我——即蔡德尔——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马雷舍夫，以及[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赖斯基、[伊萨克·所罗门诺维奇]芬德尔和[阿布拉姆·格里戈里耶维奇]普里戈任”。据称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团体在科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国立物质文化史学院、托尔马乔夫学院、语言学研究所、红色教授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以及语言和思想研究所均有活动。¹⁹⁵

审讯者假装知道他要寻找什么，对他想让蔡德尔回忆起来的内容有所概念。被告必须证实维辛斯基的说法，即托洛茨基已成功地将各反对派分裂团体整合成一个全国性的阴谋集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蔡德尔作证说，“1933年冬天，著名的季诺维也夫派分子谢夫从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谢夫曾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工作。]在普里戈任公寓举行的一次非法会议上……他坚持要求各独立团体联合起来，停止争吵。”¹⁹⁶

被告接着描述了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以召开农民运动会议为由，列宁格勒所谓托洛茨基派学者领导人托姆辛斯基组织了一次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领导层的秘密会议。他吸引了其他城市的代表：“莫斯科由皮翁特科夫斯基、他的三名学生和托洛茨基分子米尔曼代表；巴库由季霍伊克罗夫代表；萨拉托夫由明金代表；斯大林格勒由梅尔松代表；我记不清阿尔汉格尔斯克来的是谁了。”¹⁹⁷ 正式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佩切尔斯基的公寓安排了一次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秘密会议……我详细报告了干部们部署在哪里。”

据称，阴谋者们决定让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佩切尔斯基担任托姆辛斯基的副手没有意义，该组织将从佩切尔斯基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工作中获益更多：“梅尔松提议将他从斯大林格勒调到列宁格勒，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我们的领导人员集中在列宁格勒。”¹⁹⁸

蔡德尔签署的最后一份供词标志着一项大规模抄录工作的完成。蔡德尔几周前称之为“学术会议”的活动，现在被翻译成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峰会”；蔡德尔以前称为“我的同事”和“我的密友”的人，变成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分支机构的“代表”；最初看似与学术晋升有关的日常谈话，已转变为关于“恐怖主义干部”的讨论。

无论是由被告还是审讯者撰写，或者最有可能是共同完成的，蔡德尔的证词确实是一段奇特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在 1934–35 年，忏悔叙述的重点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这些事件在主人公灵魂中引发的精神转变。当然，个人不仅有沉思，也付诸行动，但其行动带来了顿悟、自我发现，并最终走向纠正。然而，当扎伊杰利接受审讯时，那个摇摆不定、自我折磨的主人公让位于一个蓄意、镇定、精于算计的敌人。重复、简单，且与他在共产主义大学时期的忏悔截然不同，扎伊杰利的狱中叙述读起来更像一个廉价的犯罪故事。他和朋友们所做的每件事、所想的每个念头，都别有用心，且是险恶的用心。作为一份罪行编年史而非传记故事，扎伊杰利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证词旨在被解读为一部最能体现其难以置信的邪恶行为的概要集。被告并未表现出怀疑：他几乎没有花任何时间权衡摆在面前各种行动的利弊；他全心全意地从事破坏和恐怖活动，毫不犹豫。诚然，审讯笔录仍显示出对叙事的某种兴趣：扎伊杰利被迫极其详尽地描述他的行为。但故事的重点与追踪灵魂的蜕变过程毫无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官想要记录的只是扎伊杰利堕落的前兆表现。

而这个故事必须丰富、详细，并充满背叛和黑暗阴谋。卷入反革命计划的人数必须尽可能多。因此，审讯者想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究竟是何时联手以及谁参与了哪一方。扎伊杰利回忆，早在 1931 年他就开始与“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派组织的领导人”卡列夫会面。会面并不频繁：“卡列夫只来过我家一次。”¹⁹⁹ 1933 年初卡列夫被捕后，该小组启动了应急计划，由科学院蒙古和太平洋部的副主任雅科夫列夫（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提到的 Kva 的丈夫）接掌：“1934 年 9 月底，雅科夫列夫告诉我，他收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指令，要求对基洛夫实施某种恐怖行动。”²⁰⁰

在所有这些最终审讯中，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一直将扎伊杰利描述为“恐怖地下组织的头目”，而在其证词中，被告却谨慎地避开这一头衔，并始终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指代他人——卡列夫、雅科夫列夫、托姆辛斯基。

据称所有反革命组织都有一个莫斯科或全俄中心以及省级分支机构。这意味着 NKVD 不仅要水平地安排链条中的各个部分，还要垂直地安排。审讯员必须加强列宁格勒阴谋与莫斯科中心之间的联系，追踪信息在城市间的流动，并阐明决定走上恐怖道路的起源。“我最主要的是与弗里德兰德有联系，”扎伊德尔被引述说。“我们在春天 1934 年，在长时间的间歇之后聚在一起。我们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见面，然后，在他的邀请下，去了他的公寓。弗里德兰德告诉我，重要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回到了莫斯科。”

弗里德兰德指的是加米涅夫，当然，还有季诺维也夫，他在编辑委员会工作《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称认为斯大林领导层的软弱，“没有他们就无法维持”，将导致他们重新获得权威职位。当扎伊杰利问他们是否认为可能被邀请加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时，弗里德兰德说这是不可能的：“弗里德兰德告诉我，加米涅夫和泰尔-瓦加尼安让他知道，指望在党内赢得多数将是灾难性的。镇压和攻击注定会继续，迫使我们立即采取决定性步骤来改变局势，以免为时已晚。他们声称，只有精心准备、成功的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才能使我们重新夺回党和政府的领导权。”

两周后，即1934年5月，弗里德兰德重申恐怖手段是权宜之计，并“代表捷尔-瓦加尼扬指示我开始策划在列宁格勒暗杀基洛夫的计划。”当时，弗里德兰德建议扎伊杰利与加米涅夫会面；“我和弗里德兰德一同前往加米涅夫工作的阿卡迪亚出版社，但加米涅夫不在，会面未能进行。”²⁰¹

热心的审讯人员让扎伊杰利做了三份独立的供述，描述了恐怖主义如何成为反对派首选的武器：一个故事追溯至1931年并涉及捷尔-瓦加尼扬，第二个追溯至1932年并涉及卡列夫和雅科夫列夫，第三个则将弗里德兰德和加米涅夫牵涉进1934年的一项决定。尽管距离公审开始仅剩几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证词——因此提供了多种选项。毫无疑问，扎伊杰利的审讯记录是为配合预先设定的叙事而编写的——但就参与官方话语的各方而言，这是一个真实的叙事，将共产主义对恐怖分子及其背信弃义策略的一切论述都包含在内。重要的是被告的本质——而扎伊杰利邪恶的灵魂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罪行在本质上必须是真实的，细节上则不一定如此，审讯人员可以编造出揭示被告心态的供词，即使其内容并非总能得到证据支持。

为了使叶若夫的阴谋论可信，审讯人员让扎伊杰利供认他事先知道唯一已经发生的恐怖行为。“马雷舍夫和托姆辛斯基被指派负责为暗杀基洛夫的恐怖行动做实际准备，”他作证道。“我回到列宁格勒后，告诉了托姆辛斯基关于……这项任务。他说他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我们的谈话，我相信，是在1934年，在托姆辛斯基位于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当被问及为执行暗杀基洛夫的恐怖行动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时，扎伊杰利回答：“我不知道细节。我完全信任马雷舍夫和托姆辛斯基，并且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²⁰²

在整个过程中，扎伊杰利从未承认见过或触碰过武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交锋后，审讯人员问他：“你问过谢德赫他是否有枪吗？”“是的，”他回答，“我问了，他回答说小组有枪。”

在官方打印的审讯记录的这一点上，扎伊杰利划掉了以“是的，我问了”开头的那行，并在旁边手写：“我没有问谢德赫关于那件事；他主动提供了小组拥有必要枪支的信息。”

扎伊杰利愿意作为策划恐怖主义的从犯认罪，但他坚决拒绝承认采取过任何主动。他也与密谋杀害日丹诺夫无关。“我对这样的计划一无所知，”他说。“到 1935 年 4 月 15 日，我已经被逮捕，并于 7 月 20 日被流放到萨拉托夫。²⁰³ 无法再从他身上榨取更多东西了。

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显然对结果感到满意。1936 年 7 月 1 日，雅戈达一份自我祝贺的备忘录被送交斯大林——“关于被捕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的供述”。其中包括扎伊杰利、德米特里耶夫、雅科夫列夫、谢德赫等人的审讯细节。“对这些囚犯的审讯揭示了关于基洛夫遇刺案的新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不为人所知，”雅戈达称。据称现在已确定，除了尼古拉耶夫-鲁缅采夫-科托雷诺夫恐怖小组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巴卡耶夫还在列宁格勒“建立了一系列额外的恐怖小组。雅科夫列夫证实，1934 年 6 月访问列宁格勒的加米涅夫告诉他，科托雷诺夫-鲁缅采夫小组受巴卡耶夫指示要杀死基洛夫，他必须为了保密而避免与该小组接触。”据称，雅科夫列夫在 1934 年 12 月告诉谢德赫，如果他被捕，谢德赫必须联系“托洛茨基分子扎伊杰利”，并指示他“准备对日丹诺夫实施恐怖行动”。备忘录的结论指出了上述证据应如何在莫斯科公审中帮助控方：列宁格勒的调查据称证实了（1）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是针对党的领导层的恐怖活动的关键组织者，以及（2）这三人向调查机关隐瞒了仍在逃的恐怖分子的身份，促使他们继续其肮脏行径。²⁰⁴

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教授群体的调查表现出极大兴趣。内务人民委员部备忘录的第一页有他手写的批注：“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叶若夫和日丹诺夫——你们必须阅读此件，讨论一下，并用心思考其中包含的信息。”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和日丹诺夫收到各自的备忘录副本后，只简短地写上了“已阅[文件]”。莫洛托夫希望“讨论此事”，卡冈诺维奇则要求“思考实际措施”。奥尔忠尼启则立即提出建议：“枪毙这些恶棍吧”（俄语原文：*Nado perestreliat' etu svoloch*）。²⁰⁵

另一份秘密中央委员会信件，标题为“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总结了新发现的情况；它于1936年7月29日发送给所有党组织。信中指出雅戈达据称未能追究反对派分子其罪行的责任，如果雅戈达知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中心之间存在极佳的联络，这种疏忽就不会发生。然而，多亏了叶若夫的辛勤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部最近获得了充分证据，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间接煽动恐怖主义，而且实际上直接下达了暗杀基洛夫的指令。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说法，周密的计划将本土的反革命分子与苏联国家的外部敌人联系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中心的领导们不仅与……苏联政权的愤怒敌人联合起来，而且成为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托洛茨基从国外派遣了受信任的特工，指示他们在苏联境内激活恐怖组织。”而据称加米涅夫曾讽刺地评论说：“脑袋的性质是长不回来的。”这封信风格有些不寻常且极其血腥，包含了最近对主要反对派成员审讯中的精选段落。他们令人恐惧的供词为即将在莫斯科第一场清党审判中提出的离奇指控，预先在党的基层中做了铺垫。

在其供词中，据说加米涅夫“勾画了两种夺权方案。第一方案：斯大林遇刺后，党未察觉我们的两面角色，原谅了我们的错误，并与我们进行谈判……第二方案：斯大林遇刺后的混乱迫使现任领导层要么下台，要么与我们分享权力”（加米涅夫审讯记录，1936年7月23-24日）。

学术教职人员也被提及，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卡列夫的名字在全国范围内被诋毁。卡列夫曾供认收到季诺维也夫的命令，“在我的学术同僚中挑选……能枪击基洛夫的人”（卡列夫审讯记录，1936年7月5日）。中央委员会的信件还谈到了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托洛茨基分子扎伊杰利”以及其他未具名的学者计划刺杀日丹诺夫。²⁰⁶

如果说几年前学者们还被指控是“无意中”加入了反革命组织，那么卡列夫、扎伊杰利及其同伙——全是共产党人——则必定是完全有意识地行动。²⁰⁷因此，

对扎伊杰利的指控于 9 月 3 日被正式“重新分类”：现在他被指控违反刑法第 58-8 条（“针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恐怖行为”），这意味着他的罪行必须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的严酷法律进行审判。²⁰⁸

反革命活动的感知增加引发了内务安全机关的人事更替。叶若夫于 1936 年 9 月下旬接替雅戈达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同时保留其党中央书记和党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然而，政治局要求他应“将十分之九的时间投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²⁰⁹ 卡冈诺维奇在 9 月 30 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给奥尔忠尼启则：“叶若夫的任命是我最后的消息。我们父亲（斯大林）这个绝妙、明智的决定来得正是时候。”就连他未来的受害者布哈林，也认为叶若夫是个“诚实的人”。²¹⁰

任命之后，叶若夫开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用自己的人替换雅戈达的部下。随着叶若夫的到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几乎翻了两番。²¹¹ 这些从党机关和党校政治培训学校招募来的新成员，被指示对待囚犯要更严厉——叶若夫承诺他们可以免责。²¹² 新指控严重性的升级，必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说服力的升级。托洛茨基分子的图谋如此巨大，雅戈达的反间谍网如此漏洞百出，以至于时间至关重要。²¹³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接受例行简报，其中模糊地描述了刺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科西奥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计划；调查人员被敦促“熟悉大量承认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证词；他们应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法律思维。”“你对材料的分析必须得出尖锐的政治结论，”维辛斯基敦促道。²¹⁴

叶若夫写信给斯大林，谈到了一个为审查已逮捕人员名单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挑衅者”和“恐怖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被归入第一类——处决。那些知道恐怖活动却未向当局告发的人被归入第二类，面临十年监禁的前景。“我们将不得不枪决相当数量的人，”叶若夫警告斯大林。“我个人认为这是必要的一一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了结这件肮脏的事情。”²¹⁵ 最终，不少于 160 名老布尔什维克因与第一次莫斯科表演审判中所涉及的“恐怖阴谋”直接相关而被枪决。²¹⁶

为了证明向质变性的新镇压形式过渡是正当的，1936 年秋天，对灵魂的诊断发生了又一次剧变：随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继续将共产党人牵连进最严重的罪行中，它增加了蓄意恶意的新指控。²¹⁷ 现在假定在反革命世界里，意图与行动、言语与现实，终于相遇了。这种融合的后果被认为是可怕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梦想恐怖，不仅策划恐怖阴谋或恐怖企图的计划，不仅准备犯下这些肮脏的罪行，”维辛斯基在表演审判上说。“他们犯下了这些罪行。他们开枪杀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反革命理论转变成了反革命的恐怖实践。”²¹⁸ 所有关于精神改造的言论都被诅咒，那些被指控为反对派的人被要求为自己的罪行亲自负责。逮捕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从 1935 年的 5,068 人，上升到 1936 年的 23,373 人，然后在 1937 年跃升至 56,503 人。²¹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且与这种共产主义诠释学的转变相关，夜间敲门声开始紧随清党之后出现，处决成为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²²⁰

共产主义大学的一场阴谋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世界里，反革命活动从未停歇，一刻也没有。在一系列逮捕之后，恐怖活动可能有所放缓，但从未完全停止。如果扎伊杰利被捕并流放，就有其他人冒出来接管。那个留在列宁格勒，据称负责实际实施刺杀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人是德米特里耶夫，幸运的是他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拘留。²²¹ 在扎伊杰利第二次被捕时从他身上搜出的通讯录中，出现了德米特里耶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扎伊德尔否认曾与这个人亲近：“我在 1929 年或 1930 年左右得到了德米特里耶夫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编辑部有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德米特里耶夫是一位哲学家。”²²² 德米特里耶夫是一位经济学家，不是哲学家，尽管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倾向于将他——以及扎伊德尔，据称对其下属的活动佯装不知——简单地视为恐怖分子。

德米特里耶夫的最后几次审讯将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案的故事更新至当时。在年龄和理论声望上，德米特里耶夫次于扎伊德尔，当更大的人物被流放时，他留在了列宁格勒，这使他更容易被牵连到针对基洛夫继任者的所谓企图中。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中，德米特里耶夫的转变将他呈现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反革命分子，于 1930 年加入了一个颠覆性组织。据他的证词，回到列宁格勒后，他与曼德尔施塔姆和列宁格勒中心的其他成员重新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过去曾与一个托洛茨基组织合作，他们开始来我的公寓拜访。”但与扎伊德尔一样，一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员开始提出尖锐的询问，一场回避的游戏就开始了：

审讯员：你们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德米特里耶夫：在群众中传播托洛茨基主义观点。

审讯员：还有呢？

德米特里耶夫：贬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审讯员：还有更多。你没有提到你们组织的主要目的。

德米特里耶夫：除了我已经说过的，我还可以提到坚定不移地、系统地煽动对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斯大林的恶意和仇恨。我们编造了各种反革命的诽谤和其他谎言——我早些时候作证过。关于斗争方法，我不知道其他事情了。²²³

如果笔录可信的话，这种争执持续了数小时。当审讯员要求德米特里耶夫承认他在刺杀基洛夫以及刺杀日丹诺夫和斯大林的计划中的角色时，他的要求仍然是半吐半吞、含沙射影、拐弯抹角的，而德米特里耶夫拒绝理解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审讯员步步紧逼，被告没有空间重新解释事件的意义或事件中个人的角色——所有这些都被他的捕手刻在了石头上。

对于关于他与曼德尔施塔姆——被认定为“基洛夫刺杀案的参与者”——会面频率的棘手问题，德米特里耶夫回答：“在 1930 年到 1934 年 2 月之间相当频繁。但在 1934 年 3 月和 4 月，我在莫斯科。从 5 月到 11 月，我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可以根据存放在苏联财务管理办公室的... 财务报告... 以及共产主义大学会计师的帮助来确认我的行程。”²²⁴ 从这一系列的日期和地点中，被告正在构建一个不在场证明。“我几乎整个 1934 年都不在，”德米特里耶夫总结道。“请核实这一点。”

经过润色和打字的笔录并不完全流畅；文本赋予了德米特里耶夫一个独立的、尽管微弱的声音。（“不，我否认这一点，”他在某个时刻说；其他“不”随之而来。）面对默示的抵抗，审讯员变换了他的问题，使它们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详细。最终，他攻击了被告盔甲最薄弱的地方——他与已被定罪为恐怖分子的人密切的工作关系。一旦审讯员让德米特里耶夫承认他不仅仅是表面上熟悉恐怖分子，而是真正与其中一些人亲密，他就设下了陷阱。

这里，审讯员基于德米特里耶夫的供述，即在 1934 年 3 月、4 月和 11 月，他不断从莫斯科返回列宁格勒，“每次停留一周或一周半。”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声称，正是在那时，他策划了针对基洛夫的阴谋：

审讯员：在这些停留期间，你们组织的哪些成员在你的公寓里？

德米特里耶夫：除了我的兄弟 N. 德米特里耶夫，没有别人。

审讯员：那不是真的。

德米特里耶夫：我记得采特林——列宁格勒共青团前书记——也来过。

雅科夫·谢苗诺维奇·采特林在 1934 年与曼德尔施塔姆和列宁格勒中心的其他成员一起被定罪为恐怖主义。“我的兄弟，”德米特里耶夫供认道，“过去常说他是一个活跃的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和有才华的人。”被告声称他与采特林几乎不熟悉。至于后者是否是组织成员，“这个尼古拉没有告诉我。”

审讯员：你所说的是一派谎言 采特林怎么可能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来你的公寓？

德米特里耶夫：他和我兄弟一起来的。

审讯员：你知道他要来吗？

德米特里耶夫：不。

审讯员：你的兄弟怎么可能没有警告你他要带采特林来？他通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德米特里耶夫：是的，这很常见。

审讯员：所以你的公寓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的聚会场所。你承认这一点吗？

德米特里耶夫不得不将自己钉在审讯员呈现给他的选择的角上：要么承认恐怖分子定期拜访他的公寓，要么承认他的兄弟破例请求他许可带一个恐怖分子回家。德米特里耶夫让步了。“是的，”他说，“在我的知情下，我的公寓是一个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领导成员的聚会场所。组织选择它是因为党不知道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不同，德米特里耶夫更倾向于牵连自己而不是他的兄弟：“老实说，是我而不是我的兄弟首先提出了恐怖主义问题：我向他传达了曼德尔施塔姆告诉我的关于国家和党情况的粗略图景。尼古拉问我我认为什么措施是权宜之计。我回答说，移除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当他问我如何时，我解释说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尼古拉没有回应。”²²⁵

当他试图稍微反悔并否认知晓任何具体的暗杀计划时，德米特里耶夫被驳回了。“你与基洛夫的刺杀者们有多年的联系，”审讯官断言道。“你不可能不知道恐怖活动。”²²⁶ 最终，德米特里耶夫被逼出了供词：他的朋友们，曼德尔什塔姆和列文，“系统地培植了恐怖主义态度。曼德尔什塔姆告诉我们，在斗争中我们必须不择手段。1932 年，列文也在他的共产主义大学办公室里谈论恐怖主义……我同意他们；像我这样一个顽固的托洛茨基分子，带着富农般的顽固抵抗精神，不禁感到积极反对党的时机已经到了。”²²⁷

德米特里耶夫证词的最后部分让我们得以重构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日常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 1936 年夏秋之际是如何被病态地重新解读的。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说法，托洛茨基叛国思想的种子在这座官方学术堡垒里找到了沃土。仿佛是为了补偿审讯官在其他问题上的固执，德米特里耶夫慷慨地描述了基洛夫遇刺后地下组织的运作：“在三个月，也许三个半月里，我们深深潜伏，希望熬过镇压浪潮。然后我们又开始活动了，尽管现在谨慎多了，见面频率也降低了。”²²⁸

他进一步作证说，1934 年 12 月的逮捕之后，扎伊德尔成为了反革命组织的头目；而当他被流放后，由一位杰出的爱沙尼亚共产党人、斯莫尔尼区委委员赖恩戈尔德·伊万诺维奇·伊扎克接替了他。德米特里耶夫承认他和伊扎克关系密切：“我们达成了默契，我与我兄弟之间的反革命联系将保持隐蔽。普雷德知道这个协议。”²²⁹

考虑到他在大学里的好名声——伊扎克担任普雷德的副手——他于 1936 年 5 月 27 日被捕在周围引起轩然大波，这毫不奇怪。²³⁰ 他最近的个人鉴定反映了他所受到的尊重：“自 1917 年 3 月起成为共产党员的伊扎克同志稳重、警惕且思想坚定。”根据最近揭露的情况，鉴定中的一些句子被重重地划了线，页边出现了粗大的问号。匿名批注者特别不满意的是，先前指控伊扎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草率处理；一条旁注将这些指控描述为“被轻率地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²³¹

共产主义大学中另一位被德米特里耶夫协助揭露的显赫人物是西方史学家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据称是伊扎克在 1933 年或 1934 年将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拉入了阴谋。”多年来，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一直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因在其母国保加利亚参加共产党起义而入狱，他设法越狱并于 1925 年 11 月抵达苏联。表面上看，这是一位模范学者，被委以共产国际史讲席教授的职位。然而，据德米特里耶夫说，“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积极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层，特别是反对季米特洛夫。”²³²

他在 1935 年收到指控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的材料时，“伊扎克仍让他留在大学。”最终的揭露必须等到托尔马乔夫学院讲师、保加利亚政治兄弟会秘书博恰罗夫出面指控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是“托洛茨基主义、左翼宗派集团的积极支持者，该集团试图在保加利亚移民中诋毁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普雷德指示大学党委“仔细审查博恰罗夫的陈述”，但他手下的人行动太慢：几天之内，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监禁。²³³

在 1936 年 10 月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德米特里耶夫在长长的共产主义大学反革命分子名单上又增加了最后两个名字。米哈伊尔·西多里维奇·巴拉尼克，苏联建设系主任，自 1936 年 5 月 27 日起一直在狱中。²³⁴ 德米特里耶夫曾是承认巴拉尼克清白党纪记录的人之一：“巴拉尼克从未加入反对派，”德米特里耶夫签署的一份个人鉴定写道。“自 1930 年来到共产主义大学以来，他在社会政治工作中表现出色，并积极参加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²³⁵ 现在德米特里耶夫却要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932 年，巴拉尼克尖刻地表达了他对清洗由潘秋欣、费德琴科和季米亚纽克领导的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不满。‘党内充满了恶棍 [derzhimordy]，’”据称他当时说道。“‘现在你连一句话都不能说，否则就会有人对你作出‘组织结论’！’”在这个叙述中，巴拉尼克在所有决定性关头都选错了立场。例如，1934 年 12 月，他散布了质疑官方对基洛夫遇刺解释的“诽谤性谣言”。²³⁶ 审讯者还收到提示，要调查巴拉尼克在 1935 年 1 月宰杰尔受审时为其辩护的动机。²³⁷

与巴拉尼克同日被捕的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叶列缅科是共产主义大学农学系主任。德米特里耶夫声称，叶列缅科“否认斯大林作为理论家的贡献，并故意将其著作排除在课程之外。”²³⁸ 他还隐约记得一些大学里的闲言碎语：叶列缅科曾因集体化期间的“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但最终获得赦免。²³⁹ 无论是在审讯者的暗示下还是出于自身主动，德米特里耶夫并没有急于将巴拉尼克或叶列缅科描述为恐怖分子同谋。这两位讲师与所谓阴谋的核心成员关系过于密切，无法保持自由，但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惩罚较轻：只被判在劳改营服刑八年。²⁴⁰

然而，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称，德米特里耶夫、巴拉尼克、叶列缅科以及共产主义大学的大多数教职员都以某种身份参与了据称由宰杰尔领导的地下网络。通过唤起黑弥撒的意象，内务人民委员部因此在列宁格勒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金字塔，其基本结构遵循了 1930 年代中期苏联存在的党组织架构。托洛茨基本人从国外指导反革命活动；在苏联国内，他得到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的协助。该恐怖组织据称在莫斯科设有全国中心，通过特选的信使向列宁格勒发出恐怖指令。指挥链是等级森严且秘密的：只有当恐怖分子感觉到他们即将被捕时，才会将宣传材料和炸药移交给他们的继任者。

黑弥撒的逻辑远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执念，实际上它渗透到了大众的想象中。许多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相信他们被阴谋者所包围。可以考虑一下某个瓦年科在 1936 年 9 月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信中将反革命的支持者描绘得尤其狡诈。瓦年科想象伪装的反革命分子威胁着随时要接管权力：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一个秘密中心，拥有自己的人事部门和秘书处。这些机构一定已经完成了对其忠实、可靠的追随者和下属的部署。托洛茨基分子希望把持最重要的职位。他们不仅被发现在中央政府……还担任区委书记、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报纸编辑、宣传员……工厂经理和工会职员。显然，在我们的领导人被刺杀之后立即或次日，所有那些叛徒和挑衅者（其中大多数人的身份我们至今未知）……将在他们的人以及普通工人和职员群众中开始煽动。所有反对他们的人将被清除，必要时会被枪决。是的！这不是幻想，这本可能成为

现实。对于托洛茨基分子来说，没有细致的准备，没有武器装备，这样的冒险是不可想象的——秘密中心不会允许，因为它不愿意冒被揭露和摧毁的风险。显然，公开和秘密的中心知道什么人会被提名担任什么职位，尤其是在早期阶段。他们事先考虑了人民委员会的新组成，当然，还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新组成。²⁴¹

正是对布尔什维克实践的蓄意颠倒，赋予了黑弥撒根本上的异端性质。完全独立的仪式不会有同样的刺痛感。诚然，“非政治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重视公共自我而非私人自我。只有在私下里，隐于办公室时，他们才认真交谈。这样的人只是不知道党内生活的优点。一剂启蒙良药肯定能让他们看到光明。

但德米特里耶夫及其两面派朋友则不然。他们是党内的闯入者，知道所有需要知道的事情。他们邪恶的同志情谊并非资产阶级过去的遗物，而是一个活跃的托洛茨基主义阴谋。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受险恶意图而非天真所驱动，被捕的共产主义教员是反革命黑弥撒最危险的实践者。“托洛茨基领导人远非愚蠢，”瓦年科指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有时甚至受过外国培训。”他们利用各种黑话、背叛和欺诈来诱捕潜在的皈依者，复制官方媒体使用的革命话语。剥夺党的权力的计划要求反革命分子在人民面前以马克思的真正诠释者自居。瓦年科之前曾向斯大林强调写道：“托洛茨基分子形形色色。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设法用挑衅性语言 [*provokatorskii iazyk*] 诱惑学生、工人和红军士兵。欺骗党员和劳动者——他们私下称之为‘轻信的傻瓜’ [*Ivanushka-durachek*]——托洛茨基主义意识形态分子试图制造他们拥有群众支持的印象。”²⁴² 与其想象的对手进入激烈竞争，看谁能从同一群会众中赢得更多灵魂，斯大林主义的警惕者必须赢——否则革命就会失败。

审判与判决

随着八月份第一次公审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广泛宣传的处决告终，被监禁的教职员工的处境变得毫无希望。斯大林 9 月 25 日的“索契电报”和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推动了对这些教职员工活动的全面重新评估。²⁴³ 中央委员会现在声称它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多么愚蠢地宽容。在其 9 月 29 日的《关于处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的决议中，它要求消灭所有幸存的反对派分子。²⁴⁴

在总结调查时，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认已查明恐怖集团“是根据统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指令进行其犯罪活动的。”²⁴⁵ 据称，该恐怖组织是在卡列夫和雅科夫列夫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那里收到指令，以及宰杰尔从捷尔-瓦加尼扬那里收到指令后复活的。列宁格勒的统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包括其季诺维也夫派系的卡列夫、雅科夫列夫和马雷舍夫，以及其托洛茨基派系的宰杰尔、托姆辛斯基、普里戈任和佩切尔斯基。通过德米特里耶夫，该恐怖集团联系上了尼古拉耶夫，后者于 1934 年 12 月刺杀了基洛夫。

起诉书进一步声称，此后不久，由宰杰尔领导的恐怖集团开始准备刺杀日丹诺夫，大部分工作由共产主义大学的人员完成：佩切尔斯基联系了奥尔洛夫——表面上的刺客——他是由另一位共产主义大学教授马泽尔招募入该集团的。²⁴⁷ 引用了奥尔洛夫 1936 年 8 月 28 日的证词，大意是“佩切尔斯基认可了恐怖行动计划，给了我一把纳甘左轮手枪，并告知我日丹诺夫将抵达乌里茨基宫。”根据这个剧本，刺杀列宁格勒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本应在共产主义大学的校园内进行。²⁴⁸

初步调查结束。“根据其本人供述，”宰杰尔被指控作为列宁格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实施了刺杀基洛夫的行动。²⁴⁹ 德米特里耶夫被指控“亲自参与刺杀基洛夫”以及“在盖世太保的帮助下准备其他恐怖行动。”²⁵⁰

表面上，法律程序的细节被小心翼翼地遵守。在审判开始前，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收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所有与案件相关的材料。被告从内部监狱被带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被要求确认他们所签署的供词。在这个形式完成且证词得到确认后，他们被带回监狱牢房。1936 年 10 月 8 日，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翻阅了列宁格勒的材料后，决定“宰杰尔的案件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调查。”宰杰尔被多给了六个月的生命，他的证词将在第二次莫斯科公审中使用。

对另外七名“阴谋者”——德米特里耶夫、托姆辛斯基、马雷舍夫、佩切尔斯基、奥尔洛夫、戈尔洛夫斯基以及另一位教员伊兹拉伊尔·莫伊谢耶维奇·梅拉梅德——的审判，在他们的调查结束仅几天后进行。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 1936 年 10 月 11 日召开闭门会议。²⁵¹ 出席者有首席法官乌尔里希、另外两名军事律师、一名书记员、军事警卫以及被告，所有七名被告均由警卫看押。听证会很简短：凌晨 3:25 开始，5:00 休庭。

乌尔里希宣布诉讼程序的依据是 1934 年 12 月 1 日的法律，该法律剥夺了被告获得“公诉人、辩护律师或证人”的权利。在宣读了他们的权利后，没有被告对审判的性质提出任何异议。接下来，主席核实了被告的身份。当他随后询问每个人是否完全理解对他们的指控——所有人都肯定回答——时，法院强调它评估的是个人灵魂。当书记员询问被告是否认罪，想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时，斯大林的司法系统显示它并未完全失去对话的兴趣。²⁵² 此外，尽管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几乎完全相同，但控方的总结还是重复了每个案件的所有细节；法律系统拒绝将自己视为集体判决。（当斯大林审阅死刑判决名单时，据报道他曾惊呼：“最终，每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²⁵³

他们一生中的任何经历，都未曾为被告们准备好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处境。过去在党的会议上被指控时——德米特里耶夫于 1929 年因其在中国的放荡行为被北满党组织严加盘问，戈尔洛夫斯基则于 1924 年被区委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1935 年再次如此——他们总能在听众中寻找支持者。可能有人敢为他们辩护几句。如今他们却完全孤立无援，被普遍抛弃。将党会议的空间符号布局与军事法庭审判的空间符号布局加以比较，也揭示出显著的差异。在法庭上，面对被告的不是他们的同志，而是律师——一个专家小组。法官们就坐在被告正前方，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评判被告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这里，诠释学披着科学和正当程序的外衣出现，而非集体直觉：只有那些拥有认知权力的法官，才被赋予随时观察被告的权利。在作秀审判期间，公众位于法庭后方；而在当前这个案子中，由于是军事法庭，公众则完全缺席。²⁵⁴

这并不意味着被告被禁止发言。他们确实发言了；他们每人都被期望进行简短的陈述，其中多数人是以一种可怜的形态这样做的。这些注定赴死的人完全顺从：极少听到抗议或怨恨之词，被告们对他们更新的传记中充斥的大部分罪行（即使不是全部）都供认不讳。笔录仅记载了被告愿意承担责任的程度上非常细微的差别：托姆斯基“完全认罪”；德米特里耶夫（与佩切尔斯基和马雷舍夫一起）只是“认罪”；而戈尔洛夫斯基仅“部分”认罪，坚决否认直接参与恐怖行为。但戈尔洛夫斯基的罪责很快被证实：主审法官直接宣读了扎伊杰尔和普里戈任证词中牵连他的那些部分。证人对质笔录提供了额外的证明：马雷舍夫和托姆斯基分别在不同场合与戈尔洛夫斯基当面对质，他们讲述的情况被法庭认为足以定罪。²⁵⁵

接近尾声时，被告们被邀请作最后陈述。叙述的弧线总是相同的：这些未遂的恐怖分子宣布他们预料到最坏的结果，并将衷心接受应得的惩罚。德米特里耶夫宣称：“我将完全公正地接受任何判决。”梅拉梅德“乞求宽恕”。戈尔洛夫斯基提醒法庭，“我的惩罚应与我的罪行相称。”奥尔洛夫悔恨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而佩切尔斯基则声称他“对法庭没有更多可说的了”。²⁵⁶ 尽管他们坚决认同自己的罪行应当处死，其他被告还是恳求给予第二次机会，诉诸于马克思主义 *母题*——道德重生。仿佛深受罪责折磨的马雷舍夫承诺道：“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尽一切可能赎我骇人的罪行。”托姆斯基也请求饶其一命。

被告们试图将忏悔、悔改和重新融入社会的三重范式引入斯大林主义法庭，这一范式在早年革命时期的模拟审判中曾非常有效。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范式本身已被截断：其第三个也是关键的部分——宽恕并回归被选中者的兄弟会——已经过时。”从被告的最后陈述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些人如何试图操纵人民的感情，“普列杰在共产主义大学评论在莫斯科受审的反革命领导人时指出，“当然，没有人被欺骗。”²⁵⁷ 如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法律神话叙事部署了关于迷途灵魂得以改造的故事——法庭对那些愿意放弃反革命行为的人抱有同情——那么现今的法庭则忽略了被告们寄予希望、可能给他们一线生机的戏剧性手段。²⁵⁸ 如果说在 1930 年代初，罪行很大程度上被医学化，被告必须被隔离以防传染，那么现在他们则被宣布为“狂热地不妥协的”（*iarostno neprimirime*），必须被消灭。²⁵⁹

法官们退庭进行简短讨论。当他们回来时，主审宣布了判决。每份判决在档案中都是一份单独的、手写的文本，仅有两页长。这些判决大量借鉴了检察官的概述（毕竟没有辩护），单调地宣布每位被告“在此被判处最严厉的惩罚——枪决并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判决“不得赦免”；其执行必须是“立即的”。

²⁶⁰

一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门负责人舍韦列夫签署的最终文件，至今仍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找到。内容如下：“关于德米特里耶夫[名字手写插入标准表格]的判决已于 1936 年 10 月 11 日在列宁格勒执行。”²⁶¹

关于实际处决的材料很少。我们确实知道，在 1936 年，当受害者数量还相对较少时，枪决发生在“大楼”（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的地下室。一位名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负责执行死刑判决的“武装小队”队长，在 1991 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透露了一些细节：“敌人被昼夜不停地‘加工’（*pererabatyvat*’）。我们将囚犯一个个带进刑室，让他们面朝墙壁。刽子手几乎抵近射击。他伸展手臂，这样就不需要第二颗子弹，朝后颈开枪。然后，‘腐烂的渣滓’（*trukhliatina*）被扔进专用电梯。电梯装满后，我们将其升上去，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夜间开走运走尸体的卡车里。”同一位消息来源指出，地下室配有下水道，但血量常常大到必须中断处决并使用水泵。根据当地传说，一条地下管道将血排入涅瓦河，就在利捷伊尼桥旁——现今举行纪念仪式的地方。²⁶²

过分强调这些杀戮的任意性会不得要领。虽然 1937-38 年的大规模处决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授权的，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这里的死刑判决负责——这是一个司法机构，而非行政机构，严格在苏联法律体系的框架内运作。²⁶³ 尽管斯大林主义司法体系具有严酷的特征，它在 1936 年为其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没有人未经审判就受到惩罚，即使德米特里耶夫及其所谓同谋的审判似乎是敷衍了事且极不公平的。²⁶⁴ 案件经过了调查，有时长达数月之久，厚厚的起诉卷宗和审讯笔录用了大量纸张。诚然，法律活动的理论前提是特别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受个人权利概念指导的资产阶级司法，其自身目标是限制国家权力，那么苏联法律主要关心的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免受反革命阴谋的侵害。这种法律并不保障被告的人身不可侵犯性，没有提供可靠的机制来让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²⁶⁵

• 3 共产主义大学的混乱

群情激愤：基层对逮捕的反应

从官方角度看，党的忠实信徒对中央委员会每一项公告所表现出的热情，极好地证明了他们已准备好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必视为强迫：这些超凡人物的历史洞察力，使他们处于独特的位置，得以在他们自己眼中也对被称为“无阶级社会”的历史高峰发起最后冲击。内务人民委员部清洗活动的加强，未必被普通党员视为他们必须适应、但无需认同的事情。毕竟，清洗是共产主义实践的核心——没有将异己分子驱逐出被选中者的兄弟会，就不可能有胜利。党委要求学生必须保持警惕并揭露他们中间的敌人，这是有道理的。学生发言的核心部分可以找到直接引用官方报刊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公告的内容。这并不意味着公开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不真实，而是斯大林主义已被证明足够有效，渗透到了日常语言中。很少有人能跳出当时的语言，发明他们自己的隐秘语言。学生不能说的，他们也几乎想不到。

或许不如基洛夫遇刺事件那样震撼，但 1936 年 5 月至 6 月的事件对共产主义大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学生们和教师们第一次看到“列宁格勒反革命的指挥部就在这里”。¹ 许多人被捕，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被揭露为敌人的那些人的地位：“我们必须强调，”党委指出，“这里谈论的是我们的两位副校长，两个系的系主任，以及我们研究生院的院长！”² 不仅没有人丝毫预料到逮捕即将发生，而且其发生本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被当作“谣言”。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争取时间追查被捕者的社交网络，暗示说失踪的要员们是“休假去了”。³ 六月初，鲍里斯·普列姆和大学党委的其他人仍蒙在鼓里：“我们还没有获得我们需要的具体信息，来理解被捕者究竟做了什么。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是，一个反革命团伙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⁴

当 1936 年 7 月头四天举行的中央全会结束时宣布了新宪法——被吹嘘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逮捕浪潮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弥赛亚式背景中。⁵ 斯大林在第八次非常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赞扬宪法的讲话广播，对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具有特殊意义。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学生在大学俱乐部里收听了被放大的新秩序。⁶ 计划开设九门不同的课程来研读这份重要文件，内容基于莫洛托夫的文章《关于苏联宪法的修改》以及斯大林接受罗伊·霍华德采访的文本，其中领袖对新时代作了评论。宣传员们承担了诸如“1924 年至 1936 年间苏联生活的变化”和“新宪法与苏联民主的繁荣——一项针对法西斯主义的复兴行动”等主题。⁷

每一个新闻机构，每一位大学宣传员都宣布，斯大林宪法的颁布是苏联历史上的分水岭事件。⁸ 当他们听到“无阶级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苏联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时，学生们认为，争夺未来的竞赛已经结束，历史已被打上了最后的句号。⁹ 六月下旬一次出席人数异常众多的大学会议一致认为，“宪法草案是一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件。”¹⁰ “人对人的剥削”现在可以被宣布为过去的事情了。¹¹ 普列杰斯断言：“斯大林宪法是世界上尚未见过的事物。想想看，自列宁的《劳动者权利宣言》以来，我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就在一年多前，学生宣传员们还可以说，“苏联有两个主要阶级：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¹² 现在，阶级被宣布“基本消灭”。无产阶级没有被废除，而是被超越了一——苏联工人已经蜕变为斯大主义的新人，一种“道德水平提高”的生物。¹³ 涉及阶级斗争的期刊在 1936 年年中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庆祝后历史意识的其他出版物。¹⁴

新宪法在 1917 年的“已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未然”之间开启了一种最终的调解——必须把握这一点，才能理解官方关于先锋队与普通群众关系的路线。斯大林已经宣布共产主义的第一批基石已经奠定，这意味着基层在许多方面已经赶上先锋队，党的领导人不能再表现得好像他们在引导盲人。¹⁵ 既然同志们经历了如此值得庆贺的意识飞跃，党内民主就不能再被缩减。¹⁶ 日丹诺夫认为，定期的党组织会议、机构选举和干部提拔必须保证领导对基层的“责任”和“问责”。¹⁷

无阶级社会虽然近在咫尺，却仍然在拐弯处。¹⁸ 根据党的宣传员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经济和意识中一些资本主义残余依然存在”。¹⁹ 新宪法将苏联社会划分为两个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一个知识分子阶层。²⁰ 红色教授学院的特罗伊茨基在 7 月表示：“虽然阶级之间不再有矛盾（*protivorechiia*），但阶级之间的差别（*razlichii*）依然存在。”²¹ 一个既单向又封闭的末世时间框架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使从一点到下一点的最短距离，其长度上也有无限个中间站点，因此可以无限延伸。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在社会主义当下与共产主义明天之间的鸿沟上发展起来。正如党的主要理论家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不存在阶级……但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按其贡献获得报酬，而在共产主义下，则按需分配。”与此同时，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只需要成熟起来。”²²（共产主义大学曾计划在 1936 年春季召开一次会议，旨在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异。鉴于迪米特里耶夫和伊扎克本应是主要发言人，该计划未能实现也就不足为奇了。）²³

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一场额外的、最终的战斗。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否定了渐进发展的观念。党的活动家们一再宣称，和平的圆满结局是不可能的：苏联每向完全平等迈进一步，反对力量就随之加剧。任何愚蠢到——或狡猾到——声称完全和平时代已经到来的人，都必须受到谴责。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的“必须放下阶级斗争旗帜”的路线据称是为了削弱警惕性，而莫霍夫则因说“在我们国家，几乎没有理由让反列宁主义的派系集团继续活动”而受到谴责。²⁴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来自内部敌人的威胁加倍了。²⁵ 普雷德恳求大学的学生们牢记，政治局势已变得“更加紧张，因为我们那已彻底绝望的敌人会对我们采取绝望的行动。”²⁶ “当所有人都在赞扬新宪法时，”宣传人员在他之后重复道，“被击败的政治团体的残余仍在潜伏。”²⁷ 新一轮的战争与革命，这部末世史诗的高潮及其最严峻的时刻，正迅速临近，任何在关键时刻可能不团结在党的周围的人都必须被识别并清除。²⁸

赞扬“识别最微弱的反党风向的能力，无论其来源如何”，党的活动家们将警惕性加冕为“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品质”。²⁹ 大学期刊向学生读者敲响警钟：“保持火药干燥！无情地对待敌人。”³⁰ 希望理解新宪法历史意义的学生必须记住“列宁和斯大林同各种偏差斗争的关键时刻”。³¹ “新宪法要求我们行动更加警惕，而不是更少，”雷姆尚强调道。³² 新闻界支持她：“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引导群众的活动，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觉悟、主动性和政治敏锐性。”³³

将“党内民主”描述为斯大林主义的表现特征，而将“党内警惕”描述为其压制性的一面，这很有吸引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虽然两种处在侧重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张力是由当时的话语所调和的。党的报刊毫不掩饰地表明，清洗和演讲是相辅相成的——对布尔什维克公共领域同等重要：只有纯洁的人才配拥有发言权。1936年学生正在阅读的理论文章标题——《莫斯科审判与苏维埃民主》和《阶级的消灭与社会主义》——足以说明压迫与启蒙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³⁴ 苏维埃民主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截然不同，正如党的发言人不断重申的那样。³⁵ “我们的民主，”他们强调说，“是人民的专制。”³⁶

一部新宪法意味着重新思考被选者的兄弟情谊，特别是兄弟情谊成员之间的互动。普雷德向他的信徒传达了这一挑战：“我们的党会议必须在尽可能高的意识形态水平上进行，进行生动而引人入胜的辩论。同志们必须学习‘演讲的艺术’。”³⁷ 显然，教训被吸取了：1936年6月共产主义大学的党会被描述为“历史性的”。³⁸ 议程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党组织者收集了相关文献，并事先多次会面以讨论问题。³⁹ 当期待已久的那一天到来时，八十名学生登记发言，最终有三十人登上了讲台。⁴⁰

最近的逮捕事件主导了议程，压抑已久的对校领导的抱怨爆发出来：“基洛夫遇刺后，我们群龙无首！……我们非但没有磨砺牙齿，反而在溜须拍马。”党委那任期将满的提名遭到猛烈抨击，据称它们允许阴谋家在大学里扎根。“我们的期刊上一出现批评巴拉尼克的便条，”一名学生指出，“伊扎克就说‘指控没有依据’，还说‘巴拉尼克是个好人’。”学生们回忆说，当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接连犯下理论错误时，普雷德却宣称：“既然他捶胸顿足、忏悔了，事情就到此为止。”“确实，”他们承认，“去年我们清除了组织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接着来了谁？一种托洛茨基分子被另一种托洛茨基分子取代了！科夫曼被踢出去，迪米特里耶夫进来了；马泽尔被踢出去，佩切爾斯基接替了他的位置。多么‘精彩的一束花’！读读迪米特里耶夫的讲话——速记记录从不说谎！全是陈词滥调。”“研究生院的领导权从迪米特里耶夫转到伊扎克手中……并非偶然……而是阴谋的结果。”“一个人只能批评自己，”有人坚持道。“否则上面就会确保此人离开大学。因为他们的行为无可指摘，那些被捕的人得以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事实上，他们当时怀里揣着石头 [*s kamnem za pazukhoi*] 四处走动。”“不是石头，”有人纠正道，“而是刀子和炸弹。”⁴¹

学生和教职员工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反革命集团在这里如此容易地筑巢？”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我们，大学党组织的成员，难道不能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这些卑鄙的流氓吗？”乌赫塔自责于自己的轻信：“我把迪米特里耶夫和伊扎克当成了无可置疑的权威：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一个获得过红旗勋章，另一个参加过内战。”⁴²“因为我们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另一人忏悔道，“我们相信了他们的革命成就，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些年轻人必须信任他们。”“我无法凭直觉判断谁是敌人，”第三位发言者承认道。“像伊扎克这样的人过去常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⁴³其他的解释则涉及“我们大学里糟糕的告密者情况”和“一种对个人冷酷无情的氛围”。⁴⁴很多时候，腐朽的领导层根本不在乎：“党委成员不来参加我们的党会。当我们的领导懒得去了解人的时候，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却在不断琢磨谁可以被争取到他们那边去。”⁴⁵

但是，揭露反对派的主要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是赋予大学领导层的特权，如果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学生们对此无力挑战。有几个人说，区委“赋予了大人物们极大的权力，却没有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监督”。在一次又一次的发言中，他们使用了一件致命武器：嘲讽。一个学生用尖刻的讽刺语气回忆道：“迪米特里耶夫过去常告诉我们，他的出差具有全国重要性。”据报道，巴拉尼克和伊扎克曾吹嘘：“我们是最高苏维埃的成员！”⁴⁶ 另一名学生将那些被捕者描绘成一群自鸣得意的达官显贵：“我不记得迪米特里耶夫、巴拉尼克或伊扎克曾经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一听说我们的领导被捕了，”第三名学生说，“我就知道一定是贪污。他们生活得太奢侈了。”⁴⁷

在这种对官僚麻木的指责背后，潜藏着针对中心指派的知识分子领导层的明显愤怒。但将“精英”（*verkhi*）与“草根”（*nizy*）之间的张力视为简单的社会嫉妒案例则是错误的。⁴⁸ 将学生与高级教师之间的激烈争斗解释为一场由话语调和的、争夺纯洁性的竞赛，会更有成效。⁴⁹ 在共产主义大学被报复性地使用的“堕落”（*razlozhenie*）概念解释了一个在社会出身是无产阶级、由布尔什维克政权本身培养起来的苏联精英，如何可能变成阶级敌人。正是在庸常的苏联现实——其中存在“官员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与无阶级社会的承诺之间的鸿沟中，社会平均化的理念得以孕育。⁵⁰ 由于无法放弃绝对平等的计划——那样做意味着背叛革命——共产党人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清洗他们自己本土的知识分子。

波塔波夫是最极端的发言者之一，他开门见山：“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教授们在这里坐了几十年。不仅普雷德自 1930 年以来就在这里任教，他还享有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的额外荣誉。”⁵¹ “我们需要能与群众携手工作的党委成员，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的人，”布尔里安同意道。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解释了陈腐的公式如何与意识形态的伪装相结合，编织出一个自信的茧，使“我们与普通党员隔绝”。那些不久前还赞扬普雷德在建立独立教授支部方面表现出主动精神的人，现在却将这个想法描述为精英主义。“人们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卢基扬诺夫指出。“我们，作为教员，必须与学生保持联系。”⁵²

普雷德承受了大部分炮火。作为党委书记，他被认为应为当地党组织的糟糕状况负个人责任。“当我听说逮捕行动时，”一名明显困惑的学生说，“我几乎不敢相信普雷德竟然把这事留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已经告诉他七个月了，说我看见过巴拉尼克与米亚斯尼科夫合编的一本书，而米亚斯尼科夫是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的。普雷德说他会‘调查一下’，但他什么也没做。”⁵³

“当我们诘问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时，”另一名学生回忆道，“普雷德站起来问道：‘你们是想要见血吗？’”⁵⁴ 来自列宁格勒市苏维埃的沃兹涅先斯基相当直白地说出了学生们回避的话：“普雷德表现得像个瞎子、像个傻瓜，成了敌人手中的玩物。”⁵⁵

受到各方攻击，普雷德低下了头：“作为党组织的书记，我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他试图至少挽回一些立足点，补充道：“你们应该记住，我本应监督的是学生，而不是教学人员。”当这个论点被证明无效时，普雷德试图分担责任：“我们只是把这些人理想化了，并且崇拜提拔了他们的普雷德。‘我们将问我们的校长这个，’‘我们将问我们的校长那个，’我们的决议通常这样写道。”⁵⁶

学生们拒绝接受这样的道歉，继续嘲讽和对普雷德发出嘘声。他们想知道他有什么证据指控主要教员，以及为什么他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忽略了它：

问：你怎么能声称迪米特里耶夫“思想稳定”？你误导我们认可了迪米特里耶夫的个人评价，并且对他的过去没有提出任何警告。

答：我在这方面有罪。我被迪米特里耶夫误导了，他告诉我他不与他兄弟联系，并且已经告发了他。

问：你知道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是反对派吗？

答：当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外出实习时，我收到通知，说他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反对季米特洛夫。伊扎克对我说：“等他回来，我们亲自问他。”但在他回来的第二天，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就被捕了。几天前，伊扎克也被带走了。⁵⁷

作为一个软目标，普雷德信誉扫地。在一次先发制人的行动中，雷姆尚于1936年6月27日通知共产主义大学，区委已决定解除他党委书记的职务；原因是“他的警惕性明显钝化”。⁵⁸ 他的接替者N. V. 伊林，自认为更适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人。“大学里的团伙被揭露后，”他告诉信徒们，“我亲

自去检查了我们的档案，发现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这项工作及时完成，那个团伙本可以被消除危害。”⁵⁹

在斯莫尔尼区委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们面临新一轮严厉斥责。这次，攻击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地展开：“谁不会感到痛心，”当地权贵们宣称，“当这样一个团伙在以斯大林命名的大学里猖獗活动时？”大学领导层被指控“空谈”（*pustozvonnost'*）和“谄媚的自我吹捧”（*alliluishchina*）。雷姆尚解散了大学党委。⁶⁰“众所周知，”她说，“批评被压制了。学生们基本上被鼓励相互告诫，‘何必跟当局搞坏关系？’”⁶¹

对于主要教员来说，很难解释敌人为何能在列宁格勒这座高等学府旗舰长期盘踞。历史学家 S·I·博卢切夫斯基坚持认为：“体制就是如此，我无法让自己或他人摆脱消沉。例如，我以前通常只在区委办公室见到伊扎克。在大学里，他不愿和我说话，不像一个共产党人与另一个共产党人交谈那样。”另一位历史学家弗罗洛夫回忆道，那些被捕的人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墙：“课间休息时，我常听到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接着，我注意到有批判思想的同志们开始消失。当我问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发生了什么事，他打发我说：‘哦，你知道，他们被调到别处去了。’”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却得到了提拔。“在我的系里，”弗罗洛夫继续说，“他们给奥尔洛夫升了职。猜猜这奥尔洛夫是谁？没错，内务人民委员部抓了他。他们同样青睐的科尔佐夫，以前还破坏过我的讲座，也被逮捕了。”⁶²

随着 1936 年民主化浪潮的高涨，莫斯科摒弃了个人负责制原则，校长逐渐变得脆弱，而且非常明显。切尔内赫在说话时很可能在窃笑：“没错，普雷德是这里的管理者。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也是个共产党员，因此并非凌驾于我们之上。”既然在这个层面没有谁是碰不得的，火力便主要集中到了校长身上：

格尔舍尔费尔德：普雷德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即使在今天，我也尊敬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但他太忙于大学以外的工作

切尔内赫：当斯列普科夫因托洛茨基主义被清洗时，我表示反对，知道这一步是出于校长的个人野心——斯列普科夫曾与普雷德争执。现在斯列普科夫已被恢复名誉并提拔为区委副书记。

卡尔皮科夫：虽然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要求个人负责的管理者要彻底查清一切，但普雷德未能揭露伊扎克——他脱离现实了。是的，我们开除了托洛茨基分子扎伊德尔、托姆辛斯基和马泽尔——我们的清洗委员会表现出

色。但别忘了，马泽尔是经普雷德推荐来这里的，而且他帮助托姆辛斯基发表了作品，尽管托姆辛斯基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⁶³

普雷德还面临着傲慢自大的指控。例如，列昂诺夫希望他解释，像他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怎能容忍写着“像斯大林那样工作！像普雷德那样工作！”的标语。布里扬则从记忆里挖出一次在理发店的经历，当时有人宣布：“普雷德、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和巴拉尼科夫可以到前面来。”

被对其活动的直率评价和傲慢自大的指控刺痛后，普雷德不得不证明自己并非不懂自我批评：“我们怎么会陷入如此危局？”他在听众的诘问声中问道。“主要责任在我。我们在挑选教员方面一直有困难；基洛夫事件加剧了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大学每个系都由一名前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直到 1934 年才把他们清除出去。”最初，他们的替代者似乎值得信赖：

如果德米特里耶夫和伊扎克在 1932-34 年就在这里，担任次要职务（他们的提名由市委批准）……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是本地成长的……我们知道这些教员爱出风头，知道他们的革命态度是做作的，我们也知道伊扎克、帕利瓦德雷和叶列缅科缺乏任何政治热情，但我们错过了他们最终背叛的本质。在霍乱和瘟疫之间，我们没有太多选择。这里曾有过更好的人，但莫斯科把他们调走了。我们大学的“换班”显然失败了。⁶⁴

总的来说，普雷德经历了一个典型的 1930 年代道歉仪式：他的认罪和强烈表达的悔恨为他赢得了一些时间。⁶⁵ 尽管他的处境让区委深感尴尬，但该机构仅限于训诫校长并免去其“政论讨论员”的职务。被要求更多接触基层群众的普雷德，不得不每周每天都在办公室会见学生。⁶⁶

信仰问题

当第一次莫斯科作秀公审（1936 年 8 月 19-24 日）进行的消息传来时，共产主义大学仍深陷恶名之中。师生们都屏息关注着这场非同寻常的揭发：知名领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词，模范共产党员向人民敌人骇人听闻的转变，判决（托洛茨基被缺席判刑），以及死刑执行。列宁格勒学术界在审判中占据显著地位：扎伊杰利的名字被多次提及，而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和捷尔-瓦加尼扬的定罪，部分也基于他们与当地教授中已知的反革命分子勾结。

列宁格勒媒体上关于这些事件的文章充斥着摩尼教式的语言。一位记者电告国内：“审判驱散了幻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世界的斗争中，不

可能存在所谓的‘黄金分割点’。法庭是两股敌对势力殊死搏斗的现场，一方是所有道德与正直……另一方是所有卑鄙与肮脏。”⁶⁷ 来自所有能想象到的讲坛上，对这些两面派反对派的谩骂如洪水般倾泻而下。难道“同一张嘴——季诺维也夫的——既下达恐怖分子指令，又发表忏悔演说”是可能的吗？⁶⁸

听了维辛斯基的发言后，列宁格勒的学生们宣称：“法西斯的三倍该死、廉价的特工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死刑判决。将社会主义敌人的骨灰撒掉！”任何不表示支持审判的人都是伪装的反革命分子。1936年10月，马图舍维奇——两位同在疗养院度假的大学生之一——告发了马卡罗夫：“在检察官宣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将受到公正惩罚之际，我们共产党员被要求在8月17日的集会上即兴发言。但当我请马卡罗夫对公众讲话时，他反驳道：‘让我清静会儿，行吗？我来疗养院是为了休息，不是来演讲的！’”⁶⁹ 沉默的马卡罗夫受到了谴责：“一个沉默寡言的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敌人的帮凶。”⁷⁰

共产主义大学起草给斯大林的信呼应了这种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在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疯狗的判决中看到了他意志的体现。”但列宁格勒市委委员会认为这封信不妥，从未寄出。“给斯大林写信不是一项不言自明的权利，”委员会声明。“大学必须赢得这个权利。”⁷¹ 乌赫图代表党委会接受了批评，态度谦卑：“我们大谈警惕性，但实践得不多。”⁷² 大学校报随声附和：“我们不要忘记，反革命怪物的头颅虽被摧毁，但其卑劣的后代仍逍遥法外。”大学里还有尚未被揭露的“反革命巢穴”。⁷³

然而，报纸和党会议记录显示，对于不久前还备受推崇的领导人，人们在表态上没有任何偏离——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对苏联司法的信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学生们并没有在公共论坛上穷尽他们对作秀公审的看法。政治机器控制着在那唯一的公开记录、唯一被公开承认的现实中可以说什么。由于斯大林时代公共领域中规范言语交流的原则非常严格，讨论往往沿着预定的路线进行。因此，官方记录应被视为权力关系的戏剧化表现，不应与意识形态霸权混淆。⁷⁴

那些不幸缺失的私人谈话记录，本可能为目前支持维辛斯基和叶若夫的、相当单调的合唱提供一种对位。难道至少没有一些学生在私下进行反抗的仪式吗？比如污损苏联领导人的肖像，或者在洗手间墙上涂写“斯大林主义的死胡同”？⁷⁵ 作家皮利尼亚克不是在私下观察到“国家对个人的专制压迫感很强，个人没有哪怕最微小的表达权利”吗？⁷⁶ 还有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的评论呢？他说在苏联唯一被允许的真情流露时刻“只存在于夜晚，在床上，被子拉

过头顶”。⁷⁷ 如果我们只有基层民众的讲话记录，这种推理就会认为，我们本可以在其中辨识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抗”，无论为了安全被伪装和压抑得多么厉害。⁷⁸ 幸运的是，我们确实有某种近似于这种来源的东西，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民众情绪调查”（摘要报告）。⁷⁹ 这些文件表明，公诉方所说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受到相当多的怀疑。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探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季诺维也夫不可能煽动刺杀基洛夫。也许审判中的证人是假的？”另一个低声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认罪。他们本该闭紧嘴巴！”⁸⁰ 一名党员在检察官结案陈词中途关掉了收音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评论道。另一人被听到说：“叶夫多基莫夫曾经是列宁格勒工人尊敬的领袖。”第三人大胆拒绝投票处决前党的领导人。“判决是法院的事，”他说。“我为什么要赞成处决可能无辜的人？”⁸¹

这类言论不太频繁的原因，可能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会追踪并无情惩罚最轻微的言语过失。国家安全中尉马图佐夫于1936年10月电告斯莫尔尼区委：“我建议授权逮捕斯米尔诺夫，这位党的候选人公然宣称：‘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得逞。我知道许多托洛茨基分子会来复仇。’”⁸² 对于一位名叫特努耶夫的人，也建议采取类似措施，因为他“对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表示不满”。⁸³

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些秘密调查报告可能具有启示性，但它们未能告诉我们所有我们想了解的关于顺从压力的情况。历史学家基于此类材料，假设在党的基层成员层面存在一种隐秘的反话语，这提出了两个值得商榷的假设：一是对作秀公审的任何批评都等同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抵抗；二是被挤出公共领域的批评者，使用了一种准自由主义的语言。⁸⁴ 尽管被截获的评论非常尖刻，但它们很少直接对抗官方话语本身。⁸⁵

如果普通党员有时将公审视为法律上的反常现象，他们远未挑战驱动斯大林法律体系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对判决有异议，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公审违反了法律规范，而是因为判决设计得不好，未能达到目的。“我们不应该枪毙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一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对我们有帮助。”如果有些人希望著名的反对派能被赦免，这不是对政权确定有罪的技术手段的批评。考虑以下言论：“在我们处决人之前，我们必须看清谁是谁。托洛茨基并非没有成就：例如，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敌人采取的严厉措施，而不是他的抽象人道主义，赢得了这位匿名党员的支持。其他人对判决的严厉程度表示保留意见，同时接受反对派的基本罪行。“总的来说，他们罪有应得，除了加米涅夫，”一人说。“他们的罪行是十年前犯下的，”另一

人附和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经改过自新，现在在做有益的工作。”最后，有些人接受了法庭上提出的一些证据，同时拒绝其他证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基洛夫被暗杀时]在国内。但托洛茨基与此有什么关系？”⁸⁶

NKVD 的窃听器也在不满的声音中，听到同志们谈论着需要揪出更多敌人：“我们必须清洗掉被阿泽夫这类挑衅者和叛徒渗透的党组织，”一位教员声称。另一位渴望彻底净化的同志则说：“现在还不是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榨出更多敌人的名字。”代词“我们”的使用表明，即使是对高层决策心存疑虑的人，也无法摆脱与党公开宣称的目标之间的认同。

确实，有人是以“我们”和“他们”来表述的：他们谈论苏联司法的虚伪，认为精英与大众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他们永远不会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混蛋会被像往常一样赦免。”另一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截获了类似的意见：“当然，他们会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判死刑，但在最后一刻他们会照例说‘考虑到他们的功绩……’等等。”但即便如此，将“他们”解释为完全异见的标志也是草率的。渴望党内民主的发言者通常用“他们”指代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官方认可的敌人，例如几个月前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被揭露的“封建地主”和“傲慢官僚”。即使匿名批评作秀审判的人表达了对特权精英的仇恨，他们仍然继续拥护暴力：“我们的领导人毫无价值。我们必须杀了他们，发动一场新革命，让工人取而代之。”⁸⁷

那些潜在的抵抗者使用构成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同要素来构建他们的政治哲学，只是重新排列了它们的位置。如果有人从行进中的火车上喊道：“工人们同志们！我们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正被运往科雷马要被消灭！打倒斯大林领导的反革命中央委员会！”他几乎无法为听到他的人提供另一种视角。虽然这样呼喊的内容可能具有破坏偶像的性质，但其意识形态基础却并非如此。声称代表真正的革命遗产，要求恢复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诉诸工人阶级且仅诉诸工人阶级——所有这些斯大林主义的基本要素都完好无损。⁸⁸

虽然抵抗无处不在，但它与话语上的吸纳共存，因为主导话语的不同方面相互交叉。许多当前的斯大林主义观察者不加批判地依赖对立的二元结构，不仅将“动员”与“抵抗”对立，还将“主动”与“被动”、“公开”与“私下”对立，从而忽略了官方话语与主体性之间赋能的联系。⁸⁹ 他们忘记的是，在向基层灌输一种自我重塑的人格感——这种人格感可以被任何愿意参与革命计划的人所利用——的同时，该政权破坏了自我与社会之间任何简单的二分法。⁹⁰ 一个党员常常在普通的、倒退的自我和体现道德进步的流动自我之间挣扎，并选择后者。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让自己注定过上平庸、肤浅和自私的生活。

阿尔卡季·曼科夫的例子表明，学生可以将他们的异端冲动解释为精神上的弱点，而不必然是自我肯定的一种媒介。⁹¹ 在这位列宁格勒历史系学生 1930 年代中期的日记中的几段文字里，他猛烈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国家制造的严酷现实。然而，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日记中，曼科夫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应该为无法把握大局而受到指责：“但我写的东西可能不真实。也许那只是生活的外部方面。难道我错过了这个本质，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短视的生物，无法看透表象背后隐藏的光明、灿烂的本质？也许我的内心住着一个腐朽的小黄魔鬼，就是报纸上写的阶级敌人？也许……？也许？”⁹² 照镜子时，曼科夫看到的是一个忧郁的悲观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理想的自信的新人格格不入。⁹³

即使是受迫害的共产党员所撰写的最私密、最个人的文件，也常常显示出与政权某种程度的认同。试想安娜·潘克拉托娃于 1937 年 3 月 6 日写给埃琳娜·索科洛夫斯卡娅（信中称为“列诺奇卡”）的绝望信件，后者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艺术部的副主任。显然，两位女性在 1918–19 年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中相识，并且关系相当密切。自那时起，潘克拉托娃已成为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位杰出历史学家，并且是蔡德尔的同事。这段关系在作秀审判过程中被揭露，潘克拉托娃被指控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交友，在写信时已濒临被捕：

亲爱的列诺奇卡！

在我无聊地等待命运之时……我坚定地、毫不动摇地确信一件事：我时刻都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革命，而且从未，甚至在思想上也从未欺骗过我的党和我的朋友们。但现在许多敌人包围着我，我相信我内心必定天生就有某种缺陷 [缺陷]，这种缺陷不知何故使得我对党的个人忠诚变得毫无价值。我的敌人（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或者大约十年前知道）指望我的自由主义和轻信，

并期望轻易欺骗我，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潘克拉托娃向她的老朋友坦白了焦虑、个人痛苦和自我怀疑的感受。在彻底绝望和一线希望之间徘徊，她采纳了审判者的视角，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过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它们对我来说难以置信地艰难——我一直在回想我走过的每一步，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列诺奇卡，凭良心说，我不应得到，而且——我确信——我永远不应得到被归入敌对阵营的耻辱。如果我没有死或精神失常，如果我没有在精[神]病[房]醒来，那只是因为调动了我所有的意志力、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决心，来坚持到底，等到一切都被核实和澄清。身体上，我遭受了痛苦，但精神上，我变得更坚强了，尽管这可能很奇怪：过去我只知道如何去爱和怜悯，并不总能识别敌人，但现在我也知道如何去恨了。

仇恨是那些年代的一个重要主题：1935年9月一篇题为《我们青年的人道主义》的著名文章指出：“党教导我们的青年不仅要爱，也要恨。”⁹⁴几个月后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仇恨工人阶级的敌人。”⁹⁵

潘克拉托娃信中强调性的语言表明，我们在此处理的不是真实个体向收信人敞开心扉的反映，而是作者用来净化自我的一种工具。潘克拉托娃的苦难不应被看作是窥探其心理危机的窗口，而应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书信体灵魂拷问文类的一个例子，一种诗意的建构，而非前语言现实的表达。潘克拉托娃将党视为她生命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她意识到自己应该重塑自我，变得配得上斯大林刚刚开创的无阶级社会，她用作秀审判的标尺来衡量自己。在经历了一番最严酷的自我审视后，她得出结论，自己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既不属于这一边，也不属于那一边，但完全有可能滑向任何一方。

潘克拉托娃的信模糊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所有界限，并以恳求和誓言作结：

原谅我写这封信，列诺奇卡，不要拒绝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我永远不会辜负你的信任。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日期是哪一天，我都将保持一个尽责的个人，完全忠于党，随时准备为社会主义使命献出生命。看来我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可以向你道别吗？

尼[尤拉]⁹⁶

通过在信末签署她在地下工作期间青年时代使用的昵称，潘克拉托娃强调了将她与索科洛夫斯卡娅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过去。显然，两位女性之间的纽带不能脱离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情谊概念来理解。

当两个月后（5月11日）她再次写信时，潘克拉托娃已被清洗并流放到萨拉托夫。在此期间索科洛夫斯卡娅传达的保证，她并未将其视为两位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友谊强于斯大林主义的证明，而是视为索科洛夫斯卡娅最终相信她的“同志”（而非“朋友”）是一位忠诚党员的证据。

潘克拉托娃的第二封信是对斯大林主义价值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一次有力肯定：

亲爱的列诺奇卡！

你的电报不仅恢复了我感受生命在我体内力量的能力，而且（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知道你（当我想到我任何其他朋友时，我从未感受过同样可怕的痛苦）有点相信我，在我徘徊在这深渊边缘时，你向我伸出了援手。我相信我能，不，我坚信我能，不，我燃烧着渴望——证明我有能力从这场吞噬我的灾难中走出来，将对我道德和身体力量的损害降到最低，这种力量对我们的祖国

如此重要。这里需要做的工作如此之多，而能做的人却如此之少。萨拉托夫是一座大学和科研机构林立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渴望获得扎实的知识。我深深真诚地感谢党将我派到这个省份来做这项工作。通过将自己从莫斯科剥离出来，更接近群众，我在这里是有用的——并且赢得了信任以及重新入党的能力

列诺奇卡，这是我生命中，为精神与思想的新生活而奋斗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主要的东西保留了下来：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和完成社会主义使命的坚定不移的渴望。我已经理解了自己的错误，并深刻感受到了它们。但我的错误从未源于恶意或敌意。我将在余生保持对党的忠诚。

尽管潘克拉托娃拒绝接受自己是敌人可能被视为抵抗，但她愿意接受党的意志又重新定义了这种状况。在潘克拉托娃的案例中很明显，怀疑与认同是并行的：的确，她无法想象自己离开党的生活。（结果证明，在大清洗期间丧生的是索科洛夫斯卡娅，而不是潘克拉托娃。）⁹⁷

诸如这样的案例使得布尔什维克的私人自我问题化，如果它被构想为与官方价值观对立的自我。⁹⁸ 尽管公共自我与私人自我在多大程度上应趋于一致，这使得 1930 年代后期显得独特，但当然，认为规范性总是成为现实，认为党员的角色总是转变为完全顺从的东西，那是天真的。我并非暗示共产党员在紧闭的门后所说的话与他们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一模一样：显然，每个领域对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有自己的规则。然而，假设存在一个私人领域，“真实”的思想可以在其中自由驰骋，这是适得其反的。研究大清洗的历史学家所能接触到的最私密的领域——无论是家庭的壁炉边，甚至是孤独学生编辑他的私人信件或日记的阁楼——都渗透着官方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摒弃真实与非真实、自发性与公式化之间的二分法，以便研究在斯大林主义下构建各个领域象征性交换的具体规则。这种方法可以产生某种类似同时代话语的分类学。

受害者和施害者，温顺的主体和自我膨胀的个体：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精心策划的党内操纵规则内体验了支配与被支配。因此，很难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推动官方话语前进的代理人和陷入其网络的受害者之间划清界限。只要基层吸收了主流意识形态，反抗就可能像巩固现有话语一样轻易地导致其瓦解。

批评/自我批评

随着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最后摊牌临近，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受到更密切的审查。大学领导层负责“通风”（使...通风）学生的意识，确保没有异端邪说潜回。除了校长、党委和各学习小组负责人的工作外，整个教室和宿舍还存在一个完整的监督网络，通过它进行监视、测试和辅导。公开惩戒违规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学习小组会议——通常课后举行的学生大会——在学生休息室里也更不正式地进行。纪律处分在这里起着核心作用，这甚至反映在“惩戒”一词的使用上——它既是对党章的维护，也是对同志的纠正。然而，纪律处分被解释为转变态度和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在于安抚和管理受制者。

共产主义大学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试图通过关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发展出服从意志的同志，不仅仅是通过遵循官方规定意识形态或因制裁威胁而屈服于集体的个体。他不是被剥夺意志的个体，仿佛个体意志只有在保持好战自主且与他人意志对立时才能真正存在。相反，有纪律的同志被视为将服从视为美德的同志，这是一种通过矫正（*obrabotka*）。⁹⁹

如果没有这一合法化框架，1935年春季在共产主义大学引入的“个人自我报告”（*samootchety*）就不可能实现。人们很难想到比这更经典的斯大林主义集体理想化精神的展现，自我揭露被置于如此突出的位置。以忏悔模式见证自己最亲密思想的指令是绝对的。自我报告要求绝对透明，具有专制性，使剩余的晦暗和个人不可辨识区域失去合法性。它们既关注个人又面向集体，促成了不断相互告发向公共表演的转变。¹⁰⁰ 揭露异端观点，瓦解派系，自我报告旨在为精英兄弟会注入凝聚力。可以肯定地说，规范这些仪式、符合参与共产主义公共领域一般条件的规范，包含相当强烈的情感强度。

自我报告受到系统性监督：党组织者与小组成员合作，起草个人忏悔的摘要，然后将结果提交给党委。被动和优柔寡断，热情的反面，是不能容忍的：自我报告包含许多关于沉默作为社会拒绝标志的提及。“仔细观察，”党委警告道，“你会发现每个小组里都有沉默寡言的人。我们必须找出是什么抑制了他们参与党的生活。”尽管起初大学当局吹嘘自我报告“意味着突破，因为它们增强了警惕性”，但他们很快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的情况仍有许多不足之处。”¹⁰¹ 然后，在1936年夏天，这一仪式爆炸性地流行起来。

自我报告通常在课后举行，以免干扰学习和工作任务，由党委或小组秘书发起。在例行的党组织会议上，领导者，无论是官员还是高年级同学，通常会将讨论转向个人层面，提及这个或那个学生的行为。所有与会者都被要求就相关个体提出他们的评估，展示他或她如何未能按照共产主义道德行事。

指出缺陷后，学生提出纠正性建议，并建议犯错的同学应阅读什么文献以及吸收什么原则。小组书记将其对自己报告的书面总结附在党组织会议记录上，并且通常还会交给大学党委一份副本，以便该文本可以成为学生个人评估的基础。

在小组面前揭露自己的判断错误并不能保证立即得到纠正和赦免，但它确实确保了与精英兄弟会的联结。¹⁰² 例如，胡贝在国际列宁学校因其“个人主义态度”而受到责难。这名学生承认自己难以完全“融入”“以布尔什维克方式锻造的集体”；在他看来，这是“监护”。他的恶意者认为胡贝对集体决策的反抗可能导致“瓦解我们最强的武器——对党的信任”。公共的自我揭露确保放弃任何隐私区域。否则，正如国际列宁学校的安德烈·马蒂所指出的，社会解体威胁着集体：“听这里同志们的发言，人们可能会相信一切都好，然后，在公开场合隐藏了所有批评之后，同志们开始在走廊里讨论问题：如果党采用这样的方法，它将以数学的逻辑走向解体。”¹⁰³

关注单个学生的优缺点，没有比较的自我报告是不可想象的。党委指示每个自我报告者将自己与至少两个同伴进行比较，“一个比你好的，另一个比你差的。”这一巧妙的系统使小组能够撰写详尽的肖像，“揭示每位同志的积极和消极特征”——每个自我报告实际上包含三份报告。例如，当马卡罗夫将一名叫尼基廷的同学称为“圆滑的人”（*skol' zki chelovek*）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终，控告者因人身攻击收到了警告——他比被告更糟。¹⁰⁴ 一个名叫姆雷欣的学生未能充分谦卑自己，并为其“反社会”的声誉道歉。他受到警告，“你必须克服你的共产主义傲慢[*komchvanstvo*]。”姆雷欣否认了指控，并由此证明他“拒绝解除武装”。¹⁰⁵

学生们常常占据自我矫正仪式的主体和客体的看似矛盾的位置——因此有了看似矛盾的“批评/自我批评”（*kritika/samokritika*）对偶：同时批评和认同犯错的同伴，促使学生超越自我，从而揭露并根除隐藏在内的一切异端倾向。¹⁰⁶ 单次自我批评很少足够。一个人应该继续思考他的问题，扩展他最初的忏悔，并展示他如何实施了他所宣扬的东西。这项技术是一种个体化、评估和批评，随后是团结，接着是进一步的个体化、评估和批评，因为需要进一步改造——直到新人产生。

考虑一下共产主义大学知名哲学讲师 D. I. 季亚季亚金的案例。1936 年 1 月，他被指控“未能重组他的课程”——这种玩忽职守“不仅是党罪，而且是苏维埃罪”。他的同事们想知道，“如果季亚季亚金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能成为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教育者？”在一次扩展的自我批评中，季亚季亚金承诺解决他的错误：“我在德波林门下的学习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尽管我决心消除他学派对我的影响，但我犯了一些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精神下的错误。”¹⁰⁷ 在评估了季亚季亚金在随后六个月的行为并检查了所有相关记录后，乌赫塔在 1936 年 9 月得出结论，季亚季亚金的自我批评必须是真诚的，但前提是他确保季亚季亚金根除了所有与孟什维克经济学的暧昧关系。¹⁰⁸

抹杀了“我”与“我们”之间区别的仪式，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即发展成熟的同志的思想必须在单一的集体意识中汇聚。诠释学上灵巧的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之间自由移动。来自红色教授研究所的罗森曼曾观察到，在某幅肖像中“日丹诺夫与基督有相似之处”。她怎么能发表如此反革命的评论？她的党委书记认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不自省的同志了：“罗森曼显然不知道她的面相给人留下什么总体印象，或者我们能在她的缺点中发现什么联系。”“虽然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但我现在意识到我也必须表现得像这样，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罗森曼在自我批评中说道。她宣称理解外在必须内化，内在必须显现在外在。¹⁰⁹

自愿的自我控告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真诚的悔改和愿意接受改造的意愿。但自我批评应该是自我建设性的，而不是自我毁灭性的。官方媒体解释了所涉及到的挑战：“并非每一次自我批评都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即具体、实事求是、伴随对自己错误毫不留情揭露的自我批评。我们必须警惕公式化的自我批评，为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接近于自我贬低 [*samooplevanie*] 和自我鞭笞 [*samobichevannie*]，反常的自我批评通常伴随着哀号和呜咽。”¹¹⁰ 来自同伴的补充性惩戒，旨在通过产生“公共亲密感”来创造共同的社区意识，而不是变成彻底的斥责。日丹诺夫引用了一次党组织会议的简要记录作为自我批评过度的例子：“我们听了斯利罗夫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决定：‘必须逮捕斯利罗夫。’”¹¹¹

千禧年主题

在 1936 年夏天这个分水岭之后，官方修辞以新的、简化的方式描述自我。现在，既然党否定了信徒额外的时间来重塑自己，错误只能用“恶意的性情”（*zlye nameriniia*）。¹¹² 除非我们拓宽视野，思考心理特征如何被关于诚实和善意的黑白判断所取代，否则就无法理解对灵魂基本品质的不断提及。

认识完全按照道德品质定义的敌人是否更容易？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恶毒的特征是透明的，但难以识别，接近表面，但不知何故被伪装。辨别道德品质需要警惕的眼睛，一位诠释学大师的眼睛。

官方话语允许使用两种修辞策略来维持警惕性运动。¹¹³ 口号式方案包括反复使用一个核心公式，以激发后续的宣传运动。这样的口号通常由斯大林本人宣布，然后通过各种意识形态渠道，特别是报纸和党的群众集会进行复制。阶级和政治的脱离以及对人的关注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这里，1935 年用新口号“干部决定一切”取代“技术决定一切”口号，引发了党文化模型的关键转变和乌托邦人类学的兴起。¹¹⁴

但还有另一种可识别的、不那么直接的方案，当官方媒体开始部署陌生或长期被遗忘的词汇单位和群体时被激活。词汇方案通常采取将旧措辞置于新语境中的形式。¹¹⁵ 在大清洗的年代，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经典对立被脱离其框架，并被“正直的公民”（*chestnye grazdani*）与“人民的敌人”（*vragi naroda*）所取代——这个术语指的是内战期间反革命政党的领导人，此后一直未使用。敌人不再是剥削阶级，据说已在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被“消灭”。¹¹⁶ 相反，它是一群定义模糊的邪恶生物，痴迷于逆转历史的愿望。

当然，口号和词汇机制常常重叠。斯大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的 *communiqués*（公报）既包含明确的、口号式的禁令，也包含非传统的词位、词语和措辞。通常，当新措辞成为官方讲话、报纸社论和党内文件中使用的政治公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它就被批准。诸如“邪恶分子”（*zloumyshniki*）和“怪物”（*zlodei*）等名词，以及诸如“有害的”（*pogannye*）和“恶性的”（*vrednye*），等形容词，支持了诸如“永远不要相信悔改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或“彻底铲除托洛茨基分子”等新禁令。当我们转向灵魂评判框架的演变，这一框架赋予反对派主义从堕落变为不可挽回的邪恶以意义时，我们发现官方话语中不易受官方控制的层次不容忽视。发生在词汇层面的关于敌人描述方式的

变化，并不一定是高层授权的。

斯大林对官方发言人肤浅、不科学的道德说教感到震惊，在这方面值得注意。在他 1936 年 9 月 6 日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总书记批评了《真理报》将公审描绘为善与恶之间史诗般斗争的呈现方式：

没有文章解释这些无赖灭亡的原因、他们的社会政治面貌、他们的真实纲领。报纸将一切都归结为个性——有想要夺权的邪恶个体和掌握权力的善良个体——并将这种微不足道的杂烩[*melkotravchataia meshanina*]喂给公众。相反，应该指出的是，反对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科西奥尔等人的斗争，是反对苏维埃、反对集体化、反对工业化的斗争，是为了在苏联城乡恢复资本主义的斗争。最后，读者本应被告知，这些无赖沦为白卫军和法西斯分子的地位，是他们反对派罪恶堕落[*grekhopadenie*]。¹¹⁷

斯大林决意秉持科学态度，并抨击新闻界在这一方面失职，同时借用宗教意象（“罪孽”“堕落”）进行自我批判。

官方报刊上日益频繁出现的格诺西斯主题也同样如此——这是另一个未被自上而下颁布的关键词汇创新的例证。苏联关于人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以及通过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解放的叙述，重复了格诺西斯神话的结构。在格诺西斯主义中，“圣灵”是将人转化为灵性存在的生命原则。一个得救者的共同体形成了——一个见过光明的种族，即“属灵者”。在马克思对这些主题的转写中，阶级救世主必须拥有那种与“人民精神”（*Volksseele*）相认同并“激励”（*begeistert*）人类自我解放的灵性气息。¹¹⁸ 异化灵魂向自身的觉醒（*odukhotvorenje*）对斯大林同样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阐述一场真正革命——一场基于科学原理的革命——的动力学，他被迫援引了古老的“圣灵”概念。¹¹⁹

革命热情是无阶级社会临近的标志，许多人此时都在寻找“热情”（*entuziazm*）。由人类灵魂根本无法把握它所表明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令同志们欣喜若狂：“因为虽然想象力在感性世界之外找不到任何可以把握的东西，但这种将感性障碍推到一边的做法仍给它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康德）。”¹²⁰热情是一种奔放的心理-政治态度，驱使个体充当党的媒介。¹²¹ 在古希腊，热情（*enthousiasmos*）指的是女祭司的状态，她放弃自己的声音和自我，向世俗听众传达神谕。¹²² 柏拉图写道：“我们最大的福祉通过疯狂降临我们，前提是这疯狂是神赐的礼物”（《斐德若篇》244a）。斯大林主义的热情者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该词原始含义的一部分，即去个人化。被革命胜利所鼓舞，他剥去自己特定的心理人格，让党精神得以通过他表达出来。那些无法爆发出热情的共产党员，那些尽管身处胜利氛围却内心沉睡的人，则受到怀疑。¹²³

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些宣传员依赖于睡眠与苏醒的意象。当地期刊上的文章宣称，在无产阶级阵营中传播自满、“盲目”（*slepota*）和“虚假的安全感”（*lozhnaia uverenost'*），反革命试图“麻痹我们”（*ubaiukivat'*），“使我们昏睡”（*usypiat'*）。同样充满警告意味的还有另一段浸透灵知语言的言辞：除非学生及早觉醒，否则从死里复活的将是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可能会“复活 *ozhit'*”在我们眼前”。¹²⁴

此刻的个体既被描绘为具有泰坦般的创造力，亦被刻画为病态的破坏力。“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宣言如此高调宣称，凸显了当时人们坚信新人能从内部汲取无限力量的观念。¹²⁵ 敌人同样以超人尺度行事，仅凭意志力便能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壮举。¹²⁶ 曾被描述为“意志薄弱之人”（*bezvol'nye*）的他们，如今蜕变为“任性妄为的”（*svoevolnyi*）破坏分子与间谍，是“天生的恶棍”（*vrozhdennyi negodiai*）。共产主义大学宣传者仅承认两种自我——善与恶——并以非黑即白的术语描绘学生群体：学生要么聆听“世界太阳”斯大林的教诲，要么与“一切颠覆活动之灵魂与灵感”（*dusha, vdokhnovitel'*）托洛茨基串通一气。¹²⁷

要使诠释学转向摩尼教模式，邪恶的存在论必须改变：在大清洗期间，党的理论家塑造了一系列毫无过渡性格的角色，只有全心投入的革命者与无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英雄崇拜的斯大林与其宿敌反崇拜的托洛茨基之间的固化对立，是沿着两极化路线大规模重写历史的成果。“历史是政治武器”，《真理报》在1933年如是宣告，并于1936年以更高调重申此论。¹²⁸

斯大林崇拜在官方历史学家中逐渐兴起。作为 1920 年代党内斗争的唯一胜利者，总书记到该十年末已确立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部分人惊讶于这位外表谦逊、看似平凡的官僚竟能获得如此显赫地位。“我似乎觉得，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斯大林权力的实质——他正在成为专政者”，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于 1930 年在日记中如此记录。¹²⁹ 但即便斯大林早被认可为关键人物，他当时尚未被塑造为理论先驱。“斯大林同志最令人钦佩的品质之一”，《真理报》同年指出，“在于他从未背离列宁，从未在任何问题上摇摆不定。”尽管斯大林受到赞扬，列明显然仍是救世主，斯大林仅是使徒。¹³⁰ 两年后，斯大林化身为谦逊典范：“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¹³¹ 尽管总书记反对引入“斯大林主义”一词，但雅罗斯拉夫斯基 1933 年版的《党史》已包含题为“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的完整章节。¹³² 同年，卡尔·拉狄克创作了科幻小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作品以 20 世纪末历史学家讲座的形式呈现，描绘斯大林作为彻底改变人类的全能天才形象。¹³³

1934 年，政治局将一直在收集总书记革命事迹材料的第比利斯研究所，并入久负盛名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IMEL）。¹³⁴ 在列宁逝世十周年之际，党史学者讨论了以下议题：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在 1924 至 1934 年间的活动，以及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材料中，人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若非斯大林英勇地扛起旗帜，列宁的一生将完全失去意义。¹³⁵ 《简明教程》的早期草稿中，在题为“列宁革命活动的开端”一章之后，紧接着便是题为“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开端”的章节。¹³⁶

不同于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初期在课堂与学术期刊上被颂扬的无名无产阶级大众，共产主义如今拥有了具象的面孔：《简明教程》决心给予“历史人物”（*istoricheskie lichnosti*）应有的地位。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指出：“布尔什维克卓越领袖们的生活——他们是最优秀的人类代表——必须成为下一代的榜样。”¹³⁷ 历史教师们必须思考如何说服学生：若他们能充分理解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¹³⁸ 杰出的个人便能在其民族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共产主义大学张贴的标语强调：“我们的党战无不胜，这要归功于列宁同志——他在建党之初便掌舵领航，也要归功于斯大林同志——列宁最伟大的合作者，他如今正掌舵前行。”¹³⁹ 中央宣传部主任威廉·克诺林关于“必须公正评价斯大林同志作为历史人物的伟大性”的宣言被频繁引用。¹⁴⁰ 受命重振历史系教学法的 L. M. 图罗克和 R. 伊扎克承诺将制定新教学大纲，给予斯大林的个性品质更多关注。¹⁴¹

然而，即便在基洛夫遇刺之后，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仍可被讨论。1935年1月26日，共产主义大学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投诉：一位名叫扎哈罗夫的共产党员被听到谈论“1917年斯大林的错误”。扎哈罗夫将此言论归咎于其列宁格勒的教授。通过访谈与其一同听课的人员，共青团调查组确认共产主义大学历史教师马塔耶夫确曾在课堂上谈及革命初期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当马塔耶夫审查列宁缺席期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时，发现它们存在缺陷，“并最终在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历史系主任伊万·帕夫洛维奇·瓦维林非但未指导其他教师纠正马塔耶夫，反而加剧了其同事“极为严重的曲解”。尽管中央委员会有明令“必须让学生警惕二月政变期间党的领导作用”，瓦维林仍重申了那项诽谤性断言：在1917年4月列宁抵达前，“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对临时政府采取了错误立场”。¹⁴²

这一事件横跨了从列宁崇拜到斯大林崇拜的过渡时期展开。¹⁴³在整个1920年代，党的宣传员将列宁描绘为“革命的天才”：他的“四月提纲”比其他任何事件或文件都更能向布尔什维克传达确保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所必须采取的步骤。通过将四月提纲神圣化，这种以列宁为中心的历史的作者们谴责了布尔什维克在此前对临时政府所表现出的调和姿态，并将斯大林牵连进这一错误的策略，因为他先于列宁抵达彼得格勒。

但到了1930年代末，是时候将总书记的末世论洞察力提升到与列宁同等的水平了。¹⁴⁴历史书籍本应传达“斯大林的伟岸形象”。¹⁴⁵然而，正如以下学生笔记本摘录所示，马塔耶夫和瓦维林未能将他们的讲座调整到新路线：

在列宁返回之前，布尔什维克知道革命的方向；然而，对于如何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犹豫不决。当列宁到来时，新的战术被制定出来（阿福尼娜的笔记）。

斯大林在列宁到来之前犯的错误是支持了加米涅夫的观点；后来斯大林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萨维列夫的笔记）。

斯大林自己说过，“我们需要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来阐明我们的新政治方向”（米宁的笔记）。¹⁴⁶

从1935年起，学生应被教导“布尔什维克从革命最初就与临时政府不和”。斯大林现在与列宁一起登上中心舞台：“两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同时展开了对右翼和左翼的运动。”¹⁴⁷

如果马塔耶夫确实如正式指控所言“歪曲”了事实，那么他并未从事蓄意“破坏活动”——斯大林崇拜的新信徒们仍在谨慎摸索前路。这位四面楚歌的历史学家毫不避讳地暗示总书记并非天生奇才：“是的，我曾详细与学生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我常向他们解释，真正使他伟大的并非不犯错，而是能较快纠正错误的能力。”他期望学生少关注斯大林的起点，多着眼于他最终攀登的高度。“我曾用整堂课讲解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部经典著作，”被告啜泣着说。尽管组织学生辩论“一国社会主义”价值这类愚蠢行为被视为“卑劣自由主义与软弱性的无耻展示”，大学领导层仍给出宽大裁决：“马塔耶夫的教学错误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但无证据表明其有意煽动托洛茨基主义。”¹⁴⁸“凭借其在大学党委会议上深入的自我批评，”瓦维林也仅受到训诫处分。普列杰批评其讲座显露“客观主义、形式主义倾向”。瓦维林将不再被允许讲授 1917 年二月至十月期间课程；该课程将由另一位教师负责，以确保学生理解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伟大贡献。¹⁴⁹

然而不出一年，转变的态度将使此类裁决难以想象。1936 年历史学加冕学术研究女王，对其篡改者的宽恕变得不可想象。¹⁵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阐释历史发展到何种阶段，以及该阶段应采取何种政策，”斯莫尔尼区委宣传员写道。“同志们不仅要能引述理论，更要将其与我们党当前的政治实践相结合。”¹⁵¹随着现实与理想差距缩小，历史学家减少对经典著作的抽象研究，更多时间用于评估斯大林运用这些著作的成效。¹⁵²

斯大林的历史成就已经改变，这必须在修订的课程大纲中得到体现。¹⁵³ 由于当时宣称斯大林在多次暗杀中侥幸生还，总书记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护身符。1936 年中期，全国主要学生刊物宣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的骨肉同胞！一切最美好、使每位自觉劳动者内心充盈喜悦的事物，都与您的名字相连。人类需要您，正如我们需要生命之源——太阳。”¹⁵⁴

1937 年，学生们庆祝了一系列与斯大林在高加索革命生涯相关的周年纪念：巴统无产阶级示威运动三十五周年、巴统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三十周年等等。¹⁵⁵ 三千万份宣传贝利亚论点的印刷品被印制出来，该论点声称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的彼得堡和斯大林领导下的格鲁吉亚同时诞生。拉夫连季·贝利亚粗暴地拒绝了旧正统观点——即“布尔什维克自 1903 年起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而将决定性时刻定在 1912 年举行的布拉格第六次社会民主党会议；正是在这一年，斯大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¹⁵⁶

被发现略微偏离新历史的学者们将面临必然的惩罚。共产主义大学的图罗克在 1937 年为马塔耶夫和瓦维林在不到两年前逃脱惩罚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批评者指出：“他在讲课中对斯大林同志在我党历史中的作用注意不足。”“诚然，图罗克考察了——尽管简短——斯大林在梅萨马德西的活动，并花了一些时间讲述斯大林在第四次社会民主党会议上的发言。”但他未能证明斯大林与列宁地位相等：“关于列宁，图罗克能够讲述引人入胜、美好而英勇的故事，抓住学生的想象力。为何他不表明列宁的作用与斯大林密不可分？……缺乏丰富的细节：我们对了解斯大林的渴望，如同我们对了解列宁的渴望。”图罗克失去了历史系主任的职位。¹⁵⁷

处于高度警觉状态的区委监督员和督导员彻底修订了学术计划。他们依据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的决议，誓言加强对教学过程的控制、审核课堂，并特别关注历史教学的方式。在红色教授学院，一个专门小组审查了七十多份“近期被揭露的教师”的讲课速记稿，为每份讲课提供了书面评估。“最小的错误也必须纠正。”地方党委会启动了一系列额外预防措施，“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控制，监督他们课堂报告的内容”，并要求他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并报告教学中最微小的缺点”。¹⁵⁸

这项大规模行动一经启动，该学院院长舒雷金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学院中的破坏活动》的官方报告。院长知道在意识形态纯洁性方面不会有妥协：不久前，他本人就曾因“未能检查克尼亚泽夫的教学”而面临批评。批评者称，舒雷金“知道他的讲课速记稿被送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但对审阅速记稿上的评

论毫无兴趣，而这些评论显示克尼亚泽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此案中，舒雷金设法证明速记稿是被人对他隐瞒的，从而为自己开脱了罪责。¹⁵⁹

一旦斯大林的著作成为强制性话语，其他观点，即使只有细微差别，也不再被理解为可替代的真理，而是被理解为对唯一真理的替代选项。但对斯大林文集的研究赋予了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们力量。他们巧妙地将个人生活故事融入官方历史叙事中，依据新获得的真理重新诠释了自己的过去。作为 *共同体* 的行为，历史课变成了相互认可和强化的场景。精选的流行语被用来在共享能指方面重新编码学生的自我。马克思主义元语言为集体解释党史提供了一个框架。

¹⁶⁰

在大清洗期间，敌人被化约为基本骨架。1936年4月，一个调查党史系的共产主义大学委员会被指示确定“党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右倾主义者、左右怪胎以及季诺维也夫主义者的击败是否已被恰当地传达给学生。”¹⁶¹ 大学宣传部匆忙起草了一份教学大纲，开头考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通向叛国的道路，然后审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包括1932年至1936年间进行的恐怖行动，特别关注基洛夫遇刺事件。这个团体的历史将通过考察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来更新到最新情况。¹⁶² 1936年秋，新任副校长谢苗诺夫将与党组织书记伊林合作，教授一门名为“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中心”的研讨课。¹⁶³

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秀教会了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摩尼教世界。就在几个月前，这个世界似乎还异常复杂：白卫军与法西斯分子不同，后者又与反对派不同。不再如此：官方宣传人员要求学生们相信，“敌对阵营无法区分”。¹⁶⁴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毫无区别，”科托维奇在1936年11月对他的班级说。¹⁶⁵

为了解决当一个黑暗面人物，如托洛茨基，试图摧毁另一个此类敌人，如白卫军时出现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的末世论叙事将传统的政治区分化为表面现象：党内敌人隐藏了这么多年的共同本质终于显而易见——尼古拉一世、米留科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希特勒只是同一个致力于阻止无产阶级解放的普遍力量的不同名称。白卫军、孟什维克、反对派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反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工不同。¹⁶⁶

偶尔对敌对阵营的排名显示，在单一的漆黑之中，托洛茨基闪烁着一种特别恶毒的黑色：被宣布为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异端，托洛茨基主义因此从偏差毕

业为原始反对派。¹⁶⁷ 共产主义大学的一名教师纳罗德尼茨基在 1936 年 7 月受到训斥，因为未能注意到“托洛茨基不是一名简单的白卫军，而是站在反革命前线的人物。”¹⁶⁸ 红色教授学院的讲师佩霍宁受到审查，因为在他的历史课《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我国》中，他依据 1923 年的立场批评了托洛茨基。尽管到那时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已将他认定为反对派，“但托洛茨基作为人民敌人的真实本质尚未被完全揭露。”党委总结说：“佩霍宁关于党的团结的概念还停留在第十次党代会后党当时的思维阶段。”¹⁶⁹ 科托维奇在 1936 年 11 月 21 日红色教授学院对人群发表讲话时纠正了佩霍宁，他说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是由托洛茨基募集的，并将托洛茨基主义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¹⁷⁰

几个月后，科托维奇自己也陷入了麻烦，因为在一次对托洛茨基的其他方面残酷的攻击中，未能强调其本质一直卑劣。起诉书读道：“在他的讲课中，他没有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前时期的破坏活动进行尖锐的政治定性。”“科托维奇没有谴责托洛茨基在 1909-1911 年期间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的企图，也没有描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那个时期对列宁的两面派态度……科托维奇的讲课笔记指出，在 1910 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调和派站在了列宁一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可能是真心实意这样做的！”¹⁷¹

红色教授学院的另一位教师贝列茨基在 1936 年 12 月 19 日面临类似指控：他对后来领导反对派的那些人的早期职业生涯的评价过于宽容。以下判决决定了他的命运：“加米涅夫对武装起义思想的抵制并非那么可怕：党只是缺乏举行武装起义的许多经验。”¹⁷² 另一位未能注意“叛徒政治生涯中关键里程碑”的教师是 A. K. 帕卡林。帕卡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 1917 年 11 月的破坏活动”只字未提，也没有提及加米涅夫在 1917 年发给“俄国第一公民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电报：对沙皇兄弟的这种不当尊重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意外！”

”¹⁷³

反革命思想不会在布尔什维克头脑中随时间增长；所有反对派分子从出生起灵魂里就有反革命。“从十月革命初期起，托洛茨基分子就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粗鲁、傲慢、挑衅、叛国和破坏，”瓦年科在 1936 年 9 月写道。“列宁试图纠正他们，但若非他过早去世，他本会处决……那些剩下的、无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分子。”¹⁷⁴ 虽然马塔耶夫在 1935 年教学中的失误被原谅了，但现在他再次触怒了历史正确性的猎犬们，结局不那么愉快：“讲师马塔耶夫没有揭露二月革命期间发生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他也没有解释，在十月革命准备期间，叛徒托洛茨基就已经参与了反革命活动。”

“你们自己才是托洛茨基分子！” 马塔耶夫大喊道，但这种回应并不打算让他赢得指控者的喜爱，他们立即清洗了他。¹⁷⁵

在共产主义大学党的会议期间，学生们困惑“为什么在内战期间托洛茨基被委任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既然他一直是敌人。“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很重要有什么罪？” 费多丘克质疑道，暴露出他无法理解新的正统思想。“作为一个工人，我曾经听过他们演讲，我相信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 叶尔莫什金也附和道。过去已经过去，他说，“但谁不记得工人阶级曾经追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领导呢？”¹⁷⁶ 而梅列欣竟敢提出“托洛茨基在内战期间举行的集会鼓舞了红军士兵的士气。我绝非赞扬托洛茨基。但当学生声称‘托洛茨基从未到过前线’时，我不得不指出他们的错误。” 那些更适应官方话语变化的人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在 1917 年就已经是个恶棍：他的言行不一。” 所有想要对此判断加以限定的人，都因“推进了对托洛茨基的反革命式赞扬”而受到谴责。¹⁷⁷

当共产主义大学的资深教师特罗菲莫夫也未能本质化托洛茨基的罪行时，他差点被清洗。学生对特罗菲莫夫关于“人民的敌人”讲座的评价表明，他在宣传方面没有前途：“在特罗菲莫夫的课程之前，我们比之后更憎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一些共青团员向大学党委发送了告发信：他们认为特罗菲莫夫“理论水平薄弱”。其中一份更有破坏力的证词是科列哈耶夫在 1936 年 10 月 23 日写的一封信：

特罗菲莫夫教导我们：

- (1) 托洛茨基被接纳入党是因为当时任何人都能入党；
- (2) 托洛茨基入党是为了帮助实现十月革命并且成功了；
- (3) 托洛茨基没有被更早清洗是因为他是一个狡猾的[科列哈耶夫最初写的是“好的”，然后划掉，写上了“狡猾的”(khitryi)]演说家；群众支持他，很难把他踢出去；……并且
- (4)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好共产党员；他们的反革命观点是近来才有的，显然只是在列宁去世后才形成的。¹⁷⁸

简而言之，特罗菲莫夫将恶毒历史化了，而不是将其本质化。当被问及这是“故意”的还是特罗菲莫夫仅仅“准备不足”时，学生拒绝推测，但毫不犹豫地对该教师“在这些问题上肯定是软弱的”。¹⁷⁹

特罗菲莫夫抱怨被排斥。“我的朋友在走廊里躲开我，”他指出。为了改善情况，他向党的当局发送了一封信：“我的讲课纯粹被误解了：当我把托洛茨基描述为‘原始的敌人’[iskonnnyi vrag]时，我确实补充说他是个‘喜欢用华丽的辞藻来煽动群众的巧言者’……但我如此强调托洛茨基的煽动技巧，是为了向学生传达一个不易被打败的敌人的概念。这本应向学生灌输对托洛茨基有意识的憎恨。”

大学党委的德里泽拒绝了这一辩护及其提出者：“特罗菲莫夫一直是个同路人，同样亲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尽管形式上，特罗菲莫夫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成员，但他内心一直隐藏着托洛茨基主义。现在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爆发了。¹⁸⁰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将对托洛茨基的妖魔化推向了极致。每当叛国的蛆虫——无论是在1923年、1927年还是1931年——暴露在众人眼前时，据说它一直潜伏于此。1936年7月中央委员会传阅的信中引用了别尔曼-尤里因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证词，这一点尤为惊人：“当他告诉我……必须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时，托洛茨基——看起来几乎被催眠了——在我看来像个着了魔的人。”此处托洛茨基被描述为精神错乱，受恶魔力量影响。¹⁸¹另请注意维辛斯基八月对被告的定性：“罪犯……连普通重刑犯都视之为最卑劣、最低贱、最可鄙之人，他们是堕落者中最堕落的。”¹⁸²

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标绝非仅有那些有过反对派历史的人，但对事实准确性关注不应妨碍理解共产党对事物的观念所产生的真实效果，无论其多么光怪陆离。”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作家皮利尼亚克抱怨道，”所有不按《真理报》思路思考的人《真理报》期刊都获得了这一头衔：……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不是因为他们参加过反对派，而是因为他们不符合标准。”¹⁸³“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公报》指出，”已成为一个集体名词，指代一切需要被消灭的事物。”¹⁸⁴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官方报纸《消息报》上如此宣告。”从其最初直至最终转变为破坏团伙、间谍活动和出卖苏维埃俄罗斯肌体的行径，托洛茨基主义始终伴随着对祖国概念的背弃。绝对意义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不爱祖国的公民都是托洛茨基分子。”¹⁸⁵

到1937年，”托洛茨基主义”已成为一个指代一切反革命事物的集体名词。¹⁸⁶托洛茨基分子在大清洗的公共话语中以”天生的恶棍”(先天恶棍)和”不可救药的破坏分子”(不可纠正的危害分子)形象出现——堪称亲密敌人的典型。¹⁸⁷官方理论家如今在如下假设下工作：叛国是一种”天生特质”(先天特质)，人总是保持原样，真正的思想转变是不可能的。现在或过去任何时候，善恶阵营之间的人事流动都不被认为可能发生。

焚书

当中央委员会打击反对派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时，它致力于消除他们的思想成果。1930年代末，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图书馆员从流通中清除了数十万份出版物。图书馆原始馆藏只有一小部分留在书架上，其中仅极小一部分在开架阅览区。

布尔什维克一直以准宗教式的崇敬对待书籍。在敌人进攻城市期间许多革命出版物被毁后，苏维埃当局组织了庄重的游行，展示”这些被焚烧撕毁的著作的忧伤残骸”。¹⁸⁸这种崇敬的反面是审查制度，布尔什维克一掌权就立即实施了它。即使在新经济政策的宽容年代，主掌审查权的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仍致力于清除”不健康的文学作品”。这使得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能在1923年禁止所有”反革命出版物”。¹⁸⁹被禁材料被仔细保存，以便不时审查。随着大清洗开始，党将其认识论能力提升到了顶峰；既然共产主义真理已被完全编纂，最终判决终于可以下达。那些在封闭书架上积灰的书籍现在将被焚烧。

基洛夫遇刺后不久，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官员号召图书馆员筛选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撰写或编辑的书籍。1935年2月，带有他们肖像的标语和宣言也被收起。在此阶段，只有直接涉及1920年代反对派的材料成为目标。随后，1936年5月21日，列宁格勒当局大幅扩大了“筛选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文学”的行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松散合作，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列宁格勒办事处的全权代表在每个区选出二十到五十名“值得信赖的共产党员”（每五到十家图书馆一名积极分子），主要负责审查工作。

¹⁹¹

中央政府准备了一份秘密的禁书清单。主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著作，其中许多曾被视为经典，现被宣布有害于党的精神健康。根据文学部的指示，每本被禁作品的两份复本将存放在列宁格勒几家图书馆的专门区域，称为“非大众区”，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图书馆、国际研究所图书馆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市立图书馆。¹⁹² 文本从主要图书馆的玻璃柜到篝火永无止境的流动令人不安：既然共产主义的基石已稳固奠定，布尔什维克经典本应最终确定。也许正因如此，图书筛选计划的每个环节都以最高度的机密进行。¹⁹³

被列为“绝密”的禁书清单仅由中心派遣的可靠工作队处理。¹⁹⁴ “清单1号”包含季诺维也夫的大部分作品（70个标题）、托洛茨基的（58个）、梅德韦杰夫的（23个）和萨法罗夫的（18个），以及较少数量的其他反对派理论家著作，包括扎卢茨基、戈尔巴乔夫和叶夫多基莫夫。“清单2号”包含另外427个标题，其中包括看似完全无害的作品——经济手册，以及教育学和科技文献。这些书的问题在于其作者最近被揭露为“破坏分子”。¹⁹⁵

凭借“清单1号”，共产主义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书架上取出冒犯性书籍，打包后将密封的箱子运往瓦西里耶夫岛的焚烧站。在那里，列宁格勒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副局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根据清单核对每本书，并在书从图书馆取出后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内将其焚毁。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书籍化为青烟。整个过程高度军事化，事实上，国家军事保密全权代表——一位名叫沃林的人——确实参与了这项庞大的事业。¹⁹⁶ “清单2号”上的书籍未被销毁：它们被从书架上移走，密封在图书馆闭架书库的特殊区域。¹⁹⁷

当普雷德吹嘘共产主义大学时，“我们的图书馆清除了大量意识形态有害的文学作品，总共约五百册”，区委很快向他指出这个数字低得可笑：共产主义大学图书馆仍“受到严重污染”。¹⁹⁸

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这类污染的威胁进入了更广泛的讨论。“在一家商店，”警惕的共产党员指出，“敌人用季诺维也夫著作的书页作包装纸；在另一家，他们用托姆斯基报告的纸张作包装材料。”¹⁹⁹ 1936年2月，斯莫尔尼区委的克里沃谢耶夫提交了这份报告：“在谈论革命警惕性八个月后，猜猜我们几天前在共青团档案中发现了什么。一个柜子里不仅装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萨法罗夫等人的书籍，还有一期1925年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真令人意外——包含一篇季诺维也夫的文章！”²⁰⁰ 共产主义大学官员鲍马诺夫十月描述了大学图书馆：“因为像伊扎克和巴拉尼克这样的恶棍掌权太久，反反对派的文献很难找到。因此，我们只有三本斯大林关于反对派的著作，标着‘不外借’。而另一方面，敌人的文献却自由流通！”²⁰¹

红色教授研究所图书馆要求将禁书存放在特别保管区的请求被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列宁格勒办事处拒绝，这并非自信的表现。²⁰² 随后，1936年9月8日，一份德国报纸抵达图书馆，引起恐慌。由于该期报道了莫斯科公审新闻，研究所领导立即怀疑图书管理员搞鬼。一位官员说：“我们目前订阅了国际共产主义出版社发行的若干外国出版物，但我们没有订阅法西斯期刊。我应该相信图书管理员的说辞吗——尽管有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邮局还是‘意外地’将敌人的报纸送到了我们研究所？”²⁰³

破坏行为似乎更有可能。1937年3月举行的党的材料图书馆展览中包含了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九卷，图书馆馆长因此受到训斥。通过展示这本包含列宁给最近被揭露的穆拉洛夫电报的著作，法因贝格正在“宣传敌人”。²⁰⁴ 接着发现，研究所位于果戈里大街的藏书本应锁好保管，但在最近的翻修期间敞开着——让学生得以自由接触不久前才被仔细藏起来的反革命文献。²⁰⁵ 党委匆忙制定新规章以防止此类灾难。然而，当宣传员阿尔希普采夫一个月后在研究所图书馆索要关于革命的材料时，他收到一本关于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书，其中包含托洛茨基的一次演讲。阿尔希普采夫决定测试图书管理员的动机，在还书时问道：“你会怎么处理它？”“当然放回书架。”他的罪过似乎显而易见。

²⁰⁶

为了挽救图书馆的声誉，一个特别学生小组检查了全部字母目录和部分主题目录。“红色教授研究所没有一张被禁书的卡片剩下，”他们在1937年2月底欣喜地报告。²⁰⁷ 但目录不可信，区委指出：“对许多地方图书馆的随机检查表明，大量从目录中删除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文献仍留在书架上。”²⁰⁸

研究所党委书记波斯特尼科夫在图书馆遇到一些关于敌人的棘手问题。1937年3月他寻求建议，询问上级：“我们该如何使用包含可恶作者著作的材料？是应该剪掉书的部分内容，还是应该销毁整卷书？”²⁰⁹一位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官员提供了答案：“不仅托洛茨基的书籍，而且他在文集、期刊甚至报纸上的文章都应被清除。”只有国家和党的代表大会与会议的速记报告得以逃脱火焚。²¹⁰同时，莫斯科告诫防止“过激行为”。为了防止“过度热心的清洗者”删除整套《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文集》等重要党刊，国家文学与出版事务总局官员坚持所有筛选必须以官方禁书清单为基础。红色教授研究所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抱怨：“这些细微差别和具体细节使清除文献的工作增加了七倍；我们的工作进度大大减慢。”²¹¹

到1937年秋，该研究所图书馆在两年内四次清除了冒犯性著作。一个“特别小队”再次检查书架。借阅习惯可疑的借阅者被取消图书馆特权。“只有我们的学生才应使用图书馆，”当地党委表示。“这样更容易追踪借出的书籍。”²¹²学生们还被告知要“彻底清理他们的个人藏书”。²¹³

大清洗时期的审查制度不仅在数量上（仅1938-39年就有16,453个标题被撤出流通，超过2400万册被化为纸浆）独特，在质量上也是如此。²¹⁴在斯大林的正统观念被编纂前的多年里，只有那些已证明善于识别颠覆性内容和隐蔽含义的读者才被允许熟悉异端文本，以学习如何提醒天真的无产阶级注意其中的危险。但普通审查制度假设存在争论、对意义的争夺、意见分歧的可能性。它邀请读者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涵、掩饰、颠覆。即使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本也可能因阅读时的语调不同而改变意义。如果自由选择，语调甚至重音都可能危险。清洗运动必须更进一步。仅仅锁起书籍是不够的——学生的记忆也必须净化。尽管人民敌人佩切爾斯基、科托维奇、杜布罗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维奇讲座的笔记已被化为纸浆，但总得有人想办法“不仅从学生笔记本中，而且从学生头脑中清除他们所教授的内容”。²¹⁵

该行动以隐秘方式进行，表明焚烧反对派书籍最好理解为对审查行为本身进行审查的企图，因为后者暗示着可能引发削弱该时期自我认知为“行动中的乌托邦”的文学、政治及意识形态煽动。（拉丁语原文保留）尽管总局官员和精选的区委官员及内务部人员被允许查阅，禁书清单仍定期化为纸浆。地方图书馆员当然会被告知哪些出版物被列为禁书，但连他们也被禁止熟悉完整的禁书目录。²¹⁶

大清洗期间，党的控制对象是文本消费者而非文本生产者。个人不仅被阻止接触不道德或危险文本，甚至被剥夺对鼓励阅读文本形成独立见解的可能。无论正统或异端的诠释，都是个人主义行为，因此被视为敌对行为。而具有自由思想的学生必定是蓄意行动的破坏者。因此当党偶尔失去对材料传播的控制，当异己出版物不顾其努力突然出现时，便认定这是敌特分子植入的。“难道我们要认为……当我们在偏远角落发现隐藏的反对派文学作品时，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没注意到？”斯莫尔尼区委质问道。²¹⁷ 1937年11月13日夜，红色教授学院的萨多夫斯基被捕，其同事担忧道：“萨多夫斯基常说‘把反革命文学拿来，我正好用它填炉子。’或许他保存这些文学是为了对付我们？”²¹⁸

最终，防止非法书籍处理的唯一方法便是消灭书籍处理者。

诠释学的极限边界

莫斯科公审持续不断的鼓点令全国紧绷神经，内务部策划的逮捕浪潮迫使所有地方党组织审查成员名册。普通成员纷纷表态：“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弱点是党组织的职责。提高洞察力……能够净化我们的队伍。”²¹⁹ 学生们将1936-37年的大学清洗行动描述为无情的“绞肉机”（俄语原文保留）与“恐怖审判”²²⁰（俄语原文保留）²²¹ 指控即定罪：当时普遍认为“若某人被捕，必是恶棍”。斯达汉诺夫运动式竞争愈演愈烈：当红色教授学院的煽动者夸耀“我们会议上火花四溅时，共产主义大学还在敷衍了事”，被指责学校的代表反驳道：“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党组织政治坚定性甚至超过红色教授学院，岂非美事？”唯一确定的是：“仔细审查人员”最终以两所机构大规模清洗告终。²²²

共产主义大学党委宣称清洗是“增强布尔什维克纪律意识的教育措施”。²²³ “当某人被开除时，受教育的不仅他一人——群众也得到教训。”²²⁴ 必须在敌人实施血腥行动前将其揭露。某学生总结近期经历：“我重复过千万次‘警惕’这个词。但直到最近几次党的会议，才最终识破敌人伪装之狡猾！”²²⁵ 另一学

生附和道：“关于警惕的这些讨论对我个人帮助很大。我在党的会议上了解的敌情比研讨会多得多。”²²⁶ 当有人敢于指出，尽管官方新闻机构呼吁警惕，但也警告‘过度防范的危险’时，普列杰将其清洗。他解释道，警惕性再高也不为过。²²⁷

1936 年夏，自我诠释学的理论与实践正经历重大变革。²²⁸ 谁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谁是“反对我们的”？党委期望诠释者能超越表面迹象，探究其同志真实、最终的本质。²²⁹ 出身不再立即给一个学生或教员贴上朋友或敌人的标签。1935 年的党员文件审查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因为它过于关注阶级：毕竟，即便是工人有时也会拒绝共产主义，正如资产阶级有时也会拥抱它。斯大林在 1937 年 6 月敦促军事委员会成员根据个人的行为而非背景来判断他们：“一般标准可能不适用于个人。当我们说贵族对劳动人民怀有敌意时，我们指的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像列宁这样出身贵族的个人人物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²³⁰

在评论其撤销对几名隐瞒社会出身学生的清洗决定时，斯莫尔尼区委以同样的论调指出：“敌人并不总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人出身于无产阶级环境，但思想未开化。”²³¹ 以下摘自红色教授学院索科洛娃的证词，揭示了斯大林的指示在列宁格勒被领会的速度之快：“当我审查与曾经在此活跃的敌人相关的文件时，我最初认为大多数是敌对阶级的子弟。但后来我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敌人。以（最近被揭露的）阿布拉莫维奇为例：他是一名教师的儿子，从未与资产阶级环境有过接触。”²³²

不仅传记背景，甚至公开表现也不足以衡量一个人。在大学里说过的话不能成为忠诚的唯一标准。7 月在红色教授学院发言时，斯克里亚比娜解释说：“虽然党的会议当然是观察人的场所，但并非唯一场所。已有足够多的例子表明，有些人喋喋不休地强调警惕性的重要性，但我们后来发现他们自己也是有污点的 *pod-mochenyel*。”当然，沉默寡言者也未必更可靠：“在有污点的人中，也有一些人从不发言。无论一个人是积极发言还是保持被动，这显然都不能说明全部情况。”²³³ 与言语同样重要的是行动——或不行动。例如，当时本应清楚——而且事后的认识对他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同事们来说无疑更加清晰——伯肯在基洛夫敞开的灵柩前未能致敬，就表明他是个敌人。²³⁴

随着诠释学成为一门直觉艺术，学生们承认他们有时很难嗅出敌人。在 1936 年 8 月的一份声明中，所罗门·埃特金承认了这种困难：“揭露是一项我们应该努力掌握的技能。”埃特金急忙列举了他自己的诠释学失误：“在莫

斯科举行基洛夫葬礼期间，我与现已揭露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成员的赫茨伯格交谈。赫茨伯格在赞扬我们的经济成就，而我认为我没有理由怀疑他。我竟然允许这次谈话发生，这沉重地压在我的老布尔什维克良心上。”²³⁵

但没有诠释者会因一次失误而受到谴责。1936年，对这个领域的新手马林的宽大处理是合理的：“诚然，马林在推荐两名托派分子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时对我们造成了损害。另一方面，他完全值得赞扬，因为他仅在我们组织内就揭露了七名，甚至可能是八名托派分子！”²³⁶

一种可能有帮助的诠释工具是面相学，一种仍然属于语言、属于符号表象层面的解读技巧。这种身体语言依赖于身体元素来表现主体非身体的内在。某些面部表情、鬼脸、咬嘴唇或口吃、异常苍白的皮肤——都可能暴露一个反革命分子。眼睛尤其具有说明性。“我不认识这个人，”许多审讯者承认。“但我可以通过他的眼睛看出他是人民的敌人。”²³⁷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曾夸口说，他“能通过托洛茨基分子眼中异样的闪光认出他们。”²³⁸

当灵魂变得可见时，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区分就无法维持了。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修辞对表面（面孔、身体、语言、服装）的强调与揭露的修辞并不矛盾：既然党的诠释学可以轻松地在表象与实质之间切换，一个人的“党的面貌”（*partiinoe litso*）和一个人的“最本质”（*lichnaia sushchnost'*）就变得可以互换了。

关于这一点，可以考虑围绕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卡申定罪的修辞，他在列宁格勒历史学院关于内战的阶级分析中犯了一些意识形态错误。“也许是他的舌头开了卡申的玩笑，”中世纪史专家鲍里斯·格列科夫在1937年3月讨论该案时说。格列科夫指出“卡申喜欢炫耀他的机智”并且“他的话里冒出了许多插科打诨”，暗示他朋友的舌头并未反映他内心的想法。²³⁹但现在既然所有隐藏的东西都浮出了表面，这样的辩解就失去了认识论上的支持。“卡申的话与其说是政治错误，不如说是他非苏联政治面貌的体现，”一位发言者指出。“卡申在隐藏他的思想，但它们现在暴露出来了，”另一位补充道。“我相信卡申内心沸腾的东西爆发出来了，”第三位发言者附和道。²⁴⁰

互相监视成为一种公民义务。在契卡-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二十周年之际，米高扬在大剧院说：“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劳动者也必须是一名安全机构工作人员。”²⁴¹国家检察长维辛斯基在1937年夸口道：“数百万人协助了我们的工作！”²⁴²

学生们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牢记在心，随时准备举报他们的同伴。²⁴³红色教授学院的斯捷潘诺夫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注意自我审问的风格如何从他的供词中跃然纸上：

在我的宿舍大厅里……住着一位叫普拉托诺夫的人，我刚得知他在昨天早上四点[1936年9月26日]被逮捕。我曾经见过他吗？我和他说过话吗？我曾经去过他的房间吗？让我逐个回答这些问题：由于普拉托诺夫的房间正对着我的，我过去常在走廊里遇到他。尽管如此，我十分自信地声明我从未与他交谈过。普拉托诺夫天性沉默寡言、冷静。只有一次我去过他的房间，请求他的妻子帮个忙——借我一根针和一个老鼠夹直到今天，我对普拉托诺夫几乎一无所知。我意识到我对自己邻居缺乏好奇心是有罪的。不幸的是，我几乎没有做什么来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人民的敌人。²⁴⁴

在一个人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也在被他人观察。宣传员明确宣布了新规定：“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研究他人，注意他的过去和现在。”家庭关系、爱好、习惯——所有这些都是关注的对象。²⁴⁵

可能许多在1920年代被判定为缺乏经验的怀疑者实际上是串通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怀疑者可能犹豫过一阵子，但一旦党作出决定，他的不确定就消散了。但总是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反对派是伪装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存其人力并在最关键的时刻从背后刺伤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假装服从官方政治路线。这种伪装被称为“双面行为”（*两面派*（*dvurushnichestvo*）——这一指控几乎加诸于大清洗的所有受害者身上。

在上述1935年1月关于《基洛夫惨遭卑鄙暗杀的教训》的信中，中央委员会指出，策划这起滔天罪行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是“我党历史上首个将两面派行为奉为主臬的集团。它不惜公开而系统地诋毁自身纲领……只为赢得我们的信任，这种行径堪称绝无仅有”。²⁴⁶ 古尔金——这位曾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求学期间浸染过季诺维也夫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军事指挥官——将两面派概念扩展到整个反对派：

若审视党史便会发现，同一群人屡屡反对党。1917年武装起义筹备期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克伦斯基泄露计划时，列宁指出这是路线偏差。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列宁将[托洛茨基]“既不战争也不和平”的政策定性为叛国。再以工会辩论为例：当党在决议根本性问题时，某些人却在暗中破坏……党要求反对派承认错误，他们别无选择便走上两面派道路。借忠诚誓言的掩护……反

对派将自己封闭在壳中，建立起地下恐怖斗争中心以对抗党。²⁴⁷

自觉敌人的典范，“双重交易者”并非出于软弱或迷惑而行动，而是出于恶意的算计。作为被指控策划基洛夫暗杀案的恐怖分子，德米特里耶夫向审讯者承认：“自 1930 年起，我就是个双重交易者，因为我向党隐瞒了一个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主义组织的存在。”²⁴⁸

双重交易者在理论上是复杂的，科托维奇于 1936 年 11 月 21 日在红色教授学院警告他的学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声称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只是追求权力，这是一个故意传播的传说，以掩盖他们恢复资本主义的计划。托洛茨基公开讲话，但他在苏联国内的支持者必须隐藏他们的复辟野心，并追随双重交易者犹大。”²⁴⁹ 此处引用圣经中的叛徒并非偶然：犹大的名字，作为背叛的象征，与那些在 1917 年前欺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密探以及之后的反对派人士可以互换。无论其实际面目如何，双重交易者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所理解的背叛原型与更具体的斯大林主义背叛类型之间的联系。

不愿彻底悔改地承认异端邪说是双重交易的明显迹象。²⁵⁰ 来自共产主义大学的叶弗里姆·奥尔洛夫接受了他的儿子可能受反对派中心指令行动的可能性，他的儿子在 1920 年代曾投票支持托洛茨基的纲领：“尽管当时我没有读他的悔改声明，但我现在相信那是双重交易。”奥尔洛夫对他年轻的莫伊塞抱有希望——“我越和他交谈，他的忏悔就越真诚”——但党没有。两个奥尔洛夫都因伪装而被清洗。²⁵¹ 来自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的阿列克谢·米亚辛支持他妻子恢复党籍的申请，尽管她是一个已知的反对派。他也在 1935 年被清洗为“双重交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保护者”。²⁵² 作为被指控的基洛夫阴谋者之一，米亚斯尼科夫在 1934 年 12 月的审判中谈到了双重交易：只有“与动摇者和怀疑者断绝任何联系的人才能声称自己没有双重交易。”²⁵³

双重交易者很可能将同志引入歧途，并在必要时清洗更警觉的同志，以便反对派能够保留其干部。1936 年 11 月 2 日，加布里埃利亚诺夫谴责共产主义大学的同事尤苏波夫为“双重交易者。在科学院工作期间，尤苏波夫知道一个小共产主义团体与‘纯血统’党员之间发生的激烈斗争，这些党员后来被证明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但他更愿意与这个团伙的成员保持关系，而不是保持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队伍的纯洁性。”尤苏波夫的双重交易在于他试图“摆脱多余的、洞察丑陋现象核心的眼睛。”²⁵⁴

能够解释即使是最受信任的教授也可能成为敌方鼯鼠，“双重交易”体现

了敌人的难以捉摸。尽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坚持，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对他的食品工业学院老师加尔佩林试图将他拉入反革命组织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足够博学，能够理解谈话中的倾向。但我没有注意到加尔佩林把我推向了错误的政治方向。据我所知，他可能有第二张脸[*vtoroe litso*]，但我只能为我所知的那张脸负责。”²⁵⁵

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揭露为双重交易者的消息传到红色教授学院时，历史学家沃洛达斯卡娅评论道：“尽管国际媒体对最近的逮捕事件议论纷纷，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力量的源泉在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开放性。战争即将来临：我们很高兴内务人民委员部切除了这个毒瘤。”同样来自红色教授学院的 I. I. 纳安承认，1937 年 5 月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红军将领的被捕“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那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一直担心那些混蛋泄露的所有秘密。”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叛徒？²⁵⁶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内心折磨吸引了每一个有意识的列宁格勒学生。被指控间谍罪，1937 年 5 月 27 日，红军首领屈服并承诺“纯洁的心忏悔”(*chistoserdechnoe priznanie*).²⁵⁷ 抓住机会，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维尔·迪本科要求关于双重交易经验方面的细节：“你是如何将叛国[*izmena*]，背信弃义[*predatel'stvo*]和间谍活动……与持有党证结合起来的？”图哈切夫斯基机械地告诉他，“在[反对派]团体的控制下，我被拖上了卑鄙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但我仍然热爱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所以我犯下反革命行为时，我是在与自己作对[*razdvaivalsia*]。”²⁵⁸

对于双重交易者后天形成还是天生的，意见不一。根据伏罗希洛夫的说法，元帅的“道德堕落[*moral'naia razlozhennost'*]……随着时间发展成为背叛。”²⁵⁹ 作为战争委员，他于 1937 年 6 月 7 日签署了一项法令，指出“活着腐烂的人”(*zazhivo sgnivskie liudi*)开始同情德日法西斯主义。²⁶⁰ 其他人则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性情中看到了某种天生的东西。莫斯科军区司令布琼尼认为他的叛国行为早在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前就开始了。“你的目标一直是击败我们的军队，”迪本科附和道。“你说你 1918 年从战俘营逃脱后返回俄罗斯。我认为你从未逃脱：你是被德国派来监视我们的。”图哈切夫斯基的反驳暴露了他对大清洗时间性的无知：“既然我在十月革命前就逃离了德国，我怎么可能被命令解散苏联军队。”他是房间里唯一一个将时代错误视为问题的人：阴谋家不是有逐步展开传记的个人，而是超越时间及其法则的普遍类型。

斯大林在 1937 年呼吁同志们将党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双重交易者”将被消灭。²⁶¹ “识别……腐烂的双重交易者的能力”至关重要，其不断增长的意识使党委员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²⁶² 1937 年 4 月，共产主义大学确定其一名学生萨任一直是一个恶意的双重交易者。党组织负责人伊林获得了一份旧的党记录速记稿，表明萨任在与联合反对派的讨论中批评了中央委员会。“1927 年我只是一名党员候选人，我们的组织离我的村庄 37 公里远，”萨任反驳道。“当时我不认识任何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不了解政治。”但对维诺格拉多夫来说，这种道歉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萨任的双重交易：“他一定在某个地方听说过托洛茨基的成就。

我回想起勒热夫市的一次共青团会议，托洛茨基在那里受到赞扬。人们记得他在那里的演讲，但他却莫名其妙地不记得。”萨任被一致清洗，党委员会的雅·K. 布季科评论说，“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普遍教训，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何很好地隐藏他们的真实自我。”²⁶³

双重交易的幽灵笼罩着每一个集体，无论大小，在党等级中高低——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威胁，没有比这更有威胁性的个人。这些特殊类型的叛徒虚伪且完全伪装，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在背后捅党一刀的同时遵循官方仪式。

全面控制：1936 年的党证交换

与 1935 年的审查类似，在 1936 年大部分时间进行的所谓党证交换开始时只是一些官僚事务：替换自 1926 年以来设计未变的旧党证，换成新党证。²⁶⁴ 尽管斯莫尔尼区委员会的描述只提到在交换前几天与特定持证人员进行“同志式谈话”，但记录显示，苏联国家镇压能力的要素——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察、检察机关雇员——逐渐充实了列宁格勒的交换委员会。²⁶⁵

在共产主义大学启动交换的仪式上，区委员会宣传员古谢夫强调了诠释学。“我们的党组织必须提高每位同志的警觉性和战斗准备状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指出，“自审查以来的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发现了三个额外的阶级异己分子：莫霍夫、佐里娜和丘扎科夫。”²⁶⁶ 大学领导一致同意：“尽管我们在基洛夫暗杀后立即开始清洗我们的党组织（122 名学生被清洗），但我们在 1935 年没有揭露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的盲目允许伪装的敌人未被发现。”²⁶⁷ 普雷德得知区委员会揭露了安德烈耶娃时感到震惊：她曾是共青团部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难道敌人已经渗入清洗活动本身？²⁶⁸

在交换党证的过程中，共产主义大学从 851 名成员中清除了 34 人（3.9%）

出党；另外几名学生被降级为“候选人”或“同情者”。“党同情者”小组是在 1934 年 2 月第十七次党代会决定后在支部一级创建的。²⁶⁹

广义上解释，“党证交换”成为一个涵盖 1936 年大学党组织所有开除的总称，无论是由基层发起还是高层命令。德米特里耶夫、伊扎克，以及其他在春季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反革命领导人”被列入官方的“党证被撤销个人名单”，与那些因相对轻微的污点而被大学当局开除、揭示其性格弱点的学生并列。²⁷⁰

如果仔细阅读交换报告，它们准确反映了叶若夫上台后内部敌人定义的变化。5 月，当只有几张党证被替换时，交换委员会将清洗者描述为阶级污染物，“一种粘附的渣滓”（*nakip'*）²⁷¹。但到了 10 月提交最终报告时，阶级语言不再被使用。斯大林的宪法不是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吗？²⁷² 现在，被开除的人被贴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人民公敌”和“异己分子”的标签。²⁷³ 秦，一位为大学杂志报道交换的韩裔共产党员，在 6 月确实提到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莫洛霍夫被“剥夺选举权”，而加米涅夫（一个不幸以现在名誉扫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命名的青年）是“商人的儿子”。但新的政治词汇出现在文章选择的标题中：“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清除出党”，在文章中，秦猛烈抨击了“反革命诽谤的贪婪消费者”，以及那些“表达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的人。²⁷⁴

与 1935 年的审查相比，现在不仅显示出对反对派更协调的攻击，而且官方术语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个新时代，没有反对派是“前”（*byvshie*）——这些敌人非常活跃。在一个相关的分类转变中，“异己分子”（*chuzhdyi element*）——即潜在的敌人——变成了“敌对分子”（*vrazdebnyi element*）：完全成熟的敌人。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活动分子”被揭露。²⁷⁵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后代”无处不在。许多被揭露，但更多仍隐藏着。一旦学生被指控托洛茨基主义，他几乎无法自拔。阿列克谢·特罗菲莫夫的工人阶级背景在他试图解释列宁遗嘱副本到手并不意味着他与反对派有联系时毫无帮助。²⁷⁶ “我做错了什么？”他问道，“我只是从区委大楼玻璃书柜里随手拿起一卷书，偶然看到反对派声明，内容大致是‘斯大林态度粗暴’、‘斯大林不适合担任总书记，应由皮达科夫取代’。当我在宿舍提及这些时，不幸造成了误导性印象，让人以为这是列宁而非反对派对斯大林的评价。”

特罗菲莫夫不仅阅读禁书、发表反对言论，还突然变得可疑地沉默。对于

这样的控告，特罗菲莫夫只能回答说，别人曾抱怨他性格执拗，把他的观点视为异端邪说，因此他决定减少不必要的交谈。对党委而言，这套说辞毫无说服力。德里兹援引此前的“托洛茨基主义爆发”，对特罗菲莫夫近期的沉默作出了险恶解读。

“两面派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他厉声强调，“虽然特罗菲莫夫通常偏好暗中反对党，但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他的高谈阔论绝非偶然，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态度的迸发……特罗菲莫夫不去读报了解身边动态，反而倾听反革命低语。任何熟悉党史的人都不必提醒皮达科夫动摇过多少次。况且列宁的三十卷著作中从未有一处表示皮达科夫优于斯大林。”

特罗菲莫夫立即反驳：“您的意思是我成了托洛茨基分子？难道我连和朋友交谈都不行了吗？”

“别胡说八道，特罗菲莫夫，”图赫塔梅舍夫打断道，“你必须说话，但要说共产党人该说的话。如果你继续以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方式说话，我们就消灭你。”

特罗菲莫夫否认他在多言与寡言之间的摇摆与异端思想有任何关系：“你们要我说出我反对主义的根源在哪里。但是同志们，我需要重申，我从来不是反对派的一部分！”然而，过去不再那么重要；当前最轻微的政治异端就足够了：这里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尽管没有人能证明特罗菲莫夫与反对派有任何联系，但他处于严重困境。

党委员会看到的不是一个困惑的同志，而是一个需要被压倒的敌人。在他最后的行动之一（他将在几周后被清洗），普雷姆扑向了特罗菲莫夫。尽管随后的审讯类似于 1920 年代标准的政治挤压，但举证责任落在被告身上：

q：托洛茨基何时加入季诺维也夫？

a：大约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那时，托洛茨基反对派很突出，因为这是“工业化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我们国家的工业化。

q：季诺维也夫是右翼反对派的一部分吗？

a：不，他是左翼。当两个反对派合并时，他加入了反革命阵营。

q：那发生在何时何地：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是会议上？

a：合并发生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之前，大约在 1928 - 29 年的某个时候。

q：为什么你同时提到两年？我们曾经有过持续两年的代表大会吗？

除了偶尔不准确的日期外，特罗菲莫夫给出了正统的回答。但审讯已经转向了一个新的基础。与他 1920 年代的前辈可能给予特罗菲莫夫疑点利益不同，普列姆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对党史了解不多，但反对派散布的每一则诽谤都让你感兴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不再是启蒙——特罗菲莫夫知道什么和他必须学习什么——而是他追求什么样的知识，“我们的”知识还是“他们的”知识。

“也许，”普列姆思考道，“当你在研究某个主题时，你对反对派对此的言论产生了兴趣。这里有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你坐在椅子上，下一刻就冲向区委员会的秘书处，寻找一些反对派文献；实际上，我应该说，那些曾经被称为反对派但结果被证明是反革命渣滓的人。”普列姆假设区委员会书架上的大多数书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那么，为什么突然对反对派文献产生好奇？”“我已经读过经典了，”特罗菲莫夫咕哝道。“我在家里有这些书。我在小组里谈论反对派文献是因为我假设这里的同志们足够有文化，能够纠正我的错误。”

这引发了一个相关问题。“看看那个，”震惊的戈姆佐娃指出。“十二名共产党员与特罗菲莫夫生活在一起，但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他的反革命行为是什么性质！”交换委员会也没有掩饰其不满：“尽管多次呼吁保持警惕，特罗菲莫夫的违法行为被隐瞒了一个半月！它们发生在五月，但直到六月逮捕后才被报告。这里一定有人在掩护托洛茨基分子！”小组秘书图赫塔梅舍夫解释了发生的事情：“绝对如此，特罗菲莫夫所说的话明显是对我们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诽谤。我向卡申报告了，他让我指示特罗菲莫夫重新阅读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偏差的文献。”特罗菲莫夫能否被再教育是一个未决问题；图赫塔梅舍夫认为，他的职责“是继续审查特罗菲莫夫，寻找他反党情绪的根源。”

特罗菲莫夫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解释了他们对他“托洛茨基主义事件”的看法。谢尔盖耶夫回忆道：“我正试图入睡，所以不记得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然后随着谈话的进行，我竖起了耳朵。特罗菲莫夫站在角落里，埃列明和卡申正在和他说话。第二天早上步行去学校时，我和彼得罗夫讨论了这个案子。我们得出结论，特罗菲莫夫说话的方式像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话必须被报告一

一煽动者不能留在我们中间。”总的来说，谢尔盖耶夫对自己的警惕性感到自豪：“我可能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但我及时弄清了情况，并向我们的宣传员布拉金报告了一切。”

卡申不能说得那么轻松，因为他收到过对特罗菲莫夫的投诉却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大家对特罗菲莫夫保持沉默了两个月，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他说。图赫塔梅舍夫说，当那场可耻的谈话发生时他在睡觉，“但这是一个谎言。”图赫塔梅舍夫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实际上，是卡申不愿意报告特罗菲莫夫。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我反对从卡申的党证上删除谴责，现在每个人都能看出我是对的。”

埃列明也明白他面临一场斗争：他的室友们认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分享秘密。彼得罗夫作证说：“当我走出房间时，我无意中听到埃列明和特罗菲莫夫在谈论列宁的遗嘱。当我回来时，谈话停止了。”谢尔盖耶夫已经转向攻击埃列明。“当我们去参加巴甫洛夫的葬礼时，”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行为心理学家，谢尔盖耶夫回忆道，“埃列明问道，‘这个巴甫洛夫到底是谁？他不是经常去教堂吗？另外，你没注意到《真理报》没有称巴甫洛夫为‘同志’，而只称‘巴甫洛夫院士’吗？”埃列明的“非共产主义态度”那时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没人应该惊讶他与特罗菲莫夫勾结。

普列耶夫阐述了在争论过程中变得明显的事情：“在我们的小组里有敌对阵营。内部紧张使其成为一个不健康的地方。”交换委员会因托洛茨基主义清洗了特罗菲莫夫；埃列明因“同情特罗菲莫夫”被清洗。这个“自满小组”的其他五名成员收到了简短的谴责，小组被解散。

学生们的共同生活既亲密又带有强制性，将熟悉感和无情的相互告发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权力掌握在那些能够展示他们不仅意识清醒、意识形态训练有素，而且足够纯洁，能够评判他们较不成熟的同志，并决定他们的屈辱是否足够深刻以及自我纠正运动是否成功改善了受审查学生的品格的人手中。

领导者的享受：幻想还是噩梦？

学生小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总体机构。不断暴露在小组中确保了相互监控是绝对的——贯穿日常活动，如学习、吃饭和看电影。但教职员工呢，那些受信任向学生传授斯大林教导的人？谁监控这些教员的思想、欲望和行为？难道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居住在教授队伍中，恰恰是因为讲师们可以退回到私人的、受

保护的空間嗎？在這方面，別墅，像學生宿舍一樣，可以逃脫黨的紀律目光。

經驗豐富的革命者需要一個地方從勞動中恢復，到 1930 年代中期，大多數高級黨員都有“個人”鄉間別墅。²⁷⁷ 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在莫斯科附近擁有別墅；斯大林於 1934 年搬到了他在昆采沃的豪華隱居地。作為一個烏托邦空間、一個放鬆和恢復活力的場所，別墅仍然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地方，享有特權但不受控制，純潔且當之無愧，但也容易腐敗。1937 年 7 月，一名國家官員報告說，過去一年里，一個由老布爾什維克經營的合作社的三十四名成員被逮捕。“我們為人民的敵人提供了別墅。”²⁷⁸

1936 年，共產主義大學重提一樁舊案——揭露沃茲德維任斯基教授事件。這位異見文學的愛好者曾組織教職工讀書小組，在黨管理的療養地“青年村”聚會。如今，他 1924 年的檔案被重新翻出，原來沃茲德維任斯基與同黨躲進樹林確有緣由——他們在閱讀哲學家波格丹諾夫的著作，此人曾公開批判列寧。校黨委現在更加警覺，試圖徹查所有利用沃茲德維任斯基接觸精英避暑別墅及隱秘酒店客房之便、散播反革命學說者。²⁷⁹

別墅亦曾為紅色教授學院的伊瓦申科夫提供避風港，使其得以與反革命親屬帕夫柳申科會面。後者於 1937 年 10 月 29 日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顯然是人民的敵人”——伊瓦申科夫則因這段與敵共處的假期受到審問。事情起初何其無辜：“去年三月，帕夫柳申科攜妻造訪列寧格勒。我們決定合租夏日別墅。”然而伊瓦申科夫深悔自己的輕率，尤其因為“我始終對帕夫柳申科存疑：作為斯摩棱斯克省委秘書，他曾因斯摩棱斯克丑聞遭清洗，後又復職。有次我問他是否對黨懷有怨恨。”不，’他答道，還補充說，’幾年前奧爾忠尼啟則授予我勳章時，我深感榮幸。’”那年夏夜，當話題轉向近期清洗時，帕夫柳申科掩飾著真實情感。“他慣常痛斥人民的敵人，反復說道：’他們要把我逼進墳墓了。’”

紅色教授學院的拉比諾維奇認為，伊瓦申科夫本該三思而後行，不該與反對派分子同往鄉間：“1928 年工人們都嘲笑帕夫柳申科。你知情吧？他們當時喝倒彩。”巴辛則從可靠渠道获悉，當看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工靠近別墅花園時，帕夫柳申科曾惊呼：

“莫非冲我们来的？”（*Не к нам ли?*）这句无心之言实为认罪表态，本应引起伊瓦申科夫警觉。

伊瓦申科夫竭力辩解：“帕夫柳申科那句‘是来抓我的吗？’（*Не за мной ли?*）恰是被捕当日所言。”伊瓦申科夫版本的问话与巴辛所述至关重要：特工并非针对别墅里的任意一人——他们直指帕夫柳申科，而后者做贼心虚暴露了自己。尽管校党委免除伊瓦申科夫两面派的指控，仍严厉批评其判断失误：与可疑分子共用别墅属于“严重政治错误”。²⁸⁰

阴谋在别墅间流转。每个阅读报纸的党员都知晓，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组织领导层的关键会议在莫斯科郊外伊林斯科耶的别墅举行。据加米涅夫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的供词，正是在此地决定启动列宁格勒地下组织。季诺维也夫也是在此命令卡雷夫与扎伊杰尔刺杀基洛夫。²⁸¹ 而德米特里耶夫供认，整个1935年间，共产主义大学高级教职员——“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惯常在列宁格勒郊外的亚历山德罗夫卡别墅聚会”。²⁸² 当普列姆被怀疑包庇这批所谓颠覆分子时，他被质问：“你是否习惯与德米特里耶夫在他的别墅消磨时光？”他答道：“我住在另一栋楼，但每晚都一起打排球。德米特里耶夫、佩切爾斯基，有时叶列緬科[作证时均已入狱]都在我队里。”²⁸³

这番轻描淡写看似随意的提及不容忽视。在别墅里人们不工作——而是嬉戏。而嬉戏作为新人想象力与自由的表达，也可能沦为懒散与道德堕落的温床。

新人理应谦逊克己。他不应耽于享乐，尤其不该沉溺于享乐主义的自我放纵。党将无目的的活动呈现为资产阶级无休止积累冲动导致的过度与冗余。承袭革命苦行者抛弃优渥生活的悠久传统，正直的党员甘愿承受现世的匮乏。为强化世俗资产阶级价值观与己方关于牺牲、平等、共同体理念的对比，多数党领导层饮食简朴，身着军装或类军装服饰。

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层却与这一理想相距甚远，沉溺于放纵。在遥远之地，隐匿于奢华避暑胜地，他们得以接触秘密享乐。他们很快“习惯于长期居住在芬兰铁路沿线的大学别墅”。伴生之罪则是

驱车前往乡间，某证人称其为“将犯罪团伙更紧密联结的奢侈享受”。²⁸⁴ 他们被“装着法国锁的栅栏……环绕着农奴”与学生隔离，生活得如同“封建领主”。

285

按党的宣传家所言，除了贵族幸存的个体——小商贩这个社会他者，竟有人敢沉溺于别墅嬉戏简直匪夷所思。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此类越轨行为竟爆发于党的领导层。这如何解释？绝非社会保守主义作祟——掌权者过于年轻，不符合资产阶级刻板印象。精英兄弟会遭遇了什么？它已不再是纯粹的乌托邦集体，这对大学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

官方试图控制现实方方面面、消除戏剧性与嬉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斯大林主义无法驾驭想象力，反而创造了某种话语结构，让作为终极禁果的幻想从中逃脱。这种逃脱不可避免，因为压制幻想的幻想本身即具内在矛盾。党的宣传家们带着自虐式的重复，回应着深刻的不信任感，不断重返内务人民委员部道德败坏的场景。还有什么比新精英的颓废生活方式更不堪？这些被《真理报》记者们，既被憎恨又被羡慕。

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更丑闻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记述，一位 1938 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间谍，保留了一种过度行为的感觉。最让奥尔洛夫困扰的是，在将他们的放荡限制在秘密隐居处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雇员后来开始公开饮酒和赌博。使情况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奥尔洛夫，原来，是由伯尔曼招募的，我们从他对特-瓦加尼安的审讯中熟悉。一天晚上，伯尔曼顺便拜访了奥尔洛夫的办公室，并邀请他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俱乐部，那里外交部组织了一个化妆舞会：“部门主管们试图在组织豪华舞会方面互相超越。前两个舞会，由特别部门和边防部队管理局组织，证明是巨大的成功并引起了轰动。新贵族的苏联女士们蜂拥到她们的裁缝那里，订购晚礼服，并屏息等待下一个舞会。”²⁸⁶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内务人民委员部党委员会的秘书，决定向“粗鲁的莫斯科人”展示一个真正的化妆舞会，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见过的任何东西一样夸张。内务人民委员部模仿反动力量，无论在哪里找到它们，无论是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豪华俱乐部已被变成典型的特权沙皇团军官俱乐部”），还是在衰落但奢华的西方。

奥尔洛夫后来提供了对派对的详细描述：

俱乐部的豪华舞厅灯光昏暗。从天花板的中心悬挂着一个大的旋转球，由小镜面棱镜制成，在整个地方撒下了一场真正的雪花般的闪烁光点。

身穿燕尾服和制服的男士，身着晚礼服和轻歌剧戏服的女士们，随着爵士乐队的音乐翩翩起舞。许多女性戴着面具，穿着极其华丽的服饰，这是斯卢茨基从莫斯科大歌剧院的服装库借来的。桌上摆满了香槟、烈酒和葡萄酒的瓶子。喧嚣声、粗犷的笑声和窃窃私语淹没了音乐声。

此处描绘的一切场景皆为幻象。描述那么多本职是揭除叛徒面具的人却戴着面具，这令人深思。一种奇特的幻想在烛光下上演，一种角色互换的幻想。但谁是这幻想的主体？谁是这叙事的作者？是典型的内务部主任斯卢茨基，其幻想涉及扮演反革命的角色？还是众所周知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奥尔洛夫，他想象着自己正在揭露内务部的真面目？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一位内务部上校在醉醺醺的狂喜中高喊：“哦，小伙子们，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快乐的童年！”他可能是认真的吗？革命的承诺实现了吗？还是反革命早已从内部吞噬了社会主义，使堕落的特工得以放纵其反常行为？自我放纵的倒错与亵渎招来了性暗示评论。难怪内务部经济管理局局长米罗诺夫用以下恭维来助长斯卢茨基的虚荣心：“不可否认，你会成为巴黎一流妓院的好老板”？²⁸⁷

如果说这很可笑，那这幽默确实是黑色的。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沉溺于性很容易成为危险的瘾。一位同志为性满足的愉悦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意愿破坏了集体性，使共产主义成为不可能。“在性交过程中思考……无产阶级的需求是如此困难，”一位学生在1927年指出。²⁸⁸十年后，官方路线宣称，苏联人民已超越了人体的极限，结合了青春和成熟的最佳特征，却没有两者的任何缺点。性的界限已被克服：完美新人类是无性的。²⁸⁹ 党机关和志愿组织致力于禁止一切性交；它将被人工授精所取代。²⁹⁰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务部主任们的堕落成为针对该机构的揭发材料中的一个标准主题。²⁹¹ 来自南方的调查员伊·伊利

因回忆了他所在机构的氛围：“通常，在罗斯托夫没有一次行动会议不以大量饮酒和性放荡[性放纵]结束……至少持续二十四小时。有时，直到第三或第四天才能在某处的旅馆里或与妓女一起找到行动人员。”²⁹² 到1930年代初，东部处安全资源负责人乔治·阿加别科夫将精英阶层描述为惯常沉溺于最卑劣行为的狂人。他将东方秘密行动负责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彼得斯描绘成“骨子里的堕落。彼得斯出行从不离开他的小型女性秘书团。当他玩腻了其中一个，就会当场把她甩掉。”²⁹³ NKVD 首领沙宁的过度行为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似乎他喜欢年轻人：“组建了一个由秘书和打字员组成的整个团体——[女性]享受这类小庆祝活动。”²⁹⁴

沙宁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至高首领雅戈达，树立了纵欲的榜样。据同时代人描述，雅戈达是个“放荡[raznuzdany]成性、永无止境索求女性的人”。据记载，他在莫斯科高尔基的寓所和自家别墅举办狂乱聚会。²⁹⁵ 当雅戈达于1938年被捕时，其办公室查获了165件由象牙或琥珀制成的阳具烟斗，以及一个橡胶阳具（*faloimitator*）。除这些玩意儿外，他还收藏色情电影，并向密友展示。²⁹⁶ 他的继任者叶若夫与所有人滥交，无论男女。他曾供述利用别墅与其朋友、红军政工人员康斯坦丁诺夫进行“鸡奸关系”：“1938年他在我别墅待过两三次……受我邀请。”²⁹⁷ 而叶若夫是在何处作此供述？正是在他下令建造的臭名昭著的苏哈诺夫卡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无人不称其为“别墅”²⁹⁸。

叶若夫的继任者拉夫连季·贝利亚也被描述为性变态狂。这种话语定式必须被解释为一种类型，是共产主义想象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预先塑造的典型。从审讯记录中跃然而出的，并非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神话般的终极反派。贝利亚于1953年入狱，被迫承认其日常生活的“堕落本质”以及他与女性“肮脏且不加选择的交往”。²⁹⁹ 与雅戈达的情况一样，在贝利亚办公室发现的物品清单说明了一切：十一双丝袜、十一个丝绸胸罩、七件丝绸睡衣、女性运动服、性玩具、色情物品、淫秽情书，以及“大量男性放荡用品”。³⁰⁰

在布特卡监狱期间，贝利亚的副手萨尔基索夫上校编制了一份他老板性征服对象的目录，包括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名单上有三十九个名字，而另一些则说是七十九个。贝利亚曾一度喜欢谈论他的“情妇们”，他这样称呼她们时带着明显的自豪。知情人士说，年轻女性

是从莫斯科街头被他的保镖绑架来的。她们通常被带到贝利亚在城里的房子或他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有鲜花、美食和糖果等待着她们。这一切都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没人看见任何事情，尽管人尽皆知。

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关于终极诱惑者的神话故事一样，关于叶若夫和贝利亚堕落行为的叙述缺乏连贯性。早在掌权之前，叶若夫就能把他想要的任何人弄上床。他蜡黄的脸色和肺结核——根据一些描述，叶若夫在谈话时会大量吐痰——丝毫没有削弱他的性吸引力。贝利亚则有着珠子般的眼睛、过大的鼻子和秃顶的脑袋，被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娅形容为“一只丑陋、无形的癞蛤蟆”。³⁰¹ 然而，他却设法用以下台词迷住了一个青春期女孩：“你的樱桃小嘴多可爱啊！你有着维纳斯般的身材！”³⁰² 回忆录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贝利亚的形象：他有着无尽的淫欲（他生了许多孩子，被其下属安置在国家孤儿院），却又非常自律。很难说这个神话般的恶棍是为了他的警察职务而利用性，还是反之亦然。他可能会利用敲诈来获得性，例如，当他威胁奥库涅夫斯卡娅，承诺释放她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和祖母（实际上两人都已被处决），迫使她与自己发生关系时。但他也可能为了实际目的而利用性，比如他勾引了基拉·阿利卢耶娃的一个朋友，以便让她监视斯大林的女婿。

特权、摆脱党组织的控制、身体和思想的堕落、放纵而病态的性行为——所有这些都通过转喻联系在一起，并浓缩在乡间别墅狂欢的剧场中。同志们在这里尤其放荡不羁，与群体中的任何其他成员进行无休止的性交。³⁰³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曾作为安全部门特别处的狂热头目而闻名并令人畏惧，他在1937年被指控组织了一个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共济会支部。³⁰⁴ 他还被指控在其位于库奇诺的“夏屋公社”对客人实施了一部严苛的无耻淫荡章程。了解库奇诺狂欢活动的戈皮乌斯医生告诉审讯者，“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参加浴室活动。”没有例外，甚至博基的两个女儿也不能幸免。在公社的章程中，这被称为“亲近大自然母亲”。参加狂欢的人都回归到了最原始的状态。在一个直接取自《创世记》的场景中，欲望是未知的，自然的需求轻易地由丰饶的大地母亲满足，冲突和不满都不可能产生。共产党人将这种完美过去的原型投射向未来，而现在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乡间别墅中得以实现。博基的章程——普遍参与——是对天堂的拙劣模仿：所有人都被期望“打理当地花园”并“裸体或半裸体地走动”。³⁰⁵

克利缅科夫是博基的另一个同伙，他补充了细节：

“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妻子来到别墅。非成员也被邀请，包括妓女。”根据博基的指示，侍者——都是布尔什维克精英成员——饮用了大量酒精，然后去了浴室，在那里他们进行交媾：“女性习惯上被哄骗喝酒、脱光衣服，然后被‘使用’。男人们轮流与她们发生关系。”作为等级的标志，博基同时占有数名女性。

客人们集体做所有事情：他们成群结队去浴室，并参与“集体性堕落”（*gruppovoi polovoi razvrat*）。在这里，共产主义乌托邦变成了反乌托邦：集体活动变成了轮奸的形式；对女性的羞辱和骚扰被证明是巩固无产阶级团结最可靠的方式。

潜在的暴力常常爆发出来：“醉酒狂欢常常伴随着斗殴，当男人们注意到他们妻子的堕落行为时，斗殴就演变成混战。通常，疯狂的流氓行为之后是相互羞辱：喝醉的人会被在生殖器上涂上颜料或芥末。如果他们睡着了，可能会被活埋。”当大多数狂欢者裸体游荡时，会有两三个人穿上从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取来的牧师服装，主持“醉酒的礼拜”。

这个颠倒世界的主人公因他如此喜爱的哥萨克式的阈限行为而获得了“巴季科·博基”的绰号。正如奥尔洛夫的叙述一样，反革命特征——道德堕落、淫秽语言、好色——被归于安全部门。雅戈达狂欢的身体素材必须是共青团女孩；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只有毁掉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女儿时才能享受。对于像彼得斯这样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审讯者来说，这种施虐的战栗想必更加甜美，因为这些无产阶级贞洁的捍卫者，恰恰扭曲了他们本应保护的共产主义灵魂。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狂欢作乐的传言已流传多年，但直到 1936 年才有人指出这些事件必须被严肃对待，视为一种危险活动。戏仿褪去了伪装，显露出对社会主义秩序的真实威胁。根据官方记录及其衍生的民间叙事，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的罪孽远超过其模仿的资产阶级习气。当斯卢茨基、雅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的内外自我裂痕赫然显现时，正是他们对这种分裂的明显意识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外在自我必须彻底伪装。

资产阶级曾将私人自我置于公共自我之上。他们也在乡间别墅沉溺于非法享乐。但这关乎意识问题：充足的政治教育足以使这类人摆脱堕落。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则截然不同：他们在别墅中的性游戏并非致敬资产阶级私人领域，而是作为充满活力的反革命仪式上演。

如今无人能断言这些淫乱聚会是否真实发生。现有证据——破碎且耸人听闻——不足以支持判断。但在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的幻想比现实本身更真实。它们构建欲望，勾勒满足与耗尽的场景，界定道德想象。在幻想中，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行使着巨大权力，操纵人物与情境以满足自我。由于这些场景是令人愉悦、厌恶抑或兼而有之尚不明确，谁创造了它们及其目的问题必须搁置。这些传说如同谣言，没有确定作者，也没有确定受众。³⁰⁶ 然而，它们所正当化的暴力使其与大清洗存在无可争议的关联。³⁰⁷

尽管关于淫乱聚会的某些问题无法解答，其他问题则可以。是什么使幻想场景对当时人可信？为何其中如此多涉及性变态行为描写？幻想的噩梦塑造出内部敌人形象——那些亵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 insider，并将其与其他反革命形象相联系。因此雅戈达与叶若夫的淫乱聚会，对应着强加于德米特里耶夫、伊扎克和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的特殊阴谋指控。无论事实或捏造，这些案件赋予邪恶可辨识的面貌。斯大林主义狂热者如今有了恐惧、揭露和斗争的对象。

维系精英兄弟会的要素超越了一套象征性认同：共享的价值观、理论教条和信念。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缺乏一个能一劳永逸界定“意识”内容的实质标准。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每日都在经受考验，但精确界定证明自身清廉所需行为极其困难。鉴于此困境，可能的出路是将意识转化为自我掌控与自我克制：服从身体规训技术。随之产生的压制性动态在分析层面呈现其反面：对无节制性满足的幻想。

以此观之，联结共产主义者的纽带隐含着对越界享乐的共同态度。官方话语可根据政治形势不断重构，而纯粹性幻想的坚硬内核却转变为抗拒清晰符号征召的噩梦。斯大林主义将其内在的不可能性投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这一暧昧形象——这个既陌生（又如此亲密）的肉体将腐化引入健康社会肌体。这个畸形个体作为恋物癖，既否认又体现纯粹集体的结构性不可能性：仿佛在这个形象中，不可能性获得了积极可触的存在。而据称他参与的淫乱聚会标志着享乐的迸发：吊诡的是，无拘束的性形象同时扮演着

双重标志——既是解放新人的来临，又是触及（性）他者、重建（性、阶级）差异的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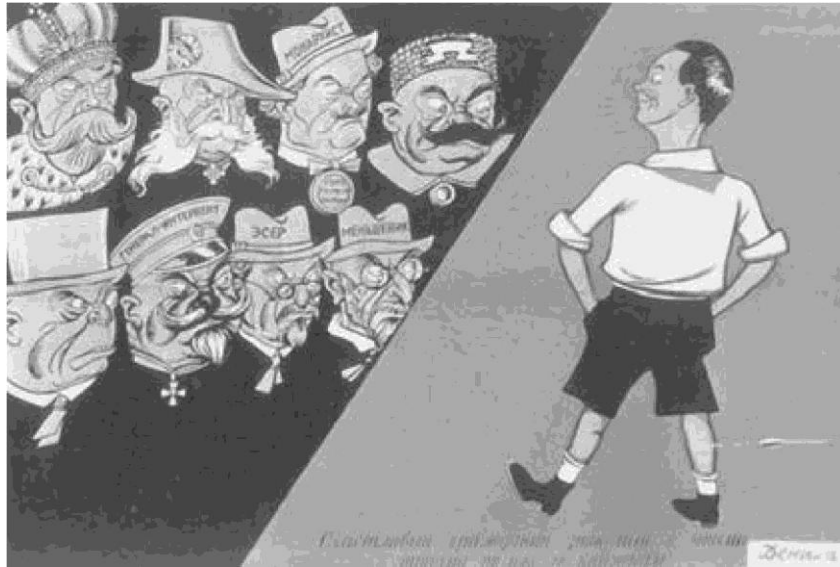
若最初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共同沉浸于宏大放纵（何乐不为？毕竟每个共产主义者都是某种契卡），随后则对其纯洁性产生担忧并转而反对他们。

³⁰⁸ 大清洗期间大量调查员被捕处决：1936 年 506 人；1937 年 3679 人；1938 年 1 月至 6 月 3113 人。³⁰⁹ 对他们的妖魔化渗透着识别与斗争过度行为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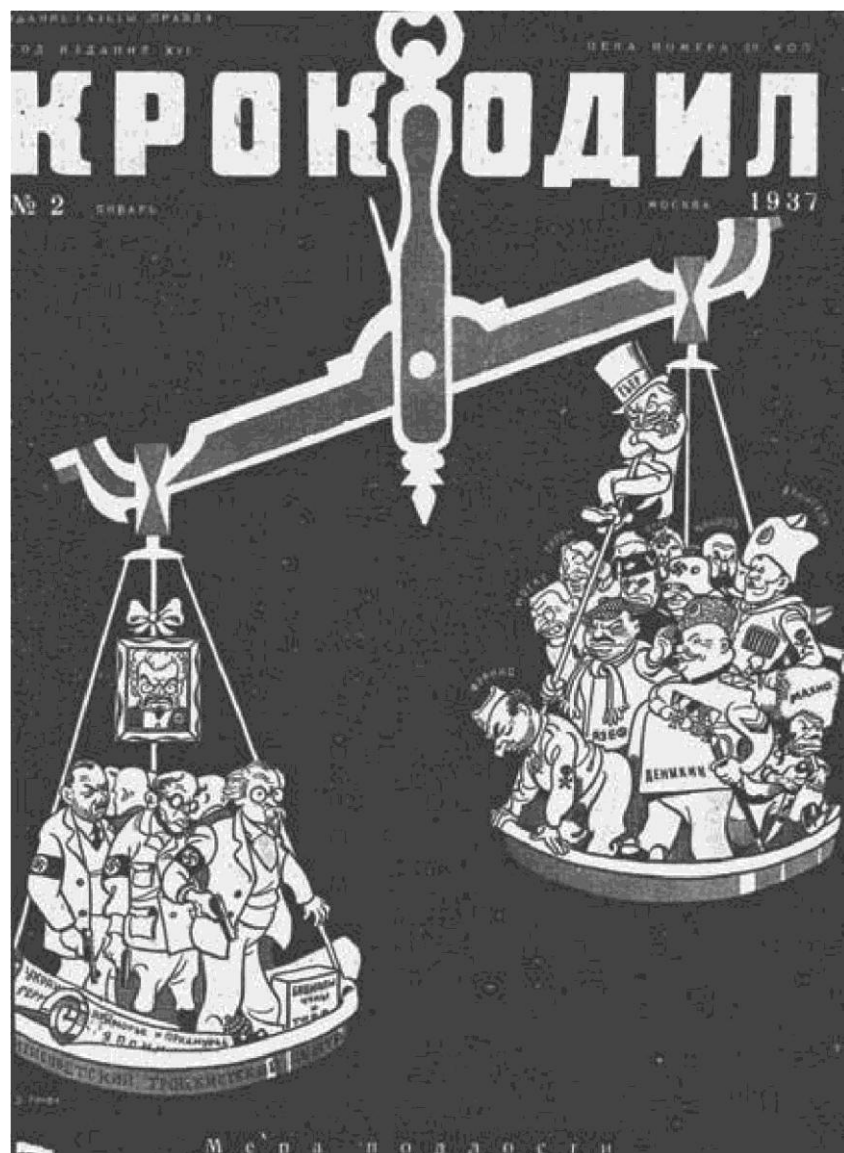
理解这场内部敌人猎捕取决于苏联集体内外界限的划定行动。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发现反革命者并以持续更新的清洗运动清除他们，从未使党的领导层平静或确信内部安全机构终获纯洁可靠。对越界的执迷转变为真正的暴力传染，波及最高层级，导致雅戈达被处决；随后是叶若夫；最终战后是贝利亚。随着过度本身被消耗，斯大林干部的禁欲主义得以胜利重申。但安全机构的清洗当然失败了。没有事物被净化，没有“堕落”被永久清除，清洗必须每次重新开始。一个替代者取代另一个，一个代理者取代另一个，没有终结，没有安宁，唯有高涨的焦虑。

敌人性质的嬗变

在 1930 年代进程中，反对派被同化为邪恶敌人的刻板印象，连同富农和资产阶级——他们在修辞与谩骂中迅速被等同。



“幸福的公民只在书籍中遇见这些生物。” 杰尼绘，1932 年。1930-34 年间，小资产阶级和富农代表真正的敌人，而非反对派。



“卑劣的尺度。”《鳄鱼》2（1937）：扉页。旧敌人——白卫军和国际资产阶级领袖——被新敌人——内部反对派（可辨认出托洛茨基、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和皮达科夫）所超越。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对反对派的妖魔化强度加剧。自1920年代末遭诅咒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忏悔获赦的季诺维也夫主义者，被合并为一个群体。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指令《关于处理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措施》要求消灭所有幸存反对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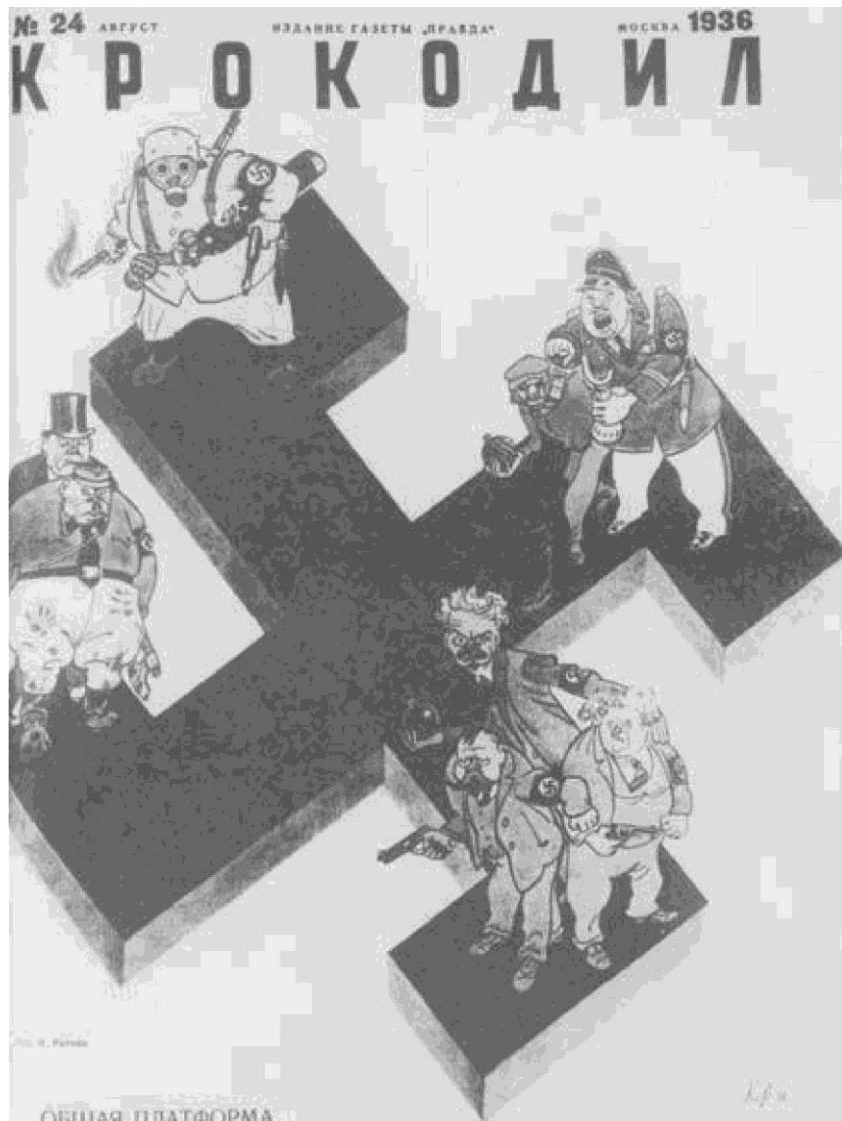
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的伪证



“加米涅夫同志进行自我割礼。” V. Mezhlauk 绘画，1934 年 2 月。RGASPI, f. 74, op. 2, d. 170, l. 4. 被允许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发言，加米涅夫，一位前反对派领导人，说：“我的过去是一具尸体，我可以对其解剖。[. . .] 我想前进，而不必像拖着旧皮一样，就好像，如果您原谅这个比喻，某个圣经人物[笑声]。”



“一个人必须用肚子爬进党……（季诺维也夫喜欢的短语）。” 《消息报》1936 年 8 月 23 日。1935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声明，“季诺维也夫集团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将两面行为变成要求的集团。反对派愿意公开和系统地打击自己的平台[. . .]仅仅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是独一无二的。”季诺维也夫接受了指控：“当我在第十七次党代会[1934]上发言时，我只是在言辞的外在形式上适应了多数派的观点，但我的思想实质没有改变：两个灵魂在我体内依然存在。”



“一个统一的纲领。” Rostov 绘画。 《鳄鱼》杂志 24 (1936 年 8 月)：封面。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想象力将传统的政治区别简化为一个 门面： 隐藏了多年的党的敌人的共同本质终于变得明显；反对派领导人、帝国主义者和纳粹都是同一种普遍力量的不同名称，这种力量致力于阻止无产阶级的解放。白军、孟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反革命阵营中的分工。

暴力的权宜之计

共青团书记科萨廖夫在 1935 年指出，“有一个敌人不会自愿放弃其阵地，只能通过 [...] 肉体消灭来移除。”只有当反对派被“毫不留情地”消灭时，党发言人附和 他的观点，“苏维埃土地才能迅速沿着斯大林路线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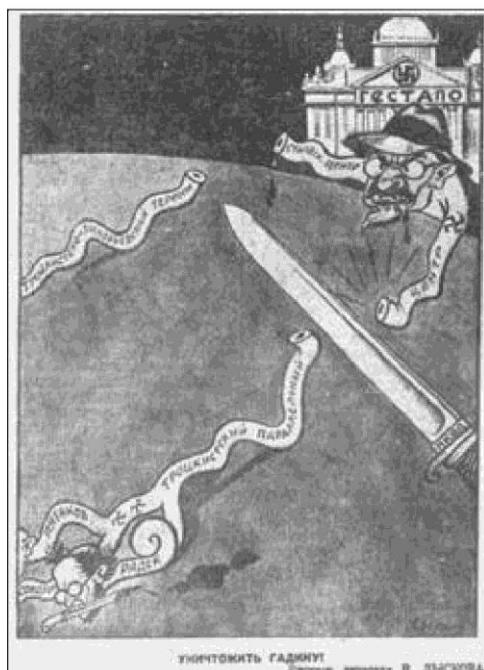


“根除间谍和破坏分子。” 《消息报》1937 年 6 月 12 日。党宣传人员认为系统性地“清除”敌人是绝对关键的（清除）。在这方面，将斯大林主义政体描述为“园艺国家”是恰当的。



“消灭这个卑鄙的生物！‘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杀手集团从地球表面抹去——这是劳动人民的判决。’ ” A. Keil’ 海报，由 Izgoiz 出版。《莫斯科工人报》，1936 年 3 月 24 日。

“消灭这个卑鄙的生物！” 《苏维埃西伯利亚》1937 年 1 月 26 日。托洛茨基，盖世太保的使者，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砍掉了手臂。一支手臂，称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已在 1936 年被移除，现在轮到另一支手臂，由皮达可夫和拉狄克领导的托洛茨基平行中心。



毫不留情

始终牢记革命吞噬其子女的格言，列宁警告他的门徒，“不要让你们之间流血。”由于党直到 1936 年都遵守列宁的训诫，八月公审的死刑判决甚至对党中最狂热的成员来说也是意外。



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收听广播中关于布哈林和其他“右翼-托洛茨基集团”领导人判决的新闻。官方媒体将苏联描述为工人民主。劳动群众被描绘为积极和热情地支持公审。Vorotynskii 摄影。 《消息报》1938 年 3 月 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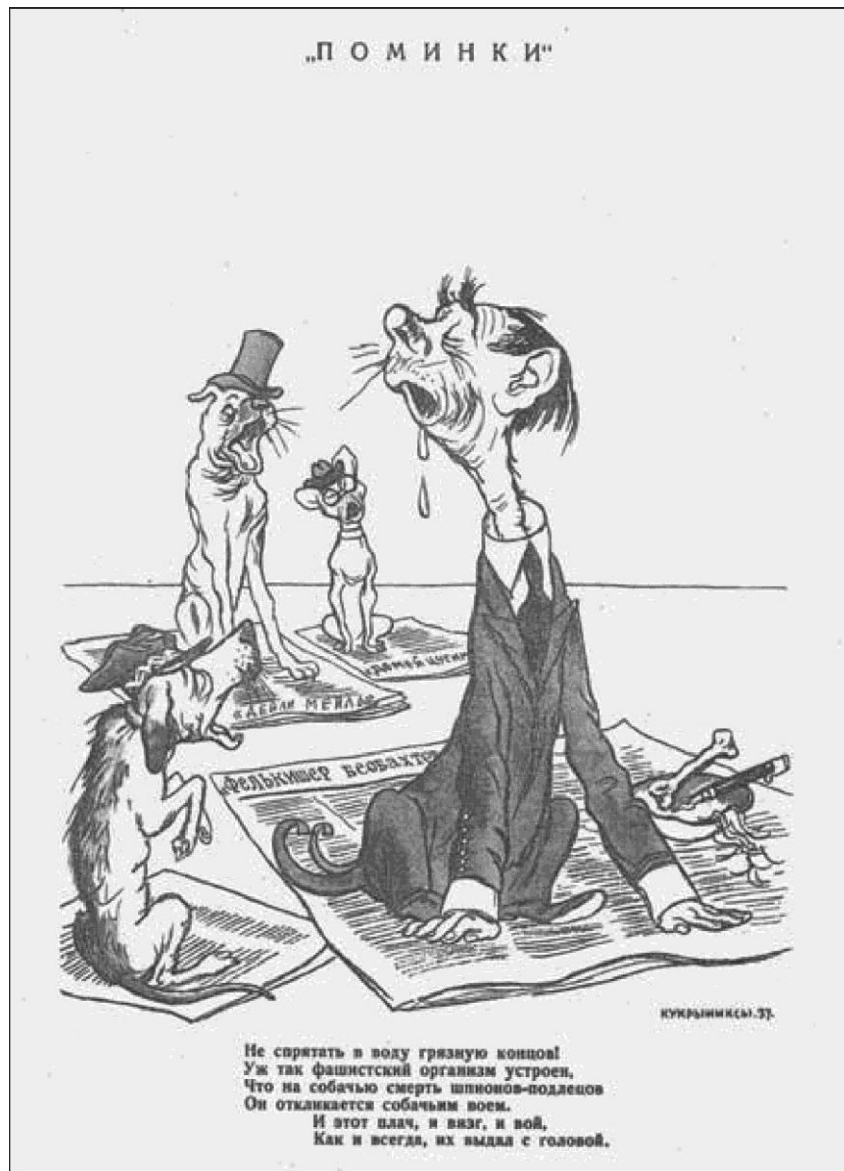
以基洛夫命名的迪纳摩工厂的工人们投票赞成处决那些卑鄙的刺客、叛徒和祖国的叛徒。他们举起的横幅上写着：“清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杀手集团——这是劳动人民的判决。” Sabel'nikov 摄影。 《真理报》1936 年 8 月 24 日。

“来自《国际歌》的律师们。” Kukryniksy 绘画。

《真理报》1936年8月24日。在托洛茨基及其帮手的煽动下，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喊道：“恐怖分子必须活下来！！拯救恐怖分子！！爱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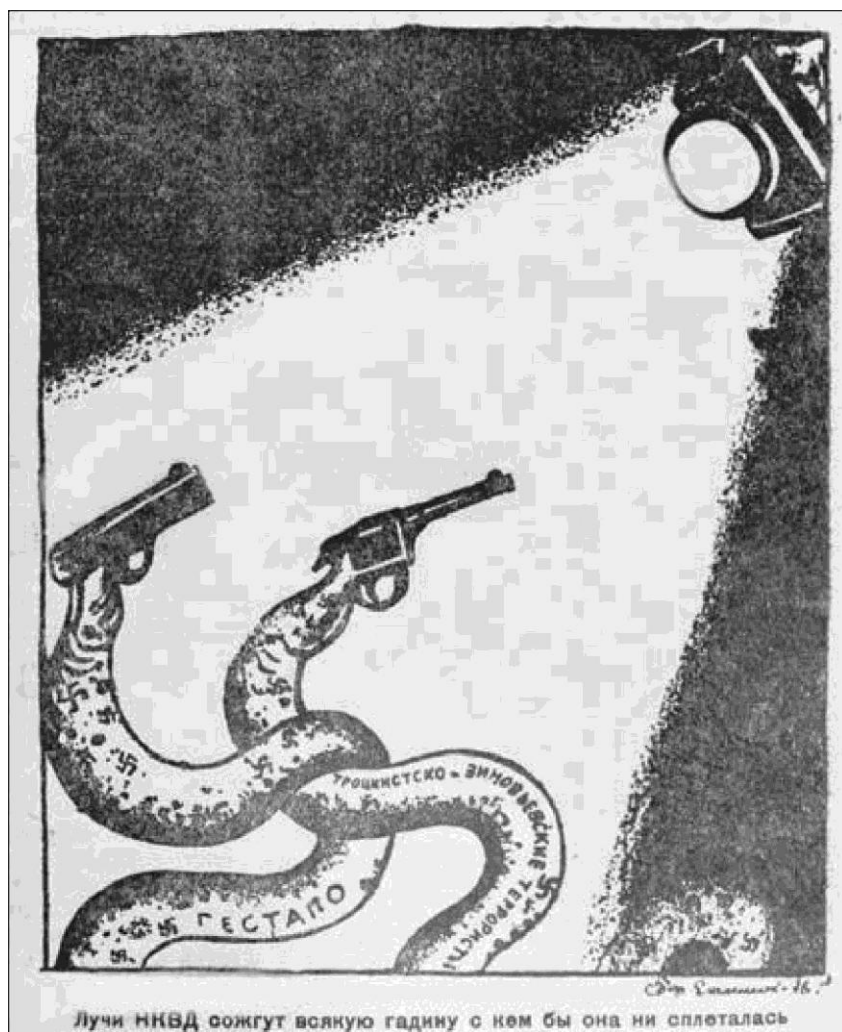
“阿塔曼们哀悼。”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年8月26日。沮丧的托洛茨基刚刚读到了莫斯科公审的判决。





“葬礼后的宴席。” Kukryniksy 绘画。《鳄鱼》杂志 16 (1937): 3. 资产阶级国际媒体的走狗们对那些间谍反对苏联的走狗的死亡表示悲伤。

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谈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眼中充满钦佩和喜悦的泪水。他总是表达“对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些人的温暖的、个人的感激之情。”赫鲁晓夫回忆道，“我们被教育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帮助党的机关了解其成员并揭露渗透到我们领导层的敌人。”1930年代后期挂在办公室里的横幅写着：“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无误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照灯暴露任何爬行动物，无论它与什么纠缠在一起。” Ershik 绘画。《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12月1日。法西斯蛇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纠缠在一起；两个邪恶实体无法区分。



“契卡、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不祥的字母表。” V. Gal'ba 绘画。《红色报纸》，1937 年 12 月 20 日。

外国侵略者从苏联安全机构的各种首字母缩略词中学习俄语。

叶若夫的“刺猬皮手套”
(叶若夫手套)。《消息报》1937 年 7 月 30 日。在叶若夫的严厉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摧毁间谍和恐怖分子。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感到沮丧。在叶若夫作为治安维护者的优秀声誉的鼓舞下，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职员宣布他的任命

“以其强大、振奋的精神澄清了空气。”甚至他未来的受害者布哈林，也认为叶若夫是“诚实的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作为民众英雄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被描绘为享受劳动群众热情支持的民主领导人。



大清洗期间的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期间召集其支持者。 《消息报》1937 年 11 月 20 日。



尼古拉·叶若夫，人民委员，会见他的选民。说明文字称有七万五千人前来听他讲话。 《消息报》1937 年 12 月 11 日。

精英冲击

草根阶层与精英之间的激烈交锋，以及一代又一代教授领导层的被抹除，这是一场话语介导的纯洁性之争。马克思主义的“退化”(razlozhenie)概念解释了社会出身无产阶级、由苏联体制自身培养起来的苏联精英，何以会变成阶级敌人。正是在平庸的苏联现实与无阶级社会的承诺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中，“再生”(obnovlenie)的观念得以孕育。由于无法放弃绝对平等的计划——那样做就意味着背叛革命——共产党人被迫反复抹除自己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



“在自我批评的新鲜风气下，锥子[俚语，指大人物]纷纷倒下。” 《鳄鱼》杂志 第11期(1937年)：封面页。

前与后：斯大林式幽默的范例

尽管大多数时候严肃而庄重，但在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早期，党能够接受一丝轻松与嬉戏。“同志式的漫画[druzheskie sharshi]”人们画出了漫画，嘲弄盛行，但没有人因自尊心受损而受到严重伤害。但如果 1920 年代的笑声是温和的（主要是戏仿），那么到 1930 年代末，它就变成了讽刺和恐怖。官方记录中俏皮话、诙谐语和双重含义的消失，与党的阐释能力的显著提高有关。既然反革命分子已经显眼，他们企图伪装成共产党人的可悲尝试使他们成为了荒谬的骗子。



“大厅里的笑声。” 《鳄鱼》 34（1936）：扉页。在大清洗期间，苏联媒体创造了“胜利者的笑声”（*smekh pobeditelei*）这个术语：那些亲眼见证共产主义的人可以嘲笑那些在无产阶级天堂大门前被拒之门外的人。



在 1920 年代初，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的塞尔维斯特（Sylvester），他是 16 世纪家庭法典的作者，教导革命者如何革新他们的日常生活。伊夫·马柳京（Iv. Maliutin）绘。《鳄鱼》35（1923）：扉页。

在 1930 年代末，托洛茨基是一条法西斯走狗。加尔巴（Gal' ba）绘。《红色报》1937 年 1 月 27 日。



在 1923 年，布哈林是一位仁慈的祖母，教导苏联儿童共产主义的字母表。切列姆内赫（Cheremnykh）绘。《鳄鱼》47（1923）：1249。

在 1938 年，布哈林是凶恶的“法西斯疯狗”（与托洛茨基并列）。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Efimov）绘。
《消息报》1938 年 3 月 6 日。





“卡尔·拉狄克，一位著名的演奏家，在铜[木头脑袋]乐器上演奏。”叶菲莫夫（Efimov）绘。

《鳄鱼》6（1925）：扉页。木头脑袋指的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请注意，暴力在此早期阶段就已明显存在，但它是针对布尔什维克阵营之外的。

在1937年，拉狄克自己招致了暴力——他是一个法西斯同路人，对在全欧洲绞死工人负有责任。

《莫斯科工人报》1937年1月27日。



• 4 弥赛亚时代

饱含意义

在大清洗的年代里，党投入了巨大努力来终结对未来的争夺；历史被赋予了终结，一个完美的社会被说成是本质上已经完成。时间已经圆满，不再需要在历史的当下与超验的彼岸之间进行中介。

1930 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是一个完全表达的世界。语言不再是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体，它毫无剩余或残余地呈现现实。语言取得了胜利——它没有阻碍，没有晦涩。每一条真理都以非凡的自信和从容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在声称已经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语言折叠回自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在外部。在纳入自身指涉对象的过程中，它失去了它的秘密——意义的不确定性，因而也是其无穷尽性。在反对幻想的十字军东征中，斯大林主义阻碍了语言的快感，它超越自身的必要性，通过双关、反讽和修辞手法来颠覆意义。

实现了革命承诺后，斯大林主义通过依赖直觉融合了意识和其对象，直觉是一种不将普遍性与其在特殊性中的存在分离的知识形式。这种弥赛亚式的自我理解被诗人亚历山大·贝济姆斯基捕捉到，他用以下方式颂扬了总书记的语言：

演讲中的句子简洁而欢快，演讲的声音被火焰点燃，他的每一个词都涵盖世界

每一个短语都是一部史诗。¹

[*Stroki doklada prosty i bodry Zvuki doklada zhivut
plameneia, Kazhdoe slovo ego—miry*

Kazhdaia fraza—epopeia.]

在 1930 年代末的乌托邦世界中，词语与事件、法律与现象，不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限制过程相互关联，而是相互理解，一个在另一个之中，一个凭借另一个。² 因此，当代诗学的显著特征是：语言的内容生动，立即自我投射。

“应然”和“实然”变得难以区分。一旦神话历史与世俗历史融合为一体，就没有必要将语言视为指向超越之物。词语不仅仅是象征意义的载体；它们成为意义的具体实现。“我的浪漫主义植根于现实，”作家康斯坦丁·费定在

1938 年观察到。“当梦想完全实现时，做梦是多么容易！”³ “言行合一，”党的宣传者呼应道，“是我们时代的独特特征之一。”⁴

并非所有弥赛亚式自我理解的含义都同样具有解放性和庆祝性。语言的崇高角色需要警惕和格外小心。因为命名就是召唤存在，同志们被警告不要“引用人民敌人的多余引文。”⁵ 1940 年 7 月 2 日，司法部颁布法令，提醒律师在起诉书中避免“无端引用反革命言论”。任何判决中提及党的领导人均被禁止——这被认为会给他们带来厄运。⁶ 此后，被处决者不再被允许向行刑队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一位名叫贝尔格的军官回忆说，他的指挥官曾告诫他：“今后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敌人不得滥用官方语言。⁷

与错误名字的关联与错误人物的关联同样危险。没有人比萨任更清楚这一点——他因与一位为纪念彼得堡党组织书记而命名为“季诺维也夫”的年轻学生关系密切，而被共产主义大学开除。名字的同质性让诽谤者宣称：“萨任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联系！”被告试图为自己辩护，说：“自 1930 年以来，我只见过季诺维也夫（指学生，而非如今名誉扫地的反对派领袖）两次。”但他并未质疑从一个季诺维也夫到另一个季诺维也夫，再到季诺维也夫主义之间的跳跃。

这种名字的实体化与十年早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演讲者可以玩弄名字游戏，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布哈林在 1930 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开玩笑地指出：“这里没有一个成员——我敢说——认为我内心怀有某种‘积怨’，甚至连面无表情的加米涅夫也没有。”除了意译短语 *derzhat' kamen' za pazukhoi*（心怀积怨），布哈林还在这里对加米涅夫的名字进行了双关：*kamen'* 意为“石头”。从大清洗的角度来看，尽管他曾嘲笑这位反对派的名字，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名字与其持有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加米涅夫的公共人格被嘲笑，但他真实的自我仍能隐藏其后而安然无恙。这种对命名的轻率态度为布哈林赢得了“空谈家”的名声，并在大清洗期间成为逮捕他的理由。⁸

斯大林主义对语言的审查在性质上而非数量上是独特的。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审查。第一阶段的审查存在于每一个通过诉诸单一真理来使自身合法化的政权中；沙皇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沙皇认为必须禁止错误观念，并保护他那幼稚易轻信的臣民免受异端和诱惑，特别是自由主义多元论的影响，而他的审查员们也公开为他们的活动感到自豪。⁹ 布尔什维克追随其沙皇前辈的脚步，给自己设定了区分正确与不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任务。在 1930 年代初，审查作为一种边界控制运作——一种区分好语言与坏语言的元语言。

只要第一阶段审查遵循某些规则，它就会陷入无尽的倒退：一种元语言必须始终区分好的和坏的规则，好的和坏的审查员——语言之间无尽的换喻滑动不可避免，每一种新的语言都将自身设定为元语言（真理，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正确解释），相对于它刚刚取代的语言。托洛茨基审查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和丹，布哈林审查托洛茨基，斯大林审查布哈林，如此循环。

随着新宪法的颁布和“历史的终结”，观察家们预期审查制度将变得多余。但实际上，审查演变为文本生产的普遍原则且无所不在：斯大林主义不再审查某个平台或某本书，而是审查“存在需要审查之物”这一观念本身。斯大林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是：我们不可能犯错，因此我们并未真正说什么，只是让事物自行显现。终极的元语言宣称人类活动不存在语言构成的自主领域。弥赛亚意识否认语言中介本身。大清洗的语言未经任何过滤就传输世界，自认为透明；其目的——对世界直接、无误且完整的呈现——已经实现。语言不再是反射镜，它被期望不再反射光芒，成为一张隐形表面，让图像穿透时仍保持其物质性。

诠释学的时代结束了——这架阶梯曾帮助苏联社会达到透明，但现在可以丢弃。警惕者无需解读字里行间；他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确信一切都无所隐藏。既然错误和歪曲已不可能，学生没有理由对所见所读吹毛求疵。怀疑主义意味着悲观和失败主义。因此矛盾的是，一种极端的怀疑诠释学实践被用来根除诠释学本身。

甚至最微弱的解读可能性也被否定，并非因为某些解读具有颠覆性，而是因为多重解读意味着不完整。歧义性不可想象；词语不能有超过一个含义，因为这会隐含承认含义尚未完全稳定、历史仍在继续。报纸的某栏文章、某首诗歌可能被接受，但审查者必须确保其中没有间接、次要的含义，即使极其不可能。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解读是不可能的。陈述被驳回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可能是错误的。所有陈述都是有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图范畴已被超越——所有意图都已实现。无需确认恶意意图：语言直接证明了其所宣告事物的本质，如果它作为不透明、晦涩的媒介持续存在，那就意味着敌人潜伏在字里行间。

二阶段审查是后历史现象——弥赛亚意识使自我反思成为禁忌。在大清洗的本体-时间背景下，审查既必要又不可能——必要是因为无冲突的社会需要常规净化，不可能是因为不纯被官方否认。审查指向内在完美与外在邪恶的界限，却必须否认其自身的存在。斯大林的乌托邦无法向自身反映其产生的外部条件，因为它通过压制这些条件、抹除外部历史起源而构成的。¹⁰

要让审查制度自我审查，政权必须承担起固定所有含义的艰巨任务。文本传达信息时毫无歧义，斯大林主义主体在判断上不允许任何弹性。如果说 1930 年代初，雷科夫还能将“逐字解释”视为错误，那么到该十年末，提出任何其他解读方式都将是错误。¹¹ 词语被简化为单一含义，“歧义”被消除。¹² 党的教条不再能被分析，只能被重复：当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提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最终且不可逆转的论断可能不准确”时，一个大学委员会最初被组建“以研究如何最好地理解官方公式”。然而，伊林绝不允许这种解读许可：“胡说八道！党组织何时能审查，更不用说篡改斯大林的公式了？”¹³

随着大学官员愈发渴望消除多义性，文件变得高度公式化。每次会议后，党委书记仔细审查会议记录；学生也被允许浏览材料，以确保他们的发言不含多重含义的表达。大学宣传员对以下告诫感到不安：“我们必须击败在马克思和列宁旗帜下活动的阶级敌人。”他们担心读者会得出结论，认为敌人是受革命意识形态指导，而非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是对该句不太可能的解读，但其语法允许。¹⁴

即使最明显的事情也必须明确说明。仅仅称总书记为“斯大林同志”是不够的；必须称其为“亲爱的苏联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当同一页多次提到斯大林时，学生的笔记变得极其冗长且重复。

无人能依赖语境，因为语境化可能为敌人的含义敞开道路。在 1927 年 10 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不幸的教师潘秋欣发言赞成出版反对派的纲领“以便我们能亲身体验反对派的反革命活动”。十年后，速记记录中的这段话被重重划线。当他的言论最初被记录下来时，潘秋欣的意思会被理解为存在对纲领真实本质的合理怀疑，消除这些怀疑的最佳方式是使文本广泛可得。1937 年，他的陈述被按字面解读：潘秋欣想看反革命材料，恰恰因为它们是反革命的。¹⁵

再举一例，索罗金于 1937 年 5 月 27 日写信给红色教授学院党委，抱怨其老师的讲课：“拉尔采维奇声称，只有法西斯主义接管整个世界后，我们才能体验全球革命——这就是这个人民敌人的主张。”讲师可能说法西斯主义是历史辩证法中一个会被克服并导致无产阶级统治的状态，这种可能性被忽视了：拉尔采维奇的话被直白解读，他因暗示法西斯主义与世界革命难以区分而受到谴责。¹⁶

隐喻、明喻和典故被从官方记录中剔除。彼得罗夫，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于 1937 年 12 月为六年前将纸币称为“约定符号”（*у словных е з н а к и*）而道歉——当时人们认为符号只能是自然的，绝非人为的。¹⁷

省略号为敌人打开了另一个缺口。当德米特里耶夫编辑一本列宁经济学领域最有用引文的汇编时，他似乎遗漏了一些关键段落，从而“歪曲了列宁的教学”；1936年，共产主义大学因此事爆发丑闻。“引文是完整的，还是存在关键遗漏？”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B·N·戈洛文奇茨被问及。“我没有核查，”他不得不承认。这是戈洛文奇茨的终结；作为反革命网络中的一条线，他肯定允许已被揭露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德米特里耶夫煽动学生用任何想到的内容填充列宁的文本。¹⁸

视觉符号也受到严格管制。事物不能代表其他事物；它们只能是它们自己。请看以下：斯大林昆采沃别墅宽敞的椭圆形会议厅装饰着苏联领导人的肖像。当政治局会议在此举行时，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肖像下方。¹⁹ 1935年夏天，莫斯科一家电影制片厂需要法西斯集中营的图像。一个工人住宅区被选为拍摄地，工人们自己扮演囚犯。为防止混淆，一个醒目的标题写着：“法西斯集中营”。尽管如此，一些人可能仍倾向于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工人的生活与法西斯集中营囚犯的生活相同。赞助这部电影的当地党委书记库兹涅佐夫为他的语义放纵付出了代价。²⁰

保留敌人的快照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继续存活。在关于1938年公审的纪录片中，布哈林和雷科夫仅出现三次，出镜时间不到一分钟。被告最初从后方被看到，当维辛斯基戏剧性地指责他们为“破坏者、间谍、敌特”时，电影切到他们的脸部，然后迅速切走。²¹

当搜查亚历山大·图哈切夫斯基的公寓时，发现了他被处决的元帅兄弟米哈伊尔的照片。他很快道歉：“我还没来得及销毁它们。我确实销毁了大量他的照片，但不是在我被捕时被查抄的那些。这是因为我当时正在搬家。此外，一些照片在我不想损坏的相册里。但我无意保留我兄弟的照片作为纪念。”²² 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才会有敌人的照片：被定罪者在处决前不久拍摄的照片被附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用于识别目的。

在符号生产和分配的前沿，出版业成为一个危险职业。文字编辑被指示“避免在行尾不合规定地拆分连字符词”。单词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ер*，或反革命分子，是主要例子，原因显而易见。另一个必须避免的断行是“教师斯大林”（*учи-тель Сталина*）。虽然 *учи-тель Сталина* 意为“斯大林的老师”（列宁），*учи Сталина* 意为“教导斯大林”——而显然，只有敌人才会如此狂妄。²³

警惕的柳博舍夫斯基于1937年12月从基辅写信给莫洛托夫：

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当我购买了近期期刊《星火》（第31期）时，我读到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宪法有一个基本缺陷——内部矛盾、欺骗、虚伪。斯大林的宪法……具有相同的原则、相同的假设、相同的公理、相同的思想。”莫洛托夫同志，我该如何理解这一点？这是阶级敌人的有意出击吗？还是我漏掉了什么？也许维辛斯基的手稿是正确的，但编辑们歪曲了他的话的含义？无论如何，文章的这一部分不清楚，该短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²⁴

排版错误看起来偶然，就越有力地证明了敌人的精巧。例如，1936年7月13日版《为了苏联铝业》头版的排版者被逮捕了：斯大林的肖像被放在标题为“对人民敌人决不留情”的文章正下方。²⁵在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论坛报》上，标题“更高地举起列宁和斯大林的旗帜”后面跟着一篇标题为“严重错误”的文章。该编辑被流放到科雷马。²⁶当第14期《青年无产者》列出其谜题答案时，部分答案如下：“（13）动物的叫声；（14）一位红军领袖的名字”。所有该列宁格勒期刊的印本都被没收，其编辑相应受到惩罚。²⁷

一阶段审查依赖存在于文本之外的道德权威：社会主义的进步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差距的消除削弱了这一权威，要求二阶段审查机制内化。审查制度渗透到整个苏联语言领域。它被从精英手中夺走，变得民主化——曾指导老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现在成为集体的关注点。因为每个人必须看到真相，必须创建文本机制，使真相能够透过文本显现。

不可能通过思考国家与社会、党与个人的概念来确定二阶审查的执行人。审查并非完全来自上层，个人自我表达的概念在此也不适用。援引威权国家的纪律实践，或普通成员的狂热热情，会不合时宜地复活作为行动主体的概念，一个在世界上行动、改善世界的生物。因为已经完善的社会超越了主体，审查没有明确的来源：它可能来自列宁格勒机构或地方党组织，来自校长或学生自己，但没有人对行动的来源负责并声称额外的权威。指示视角——对事物的不完整看法——这样的步骤会破坏斯大林主义对普遍性的主张。必须否认的不是落后学生发言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一阶审查就足够了），而是言论与发言者相关的原则。违规者不是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被谴责，而是作为语言广告牌。

斯大林政体中的每个有意识公民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任务，指出携带隐秘含义的语言构型——审查者的平等是当时的秩序。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的两名学生，在几本小册子中发现图书馆印章遮住了斯大林的肖像，便告发图书馆员玷污了总书记的形象。²⁸祖耶夫是共产主义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1937年4月发现列宁主义讲师站立的讲台物理布局中存在一个法西斯符号；他称此为“敌人阴谋”。²⁹同样警觉的列夫·梅赫利斯截获了一名学生传给另一名学

生的纸条：“告诉他学习进展顺利。”考虑到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叛乱的信号是“西班牙上空万里无云”，红军政治部主任认为这也可能是一份阴谋性的公报。³⁰

一个名叫瓦年科的信徒无论看向何处，都看到了敌人的阴谋。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后，他坚称周围都是表达对被处决者声援的哀悼者：“似乎公开和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爪牙找到了纪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式。有些人通过第二天不去工作，有些人通过穿黑色西装，还有一些人通过召开家庭聚会来纪念。”8月24日，即死刑执行的那天，瓦年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段阴郁的曲调，他将其解释为葬礼音乐：“难道托洛茨基分子甚至成功渗透到广播电台，并为其所用？！”³¹

这种全新的、完全被淹没的语言使阶级教育充满危险。讲师不仅对实际所讲内容负责，也对他们的省略内容负责。随着学生对教材审查的加剧，党委的“可靠监督者”严厉批评任何表述不够清晰的言论。³²科托维奇因“系统地淡化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作用”而被宣布为破坏分子：“在他的讲座中，他没有提到斯大林与党的敌人、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讲义由沃洛达尔斯卡娅速记核查）。”红色教授学院的另一位历史讲师阿布拉莫维奇也被归入破坏分子之列，因为他在第四届杜马期间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只字未提：“（讲义由拉比诺维奇速记核查）。”³³班特克和西福诺夫受到审查，前者因“倾向于淡化某些问题”，后者因“未能对法西斯笑话作出评论”（1937年12月）。³⁴

第二阶段的审查影响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所说的话如何被理解。以语言学研究所对批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斯米尔诺夫“压制自我批评、挥霍资金等”的决议的怀疑为例。引发警觉的事实是，斯米尔诺夫的前任戈尔洛夫斯基最近被捕。那么，该决议在表面批评斯米尔诺夫的同时，是否可能基于对比，实际蕴含一种秘密的、反革命的意义？有些人坚持认为，“该决议实际上让人相信，在我们这位托洛茨基分子的主任斯米尔诺夫之前，戈尔洛夫斯基并未挥霍资金或压制批评。”³⁵

党委员会必须中和学生们的想象力，他们构建自己自主意义的能力。在1936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局宣布红色教授学院的一群党历史学家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由是他们的讲座“包含了太多有争议的要点，这些要点可以有多种解释方式。”瓦西里·拉尔采维奇的讲座课程，此前因他对新时代学术的贡献而受到赞扬，再次被提及，作为“理论战线上的破坏”的例子。警惕分子解释说，拉尔采维奇在一次讲座的开头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故意误导学生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可能不是唯一的哲学。”季米

扬斯基使用类比——另一种高度危险的修辞形式——让学生相信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和日本、德国的间谍”，正如克格勃所声称的那样。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对类比的理解，这位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师使用了“经院式的例子，例如，‘富农需要狗来保护他的财产，就像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红军一样’，或者，‘德国的罗姆叛国与我们国家的季诺维也夫的背叛相似。’”类比总是隐藏在语言的晦涩中，被认为鼓励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包括反革命的解释。学生们可能理解季米扬斯基的意思是红军保护富农，或者纳粹党等同于共产党。³⁶

来自共产主义大学课堂的轶事也揭示了如何对所说的一切都必须照字面理解。在1936年9月课间休息时，前述名为季诺维也夫的学生被听到说：“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斯大林就被誉为伟大的理论家。他多么幸运！”第二天，一名名为马克西莫维奇的警惕分子向大学党组织的副主席乌赫塔报告了这一“诽谤”。但马克西莫维奇在随后的调查中听取时，感到有些失望：

乌赫塔：他说的是真的吗？

季诺维也夫：是的。

乌赫塔：逐字逐句？

季诺维也夫：是的。我承认说了那话。

乌赫塔：也许你本意是想说点别的？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当乌赫塔随后建议正义的举报者“不要对此事小题大做”时，马克西莫维奇感到愤怒。另一名同学，某个雅科夫列夫，介入了。他向马克西莫维奇保证：“季诺维也夫说的肯定不对。我们已经没有列宁生活了十年，在这期间斯大林无疑证明了他的理论能力。”但这句话产生了与意图相反的效果。“雅科夫列夫的话会被理解为，”字面思维的马克西莫维奇说，“在列宁去世之前，斯大林根本不是理论家”，而只是在1924年1月之后才成为理论家。³⁷

官方语言充分实现其意义时，修辞暴力除了真实的暴力便再无其他意义。以咒语的形式，标签确保了其载体的毁灭。胚胎学家米哈伊尔·扎瓦多夫斯基在1936年农业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他声称，如今语言被使用“不是为了纠正，而是为了杀戮。”³⁸

看似与实际事件无关，这种语义发展直接关系到大清洗。事实上，革命后几十年的党史可以解读为布尔什维克残酷隐喻成真的历史。在与联合反对派的

激烈论战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敦促当时仍是斯大林忠实支持者的李可夫，利用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者身份采取戏剧性行动：“向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吐口水！”³⁹ 那是1928年11月，没有人认真对待奥尔忠尼启则。但当近十年后军事指挥官抱怨调查人员“例行地向被告的嘴里吐口水”时，他们指的是字面意思。⁴⁰ 或者以布哈林为例，他在1930年10月问斯大林：“难道是因为我不舔你的屁股 [ne lizhu tebe zada] . . . 我就被指控为‘恐怖的通道’吗？”⁴¹ 六七年后，这个隐喻也成为了现实。一个名叫柳布采夫的军官被审讯者告知：“如果我愿意，你会发现自己拿着我的裤子亲吻我的屁股。”⁴²

多年来的一个可能的修辞手法，“死亡”获得了字面意义。在1920年代，一个政治活跃的学生将被开除出共产党称为“政治死亡” (*politicheskaya smert'*)。另一个学生呼应了这种想法：“我被排除在党外的想法让我沮丧——这样活着毫无意义！”⁴³ 离开大清洗期间的文本语境，死亡只是假装隐藏在讽刺性的委婉说法之后。“我们会送你上路 [*v raskhod otpravim*]”，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人员这样告诉被告。在最高刑期上增加一年，他们承诺道：“我们会把你关上十一年。”囚犯们被威胁要接受“头骨替换” (*smenim cherep*) 和“彻底粉碎” (*v pyl' pustim*)。⁴⁴ 可以说，这一次，语言落后于现实，而不是现实落后于语言——只是这种语言上的不足不过是一场旨在嘲弄受害者的虚假表演。⁴⁵

扁平化的主体

无阶级社会的建立被描述为一个事件，它将苏联人民从他们的历史境况中解放出来，最终使他们成为自由且完整的存在。障碍与人类冲突的时代即将终结，自由自我表达的时代刚刚开启。鉴于这种异常强烈的末世论预设，个体的身份必须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新人是完整的，与自身和谐、和平地共存。

大清洗的话语抹去了所有的内在性。人性已被审判；绝对自我意识已在党的全知意识那耀眼的光芒中显现。⁴⁶ 进化过程多样复杂性的最终完成，赋予了斯大林式自我以永恒在时间中的透明质感。个体就是其一直以来的样子，没有剩余或补充。既然过去已与未来结合在一起，党员们学会了将他们突出的道德品质呈现为不可改变且非个人的。他们并非走上了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一直就是共产主义者。

呈现一种不变自我视图，自传性自我叙述变得单调和重复。如果过去作者借鉴各种模型自我，现在则有两种基本类型——善与恶。剥离了能动性，不再被迫描述意识的转变，自传作者偏好以编年形式叙述他的生活。客观时间，

而非内心灵魂的痛苦，构建了斯大林主义叙述。由于主角与党不可分，因果可以互换，成熟的斯大林主义自传作者已完全内化了集体的视角。

在他的自传中，谢苗诺夫，普雷德在 1936 - 37 年共产主义大学的副手，捕捉到了这种不可渗透、静止的自我。谢苗诺夫使用主动语态叙述他的早年生活：“在我十一岁时，我离开了我们贫穷的农民，在那个村庄的经济生活之后，我去了顿巴斯矿区，然后从那里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开始当搬运工。”然而，与前辈们将党员身份与主体能动性显著增强相关联的做法不同，这位自传作者在叙述 1919 年 1 月入党后的时期时采用了被动语态：“从旧军队中，我被调到红军，随后又被调到党和苏维埃工作。接着我被莫斯科召回，成为最高法院检察官。1928 年，我被派往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1930 年又被派往国外。之后我成为新西伯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随后，我被提名担任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校长。当这些课程被取消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被调往列宁格勒工作。”这些字里行间全然不见个人发展的痕迹。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并非谢苗诺夫一成不变的自觉自我，而是其自我表达所依附的政治秩序：在旧秩序下，他不得不为保持独立于体制之外而奋斗（因此使用主动语态）；但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权，谢苗诺夫便自然而然地将自我认同消融于无产阶级集体之中（因此转向被动语态）。⁴⁷

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自传作者们精心构筑了自我发现的戏剧性叙事，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无阶级社会时，传达出强烈的个人兴奋感。相比之下，谢苗诺夫的“善行”清单如此单调，其叙述如此重复，以至于叙事本身都消失了。⁴⁸这份文本可能用于法律场合，谢苗诺夫的自传提供信息时力求详尽谨慎，不具教化性或煽动性。

斯大林时代英雄的传记与基督教圣徒传记极为相似，展现超人的完美；而人民公敌的传记则描绘其非人的堕落。此处呈现的是恶魔传记：汇集完全应受谴责的个人特质、家庭影响和政治信念。⁴⁹不出所料，邪恶的自传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浮现出来。

1937 年 11 月，列宁格勒中央公共图书馆馆长多布罗尼茨基的供词以自传形式呈现。如同往常，其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被着重提及。在缺乏实质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便具有决定性意义：身为叛徒之子，自幼与反革命分子交好，多布罗尼茨基便始终是叛徒。“1924 年，我抵达汉堡并与父亲同住，”他陈述道，“1925 年，父亲开始训练我从事间谍活动。起初他并未直接要求我成为双重间谍与叛徒，但他细致而长期地为我做着准备。”自然而然，多布罗尼茨基最终在列宁格勒建立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并策划了针对日丹诺夫的政变。⁵⁰

学生和教员在党会上的发言方式同样指向了人类主体性的简化。通过不断重复口号、陈词滥调、以及空洞的短语——“追随斯大林！”“保持警惕！”“人民的敌人去死！”——他们宣告了自身人格的彻底掏空——主体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形式。⁵¹ 对党的完全忠诚转变为对其领袖的无尽颂扬，这位领袖是唯一具有内容的主体，是被认为体现了革命的化身。

例如，对科托维奇被捕的讨论，揭示了传统的解释策略与官方自我观日益萎缩的层面之间的冲突。科托维奇是如何做到长期赢得尊重的？学生的警惕性何在？这些问题在红色教授学院的走廊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米哈伊洛夫认为，科托维奇有能力隐藏真实的自我，将其包裹在层层空谈之下，这就是答案。而另一位年轻讲师利托维奇则辩称，这种解释意味着科托维奇的灵魂具有某种复杂性——而当代的心理地形学认为这已不再可能。“米哈伊洛夫跟我谈论科托维奇的‘能力’和‘机智’，”利托维奇在向党委提交的揭发材料中说，“并坚称这些技能使科托维奇得以转移我们对其托洛茨基主义的注意力。”米哈伊洛夫发现自己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辩护，感到惊讶，反驳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我们敌人的能力视而不见。”正因为托洛茨基是个狡猾的对手，考虑他的修辞技巧就显得相当重要：“我依据的格言是‘了解你的敌人，了解他如何伪装自己。’此外，我说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演说家’，而不是‘世界闻名的演说家’。我对戈培尔也做了完全相同的评价，即戈培尔懂得如何利用煽动术给人们洗脑。今天我重读了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审判上的发言，我可以指出总检察长本人在哪里说过‘拉杰克的修辞天赋并不能减轻他的反革命性’。”然而，尽管米哈伊洛夫努力辩解，他仍未能反驳针对他的指控。党委认定他将复杂的主体性归因于托洛茨基分子，将科托维奇的自我描述为被赋予了矛盾特质，有些积极，有些消极。“你引用维辛斯基是离题的，”他被告知。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最好听听列宁和斯大林的话，他们最了解托洛茨基分子的品质：像科托维奇这样的人不过是个“‘空谈家’，一个‘夸夸其谈者’，一个‘犹大’。”⁵²

如果斯大林主义的自我是完整且全能的，那么它也是透明且脆弱的。自从学生们上次接受党的诠释者审查以来，他们的潜在罪责已大大增加。早先他们可用的大多数辩护策略，即使不是全部，都已被剥夺合法性，使他们要为最微小的过错负责。每当需要解释一次违规行为时，最坏的情况总会被强加其上。

一旦自我失去了其多层特质，“日蚀”辩护路线就失去了其依据。列宁格勒语言学研究所的波兹德涅夫是

一位 1930 年代初期的党员，于 1936 年申请重新入党。这位申请人解释说，他撕毁了所有文件和党证，“由于心理疾病”。⁵³ 拒绝接踵而至：一个心理状态落后于意识形态的人，不能指望被重新接纳。⁵⁴

随着苏联法学家修订并缩小了免除个人责任的条件，关于丧失自我的主张几乎没有留下余地。1926 年刑法典第 24 条和第 25 条规定，任何处于“朦胧状态”（*sumerechnoe sostoianie*）的人，其行为因此非预谋，不能对其行为负责。但在莫斯科法医精神病研究所被认定为“无法律责任能力”（*nevmeniaemyi*）的患者比例，在这些条款起草后的十年间急剧下降——从 1922 年的 46.5%，到 1932 年的 10.0%，再到 1937 年的 3.4%。⁵⁵ 那些在 1920 年代被贴上精神病患者标签并被送往精神病机构的同类患者，在 1930 年代末却受到审判并被处决。⁵⁶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海辛教授的案例说明了“日蚀”辩护可用空间的缩小。作为科学院的一位重要人物，海辛可以宣称几项革命成就：他曾在乌克兰与白军作战，在莫斯科担任过红军部队的教官，并被认为是足够可靠而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教。⁵⁷ 然而，他的任何功绩都未能阻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他逮捕，作为“挫败物理学系托洛茨基分子”努力的一部分。

海辛的同事们在 1937 年 4 月中旬召开会议，讨论最近席卷大学的逮捕浪潮。研究生季维利科夫斯基带头发难。在一篇博学的演讲中，他提请注意“过去破坏者——比如在沙赫特审判中揭露的那种——与我们当今时代破坏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专注于来自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威胁，那些抵制学院苏维埃化的反动学者，所以我们……忽略了海辛在这一学术机构中组建恐怖分子和破坏者团体的努力。”

尽管恐怖主义的指控是新的，但这其中很多内容都呼应了九个月前针对卢津的指控。如前所述，疾病和暂时的自我丧失曾使卢津得以反驳针对他的最具破坏性的指控。但当伊戈尔·塔姆，海辛在爱丁堡大学的同窗好友，试图运用类似的修辞，通过提及海辛严重的“神经衰弱状态”（*nevrastencheskoe sostoianie*）来为海辛的错误辩护时，结果完全失败。被告的一位前学生问道，怎么会有人暗示精神虚弱驱使海辛进行破坏活动？他辩称，当然，在最近揭露了托洛茨基阴谋之后，任何政治上成熟的人都不会相信海辛的破坏活动仅仅有“心理基础”。

叶若夫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当然不会那么天真。讨论海辛案件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可能不知道，但海辛已经不在人世了。1936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在盖世太保的帮助下，组织了多起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杀企图”为由，判处他死刑。⁵⁸

在大清洗期间，几乎没有哪一种辩解奏效——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临时性精神错乱的请求至少在1938年以前仍会出现在文件中。在法庭上撤回供词的囚犯详细阐述了可以解释无根据自我控告的心理疾病。例如，阿卢廷上校声称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ne ot davaia sebe ot cheta*]。”一位名叫季霍米罗夫的军官曾惊慌失措，“因为我的病态心理[*pri bol' noi psikhike*]。”⁵⁹而指控自己和他人。”奥尔洛夫也是一名军人，他供认参与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是出于“道德压抑[*moral' lnaia podavlennost'*]。我几乎疯了，所以我决定认罪以快速结束一切。”⁶⁰告密者切尔尼亚科夫将其毫无根据的供词归咎于他的“半昏迷状态”(*poluobmorochnoe sostoianie*)，而政委鲍罗金则将同样自杀性的举动解释为“心理衰竭”(*psikhologicheskoe istoshchenie*)。⁶¹的结果。最后，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在二十四小时内先是说自己作了伪证，后又说他的证词是真实的：“昨天，在……我病态状况[*boleznenoie sostoianie*]的影响下，我无法让自己说出真相。所以我没有说‘是的，我有罪’，而是几乎机械地回答‘不，我无罪’。”⁶²

但所有这些医学化都无济于事。人格弱点不再符合斯大林宪法背后的假设，根据该宪法，新人已经被塑造完毕。官方话语将内部敌人描述为沉着的狂热分子，而非虚弱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再同意用治疗性语言抨击作恶者——这是妖魔化的时代。

为了解释他那句无可辩解的断言——“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孤独的”，红色教授学院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讲师试图将经典的“日蚀”辩护应用于新时代。他没有将失误归咎于其人格的原始深处，而是从最字面意义上指责自己的身体：“坦率地说，我说的胡话不是错误，而是意外的口误[*ogovorka*]。”⁶³。”既然据称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已达到绝对自我透明，彼得罗夫就无法将自己的口误解释为回归到无自我意识的生存模式，所以他将其归咎于自动行为。并非他的心灵被无意识遮蔽；问题在于身体，而非心理。在过去，党会认为容易胡言乱语的同志是舌头打结。说错的话被认为与意识无关，其重要性被搁置一旁。但当彼得罗夫暗示他只是犯了一个随意的、毫

无意义的错误时，党委中更敏锐的成员表示怀疑。根据新的观点，即使是身体也应处于完全控制之下。“不存在所谓的‘意外口误’，”当地的警惕者们总结道。⁶⁴

党不再区分错误陈述的原因及其动机。1936 年秋，一位教员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也适用于苏联”的错误建议，引发了如下评论：“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是个‘笨拙的人’，就此了事。但时代变了，我们应该仔细调查他的目的。”⁶⁵ 而那位把“苏联渣滓”打成“托洛茨基渣滓”的排字工人也招致了灾难。“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他嘟囔道，但没有人相信这样的错误会是“无意的”（*nechai ianyi*）。⁶⁶

）。如果说以前学生还能够将表面上的亵渎行为解释为善意的挑衅，那么在大清洗的日子里这已不再可能。如前所述，米哈伊洛夫曾描述科托维奇，以及延伸到托洛茨基，是个有魅力的演说家。他怎么敢赞美敌人？他的一个借口如下：“潜意识里，我回到了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如果要相信他，米哈伊洛夫是在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一名挑衅者，一个故意说错话以引诱反革命分子暴露自己的忠诚同志：“我实际上是想揭示对话者的真实政治想法。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对抗敌人，就必须揭露他。”米哈伊洛夫是一剂疫苗吗？是携带异端思想，让学生群体能够建立防御的载体吗？他所说的所有赞美科托维奇的话，是否都应该被解释为他真实想法的反面？党委的回答是响亮的“不”。一个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无法伪装自我，而一个邪恶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无法成功地伪装自己。⁶⁷

在一个世界被宣布为完美、自我控制的价值飙升的时代，自杀似乎也具有颠覆性。自杀意味着自私和不负责任地行动，破坏集体。然而，一种真正的自杀瘟疫伴随着大清洗而来，带走了中央委员会成员（亚科夫·加马尔尼克和帕纳斯·柳布琴科）以及其他显要人物，如维萨里翁·洛米纳泽，以及最著名的米哈伊尔·托姆斯基。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大林宣布此类“反党行为”是罪责的决定性证据：“他们自杀是为了掩盖行踪……最后一次欺骗我们，使我们陷入可笑的境地。一个人自杀是因为害怕被揭露。”⁶⁸

斯大林将自杀等同于叛国的做法被接受了。“我太想自杀了，”被捕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妻子皮亚特尼茨卡娅在 1937 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向他建议（一起），明知这是

错误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断然拒绝，声称他纯洁如雪。”他似乎也认同，结束自己的生命意味着在党和历史面前自证其罪。⁶⁹

1936年夏，红色教授学院内爆发激烈争论——当历史学家维克托罗夫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后自杀身亡。部分同志谴责其绝望行为是“反党示威”。潘捷列耶夫则出于对人性脆弱性的陈旧信念，强烈反对这一论断，认为维克托罗夫选择自杀或许是因为在危难时刻未能获得同仁支持。党委将“真诚的遗书或可证明任何人清白”这一观点视为潘捷列耶夫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证据（1937年4月）。⁷⁰

当主体性被彻底抹平时，意图与行为最终融合。这个新兴的、全知全能的主体不再有非预期后果，并对最轻微的过失承担全部责任。⁷¹当苏联青年领袖亚历山大·科萨列夫对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的指控表示怀疑时，斯大林指出：“或许科萨列夫不是不理解，而是不愿理解？……这些所谓的失误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体系？”⁷²“到处都在谈论蓄意破坏活动，”科学院院士维尔纳茨基在日记中平淡地写道。⁷³

阴森的笑声

布尔什维克专政初期，向来阴沉严肃的共产主义公共领域尚能容纳一丝轻松嬉戏。辩论总是激烈，但控诉者与被控者时常互换角色，向观众寻求认同的笑声。对官方幽默感的考察表明：1920年代针对内部敌人的笑声尚属温和（主要采用反讽与戏仿手法），而到1930年代末已变得尖刻而毁灭性。只要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进行、社会工程尚未完成，语言就能保持其灵活性，言说者尚可被允许嬉笑与轻浮。但随着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实现，玩笑式的威胁成为现实。当被告试图自我辩护时，法庭里回荡的笑声已是绞刑架前的笑声——那是因感知到被告即将落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之手的绝望处境，而产生的得意窃笑。

歧义性既已消除——幽默便难以存续。这并非一日之功。苏联历史上曾有过笑声被称颂的时刻，那是强大革命社会的标志。⁷⁴例如，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他1920年的文章《让我们笑吧》中赞扬了讽刺。⁷⁵几年后，他仍然坚持认为“笑声在我们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人类解放的最终斗争。”⁷⁶ 谢尔盖·爱森斯坦在其 1930 年的文章《布尔什维克确实在笑》中写道，这个时代“为世界幽默与笑声史添上了新的一页，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本身就在社会形态的历史与多样性中刻下了新的篇章”。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尚未完成，而良好的幽默感依赖于阶级斗争的进展：“只有渴望完全理解你所嘲笑的那张丑陋面孔的社会意义，才可能超越粗俗闹剧和学生式幽默的局限。”⁷⁷ 相应地，讽刺期刊在 1930 年代初蓬勃发展，尽管布尔什维克对其价值并未达成一致。如果批评者坚持认为讽刺是“唯心主义的幻象”，那么支持者则视其为一种阶级武器。⁷⁸

但讽刺主要针对外部敌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那么党员之间的幽默又是怎样的呢？速记记录党内辩论的速记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得以追随被选者兄弟会中笑声的变幻莫测。请看共产主义大学讨论联合反对派的会议记录，其中充满了笑声。尽管 1920 年代末的言论已经相当激烈，但幽默尚未达到绝对毁灭性的程度：这里表现出的更多是讽刺而非挖苦。

例如，反对派分子维特科夫斯基在 1927 年抱怨道：“当选举在我们的集体中沦为对区委的橡皮图章时，我们还如何谈论民主？……认为党内群众无法理解反对派纲领的建议，只是一种嘲弄的形式 [издевательство]。”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插嘴道：“纲领写得那么好吗？”学生们笑了。

当维特科夫斯基试图谈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演讲”时，他又被打断了：“你爱上托洛茨基了。”更多的笑声。维特科夫斯基遭到嘲笑，或许甚至是蔑视，但针对他的嘘声缓解了紧张局势，而非加剧。

多数派埃罗费耶夫以相当轻率的口吻谈论异端：“有些人，当话题转到反对派时，脑子就全乱套了 [мозги на бок выворачаются]。那些想要歪曲话语、声称我们把每一个批评中央委员会的人都称为反对派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埃罗费耶夫的语气并非特别沉重：他认为反对派的语言古怪、近乎无理；正是这一点，使得维特科夫斯基和他的学生朋友们在他眼中显得可笑。

下一位发言者，名为米季亚耶夫的多数派，也将反对派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滋扰，而非真正的危险来源。他嘲笑反对派分子为“乌合之众” (шпана)，他的措辞为他赢得了听众的轻笑。

为反对派收拾残局的奥格涅夫，试图将多数派的幽默反过来用于他们自己。“不幸的是，我的脑子不如米季亚耶夫的好使，”他讽刺地指出。当他恢复稍微严肃一点的语气，抱怨“区委正把我们的组织置于斯大林主义体制的铁盖之下”时，多数派对他进行了嘲弄：“那你想要托洛茨基来代替吗？”笑声随之而来。

即使当指控变得更加严厉时，语气仍然带有一丝戏谑。令多数派发笑的言论让反对派皱眉，反之亦然，但笑声似乎将双方拉近了。是什么消除了发言者心中的恐惧，使他们变得无动于衷，是言辞与事物之间的差距——这正是许多笑话的素材。学生们，可能是同一群学生，对效忠派和反对派的反驳都报以笑声——或许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裂痕，但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情谊仍然完好无损。当奥格涅夫鼓吹和解，说“我们必须冷静地讨论问题，并为被清洗者恢复名誉”时，会议记录表明笑声变成了掌声。

总结辩论时，多数派卡拉什尼科夫听起来有点受伤：“我们的反对派……嘲笑我们。”于是卡拉什尼科夫猛烈抨击，宣称一个叫涅洛戈夫的反对派分子，他的头颅上装饰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型，但里面装的是蠢牛的脑子”。许多人大笑，但谁能说他们是嘲笑那个有牛脑子的家伙，还是嘲笑那个发明这种幼稚侮辱的人呢？⁷⁹

这类交锋包含着嘲弄，但没有人因此在自尊上受到深深的伤害。相互竞争的派别互相嘲笑，互相讥讽——但显然，他们并没有完全认真对待对方。因此，意识形态对手的妖魔化得以避免。然而，不出十年，幽默便窒息了。1936年阅读上述速记记录的读者，对页面上笑话的质量几乎毫无兴趣。他唯一关心的是索引：他那匿名的手只在反对派的发言下划线。

考虑到大清洗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里的权力平衡，秘密警察曾被反对派嘲笑这一点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当联合反对派的成员在1927年被捕时，他们仍然可以在调查人员面前大笑、戏弄他们、装傻——十年后的情况将会多么不同。请看莫斯科共青团员季娜·兹纳缅斯卡娅的例子，她曾短暂被捕，被指控参与非法的地下活动，她如何利用幽默来颠覆她的审讯者——一个叫莫罗兹的人的权威：

莫罗兹：你的公寓被搜查了。请告诉我：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兹纳缅斯卡娅：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莫罗兹：我怎么会知道？

兹纳缅斯卡娅：部分纲领在我这儿。

莫罗兹：什么纲领？

兹纳缅斯卡娅：反对派的，还能是什么？（她笑了）……

莫罗兹：部分纲领，还有别的吗？

兹纳缅斯卡娅：我不记得了。我就是不知道（她笑了）。

兹纳缅斯卡娅明确表示她在玩游戏，她断断续续的笑声与她的言辞一样具有说服力：她暗示，被告并非一个天真的傀儡，而是一个有意识、坚定的反对派分子。兹纳缅斯卡娅否认了一切，因为，在她看来，莫罗兹没有审问她的道德权威。如果有人可以问她尖锐的问题，那应该是党的监察委员会，而不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个必须针对反革命分子，而非“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在那些年里对自己的称呼）的机构。

当审讯者威胁要让兹纳缅斯卡娅与她的一个同谋对质时，她反驳道：“你无权那样做。”审讯者试图让她明白自己的位置：“GPU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不由你决定你还没入党，”只是个候选人。被告佩夫兹纳的妻子，因此熟悉莫斯科党组织的生活，只是感到困惑。⁸⁰

审讯的其余部分是荒谬的：

莫罗兹：请告诉我，在所有这些派系活动中，你扮演什么角色？

兹纳缅斯卡娅：……我什么都不知道。平台摘录是寄给我丈夫的，不是给我。我完全没有参与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没有。你怎么想？真的。

莫罗兹：我会证明你说的不是真的。你去过维什尼科夫斯基巷吗？

兹纳缅斯卡娅：不，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

莫罗兹：许多人作证说[你与反对派会面]。

……你听说过谢尔巴科夫吗？……兰瑟尔？斯捷潘诺夫？

兹纳缅斯卡娅：我不认识这些人

莫罗兹：但她们说佩夫兹纳的妻子，兹纳缅斯卡娅，代号，迪娜——兹纳缅斯卡娅：我从来没有代号，我不认识这些人莫罗兹：也许是另一个妻子[佩夫兹纳的]？

兹纳缅斯卡娅：也许是另一个妻子（她笑了）。

莫罗兹：另一个妻子？另一个兹纳缅斯卡娅？

兹纳缅斯卡娅充满自信，当着莫罗兹的面笑着，拒绝承认自己是被告。她挑战审讯者进行一场平等的战斗，她的挑战如此有力，以至于莫罗兹以尖锐的言辞回应她的讽刺话语，

他自己，一直说着“请”。这位年轻的反对派走过场，但最终记录在案的文字是公式化的，而她审讯者的反应证明她的言辞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在与联合反对派的讨论和大清洗的严酷之间的间歇期，笑声不时爆发，但它听起来越来越病态，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因此，在 1932 年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记录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在其历史领域中的走私”的激烈辩论的文本中，幽默清晰可见。极端主义研究生攻击教职员工未能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但被拒绝，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乞求宽恕。

被告人乌加罗夫承认某些过度热心的朋友曾发表过“一些不加区分的批评”，但他坚称“总体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夸张表现。同志们只是不知该如何解读斯大林的来信。”他的道歉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人们对何种言论应被严肃对待、何种言论被视为戏谑的看法：“政治指控不应被随意抛出……我们应当说：‘考虑到 X 情况，同志，你热烈而激昂的性格导致你发动了一场不够布尔什维克式的攻击；但考虑到 Y 情况，你绝对是正确的。’然而，将每项批评都等同于托洛茨基主义，就是采用官僚主义公式：‘我的职位是党任命的，因此批评我就是批评党！’（笑声）”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在此利用了幽默为自身辩护。即便在道歉时，他仍尖锐地诉诸某种反官僚情绪，引发了同情的反应——笑声——而到 1936 年，这种笑声将被斥为同情托洛茨基主义。

受到现场反应的鼓舞，乌加罗夫继续说道：

有人说：“我们在大学里发现了一个‘托洛茨基集团’，或者至少是一个‘小团体’！让我们动员研究所来斗争这个‘托洛茨基巢穴’！”——然后烟花开始 [*poshla pisat' gubernia*]。但是同志们，一个人必须承担自己所说的话的后果！记住，托洛茨基主义已成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主要意识形态承诺。所以，如果你给某人贴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标签，你不仅在暗示他必须立即被大学开除，而且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必须对他采取措施（笑声）。⁸¹

很少有演讲者会指出这一时期官方语言使用的含义。乌加罗夫指出的行动与言语之间的差异不可能被忽视：他多次引发观众的笑声——这或许是最后一次提到对某位学生言论的字面解读会引发如此轻松的回应——乌加罗夫暗示“托洛茨基主义”正被当作一个易于交易的政治口号而四处传播。由于并非所有被描述为“托洛茨基-

主义者” 确实被当作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对待，学生们显然没有给这个标签赋予一个单一、一贯阴险的定义。称乌加罗夫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在戏弄他，而不一定是威胁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斯大林信中的言辞将自我实现：“托洛茨基主义” 获得了完全阴险的含义，被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的学生被开除出党、逮捕和枪决。与此同时，乌加罗夫可以开玩笑地说话。

各种类型的幽默在这些年里消失了。⁸² 伊利亚·伊利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可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苏联幽默家，在 1936 年向伊利亚·爱伦堡抱怨他们作品受到限制：“当我们试图嘲笑自满的苏联文牍主义者时，他们称这是诽谤。”⁸³ 由于担心喜欢模棱两可的同志更可能表里不一，当局正式禁止了玩笑。⁸⁴ 例如，马特维·什基里亚托夫拒绝区分笑话与颠覆活动：“针对党的笑话就是针对党的煽动活动。”⁸⁵ 1936 年 6 月，马列金在语言研究所发言时表示赞同：“敌人不会公开表达意见，而是披着笑话、轶事的外衣进行传播。”⁸⁶

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因“传播反革命笑话”面临日益严厉的惩罚。⁸⁷ 扎伊采夫因“在宿舍讲反斯大林笑话”遭清洗，达维坚科因声称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挑衅我们”而传播反革命轶事受到严厉谴责。⁸⁸ 当萨比托夫被发现阅读非法文献时，他坚称“这门替代课程只是个玩笑”。审判迅速进行：“连顽童都不会尝试这种事。萨比托夫显然不适合留在党内。”⁸⁹

双关语和对语言的随意态度都被定罪。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维修工塞利维尔斯托夫在 1934 年 12 月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原因是他开玩笑说：“杀死斯大林是唯一能提振苏联人民精神并震慑外国人的方式。而且很便宜：一颗子弹的价格只有两戈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委员长阿格拉诺夫在审讯中问他：“你怎么能否认你曾呼吁暗杀苏联领导人？”“我没有呼吁恐怖主义，我只是开了个玩笑，”塞利维尔斯托夫回答道，但阿格拉诺夫驳斥道：“我们，调查人员，不仅关注你呼吁恐怖的形式，也关注呼吁本身。”⁹⁰

词语一旦脱离意图，便被视为致命的严肃问题。军官扎巴卢耶夫仅仅对着镜子评论道：“好一头鬃毛，简直像季诺维也夫的[季诺维也夫以头发凌乱闻名]！”就足以让他作为认同敌人的分子而被捕。⁹¹

类似的情况导致莫斯科纺织学院的米罗什尼琴科于 1936 年 4 月被关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在绝望的恳求中，他试图解释说，眼下所有的

麻烦都源于他的同学们不欣赏他的幽默感：

据许多我尊敬的人说，我有一副优美而有力的嗓音。我的歌曲演唱让我在学生中颇受欢迎。我主要演唱浪漫的俄罗斯歌曲。但我的曲目也包括歌剧和意大利语的那不勒斯歌曲，例如《我的小太阳》和《重返索伦托》，这些我是从唱片中学会唱的。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大家谈论起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战争。

“那么，米罗什尼琴科同志，你支持谁？”一位同学问道，“意大利还是阿比西尼亚？”

“米罗什尼琴科支持意大利，”另一个人回答道。

“还能有别的可能吗，同志们？”我笑着说，“你们知道我是‘意大利人’，我甚至用意大利语唱歌。”

大家都笑了，谈话就此结束。但我所谓的同志库兹涅佐夫却有不同的看法……并向学院当局告发了我。他写道：“米罗什尼琴科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进行鼓动。”

我不知道库兹涅佐夫还写了我什么，但在 1936 年 4 月 26 日，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来到我的房间，宣布我……已根据刑法典第 58-10 条“反革命鼓动”被起诉。⁹²

在大清洗期间，幽默并未完全消失——1936-37 年的党会议速记记录偶尔提到“大厅里洋溢着欢快气氛”（*veseloe ozhivlenie v zale*）和“哄堂大笑”（*obshchii smekh*）——但它已变成了后末日式的，“阶级历史的最后笑声”。⁹³ 这种新的喜剧感在基层也很明显。1936 年春天，共产主义大学的叶尔莫连科回忆说，普列姆曾敦促他与一位同事，女教师胡季亚科娃结婚。当时已被揭露为叛徒的普列姆“曾告诉我，‘我们想让胡季亚科娃留在大学里。如果你娶她，她就能以‘职工配偶’的身份留下来。’你意识到他们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样的新娘了吗？”叶尔莫连科带着既愤怒又好笑的神情向同事们提出这个问题。除了胡季亚科娃因与异己分子有联系而受到的两次训斥外，她的教学也被标记为有偏向主义。可笑之处不仅在于叶尔莫连科被笨拙地推入一桩权宜婚姻，还在于敌人竟以为能欺骗一个好共产党员加入反对派阵营。

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在回忆已垮台的大学领导层用来提升地位的“把戏”时，又一次大笑起来。“你越是杰出，”安德留申科在 1936 年夏天指出，“你在会议主席团的座位就越高。”听众报以会意的笑声。这里的欢乐来源超越了学术等级的狂欢式颠倒。对于当时的感受力来说，同样荒谬的还有常委会成员的身份，其中包括德米特里耶夫、阿尔塔帕尔马科夫和伊扎克。这些“无赖”被揭露后，如今成了笑柄。他们教授式的狂妄自大受到了嘲笑。一位学生回忆说：“当我说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不配拥有学术学位时，伊扎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不尊重我们的领导，’他训斥我。但莫斯科的高级评定委员会看到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的档案时却笑了。’他是个无名小卒，’委员会说；‘他只知道怎么讲下流笑话。’”⁹⁴

俏皮话、机智语和双关语从官方记录中消失，而讽刺话语日益增多，这与党诠释能力的显著提高有关。⁹⁵ 在党达到完全觉悟之前，反革命分子或许还能尝试走在从黑暗通往光明的微妙钢丝上。现在他们变得显眼了，他们无法伪装成共产主义精神运动员，这使他们成了滑稽的骗子。苏联媒体创造了“胜利者的笑声”（*smekh pobeditelei*）一词：那些即将亲眼目睹共产主义的人，有资本嘲笑那些发现通往无阶级天堂的大门在他们面前关上的人。⁹⁶ 农学家李森科在 1937 年说得很好：“那些过去恶意嘲笑我的人，现在再也笑不起来了。”⁹⁷

反革命通常是件严肃的事情，但有时也会成为嘲笑的对象。反对派中心被描绘成一场闹剧般透明的阴谋中的元素。这些荒诞的企业，与其说可怕，不如说可笑。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评论说，1930 年的瑟尔佐夫-洛米纳泽集团曾“玩弄”夺取政权的想法——它实际上并没有威胁党的领导层的真实权力。⁹⁸ 1937 年 7 月，总书记“一笑置之”了敌人推翻他的计划。⁹⁹

事实上，许多人都把公审看作一场喜剧。¹⁰⁰ 官方发言人将被告比作小丑——他们可怜、谄媚、荒谬。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审的总结陈词中，维辛斯基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吼道：“停止这场小丑般的闹剧吧！”¹⁰¹ 当同一审判中的被告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时，他被告知：“这种企图脱身的可怜尝试相当滑稽！”¹⁰²

幽默与病态相互交织。1937 年冬天，中央委员会成员们对布哈林的折磨感到好笑。“你们在笑什么？”布哈林感到困惑，但他试图自我辩解时只招来更多的窃笑。¹⁰³ 在季诺维也夫的案例中，角色发生了逆转：据未经证实的说法，当他被带出牢房执行死刑时，他突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¹⁰⁴

斯大林劳改营中的一些囚犯将古拉格视为一场闹剧。他们把自己看作“一场巨大滑稽剧中的演员”，营地生活呈现出“一场滑稽实验”的特征。¹⁰⁵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

幽默印记体现在 1938 年选择修道院作为苏哈诺夫卡监狱地点，并将这个刑讯之所称为“夏季别墅”（dacha）。¹⁰⁶

确实，大清洗的怪诞幽默走向了淫秽的方向。淫秽语言是咒语化语言的典型例子：无论是以戏谑口吻说出，还是说给错误对象，它们依然保持效力。仿佛说出淫秽之语者不承认言语行为与现实事件之间存在任何分离——嘲弄就意味着毁灭。¹⁰⁷ 1935 年，国家保密总局（Glavlit）指示审查员通过打击“粗俗表达”来维护“俄语的纯洁性”。¹⁰⁸ 性器官的隐喻被从流通中清除：试图将俄语四字母词 *khren*（山葵）作为男性生殖器的双关语被宣布为反革命行为。¹⁰⁹

淫秽语言的魔幻特质，及其自我实现的非凡能力，或许解释了为何审讯记录中对脏话的删除如此谨慎。¹¹⁰ 某位巴塔舍夫 1937 年的证词被其审讯员审查：“我无法等待过去生活条件的回归，”据称巴塔舍夫说道。“如今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反犹咒骂）犹太人和……（脏话）共产党人在掌权。”¹¹¹ 针对党员的污言秽语被替换为描述（例如，“下流语言” [*pokhabshchina*] 等），斯大林的名字则被省略号替代。囚犯供认的反苏维埃粗话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记在单独的纸片上，封入特殊信封。¹¹²

但审讯员们自己却随时随地咒骂，多个来源证实了他们的口出恶言。“难道没有对囚犯不公平对待的案例，甚至出现淫秽语言 [*mat*] 吗？”亚戈达在 1935 年质问下属。“不允许说下流话！……这样你们会让自己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蒙羞。”¹¹³

亚戈达的斥责收效甚微。“你撒谎！”沃伊特洛夫斯卡亚回忆审讯员吼道。“你该跪下，你这流氓、犹太、杂种、人渣、卖身怪物”——回忆录作者拒绝复述接下来的咒骂。¹¹⁴ “想想吧，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韦斯伯格回忆一位狱友对他说，“那个人对我满口淫秽地侮辱我母亲。他可是身居要职的国家官员。真的，这种事不该发生。”后来这人意识到，“这种恶劣言语的使用并非审讯员随性所致，而是相当刻意的。”¹¹⁵ 韦斯伯格本人得到过如下“赞美”：“你这猪猡！……你这娼妓、妓女、被收买的叛徒！”¹¹⁶ 其他囚犯也受到类似称呼：“你这狗娘养的！”¹¹⁷ “你这人渣！”¹¹⁸ 审讯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的人吼道：“你是一袋屎，不是院士。”¹¹⁹

多数人从心理影响角度解释这种审讯风格。“审讯期间的目的，”一位典型幸存者认为，“是伤害一个人的

自尊，羞辱他，夺走他的勇气，削弱其抵抗能力。”¹²⁰ 然而，淫秽语言和诅咒可能有更广泛的意义，通过符号学视角最能理解。如果那些加入地下阴谋的人被塑造成向敌人出卖灵魂的叛徒，那么使用贬低他们的语言就是恰当的。¹²¹

淫秽语言是狂欢式的，是官方、克制言语的颠倒。¹²² 在大清洗的背景下，审讯者模仿了他归因于被告的破坏性企图，并试图想象一个颠倒的反革命宇宙，即被彻底颠覆的苏联俄罗斯形象。作为双重逆转的关键，咒骂通过语言的双重否定发挥作用：通过嘲讽那些嘲讽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审讯者那非凡的语言，可以说，是在拨乱反正。¹²³

急于突破囚犯心理防线，审讯者采取行动，其前提是假设被告最能理解污秽语言。¹²⁴ 因此，魏斯伯格回忆起了一个奇怪的要求：“签了认罪书，你这个皮条客，我们就完事了。”¹²⁵ 只要被告能在他审讯笔录的可怕语言中认识到可怕的事实，他就会被转化。他被许诺能迅速从他那邪恶的世界进入纯粹的斯大林主义宇宙。

羞辱被仪式化。囚犯被吐口水、被撒尿，被迫舔舐马桶，穿着松垮的、有辱人格的衣物。¹²⁶ 他们中许多人被发给没有腰带的特大号裤子（据称被拿走是为了防止自杀企图），这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提着裤子蹒跚而行。¹²⁷ 利索夫斯基在此期间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所监狱里，被安置在一张倒置的椅子上。¹²⁸ 谢格洛夫军官被要求站在走廊里，用拖把向每一位路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敬礼，他于 1937 年 5 月签署了要求的认罪书。¹²⁹

当一个羞辱场景特别精心设计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称之为“游戏”，并给它起个名字。这就是“第五角”（*piatyi ugol*）的玩法：四名军官占据房间的四个角落，用靴子殴打站在中间的囚犯。囚犯应该把自己藏在第五个不存在的角落里。¹³⁰ 来自伊万诺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朱拉夫廖夫发明了另一个游戏，叫做“鸭子”：两名狱卒捆住囚犯的手脚，掰开他的下巴。然后第三名狱卒试图用他的尿液击中囚犯的嘴。¹³¹ 细节可能有所不同。梅列茨科夫将军是跪着而非仰面朝天，审讯者在他的“秃头”上撒尿，而不是嘴上。伴随的“哄堂大笑”表明这个游戏很有趣。¹³²

跳舞同样有效。1938 年 5 月被捕的国家检察官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拒绝遵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示，供认自己是右翼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他的审讯者，一个叫克列宁的人，命令他抱着一把椅子在房间里蹦跳，“跳狐步舞”。起初，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认为审讯者在

开玩笑，但一阵新的耳光浪潮很快让他确信这编排是认真的：“完全惊呆了，我开始双手抱着椅子在房间里蹦跳。这持续了几个小时。每当我停下，他就再次打我，让我继续跳。”¹³³

审讯者的殴打既非随意也非出自真心，很难描述为愤怒的行为。殴打的蓄意性和其中蕴含的嘲弄表明，这些手势必须被视为一种换喻，代表污言秽语，是正常言语的替代品。无论多么粗野和施虐，殴打都有一个精确的语义定位——这是一个诚实的苏联公民应该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方式。后者此前不熟悉恰当的语言，在被迫认罪的过程中，学会了在语言上做出回应。

在审讯一名在档案中仅被称为“K”的涉嫌颠覆分子时，调查人员发明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游戏，将动作与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嚎叫和咆哮——结合起来。根据调查人员的命令，被告必须爬到一个用铁框围住的高窗前：“因为他个子高，K的头会不断撞到天花板。背靠着墙，他的背被金属框杆严重擦伤。”当他爬到这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后，被告被要求用最大的力气喊出：“喔喔喔！”这引来折磨者们阵阵哄笑。他们会向被告伸出舌头，模仿公鸡的叫声。“看看他，”他们嘲笑道，“他不肯认罪，但他喔喔喔的声音听起来像夜莺的歌声！”¹³⁴ 在他们的另一项娱乐活动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尉们要求K模仿一头牛。¹³⁵

在这间审讯室里，本质与表象终于匹配了：当K贬低自己，表现得像个傻瓜，说着胡言乱语时，他外在的行为终于符合了他的真实自我。任何否认反对苏联秩序罪行的说法，其意义大概就和大喊“喔喔喔！”差不多。这种荒谬的语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看来，这是地牢里唯一真正下流的语言——必须在共产主义的供词语言开始运作之前被清除掉。

这些极具想象力的羞辱旨在迫使反革命分子认识到他们非人的本质。官方媒体将托洛茨基、张伯伦、希特勒以及其他据称是被告外国主子的人描绘成蛇和野狗。一旦他们苏联代表的野兽身份被证实，后者也被剥去了同志——被选者兄弟会中的同志——的身份，间谍、破坏及其他卑劣活动就可以归咎于他们。¹³⁶ 这与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对被告的描述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形容被告“像捣蛋的猫一样卑鄙”或“像发怒大象的小狗”。¹³⁷ 他要求“把这些疯狗都枪毙——一个不留！”¹³⁸

如果他的控诉者把布哈林描述为“狐狸和猪的杂交”，他本人则

坚称自己仍然是一个具有道德敏感性的生物。¹³⁹ 布哈林在 1936 年 12 月 1 日的一封信中向莫洛托夫保证，他不是“犀牛”，而是“人”。¹⁴⁰ 一些囚犯承认他们已被贬低到动物的地位。“脸朝下，匍匐在地板上，”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尔德告诉莫洛托夫，他如何“像被主人鞭打的狗一样哀嚎、尖叫、扭动”。¹⁴¹ 中央委员伊克拉莫夫在 1937 年受审时承认：“我是一个像动物一样的赤裸的人。”¹⁴² 布哈林的门徒齐采夫形容自己是“毒蛇”。¹⁴³ 其他人则将非人化的语言送回给发送者。一名囚犯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线人卡谢耶夫比作“拴着皮带的狗。他对谁吠叫，谁就被逮捕。”而某个叫迈尔的人在 1937 年受审期间说，“安全部门里都是畜生，不是人。”¹⁴⁴

如何与那些不懂人话的托洛茨基分子沟通？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解决方案：语言变成了一种物理结构而非符号结构——一束声音，而非一堆意义。想想审讯者们嘲讽地称之为“电话”的东西。厚厚的纸卷起来塞进囚犯的耳朵。然后审讯者在被绑住的受害者两侧，用尽肺活量大喊：“认罪！认罪！认罪！”直到他的耳膜破裂。¹⁴⁵ 再举一个例子：当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用“鲜血和脑浆”（*krov' iu i mozgom*）书写认罪书时，被告字面意义上不得不将他的内脏倾倒在纸上。¹⁴⁶

证明新人（New Man）在本体论上的独特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笑声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超越了官方语言，既先于符号又后于符号；它既是对通常归因于那些不了解斯大林主义真理之人的前意识形态声音的模仿，也是消除了无意识、超越了正常言语的个体所产生的高度复杂产物。在嘲笑的审讯者面前，生理学与意识形态重合了：含糊不清的准动物声音与承载意义的声音——那种典型的解放之声——共存。

与世界上其他警察部队的做法相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方式是否显得突出？叶若夫的审讯者贡献了诸如“托洛茨基渣滓”和“反革命流氓”之类的辱骂性术语，以及不需要工具、反而涉及病态幽默的酷刑技巧。更根本的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话语内部部署这种仪式化的残忍行为，这一事实表明，普遍主义并不排除非人化。内务人民委员部施虐行为的新颖之处，与其说在于使用的词语甚至采取的行动，不如说在于为这种施虐辩护的弥赛亚式时间计算。频繁使用咒骂和殴打表明正常的沟通无法继续，囚犯们已经被审判并被认定为非人。

托洛茨基分子的枕边密谈

1936年12月，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收了艾玛·阿韦里亚诺夫娜·德米特里耶娃的护照——她是被处决的共产主义大学讲师德米特里耶夫的妻子。德米特里耶娃和她的女儿被流放到鄂木斯克五年。她的抗辩，她反复声称自己个人无罪，都是徒劳：“我们被必须背负的污名重量压垮了。”1955年，在一个偏远的乌克兰村庄担任学校教师的德米特里耶娃向国家请愿，希望她的苦难最终能够结束。她还请求帮助“寻找我的丈夫。我之前所有试图查明他命运的努力都毫无结果。”在她丈夫失踪十九年后，德米特里耶娃仍然不确定他是被枪毙了还是在劳改营里腐烂。受到赫鲁晓夫解冻的鼓舞，她希望当局“能找到德米特里耶夫，重新审查他的案件，如果有足够依据，考虑为他平反。”¹⁴⁷

德米特里耶娃并非个例：毫无疑问，苏联政权将罪责延伸到了家庭成员身上。¹⁴⁸ 莫洛托夫后来解释说：“将镇压措施施加于敌人的妻子和孩子身上，这是绝对不言自明的。”¹⁴⁹ 根据官方数据，1939年古拉格中有13,172人是以“叛徒家庭成员”的身份被捕的。¹⁵⁰ 受影响的家庭被从列宁格勒驱逐的比率尤其惊人。在1937年7月22日这一天，不一定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就驱逐了该市129个家庭（215人）。¹⁵¹

许多人因家庭成员的罪孽而受罚感到不满。某个叫安季波夫的人在1938年12月12日于列宁格勒火车站等待驱逐时向中央委员会申诉：“驱逐……政治上危险的分子——这个我理解。但要连根拔除整个家庭，包括妻子和老人——这里面一定有破坏分子的手在作祟。”¹⁵² 另一些人引用斯大林最近颁布的宪法中的某一条款，要求只根据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非亲属的行为来审判他们。¹⁵³ 来自莫斯科物理研究所的鲁默尔在1937年4月指出，“人可以选择朋友，却无法选择兄弟。虽然我的朋友都没有被捕，但我的[托洛茨基分子]哥哥比我大十七岁”；他说，自己和他几乎没有联系。¹⁵⁴ 库图佐娃是莫斯科工人学院的毕业生，她在11月也以同样的口吻说：“我和我的妹妹不住在一起。我只是为了看母亲才不时去她住的公寓。”她补充道，“像她这样的人民公敌必须被消灭，以免玷污我们的土地，”她声明她希望她“前妹妹”的罪行不会影响到她。¹⁵⁵

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中显而易见的集体责任模式，是否违反了苏联罪责是个人的观念？德米特里耶娃的流放

或者库图佐娃的被清洗，是否表明苏联领导层认为道德能力并非附着于离散的个体，而是附着于整个亲缘群体？我们知道斯大林经常签署对人民公敌的妻子和/或孩子的逮捕名单。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吗：作为高加索人，“那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血亲复仇和家庭报复的文化传统，斯大林或许很自然地会从惩罚亲缘群体的角度来思考”？¹⁵⁶ 在寻找答案时，我们或许可以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家庭观念。矛盾的是，苏联对家庭关系的关注非但没有标志着某种基因主义的复兴，反而成为共产主义个体化的顶峰。¹⁵⁷ 根据内在价值判断每个灵魂的需要得到了激进的解释：一个真正自主的个体必须完全摆脱他所爱之人的掌控。

在斯大林主义下，传统家庭价值观受到严厉批评，更不用说嘲笑了。党嘲笑在有意义的东正教、农民家庭文化与“资产阶级”西方家庭生活理想之间做出区分的建议——两者显然都是父权制的、剥削性的，并且基于偏见。旧家庭结构被呈现为保守主义的传导体，是旧秩序用来维持其霸权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虽然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是可以通过意识修正的直接问题，但一个人的孝心被视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精神层面，不易改变。

斯大林主义的语言暗示了所有人际间纯粹情感联系的非合法化。¹⁵⁸ 那些传统上带有虔诚孝道意味的表达，开始具有贬义含义：“家庭关系”（*semeistvennost'*）开始指代裙带关系，“亲属关系”（*rodstvo*）指代罪犯或破坏分子的邪恶团结。在党的文件中，配偶仅以名字和父名相称，从而使婚姻联系在语言上不可见；妻子很少随夫姓。

党的宣传人员援引马克思的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是私事，“但前提是它们不违反社会秩序。”¹⁵⁹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重申了这一准则：“我们不干涉人们的私生活，但我们要求同志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不得对党产生负面影响。”¹⁶⁰ 1930年12月，一位名叫斯特拉舍夫斯基的人在监察委员会前抗议道：“与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同志们避开工人阶级的女孩，却偏爱白军军官留下的女士。‘我们会改造她们，’他们说，但……因为自然界女性支配男性，结果反而适得其反。”¹⁶¹ 对阶级或政治立场不同之个体的吸引力，被宣称是“不亚于对猩猩或鳄鱼的迷恋”。¹⁶² 纳雷姆的一位女性就因“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染”而受到正式训斥。¹⁶³

共产党人被要求在自己的家庭中进行传教，必须定期汇报已成功说服哪些家庭成员投身革命事业。对于老一辈人，尤其是母亲和祖母（女性被认为在思想上较不敏锐），大家认为需要时间，但每位共产党人至少必须说服自己的生活伴侣。¹⁶⁴ 当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问及其妻子为何未入党时，扎伊杰尔试图为自己开脱：“我妻子身体不好，听力不佳。她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审讯记录未说明审讯员的反应，但这一借口并未能阻止其整个家庭最终被定罪。¹⁶⁵

在被认为值得保留的程度上，共产党家庭，据克雷连科所言，是“培养新人的手段”。¹⁶⁶ 布尔什维克中普遍存在的给子女取革命性名字的倾向，揭示了这种将父母身份政治化的决心。¹⁶⁷ 这可能有风险：我们已见识过以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命名的学生遭遇了什么。而卡赞斯基，空军军事学院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教员，1937 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了四个月，只因他给 1926 年出生的儿子取名“列季特”，以纪念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¹⁶⁸

那些被认定无可救药、无法改造的父母，必须被移交当局。¹⁶⁹ 斯大林在 1932 年教导说，首要的认同对象必须是党，而非家庭：“要做我们真正的母亲——共产党——的合格儿女。”¹⁷⁰ 共青团报刊在 1936 年呼应道，如果父母“敌视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孝道”就必须暂停。¹⁷¹ 著名的苏联教育理论家安东·马卡连科，非常赞赏那些“如此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至于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愿信任”的年轻人。¹⁷²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一个爱党胜过爱家庭的农民男孩，成为共产党青年的重要榜样。帕夫利克是叶卡捷琳堡附近的小村庄格拉西莫夫卡的少先队小队长，也是农村集体化运动的狂热支持者。1932 年，十三岁的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其父是富农，导致其父被判处十年强制劳动。帕夫利克的远亲视他为叛徒，同年 9 月 3 日，他的叔叔、祖父、祖母和一个堂兄将他连同他的弟弟一起杀害。¹⁷³ 苏联宣传机器迅速将这位受害者塑造成烈士：帕夫利克·莫罗佐夫道德剧成为儿童歌曲、戏剧、交响诗、完整歌剧和六部传记的主题。1936 年 7 月 28 日，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市中心竖立一座纪念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雕像。¹⁷⁴ 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敦促新一代人：“回想帕夫利克的英雄气概，一个‘小伙子’的英雄气概，他明白血亲可能是你精神上最凶恶的敌人。”¹⁷⁵ 许多人将这一训诫铭记于心。例如，一位名叫托洛孔尼科夫的人在 1936 年 2 月的一封信中向政府保证，他准备掐死“那个曾是我父亲的人”，因为他犯了农民的贪婪罪。

1936 that he was ready to strangle “the man who used to be my father” because he was guilty of peasant acquisitiveness.¹⁷⁶ 当红色教授学院党委发现安娜·雅库尼娜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其叔父是富农剥削者时，撤销了先前清洗她的决定。¹⁷⁷

那些不愿放弃其思想不健康的父母的学生，注定难逃被清洗的命运。1935年，曾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博格丹诺娃，在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次党会议上被要求解释为何她仍与资产阶级家庭保持某些联系。博格丹诺娃从描述一个破碎的家庭开始，很快转而强调她与父母和兄弟联系甚少：“我父亲在我幼年时去世。我由哥哥们抚养。其中一个塔斯社的记者，第二个是诗人，第三个是学生。在政治上，他们不是我们的人。1919年，我的另一个哥哥被契卡枪决。十五岁时，我离开家庭，加入了共青团。”当她几年前在德国与“白俄移民母亲”会面的细节被曝光后，她的证词失去了可信度，博格丹诺娃很快被清洗。¹⁷⁸ 她的同事古巴里纳的境况较好，她宣称“我对父亲不保留任何孝顺之情；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他，那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她被认为对其父母的政治面貌负责，得以保留党证。¹⁷⁹

1935年6月的一项法律规定，父母对其子女的行为负法律责任。¹⁸⁰ 在共产主义大学交换党证期间，六十六岁的奥尔洛夫被指控庇护其被捕的儿子（据称其子曾计划暗杀日丹诺夫）。老奥尔洛夫声称他的儿子并非看起来那样邪恶。由于在这种背景下表明亲属关系可能具有破坏性，奥尔洛夫只用“他”来指代他的儿子：“我跟他谈过好几次，试图说服他不要反对开除托洛茨基……并不是说清洗他不公平——他未能从近期事件中吸取教训——但他确实试图弥补。我认为他现在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由于未能认识到针对其子女的指控的严重性，老奥尔洛夫被清洗，并非因为他本人是敌人，而是因为他未能识别出一个敌人：“奥尔洛夫没有果断地谴责他的儿子是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反而声称他的儿子据称‘误入歧途’，仅此而已。”¹⁸¹

反革命分子一旦暴露，就丧失了对其子女的所有权利。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员布祖列维奇收到前妻的来信，告知他：“既然你肯定与被揭露充斥着托洛茨基分子的大学机构关系密切，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不与你有任何来往。”在回信中，心烦意乱的布祖列维奇声称他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不敢质疑父母身份是政治问题这一假设。¹⁸²

如果孩子没有与其落后的父母分开——例如，当孩子伴随被判刑的父母去劳改营时——孩子几乎不可能成为有觉悟的苏联公民。¹⁸³ “一个五岁的孩子与劳改营囚犯的孩子玩耍时，确实可能听到他们说出工人阶级领袖的名字，”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在 1936 年指出。但由于他反对派的母亲“严禁他说出那些名字，这个孩子很可能会发展成托洛茨基分子。”¹⁸⁴ 受这种儿童心理学的启发，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将所有居住在白海劳改营的八岁以下儿童转移到孤儿院。¹⁸⁵

叶若夫 1937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第 00486 号命令，指示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向中心电报告知那些母亲已被逮捕的儿童姓名。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有关联的，或者仅因共同反革命过去而相识的儿童，最终不会进入同一所孤儿院。¹⁸⁶ 格奥尔基在 1936 年其父罗纳德·德米特里耶夫（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与其姐妹迪亚列克季娜、埃涅尔吉娅和米罗斯拉娃一同被捕后，被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在这个孤儿院里，这个小男孩遇到了其他失势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子女，其中包括尤拉·图哈切夫斯基和拉达·皮亚塔科娃，“所有人都很害怕。”在院子里玩耍时，“政治犯”的孩子们与其他孩子被一道厚厚的栅栏隔开：“普通刑事犯的孩子常冲我们喊‘托洛茨基分子！’‘叛徒！’并朝我们扔石头。”¹⁸⁷

无数孩子效仿了这个榜样。韦尔曼，列宁格勒以北某个劳改营的一名政治犯，回忆道：“1937 年冬天，当我们的队伍向卡尔戈波尔劳改营行进，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一个小村庄时，我们看到路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和一排学生。当我们与他们齐平时，教师命令道：‘三——四！’孩子们便欢快地唱起‘人民公敌死路一条！’”¹⁸⁸ 党对表现出早熟政治兴趣的孩子感到自豪。拉狄克在 1936 年作秀审判后指出：“当破坏者获得赦免时，我遇到的一些孩子中激起了愤怒的洪流。他们问我：‘那些曾想让工人农民挨饿的人怎么能不被处决？’”¹⁸⁹

1937 年 5 月 20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对受镇压父母子女的正确政治教育》的指示。¹⁹⁰ 一个特殊的“无产阶级城市”被建立起来，以便对这些处境不利的青年进行再教育。¹⁹¹ 但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7 年 9 月的一份备忘录遗憾地指出，即使在这些地方，也存在儿童破坏活动的案例（1937 年 9 月）。¹⁹² 也许正因如此，政府在 1938 年 1 月允许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托洛茨基分子的子女送往监护人处，“前提是首先确认后者能在政治上引导他们。”¹⁹³

“并非每个兄弟都是兄弟”，帕夫利克·莫罗佐最早的传记之一中的一个章节标题，是大清洗的另一个突出主题。

phies of Pavlik Morozov, was another prominent theme of the Great Purge.¹⁹⁴ 许多未能揭发其反革命兄弟姐妹的学生被开除出党。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贝科夫声称，他向斯大林揭发德米特里耶夫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与他异端的兄弟划清界限”（1936年春季）。¹⁹⁵

1936年7月，当共产主义大学发现研究生院副院长纳罗德尼茨基的兄弟曾是一个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时，对这位行政人员提起了指控。纳罗德尼茨基解释说：“我的六个兄弟姐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身居要职。只有一个兄弟不知何故仍落后。我不知道他为何陷入反对主义，也不知道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与他有联系。”大学里的列宁主义教师 V. Sh. 格尔施费尔德证实了纳罗德尼茨基的说法：“我在1920年代末曾在一家针织厂与纳罗德尼茨基的这个兄弟共事；他确实目不识丁，心理上很幼稚，而且在反对主义上固执得令人难以置信。”格尔施费尔德发誓说他“从未想过纳罗德尼茨基会不揭露他兄弟的过去。我不能原谅自己如此信任纳罗德尼茨基的诚实。”如果格尔施费尔德只受到严厉训斥就脱身了，纳罗德尼茨基则必须被清洗；用普列德的话说，他“虚伪地将他的托洛茨基兄弟轻描淡写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据称偶然加入敌营的人。”¹⁹⁶

即使与配偶在一起，党员也应时刻保持自我意识。诚然，他们被期待去爱，但爱是两个思想之间增强的亲和力——一种理性的、而非情感的纽带。薇拉·恰普林娜深爱她的丈夫、著名的共青团领袖尼古拉·恰普林，但在他身上，她看到的是一位同志，而不仅仅是一个情人。她自豪地回忆道：“当需要一名志愿人员，在向苏联走私机密文件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时，……尼古拉·恰普林推荐了我，不顾我是他的妻子和他年幼孩子的母亲。”¹⁹⁷ 在叶若夫家中，意识也作为亲密关系的源泉补充着情感。叶若夫个人档案中，其陷入困境的妻子叶夫根尼娅写的一张奇特字条证明了这一点：“科柳申卡！我求你，……查清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全部。我无法接受我被怀疑两面三刀。”¹⁹⁸

有义务与背叛的配偶划清界限。¹⁹⁹ 皮亚特尼茨卡娅倾向于接受党的要求并揭发她的丈夫，她在1938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样你就能证明你不仅仅是一个妻子……你是伟大苏维埃联盟的一名公民。如果你没有力量这样做——那你就见鬼去吧。”²⁰⁰ 马特廖娜·普罗科菲耶夫娜·波奇塔连科的丈夫奥特罗日坚诺夫于1935年被捕，她显得意志薄弱。她不仅试图向丈夫违规传递物品，甚至要求与他进行面对面

会谈。 尽管多次警告她应与“敌人”划清界限，波奇塔连科仍出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要求与丈夫一同流放雅库茨克”，她工作的单位赫尔岑研究所的党组织随即对她进行了清洗。²⁰¹

玛格丽塔·米哈伊洛夫娜·拉法伊洛维奇的丈夫索罗金也遭逮捕。作为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拉法伊洛维奇在 1935 年 1 月 25 日竭力“以共产党员而非妻子的身份”对他作出评价。“在与我的交谈中，索罗金始终认同党，”她报告道，“诚然，他染上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恶疾，比如领袖崇拜[领袖崇拜(俄语: *vozhdizm*)]。但我一直在努力改造他。他是否在伪装情感我无法判断，但索罗金给人的印象是对基洛夫遇刺深感痛心。”党委对此不为所动：“个人情感必定遮蔽了她的责任感，使其丧失了阶级警觉。”²⁰²（顺便提及，妻子遭受迫害不应简单解读为纯粹的父权制。妻子被定罪的丈夫也会受到惩罚。列宁格勒农业科学院院长阿尼舍夫——通常被描述为“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于 1933 年因“与被流放的妻子通信”而被清除出党。）²⁰³

时而也会响起为被捕配偶辩护的温和声音。“我代表数百名女性写信，她们将苏联监狱称为‘哭墙’，在那里年轻审讯员指望通过羞辱……被捕者的妻子来谋求晋升，仿佛这样做就能证明自己的警惕性，”一位名叫伊万诺娃的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当妻子向调查人员询问：‘我丈夫犯了什么罪？’她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他是人民公敌，但具体罪行是秘密。’”但正如这封控诉信的结尾所示，国家绝对正确的假设不容质疑：“我们，苏联妇女，要求政府公开审判我们的丈夫，以便我们亲眼判断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敌人。届时我们将能将丈夫从心中彻底割舍。”²⁰⁴

为在配偶被捕后必然到来的调查中生存下来，最好随着指控证据的提出逐步与被指控者保持距离：被怀疑者因此试图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权，辩称越了解丈夫或妻子，就越不信任对方。1936 年 3 月，共产主义大学发现胡季亚科娃对其托派分子丈夫奇斯托夫表现出有害的摇摆态度。胡季亚科娃声称仅在 1933 年清洗期间——即婚后——才得知奇斯托夫是反对派。“只要还有希望恢复奇斯托夫的职务，”她解释道，“我就保持联系；奇斯托夫病了，我必须给予他帮助。”然而一旦清洗决议通过，“我重新审视了与他的生活，并

告知奇斯托夫我们之间结束了。”胡季亚科娃特别强调她只与“普列杰同志”而非丈夫讨论私人事务。“为什么，”交流委员会成员质疑，“胡季亚科娃需要校长指点她的私生活？”“若她真不同情反对派，本应更早与奇斯托夫断绝关系。”²⁰⁵

确实，胡季亚科娃与红色教授学院的扎瓦多夫斯卡娅截然不同——后者在1937年6月检举丈夫：“我们共同生活的九年间，扎瓦多夫斯基始终受我影响。1935年我甚至推荐他从事秘密工作。”次年，B.扎瓦多夫斯基发生婚外情：“目前我们相隔万里，还隔着另一个女人——她的政治面目我无从知晓。既然我对扎瓦多夫斯基当前所受影响一无所知，我认为有责任撤销先前给予他的积极推荐。”²⁰⁶

扎瓦多夫斯卡娅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7年8月15日明确宣告“检举丈夫的妻子”将被宽恕。²⁰⁷1939年5月11日的另一项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补充规定：“人民公敌配偶提出的离婚申请将立即批准”——无需办理手续。²⁰⁸

党严厉批判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忠诚应高于一切其他忠诚形式的论调，敦促所有有良知的公民利用与亲人的日常接触来彻底了解他们的政治人格。我的爱人理解革命的需要吗？他或她会不会是反对派？这些正是共产党员们自问的部分问题。步入婚姻意味着持续质询，同时扮演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角色。²⁰⁹

以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学生米亚辛为例，其妻胡托罗克因托洛茨基主义被地区三人小组开除出党。他的同学涅克拉索娃致信党委，坚称米亚辛未履行优秀共产党员的本分：“他在党代会和私下谈话中反复强调，胡托罗克遭遇‘完全不公’。”但胡托罗克不是在1933年试图自杀吗？“胡托罗克因心怀不满的反对派身份而厌倦生活。在试探我的过程中，她曾坦承仍忠于托洛茨基。米亚辛非但没有举报妻子明确的反党立场，反而设法从基洛夫处为胡托罗克争取到特殊配给[食品和服装]。”米亚辛的行为似乎与尼古拉耶夫如出一辙——后者在向列宁格勒党书记的背后开枪前也曾乞求其经济援助。²¹⁰

有一段时间，米亚辛为妻子的清白辩护。当他回顾三年前的事件时，竭力传达她的绝望：“胡托罗克

患有神经系统功能性紊乱。她情绪低落，医生嘱咐我仔细看护她。”某夜米亚辛惊醒，看见妻子坐在窗边涂写着什么：“当我询问她在做什么时，她建议我把枪藏起来。我要强调的是，当时我未听到她任何托派言论。我知道胡托罗克1923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期间支持过托洛茨基，后来在奥廖尔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又如此。尽管我们不断讨论政治——胡托罗克在同居四年间不得不向我表明立场——我在她身上未发现托洛茨基主义的丝毫痕迹。”尽管被指控“捏造区分好托派与坏托派的理论”，米亚辛并未气馁：“我只能说，党教导我们要因人而异。我相信胡托罗克属于皮达科夫式的托派分子”——此时皮达科夫仍是真诚悔过的象征——“她有权就定罪提出上诉。”²¹¹

但像胡托罗克这样的反对派可能真正悔过的可能性如今已被否定。那些未能识别并惩处日夜相处的叛徒的人，犯下了严重错误。同志们逐一斥责米亚辛：“你多年未察觉胡托罗克的反对派痕迹，这只能加重你的罪责！”还有：“你为何三次跑到党部询问？究竟谁更了解胡托罗克，是你还是党书记？”还有：“你的虚伪显而易见。你用法律术语谈论胡托罗克——一名活跃的反派”——即采取形式主义的资产阶级定罪方式，而非实质的共产主义方式。还有：“尽管你熟悉反对派的策略，却宁愿质疑党的判决而非你妻子的！”“米亚辛，你对家庭制度持有市侩态度！”

米亚辛虚弱地嘟囔：“自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胡托罗克起，我明白自己错了。胡托罗克的逮捕划清了我与她之间的界限。从此，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这番冷淡的道歉不可能挽救他；米亚辛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两面派保护者”被清洗。²¹²

并非所有家庭都像米亚辛家那样亲密，也并非所有配偶都对伴侣承担同等责任。²¹³当赫尔岑学院讲师罗克琳娜证明自己与反对派丈夫分居不同公寓（博戈莫利斯基继续与前家庭同住），“因此无法深入了解他”后，她获得了疑点利益。显然，委员会认定罗克琳娜未曾获得真正洞察博戈莫利斯基灵魂深处的机会。内务人民委员部承认，与反革命配偶同居的时长必须纳入考量。²¹⁴

人民公敌的配偶受怀疑并非因亲属关系，而是因未能履行诠释职责。²¹⁵ 1938年7月，国防委员部的沃兹涅先斯基被捕时，其妻拒绝相信指控。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她对自己的诠释能力充满信心：“我了解丈夫是个诚实的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当你仅从工作或朋友茶会了解某人时，你的判断可能出错——但与丈夫和谐生活十八年却未能看透他[看透他(俄语: *razgliadet' ego*)]——此人必定极其盲目，而我并不盲目。”²¹⁶

1936年，特别是1937年形势愈发紧迫时，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主张有权全面掌握学生家庭情况。通常由两三名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被指派调查具有可疑家庭背景的同志。许多学生因未向党委报告家族圈中存在意识形态敌人而失去党籍。²¹⁷ 1937年末红色教授学院审理的十六个案件中，九起涉及不可靠的家庭成员。伊瓦舍夫因“未检举妻子”被指控，卡采涅利隐瞒儿子妻子的兄弟旅居国外，波波夫有人民公敌亲属。库列夫和古巴琳娜也濒临逮捕，前者因“兄弟越过苏联边境”，后者为被捕父亲辩护从而“表明她不信任内务人民委员部。”²¹⁸

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塔季扬娜·阿布拉莫夫娜·巴伦堪称共产党员中的约伯。1936年清洗期间，其夫被定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份公报日期为1936年7月的军事学院文件指出：“基辅共青团员多布罗夫积极参与反对派，曾撰写宣言要求允许托洛茨基发声。”巴伦一得到消息便在共产主义大学党委（她任技术秘书）前坦白：“不久前我收到匿名信，指出多布罗夫是托派分子。多布罗夫极不情愿地向我透露与那些人的联系，借口称尚未向局里详细说明。”仿佛为了向当局证明自己并非“迷失的人”（迷失的人(俄语: *poteriannyi che lovek*)），巴伦决定寻求离婚。²¹⁹

尽管她“继续做布尔什维克”的请求暂时获准，但巴伦的麻烦才刚开始。不久后她再次受斥责，这次因“隐瞒父亲曾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事实”。现在该与父亲划清界限了。“是的，”这位勤勉的共产党员承认，“我知道父亲拥有一家针织作坊。这正是我由兄长斯韦托夫抚养的原因。”²²⁰ 又过了一个月，

巴伦收到弟弟马耶夫的来信，告知“我们的长兄刚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清洗。”她再次昂首阔步前行。“我有责任向党组织报告，”她在1937年3月写道，“我的兄长，乌克兰总局负责人，因包庇人民公敌刚刚被开除出党。”²²¹

巴伦一家时而同舟共济，时而各自沉沦，境况每况愈下。当他们得知巴伦的弟弟也遭逮捕后，大学领导——此前表现出惊人的耐心——决定是时候更仔细调查此事了：

问：为何你们兄弟姓氏不同？

a：他们以像“巴龙”这样的姓氏为耻。[单词 *baron* 在俄语中与英语意思相同。]

q：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兄弟们被开除出基辅共青团的？

a：1928年。当时我也知道我丈夫是那个反对派组织的成员。

她所在支部的成员逐渐相信“巴龙在1928-29年就已经知道基辅的托洛茨基分子——包括她的丈夫和兄弟——是两面派，但什么也没说。”为了证明被告与她的反对派家庭仍保持密切联系，提出了三组论据：（1）如果巴龙真如她所声称的那样，因无法忍受其观点而与丈夫离婚，“她无疑也会与她的托洛茨基兄弟断绝一切关系，但她并没有这样做。”（2）巴龙收到她的托洛茨基兄弟的消息“不是通过她母亲，而是直接联系”，这意味着她仍然与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3）尽管反复被告诫要与敌人断绝联系，“巴龙还是去了基辅，并在那里会见了她托洛茨基分子的丈夫。”完全重新建构后，巴龙的家族谱系被描绘成一棵托洛茨基主义的树：她的父亲是根，她的丈夫和兄弟是枝条。在下令清洗她的决议中，委员会给出了如下总结：“巴龙的本质是剥削者。她的意识是由敌人培养的。”²²²

尽管A.M.沃洛达尔斯卡娅的家庭背景问题不比巴龙少，但这位红色教授学院的历史讲师，通过说服审问者她自己的政治记录与她叛国家庭的记录相悖，成功维护了她的共产主义自我认同。她的困境始于1935年她的丈夫鲁德尼茨基自杀。一项调查表明，“鲁德尼茨基可能与反革命分子有过联系；当他看到自己将被揭穿时，决定逃避责任。”沃洛达尔斯卡娅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一段截然不同的夫妻生活图景：

将她的丈夫置于不同的光线下：“鲁德尼茨基和我共同生活了十五年。我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同志。我从未怀疑过他对党的忠诚，并且一直相信他。当他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在被建议“要客观并查清她丈夫的真实情况”后，沃洛达斯卡娅在共产主义学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那里，认识鲁德尼茨基的学生向她保证，“他的名字从未与人民的敌人牵扯在一起。”当沃洛达斯卡娅从军事检察官那里获得证据，诊断她丈夫的自杀是“出于身体疾病的原因”时，剩余的怀疑也消散了。

一片疑云仍然笼罩着沃洛达斯卡娅。1936年夏天，她被指示“要详细询问她所有的亲戚和熟人……以核实他们中是否有人曾经是反对派。”沃洛达斯卡娅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这个建议：“我一回到家就开始在脑海里过一遍我的亲戚们。”她决定最好是书面询问她的兄弟们——毕竟，没有比书面陈述更好的东西可以在党内法庭上出示了。只有她的哥哥有什么需要坦白的：“亚历山大，现在是莫斯科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写信告诉我：‘是的，我在1923年动摇过；但到了1925-27年，我已经改正了。’”

但这远非故事的结局。1937年2月，沃洛达斯卡娅的一个兄弟因“隐瞒与皮达科夫的联系”被判处五年劳改营。另一个被描述为“一家受污染的杂志的编辑”并遭到逮捕。关于沃洛达斯卡娅的旧疑被重新提起。她的同事库拉金不相信她会对兄弟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例如，我不仅知道我亲戚的情况，也知道我熟人的情况。”党委得出结论，“姐妹之情一定压倒了沃洛达斯卡娅。”有人提出动议要清洗她。“尽管这位讲师有许多积极的品质，但我们无法信任一个亲戚左一个右一个都是人民敌人的人。”沃洛达斯卡娅宣布，她愿意为他们罪行承担“道德”责任，但不是“政治”责任，因为“我的兄弟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我的共产主义身份不应该基于他们的记录。”

最终，她获得了一份证明，大意是“1923年作为赫尔岑学院的学生时，沃洛达斯卡娅让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托洛茨基的女儿日子很难过”——三十四人投票赞成开除，六十二人赞成严厉训斥。她就这样勉强逃过了清洗。²²³

虽然不可否认，1930年代末许多家庭被一扫而光，但他们遭受此运，并非作为一个由牢固血缘纽带联结的有机体，而是作为一个由共同意识联结的、紧密团结的反革命小组。由于参与第二个小组是自由意志的问题，而在第一个（家庭）中则是生物宿命的问题，党员

总是可以希望得到平反。因此我们看到，沃洛达尔斯卡娅通过说服审问者她自己的政治记录与她叛国家庭的记录相悖，成功维护了她的共产主义自我认同。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点了如此多亲属的名，并非因为他们的基因被污染，而是因为他们作为阐释者失败了。谁会无能到无法揭穿那些与他们亲密生活在一起的人的邪恶灵魂？那些占据如此便利位置却未报告任何事情的党员，很可能是在故意庇护他们的同谋者。正是这种逻辑，使得家庭成员偶尔能逃脱亲人遭受的命运，也使得他们在大清洗中成为同谋。1935-38 年间，共产主义家庭不仅是压迫的对象，也是压迫的主体：斯大林主义话语在成功说服个人革命运动先于个人幸福之后，将家庭忠诚变成了一个空壳。²²⁴

重写反对派记忆

斯大林主义历史叙事以其空缺而臭名昭著。在讨论 1930 年代时，学者们经常提到“社会记忆的审查”、“对现实的歪曲”和一个“虚构的世界”。²²⁵ 但仅仅嘲笑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知识肯定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确实，没有任何基于通过时间走向解放的进程观念的话语，能对过去之事完全漫不经心。

很难说斯大林主义更与遗忘有关还是与记忆有关：一切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些术语。对遗忘的强调属于“压制性假说”——根据这一论点，共产党员在回忆过去时受到严格审查。然而，从福柯所谓的“生产性假说”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实际上被鼓励去回忆许多事情，并且要极其详尽地回忆。²²⁶ “每个人都必须记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的流氓是如何背叛我们的，”一道典型的训令写道，“在法西斯愤怒的狂乱中，他们……”，等等等等。²²⁷

随后的回忆是真是假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党史并非简单地被强加，而是作为被找回的记忆被强加。斯大林主义的权力并非仅仅通过堵住嘴巴来行使；它的否定因素——压制性假说将这些因素归结为一个不断禁止的中心机制——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当代话语远非对 1920 年代发生的事情施加沉重的沉默，而是不断地被支持和放大，产生了强化、重新定向和修改关于旧党内争斗记忆的多种效果。当时公众记忆的特点，并非一致关注于掩盖反对派曾经存在的事实，而是痴迷于将这个主题转化为话语。

人们发明了谈论政治异端邪说的装置，以及倾听、抄录和再分配共产党员就此所做的忏悔的装置。²²⁸

集体记忆采取了一种交换形式：学生和讲师们提交他们的自传，而档案馆则提供这些材料的官方版本。档案馆是个体灵魂拷问与官方审讯之间一个复杂的协商与交换过程的发生地，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真诚戏剧的东西。虽然虚伪、欺骗和隐瞒的策略不容忽视，但应记住，许多普通共产党员与阐释过程合作，有时甚至比他们的起诉者对他们的过去要求更为苛刻。

记忆不仅限于中心：每个组织都有自己本地的、更为审慎的回忆和检索工作要做。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共产主义大学被要求调查自己的记录。1936年9月5日，当地党组织重提了该大学最大的罪过——1925年12月对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历史系主任伊万·瓦维林，站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回忆晚会的中心。就在一年前，伊扎克还因为他无法看穿淡化斯大林在1917年作用的马塔耶夫而折磨过他：“瓦维林，你甚至不明白自己有罪，这只会增加你的耻辱。”当时，伊扎克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情况已大不相同：伊扎克被捕了，而瓦维林经受住了风暴并回到了教学岗位。²²⁹“那场把我诬陷为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运动，正是那些后来被证明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人发动的！”瓦维林现在大声疾呼。²³⁰

然而，瓦维林不可能感到太安全；他1922年来到共产主义大学成为其第一位本土培养的讲师，是极少数自季诺维也夫主义鼎盛时期（1925-26年）以来一直留在这所大学的人之一。因此，人们期望瓦维林更深入地挖掘他的记忆宝库，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一些责任。²³¹“莫斯科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审判，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大学曾经进行过的煽动性工作，”瓦维林承认。故事必须被重述，这一次要从更新的、斯大林主义史学观的角度来讲述。瓦维林的认罪尝试将历史与自传交织在一起，试图同时重新解释与季诺维也夫辩论的总体进程，以及他自己在这些戏剧性事件中的个人角色。²³²尽管党要求瓦维林个人重新体验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创伤，但他的任务并非将所发生之事过度个人化，将其呈现为纯粹的个人回忆，而是在重述过程中将自己更牢固地嵌入共产主义集体之中。

尽管一些学生记得瓦维林的多数派立场，但他的

英勇事迹在讲述过程中无疑得到了美化。根据 1936 年的正统说法，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反对反对派的运动，是由勇敢的（尽管寡不敌众的）地方干部在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进行的。他们强有力的活动导致“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并将后者与基层隔离”。²³³

瓦维林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25 年，我们大学庇护了狂热的反对派，如校长米宁等人。我记得米宁和萨法罗夫组织了专门的小组来研究他们所谓的‘列宁主义’。我没有被允许参加这个精英小组，它本应成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核心。”在以“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跟踪了第十四次党代会前夕的辩论后，瓦维林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幕后的活动一无所知：“当时，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摆出相互争吵的姿态。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转移党对准备联合攻击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瓦维林不是白当党史家的：他的评论——当然没有人能在 1925 年知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年后会结成统一战线——只能是事后之明。

根据他的自我表述，瓦维林与反对派的“战争”早在 1935 年 12 月 16 日大学党组织会议上，在反对派校长米宁做完主要报告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叙述者回忆说“多数人嘲笑我的想法”，但他坚定地捍卫了自己忠诚派的决议，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斯大林主义的殉道者。当然，他并非无懈可击。无法彻底谴责季诺维也夫的领导——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之前，很少有列宁格勒共产党员梦想这样做，尽管 1930 年代的党史家要求信徒们恰恰具有这种先见之明——瓦维林处境微妙。“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决议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批判不够充分，”他承认。“会议结束几天后，更不用说今天了，我就意识到其中某些点是多么令人不满意。例如，我在决议的序言中插入了‘对我们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希望表达的是，季诺维也夫是一回事，而列宁格勒党组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瓦维林来说幸运的是，他决议的第二部分限定并——据 1936 年的叙述者称，甚至“完全否定”——米宁的立场：“这里我违背了自己的引言，尽管当时并未清晰意识到。”瓦维林几乎不自觉地体现了党的路线：“诚然，我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声明莫斯科对反对派的指控完全正当。但我的立场将第一批学生从季诺维也夫的怀抱中撕离。”瓦维林是“批评我们领导层的简短信件”的发起人组织者之一——大学记录或多或少证实了这一事实。²³⁴

随后发生的事件众所周知，瓦维林只回忆了米宁如何大摇大摆走出礼堂，引发了关于究竟有多少学生跟随这位反对派校长的激烈争论。季诺维也夫派声称“至少有 106 名同志离开”，而他们的斯大林派对手则坚称不超过 35 名同志坚持异端立场。有趣的是，尽管 1925 年瓦维林缩减了反对派人数，现在他重审记忆以揭露尽可能多的隐蔽敌人：“在米宁策划离场的会议期间，我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负责记录。我保存的反对派名单帮助党在基洛夫遇刺后揭露了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

1936 年，瓦维林将多份摘要合并为一份总名单。实际上，并不存在包含所有随米宁冲出礼堂学生姓名的单一清单。他文件中的不同计数包含了速记记录中提到的名字、各类投票结果报告以及大学在不同时期准备的备忘录。1937 年 5 月另一位事件参与者发给共产主义大学的信件，为了解瓦维林如何制造其“邪恶灵魂”名单提供了线索。这封信也表明，在大清洗期间，旧名单的重要性——确实是生死攸关之事：

校长同志！

我叫 B·I·尼古拉耶夫，1923 至 1927 年间曾是贵校的学生。我需要就 1925 年我对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态度，向太平洋舰队中央军事指挥部作出明确答复。令我沮丧的是，我无法确切回忆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前的关键事件。我已向上级坦白，自己存在错误解读、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些许动摇的问题。不幸的是，既然我无法凭借记忆逐日重建自己的行为，很可能我在陈述罪责事实时有所夸大。您定能理解这种记忆缺失[失忆症]令我多么痛苦，而被怀疑不诚实时的感觉又何其可怕。尽管我愿为真正犯下的过错承担全部责任，但若为从未做过的事受罚，既可怕又愚蠢。

尼古拉耶夫向收信人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承认对方比他更了解这段经历。既然受审的是他的灵魂，他就有责任陈述所能记得的一切，从而让党洞察他的心理过程：“我自己记得什么？大多数学生都感染了季诺维也夫主义……某个倡议小组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报告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反党行为……”

正是这次关键会议使双方分道扬镳。我无法忘记，我们那位托洛茨基主义校长米宁带着四五十名学生离开了会场。²³⁵

尽管（或许正因）自称失忆，尼古拉耶夫的记忆仍用当代话语重构了事件。他调整叙述以符合成熟的斯大林教条，其程度不亚于瓦维林。他将季诺维也夫比作瘟疫（“感染”）；指明区分良莠的关键事件；并给米宁——1925 年时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狂热的托洛茨基反对者——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对尼古拉耶夫而言，学生中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本不该包括他。“我投了中央委员会的票”：申请者对此十分确定。意识到自己仍可能被指控思想罪，尼古拉耶夫抢先忏悔道：“在我十七年的共产主义生涯中，只犯过一个错误。虽然共产主义大学教导我进行独立政治判断，但在关键时刻，我被欺骗手段拖上了反党道路。然而，我从未真正认同反对派的观点！”担心自己在关键会议上可能的发言，尼古拉耶夫问道：“我们党组织究竟何时转变立场？我在第十四次党代会后的首次会议上发言了吗？说了什么？是否真有反对派分子在党代会后被学院开除——我隐约记得类似情形？”最后这个问题暗示：1927 年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尼古拉耶夫在 1925 年未被列为怀疑对象，因此如今也理应留在党内。

翻阅瓦维林的名单，大学委员会确实未在反对派中找到尼古拉耶夫的名字。1937 年 7 月 15 日寄给他所在部队的证明措辞谨慎，相对宽容：“在‘参加 12 月 31 日会议的季诺维也夫共产主义大学同志名单’中，列有尼古拉耶夫的姓氏，但未注明名字缩写。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人属于那 278 名未跟随米宁离开、而是留在会场并投票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学生。”

拯救申请者的是十多年前的一份文件，证明“当被问及能指认哪些反对派分子时，尼古拉耶夫提到若干学生，这些人后来确实被证实[是]反对派”。例如，尼古拉耶夫曾作证：“我与科廷同住，我们有过政治争论；科廷支持反对派。”虽然他协助揭露异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尼古拉耶夫完全摆脱嫌疑——当前尤其不能。“尼古拉耶夫的名字前，”档案管理员在 1926 年注明，“立场不明。”

重新核查速记记录，关注十年前同志们的言论；

并不断重审他们的自传，这是大清洗期间的普遍做法。这些措施可被理解为一种记忆实践，其意义不在于精确重构过去，而在于通过创造性过程确立关于过去的更深层真相。共产主义大学的纠察队员针对同志，并非因其当下的行为，而是因档案显示他们过去的作为；多数判决具有追溯性，惩罚据称党刚刚揭露的旧罪。虽然犯错的共产党员几乎无法指望对判决提出上诉，国家却在重新审视判决过程时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

过去二十年间，党积累了层层叠叠的速记记录、自传和审讯笔录。这个庞大的文献库如今被史无前例地激活。面对雪片般的信息查询请求，列宁格格各大学组建委员会系统化整理文档库。所有涉及 1920 年代讨论的现有材料——此前仅有手抄单本——都被整齐打印、复印并整理进专用档案。²³⁶ 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与苏维埃机构之间发展出大量通信往来，有时跨越数千英里，只为查明那些如今在国家某地担任某职的个人，是否曾在学生时代制造过骚动。

党内狂热分子被要求日夜搜寻昔日的异端。1935 年 3 月 31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的《关于收集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情报的通告》要求地方机关“加强行动工作，收集一切可用材料”；基层党组织被敦促追踪每一名曾涉足其机构的反对派分子。²³⁷ 共产主义大学首次筹备针对往届学生的大规模运动。

那年春天，共产主义大学党委发布备忘录，列举了开除反对派的所有历史理由。不可避免地，许多被清洗者早已离开大学。其中包括加拉西莫夫这类“前人员”——他 1930 年因“诋毁领袖”被开除，以及据称 1934 年说过“我认识尼古拉耶夫，确信他刺杀基洛夫纯属个人动机”的菲利波娃。²³⁸

共产主义大学的校友们帮助揭露了更多姓名。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曾于 1926 年至 1929 年在该校学习，1931 年作为研究生重返校园，他回忆起许多事情。1935 年 1 月 16 日，他“履行共产主义义务”，提交了一份详尽名单，列出他所能记起的每一位反对派成员：“库巴索夫同志（现任政治处副主任）与卡拉佩季扬同志（在莫斯科党史研究院学习）曾参加 1927 年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托洛茨基派地下会议；维特科夫斯基、奥格涅夫、热列佐夫、瓦西利琴科、亚姆希科夫、

以及卡尔马什尼科夫等同志在 1926–1929 年间是活跃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还有潘秋欣，他也是活跃的托洛茨基派分子，1926–29 年间曾在此与我同窗。”正如“同志”这一称呼所示，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的备忘录并非正式揭发：他只是“希望将所掌握的信息提请党委注意”。该机构的职责是“审视上述人员向党展示的面貌”，并决定是否将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提供的信息转交国家安全机关。²³⁹

另一份由时任党委秘书阿德里亚诺夫于 1934 年末编制的名单，标题为“远期曾加入其他政党或党证受过处分的学生名单”，不仅收录了三名孟什维克、六名社会革命党人、四名犹太社会主义政党成员和四名季诺维也夫派分子，还包括三十六名“曾被清洗后恢复党籍的同志”。²⁴⁰ 该名单在 1935 年期间不断更新，使校方得以追查多人，包括被派往纳雷姆（西伯利亚）的达维多夫（罪名是“兜售托洛茨基派观点”）、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库库廖夫（罪名是“散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诽谤”）以及“前萨普罗诺夫派”丹尼林。²⁴¹

共产主义大学档案员持续查阅机构议事录以及党组织负责人在学习小组中对学生所做的评估。新的定性依赖于旧档案。典型的议事录常写道“从档案可见”，或“虽难以根据简短记录判断，但……”²⁴² 档案工作可能极其艰辛：1920 年代的大部分人事材料通常已转移至区档案馆。区委又将部分材料转至列宁格勒中央党档案馆，数量不详。党委书记不得不频繁前往中央档案馆查阅。²⁴³ 档案通常仅记录“领导反对派三人小组的最活跃分子、非法组织成员等”，这也使研究工作难上加难。²⁴⁴

正因如此，共产主义大学调查工作的成果更显卓著。挖掘出的材料数量既证明此类工作的重要性，也体现投入其中的人力之巨。整个 1936 年，一位名叫帕舍维奇的工作人员忙于追溯历史：“按校长命令，我正在档案中搜寻托洛茨基派姓名，”他告诉同学。²⁴⁵ “诚然，新生需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接受中央组织部的问询，”官员们表示，“但我们仍需更细致地研究他们的履历，以查明每个人在 1925–26 年间对反对派持何种立场。”²⁴⁶ 尽管抱怨“我们缺乏前学员参与反对派活动的全部必要材料”，共产主义大学仍在 1936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设法签发了

“逾千份摘录自我方档案的证明文件”。²⁴⁷

回想共产主义大学党组织的书记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普列姆一案，他曾被怀疑对辖内托洛茨基派分子视而不见。无人能否定普列姆可能有意庇护叛徒。共青团大学部门负责人卡尔皮科夫收到的一份新举报更坐实了这种猜测。1936年7月7日，他得知普列姆1925至1927年间曾在别尔哥罗德共青团组织工作，该组织因搞派系活动被解散。²⁴⁸面对各处传来的加强警惕的呼声，校方感到必须派遣伊万·卡尼亚欣前往库尔斯克，以核实该举报是否属实。一周后，卡尼亚欣提交了详尽报告：“我在当地查阅的文件显示，别尔哥罗德确实存在一个由前共青团书记涅恰耶夫领导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别尔哥罗德执行委员会已将全部档案移交地区党档案馆，但党委保留了一份所有参与反对派活动人员的名单副本，特别标注了1925-27年。名单中未出现‘普列姆’这个姓氏。”

卡尼亚欣与当地执行委员会副书记安东诺夫共同审查材料后，询问了当时在该市的共产党员。其中部分人认识普列姆，但对其与反对派的牵连一无所知。“离开别尔哥罗德后，”卡尼亚欣的报告继续写道，“我前往库尔斯克查阅地区党档案。应我的要求，书记舒托夫查阅了别尔哥罗德党和共青团组织中所有涉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文件——仍未提及普列姆。”由于别尔哥罗德部分文件尚未编目，舒托夫承诺完成调查后补交报告。随后卡尼亚欣会见了当地机械拖拉机站站长、1926年入党的达维坚科，此人声称与普列姆交情颇深。两人进行长谈后，卡尼亚欣请达维坚科将所忆事项书面记录。特使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尽管达维坚科的回忆未对核心问题作出定论，但仍作为附件纳入报告，其签名经共青团地区委员会认证。²⁴⁹

尽管卡尼亚欣行文干涩、就事论事，但有罪推定贯穿其报告始终。卡尼亚欣并非断言普列姆与反对派活动无关，只是表示虽经竭力调查，仍未发现确凿证据。证据缺失并非无罪证明。

自1935年春起，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开始协助共产主义大学，

甄别前学员中可能存在的敌对分子。²⁵⁰ 1936 年 9 月编制的“反对派及与之有联系人员的综合名单”同样大有帮助——这些名单收录了在党代会提及、备忘录记录或告密者举报的名字。²⁵¹

共产主义大学调查人员经过多方核查后，最终认定像 T·F·丹尼利金这样的人是惯犯，显然已无可救药。调查人员详细列举了作出这一严厉判决的依据：

丹尼利金在大学期间表现为缺乏纪律的利己主义者，存在无政府主义倾向并支持萨普罗诺夫。1924 年 6 月 14 日核查三人小组第 2 号记录显示，丹尼利金本应被开除并下放至基层工作。这些事实与其 1933 年自传不符——丹尼利金在自传中写道“1924 年因个人原因离开大学”……此外我们发现，1929 年 12 月 24 日斯塔夫罗波尔巡回监察委员会第 1 号记录表明，丹尼利金在 1926 年采取调和立场。以下记录可资证明：“丹尼利金同志在左倾问题上采取缓冲立场。”²⁵²

大多数针对学生背景的调查同样穷追不舍。档案员明白自己必须为任何细微疏漏负责。共产主义大学当局收到“关于 N·S·切尔库诺夫情况的查询”后，给出了严谨周详的回复：“在我们‘动摇分子’名单中出现的是奇尔库诺夫（无名字缩写），而非切尔库诺夫。但该名单不能视为完整。您的查询副本已转送列宁格勒地区档案馆进一步核查。”为防万一，还附上了关于 N·S·奇尔库诺夫的说明：“奇尔库诺夫曾在（与反对派的某次辩论中）立场动摇，但从未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起诉。”²⁵³

大多数档案调查是应要求进行的。党政机构不仅向嫌疑人本人学习过的机构索取信息，也向雇用过与他在不同职业阶段相识者的组织征询。共产主义大学收到了来自遥远的哈卡斯的一份请求——该地区刚收到关于“贵校三年级学生卡皮坦斯卡娅于 1936 年 11 月 8 日揭发与我方共事的阿布拉姆松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信息。据她证词所述：“在第十五次党代会前于雅尔塔工作期间，阿布拉姆松曾向立场薄弱的同志分发中央委员会提纲，却将反提纲留给准备更充分者。”请询问卡皮坦斯卡娅，并获取她关于阿布拉姆松所有可能事实的书面声明。”

卡皮坦斯卡娅欣然配合：“我回忆起当被问及托洛茨基为何被驱逐时，阿布拉姆松说：‘我能怎么办？我个人深爱托洛茨基，但如果他危害党，就不能留在党内。’”最后她致歉表示——“当时经验不足，我忽略了追踪阿布拉姆松后续活动”——并得以向哈卡斯党书记库巴索夫提供两位“应知悉更多内情”的同志姓名。²⁵⁴

通过这些反复的书信往来和对档案的持续复查，共产主义大学的档案人员将所有曾质疑党的路线者单独列出并归入同一名单，至 1936-37 年冬季已完成一个包罗万象的集体名词构建：“反对派”。²⁵⁵ 分类统一化运动沿两个互补方向发展：所有反对派及反对派分子——无论过去分歧多大——被合而为一；对反对派的同情无论多轻微，都被等同于彻头彻尾的反对主义。

大清洗期间在共产主义大学汇编成厚卷的档案材料，印证了 1920 年代档案记录中所用语言的丰富性。例如 1923-24 年讨论的纪录运用了无数分类术语，以精微表述描述同志：“立场摇摆向中央委员会”；“发言如调和派”；“支持反对派”。²⁵⁶ 十二年后，同一群学生在档案人员笔下被划分为“站在党的立场”或“站在托洛茨基立场”。所有类型的“缓冲立场”如今被彻底忽略。学生们在新方针讨论期间或许未察觉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但这事实无法逃过 1930 年代更具经验的档案解读之眼。例如舒穆洛维奇早在 1923 年就意识到托洛茨基关于“党的领导人丧失阶级属性”的论断是错误的，但因当时愿接受托洛茨基其他方面的观点，十三年后他仍被描述为“托洛茨基分子”。²⁵⁷ 乌托奇金认为“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路线与中央委员会路线并无差异”——这是当时许多多数派党员共享的观点；如今他却被称为事实上的反对派分子。²⁵⁸

档案员于 1926 年编制的详细比较，对比学生在新路线争论（1923 年）期间与季诺维也夫讨论（1925 年）期间的行为，表明许多在大清洗期间注定消失的细微差别曾经被认为非常重要。（见下页表格。）

到 1936 年，然而，档案员开始认为绝对无关紧要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主义者并不总是合作，以及根据旧记录，1923 年至 1925 年间只有一名学生始终在反对派中。尽管 1920 年代的党统计人员可以计算“恶意”，邪恶的”（*zloi*）与“狂热的”（*iaryi*）反对派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清，而 1936 年的对应者认为，任何曾经以任何方式质疑官方立场的人都属于敌人。²⁵⁹

大学备忘录：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介于托洛茨基反对派（1923 年）和列宁格勒反对派（1925 年）之间

1923	1925	数量（百分比）
不确定	支持中央委员会	4 (06.0)
不确定	支持反对派	3 (04.5)
未公开	积极支持反对派	8 (12.0)
支持党的路线	摇摆不定	23 (34.0)
没有偏差	坚定支持反对派	16 (24.0)
支持反对派	支持中央委员会	4 (06.0)
有某些偏差	摇摆不定	1 (01.5)
无明确立场	无明确立场	1 (01.5)
摇摆不定	摇摆不定	2 (03.0)
在反对派中	在反对派中	1 (01.5)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支持反对派； 在经济问题上支持中央委员会	支持中央委员会	3 (04.5)
支持中央		
支持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建设问题 上的立场；在经济问题上支持反	支持中央委员会	1 (01.5)
总数		67 (100)

来源：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926，页 19

共产主义大学的黑名单当然不能被视为完整，直到联合反对派的支持者被加入其中。1928 年的原始备忘录只将 8 名学生（共 579 人）描述为‘反对派’。这些进一步细分为‘积极分子’、‘同情者’和‘已离开者’。然而，十年后，这些区别几乎没有任何分量，此时大学认为自己对前学生的真实信念不那么天真了。

260

在这方面，关键事件是 1927 年 10 月 19 日学生与托洛茨基的会面。托洛茨基试图在决定性的第十五次党代会召开前几周，将列宁格勒党的意见转向联

合反对派。共产主义大学当时声明，‘参加非法会议必须被视为宗派主义’，要求立即报告所有与反对派领导人的会面。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妖魔化已经进入相当高级的阶段，共产主义大学宣布，‘同志们必须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负责。没有人可以认真地声称，由于没有遵守议程，这个场合是一个‘问答之夜’，并且他们是出于好奇而参加的。’²⁶¹

然而——这对理解党的话语在接下来十年中所经历的距离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大学党组织给自己设定了任务，澄清学生‘为什么’参加非法会议以及‘是否’‘有意识地’这样做。解释仍然优先于索引化，而‘谁’违反禁令的问题似乎不那么紧迫。1927年党组织的负责人宣称，‘我们不应该对那些与托洛茨基会面的学生太严厉，因为他们声明不同意他的观点。’重要的是问他们是否认为他们参加的是宗派会议；那些给出肯定回答的人...必须被免去实际工作，但不是在给自己澄清问题的机会之前。’卡帕佩蒂安，其中一个犯错者，在1927年解释说：‘我想亲眼看看托洛茨基同志，亲耳听听他说话。如果我知道这次会议会被归类为宗派主义，我就不会参加了。’那时，奇斯洛夫的辩护听起来更像是一棵荆棘，而不是橄榄枝：‘这里到底有什么罪行？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只是我理解了托洛茨基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分歧的实质——我完全不同意反对派观点！与托洛茨基会面也许是我自己的误解，但不是动摇。’²⁶² 1936年重读，奇斯洛夫九年前的沮丧完全不合时宜。他当时坚持的所有细微差别现在都被归类为两面派的把戏。

当他的上级在1936年发现埃芬迪耶夫也是1927年在列宁格勒与托洛茨基谈话的人之一时，他们立即解雇了他。埃芬迪耶夫恳求他的母校纠正他们一维的描述：‘我一意识到会议是宗派主义的...我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我向局书记报告了一切，并详细解释了带我到那里的环境。确实，我的个人评估描述我为‘不稳定的’，但我甚至没有受到谴责，而真正的反对派却被清洗了。’然而，在1936年，党不再倾向于深入探究这些微妙之处。那些哪怕只是为反对派辩护一句话的学生都被定罪，更不用说那些‘参加过非法集会’的学生了。普雷德拒绝向埃芬迪耶夫发送任何有助于他辩

护的材料。事实上，大学通知他的检察官，他们应该直接向大学获取信息。²⁶³

随着大清洗的进展，档案记忆的视野不断扩大。为了扩大其异端分子名单，共产主义大学在 1937 年开发了两个额外的‘前’人蓄水池：‘1921 年清洗期间被清洗的同志’名单和‘参与克隆施塔特反对红军的战斗，在叛乱被镇压后逃往芬兰的参与者’名单。新名字不断加入池中，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告密和逮捕。

264

在 1936-37 年盛行的‘最后审判’氛围中，共产主义大学被期望对其所有学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做出决定性诊断。一个人在个人评估中的描述变得极其重要。党章规定，对于那些‘在后来的活动中证明自己是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的同志，可以从个人评估中删除负面分数。记录被清理的学生变得近乎完美。相反，一旦赦免罪行变得不可能，清洗——以及随后的逮捕——就变得几乎不可避免。²⁶⁵

在这些条件下，‘移除党的谴责’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舞台，记忆政治在这里展开。1936 年 4 月至 7 月间，共产主义大学的党组织完成了‘重新评估学生个人档案中提到的每一项谴责’的艰巨任务。²⁶⁶ 总体上是宽恕的，党删除了摆在桌面上的 626 项谴责中的 580 项。几乎所有与‘异己阶级出身’或‘集体化期间的不当行为’有关的重罪都被清除。大学原谅了马列什科在粮食征购期间的不活跃，季弗利茨基在集体农庄未能领导收获运动，以及前述的瓦维林没有报告‘他的父亲被去富农化’。²⁶⁷ 尽管与阶级有关的罪行通常被抹去，但解释学上的失败却非常被铭记。因此，对于四十六项谴责，‘没有赦免的理由’。塔卡拉诺夫仍然受到怀疑，因为他‘向党推荐了一个异己分子’，杜耶夫因为他‘没有及时向党报告托洛茨基分子的出击’，卡申因为他‘无法识别反革命诽谤’。

268

档案记忆是巨大的，旧的谴责不仅可以被移除，还可以被复活。在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激进化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大规模回归党之后，共产主义大学在 1929 年 4 月删除了个人评估中的许多负面条款。现在，这种宽大必须重新审查。科兹洛夫在 1928 年因为参加宗派会议而被‘警告’。一年后，作为一个‘恢复了纪律’的人被原谅，他

在 1936 年再次面对他的过去并被清洗。²⁶⁹ 帕连科夫的遭遇如出一辙：“他在 1927 年中国危机期间立场摇摆”，1929 年虽获赦免，却在大批清洗期间被紧急重新列入异端名单。²⁷⁰

鲁任科夫的案例尤为典型，展现了档案如何被用来就同一罪行获取第二次定罪。1937 年 1 月，政治机关紧急要求“补充调查这名显然是反对派的前学生”，由此触发对鲁任科夫大学档案的新一轮调查。由于 1929 年鲁任科夫已被从“顽固反对派”名单中移除，党务档案管理员不得不费力追溯其最初的罪状。最终，勤勉的大学档案管理员找到一份载有“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年级学生”信息的文件。这份文件藏于一份泛黄的卷宗《1926 年反对派参与者名单》中，其中将鲁任科夫记载为“同情反对派的学生”。同一调查小组还发现了鲁任科夫 1929 年 4 月 18 日的一份忏悔书。正是这份略显拗口的文件，构成了当初鲁任科夫那看似不负责任的免罪依据：

“我在红军时期就继承了对托洛茨基的深切同情……但我只是同情托洛茨基本人，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托洛茨基主义意识形态……也许我确实错误解读了某些措辞，但这是我个人的失误，并非完整的托洛茨基主义……唉，自从我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后，这个标签就挥之不去。学生们开始戏称我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我深知这样的标签可能导致无端后果。不堪其扰的我最终决定离开大学……然而我的转学申请被标注为‘待核实鲁任科夫的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后再议’，这个决定令我愤怒不已，以至于我开始自我控诉（*govorit' na sebja*）。当时所有人都因明显原因回避我，我精神备受煎熬。如今我坚信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意识形态……我从来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仅凭同情就将个人定性为此类人。”

这份 1929 年被表面接受的忏悔书，在 1937 年被定性为“两面派行为”，鲁任科夫被揭露为“危险敌人”。

曾为鲁任科夫开脱的人如今必须付出代价。首批被揭发者包括尼基福罗夫，他此刻或许后悔曾建议“若鲁任科夫公开放弃托洛茨基主义信念即可获原谅”。这位前大学党委书记被指控在撰写个人鉴定时企图尽可能多地庇护反对派成员

：“尼基福罗夫的策略是抹平所有尖锐棱角。”更严重的是，大清洗时期的监督者们指责 1929 年的尼基福罗夫竟敢斥责那些正确指认鲁任科夫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学生：“我们必须克服嘲弄和贴标签的习惯”，援引尼基福罗夫的话说，“要学会以同志的方式指出错误。”共产主义大学研究团队“查阅全部档案”后，并未发现能直接将尼基福罗夫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挂钩的证据。但显然他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要么拐弯抹角，要么三缄其口”。党委会总结称，还需“审讯列宁格勒的补充档案……以探寻其缺乏应有布尔什维克坚定性的根源。”

随着大清洗推进，学生团队从党档案中挖掘出越来越多的异端名字。这些名字从“同志”栏目被移至“人民公敌”名单，所有相关信息均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名单绝非无害。虽然布哈林和柳亭的同情者难以寻觅——但如前所述，波波夫曾批评集体化——该案在 1936 年被重新审查；而联合反对派的前支持者则因 1928 年春季大学机关的出色工作而完全暴露，任何后续的狡猾掩饰都无法掩盖其真实身份。鲁任科夫、维特科夫斯基和奥格涅夫都是“大楼”里的熟面孔。1926 年的“动摇者名单”在此期间逐渐演变为“反对派”名单，继而成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名单，并成为大规模逮捕的依据。“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古谢夫在 1925-26 年间是季诺维也夫分子”，1936 年 9 月的一份典型内务人民委员部证明文件写道，“依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第 58-10 条——反革命罪对其提起指控。”²⁷¹

斯大林主义对反对派的记忆详尽细致，决心根据同志在过去考验中的表现进行评判。诚然，党内斗争的官方历史日益变得“铁板一块”和“单一维度”。政权在 1930 年代后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呈现、解释和分类同质化的“反对主义”。然而绝对标准化与其说是共产主义话语的威权特质所致，不如说是因为弥赛亚时代终于到来，此刻必须彻底固化意义的迫切需求。

• 5 终幕

清洗运动加剧

我们该如何分析列宁格勒共产主义高等教育在大清洗时期的历史？共产主义大学是否如人们所说，是一个从“小村庄”变成“大地狱”的地方？若是如此，那么 1931 年至 1937 年间见证了一长串个体升掌权力、短暂握持、随后被颠覆的过程。1931 年末，费德琴科与潘秋欣指控伊萨克和德米特里耶夫为托洛茨基分子，结果几周后他们自己也成了类似指控的受害者。1932 年至 1933 年间，年轻而喧嚣的伊萨克、德米特里耶夫和阿尔塔帕尔马科夫掌权后，便将怒火倾泻在阿尔沙夫斯基、科夫曼和贝科夫身上。1936 年春天带来更多变局时，新领导者——德里泽、乌赫图塔及东山再起的贝科夫——给这三位怒气冲冲的前任施加了他们一年前曾施加的同样苦药。随着大清洗愈演愈烈，昨日的英雄迅速变为今日的恶棍：不到一年时间，清洗者将再次被清洗。大学的校长兼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普列杰，曾长期凌驾于这出权力旋转木马之上，但即便是他，也在其庇护人——著名的莫斯科法学教授叶夫根尼·布朗尼斯拉沃维奇·帕舒卡尼斯——于 1937 年春天倒台后随之被拉下马。

然而，有理由怀疑大清洗并非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力争夺。派系斗争可能显得冷酷无情，而且似乎每一失势集团都与其权力基础剥离，但某些“派系”如何实现惊人逆袭，从篡权者手中夺回权力缰绳并实施报复？诚然，学生与教授曾合作捍卫名誉、反击诋毁者，但此类临时联盟能否被描述为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共产主义大学的联盟往往极不稳定，正因其构成高度异质——这与典型社会或政治史家所构想的那种争夺权力的裙带小集团大相径庭。前一刻学生们还齐声谴责某教员，十分钟后却可能彼此攻讦。若某“派系”部分成员遭清洗而其他人获释，跨越惩戒界限的友谊鲜能维系。包括普列德、图罗克及某种程度上的瓦维林在内的多位教员，接连抛弃不同学术圈子直至声名狼藉。相反，对立联盟的成员往往共同倒台，成为互相揭发的牺牲品。

与其将 1936-37 年在共产主义大学发生的血腥清洗视为权力斗争，我更倾向于在布尔什维克诠释学的背景下审视它。当道德自我为纯洁和解放进行生死斗争时，法律和效用都无关紧要。1936 年春被捕的“反革命团伙”的活动在漫长的时期内被反复诠释和重新诠释。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伊萨克和德米特里耶夫不再是“争吵者”(*sklochniki*) 并成为“邪恶个体”(*zlostniki*)。长久以来，他们一直以诊断灵魂困扰的疾病为傲，但现在明显他们做出了许多误诊。

因为不存在无可争议的判断，大学内的权力关系总是不稳定的。权威是易变的；力量可能在一瞬间变成弱点：无论是未能清洗敌人还是决定清洗真正的信徒，都会引发立即的报复。每次新的公开审判都揭露了一类新敌人，需要大学领导去应对。未能立即这样做，必定意味着这里有一些无能的诠释者，无法或不愿嗅出隐秘的托洛茨基分子。当正义的全能被假定，每一个诠释失败都被宣布为故意破坏时，每个人都可以被指控为与反革命分子勾结。¹

1937 年 2 月至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加速了清洗行动。² 斯大林的秘书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编制了反对派成员名单。他警告道：“目前国内有超过 150 万名前党员——这些都是从 1922 年起在不同时期被开除出党的人员”，他们全都构成了首要的逮捕对象。³ 斯大林本人也提出了一些计算数据，这些数字本身并非最引人注目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背后展现出的高度系统性思维：“我们知道 1927 年有 4000 名共产党员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另有 2600 至 3000 人弃权。加上那 11000 名（未参与投票的），总共就是 18000 人。这些就是托洛茨基分子。再算上 10000 名季诺维也夫分子，就达到了 28000 人。若把其余的右派分子、各种渣滓都算上，就有 30000 名反党干部。我们已逮捕了 18000 人，这意味着还有 12000 人逍遥法外。”⁴ 进一步扩大搜寻内部敌人的迫切需要将更广泛群众纳入这一进程的指令——甚至在全会结束前就已传达至列宁格勒。行动必须立即展开。⁵

为期三天的党代表会议（3月26日至29日）专门讨论全会决议，这是共产主义大学有史以来召开的最长会议。在出席的370名学生中，有78人发言。党委记录道：“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喧闹的会议。”辩论按照既定路线展开。宣传员们援引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论述，反复强调全会关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组党的工作”的指示。⁶ 一群新的学生精英站了出来。“我们的组织，”其中一人不断敦促，“必须根除托洛茨基主义渣滓的残余。”另一位指出：“全体会议结束工作已经一个月了。我们组织的集体领导在哪里？”一个又一个演讲者严厉批评了大学领导层违反民主原则：大学局、党委书记和校长在做出决定时没有考虑有意义的自我批评。当一位演讲者抱怨“我们党委的成员在密室中开会”时，另一位讽刺地反问道：“谁能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⁷

许多人声称学术隔离加剧了情况。党委成员丘普罗夫做了一个个人供述：“在多年与群众一起工作后，被锁在这些墙内，我感到非常奇怪。”⁸ 马塔耶夫紧随其后：“当反革命分子伊扎克说‘学生必须学习，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工厂里’时，这是一个巧妙的策略，企图在我们与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之间设置障碍。”由于被认为未能履行将大学基层与大学外工人联系起来的职责，党委书记们成为了众矢之的。“我们不会对党委书记选举中的章程违规行为保持沉默！”一位学生怒吼道。当党委提名党委书记时，“它甚至有后备候选人，‘以防万一。’”一位学生指出，“同志们说我们的一些党委书记领了两百卢布的工资，”然后酸溜溜地评论道，“我猜他们工作相当勤勉！”多数人宣布党委书记的职位“多余”。⁹

地方领导层日益发现自己夹在中央的铁锤与基层的破除偶像主义之间。莫斯科、全国媒体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在煽动学生与大学领导层对抗。¹⁰ 专政统治和裙带关系被诊断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症状。博茨马诺夫的话语在大学里定下了基调：“过去我们诘问中层；现在是打击高层的时候了。”G. I. 奥利索夫抛出了最新的侮辱性词语：“在普列杰、谢苗诺夫和大约十几名职员之间，我们的机构完全官僚化了。”¹¹ 大学副校长E. N. 谢苗诺夫因“仅召开一次小组会议讨论平行中心”而受到指责，博奇-

卡列娃、图罗克和克拉斯夫采夫，这三位都是著名讲师，被认为“犯有意识形态扭曲的错误”。类似的投诉也送到了大学期刊编辑的案头：“我们的党委仍然受到厚厚的甲壳保护，对学生的信号毫无反应。仿佛他们在对自己说，‘好吧，来吧，批评我们吧；我们会安然度过风暴。’”¹²

在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下，雷姆尚和斯莫尔尼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组织了无情的自我批评轮次。党书记们被禁止“掩盖事情”，他们必须密切关注大学举行的每一次集会和集会，“不迟于次日，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上级通报。党组织会议的记录（通常包含对大学领导层的严厉抨击）必须在第三天之前送达区委员会。¹³ 然而，如果这被当作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它失败了。基层认真对待“不论级别和资历的批评”这一口号，毫不犹豫地质疑最高层：“甚至雷姆尚和区委员会也不能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没有对大学的工作给予足够的关注。”¹⁴ 中心似乎对结果感到满意：“那些将自己关在官僚堡垒后面、无视‘小人物’[*маленькие люди*]声音的鲁莽贵族们终于感受到了压力。”¹⁵

清洗之风逼近强风级别。1937 年春天的气氛可以从谢苗诺夫对两位最近晋升到大学领导岗位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指控中看出。德里兹，党员文件交换期间的技术秘书，被指控庇护敌人。谢苗诺夫讽刺地问道：“德里兹，请你告诉我们，你过去是如何把党证发给反革命分子的？”¹⁶ 作为一名党书记，伊林签署了德里兹如此慷慨地发给敌人的党证。“伊林从普列姆那里接手了记账工作，却不肯整顿秩序，”谢苗诺夫断言。布伦恰洛夫被指派审查一些清洗案件，他惊讶地看到关键文件竟如此肆意可及：“应我的要求，格拉西莫娃从一个带劣质锁的普通木箱中拉出文件，递给了我。她甚至没有费心问我的名字，或者弄清楚我是否是党员！”¹⁷

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也是谢苗诺夫攻击的目标：“‘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是一个很好的口号，雷姆尚在地区领导层会议上提出。然而，她对培养政治干部的机制说得极少。普雷德的演讲更令人失望，他从未承认大学里情况的不足。尽管他与反革命分子并排坐了整整六年，普雷德还是设法说，‘我一直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多亏了这样杰出的‘斗争’，我们失去了基洛夫同志。”谢苗诺夫要求“重新审视我们在政治活动中使用的武器库。早在去年九月，我就发出警告

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中猖獗。当时和现在一样，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清除大学中一切异己分子。这里的学生人数应至少减少 200 人。”最后这番话使普雷德不安，他想结束流血：“进行大规模清洗是愚蠢的。”¹⁸

校长与其副手之间的争论由灵魂诠释学的应用所定义：从敌人猖獗的前提出发，谢苗诺夫主张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消灭运动；全面清洗几乎没有选择性，但肯定能消除邪恶灵魂。相比之下，普雷德坚持认为他前一年实施的措施在完善政治体方面有很大进展：“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两面派学生——托洛茨基主义流氓伸出的手指非常长，永远不能说他们都被根除了。但我们必须仔细检查每个人，只清洗那些不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双方都有支持者。斯莫尔尼区委转而反对指控者，支持普雷德。雷姆尚警告说：“‘不加区分的猜疑’不仅会阻碍我们发现真正的敌人，还可能提振敌人的士气。‘看我们有多少支持者！’敌人会说。‘仅一所大学就有两百人！’”伊林同样急于反击热心的副校长，他声称：“我们不能流放谢苗诺夫怀疑的每一位同志。学生必须个别对待。”他的党委希望看到清洗受到遏制：“我们整天开除人；这是违反章程的——只有大学全体会议才有这样的权力。”¹⁹

为了说明用一套官僚统计准则替代对个别灵魂的调查所带来的可怕结果，斯特罗穆奇科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1937 年 1 月 22 日，我小组的书记谢斯塔科夫给了我一个积极的个人评价。然而，二月份出现了第二个评价，这次是负面的。‘我的党性怎么可能在三周内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我问。谢斯塔科夫别无选择，只能再次修改我的个人评价，向德里兹解释道，‘我训斥了斯特罗穆奇科夫，因为我的小组在揭露人民敌人方面迟到了，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²⁰斯皮里多诺夫的情况类似：在讨论他的个人评价时，他的小组分裂了。只有六名学生赞成负面评价，但党委书记克拉斯诺夫声称“对斯皮里多诺夫的批评已获批准”；党委不得不介入以撤销负面个人评价。²¹

他的立场更符合 1937 年的氛围，谢苗诺夫轻易占据上风。“任何反对彻底清洗的言行都等同于庇护两面派，”同僚中的强硬派如是说。普列德是个自由主义者。“校长看待事物总带着玫瑰色眼镜，”图罗克说道。马尔戈林附和道：“他夸口我们已经清除众多敌对分子，这实际上造成了松懈情绪。

那些已被揭露的不过是浮在水面的渣滓，真正的敌人潜伏得更深。”据政治经济学讲师谢克尔日茨基所述，二月至三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表明谢苗诺夫是正确的：我们必须重新审查工作人员。”²²

领导权正在从普雷德手中滑落，他无法抓住它们。“尽管一再告诫，”学生们说，“校长证明无法改善他的表现。当然，他在党的会议上自我批评，但他的行动继续受到过时原则的指导。”正如他的 several 批评者指出的，他既没有遵守列宁格勒党委的指示来清除托洛茨基主义破坏的残余，也没有扩大党内民主。²³更糟糕的是，布德科强调，普列德似乎从未从大学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事件中汲取教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发现了六名隐藏在此的托洛茨基分子。为何未能及早揭露？为何总要等到他们调任新岗位后才暴露？”²⁴

随着审判时刻临近，普列德的言辞在自我贬抑与谄媚迎合间摇摆不定：“在近期区委和市委全体会议上，我已对自己的错误作过充分检讨。甚至有人对我说：‘忏悔够了，说说你们取得了哪些实际成效。’”当普列德强调自己如何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时，他讲述了带领学员前往莫斯科列宁博物馆、白海运河及全国各地建筑工地参观的往事。但学员们毫无反应——他们心知肚明：支撑普列德的两大支柱已轰然倒塌，雷姆山刚刚被清洗，斯莫尔尼区委也遭解散。

²⁵

此后数月——这所大学行将消亡的最后时光——完全笼罩在清洗浪潮中。党员接连因“反革命活动”“破坏行为”“间谍活动”等罪名被开除。仅在 1937 年 4 月 8 日的一次支部会议上，就有三名同志被清除。塞尔波夫在平行反革命中心审判案后发表言论：“我们的人民委员警惕性不足。与其枪毙那些托洛茨基分子，不如把他们流放到德国去煽动革命。”此言一出当即被开除。

学生们感到困惑：“难道每个共产党员不清楚托洛茨基站在哪一边吗？”在总结其判决时，党委写道：“我们终于撕下了这只狼的羊皮。”第二个被指控有反对派同情心的学生是前面提到的萨任，他被指控搞两面派。被告抗议道：“我在 1927 年支持联合反对派时，对政治没有理解。”但没人愿意听。“在托洛茨基分子身上浪费口舌没有意义，”有人说道，与其说是对萨任说，不如说是关于他。第三个“托洛茨基分子”萨沃辛被指责对逮捕一个名叫古利马舍夫的人使用了“恶棍”一词。

徒”对那些逮捕了某个古利马舍夫的人。“我指的是敌人，当然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沃辛试图解释。“我还没有愚蠢到玷污我们的机关。”但普遍意见是“萨沃辛没有说错话；因此……当被问及为什么另一个托洛茨基分子被送往塔吉克斯坦时，萨沃辛的回答是‘嗯，你知道，总得有人流血。’”²⁶

随着更多共产党员被驱逐出大学，录取人数减少：精英的兄弟会正在缩小。²⁷ 尽管斯莫尔尼区委全体会议废除了党录取禁令（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起生效），并允许大学在 1936 年 12 月招收最有前途的申请者，但只有两名学生敢于申请。²⁸ 一个官方的警告可能有助于解释这种摇摆不定：“录取做法不应转变为破纪录的运动。记住，敌对分子可能会试图混入。”²⁹ 一份备忘录概括了党组织规模的缩减：1934 年 3 月其拥有 1287 名成员，至 1936 年 10 月减少至 711 人，而现在，1937 年 4 月，这个数字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364 人。但党委却倾向于看到这一趋势的好处：“在数量上，我们的组织缩减了，但在思想和政治上，它巩固了自己的队伍。”³⁰

在短暂的一刻，首席清洗者谢苗诺夫骄傲地矗立于孤峰之巅。他的全面胜利可以从 4 月选举大学新党委的结果中窥见一斑。³¹ 根据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指示（并打破了布尔什维克长期的传统），投票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名义上主持选举的普雷德向大学社区保证：“无记名投票将有助于选拔最优秀的人才，那些展现出远见卓识并具备识别和消灭敌人天赋的人。”³²

在竞选期间，“党内民主蓬勃发展。”学生们提出自己的名字来对抗党委的候选人。经常出现候选人由第三方推荐的情况，即使当事人本人对领导责任兴趣不大。每个候选人都从各个角度被讨论，自我批评是强制性的。在 4 月 13 日至 21 日的九天期间（据一项计算，总共约 52 小时的审议），共产主义大学的官员们审查了提出的 95 名候选人。³³ 得益于“民主化的有效性”，许多新面孔出现在领导层：新党委中完全没有老布尔什维克。其成员主要是年轻的研究生，区委报告领导层有 80% 的更替。³⁴

如果说 1936 年 10 月举行的上次选举给普雷德带来了不愉快的冲击——约七百名学生中有 28 人投票反对他——那么在 1937 年，他根本未能再次当选党委委员。³⁵ 在全国范围内，对大学领导人的压力正在增加。莫斯科赞扬那些揭发自己校长是“敌人打击者”的学生。

普雷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命运不再是党内专属事务，如今已掌握在安全机构手中。³⁶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声望在 1937 年夏季达到顶峰。从二月至三月全会返回后，日丹诺夫在一次区委领导会议上讨论了该机构的“历史使命”。他声称，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打击隐藏在区委和其他管理机构中的人民敌人。”扎科夫斯基随声附和，引用了其下属成功揭露知名党员与敌人和间谍之间联系的事例。

随着大清洗的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罗网捕获了大量其自身的调查人员；最终，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本人也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并处决。然而，这反而增加了该机构的神秘感，因为许多人钦佩它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清洗的意愿。³⁷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镇压浪潮整层整层地打倒调查人员，学生纠察队从未得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必然腐败的结论。不，这最终证实了“革命之剑”正义而无情地斩断了人民的敌人。³⁸ 如果说前几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其精力用于向日丹诺夫提交关于“安全危险”的冗长分析报告，那么在 1937 年，它仅限于发布关于逮捕的简短“情况通报”。³⁹

那一年，列宁格勒的逮捕人数与总人口的比率达到 1:32。高等教育领域的受害率更高：例如，在 1937 年 11 月被处决的 3859 名男女中，有 276 人（比例为 1:14）被认定为“学生”或“教员”。⁴⁰ 按全国标准，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成员属于“超额完成者”：他们每天获得不少于两百份口供。⁴¹ 这是对叶若夫为列宁格勒定下的配额的回应：他要求四千次处决——或简单称为“第一类”——以及一万人作为囚犯送往劳动营——“第二类”。⁴² 主动权掌握在斯大林和叶若夫手中，但各地都拥护这场清洗。即使莫斯科屈服于来自下方的要求，同意将原始数字翻倍，实际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配额。⁴³ 告发⁴⁴

到 1937 年夏天，大清洗最后的检查和限制已被解除：撰写一份悔过的自传不再能带来自我改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人。

绞索和绳套遍布各个角落，学生们互相指控搞破坏和蓄意破坏；参加各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或为英国、德国或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对反革命活动的指控要求立即反驳，这通常采取反指控的形式⁴⁵ 指控作为真正敌人的告发者，是一个旨在诋毁正派共产党员、削弱党的资产阶级闯入者。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基层评判上级，个人评价不可能保持稳定：今天是美德，明天就成了恶棍。在 1935 年的审查和 1936 年更换党证期间，列宁格勒的党报哀叹道：“认真的同志被轻率地清洗……而彻头彻尾的人民敌人却未被察觉。”⁴⁶

每个学生都应该能够识别反革命的教员——腐朽的两面派——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⁴⁷ 当红色教授学院的阿列克谢耶夫思考“党可能捏造派系来为切断领导人联系辩护”的可能性时，他立即被清洗了。⁴⁸ 一位又一位发言人在党委会议和较小的大学集会上强调新发现的党的纯洁性，但同时又警告说，叛徒数量不断增加的危险。破坏者和间谍的数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如果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倾向于低估反革命团体的规模，那么在这个十年后期，这种方法被逆转了，因为斯大林的追随者们夸大了数字，以证明这些团体的威胁性有多大以及对他们的惩罚是多么理所应当。前面提到的瓦年科在 1936 年 9 月坚持认为：“必须是个轻信傻瓜”⁴⁹

伊万努什卡-杜拉乔克（童话中的傻子）才会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只是一小撮人，不超过 16、50 或 100 人。不，他们……到处都有地下中心。”无论叛徒被描述为微不足道还是无处不在，对阴谋日益增长的关注是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没完没了、滔滔不绝地谈论两面派闯入者；标记他们；逮捕他们；处决他们。⁵⁰ 解释学在某些方面被简化了，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复杂。敌人是透明且容易发现的，但人们必须知道去哪里寻找。1937 年 6 月巡视各省归来后，列宁格勒党组织副书记谢尔巴科夫写信给日丹诺夫说：“谁会相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竟落在敌人手中！”

莫洛克在 1937 年 3 月于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那些看似诚实的人”⁵¹ 诚实的结果是恶棍“恶棍同样困惑的莫斯科毕业生波尔写信给斯大林：“我知道党员……被分为纯洁的和被玷污的”⁵² 纯洁的和被玷污的；然而，一些看似纯洁的人结果是暗藏的敌人，而一些看似被玷污的人结果是忠诚的。”韦尔纳茨基教授在 1938 年 1 月 5 日的日记中阐述了这种对隐藏敌人痴迷的后果：“数百万人正在被捕。这是日常之事。”由于每次逮捕都会产生连锁反应，韦尔纳茨基于 2 月 4 日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因逮捕而哀恸与混乱”⁵³ 一切都分崩离析。”他在 11 月 21 日又写道：“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在谈论逮捕，这是当今最痛苦的现象。”⁵⁴

突然间，“人民的敌人”无处不在。这个术语本身作为一个关键的语言标记，区分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由于善与恶在概念上是绝对相互依存的范畴，党依靠其指出敌人的能力作为其自我定义的基本部分。为了更好地维护这个精英兄弟会的边界，他者不能是遥远的抽象概念；学生们必须认识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在 1935-36 年从学生队伍中被清除出去后，却一再奇迹般地重新出现在大学围墙内。⁵⁵ 左派或右派的意识形态偏差是由纠察队编造的，通过预先选定的受害者的口中说出，并由最初构想出这些偏差的同一群学生激烈地驳斥。⁵⁶ 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位名为祖耶夫的职员在 1937 年 4 月表示：“只要我们生活在被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包围的环境中，就不可能松懈。既然委员会直到 3 月才揭露了一些反苏维埃人士，说明我们的警惕性还不够。”⁵⁷ 正是这种热情将清洗推向更深更远：在大学能够安息之前，总是要再进行一次最终的打击邪恶的行动。

在挖掘更多隐藏敌人的压力下，党员们开始互相攻击。共产主义大学的农业科学讲师 S. T. 博卢切夫斯基在 1937 年 1 月被两名初级讲师布尔佐夫和贝科娃告发：他们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有关联：伊扎克、德米特里耶夫和马尔蒂诺夫。”党委的调查为博卢切夫斯基洗清了罪名。⁵⁸

他的同事、大学学术秘书博奇卡列娃被描绘为同一团伙的成员。1936 年 10 月 16 日由索贝列夫和施密特联名撰写的一封告发信如下：“直到最近，我们不了解博奇卡列娃的传记，但普雷德向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增加了我们对她可能确实与在此地被发现的傲慢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无赖们关系密切的怀疑。”“在来列宁格勒之前，博奇卡列娃曾在亚速-黑海地区工作，该地区因反革命分子猖獗而臭名昭著：‘博奇卡列娃从那里到这里跨越一千多英里的’偶然’跳跃，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组织使用的伪装战术的一部分吗？”⁵⁹

十天后，博奇卡列娃在共产主义大学党委面前抗议：“我向你们保证，那些土匪中没有任何人与我调入大学有关。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还曾批评过我。对我与被捕者关系的告发如此详尽，人们可能会认为我的告发者们并没有花三四年的时间每天与”

那些土匪接触。”⁶⁰ 对博奇卡列娃的告发“未被证实”，但提出轻率告发的人不再受到惩罚。⁶¹ 同时代的人抱怨道：“经验表明，告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去证明你不是骆驼吧！即使你证明了，对你的诽谤者也不会有任何惩罚！”⁶²

在大清洗期间收到的告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平均而言，1936-37 年期间，每个党员收到三份投诉。⁶³ 在红色教授学院，1937 年 4 月至 12 月期间，破纪录的 51 名学生（占 106 人中的比例）被揭发：10 人因“未能揭发人民的敌人”，另外 10 人因“警惕性不够”，至少 13 人因“隐瞒同学的劣迹”。⁶⁴

概括地说，告发信是颠倒的推荐信。⁶⁵ 后者描述革命美德，前者则描绘反革命阴谋。告发是猛烈的，其作者完全清楚其后果。那封针对莫斯科某居民波兹德尼亚科夫的简短信件颇具说明性：“我要求在 24 小时内逮捕波兹德尼亚科夫。必须消除他，必须一枪打穿他的脑袋。我了解他：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爬虫”*不可救药的爬虫*”。⁶⁶

大多数信件并非匿名——其作者似乎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且并不惧怕报复。最受欢迎的收信人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是党、国家机关和报刊。相当多的告发信直接寄给了斯大林。⁶⁷ 毕竟，他曾有一句名言：“即使只有 5% 的材料是真实的，这也是面包啊。”⁶⁸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宣扬告发的福音。那位更看重个人友谊而非党的同志并不理解真正的友谊。斯大林解释说，贵族或骑士可能会犯那个错误，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会。一个有觉悟的同志会毫不犹豫地揭发他最老的朋友。他说得越早，党就能越早保护集体，并防止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斯大林接着说，坚持私下解决问题，是在沉溺于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

为了尽可能具体地讲道，总书记回忆起 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洛米纳泽（一位崭露头角的党领袖）写给他的老朋友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煽动性信件：“我们在这些信件写就八九年后才得知，结果发现它们是反党性质的。可以肯定地说，谢尔戈因为他的善良本性而没有通知我们。显然，他希望纠正洛米纳泽。”但他的软弱使党的诠释变得复杂：“在不知道洛米纳泽的真实本质[*真实本质*]，”中央委员会同时提升他为

外高加索党组织。“如果我们知道他写给谢尔戈的信，我们就不会这样考验他。结果发现这个人是在反对党工作，而不是为它工作。”

伦理支持告发，而不是反对它，只要党的利益至上。与奥尔忠尼启则不同，斯大林没有党的知识不做任何事。关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即将公布：

就在那时，谢尔戈同志收到了洛米纳泽的一封讨厌的信。

他来找我说：“让我给你读洛米纳泽的信。”

“要点是什么？”我问。

“很糟糕，”奥尔忠尼启则回答。

“把信给我，”我说。“我会向政治局报告；中央

委员会需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人作为成员。”

“我不能，”奥尔忠尼启则说。

“为什么？”

“我答应了。”

“您身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党的传统的维护者，怎能答应任何人不把反党信件呈交中央委员会？难道您与洛明纳兹共享秘密却对中央委员会隐瞒？谢尔戈，您觉得这像什么样子？您怎能做出这种事？”

斯大林温和地施压、羞辱，始终保持着友善的语气——他确实将这位格鲁吉亚同乡视为朋友，但党外绝无私谊。然而奥尔忠尼启则依然固执：“我不能出示这封信。”

当奥尔忠尼启则最初接触斯大林时，他已在私下指责这位友人。他希望此事能作为私人事务，由三位格鲁吉亚人自行解决。斯大林对此毫不接受：“他想让我知晓他与洛明纳兹共享的秘密，既分散道德负担又不通知中央委员会。我告诉他，我不愿知晓此类秘密。‘若您让我看信，’我说，‘我立即将其分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的疏失既损害了党组织，也辜负了洛明纳兹本人。既然有机会，洛明纳兹理应主动向党坦白以纠正错误。斯大林回忆起自己昔日的告诫：“您会毁了洛明纳兹。”他对惊愕的奥尔忠尼启则说道：

如果你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小事——那封信是反党但不足以进行清洗——洛米纳泽将知道在出现更大的事情时该怎么做。但如果你庇护洛米纳泽，他会认为可以继续犯错，因为他有保护者。从庸人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拯救他，但如果你以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你就必须意识到，你未能及时纠正他，将会毁了他。

布尔什维克，你必须意识到，如果你未能在还有时间的时候纠正他，你将会毁了他。而这正是所发生的。洛米纳泽卷入了某件大事。

奥尔忠尼启则出于好意，斯大林看到他心碎感到痛苦：“当然，没有人比谢尔戈更将这一悲剧放在心上。他信任了某人，而那个人背叛了他。谢尔戈要求枪毙洛米纳泽——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步骤！”⁶⁹

告密与卑鄙地背叛朋友或干涉他人的私事几乎没有关系。⁷⁰ 实际上，苏联媒体将告密者描述为“英雄”和“正义的捍卫者”。⁷¹ 并不是说“告密”的负面含义在斯大林时代完全陌生：用于无根据指控的特殊术语——诽谤（*nagovor*），诽谤（*kliauza*），和诽谤（*kleveta*）都是不明智的行为，破坏了苏联集体。⁷² 然而，当来自合适的人时，告密信不被视为冲突的根源，而是被视为补救措施，社会纯洁的保证者。

作为双刃武器，举报最终导致了两位敌对的共产主义大学教师——贝科夫与德米特里耶夫的倒台。1935 年 9 月，被党委描述为“众所周知的思想涣散者……致使宣传员迷失方向”的贝科夫被解除大学教职。⁷³ 一年后，贝科夫声称季米特里耶夫与其他未被揭露的恐怖分子“串通”将他扳倒，并吹嘘道：“正是我写信给斯大林，告知他尽管季米特里耶夫的兄弟是反对派成员，但季米特里耶夫拒绝与之断绝关系。我知道季米特里耶夫此前曾被开除出党并遣返至生产单位。显然他毫无悔改！... 他和他的密友们早就密谋要除掉我。我丰富的革命经验使我精通一切监控手段，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季米特里耶夫在监视我。”⁷⁴ 然而最终定论权属于季米特里耶夫，他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审讯官将贝科夫描述为“托洛茨基分子”。季米特里耶夫这是在实施自己的报复——更准确地说，是反报复。

声誉从荣耀到耻辱的滑落如此迅速（有时又回归荣耀），以至于将大清洗简单理解为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网毫无意义。1934 年处决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的刽子手贝科夫，在 1935 年沦为受害者，1936 年又重操旧业。季米特里耶夫本人也绝非无辜羔羊，1936 年他面对的正是其受害者不到一年前遭遇的同种恶魔。整个教职工队伍仿佛在玩“音乐椅游戏”：试图厘清谁坐在哪里毫无意义——座位随时会变；在 1930 年代末期的摩尼教式世界里，唯一恒定的是相互指控与谴责。

当局不再主动征集检举材料。

告密者需要证明自己是出于强烈动机、自愿行动的治安维持者。他们毫不犹豫地立即撰写检举信，即便对象是老友或同事。列宁格格勒顶尖院校另一对教师之间详细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检举表明，这种行径的后果正变得愈发危险。

戈尔拉切夫与索科洛夫——大清洗期间红色教授学院的两位学员——于1929年在赤塔首次相识。戈尔拉切夫“逐渐赏识索科洛夫是位正派的党员”——这是基于相互尊重的勉强友好评价。四年后两人迁至列宁格勒，戈尔拉切夫进入共产主义大学，索科洛夫入读托尔马切夫军事学院。“我们大约见过三次面”，戈尔拉切夫承认道。当他在1937年夏检举这位朋友时，他解释说索科洛夫曾发表过激言论，称集体农庄建设是场灾难。“人们正在死去”，索科洛夫以母亲“在村里挨饿”为例，并声称“斯大林在进行恐怖实验。若列宁在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就在戈尔拉切夫向党组织汇报索科洛夫的异端言论后不久，这对昔日好友在街上偶遇。“从他对我的反应来看，”戈尔拉切夫回忆道，“我能感觉到他已经知道我写了关于他的材料。”作为以牙还牙的回应，索科洛夫向红色教授学院寄了一封信，声称戈尔拉切夫曾与他一同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甚至有一次还给了他孟什维克刊物。现在轮到戈尔拉切夫反击了。他的反反举报声明称：“索科洛夫正试图对我揭露他的行为进行报复。”

即使党委不愿完全采信索科洛夫的辩词，也无法彻底忽视戈尔拉切夫的过失。学生们质疑：既然知道“我的研究机构里藏着一个人民的敌人”，戈尔拉切夫究竟做了什么？戈尔拉切夫回应道：“1935年3月或4月，我向我们的党史教师科托维奇汇报了索科洛夫的情况。”但科托维奇本人后来也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

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米申为戈尔拉切夫辩护：“我从共产主义大学时期就认识戈尔拉切夫，他在那里发起过揭露托洛茨基分子的决定性战役：帕尼科等人在他举报后被开除。显然，戈尔拉切夫不可能认同索科洛夫的观点。”最终，戈尔拉切夫仅因“在揭发索科洛夫过程中反应迟钝”而受到训斥。⁷⁵

沉溺于猎巫氛围中的学生们，会根据不同形势采取自卫与反击策略。成功毁谤他人意味着自我证明；失败则暴露自身成为破坏分子。一旦举报成为官方惯例，所有

人都必须参与其中。那些不愿谴责同事的“可鄙感伤主义者”被称作“举报反对者”。⁷⁶ 教授与学生开始审讯他们最好的朋友，明知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他们别无选择：拒绝调查将被解读为失职，甚至可能被视为与敌人勾结。

请看红色教授学院发生的以下事件链。哲学讲师罗斯季科夫被揭发并遭到清洗。学院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巴尔苏克交给下属瓦西里耶夫一项敏感任务——他必须谨慎收集关于乌尔里赫（罗斯季科夫的门生，其政治忠诚度同样受到质疑）的信息。瓦西里耶夫尽职调查后确认，乌尔里赫确实“与罗斯季科夫过从甚密：他们常互相拜访并共进晚餐”。

令瓦西里耶夫大为惊讶的是，他出色完成的工作并未获得赏识：“当我将调查结果带到党委办公室时，看见巴尔苏克正在房间里踱步。”他显然情绪激动，“瞥了一眼递交的关于乌尔里赫的材料，随后将我的报告塞进办公桌左手边的抽屉。十分钟后——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种事如何可能发生——乌尔里赫本人竟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你所写的关于我的指控并不准确’。”此外，他还讽刺地补充道：“你本该在举报中多塞些材料进去。”难道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巴尔苏克竟与敌人勾结？难道他表面上假装调查乌尔里赫，实则向其传递敏感监控信息？

巴尔苏克需要维护自己的声誉：“我不记得瓦西里耶夫亲自将材料交给我。很可能他把材料留在（我办公室无人看管的）桌上。当我转身时，看见乌尔里赫正俯身在桌上偷看收集的针对他的材料。”委员会驳斥了这套说辞：巴尔苏克被指控“向乌尔里赫泄露秘密材料”并遭到清洗。⁷⁷

尽管巴尔苏克、乌尔里赫和瓦西里耶夫可能显得狭隘、报复心强甚至冷酷无情，他们却以追求觉悟和纯洁来为自己辩护。回避道德说教，我无意揭露他们的言辞不过是掩盖自利目标——无论是个人晋升还是单纯生存——的伪装。与其指出这些列宁格勒共产主义教育领袖未能践行他们口中常提的个人纯洁理想，不如指出这一理想在构建大清洗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使广泛的相互告发合法化。这些致力于提升其终身奉献的党的纯洁性的要员们相互揭发，从而推动清洗运动不断升级。

普雷德的陨落

对普雷德的清洗、逮捕与处决构成了我们这出戏剧的最后一幕，也是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历史的最后一页。普雷德的声誉在一年前已严重受损，而在四月党委选举前夕彻底崩塌。导火索是与普雷德关系密切的主要共产主义法学家帕舒卡尼斯的被捕及其学派的没落。⁷⁸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帕舒卡尼斯已经预测，无阶级社会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并且国家机器将不再需要。根据他的理论，法律反映了商品交换的经济关系，并确保剥削得以延续的工具；因此，在消除私有财产关系后，法律必须消亡。受到帕舒卡尼斯的启发，苏联法律理论家讨论了国家强制机器消亡的延期过程，以及苏联法律体系通过逐步简化而自我消亡。⁷⁹ 但当新宪法宣布个人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并首次制定全联盟民事和刑事法典时，苏联法律体系显然必须加强而非削弱。1936 年底斯大林声称“法律稳定性对我们而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要”之后，任何关于法律制度多余化的讨论都变得危险。⁸⁰ 1937 年 1 月，著名国家理论家帕维尔·尤金谴责帕舒卡尼斯阻碍“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同年 4 月维辛斯基接续对其展开全面批判，指控帕舒卡尼斯的“消灭主义”意图及企图通过法院放弃刑事镇压。全面的批判。⁸¹

帕舒卡尼斯匆忙转向，宣称自己已认识到反破坏分子和间谍斗争的强化使任何关于苏维埃国家消亡的言论都具有危险性。⁸² 但为时已晚。1937 年 1 月 20 日帕舒卡尼斯被捕，被定性为“人民敌人”，指控其领导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反苏组织。在 1937 年 2 月 9 日首次审讯中，他否认全部指控。“我不是两面派，”他坚持道，“也非叛徒。对我的指控是企图毁灭人的谎言。”⁸³ 但其部分自 1936 年秋即遭逮捕的同事作证称，反革命集团早在 1930 年已形成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包括帕舒卡尼斯及数名亲近门生，该集团“将布哈林思想走私入苏联法律理论前线”。⁸⁴

三月中旬，帕舒卡尼斯仍声称人们“诽谤我”（*捏造指控*），但两周后精神崩溃。4 月 2 日他供认被米柳钦（最高苏维埃下属学术委员会主席）招募进敌对阵营：“1933 年春当我们交流理论前线形势意见时，米柳钦称党的领导层在经济理论问题上缺乏方向……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与之斗争。”据称米柳钦指示帕舒卡尼斯与包括布哈林、雷科夫、托姆斯基在内的右派中心建立联系。“左翼分子”亦不可忽视。1937 年 9 月 4 日受审时，帕舒卡尼斯认罪破坏活动，主要罪状是“散布苏维埃国家消亡的反党论题”，被判处死刑。

委员会⁸⁵

共产党大学党委被告知普列杰是帕舒卡尼斯的直系门生，完全认同其导师的反革命观点。因此在 1933 年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的讨论中，“普列杰对压制托洛茨基主义关于苏维埃国家非持久制度的愚蠢主张反应迟缓。”⁸⁶ 1937 年 4 月赴莫斯科的大学调查组发现，在帕舒卡尼斯学派主办的马克思诞辰 125 周年公开辩论中，普列杰的同事卡尔塔舍夫曾声称“国家在十月革命后已开始消亡”。尽管该论点引发强烈谴责，卡尔塔舍夫坚称当时无资本家阻碍向共产主义跃进，无国家社会“并非遥不可及”。

调查人员确认，“普列杰非但未揭露季诺维也夫分子卡尔塔舍夫”，反而试图调和双方，视分歧为“学术争论”。据证人陈述，这位未来校长曾作如下悖理声明：“确实，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使命后我们将生活在无国家社会。但无法预见生产资料发展速度及脑体劳动矛盾消除时间。”同年普列杰称“消灭富农标志着所有法律规范的消亡”，这被认定为对国家强制机器的隐晦诽谤，典型体现帕舒卡尼斯门生特征：“实质上，普列杰暗示我国法律具随意性！他不谈强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苏维埃，反而热衷计算苏维埃国家及其法律支撑何时消亡。”⁸⁷

“我们仍需证明，”审讯人员适时承认，“普列杰与人民敌人存在关联。”⁸⁸ 1933 年与普列杰结盟的卡尔塔舍夫，早在基洛夫遇刺后即因雇佣“匪徒米亚斯尼科夫”被捕——此乃重大线索。但直至 1937 年 4 月列宁格勒法律学院校长乌恩德列维奇与科学秘书列祖诺夫被捕，普列杰才“完全暴露”。⁸⁹

1937年4月14日，基洛夫工厂干部巴利亚斯尼科夫率先揭发普列杰：“尽管他明知米亚斯尼科夫与乌恩德列维奇（列宁格勒反革命托洛茨基中心成员）……更不必说扎伊杰尔与列祖诺夫（均已肃清）均与帕舒卡尼斯有关联，普列杰却未揭露他们。”⁹⁰ 紧随其后的是法律学院奥舍罗夫签署的更详细揭发信：“普列杰与列祖诺夫友谊深厚，列祖诺夫常言只需召唤，即使深夜普列杰也会立即前来讨论‘学术问题’。乌恩德列维奇亦与普列杰过从甚密，1936年春普列杰常将大学公务车借予其使用。”

普列杰与声名狼藉学者的关联罪责已被证实。但普列杰本人算学者吗？奥舍罗夫指控其在法律学院未产出重要成果：“每年他承诺充分利用暑期实践带回的资料完成集体农庄民主研究，但年年仅止于承诺。”面对学位为荣誉授予的证明文件，普列杰勉强承认：“我出版物稀少。学位系因教学授予。”⁹¹ 另一项致命供述接踵而至：“授予我学位的学术工作者，特别是乌恩德列维奇，后被证实为人民敌人。”

奥舍罗夫揭发中最具杀伤力的是暗示普列杰非普通门生：“去年秋帕舒卡尼斯来列宁格勒时，普列杰与之共餐，一次在乌恩德列维奇家，另一次在自家。”⁹² 普列杰知必须否认此节：“即便我有意与人民敌人建立私人关系，亦无暇参与其狂欢——我居乌里茨基宫，每次来访必经警卫。且与宫殿司令普津为邻，实难隐蔽访客。”⁹³

但普列杰未能避免污染，数周后向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承认。他试图解释尴尬事件：“科学院代表团为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葬礼抵此，下榻乌里茨基宫。乌恩德列维奇寻我言：‘我们的上司帕舒卡尼斯在仪仗队，能否给其食物？’”据普列杰陈述，帕舒卡尼斯未午餐，故“在我处用茶点后同赴餐厅”。尽管竭力将玷污寓所之事描述为短暂不可避免，他被迫承认曾款待恶魔。⁹⁴

其怨敌随后揭露普列杰职业生涯中始终蓄意庇护人民敌人。例如 1933 年肃反中，列祖诺夫与乌恩德列维奇保留党籍仅因普列杰主持审讯委员会。⁹⁵ 列祖诺夫档案摘录显示普列杰曾错失锁定敌人良机。据记载：“谈谈你与家庭的联系，”普列杰问。“我生于西伯利亚富裕农家，”列祖诺夫答，“随富农阶级消灭，我母亲亦遭清算。”⁹⁶ 尽管历史污迹显著，普列杰竟允其友否认父母身份重塑自我。“他未就理论前线反革命歪曲向列祖诺夫提问，”1937 年对 1933 年肃反速记的评注如是说。

奥舍罗夫指认另一关键节点——1935 年春发现列祖诺夫与“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米亚斯尼科夫合撰论文时，“众人皆认为列祖诺夫将被清洗”，然“普列杰再度接受其两面派忏悔！”

直至 1937 年 2 月列祖诺夫正式被宣布为人民敌，普列杰终于揭发：“同志们，早在 1930 年列祖诺夫出版社会科学详读时，该书引用考茨基与托洛茨基！四年后其出版《苏维埃国家与苏维埃社会》……首页引斯大林‘无产阶级需强力专政’，次页却援引希特勒证明我国为‘半国家’。”据普列杰新评估，列祖诺夫确系鼓动学生“忘却巩固苏维埃国家、发展苏维埃法律、革命法制观念”的敌人。⁹⁷ 但奥舍罗夫认为普列杰未到位：“即便最终抨击列祖诺夫，他仍拒评另一敌人乌恩德列维奇。”⁹⁸

共产主义学院法律讲师伊利亚·斯拉文 5 月 22 日的揭发，持续抨击普列杰诠释学能力缺陷。“普列杰与众多近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民敌人有联系，”斯拉文写道，“尽管 1933 年仅四五名教授从共产主义学院（以充斥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著称）被清洗，普列杰对此少数人复职无所作为——更甚者，他留用现知密谋刺杀日丹诺夫的库切罗夫于哲学研究所。”斯拉文巧妙揭示普列杰如何大张旗鼓清洗公之于众者，却操纵上诉程序恢复党羽。

⁹⁹

普列杰敏锐察觉身后狂吠群犬，请求并获准延期准备辩护。6 月他提出详实反驳：“首先，

当人民敌人见我不接受其理论构想时，拒在法律学院任用我。其次，关于未揭露乌恩德列维奇与列祖诺夫的指控，请注意我的诋毁者奥舍罗夫与斯拉文亦参与肃反——当时他们对这些人民敌人亦未置一词。”我的揭发者诠释鉴别力不优于我：此乃普列杰辩护要旨。¹⁰⁰

但形势愈发恶化。伊林与党委获取材料表明校长（现被险恶描述为“帕舒卡尼斯反革命集团成员”）非但未“揭露敌人……反在斯莫尔尼区机关提拔他们”。库兹明与克拉索夫斯基联名揭发，及叶尔莫连科另一揭发，复述上年致命事件：“普列杰给予德米特里耶夫、伊扎克、马尔特诺夫、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等团伙积极个人评价……未追查阿尔塔帕尔马科夫系托洛茨基分子的信息，转交另一敌人伊扎克。马尔特诺夫被捕数日前，竟欲提名其为副手。”¹⁰¹

饱受折磨的普列杰孱弱回应：“此乃旧材。不能因同一罪行两次惩罚我。”但布季科简明阐释追溯审判为斯大林法学核心：“去年我们不知帕舒卡尼斯与乌恩德列维奇真相。现知其本相。”普列杰思忖诠释失败优于共谋，遂致歉：“人民敌人——此乃我悲剧——伪装精妙使我难察……我处境因二十二年党务经历更显严峻，人们对己期望更高。”¹⁰²

1936年6月16日，当校方决定清洗普雷德的副手德里泽和乌赫塔——这些“为人民公敌打掩护的两面派”时，普雷德的职位已岌岌可危。校长的左膀右臂竟与列宁格勒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利特温斯基有关联，而曾在此任职的科托雷诺夫正是阴谋刺杀基洛夫案的主谋。共产主义大学的纠察队员指控：“德里泽在利特温斯基公寓参与狂饮作乐，乌赫塔对此知情。”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当第一批反革命分子于1936年春被捕后，普雷德竟用更多敌人填补了大学空缺。“是的，”他供认，“是我向招生办公室推荐了德里泽。”¹⁰³

对普雷德的指控暗示他曾庇护过所有经过大学的恶棍。“1935年，瓦维林因暗中传播托洛茨基主义终于被解除教职，”学生们指出。

“当瓦维林开始宣扬反革命观点时，普雷德走过场将其解雇。但猜猜是谁又雇用了他？当然是同一个普雷德！他作为斯莫尔尼区党委委员，能把瓦维林塞去区级单位教历史。”¹⁰⁴

副校长谢苗诺夫一直知道校长从未真心净化大学：“普雷德是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他非要等到莫斯科审判后才开除罗姆的妹妹——而这个罗姆正是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派中心的联络人！”¹⁰⁵

更多揭露接踵而至。6月23日党委宣布将重审前党委秘书普列姆和前校长纳罗德尼茨基的案件，这两名高级干部一年前被大学开除却仍自由活动。有学生最近还见到两人：“他们醉醺醺地拿着瓶酒，正踉跄走向普列姆的公寓。”堕落、狂饮、托洛茨基主义与阴谋在此描述中交织，玷污了普雷德前下属的“共产党员资格”。¹⁰⁶

急需住房的党委成员贝索诺夫困惑不解：“校长为何从不提议驱逐普列姆？尽管此人因包庇托洛茨基分子被免职，却仍住在宿舍最好的公寓里。”一份来自普列姆的认罪书被加入普雷德个人档案（存放于党委档案室）：“在出版社社长卡冈诺维奇的公寓里，一伙恐怖分子与间谍常举行所谓‘晚间聚会’；普雷德总是受邀参加。”¹⁰⁷

现在该是普雷德亮出最后底牌的时候了：他难道不是老布尔什维克吗？在向大学党委陈述的那一刻，他再次成为那个“毕生与党紧密相连”的资深革命者：

我的经历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九岁起我就开始牧羊。十二岁时我已能承担成年人的农活。革命前我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但环境使我接触到了政治文献。我的哥哥尤利乌斯·雅科夫列维奇是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成员，自1913年起就积极参与党的工作，与当时进步人士往来密切。因此在我十三岁时，就有机会聆听政治谈话和革命运动史讨论。

1914年8月，济列同志邀请我参加首次秘密会议……要求我为两名即将逃离沙皇军队的同志伪造护照。此外，我还撰写反战传单，经油印后在征召士兵中散发……以及致农业工人的呼吁书，敦促他们拒绝为“灰色男爵”（对拉脱维亚地主的贬称）进行夜间打谷作业。

战争年代，我们的组织规模缩减：只剩下妇女坚持，男性成员要么被征入（沙皇军队）要么转入地下。

尽管如此，1915 年国际劳动节时，我们仍在人口密集区悬挂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结束战争！”“五一节万岁！”……

革命结束后，我领导供给委员会并加入赤卫队。

但成效有限，因 1918 年 3 月拉脱维亚被德军占领。同年 4 月初我遭德国当局逮捕，关押在马林堡监狱。根据地下小组建议，我于 1918 年 6 月逃往苏维埃俄国，并志愿加入红军。

最后，普雷德强调尽管在随后岁月中犯下“严重错误”，但他并非“迷失者”。这点至关重要：“你们将我描绘为黑暗人物，但此刻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拉脱维亚人！”¹⁰⁸（1917 年拉脱维亚人以革命热情著称。）

刚晋升经济学部主任的奥利索夫对校长的自画像发出致命一击：“我们知道有些老布尔什维克给党造成严重损害，而其他同志无论多年轻，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奥利索夫对普雷德基本立场的否定，确实符合当日的忏悔秩序：过往功绩已无关紧要，唯一问题在于当下是否纯洁。不知何故，普雷德始终未能理解这一点。¹⁰⁹

针对普雷德的抨击持续不断，校刊评论的语调已宣判他的政治生命终结：“普雷德邀请亲信吹捧自己，又如猪猡般狂喜地拥抱这些谄媚之辞，纵容反革命余孽滋生……我们终于能证实他与帕舒卡尼斯、翁德列维奇、列祖诺夫、卡尔塔舍夫等人民之敌的关联。他的眼泪——鳄鱼的眼泪——再也不能哄骗我们入睡。”¹¹⁰

此外，当局不再确信普雷德的背景如他自称那般光荣。普雷德的兄弟已被逮捕，且消息严峻：“1937 年 4 月 22 日，里卡德·伊阿诺维奇·普雷德因非法入境苏联罪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¹¹¹

普雷德不确定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的是谁，便解释道：“我的亲属仍留在拉脱维亚。我去年就已与他们停止通信。在列宁格勒，许多人与我同姓——我并非都认识他们。”¹¹²

但这位校长的话不可信。在 6 月 22 日的党委会会议上，伊林宣布了不出所料的消息：每一份针对普雷德的举报都“被证实属实”。大学党委会

最终投票决定将其清除，该决定于6月27日经大学党员大会批准，并于7月5日获斯莫尔尼区委员会认可。十天后，谢苗诺夫“解除了普雷德在大学的职务”。

1937年8月9日，普雷德提出申诉。这封写给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全权代表安德烈·泽林斯基的长信，字迹潦草扭曲，流露出绝望。信中要求对其案件进行仔细复查。作为其自传的补充，申诉书详细记述了普雷德与党内各类敌人长期而英勇的斗争：

亲爱的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

我并非要求您轻信我的言辞。我知道必须用事实 and 材料证明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我被错误指控为：“人们为自己辩护[免受自由主义指控]”。¹¹³ 细致的调查将确认我出于善意且行为端正[*dobroporiadochnyi* (俄语：品行端正)]

首先，您可以查证我在第十四次党代会[1925年12月]期间在波罗的海舰队的工作。当时形势紧张：我不得不武装起来对抗反对派分子——我们政治部主任叶列梅耶夫，并直面舰队半数被人民敌人蛊惑的政治工作者。目前在远东舰队的奥库涅夫同志和此处空军训练学校的古尔金同志可以证实我的陈述。我谈论的是遥远往事，但当时的作为不应被遗忘。

其次，我反对右倾偏差分子的斗争值得重新审视。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我于1927至1931年在该处学习），斯列普科夫、扎伊采夫、阿斯特罗夫等人代表的布哈林学派占据领导职位——尽管莫斯科党委内固守的犯罪团伙百般阻挠，我们仍成功将其动摇。在列宁格勒工作的尼卡诺夫和特罗伊茨基同志了解我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经历，他们将证明我曾与敌人交锋。

第三，您不应忘记我在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1932年我发起大规模运动揭露包括潘秋欣、费德琴科、季马纽克等人在内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该托洛茨基匪帮头目潘秋欣积极参与破坏活动。随函附上1932年1月8日共产主义大学决议；这份我亲自起草的文件证明了我一贯的警觉性。

第四，请查阅1935年11月苏联法律研究所的会议记录。您将确信是我提议清除列祖诺夫，而斯莫尔尼区委员会甚至拒绝训诫他。¹¹⁴

为使自己处于弥赛亚式分界线的正确一侧，普列德必须谨慎区分那些他将称为“同志”的人与仅直呼其名者。他对于光荣共产党员与应受鄙视敌人之区别的理解，可从信函结尾窥见：“或许难以置信，但我确是诚实之人，毕生积极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¹¹⁵

正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用敌对者名单围困被告以关联定罪，普列德试图列举他所期望能维护其德行的忠诚布尔什维克名字。老布尔什维克卡基特-辛普森声称“普列德的清洗是需要纠正的错误”。¹¹⁶ 1919年入党的甘茨贝格所作的推荐信简短得可疑。他写道：“我只能说明，普列德一如既往仍是优秀的布尔什维克。”¹¹⁷ 曾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任职的老友德里祖尔仅愿担保校长“截至1931年的行为。对普列德赴列宁格勒后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¹¹⁸

日益绝望的普列德在致日丹诺夫本人的信中凝练陈述：“1915年入党时，我仅是十五岁少年。二十三年来为党勤勉工作，生活别无他求。难道仅因曾与匪徒共事且频繁会面，我就该被清洗吗？”¹¹⁹ 此信是否送达日丹诺夫尚不可知。无论如何，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37年8月23日批准开除普列德的党籍。

两周后，普列德被捕。逮捕令将其描述为“无明确职业”且“因托洛茨基主义被清除出党”的个人。¹²⁰ 相较之下，普列德在狱中填写的问卷声称遭清洗是“因未揭露人民敌人”——系疏忽而非蓄意破坏。¹²¹

1937年春遭羁押的列祖诺夫与翁德列维奇所作的有罪证词，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坐实案情。1937年8月21日审讯中，列祖诺夫承认在帕舒卡尼斯授意下，1932年共产主义大学组建了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其会议在普列德公寓举行。¹²² 列祖诺夫指认普列德为该集团头目之一。当审讯员要求提供其他涉案人员——法律学者及共产主义大学教员——姓名时，列祖诺夫补充了三人：扎伊杰利、卡沙尔斯基和拉尔采维奇。此关键线索与上年调查相连，巩固了列祖诺夫的证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叙事线索正编织成庞大网络，牵连愈来愈多学者与教员。若任一环节

断裂——无论是尼古拉耶夫与科托雷诺夫案（1934 年）证据、扎伊杰利案调查（1936 年），还是法律学者案（1937 年）——整个阴谋叙事将彻底瓦解。

据列祖诺夫称，帕舒卡尼斯策划了一个复杂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推动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全国性阴谋。该秘密反革命组织的骨干应是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和 RANISON（全俄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协会）的毕业生。在 1929 至 1931 年间，完全受破坏分子控制的中央委员会分配委员会，将伯曼、斯拉文、温德雷维奇、利伯曼和普雷德——这些上述精英培训中心的毕业生——派往列宁格勒。

123

普雷德审讯的第一天是 1937 年 9 月 5 日。他否认所有指控。“我从未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他告诉审讯员。“我认为我的逮捕一定是因为误解，因为我想不到任何理由。”普雷德坚称，在被捕前，他只认识帕舒卡尼斯、温德雷维奇和列祖诺夫作为“支持官方路线的党员。如果我知道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我会在党和国家机构面前揭露他们。”¹²⁴

两天后，普雷德再次进入审讯室，压力加剧：

审讯员：你一直在撒谎。今天，你改变证词，声称帕舒卡尼斯在国家与法律问题上不坚持党的路线。你早就知道这一点。放弃你的否认，给我们真相。

普雷德：我在 9 月 5 日和 9 月 7 日所说的没有矛盾。帕舒卡尼斯在党会议上放弃了反革命信念后，继续作为一名党员。

审讯员：你担任红色教授学院党委书记，而帕舒卡尼斯的反革命思想在你面前讨论过。你是否揭露了帕舒卡尼斯？

普雷德：是的，我揭露了帕舒卡尼斯……在我的领导下，党组织批评了他的反革命理论。

审讯员：我们还知道一些事情：你是帕舒卡尼斯反革命理论的支持者，在讨论他的反革命理论时，你为他辩护。告诉我们真相！

普雷德：我从未为帕舒卡尼斯辩护，也从未同意他的“国家与法律”理论。

此时，审讯员向普雷德宣读了温德雷维奇证词的一段摘录：“1930 年，普雷德……是帕舒卡尼斯关于国家消亡和苏联法律的资产阶级法律形式的反革命思想的热心支持者。当时，他完全支持这一平台，并在红色教授学院传播它。”¹²⁵

如果这还不够，普雷德必须准备应对新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对其案件的影响。随着 1937 年 9 月叶若夫“间谍狂热”的开始，列宁格勒机构关押者的困境进一步恶化——普雷德和温德雷维奇与去年秋天被定罪的刺客一样遭遇不佳。当温德雷维奇在 1937 年 9 月 16 日受审时，他已经承认了恐怖行为。因此温德雷维奇供认在 1934 年初从扎伊杰尔那里收到了恐怖指令：“我决定可以从我最亲密的政治同僚中组建必要的小组。由于他们能接触到党的领导，他们能够执行托洛茨基诉诸恐怖主义的指令。”

据称，普雷德和温德雷维奇共同策划了一个计划，以报复“基洛夫摧毁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小组”。他们如此接近斯莫尔尼宫的受保护区域，以至于可以利用基洛夫守卫的片刻疏忽来暗杀他。武器已获取：温德雷维奇获得了一支纳甘左轮手枪，而索罗金和列祖诺夫获得了勃朗宁左轮手枪。“我们决定需要学习射击，”温德雷维奇作证说；该小组已开始计划跟踪基洛夫，“但我们被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小组抢先了。”

随后，随着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加剧，该小组开始计划袭击日丹诺夫。他不能在斯莫尔尼宫被杀，因为安全措施太严密，因此计划在他途中射击。但这个替代方案最终也被否决：“我们得出结论，向行驶的汽车射击是徒劳的姿态，并会暴露组织。”第三个计划最终被一致通过：阴谋者将制造一起车祸，导致日丹诺夫的车撞上他们的车。弄到了一辆车并雇佣了一名司机。1935 年底，阴谋者检查了连接沃伊诺沃街和特维尔街（就在共产主义大学外）的官方路线，寻找制造事故的最佳地点。但这个计划不得不放弃“因为托洛茨基分子中的大规模逮捕”。¹²⁶

还考虑了其他恐怖行为：向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投掷手榴弹（计划被认为“不现实”而否决）；杀死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只有在同一节火车车厢内才可行：温德雷维奇表示“卡沙尔斯基试图招募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些铁路工人加入我们的组织”）。当在 1937 年 11 月 25 日被问及他如何得知普雷德参与反对党的领导阴谋时，

温德雷维奇说，列祖诺夫告诉他“普雷德参与讨论与该小组实际反革命活动相关的所有问题。”¹²⁷

1937年11月16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处副主任雷兹尼科夫中尉的调解下，进行了普雷德和温德雷维奇的证人对质：

向温德雷维奇提问：你第一次见到普雷德是什么时候？

温德雷维奇：我自1930年以来认识普雷德。

向普雷德提问：他是否正确描述了你们相识的时期？

普雷德：是的，他描述正确。温德雷维奇自1931年1月起认识我。我们在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大会上相遇。

向温德雷维奇提问：你对普雷德的反革命活动了解多少？

温德雷维奇：……我从列祖诺夫那里得知，普雷德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工作中采纳了帕舒卡尼斯的路线。当他在1931年春天被派往列宁格勒时……普雷德在列宁格勒法学家中担任领导职务。1932年，一个反革命法学家小组成立。小组领导是温德雷维奇、列祖诺夫和普雷德。直到1934年底，所有与……在学术工作和教学中实施托洛茨基-右翼立场相关的问题，通常都由这个三人小组先讨论。之后，普雷德只参加

几次谨慎的非法聚会，包括我、列祖诺夫和索罗金。我从普雷德本人那里得知，直到最近，他在莫斯科出差期间仍与帕舒卡尼斯联系。他多次告诉我们帕舒卡尼斯制定的关于国家法相关反革命活动的指令。

向普雷德提问：你已听到温德雷维奇在这次证人对质中提供的指控性证词。

普雷德：是的。我否认我曾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否认我曾积极反对党或苏维埃政权。

向温德雷维奇提问：你对普雷德的反革命活动了解多少？

温德雷维奇：1934年在他们的公寓与普雷德和列祖诺夫交谈时，我得知普雷德知道托洛茨基关于恐怖的指令。普雷德是否知道我们准备的具体恐怖行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就这个问题与他进行个人交谈。

向普雷德提问：谁告诉你托洛茨基关于恐怖的指令的存在？

普雷德：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指令的存在……也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向温德雷维奇提问：关于普雷德试图隐瞒其反革命活动，你能告诉我们什么？

温德雷维奇：我认为普雷德试图逃避他多年来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的责任。

证人对质在此结束。温德雷维奇和普雷德都签署声明，表示已阅读协议中出现的所有内容，且他们的话是逐字记录的。

尽管温德雷维奇的指控毫不留情，但其证词中的某些模糊性不应被忽视。例如，他从未声称普雷德帮助策划暗杀基洛夫或日丹诺夫——他只声称普雷德对这些计划有所了解。他将普雷德排除在 1934 年后的叛国活动之外是引人注目的；人们只能推测这种轻微开脱声明的原因。¹²⁸

虽然证人对质的文本——从审讯角度来看是关键证据——甚至比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的标准速记稿更公式化，但它让人一窥大清洗的法律文化。协议准备得一丝不苟，尽管普雷德的否认被仔细记录，但他的抵抗毫无意义：调查人员知道同事的证词足以定罪，无论普雷德说什么。证人对质的意义不在于它揭示了什么，而仅仅在于它发生了。

一个月后，间谍活动的额外指控被加到普雷德的罪行清单上——负责间谍相关犯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分支机构排挤了负责反革命相关犯罪的竞争对手机构。由于普雷德的档案此前已包含超过定罪他为活跃反革命分子所需的最少两份指控证词，看来内务人民委员部想将普雷德牵连到正在进行的拉脱维亚案中。（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拉济维洛夫斯基对叶若夫“揭露拉脱维亚反苏地下组织”的指令感到困惑。他找不到任何。最后，叶若夫告诉他：“不要担心缺乏具体材料。只要指定一些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并从他们那里逼出必要的供词。我们对这些人不必客气。”）¹²⁹

至少三名拉脱维亚人作证说，普雷德参加了一个反革命拉脱维亚民族主义组织：沃尔齐特，在

1937 年 11 月的某个时间受审；梅扎克，在 12 月 29 日受审；以及德雷兹登，在 12 月 11 日和 1938 年 1 月 2 日再次受审。¹³⁰

内务人民委员部此时广泛使用酷刑的事实可能与所有这些证词有很大关系。¹³¹ 1937 年 6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为了获取充分和真诚的供词，可以偶尔对那些拒绝透露信息的人民敌人使用肉体影响方法。”¹³² 同一时期，维辛斯基发送了一份加密电报，建议在调查期间，“一些程序规范可以被废除。”苏联副总检察长帕金斯基解释说，在重大案件中没有时间讲究“礼貌”。仔细遵守法律规范必须推迟到“我们清洗掉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右翼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¹³³

1939-40 年受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人员的证词表明，地区机构的负责人指示下属对被告使用肉体影响手段。“传送带”经常被使用。调查人员还使用“燕子”，即受害者的双手和双脚被绑在身后，然后被吊到空中。1937 年 4 月接替阿格拉诺夫（被判处并枪决）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主任的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在自己被处决前不久作证说，所有部门的调查机构都包括“敲钟人 [破坏者] 调查员。”这些敲钟人调查员“肆无忌惮地殴打囚犯，并很快从他们那里获得‘证词’，并知道如何撰写雄辩的审讯记录。”¹³⁴ 1955 年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索洛维约夫的证词呈现出类似的画面：“我们白天编造审讯协议，晚上使用肉体压力迫使囚犯签署它们。”¹³⁵ 被捕的国家建筑学院院长克留科夫连续两周每晚都被殴打：“他们用拳头、皮带扣、橡皮棍和绳子打我。两个大理石镇纸砸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头被椅子撞伤。‘我们会一直打你，直到你把一切都写出来，’调查员说。”¹³⁶

极度的身体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普雷德的磨难中产生的一份显著文件，他在其中承认了间谍和破坏行为，但方式非常曲折、几乎语无伦次。¹³⁷ 尽管其标题是“我亲手写的证词”（*С о б с т в е н н о р у ч н ы е п о к а з а н и я*），此文件并非手写，而是打印在一张光面纸上；不存在手写草稿，且未标注日期。该文本似乎是普雷德在不同纸张上草草写下的零散口供的汇编，这些原始材料很可能因明显刑讯痕迹而被压制。即便最终版本的文本仍保留着惊人的矛盾与语法错误。以下是文件全文。¹³⁸

(1) 我大约于 1932 年前后走上了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斗争道路，具体情况如下：尽管我并非在任何意义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理念，也未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愤怒，我却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苏维埃政权慷慨地供养着我和所有居住在苏联境内的亲属。苏维埃政权给予了我很多——更准确地说，是一切。没有苏维埃政权，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都会沦为主人、富农和男爵的奴隶。然而，我却成了反革命分子。问题在于，我其余的亲属留在了拉脱维亚，那里的人数比在苏联的还多——他们毁了我。我本应一劳永逸地切断与他们所有的联系。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必须在物质上支持我的母亲，给她寄钱，写信。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将自己与父母隔绝开来是不对的。如果我母亲四处乞讨要钱，那会对苏维埃政权的威望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她的儿子在苏联工作且拿着丰厚的薪水？外国人会认为一个无法养活家人的苏联人是个好儿子吗？

于是，联系继续维持着。这些联系被许多敌对分子所利用。那些无赖们悄无声息地向我靠近。

(2) 1932 年，我被我的表兄扬·雷恩戈尔多维奇·普雷德拉入了反革命间谍组织；他后来在列宁格勒被捕。

(3) 在参与反革命组织期间，我与以下人员有接触：亚历山德罗夫（造船业）、穆克列维奇（造船业）、米亚斯尼科夫（列宁格勒苏维埃；已被捕）、列祖诺夫、翁德列维奇、帕舒卡尼斯（科学院）、泽尼斯（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莫斯科人）、扎伊马尔（来自拉德加尔；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主任）。

(4) 被招募入组织者：班特克（共产主义大学）、波利亚科娃（共产主义大学）、斯米尔诺娃（区委）、吉特尔（乌克兰人）、阿特拉……多岑科、谢苗诺娃、“G 与 R”编委会成员。

(5) 组织目标：通过国内叛乱团体摧毁苏维埃政权，在适当时机借助干涉主义者。

(6) 来自国外的援助：指令；何时炸毁何物；准备何种爆炸物及何时对发电厂、航道[手写]、桥梁实施爆破——均按行动方案执行，[行动]启动[手写]前才能接收。

绝不能等待这些计划。新的计划会取代昨日的。必须确保明日的计划不会送达。

边界绝对不可渗透，任何黑国家的飞机均可飞越苏联领空。而最重要的是——无线电。要安排得只有极其强大的外国电台能被接收，私人无法收听。个人——需压制空中信号。

(7) 爆炸、投毒、纵火。每日重新制定计划。纯属巧合。何处可行何事。破坏者并无计划。他利用的是疏忽。只有军事目标有计划。但这不是我的专长。

普雷德

此事发生在以下情况下：1927 年召开空军指挥官会议时，有许多拉脱维亚人参加。他甚至邀请其中一些人到家中，同时也经常在瓦尔瓦罗夫街的办公室与他们交谈。

我是由拉脱维亚积极分子招募的。

关于我对党所犯罪行，我可以陈述如下：

我隐瞒了事实：我的两名亲属，我们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间谍，于 1932 或 1933 年被拉脱维亚情报机构招募，并在两方面活动。两人都因此被判刑。在共产主义大学和斯莫尔尼区委的党会上，我掩盖了他们的定罪情况。关于他们下落的说法含混不清。人还活着，但杳无音讯。有种意见认为并非一切都正确。并非一切都很真诚；我失去了信任。我不该隐瞒此事。

该间谍集团的真正组织者是扬·普雷德。结果发现他是在拉脱维亚被招募的，虽然我无法确切说被谁招募，但显然是拉脱维亚[总部][手写]情报部门的一名雇员。扬·普雷德收集了关于马尔季造船厂的信息——我为他安排了那里的工作。实际上我也是被同一个人招募的，尽管我实际上没做什么。他和我一起住了几天，这就够了；我承担作为参与者（无论知情与否）的责任。

至于我，我没有招募任何间谍。

我于 1925 年被招募在拉脱维亚人的……民族主义组织……工作

普雷德

声明

在审讯过程中仔细审视了自己行为的整体后，我认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我的反革命-民族主义拉脱维亚活动了如指掌。因此我决定向调查人员提供关于

我反革命活动的详尽证词。

普雷德

普雷德根据刑法典第 58-6-8-10-11 条被定罪。由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首脑纳坦·沙皮罗（本人于 1938 年 8 月 29 日被定罪并枪决）准备的起诉书声称：“调查确认普雷德参与了对党中央书记基洛夫的卑鄙暗杀。”此外，它认定普雷德“于 1932 年被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招募为间谍”。

间谍指控，这在 1938 年是司空见惯的，对起诉方很方便：无需证人，所有有罪的材料自然都被销毁或藏匿。此外，这些指控与莫洛托夫的声明一致，即“托洛茨基分子已变成一群破坏者和刺客，他们在我国执行法西斯情报机构的任务”。¹³⁹ 莫斯科调查员库兹涅佐夫于 1939 年 2 月作证说，他接到了间谍名额指标。“当我告诉上级我们在常规调查工作中无法获得相关口供时，他指示我，‘你自己写笔录，考虑到囚犯的工作性质以及他可能已经交给敌人的材料。别担心，我们不会挑剔。’”¹⁴⁰

此外，普雷德自 1935 年起被指控为列宁格勒反革命拉脱维亚叛乱恐怖中心成员。据称该中心计划组织小组起义并实施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行动。

¹⁴¹

无论指控多么荒诞不经，普雷德对所有指控均认罪，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会于 1938 年 1 月 17 日判处他死刑。¹⁴² 他罪孽深重，以至于他的法官们无意精确界定他的罪行：站在被告席上便是他的本质，而这本质被判定为恶意的。因为大清洗时期，任何先前行为与意图之间的界限都已完全崩溃，人们无意区分它们。

指控、逮捕和处决的跷跷板永无止境。普雷德的敌人刚告发完他喘口气，他们自己随即又被告发。就在党组织于 1937 年晚春为开除普雷德做最后润色时，党委转而攻击奥利索夫——“一个谄媚者和官僚主义者”——和谢苗诺夫——“不比奥利索夫好，他故意庇护后者，帮助他在大学传播反革命教条”。¹⁴³ 由于伊林曾暗示老布尔什维克可能误入歧途，而年轻同志往往证明是坚定的，他立即断言：“奥利索夫企图使党内两代人相互对立，这使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¹⁴⁴

奥利索夫惊愕地看到自己创造的怪物转而攻击自己，他解释道：“我并非意在对比‘年轻’和‘年老’；我唯一的意图是

表明普雷德躲在老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背后，而一个人以前的党龄不能作为评价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¹⁴⁵ 据奥利索夫说，当代托洛茨基主义支持两条反革命活动路线：破坏苏联经济，以及诋毁好的共产党员以削弱党的队伍——后者正是奥利索夫对手们的策略。此外，他自己只是一个“仍在成长、偶尔犯错的指导员”，但“绝非托洛茨基意义上的作恶者”。¹⁴⁶ 但当曾负责大学刊物的朝鲜共产党员权认同奥利索夫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说法时，很明显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者。指导员们声称他们曾听他“声称托洛茨基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说，奥利索夫是一个“骗子”(*zhulik*)，“一个无赖”(*prokhvost*)，“一个欺诈犯”(*moshennik*)——必须将他清洗。¹⁴⁷

接替普雷德职位的谢苗诺夫也不会长久。¹⁴⁸ 他被贝科夫告发，后者已离开共产主义大学在中央委员会高等党教育部工作。1932年在德国时，“谢苗诺夫常说托洛茨基主义很快会在苏联流行起来，斯大林领导层必须被推翻。到达莫斯科后，谢苗诺夫告诉一位朋友，‘你最好给自己挖个深点的坑。揭发的幽灵正盘旋在我头顶。’”¹⁴⁹ 他的恶意者们趁机诋毁谢苗诺夫：“他抨击普雷德，但谢苗诺夫对自己行为并不太批判谁让他出国的？帕舒卡尼斯和多岑科——两个托洛茨基恶棍！谢苗诺夫应该解释为什么他当时受到如此‘仁慈’的对待。”¹⁵⁰ 7月下旬，当他预定要公开面对抨击者时，谢苗诺夫称病。但这并未阻止学生们要求伊林无论如何宣布委员会清洗谢苗诺夫的决定。¹⁵¹

曾经强大的列宁格勒共产主义教育体系，今天缺一个齿轮，明天少一个活塞。1937年7月27日，谢苗诺夫上任不到两周，最高苏维埃决议关闭共产主义大学，将所有学生转入基洛夫高级农业研究所。¹⁵²

清洗仍未结束。伦贝格教授于1937年12月警告当局，他认为反革命斗争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自满”(*blago-dushie*)：“说敌人已被击败，没什么可害怕的，是在欺骗自己。敌人……保存了其活跃力量[*zhivaia sila*]，正伺机攻击我们。我们必须对革命的敌人毫不留情，从肉体上消灭他们。”¹⁵³ 红色教授研究所的党委——这个机构仍有一线希望挺过风暴——将此告诫铭记于心：在其存在的最后六个月里，约一半在校学生因“丧失警惕”、

“与法西斯分子称兄道弟”及类似的“政治错误”被送上党纪法庭；大多数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¹⁵⁴ 不可避免地，列宁格勒红色教授研究所于 1938 年 1 月 7 日被清算。¹⁵⁵

最后让我们看看叶列缅科和巴拉尼克的命运，这两位共产主义大学指导员于 1936 年末因反革命行为被定罪并送往索洛夫基。他们在监狱营地度过了余生，但他们的故事仍属于共产主义大学的历史。

与大多数其他“阴谋家”不同，巴拉尼克和叶列缅科没有经过法庭审判：他们的命运完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1935 年 1 月 23 日国家检察长发布的一项指令允许“缺乏充分文件证据的反革命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¹⁵⁶ 5 月 27 日，特别委员会成立了若干“特别三人小组”：由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主持，成员包括当地民警首脑和被捕者所属的行政部门首脑。当被问及地区三人小组有何权力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他们的裁决是终局的。”¹⁵⁷

根据中央委员会 1937 年 7 月 2 日发布的决定，叶若夫签署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00447 号指令，规定“最具威胁的”罪犯必须处决。¹⁵⁸ 作为此次行动的一部分，他给列宁格勒三人小组分配了任务：在两个月内监督索洛夫茨基营地处决 2000 名囚犯。¹⁵⁹ 营地管理人员准备了一份标记为处决的 1116 名在押人员名单，巴拉尼克和叶列缅科名列其中。

即使在监狱集中营里，灵魂诠释学仍在继续。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惯常威胁囚犯：“别以为在集中营里就能置身事外，我们会追捕你到天涯海角来监视你。”¹⁶⁰ 这为加重叶连科和巴拉尼克的刑罚提供了理由：据称他们在监禁期间继续发表反苏言论并策划恐怖行动。¹⁶¹

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中灵魂诠释学的精细运作可从阿尔马佐夫的案例中窥见，他是列宁格勒一所细菌实验室的负责人，在巴拉尼克和叶连科被捕两周后被逮捕。阿尔马佐夫因“对体制的持续抱怨”被定罪为煽动暗杀基洛夫。当他抵达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后即被监视。集中营负责人阿佩特少校报告称“阿尔马佐夫尚未摆脱其反革命情绪”。以下为集中营线人的部分报告，证实了该判断：

代号“皮萨列夫”：“阿尔马佐夫说：‘统治集团无疑近乎疯狂，因为我看不出报纸指控整个工厂搞破坏还有其他原因。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代号“奥古斯特”：“阿尔马佐夫告诉囚犯：‘外面的土豆不比我们在这儿吃的好多少。每年春天政府都吹嘘“我们播种了 X 百万公顷土地”，但整个田地都长满了杂草。’”……

代号“别利马诺夫”：……阿尔马佐夫非常狡猾：他小心翼翼地对我们察言观色，字斟句酌，但每句话都浸透着对一切苏维埃事物的憎恨。他在与其他囚犯交往时谨小慎微，试图掩饰其‘真实的反苏本质’。”

由于阿尔马佐夫主动寻找老囚犯，“像海绵一样吸收”他们告诉他的所有负面信息，最后一名线人断定他已无可救药。¹⁶²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政治与情报部门审查了索洛韦茨基死刑名单，并几乎确认了每一项判决。随后名单被转交给该行动负责人、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加林，他仔细检查每份证明文件，为其标注连续编号，并将所有文件缝合成大号文件夹。接着由“特别三人小组”审阅议定书。¹⁶³ 巴拉尼克和叶连科的处决由扎科夫斯基（特别三人小组主席）、加林以及曾任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时任列宁格勒首席检察官的波泽恩共同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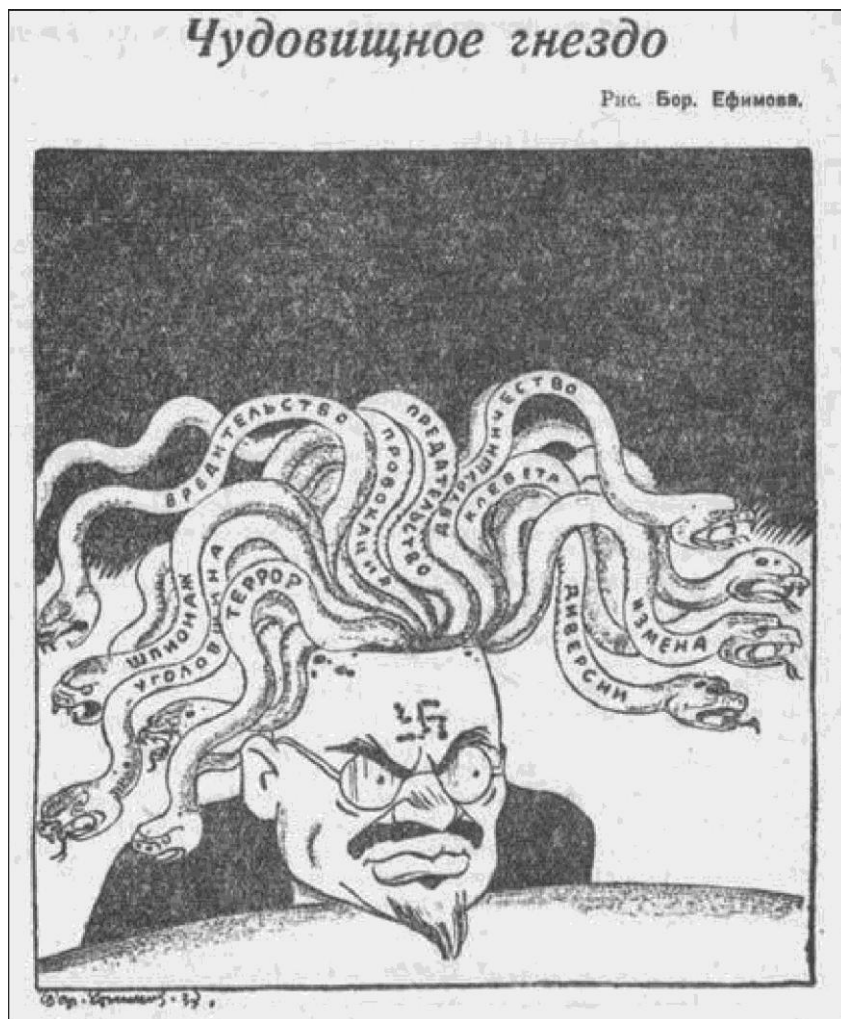
议定书连同三人小组的决定被交给马特维耶夫上尉，他被派往肯姆指挥特别“行刑队”。受害者被误导以为将转移至其他集中营，从索洛韦茨基岛押解至大陆。当押送队伍抵达卡累利亚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附近的桑多尔莫赫林区时，囚犯们被分成小组，剥去外衣只剩内衣，被带至坑边。¹⁶⁴ 在每个坑边，两名士兵强迫巴拉尼克和叶连科跪下。马特维耶夫从后脑射杀每名囚犯，助手随即尸体推入坑中。当坑被填满时，尸体被覆盖生石灰和泥土。¹⁶⁵ 据某些资料记载，当马特维耶夫弹药耗尽时，他用铁棍砸碎受害者的头颅将其杀害。¹⁶⁶

妖魔化托洛茨基分子

偶发的敌对阵营排名显示，在一片单调的黑暗中，托洛茨基闪烁着尤其恶毒的黑光：作为首个布尔什维克异端被提及，他从偏差主义者堕落为叛徒。



《刺客的卫生学》：“谋杀与叛变的英雄/不曾忘记卫生准则/法西斯同伙以科学为基础/刽子手完成日间劳作/怯懦地清洗双手。”库克雷尼克希作画，扎罗夫配文。《鳄鱼》杂志 4（1937）：11.



“魔窟。”叶菲莫夫作画。《消息报》1937年1月29日。以下毒蛇从托洛茨基的法西斯头颅中钻出：“犯罪”、“恐怖”、“间谍”、“破坏”、“挑衅”、“叛国”、“两面派”、“诽谤”、“颠覆”和“背叛”。

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

据斯大林所言，托洛茨基主义“已非七八年前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而沦为“一群无耻破坏者和破坏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将身心卖给了法西斯”。克雷连科认为“托洛茨基将以集人类想象所能及的最低劣最卑鄙罪行于一身的怪物形象载入史册”，米高扬则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属于人类：“托洛茨基孕育了新物种——伪装成人的怪物。”

“盖世太保丑闻：‘请理解，中尉先生，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是诚实的奸细，不能堕落到卑鄙的地步。’”布罗达蒂作画。《鳄鱼》杂志 4 (1937)：7.



《交易》：“——‘我要的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你却装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这两部作品相似，夫人。两书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鳄鱼》杂志 4 (1937)：12.



“人民公敌”这一术语（*vragi naroda*）并非专指阶级异己者、反对派乃至已被神话化的破坏分子和间谍。语用学至关重要——该术语将根本性的他者性烙印在那些被排除于政治实体之外的人身上。



“卑鄙之柱旁。”叶菲莫夫作画。《苏维埃艺术》1937年2月5日。额带纳粹标志、双手滴血的托洛茨基站在标有“人民公敌”的牌匾前。斯大林主义将传统政治区分简化为表象。党敌们隐藏多年的共同本质终于显露：托洛茨基与希特勒不过是同一股阻挠无产阶级解放的普遍力量的不同代号。

“人民公敌——叛徒托洛茨基及其孽子【拉狄克】，立于卑鄙之柱旁。”叶菲莫夫作画。《消息报》1937年2月1日。象征背叛的犹大之名，与1917年前欺骗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奸细及之后的反对派相互指代。犹大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背叛原型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颠覆叛国概念之间的纽带。



恐怖主义

斯大林 1936 年 9 月 25 日的“索契电报”要求全面重估反对派活动并大规模指控叛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被敦促将恐怖活动归咎于所有被告，“无论调查期间收集的具体材料如何”。



作为宠物携法西斯炸弹进入苏联的反对派领袖。库克雷尼克希作画。《鳄鱼》杂志 1937 年第 4 期：扉页。



“你的牌被将死了。”叶菲莫夫作画。

《消息报》1936年8月22日。

“盖世太保账目。”加尔巴作画。

《红色报》1937年2月2日。“收入”页写着：“爆炸、灾难、暗杀、坠机。”“支出”页写着：“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利夫希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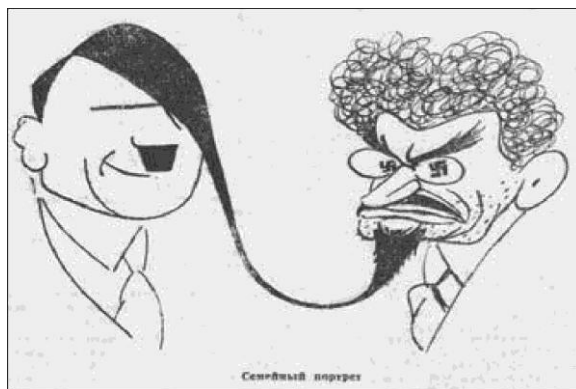


平行中心

1937 年 1 月举行的第二次莫斯科公审涉及十七名据称隶属于所谓平行中心的党的领导人，包括卡尔·拉狄克、尤里·皮达可夫和格里戈里·索科尔尼科夫。平行中心据称延续了 1936 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但它也延续了苏联境内的法西斯活动。



“步调一致。”加尔佩林
作画。
《莫斯科工人报》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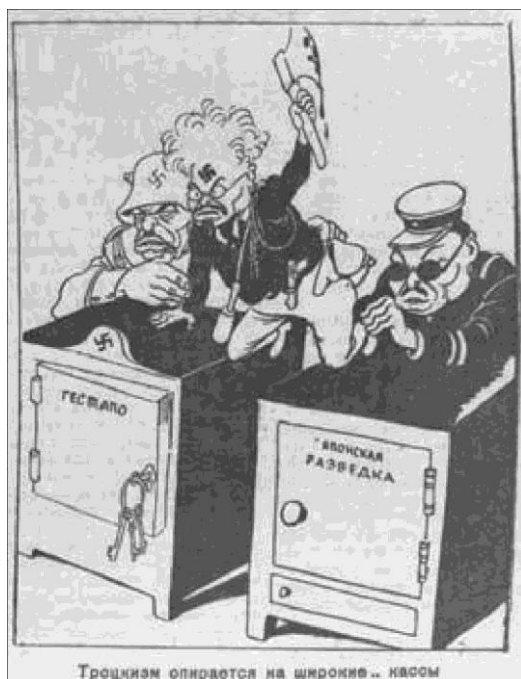
“全家福。”加尔巴作画。《红色报》1937 年 1 月 31 日。希特勒与托洛茨基合二为一。

勾结外国势力

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反映在公审中。1937 年 1 月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等人）的审判指控强调，国内反对派意图将苏联领土出卖给德国和日本。



“未举行的盛宴。”叶菲莫夫作画。《鳄鱼》杂志 1938 年第 7 期：扉页。国际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对服务员托洛茨基深感失望，他未能提供菜单承诺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沿海边疆区”。



“托洛茨基主义依靠宽大的……钱柜。”列奥作画。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年1月29日。一个钱柜标着“盖世太保”，另一个标着“日本情报机关”。

“三头爬行动物。”列奥作画。《列宁格勒 skaia 真理报》1936年8月24日。





“他们出卖祖国。” 加尔巴作画。

《红色报》1937 年 1 月 26 日。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贸易公司代表卡尔·拉狄克，向外国资产阶级出售苏联的部分领土。

“卖方与买方。” 叶菲莫夫作画。《消息报》1937 年 1 月 26 日。索科尔尼科夫、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将苏联零售兼批发卖给国际资产阶级。





法西斯拿破仑托洛茨基煽动皮达可夫向德国法西斯提供苏联劳动者的鲜血。水壶上写着：“预付款。”说明文字写着：“赫斯先生【希特勒副手】，这是我们生存能力的证明。”叶菲莫夫作画。 《消息报》1937年1月27日。

右翼-托洛茨基集团（三）

1938 年 3 月举行的第三次莫斯科公审包括二十一名被告，据称属于所谓的“右翼-托洛茨基集团”，由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前总理阿列克谢·李可夫、前党书记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前负责人亨里希·亚戈达领导。



“血腥匪徒的梦想。” 《消息报》1938 年 3 月 10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前负责人亚戈达挥舞滴血斧头，布哈林位于斧头上方。布哈林手持“恐怖主义、间谍、叛国和恐怖”之书。亚戈达曾说：“布哈林为我服务不会比戈培尔差。”



“死胡同。”梅兹拉乌克作画，1937年2月。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引领一批打着“布哈林学校”横幅的新反革命分子入狱。他们很快将与身陷囹圄的拉狄克汇合，还有顽皮的猫——布哈林（尾巴顶端带纳粹标志）和拉狄克（在沙地上画纳粹标志）。RGASPI, f. 74, op. 2, d. 170, l. 123。

“三位医生。”《消息报》1938年3月11日。普列特涅夫、列文和卡扎科夫据称毒害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古比雪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主席任斯基和作家高尔基。





“在柏林餐厅。切尔诺夫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代表与第二国际领导人、德国情报机构代理人丹的会面已安排妥当。”叶菲莫夫绘，1938年。为解决当黑暗势力人物（如托洛茨基）企图摧毁另一敌人（如纳粹或社会民主党）时产生的问题，斯大林末世论叙事将传统政治区别简化为表面现象。隐藏多年的政党敌人的共同本质终于明晰：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孟什维克领袖（丹）、右派（李可夫与托姆斯基）与左派（托洛茨基），以及希特勒，皆是同一宇宙力量的不同名号——该力量矢志阻挠无产阶级解放。



K. 叶利谢耶夫绘于 1938 年。画中布哈林被描绘成火枪手，试图将俄罗斯农民拉回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布哈林曾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 年 3 月 3 日俄国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签署的和约，标志着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辩称战争持续可能引发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在 1938 年受审期间，布哈林承认他曾计划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以组建一个好战的新政府。

尾声 牺牲的真相

谁应该为大清洗负责？谁支持了无阶级社会只能通过牺牲无数生命才能达到的观念？档案材料表明，在屠杀背后有一个中央机构——1936-38 年对党内精英的破坏是通过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法令精心策划的。然而，暴力的范围太广，参与者太多，无法证实暴力是斯大林针对无助党派的阴谋的结果。除非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即主体既是社会清洗话语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否则无法解释镇压的规模。一旦我们将话语视为由多元主体构建的多元且有争议的意义网络，就有可能解释大清洗所特有的不可控程度，而不剥离其意识形态基础。随着千禧年主义成为共产主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语言和实践方面，普通党员和斯大林领导层之间几乎不可能划定界线。通过采样共产主义中坚分子的陈述，可以公平评估领导人寻求救赎与党整体末世期望的交集：“为了社区的利益，必须消灭党的敌人”；“在摆脱野蛮状态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残忍和狡猾。”¹

如果我们询问暴力如何形成对“善”的主张，将会开启对斯大林世界的新视野。² 病态而残酷的叶若夫机构建立在一个广泛共享的意义体系之上，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清洗和对清洗的抵抗——无论多么能激发同情，比另一种方式更能显示弥赛亚心态如何证明，有时甚至要求，大规模清除反对派、破坏者和间谍的合理性。正是因为不仅仅是适应国家政策的演变以保全自己，而是寻求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纯洁性，才使得如此多的党员参与了推动大清洗达到新高度的举报。

官方历史诊断——悖论在于它将 1930 年代末期既解释为无与伦比的纯洁时期，又解释为反革命的最后抵抗时期——将清洗行动证明为普遍和平胜利之前的末世事件。麦子现在与稗子分离，时机成熟以揭示每位同志的真实本质。被带到无阶级天堂的门槛，个体显示出自己要么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要么是反革命性和破坏性的。³

在叶若夫时期，令人毛骨悚然的 tacit 反对主义和公开叛国的 confession 是日常事务，尽管必须小心解读它们。斯大林警告说：“有些人作证真实——即使他们承认的事情很可怕——以清除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渣滓。还有些人不作证真实，因为他们爱上了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渣滓。”⁴ 那些真正忏悔的人会坦白党告诉他们要坦白的一切。“勇气的最高标志，”斯大林解释道，“不在于捍卫自己的信念并展示自己是一个造物主。真正的勇气，勇气的最高精神，在于超越自我。如果没有准备好克服自我——请允许我说：自爱——并服从更高层次的意志，就没有集体，没有领导，没有共产主义。”⁵ 斯大林和他的刽子手可能意识到许多供词是从被告那里逼出来的，但他们如此坚信受害者的罪行，以至于他们确信自己是在迫使后者揭露真相。

重要的是要记住，认为一些供词是强行逼出来的想法在 1930 年代并不是被禁止的思想。许多中央委员会成员公开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并且在 1937 年 2 月至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短暂成为讨论的主题。“抱歉，我可以重述一下事实吗？”斯大林在那个场合说。“当我或其他人问道：‘老实告诉我，你是自由作证的，还是被逼供的？’拉德克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甚至哭了出来：‘逼供我？你在开玩笑！自由地，完全自由地。’”⁶

到 1937 年春天，大多数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已被枪决或送往集中营，党的领导层准备将火力转向拉德克、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

莫斯科第三次公审（1938 年 3 月）的准备工作正全面展开，这场审判将处决列宁同僚中最后残存的人物。⁷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及其旧日盟友在二月至三月全会期间仍是中央委员，他们被允许在同志们面前最后一次为自己辩护。他们在自辩中的陈述及其论点所受的对待，为我们理解布尔什维克对真理的认知提供了珍贵视角。

这场言语交锋的直接导火索，是布哈林提交的投诉信——他在信中批评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方法。此信的语气与暗示激怒了绝大多数与会者。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抗议是种侮辱，是“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攻击”。意识到这封信适得其反后，这位深陷重围的申诉者声称自己从未想过指控叶若夫奉上级指示捏造案件。但发言者提醒他记住自己那句玩世不恭的话：“需求催生供给”。

布哈林坚称自己针对的只是具体指控者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并强调：“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不应预先认定[对我的]证词必然正确……我认为反驳此类证词——任何证词——都不构成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攻击，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不提供证词[证词主体]，而是收集证词……它协助整理这些证词，但绝无义务为每条证词的真实性负责。[这些]证词是调查材料，需经过进一步核实、澄清[洗清]、过滤[过滤]等程序。”⁸ 表面上，布哈林在此援引了自由主义法学的基石：无罪推定。此外，他似乎将真理确立为真实性。他主张，所需的是“对事实与矛盾进行透彻的分析比对”。他特别致力于科学证明其主要指控者采特林满口谎言：“我比对了事实，核对了大量时间节点。基于这种比对，我驳斥了采特林的所有断言。”⁹ 如果允许进行适当自辩，布哈林相信自己能够瓦解对他的指控。

最耐人寻味的是，其对手竟按布哈林设定的条件接受了挑战。雅罗斯拉夫斯基告诉布哈林：“我们确实握有非常确凿的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完全证明（你的）罪行。”而奥辛斯基则惊叹于被告如何用其“不在场证明”和提交的证言矛盾来驳斥“本质上次要的要点——他们只谈论证词如何自相矛盾，却不谈如何形成证据链”。斯大林也愿意承认“契卡人员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所夸大——这是其工作性质允许的某种夸张——但我绝不怀疑他们工作的诚意。”¹⁰

叶若夫尤其热衷于驳斥布哈林的形式论证：

“布哈林正在寻找某个在押人员证词中的孤立矛盾与差异，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瞧，调查方式促使人们说出……不准确的内容。’同志们你们看，”叶若夫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真要伪造所有这些不利于布哈林的证据，显然这些证据本会被打磨得圆润有序”

“矛盾会被抹除，”波斯蒂舍夫插话道。

“是的，”叶若夫抓住时机，“矛盾会被抹除。而每个人都说了该说的话。这个事实恰恰证明调查进行得正确。数十名在押人员在不同地点接受审讯——”

“并且在不同时间，”贝利亚补充道。

“我认为如果（证据）完全一致，”叶若夫总结道，“布哈林早就该在所有屋顶上大喊这是伪造的了。”¹¹

在逐一处理并驳斥布哈林的论点后，中央委员会转向问题实质：他这种“法律主义式挑战”（*advokatskoe osparivanie*）所揭示的布哈林本性。在此，被告对程序的执着反而加重其罪责。“你表现得像个律师，”加里宁指责道。这并非意味着“布哈林不应该辩护。问题不在此。关键在于，他在辩护时采用了律师手法——这种律师……事先不关心被告是否有罪，只相信他应当被判无罪。”¹² 证据固然重要，但提交证据者的个人可信度更为关键。

布哈林承认要反驳“第二类事实”极其困难，这类事实涉及“个别面对面谈话（*razgovory s glazu na glaz*）]””。当两个证词冲突时，信任是关键：真理只能通过人们的心灵来获得。¹³ 在布哈林看来，他的处境的悲剧在于，托洛茨基分子如此有效地滥用了真诚的话语，以至于坦白不再可信，而他正是这一情况的受害者。他们“如此毒化了气氛……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人类的情感——不是情绪，不是心灵的冲动，不是眼泪。许多早期代表一种证明形式的人类情感表现……今天已经失去了效力和力量。”¹⁴ 布哈林恳求相信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内心深处渴望“一种工具，能让你进入我饱受折磨的灵魂。”“我在党面前的罪行非常严重，”他承认。“但正如我坦白真实罪行的力度一样，我以同样的力度否认强加给我的罪行。”¹⁵

伏罗希洛夫祝贺他理解道德自我才是重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义务……考虑

不仅考虑目前调查机关掌握的全部事实”，还要“考虑人们的个性。”¹⁶ 中央委员会存在共识，认为事实性是次要真理。主要真理是由党所代表并承载在其忠诚成员心中的历史真理。“因为我为自己筑起的堡垒之一，”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者伯杰回忆道，“是坚持客观性……我的审讯有时会以争论‘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形式进行。”如果伯杰相信“党的真理必须适应客观真理，而不是相反，”他的审讯者则坚持，“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空谈。只有党的真理，这个真理必须压制所有其他真理。”¹⁷ 斯大林的审讯者们部署了一种积极的真理观念，并准备公开捍卫它。将他们描绘成言行不一的犬儒主义者，是忽略了革命话语在制造大清洗现实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忽视官方的真理机制，我们就回避了产生大公安脚本的体裁，并将这个充满价值的脚本——无论按我们自己的标准多么病态——变成病态想象的产物。那种仔细比较坦白叙述与其他可用记录的方法，肯定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经典区别：“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一个写散文另一个写韵文，那样它仍然是历史的一个样本；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另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这一引用出自（《诗学》，1451b），为每个坦白补充一个批判性的后记，纠正扭曲并填补空白，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坦白主体生活的准确重建。¹⁸ 然而，将真理特权化为历史准确性——这种方法未能认识到真理是一种建构。福柯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它所接受并使其作为真理运作的话语类型；区分真假陈述的机制和实例，以及每种陈述被认可的方式。”¹⁹

大清洗时期的话语体系通过将生活叙事相互对立并权衡其作者道德品质的方式，生产关于自我的真相。真相关乎自我的诠释学，而非简单的事实查明程序。若严肃对待共产主义忏悔——即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即便是荒诞内容也能成为真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事实与虚构的差别。这仅意味着，我们追寻这种差别的根源不在超历史的本体论中，而在话语中；就我们而言，正是在迫使被告修改、简化乃至彻底更改供词的动态条件中。

当被告在大清洗期间诉求真相时，灵魂的真相在他们眼中远比具体指控罪行的细节更为重要。斯大林主义司法系统的运作可被解读为对另一种证据的追寻——一个人是否与历史同向而行？是否与党同向而行？这些才是关键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并非违反法典，而是公开拒斥法典，认为其不适用于反革命斗争——这种斗争首先被理解为思想犯罪。他们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尽管对当代读者而言可能显得怪异：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普遍阴谋的存在更真实了，这是一种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谋划，而非必然实现的事实状态），并设计出一套自创的获取真相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被告施加道德压力乃至酷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官依据二元原则重构了灵魂诠释学。1930年代初期旨在确立个体与光明距离的复杂技巧，如今让位于更简单的程序。诠释学变得直白且极度重复：直白是因为真相浮于表面，重复是因为人只分善恶两种。共谋的灵魂立即可辨；而供词——如同环绕邪恶标记的同心圆——完全可以由审讯者捏造。

关于供词真实性的外部追问使我们自身成为诠释者，或许最好避免这种做法。当我们对供述主体的真诚度形成自己的判断时，无意间便成为斯大林主义灵魂审判事业的共谋者。坚持追问证词是否准确描述当事人，源于这样一种假设：谈论自我时，人便揭露了自己的道德本质。有时真实自我完全显现，有时则被隐藏，但它始终存在，藏匿于语言之下，渴望被发掘。然而，当以规范主体的标准评判历史行动者时，我们仍被困在摩尼教伦理中，只是颠倒了其结论：斯大林主义者显得道德破产，而反共的道义抵抗者则被授予英雄桂冠，因其成功保全了人格完整。²⁰

但大清洗多数受害者在被捕前夕也曾揭发他人，这一事实使得义人与罪人的区分变得可疑。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走上绞刑架前，也曾帮助为同志和朋友钉上棺木。以下是皮达科夫在1936年审判中对其前托洛茨基派友人的评价：

“这些人丧失了最后的人性，必须像污染我国清新愉快空气的腐肉一般被消灭。”²¹ 六个月后，皮达科夫本人被捕入狱。此时轮到另一位反对派知名人物李可夫诋毁他——“皮达科夫是个伪君子[*litsemer*]”且是“托洛茨基分子败类”——然而这种人格谋杀并未挽救李可夫，他不久后也遭

逮捕。²² 布哈林加入了对老近卫军的贬损行列。他宣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令他作呕。至于加米涅夫，“这是所有人中最卑劣的”。不出一年，布哈林本人便遭指控处决，留待后世裁定他是刽子手还是殉道者。

叶若夫人格的急剧堕落，无疑为他 1939 年的逮捕和 1940 年的处决提供了正当理由。²³ 这位不久前还执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此时因腐化堕落、破坏活动及一系列其他反革命罪行遭到定罪。²⁴ 以 1930 年代末期的视角观之，叶若夫可谓恶贯满盈。但当改革时期来临，斯大林式正义的声誉大打折扣。曾经的罪人变为无辜者，司法系统涌入大量平反请求，其中也包括叶若夫的家属。“叶若夫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也是其受害者之一，”他的亲属声称，“他只是执行专政者的命令。”²⁵ 赫鲁晓夫早在 1956 年就提出过类似观点：“叶若夫或许无罪。他本是个好人。”真正的责任在于斯大林。²⁶

那么叶若夫是否应当同他著名的受害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同获得平反？当他实际受审时，这显然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改革时期的领导层仍坚持认为叶若夫是俄国史上最恶劣的罪犯之一，但支撑此观点的理由自然与贝利亚当年的说辞截然不同。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势首领，其罪责并非在机关内包庇反革命分子并密谋除掉斯大林——这是 1939 年的指控——恰恰相反，他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处决了无辜者。他理应经历第二次审判以洗刷旧罪名，再经历第三次审判以确认其践踏司法准则、迫害无助民众的罪行。立志塑造国民历史记忆的法学家们或许愿意深思这种复杂的法律程序。但历史学者是否应当重建正确的语义体系，将施害者称为受害者、受害者称为施害者？至少在当前讨论的案例中，这种方案显然行不通：与此前的皮达可夫、拉狄克和布哈林极为相似，叶若夫既是施害者亦是受害者。

以考察大清洗如何建构叶若夫的自我意识来结束本研究或许恰如其分。贝利亚审讯人员对叶若夫的塑造背后藏着一个故事，但若我们沉溺于非历史化的道德说教，便无法听见这个故事。

叶若夫倒台的原因在此无法详细探讨——这些问题已由苏联政治研究者仔细审视过。我对针对叶若夫的指控的真实性也避而不谈。事实上，审讯材料越是荒诞不经、丑闻重重，就越能告诉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想象力——而这正是我在此试图

理解的。将审讯记录作为虚构作品、作为创意写作的练习来阅读，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清洗诗学运作的²⁷关键。

叶若夫于1939年4月10日被捕，被关押在莫斯科郊外的苏哈诺夫卡监狱，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押“特别危险的人民敌人”的监狱。²⁸ 他的审讯者是国家安全中尉叶绍洛夫和国家安全上尉罗多斯。²⁹ 叶若夫的调查卷宗包含十一卷，充斥着这位被降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领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有罪证词；五十八名证人被询问。档案中还包含一些审讯记录，充满了惊人的供词。因此，我们了解到在1939年7月21日的审讯中，叶若夫承认他为德国、波兰、日本和英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而在1939年8月2日，他透露了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组建的恐怖小队的组成。³⁰ 据称，他和他的助手策划了1938年11月7日的政变计划：几起打击将针对出席莫斯科红场十一月庆祝活动的国家领导人。³¹ 如果这还不够，贝利亚还将叶若夫描述为一个“右派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和间谍组织”的积极参与者。³² 从审讯记录的页面中，对整体人格的全面谴责跃然纸上。叶若夫不仅仅是叛徒和破坏者——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恶劣的作恶者。

最重要的是，叶若夫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性狂热者。他性选择的惊人随意性和关系的短暂持续时间表明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当然，布尔什维克的堕落并不是新鲜事。早些时候，党遗憾地看到许多党员对社会主义建设失去信心，陷入放荡。³³ 但叶若夫的性丑闻并不表明性格弱点。相反，它们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怪物的形象。他无法被治愈或再教育，只能被消灭。

叶若夫的同性恋习惯在审讯记录中尤为突出。在1939年4月24日的审讯中，他作证说他“长期的恶习——鸡奸”。有充分的理由让他说出这番供词。在他被捕和处决前不久，当他仍是一名重要立法者时，克雷连科在同性恋和反革命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的主顾是谁？他们是工人吗？当然不是。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或剥削阶级的残余。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就去搞鸡奸。”³⁴

叶若夫承认了他最近与朋友杰缅季耶夫的与男童性关系，杰缅季耶夫是列宁格勒斯韦托赫工厂的警卫副主管。杰缅季耶夫在1938年10月访问莫斯科，当时叶若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娅在克里米亚度假。他于11月的第二周返回，并住在叶若夫的公寓里直到12月初，与被告发生性关系在定期进行。据杰缅季耶夫供述，他和叶若夫“从事鸡奸活动”——或换一种说法，“最变态的淫乱行为”。还添加了刺激性细节：例如，叶若夫因“杰缅季耶夫未佩戴假牙而欣喜若狂，并反复将阴茎插入其口中”。³⁵

该被告还供述，他与另一友人康斯坦丁诺夫（一名红军政工人员）几乎同时保持着鸡奸关系：“1938年，应我的邀请，他经常留宿我的公寓，并曾两三次前往我的别墅。我们当时发生过两次鸡奸行为。”³⁶ 一天晚上，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听了一会儿留声机，然后准备睡觉。科斯坦季诺夫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他刚脱完衣服，叶若夫就“躺在我身边，提议进行鸡奸。”科斯坦季诺夫拒绝了，叶若夫便回到了自己的床上。但就在科斯坦季诺夫快要睡着时，他“感到嘴里有东西。当我睁开眼睛，发现叶若夫把他的生殖器塞进了我嘴里。”科斯坦季诺夫跳起来，骂了他一顿，把他推开，但叶若夫又“带着下流的提议”爬向他。³⁷

最终，康斯坦丁诺夫屈从于叶若夫的恳求。他是受害者，但又不完全是：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脑对其友人拥有某种奇异的控制力；他们的意志被麻痹了，通常只能顺从他的要求。叶若夫常声称他的同性恋情是“相互主动的”（*vzaimnoaktivnaia*）；现在这一边，现在那一边被穿透了。他的性关系大多是相互的，这使得任何试图将被告分类为发起者、贪得无厌的卡萨诺瓦或自我物化的小资产阶级娘娘腔的尝试都失败了——他两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者的脚本描述了施虐受虐的同性友谊，在这种友谊中，亲密关系没有被废除，而是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爱似乎建立在狡猾、强迫和羞辱之上。仔细审视，叶若夫并不完全是一个施虐狂，因为施虐狂需要意志和力量的战斗，这一切都发生在线性时间中，有开始和结束。叶若夫的受害者最终接受他的侵犯，因为他们共享他的道德憎恶，这是人民的敌人的典型特征。这个恶毒的社群建立在谎言、狂欢、暴力和其他怪癖之上。

叶若夫的同性恋倾向绝不排斥女性，甚至并未以牺牲与女性的性关系为代价。女性只是一种平行的爱好，两者互不干扰。叶若夫承认，当“（康斯坦丁诺夫）带着妻子来我的公寓时，我也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康斯坦丁诺夫证实了这一证词。有一次，他被告知要带上妻子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喝了大量酒后，在沙发上睡着了。那天晚上叶若夫没有打扰他——他看上的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当康斯坦丁诺夫在凌晨一两点醒来时，管家告诉他卡捷琳娜在叶若夫的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她头发凌乱地走了出来。当夫妇俩回到家后，卡捷琳娜哭了起来，告诉丈夫叶若夫的行为像野兽一样。当科斯坦季诺夫躺下时，叶若夫开始和她跳狐步舞。跳舞时，“他强迫她用手握住他的生殖器。”跳舞结束后，他们坐在桌旁，叶若夫“掏出他的生殖器……强奸了她，撕破了她的内衣。”第二天晚上，他告诉科斯坦季诺夫，他和他妻子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她“虽然可能年纪大了些，但还算是个不错的妻子。”³⁸

叶若夫的大部分性接触发生在工作相关情境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竭尽全力破坏无产阶级集体的健康。他的性放纵行为象征着外来分子的渗透——无论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叶若夫在描述其关系时使用的“联络”一词，将其恶行从医学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通过灌醉这对夫妇并轮流侵犯丈夫和妻子，叶若夫将不道德行为带入康斯坦丁诺夫家庭。叶若夫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不断背叛妻子，而妻子则与她的上司谢苗·乌里茨基、以及著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保持着性关系。

叶若夫的情妇名单显示其性欲极其旺盛。1934年春，他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职员塔季扬娜·彼得罗娃发起追求。他还与叶夫根尼娅·波多利斯卡娅有染，后者是苏联驻华沙全权代表的妻子，叶若夫在1931-33年间与她熟识。叶若夫与塔季扬娜很快开始“同居”，这段关系持续到1936年11月塔季扬娜被捕。叶若夫甚至侵犯了她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以提供庇护为条件（女孩几乎算孤儿，因父亲不得离开华沙岗位）要求她与自己发生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主动引导她进入同居关系”，这很可能指他对其实施了鸡奸。³⁹

叶若夫的供词将叙事性与性欲相关联，却使两者都失去了意义。通常，性与叙事相互促进，推动情节发展。⁴⁰性的艺术在于通过延迟高潮来延长愉悦行为本身：“当我们仅从形式上审视小说时，会看到一套趋向高潮与解决的事件模式，并被另一套旨在延迟此高潮与解决的事件模式所平衡。”⁴¹然而审讯记录中运作的叙事学想象却短路了这种逻辑。性欲并未发展，供词具有极端重复性。通过将叶若夫多样化的性行为压缩为不变的图像，审讯记录忙于分类而非讲述故事。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的放纵与堕落，被简化为一套指向彻底反革命分子的符号系统。

突显了乌托邦向反乌托邦转变的轻易性，叶若夫的放纵成为恶意共同体战胜个体的例证。1930年代初期的敌人无法调解其孱弱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人，太人性了。相比之下，1930年代末的敌人则是自动机器。随着乌托邦时代的降临，所有调解其利己冲动与集体需求之间的中介已被抹除。人格失去了相对自主性。叶若夫那种机械式的征服欲令人产生诡异之感。被告并非完整的人：一方面，他是表现得如无生命机械玩偶般的真实个体；另一方面，他是假装存活——行动、威胁、哄骗——的无主体机制。

叶若夫的性行为中毫无色情意味。色情需要欲望主体，需要幻想与现实间的某种距离，而在大清洗的语义体系中这种距离不可能存在。叶若夫关注数量而非质量。他的性消费如此缺乏激情，甚至不总是亲自挑选情爱对象。据其证词，其侄子阿纳托利亚常为他“召来”女子：外贸人民委员部职员彼得罗娃、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厂职员沙里奥娃、水运人民委员部职员谢玛等等——全都被迫与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共度良宵。⁴²

叶若夫与所有人发生关系，任何时候、以所有可想象的方式。他与有夫之妇、妓女、年轻女孩同眠；与同性恋及异性恋男性同眠；当着伴侣的面或单独进行。他的性征服有时基于同意，有时基于强迫——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事实上，审讯记录并未强调鸡奸或强奸甚于其他恶行，而是作为恶行大全发挥作用。叶若夫既非通奸者、恋童癖者，亦非同性恋者。他是所有也是虚无。其选择的全然矛盾性才是突出之处。具体反常行为并不重要，正如他是德国、拉脱维亚或日本间谍——或同时是所有间谍——都无关紧要。

因此，他沉迷酒杯，严重酗酒。他的亲属证实，他经常在家中或乡间别墅与朋友及同僚大量饮酒，而这些朋友和同僚后来均被“揭露”为人民的敌人。叶若夫还在办公室举行“饮酒狂欢”，通过警卫部门订购葡萄酒和白兰地。他的密友之一是费奥多尔·科纳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同僚，此人很快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判处死刑。叶若夫承认：“科纳尔和我总是在他带到公寓的妓女陪伴下饮酒。”⁴³ 在他失势后不久，斯大林告诉他的保镖：“醉鬼叶若夫……在醉酒状态下，签署了逮捕那些常是无辜者的名单，而这些名单是被人塞给他的。”⁴⁴

然而在审讯笔录中，酗酒并未被视为一种动机或借口，而只是作为又一项恶行。由于叶若夫的证词缺乏叙事，各项恶行相互类比，而非互为因果。邪恶人格是一种被表演出来的东西；事件并不塑造叶若夫，而仅仅揭示他。思想及其所导致的行动，在本世纪早些时候对共产主义忏悔叙述如此重要，在这里却变成了透明的过程，因为行为——无论是欺骗、强奸还是酗酒——仅作为例证，而非解释。笔录对动机、快感、政治图谋的细节吝于描述。没有人试图理解被告为何要做那些病态之事。他的人格毫无深度。这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木然摆动的木偶，一个放纵无度的享乐主义者，不断地行动，侵犯某人，背叛另一人，毫无理由或悔意。他不反思，不感受——他只行动。

叶若夫试图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心理问题。1938年11月，他向斯大林抱怨：“过去两年紧张、高度紧绷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的整个神经系统。所有感知都变得敏锐，并且出现了疑病倾向[*mnitel' nost'*]。”⁴⁵ 他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也在1939年11月17日向斯大林坦白，她再也无法承受指控：“医生能治好这因多年失眠而紧张的神经，这疼痛的大脑，这不知如何摆脱的深重精神痛苦吗？我感觉自己像个活死人。我该怎么办？”两封信都石沉大海。⁴⁶ 神经衰弱、抑郁、神经疾病——这些通常能推迟判刑的情绪崩溃——在1930年代末期全都被驳回。

说当局对叶若夫的情绪不感兴趣并不准确。专家意见认为，情绪非但没有削弱心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自觉的。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出现，心智与身体坍塌为一个整体；专家们坚持认为，“精神”不存在于“身体之外或超越身体”。⁴⁷ 一旦意识与作为情绪载体的身体之间任何有意义的区分被取消，一方作用于另一方的观念就必须被摒弃。叶若夫感受到的一切都会立即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反之亦然。在一个反革命的反乌托邦中，不可能有别的样子。一个没有相应心理体验的身体事件，会削弱这位邪恶天才的“全意识”，并为辩解开脱提供可能。相反，邪恶心智设想的一切都会立即实现；身体瞬间显现所有险恶图谋。

叶若夫的性格缺失标志着心理学的废除。在一个彻底物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只不过是集体的一个功能，恶行不会以满足自私幻想的形式出现。相反，叶若夫是被迫屈服于诱惑。他盲目、自动、强迫性的行为并不使他显得纵情或玩世不恭。相反，他遵循着一个比他自身强大得多的命令，一个由托洛茨基或其他反革命领袖制定的命令——摧毁、破坏、背叛！

叶若夫不是一个审美者，一个在瞬间享受中实现其天性的主体。他的放荡过于系统化且狂热。尽管知道等待他的是枪决队而非感官满足，他仍加强其放荡活动。如果他关心保命，本可以利用最后的自由时刻忏悔，从而有助于他未来的辩护。但叶若夫宁愿坚持其放纵，由此证明这不是个人怪癖，而是一种伦理态度。

被告受无私的、无动机的、彻底的恶所驱动。在任何可想象的方式下，对任何个人，无论何时何地有机会就作恶，叶若夫不致力于任何意识形态，甚至不致力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1939年，反对派主义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而七八年前它曾是。据斯大林所言，“托洛茨基主义已成为那些无耻的破坏者和怠工者将身心出卖给法西斯的代名词。”⁴⁸ 虽然克雷连科相信“托洛茨基将以集人类想象力所能及的所有最卑劣、最无耻罪行于一身的恶魔形象载入史册”，米高扬则否认托洛茨基的下属是人类：“托洛茨基孕育了一种新型人类——一个伪装成人的怪物。”⁴⁹ 当然，这些称号是在叶若夫掌权时喊出的，但它们所唤起的邪恶概念现在被应用于受审者叶若夫。他妻子的一位老朋友季娜伊达·格利基娜将他妖魔化：“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也失去了一个人的样子。”⁵⁰

在党自认为认识另一个叶若夫——一个忠诚而有觉悟的叶若夫——的程度上，它只是天真了。确实，在1920年代，他享有“善良细心、没有傲慢和官僚作风的人”的名声。⁵¹ 他的党内同僚形容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人道、温和、得体的人。”⁵² 但现在，随着历史走向终结，真相大白，党的诠释者们意识到他们错得多么离谱。邪恶的个体一直都是邪恶的：他们只是设法欺骗了党很长时间。

例如，叶若夫的鸡奸癖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的供词写道：“大约从十五岁到十六岁，我在同一家裁缝店与同龄学徒发生过一些性变态行为。这一恶习在旧沙皇军队的前线条件下再次出现。除了与我们连队一名士兵的偶然关系外，我与列宁格勒的某位菲拉托夫（他在同一团服役）也有过关系。”当叶若夫于1919年担任无线电报部队第二基地政委时，他让某个安托申担任秘书，并与他建立了“双向积极的鸡奸关系”。

“1925 年，哈萨克斯坦首都从奥伦堡迁至克孜勒奥尔达，我也前往那里工作。不久，Ф. И. 戈洛谢金（新任首席仲裁员）作为省委秘书抵达。他以单身身份到达，没有妻子，我也过着单身生活。在我前往莫斯科之前（大约两个月内），我实际上搬到了他的公寓，并经常在那里过夜。不久，我也与他建立了鸡奸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我离开。”苏维埃共和国的广袤空间变成了普遍的内部景观，一个体面与纯洁的战场，其中可悲的结局早已注定，时间仅仅是纪年标记。

虽然口供中仍残留着对传记的兴趣，但这已不再源于内心可能发生真正改变的预设，而是源于一种信念：一个人长期的行为揭示了其道德内核。对叶若夫过去的调查以惊人的细致程度进行，但这种兴趣反映了一种信念：如果叶若夫在 1939 年是恶棍，那他必然一直是恶棍。共产主义话语总是在自由意志和预定论之间摇摆不定，始终未能超越“邪恶是内在特质”与“邪恶是自由选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但在叶若夫受审时，决定论立场已明显增强。在普世救赎的故事（其内含发展元素）背后，斯大林主义的审讯者挖出了一幅冻结的人性自我图景。即使叶若夫确实拥抱邪恶，他也是在如此早的年纪就投下了骰子，以至于追问这是蓄意选择还是预定行为已毫无意义。既然肉体已与心灵融合，肉体同样应受谴责。

身心俱已变态的叶若夫被描绘成近乎精神错乱。据一份证词称，当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部职务后被调往水运人民委员部，当在那里召开会议时，他一言不发，只是折纸飞机，抛向空中，然后爬到桌子椅子下面寻找。⁵³ 在搜查他的公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人员发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四颗溅血的子弹，子弹用纸包裹，纸上写着被其夺去生命者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两颗子弹）。只有完全怪物般的人才会在直接工作职责之外目睹处决，然后将其作为战利品收藏。⁵⁴

关于叶若夫与苏联国家银行行长、其长期酒友列夫·叶菲莫维奇·马利亚辛的恶作剧的描述，也指向他自我中某种怪异的倾向。叶若夫和马利亚辛习惯组织比赛，看谁在脱掉裤子蹲下时，能更快地通过放屁吹走一枚硬币上的一把烟灰。⁵⁵ 叶若夫和马利亚辛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吗？一方面，他们狡猾且工于心计。

另一方面，他们又幼稚且疯狂。他们怪异的亲密并未阻止叶若夫在马里亚辛于1936年12月被捕后下令对其施以酷刑。据报道，他吹嘘道：“我命令[他们]割掉他的耳朵和鼻子”并“挖出他的眼睛。”显然，叶若夫赢得了那场游戏。⁵⁶

关于叶若夫最后时刻的谣言充斥着淫秽与邪恶的形象。从权力巅峰跌落，虚弱到面目全非，这位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既可怜又可笑，但不知何故仍非常危险。有传言称他酗酒至精神失常，被送往喀山的一家精神病院。其他故事声称叶若夫被关进暴力病房，被锁在墙上。还有人说他上吊自杀，并在胸前别了一张纸条：“我是狗屎[я г о в н о].”⁵⁷

那些与他共度最后时刻的人，或至少声称知晓内情的人，散布着发展这一自我贬低主题的谣言。叶若夫一再遭受羞辱。他被扒光衣服带到监狱走廊，走过一排他昔日的下属。一名狱警打了他。其他人也跟着动手。叶若夫被拳脚相加，押送人员用枪托猛击他的背部。这名死囚不停地尖叫，一度倒在石板地上，但仍被拖向行刑地点。根据另一个同样不足为信的故事，身材极其矮小的叶若夫从行刑室的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躲闪着子弹，直到最终被击倒。⁵⁸

但更可能的是，叶若夫高昂着头颅死去，作为一名骄傲的共产主义者。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述——我们关于其最后时刻的唯一确凿证据——中，叶若夫仍然是官方语言的承载者。“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被保全，这只能怪我自己，因为在预审中我崩溃了，”他在结尾处说道。“请告诉斯大林，我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成千上万了解我认真和谦逊的人将证实这一点。也告诉他，我将口呼着他的名字死去！”⁵⁹他以类似的笔调致信贝利亚：“拉夫连季！尽管对我的结论严厉，这些结论是我应得的，作为党员我有责任接受，但我诚实地向你保证，我将对党和斯大林同志忠诚到底。你的，叶若夫。”⁶⁰

无论生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在自身之外寻求价值。

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重复性的坚持——审讯近乎仪式性的特质，旨在使被告的言辞意味着它们本不意味的东西——与人类学家描述的全球各种仪式中的魔法程序非常相似。象征性的过程，如同魔法技术，作用于语言并通过语言运作，它们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合作。⁶¹ 审讯者的话语中蕴含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望，正是这种绝望，为了挽救他们所信仰之物

正是这种窘迫，使他们与被告产生了奇异的贴近。扎伊采尔、普列德、布哈林和叶若夫最终似乎设法扭曲事件与言辞，使其符合审讯者所期望的意义，从而将各自的审讯推向斩钉截铁的结局。为已知之事寻找证据，令人联想到古典巫术指控的记述：关键不在于某个具体行为的真实性，而在于某种宇宙观的“真理性”，或可称之为“真理的真理”——它已陷入怀疑，需要被挽救、净化与恢复。⁶²

审讯仪式弥漫着焦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话语必须找到其对象。正如萨特所观察到的：“无论受害者是开口，还是在痛苦中死去，他无法透露的秘密总在别处，遥不可及。真正成为西西弗斯的，是行刑者。只要他提出问题，他就必须永远继续下去。”⁶³ 内务人民委员部需要认罪口供，不仅是为了使其判决合法化，更是为了从被告口中公开确认：官方所认定的罪行或异端，同样被罪犯本人所承认。如果异端分子承认其行为是异端的、犯罪的、错误的，他的判决就成为一种净化，一次对真正信仰的重新确认。如果没有，他的判决就仅仅是个人的惩罚。没有供词，剩下的只有起诉和定罪。而有了供词，无论多么逼供，剩下的便是以共产主义之更大荣光进行的揭露。⁶⁴ 被告身上的“恶”必须被“再认知”——即认知第二次，并公开重申——如此，随之而来的处决才能作为治疗手段产生效力。仅仅处死某人是不够的，因为反革命意识可能会逃脱死亡——敌人死了，但他邪恶的思想照旧流传。

为了防止革命的“真理”误入歧途，这些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风格中昭然若揭的仪式行为，提供了一种技术，用以恢复那些已变得模糊、可疑的事物。牺牲者被反复诉说，直至社区中必须被清除的那部分在他身上显露出来（牺牲性的认同），甚至让他自己也相信他就是那个“东西”；唯有如此，他才会被处死。这是最高的赎罪行为——必须被清除的东西被清除了。关键不在于罪行本身，而在于被告这个人，他被迫代表那“罪行”所指涉的一切。这一切的机制化随意性令人惊异：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选择受害者时，并不采用传记逻辑、民族逻辑，甚至阶级逻辑。坚持将“恶”认同于某个人，然后通过杀死那个人来清除他所体现的恶，这种赎罪逻辑表明了共产主义兄弟情谊与其受害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同许多仪式性牺牲一样，牺牲者选自共同体内部深处。因为牺牲总意味着损失，受害者必须是内部人。唯有如此，赎罪才能成功达成——净化必须带来伤痛才有效。⁶⁵

赎罪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被告似乎也屈服于它（“告诉他，我将口念他的名字而死！”的母题）；自我牺牲作为一种净化形式，起着清洁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通过这样做，被告试图将自己的死亡转化为生命与不朽，如同在真正的宗教牺牲中那样。受害者相信他的死亡是一种牺牲，而非仅仅是谋杀，因此即便在临死之际，也拼命试图重建与共同体的联系。这解释了被告缺乏抵抗的原因——人们不会质问女巫为何不组织起来抵抗谴责她们的社区。这类问题会是荒谬的，正是因为女巫认同的是承认她是女巫的那个共同体，而非她自己那个强大却完全异己的邪恶自我。

然而，我们不应匆忙地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归入对仪式的经典描述之下。在传统的牺牲仪式中，总存在剩余：尸体必须被分食，受害者的财产被分配，其记忆被培育。祭司分发祭品的残余，而共同体则摄入这些残余。斯大林主义的情况则不同，因为反革命者的死亡从未被充分话语化。共产主义拒斥神圣，因此难以将死亡象征化为净化。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并非被献祭给真理。他们被当作替罪羊，变成了 *pharmakos*——一种既神圣又亵渎的生物。如果献祭给神灵的动物必须是纯洁的（祭司会确认它没有疾病或缺陷），那么替罪羊则处于法律之外，因此不能被献祭，只能被随意处置。⁶⁶ 主权者的领域是一个允许杀戮而不被视为暗杀或献祭仪式的领域——斯大林可以允许反革命分子在苏联法律秩序臻于完善、死刑被胜利废除之际，接受法外审判并被处决。⁶⁷

在希腊世界，*pharmakos* 被用于仪式化的城邦净化。它可以是人、公鸡或狗。人们相信 *pharmakos* 吸收了所有的污秽和邪恶，并随他在火中一同死去。完全被非人化的反革命分子，与野兽有许多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敌对领袖被描绘成蛇和野狗。替罪羊的符号学基于边界被侵犯、污染传播的观念。而该仪式旨在将污染驱逐出去。⁶⁸ 这种通过替罪羊连接内部与外部的关联，使替罪羊成为一个中介，但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牺牲品。

如果牺牲是奉献给神灵的，并旨在实现凡俗与神圣之间的直接接触，那么替罪羊则不充当与神灵沟通的来源。它被驱逐，被抛入大海，被——

尽可能地放逐到远方。⁶⁹ 替罪羊被消灭，不是因为它的死亡是赎罪，而是因为它已被污染和禁忌——最好是结束这种生不如死的生命。⁷⁰ 在官方文献中，反革命分子被不同地描述为“污秽的”（*pogannye*）和“有害的”（*vrednye*），他们被系统地“根除”（*vykarchevyvat'*）⁷¹。我们这里涉及一种特殊的象征技术——如果说创造新人的努力通常通过建设性的隐喻来表达，那么对邪恶的顽强攻击则被视为一种宏大的预防措施。⁷² 列宁曾写道“从俄国土地上清除一切有害的昆虫”。⁷³ 沃罗希洛夫在 1938 年末的私人笔记中亦写道：“因干部在政治与道德上遭到污染[*zagazheny*]……我们必须切除感染的肢体……所有令人作呕的、背信弃义的腐烂部分都被清除。”⁷⁴ 这预示着对共产主义政体作为“园艺国家”的定性，《列宁格勒真理报》在 1936 年 8 月承诺：“我们将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败类连根拔起。”⁷⁵ 在自我否定的至暗时刻，反对派领袖尼古拉·穆拉洛夫认同这种意象：“倘若我当时未坦白，自己就会沦为滋生毒枝的根茎。”⁷⁶

归根结底，内务人民委员部清洗运动的谜题乃是超越性之谜。若我们相信审讯与定罪具有超越性质，此即牺牲；若不相信，则仅为彻底灭绝。公审期间考量的核心问题是：被告将在行刑这一戏剧性癫狂中重获象征地位，抑或永远滞留于凡俗领域。通常，被告会尝试以共产主义者的方式行事，将自身塑造为事业殉道者。而斯大林及其副手们则竭尽全力将他们描绘为替罪羊（*pharmakos*）——一种必须被清除的危险生物。

某种程度上，大清洗时期的修辞交锋实为叙事形态之争。被告试图以悲剧语调言说，将注定的死亡阐释为充满意义；控方则坚持喜剧化处理，将被告描绘得滑稽可笑，其死亡宛若笑话。正如昆德拉所评论的：此处喜剧摧毁了悲剧，“从而剥夺了受害者唯一可寄望的慰藉——那种蕴含于悲剧（真实或臆想的）崇高性中的慰藉”。⁷⁷ 被告被剥夺人性后，先失尊严，再失性命，而周遭众人皆在哄笑。斯大林时期的检察官拒绝赋予被告作为受害者的尊严。被告必须如腐肉般死去，如疯狗般毙命。因此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将被告描述为“狂吠如象的哈巴狗与幼犬”，并要求“将这些疯狗全部击毙！”⁷⁸

大清洗期间，被判刑者任何重获象征意义的尝试都遭到激烈驳斥。他们被禁止在临终时刻向斯大林致敬。必须在 30 年代末期斯大林救世论符号体系消解具象表达的背景下，审视反革命者死亡中象征维度的缺失。由于具象表达不与现实直接对应，因而可能蕴含矛盾多重含义，而党的敌人之死必须被具象化地执行。反对派成员被简化为纯粹肉体——一个吸纳污秽、并以死亡带走污秽的替罪羊（*pharmakos*）。或许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热衷枪决的原因。当沙皇政权判处恐怖分子死刑时，采用绞刑。绞刑是种体面的处决方式。鼓点为行刑注入某种庄严感。刽子手会与受刑者建立接触——是他而非受害者将绳索套上脖

颈。而枪决则涉及一种可鄙的疏离。被清除的他者化——它必须被置于远处，不可触碰。

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37年6月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会上预言：“党将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腐肉从地球表面彻底抹除。我们将毫无痕迹地歼灭所有敌人，直至最后一人，并将他们的骨灰〔尘埃(俄语: *п п а х*)〕撒向风中。”⁷⁹ 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得而知，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圣经色彩。它不仅让人想起《旧约》中“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的经文，也呼应了《公祷书》中的著名短语——“尘归尘，土归土，灰归灰”。若按照彼得·斯坦纳的分析，俄语习语 *pokoi prakh* 大致等同于英语表达“安息吧”，那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党内敌人发出的威胁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别指望继续活着，也别指望获得体面的死亡。事实上，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从不单独埋葬受害者，而是将尸体堆叠在集体坟墓中，或者在处理显要人物时将遗体火化。⁸⁰

注释

注释中使用的缩写

PANOPartiinyi arkhiv novosibirskoi oblasti（新西伯利亚州党档案馆）

RGASPI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 no politicheskoi istorii（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RNBRossiiskaia Natsional’ naia Biblioteka（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TsGA IPD Tsentral’ny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istoriko-politicheskikh dokumentov（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

导言

1. 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组织方式，参见 W. Chase，“Stalin as Producer: The Moscow Show Tri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Threats”，载于 S. Davies 与 J. Harris 编，《**斯大林：一部新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 年），226-248 页；W. Hedeler，《**1936、1937、1938 年莫斯科审判编年史：策划、呈现与影响**》（柏林：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

2. S. Kotkin，《**磁山：作为文明的斯大林主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 年），333-335 页。

3. I. Deutscher 与 D. King，《**大清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年）；A. Getty 与 O.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

4. 《**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关于其形成史的探讨**》（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9 年），88 页。

5. N. Werth，《**莫斯科审判**》（布鲁塞尔：Complex 出版社，1987 年），132-133 页。

6. N. Valentinov，“皮达可夫笔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新杂志**》第 52 期（纽约，1958 年），148 页。

7. 我这样说是因为维辛斯基搬进了托洛茨基在格拉诺夫斯基街的公寓，以及在托洛茨基于 1927 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之后，同一个维辛斯基在谢列布里亚科夫于 1936 年被捕后接管了后者在尼科林斯卡山上的别墅。N. 泽恩科维奇，《**最封闭的人们**》（莫斯科：奥尔玛出版社，2002 年），100 页。关于共产党人作为无私革命者的自我认知，参见 M. 史密斯，“斯大林的烈士：俄国革命的悲情浪漫”，**极权主义运动与政治宗教** 4，第 1 期（2003 年）：95 - 126 页。

8. *致权力的信：1928-1939年*（莫斯科：ROSSPEN出版社，2002年），316页；尤·斯泰索夫斯基，*苏联镇压史*（圣彼得堡，1997年），第2卷：203页。
9. S. 齐泽克，*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享乐作为政治因素*（伦敦：Verso出版社，1991年），261页。
10. 关于废除旧法律及以革命需要为此措施辩护，参见*工农政府法令和命令汇编*，第90期（1918年）：908页；P. 斯图奇卡，“无产阶级革命与司法”，*无产阶级革命与法律*，第1期（1918年）：43页；V. 列宁，*全集*（莫斯科，1963-77年），第37卷：130页。
11. J. 比灵顿，*人们心中的火焰*（纽约：Transaction出版社，1999年）；A. 迈耶，*复仇女神：法国和俄国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L. 托克，*从群岛归来：古拉格幸存者的叙述*（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7-8页。我从莱昂娜·托克的见解中获益匪浅，她帮助我概念化了斯大林主义古拉格的独特性。
13.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无产阶级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人生来所属的社会地位。任何接受无产阶级观点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反之，如果工人的意识不成熟，即使手上长满老茧也会被拒之门外）。这种包容性——只要申请人全心全意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普世主义的信条，对所有人开放。
14. I. 哈尔芬，*我灵魂中的恐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24-25页。
15. 7. A. 阿法纳西耶夫，编，*他们没有沉默*（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369页。
16. 在英语书籍中复制俄文名字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共产党人的名字被用作类型时，有时似乎最好省略名字，即使我们知道它们，以便我们记住那些名字所承载的神话色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等，被视为非凡人物，而不是实际吃饭睡觉的人。托洛茨基同样是超人，只是极其邪恶。在许多情况下，来源中没有出现名字；我们有的是“同志”（*tovarishch*）这个和“同志”那个。党不太关心教名；重点是放在被选者的兄弟情谊上，而不是其个别组成部分。毕竟，党员们据说已经超越了他们的个人自我，并发展出一种相似的集体主义生活观。当教名出现在原始材料中时，它们的重新出现对相关人员来说不是好兆头。因此，克格勃档案通常包括全名，因为它们针对的是据称危险的个人，其身份必须无疑地确定。
17. G. 伯切尔、C. 戈登和P. 米勒，编，*福柯效应：治理术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
18. I. 哈尔芬，*从黑暗到光明*（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00年），39-84页；S. 汉森，*时间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制度的设计*（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39-46页。
19. K. 彼得龙，*生活变得更加愉快，同志们：斯大林时代的庆祝活动*（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H. 京特，编，*斯大林时期的文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
20. D. 霍夫曼，“地方层面的大恐怖：1936-1938年莫斯科工厂的清洗”，载于A. 格蒂和R. 曼宁，编，*斯大林主义恐怖：新视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163-64页。关于革命到来时刻的文化解读，

见 R. 考克斯，“所有这些是你的！苏联商业广告与社会空间的构建，1928–1956 年”，和 R. 泰勒，“但向东看，土地更加明亮”，均载于 E. 多布伦科和 E. 奈曼，编，《*斯大林主义景观：苏联空间的艺术与意识形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1. E. 图维森，“*共产党宣言的千禧年结构*”，载于 C. 帕特里德斯和 J. 维特里希，编，《*英国文艺复兴思想与文学中的启示录*》（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 年）。

22. 当然，任何语言都不能完全没有隐喻，但就斯大林主义演讲者声称直接接触现实而言，他们否认使用隐喻。关于隐喻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参见 G. 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年）。

23. 如果在 1930 年，新人正在建造中，那么到 1937 年，官方媒体坚持认为他“在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时代诞生了。”*列宁格勒学生*，1930 年 3 月 15 日，《*消息报*》，1937 年 10 月 6 日。关于新人的当代描述——能够攀登任何山峰的苏联英雄——参见其他人，如 B. 格罗莫夫，《*西比里亚科夫远征记*》（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34 年）；《*切柳斯金号船员日记*》（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34 年）；《*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史*》（莫斯科，1934 年）；《*我们时代的伟大飞行员*》（莫斯科：OGIZ，1939）。相关分析参见 J. McCannon 的《冲击北极：1932–1939 年苏联极地探险与公众对自然的想象》，《*人文地理*》第 2 期（1995 年）；V. Volkov 的《斯大林时代人格的领土征服与技术》，收录于《*文化研究*》（圣彼得堡：欧洲大学，2006 年）。

斯大林主义在文化取向上是后历史性的，以其古典形式的复兴而闻名。先锋电影转变为音乐剧；马列维奇的白上白圆圈变为符合文艺复兴美学的肖像画。在自我语言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现象。大清洗时期，正面个体被描述为德行高尚者，所使用的词汇连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也不会感到羞愧。作为道德正直典范的基洛夫被赋予“罕见的内在品质”。如果波斯图舍夫谈论“诚实的[*诚实的*]个体”，伊格纳托夫谈论“体面的人”（*体面的人*），那么赫鲁晓夫更喜欢“有能力的个体”（*有能力的人*）。反革命分子对自己不满，急躁不安，总是伸手去抓那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东西。相比之下，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平静的”（*平静的*）和“稳重的”（*稳重的*）。斯大林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扬·鲁祖塔克描述为“最沉稳的人”（*最沉稳的*）。其自我完整不可分割，共产党员是“目标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据著名苏联记者米哈伊尔·科尔佐夫所述，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尼古拉·叶若夫是一位“不屈不挠的[*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30 年代的斯大林政治局*》（莫斯科：AIRO-XX，1995 年），第 161、163–64 页；V. Sokolov，《*恐惧委员们：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莫斯科：AST Press，2001 年），第 28 页；A. Proskurin 编，《*归还的名字：两卷本政论文集*》（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9 年），第 2 卷：第 146 页。

24. A. Wachtel，《意义的空虚：普拉东诺夫与马列维奇中的无面孔性》，收录于 C. Kelly 与 S. Lovell 编，《*俄罗斯文学、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55、262 页。

25. 理想共产党员在《真理报》上被描述为“水晶般纯净”（《*真理报*》为“水晶般纯净”（*水晶般纯净*），敌人则为“邪恶的”（*邪恶的*）。1938 年 3 月 2 日。

26. 诚然，从灵魂被视为隐藏的时期到被扁平化的时期，其转变并非如此迅速，但篇幅不允许我在此重新探讨该主题。参见 Halfin，《*我灵魂中的恐惧*》，230–44。

27. M. Ryklin，《言语视觉的变体》，收录于 D. Ross 编，《*春夏之间：晚期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概念艺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8 页。

28.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咒语化话语”，参见 E. Naiman，《话语肉身化：苏联主体性建构中的疗愈与恐怖》，收录于 I. Halfin 编，《*语言与革命：现代政治身份的形成*》（伦敦：Frank Cass，2002 年），第 299 页。

29. 《*历史问题*》，第 1 期（1994 年）：第 22–24 页。

30. N. Cherushev，《*1937 年：红军精英在骷髅地：红军精英在骷髅地*》（莫斯科：Veche，2003 年），第 168 页。

31. Cherushev，《*1937 年*》，第 151 页；RGASPI，f. 17，op. 165，以及 f. 58，11. 18–20。

32. 《*社会与权力。30 年代：文献叙事*》（莫斯科：ROSSPEN，1998 年），第 193 页。

33. I. Halfin, 《布尔什维克的绞刑架笑声》, 《政治意识形态杂志》(2006年10月): 第247-68页。
34. M. Ryklin, 《恐怖的身体: 暴力逻辑的若干论点》, 《新文学史》24(1993): 57.
35. 《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材料》, 《历史问题》, 第8期(1993年): 第6页。
36. J. Siegel, 《命名女巫》(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15-16页。
37. P. Steiner, 《波希米亚的沙漠: 捷克小说及其社会背景》(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71页。
38. S. Žižek,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伦敦: Verso, 1989年), 第125-27页。
39. 当然, 弥赛亚式的语言并非完全实现的语言——没有任何语言有能力涵盖一切。相反, 此处该术语指的是一种关注其意图描述之现实整体性的语言。用 Ryklin 的话说, “(斯大林时代)在自身内部完全复制了一个世界后, 便不再需要任何外部事物。” Ryklin, 《恐怖的身体》, 第68页。
40. 在此我非常感谢 Katerina Clark 关于高度斯大林主义本体论中“‘现实’与‘虚构’趋同”的讨论。K. Clark, 《苏联小说: 作为仪式的历史》(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1年), 第151页。
41. “供认”是 *招供*(*承认罪行*) 的翻译, 而非宗教性的 *忏悔*, 因此它包含了一种解释的元素。尽管如此, 俄语术语是在讨论意图和动机的语境中使用的, 不仅仅是事实。宗教含义可以作为隐喻被援引。因此, 被捕的剧作家梅耶荷德在写给苏联政府首脑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信末写道: “这是我的忏悔[*忏悔*]。遵循惯例, 我可能在临死前一秒做出。我从未当过间谍, 从未参加过任何托洛茨基组织(我随同党诅咒了犹太托洛茨基!), 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 B. Sopel' niak, 《分期付款的死亡》(莫斯科, 1998年), 第254页。
42.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捏造事实的前身可追溯至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动, 参见 K. Morozov, 《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与监狱对抗: 1922-1926: 对抗的伦理与策略》(莫斯科: ROSSPEN, 2005年), 第186页; 引言部分, 收录于 Zh. Alferov, V. Leonov 等人编, 《1929年的学术案件》-1931 gg.: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捏造的调查案卷文件与材料(圣彼得堡: 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 1993年)。
43. C. Pernetier 与 B. Pudel 导演, 《共产主义世界中的自传、自我批评与自白》(巴黎, 2002年); B. Studer, B. Unfried 与 I. Herrmann 编, 《斯大林时期谈论自我: 》

《共产主义中的身份建构》 《年代》 《三十年代》 （巴黎：人类科学之家出版社，2002年）。

44. Halfin, 《我灵魂中的恐惧》，43-58.

45. A. Graziosi, 《G. L. 皮达可夫（1890-1937）：苏联历史的一面镜子》，《哈佛乌克兰研究》，第1-2期（1992年）：第126页。

46. 自我归罪的剧本早在1928年的沙赫特审判中就已臻完善。参见A. Esinevich中的证词，《荒诞剧还是“沙赫特案”审判》（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技术与设计大学出版社，2004年）。

47. A. Liebich, 《从彼岸：1921年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48. N. Jasny, 《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值得铭记的名字》（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16-19页。

49. A. Litvin, 《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莫斯科：ROSSPEN，1999年），第320-21页。

50. 关于共产党人自我转变的叙述，参见J. Hellbeck, 《塑造斯大林主义灵魂：斯捷潘·波德卢布尼的日记，1831-1838》，《东欧历史年鉴》《为》《东欧历史年鉴》，第3期（1996年）；G. Liber, 《适应斯大林主义秩序：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的心路历程，1933-1953》，《欧亚研究》53（2001年）；N. Kozlova, 《日记作为入会礼与重生：阅读早期苏联时代的日常文献》，收录于C. Kiaer与E. Naiman编，《早期苏维埃俄国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29页。

51. Litvin, 《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350.

52. Litvin, 《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357.

53. Litvin, 《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383.

54. 雅库博维奇是唯一一位被指控的孟什维克中得以讲述审判故事的人。他谈到了“捏造”。R. Medvedev,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与后果》（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4-79页。关于流亡西方的孟什维克对审判证据的反驳，参见A. Shifrin, 《法庭谎言》，《社会主义通报》，1931年4月3日；R. Abramovich, 《我的莫斯科之行与“十四人审判”》，《社会主义通报》，1931年3月14日。托洛茨基最初接受孟什维克的供词是真实的。只是当类似指控指向他自己的追随者时，他才改变了想法。L. Trotsky, 《苏联发展的问题》，《反对派公报》20（1931年4月），以及注释致“B. S.”，《同志来信节选》，《反对派公报》51（1936年4月）。

55. 我在此的方法借鉴了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的赦免故事及其讲述者》，《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的赦免故事及其讲述者》（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

56. 关于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准法律司法系统，参见E. Wood, 《表演正义：早期苏维埃俄国的鼓动审判》（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5年）。

57. 考察苏联政府的法律部门时，法律史家关注的是专业律师的培训和法院的工作。他们提出了俄罗斯法学连续性与变化的重要问题，调查了人员构成与训练方法，揭露了司法系统内部的冲突。阅读这些著作，我们了解到苏联如何执行正义，执法规范的方法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立法框架的性质如何使大清洗成为可能。然而，在如此密切地审视司法人民委员部时，我们忽略了那些将灵魂诠释学付诸实践的机构所调查的罪责与过错等更宏大的问题。R. Sharlet, 《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法律文化》，收录于R. Tucker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文集》（纽约：Norton，1977年）；E. Huskey, 《维辛斯基、克雷连科与苏联法律秩序的塑造》，《斯拉夫评论》46（1987）。

58.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必须等待党的许可才能起诉共产党罪犯。党可以完全撤销指控（例如，考虑到罪犯的“革命功绩”）或将其案件的审查移交至其自身的纪律法庭。如果党的机关宣告一名共产党员无罪，国家机构就必须撤销案件。在 1920 年代中期，党试图恢复司法机构的威信。1925 年的一项秘密指示规定，此后任何犯下罪行的党员都应与其他所有公民一样，在相同的一般基础上被逮捕、起诉和惩罚。然而，由于无法与既定惯例竞争，此类措施效果有限，并在 1930 年代被废除。参见 H. Odo, 《“自上而下革命”前夕的苏联共产党和检察院》，收录于 D. Loeber 编，《**执政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多德雷赫特与波士顿：M. Nijhoff, 1986 年）。

59. 法律专家特雷宁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道，在内战期间，“对革命意识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的援引似乎是何种判决的充分依据。这是一个法律即兴发挥的时期，革命本能既是标准，又是法律真理的来源。”1922 年《苏维埃刑法典》颁布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反革命罪仍主要靠直觉来认定。A. 特雷宁，《论革命法制》，《**法律与生活**》，第 1 期（1922 年）：第 5 页。

60.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瓦尔特·本雅明接触到了“以法律诉讼为形式的教育戏剧”。似乎每个人都受过训练并能够参与。本雅明评论道，苏维埃生活就是如此，必须“每天上百次”表明立场。W. 本雅明，《**反思：随笔、格言、自传体文章**》（纽约：肖肯出版社，1986 年），第 124 页。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伊恩·哈金谈到了“用我们所知的东西取代灵魂的世俗驱动力”。I. 哈金，《**重写灵魂**》（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51 页。

61. J. 赫尔贝克，《**革命在我心中：斯大林时期的日记写作**》（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2. B. 沃尔夫，《大恐怖的彩排》，《**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 3 卷，第 2 期（1970 年）；M. 赖曼，《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政治作秀审判》，《**目的**》第 54 期（1982-83 年）；V. A. 科瓦廖夫，《**精神受难：斯大林时代的法庭审判**》（莫斯科：诺尔玛出版社，1997 年）；H. 默里，《**俄罗斯的法律虚构**》（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8 年）。

63. A. 盖蒂，《**大清洗的起源：重新审视苏联共产党，1933-1938 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年）；G. 里特波恩，《**斯大林主义的简化与苏联的复杂化：苏联的社会紧张与政治冲突，1933-1953 年**》（瑞士楚尔，1991 年）。

64. 阿法纳西耶夫，《**他们没有沉默**》；R. 塔克，《斯大林、布哈林与作为阴谋的历史》，载于《**苏联的政治思维**》（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 年），第 54、71 页；A. 盖蒂，《镇压政治学再探》，载于盖蒂和曼宁，《**斯大林主义的恐怖**》，40-62。

65. 极权主义解释的经典著作包括 Z. 布热津斯基，《**永久清洗**》（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 年），以及 R. 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 年）。

66. 不乏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传记。例如，参见 A. 乌拉姆，《**斯大林：其人与时代**》（纽约：维京出版社，1973 年）；E. 拉津斯基，《**斯大林：基于俄罗斯秘密档案爆炸性新文件的首部深度传记**》（纽约：锚出版社，1997 年）；S. 蒙蒂菲奥里，《**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纽约：兰登书屋，2005 年）；R. 瑟维斯基，《**斯大林传**》（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年）。他的副手们的传记也在不断增加——例如，A. 维克斯伯格，《**检察官与猎物：维辛斯基与 1930 年代莫斯科公审**》，简·巴特勒译（伦敦：韦登菲尔德

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90年）；D.沃森，《莫洛托夫与苏联政府：人民委员会，1930-41年》（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1996年）；O.赫列夫纽克，《在斯大林的阴影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政治生涯》（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95年）；A.奈特，《贝利亚》（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M.扬森和N.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纽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02年）。

67. 塔克，《斯大林、布哈林与作为阴谋的历史》，第54、71页；P.所罗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刑事司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R.瑟斯顿，《苏联大恐怖中的恐惧与信念：对逮捕的反应，1935-1939》，《斯拉夫评论》45（1986）：232，234，243。

68. 留京1932年的反对派领袖通常在这方被引用。B.斯塔尔科夫，《马尔捷米安·留京：我不会下跪》（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2年）；《苏共中央通报》，第6期（1989年），以及第3期（1990年）。

69. 虽然“精神失常”通常指无法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但党的领导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在他们的演讲和出版物中以惊人的清晰度解释了为什么清洗是必要的。例如，参见L.扎科夫斯基，《关于外国侦察机关及其托洛茨基-布哈林代理机构的某些方法和手段》，《红色报》，1937年6月11日。杀人狂的精神失常往往肉眼可见，然而被允许进入莫斯科的外国观察者中，没有人将任何党的领导描绘成疯狂的疯子。事实上，斯大林让罗曼·罗兰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等杰出的西方小说家相信，他是一位敬业、深思熟虑且尽责的革命家。例如，参见H.巴比塞，《斯大林：一个开启新世界的人》，A.斯捷茨基翻译并编辑（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36年）；L.费克特万格[福伊希特万格]，《1937年的莫斯科：为我的朋友们所作的旅行报告》（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37年）。

70. 即便是惯常进行观念分析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将斯大林及其同僚置于语言之外，将他们描绘为受权力驱使、狡猾且精于算计的领导人。不知何故，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语言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操纵的载体。斯大林此刻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随后又在军事参谋会议上讲话，意在产生印象，达成某些目标。但这里肯定存在某种缺失：总书记的目标从何而来？是什么政治词汇赋予其意义？除非我们想退回到一个总是渴望那些被普遍认为重要之事（权力、金钱、性）的主体，否则我们必须将说话者回归到他们的语言宇宙中。政治行为者的行为“部分由其概念构成”，语言对他们而言是“政治行动的一个竞技场”。T. Ball, J. Farr, and R. Hanson, eds., 《政治创新与概念变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诚然，斯大林利用语言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这些目标不必被认为存在于共产主义话语之外。尽管否认斯大林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是天真的，但他受到施加于其想象力（而不仅是其权力）之上的限制的约束。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不可能抓住斯大林玩世不恭之处，也无法指出他在公开场合（且表面上是玩笑般地）所言与私下场合（且理论上是认真地）所言之间存在任何严重不一致。历史学家没有找到他任何一句话暗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迫害无辜同志。他的私人笔记、写给亲密合作者的信件以及在各种党代会上上的讲话（包括那些只有他最信任的副手参加场合），表明他没有私人语言。例如，斯大林坚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工业党审判期间从囚犯那里诱得的供词反映了现实：“拉姆津的陈述非常有趣，特别是关于干涉问题，或者，

具体来说，关于干涉的日期。原来干涉计划在 1930 年进行，但推迟到了 1931 年甚至 1932 年。这非常可信且重要。”当卡冈诺维奇告诉他，针对其被捕兄弟的证据是虚假的，斯大林回应道：“你说谎是什么意思？我收到了证词。”在斯大林发给贝利亚的一份关于几个抱怨被陷害的个人的便条中，斯大林写道：“看看这个。如果他们写的是实话——就释放他们。”诚然，很难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结论，但举证责任在于那些声称他是在说反话的人。L. Kosheleva et al., 《I. V. 斯大林致 V. M. 莫洛托夫信件 1925 - 1936 年, 文件集》（莫斯科：青年俄罗斯出版社，1995 年），第 187 页；F. Chuev, 《卡冈诺维奇如是说：斯大林使徒的忏悔》（莫斯科：祖国出版社，1992 年）。我在此的分析借鉴了 E. Van Ree, 《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二十世纪革命爱国主义研究》（伦敦：劳特利奇·柯曾出版社，2002 年），第 124 - 25 页。关于视斯大林为操纵语言者的观点，见 O. Khlevniuk, “‘大恐怖’的原因：外交政治方面”，载于 S. Pons and A. Romano, eds., 《战争时代的俄罗斯 1914 - 1945》（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2000 年）；D. Shearer, “管理苏联社会：1930 年代的社会失序、大规模镇压与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世界手册》，第 2 - 4 期（2001 年）。

71. F. Benvenuti, “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载于 J. Cooper, M. Perrie, and E. Rees, eds., 《苏联历史, 1917 - 1953: 纪念 R. W. 戴维斯文集》（伦敦：圣马丁出版社，1995 年），第 135 页。

72. 关于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见 A. Wood, 《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兰开斯特：劳特利奇出版社，2005 年）；John L. Keep, 《斯大林主义：千禧年之际的俄国与西方观点》（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5 年）；G. Gill, 《斯大林主义》（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1998 年）；M. McCauley, 《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第三版（伦敦：朗文出版社，2003 年）。

73. 关于近期从派系冲突与中央-地方紧张关系角度对大清洗的解释，见 J. Harris, 《大乌拉尔：地方主义与苏联体制的演变》（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9 年）；A. Getty, “‘不允许过火’：1930 年代末的恐怖与斯大林主义治理”，《俄罗斯评论》61 (2002)。

74. 关于弗朗索瓦·傅勒对此议题（涉及雅各宾恐怖）的讨论，见“恐怖”，载于 F. Furet and M. Ozouf, eds., 《法国革命批判辞典》（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37 - 50 页。

75. 这样的解释有时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将主体禁锢于一个永恒的语言结构中。语言学者告诉我们，语言与现实的互动让人想起莫比乌斯环：语言总是多义的、流动的、演变的，永远无法稳定其意义。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它是一个奇特的系统，创造了自己的外部——它所对话的世界和它与控制权而斗争的主体——因此语言使历史成为可能。拉康谈及语言环绕的深渊，巴赫金创造了“众声喧哗”一词来指涉意义稳定化的不可能性，伽达默尔提出了永无止境、从不折叠成整体的诠释学循环观点。还有德里达，他关于语言永无止境的隐喻化的论断非常著名。尽管这些哲学传统彼此迥异，尽管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启示并不总是一致，但它们传达了相同的大意：语言是一种能够解释历史变迁的动态力量。J. Lacan, 《自我的语言：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 年）；M. Bakhtin, 《言语体裁及其他晚期论文》，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编（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3 年）；J. Derrida, “签名 事件 语境”，载于《哲学的边缘》（巴黎，1972 年；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年）；H. Gadamer, 《哲学解释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76. 我的案例研究不同于其他现有的大清洗案例研究，例如 E·A·里斯、W·蔡斯和 L·霍姆斯的研究，它们倾向于强调制度阴谋和个人动机，而我主要关注的是话语在 1930 年代血腥事件中的作用。参见拉里·E·霍姆斯，《斯大林的学校：莫斯科第 25 模范学校，1931 - 1937》，匹兹堡俄罗斯与东欧研究系列（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9）；W·蔡斯，《门内的敌人？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主义的镇压，1934 - 193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E·A·里斯，《斯大林专政的本质：政治局，1928 - 1953》（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4）。俄语案例研究也同样如此。例如，参见 A·苏图林，《边区案件：关于远东斯大林非法统治的受害者》（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图书出版社，1991）；S·阿列克谢延科，《20 世纪 30 年代库班和北高加索的镇压》（克拉斯诺达尔：媒体联盟，1993）；V·阿达穆什科，《20-50 年代白俄罗斯的政治镇压》（明斯克：白俄罗斯出版社，1994）；Z·利霍洛博娃，《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与乌克兰 30 年代末的政治镇压（主要基于顿巴斯的材料）》（顿涅茨克：顿涅茨克大学，1996）；V·基里洛夫，《乌拉尔下塔吉尔地区的镇压历史：20 世纪 20 年代-50 年代初》，第 1 卷，《20-30 年代的镇压》。（下塔吉尔：下塔吉尔国立师范学院，1996）；M·希秋克，《“米科拉伊夫奇纳地区的大规模镇压（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历史杂志》1（1998）；S·帕普科夫，《西伯利亚的斯大林恐怖统治，1928 - 1941》（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社，1997）；T·伊万诺娃，《雅库特政治镇压的历史：20 年代末-30 年代》（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1998）；V·扎哈罗夫，《“关于 30 年代的政治镇压（基于科米共和国国家档案馆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文件）”》，载于《祖国档案》，第 1 期（1998）；L·杰吉塔耶娃 编，《1937 - 1938 年哈萨克斯坦的政治镇压》（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出版社，1998）；A·斯捷潘诺夫，《限额裁决：叶若夫时期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政治镇压史》（喀山：新知识出版社，1999）；V·格里沙耶夫，《被杀害两次的人（比斯克斯大林镇压史）》（巴尔瑙尔：阿尔泰国立大学出版社，1999）；A·瓦特林，《地区级别的恐怖：1937 - 1938 年莫斯科州昆采沃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规模行动”》（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77. M·戴维-福克斯，《思想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高等教育，1918 - 1929》（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100。

78.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对斯大林统治下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她所提出的“客观主义”社会历史学中固有的问题并非新问题，也并非菲茨帕特里克所独有，但我在此关注她的工作是因为其在该领域的杰出地位。菲茨帕特里克知道，“这些普通人所过的生活……并非……正常的生活。1930 年代的动荡和艰辛破坏了正常状态，使其成为苏联公民……普遍未能实现的东西。”因此，她开始描述“苏联公民在斯大林主义的特殊环境中试图过上普通生活的方式。”当她描述大清洗时，时代显得异常，但人却显得正常。他们“赞同”或“不赞同”，“相信”或“不相信”；每个人都对斯大林主义做出“反应”，但没有人是构成这些现象的主体（“反应”预设了一个已经构成的主体）。根据菲茨帕特里克的说法，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人民受到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正如我们在类似情况下可能也会做的那样。他们尽力讨好政权，参与“公共替罪”和“告发”。事实上，有些人“认定高度警惕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逮捕发生，一个家庭的工作就是试图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来打听消息。总是有“要遵循的常规”——常规，而非仪式，是一种缺乏意义的行为。

菲茨帕特里克堆砌了“小人物”的记录——其声音尽可能多样化，反映了

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态度——教授与学生、经济管理者与工厂工人、女性与男性、年轻人与长者、体制的受益者与受害者。她考察资料来源是否具有代表性，但不考察其语言——语言在她看来是透明的。诚然，菲茨帕特里克处理资料的方法贯穿了怀疑诠释学：当她阅读公开文件时，她假定身份与话语之间存在分离，而说话者不断地在这种分离中进行掩饰。当她阅读私人文件时，她预设身份与话语的融合，并相信自己获得了真实、完整的声音。然而，意识到自我不仅是作者，也是言语的产物，这使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正如基思·迈克尔·贝克所指出的，“语言所能表达的，可能超出任何个体行动者的意图；意义可能被他人以未曾预料的方式挪用和延伸……意义（以及依赖于它们的人）始终处于风险之中。”约亨·赫尔贝格敏锐地指出，斯大林主义日记常常是规定性的，而非仅仅是描述性的。斯大林主义自我文献不仅告诉我们个体曾经是什么，还告诉我们他们希望成为什么——在写作行为中，被叙述的自我与叙述的自我之间的壁垒常常被打破。如果我们要理解文本如何生成意义并塑造其主体，就必须对斯大林主义语言（书面与口头）进行症候式阅读。我们必须研究每位说话者所采用的叙述策略，同时注意写作所揭示的其身份中种种微妙的滑移。因为斯大林主义诗学若不将决定权从说话者手中夺走便无法被操纵，言语背后的意图总是遭到颠覆，这反过来意味着，文件不能脱离共产主义自我得以产生的认识论语境来阅读。S. 菲茨帕特里克，《*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非凡时代里的普通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9、208、211页；基思·迈克尔·贝克，《*发明法国大革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J. 赫尔贝格，“发声：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肯定与异议语言”，《*批判*》第1卷（2000年）。关于斯大林主义下非政治性日常生活的更多观察，参见E. 奥索金娜，《*我们的日常面包：斯大林俄国的社会主义分配与生存艺术，1927-41*》（阿蒙克：M. E. 夏普出版社，2001年）；S. 朱拉夫廖夫，《*“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企业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动机，1928-1938年*》（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79. 关于抵抗的主题，参见J. 罗斯曼，“斯大林俄国的工人罢工：1932年4月的维丘加起义”，以及T. 麦克唐纳，“斯大林俄国的农民起义：梁赞的皮捷林斯克起义，1930年”，均载于L. 维奥拉编《*与斯大林主义斗争：1930年代的苏联权力与大众抵抗*》（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文献所采用的方法基于非常有影响力的J. 斯科特的著作，《*支配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该书在S. 高尔的“语言与‘抵抗的艺术’”一文中受到了精辟的批评，《*文化人类学*》。10（1995）。

80. 关于主体化的概念，参见M. 福柯，《*性史：关注自我*》（纽约：温提奇出版社，1988年）。

81. J. 普拉姆珀，“福柯的古拉格”，《*批判*》。3（2002）。

82. 关于“作为行动的言语”，参见Y. 科恩，“作为行动的信件：从卡冈诺维奇档案看1930年代初的斯大林”，《*俄罗斯世界手册*》第38卷，第3期（1997年）。

83. 基层参与大清洗的情况在C. 胡珀的“亲密的恐怖：1930年代苏联的家庭政治”中有所探讨，载于基尔与奈曼，《*早期苏维埃俄国的日常生活*》，65。

84. 切尔努舍夫，《*1937年*》，289-90。

85. 如今毫无疑问，清洗是集权化的：斯大林始终完全

控制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且他与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起亲自授权处决。在叶若夫时期，中心下达了逮捕配额。同时，有证据表明，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之间存在对超额完成这些配额的竞争，且这种竞争只受到部分控制。例如，乌克兰的“控制数字”被超额完成了十倍。O. 赫列夫纽克表明，土库曼斯坦的清洗超额完成了约25%的配额，尽管莫斯科已将最初配额提高了三倍。《资料来源》，第1期（1995年）：第117-130页；《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第5期（1989年）：第74-75页；A. 斯捷潘诺夫，“按限额枪决”，《意志》，第6-7期（1997年）：第106-113页；O. 赫列夫纽克，“大恐怖在土库曼斯坦的机制”，《俄罗斯世界手册》。39（1998）：197-208。

86. 中央国家档案馆，个人档案，全宗566，目录1，案卷331，第29张。

87.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一种不同且极具影响力的方法（从1940和1950年代非党知识分子的视角撰写），参见L. 金兹堡，《书桌后的人》（列宁格勒，1989年），第315页。

88. 关于党如何运作的极权主义解释，参见J. 阿姆斯特朗，《极权主义政治：1934年至今的苏联共产党》（纽约：兰登书屋，1961年）；Z. 布热津斯基，《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2年）。

89. R. 康奎斯特，《深入斯大林的秘密警察：1936-39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政治》（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5年）。

90. S. 菲茨帕特里克，“战火下的生活。斯大林俄国的自传叙事及其挑战”，载于《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地方。历史的交叉火力》：《交叉火力》 聚焦历史：《文集》 马克·费罗（巴黎：斯拉夫研究所，1995年）；B. 斯图德尔，“可完善的自我：通过‘自我修养’形成斯大林干部”，《起源》（1997年）。51（2003）：92-113。

91. G. 里特斯波恩，“无所不在的阴谋：论1930年代苏联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意象”，载于格蒂与曼宁，《斯大林主义恐怖》，106-7。

92. 由于“恐怖”是共产党人自身使用的术语，且鉴于他们心目中的含义与今日历史学家的理解不同，似乎应当谨慎使用。“恐怖”在布尔什维克语言中有双重谱系：它既可以指代雅各宾派，也可以指社会革命党人——这两种情况下其内涵都不完全是正面的。马克思本人将恐怖视为革命的对立面，而非革命所诉诸的手段。恩格斯于1870年9月致信马克思：“我们将恐怖统治想象为散播恐怖者的统治，但恰恰相反，它被恐怖本身统治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恐怖不过是受惊者通过施加无谓残暴来自我安抚的行为。”随后出现了道德层面的论点：“我绝不会参与恐怖政府，”卢那察尔斯基在1917年夺取政权前夕声明，“我宁愿向恐怖投降。”多数布尔什维克认为，恐怖是否正当取决于其背后代表的阶级。1918年彼得格勒 契卡以及北方公社联盟执行委员会新闻部主任V. 沃洛达尔斯基被暗杀，同年卡普兰刺杀列宁未遂后，苏维埃政权正式设立了“红色恐怖”。列宁指示克利斯廷斯基：“准备恐怖：这是权宜之计且紧迫需要。”但列宁将红色恐怖视为报复行为，是对“白色恐怖”一种虽深感遗憾但必要的回应。整个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都担忧红色恐怖可能退化为无意义的残暴。“无论对红色恐怖持何种看法，”米哈伊尔·奥列明斯基表示，“我愿将目前各省发生的情况称为并非红色恐怖，而是普遍的犯罪行为[сплошная уголовщина]。”在后来的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很少将恐怖手段归因于自身。诚然，列宁在1922年写道“我们的

立法应当……为恐怖的使用辩护，说明其合理性及界限。”1930年，尼古拉·克雷连科在工业党审判中针对被告声称“我们可以饶恕他们的生命，但我们不放弃实施恐怖的权利。”甚至有家长给孩子起名“捷尔卡”——“恐怖”的昵称。但就20世纪30年代“恐怖”一词的使用而言，它据称是党所遭受之物，而非其施加于他人之事。访问苏联的外国人的语言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是那些普遍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也使用“恐怖”来描述政府政策，援引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过去一年半里，”罗兰在1937年末的日记中写道，“恐怖笼罩着整个苏联。”再看维克多·塞尔日——这位1936年离开斯大林俄国的著名左翼反对派——的评论：“最终，我们目睹了不可言喻的黑色恐怖展示，它永久性地建立在苏联。”“恐怖”一词也继续存在于老知识分子的语言库中。八十岁高龄的行为心理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在1934年给政府的信中毫不讳言：“我们生活在无情的恐怖统治之下。那些恶意指处大量民众死刑并在执行判决中获得满足的人，几乎无法保持情感与思考的存在。”同年，他问卫生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卡明斯基：“您是否同意，长期的恐怖……将我们的亚洲特性转变为更可耻的奴性？”在巴甫洛夫的定义中，“恐怖”意味着“专断”（*своеволие*）和“强迫”（*насилие*）。参见列宁，《列宁全集》，6：74-78，372-98；K.马克思和F.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53，引自Furet，“恐怖”，129；“给您的信当然是历史性的：A. V.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1917年3-12月），”《苏共历史问题》，第2期（1991年）：47；M.卡普斯京，《乌托邦的终结？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莫斯科：消息报出版社，1990年），139；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2：306；S.梅尔古诺夫，《俄国的红色恐怖，1918-1923》（辛菲罗波尔：塔夫里亚出版社，1990年），187-88；列宁，《列宁全集》，45：190-91；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1：283；A.普鲁特尼克，“如此不同信念的解剖”，载于《来自海外的两种观点》（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0年），33；《苏联文化报》，1989年1月14日；《文学报》，1989年11月29日；维克多·塞尔日，“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与局限”，《群众：无产阶级行动月刊》，第3期（1939年）。

93. 所罗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刑事司法》，19；V.伊万诺夫，《修会使命：20年代末-40年代苏联俄罗斯镇压机制（基于西北地区材料）》（圣彼得堡，1997年），204。

94. D.博戈莫洛夫和A.拉祖莫夫，《列宁格勒殉道录》（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1998年），1：47。据称充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氛围的“普遍恐惧”在同时主张极权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方法的斯大林主义研究中均有提及。关于极权主义观点，参见J.弗里德里希和Z.布热津斯基，《极权专政与专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169；A.达林和G.布雷斯劳尔，《共产主义体系中的政治恐怖》（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5。在修正主义者阿奇·格蒂看来，斯大林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提供了“恐惧的又一证明。存在的是拿着大武器的胆小之人。”A.格蒂，“害怕自己的影子：布尔什维克诉诸恐怖，1932-1938”，载于M.希尔德迈尔编，《二战前的斯大林主义：研究新途径》（慕尼黑：奥尔登堡出版社，1998年），190-91。

95. 瑟斯顿，“恐惧与信念”。

96. 《苏共中央通报》，第12期（1989年）：87；A.拉林娜，《难忘的往事》（莫斯科：教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224-25。关于恐惧的历史特定编码，参见C.罗宾，《恐惧：一个政治观念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J.伯克，《恐惧：一部文化史》（加利福尼亚州埃默里维尔：Shoemaker and Hoard出版社，2007年）。

97. E. 伯克, 《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之起源的哲学探讨》(圣母大学: 圣母大学出版社, 1968 年), 39-40, 57-58, 67-70。“恐怖与欢庆的结合”在斯大林主义语境中的讨论见雷克林, “恐怖的身体”, 63。
98. 《致当局的信件》, 363, 417。
99. 阿菲诺格诺夫, 日记条目, 1937 年 9 月 9 日, 引自赫尔贝克, 《我心中的革命》, 326。

第一章

1. 汉森, 《时间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制度设计》(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47-55。
2. 塔克, “作为自上而下革命的斯大林主义”, 载于 R. 塔克编, 《斯大林主义: 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70 年); M. 戈里诺夫,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苏联国土”, 《历史问题》, 第 11 期(1990 年)。
3. A. 阿菲诺格诺夫, 《恐惧》(列宁格勒, 1932 年), 23。
4. I. 德鲁日尼科夫, 《告密者 001》(莫斯科: 莫斯科工人出版社, 1995 年), 139。
5. N. 亚斯内, 《苏联工业化, 1928-1952》(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1 年); R. W. 戴维森, 《社会主义攻势: 苏联农业集体化, 1929-1930》(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6. R. 米勒, 《十万台拖拉机: 机器拖拉机站与苏联农业控制的发展》(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 年); Iu. 阿鲁秋尼扬, “农业集体化与为工业释放劳动力”, 载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1917-1961 年)》(莫斯科, 1964 年); S. 科特金, “填充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 人口政治”, 载于 W. 罗森伯格和 L. 西格尔鲍姆编, 《苏联工业化的社会维度》(布卢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67-68。
7. 关于“富农”称谓的实际运用, 参见 A. 菲拉托夫, “关于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及前富农在苏联的命运”中的官方立场, 载于 Z. 沃多皮亚诺娃、T. M. 戈里亚耶娃等编, 《苏联政治审查史: 文件与评论》(莫斯科: ROSSPEN 出版社, 1997 年); V. 西多罗夫, “苏联消灭富农作为一个阶级”, 《历史问题》, 第 7 期(1968 年)。另见 M. 卢因的批评性叙述, “谁是苏联富农?”, 载于 M. 卢因编, 《苏联体系的形成》(纽约: 万神殿出版社, 1985 年); L. 维奥拉, “农民的富农: 1920 年代苏联农村的社会认同与道德经济”, 《加拿大斯拉夫论文集》42 (2000)。
8. I. 莫罗佐夫, 《与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阶段》(莫斯科, 1960 年); A. 鲍尔, 《俄国最后的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人们, 1921-1929》(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60-62。
9. 这里指的是布哈林 1924 年表达的观点, 即所培养的人的类型将回答“谁战胜谁”的问题。参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莫斯科: 红色处女地出版社, 1924 年), 539。
1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研究所,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448, 张页 67。
1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研究所, 全宗 1816, 目录 1, 案卷 4922, 张页 57。
12.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5 年 1 月 17 日。
13. 这并不意味着其余知名人士的处境必然好得多, 只是因为他们大多被解除了在列宁格勒的教学职务, 关于他们命运的信息难以获得。
14. 按党的自身标准, 教师的学术资历不足: 大多没有教授学位, 但仍被“作为教授”聘用。

他们授课时间很长，“兼职”（*совместительство*）很普遍，共产主义大学 11 名主要教师中只有一名是全职。兼职现象普遍：“由于低薪，我们的教学人员已成为最糟糕的客串演员 [*гастролеры*]，”党委抱怨道。（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新入职教师月薪 210 卢布；系主任额外增加 125 卢布。相比之下，学生津贴为 250 卢布。）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研究所，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9，张页 53。

15. G. 贝科夫，“布尔什维克干部熔炉的十五年”，载于《以 I. V. 斯大林命名的全联盟共产主义农业大学十五年》（列宁格勒，1933 年），47。

16. R. 普雷德，“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而努力”，载于《十五年》，10-11，14。关于转向农村和共产主义大学，参见 A. 米柳京，《苏维埃党校与其重组相关的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关于苏维埃党校工作中的目标设定”，《党的工作者手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第 7 卷，第 1 章。

1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研究所，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1026，张页 108-09。该大学 1934-35 年设有三个分部：（1）两年制农业专家培训部；（2）三年制培养党集体农庄干部部；（3）一年制共青团部。

18. 1937 年初，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有 135 名成员。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研究所，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77，张页 55，以及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9，张页 55-56。

19. TsGA IPD, f. 566, op. 1, d. 274, l. 34. 录取委员会要求提交以下文件：（1）地区党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函；（2）经核证的自传与调查表；（3）党籍材料，包括党龄证明、通过 1929 年及 1933 年党内审查的印章，以及详细的个人评价。“论苏共党校工作的目标导向”；“论苏共党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载于《党务工作者手册》（莫斯科，1934 年），第 8 辑。许多教师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TsGA IPD, f. 24, op. 2b, d. 1256, ll. 94-95.

20. TsGA IPD, f. 24, op. 2b, d. 1256, ll. 86-88.

21.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3, ll. 276-77.

22.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26, l. 23.

23. 安德烈·日丹诺夫近期发布的指令告知每位学生：“不研究历史就无法掌握列宁主义。”A. 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六月全会总结与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任务》（莫斯科，1935 年），第 22-23 页。

24.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5, l. 27.

25. G. 贝科夫，“要懂得珍惜、爱护和培养人才”，《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5 月 15 日。

26. 《真理报》，1935 年 3 月 6 日；V. 斯大林，《著作集》，13 卷本（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49-1952 年），第 6 卷：46 页，第 11 卷：58 页。

27. F. 本韦努蒂，《向破坏者开火！1934-1938 年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与工业组织》（罗马：V. 列维出版社，1988 年）；R. 迈尔，《1935-1938 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苏联社会斯大林化支撑与激化因素的斯达汉诺夫主义》（斯图加特：F. 施泰纳出版社，1990 年）；L. 西格尔鲍姆，《1935-1941 年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与生产力政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 年）。

28. “斯大林同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11 月 25 日。另见《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 年 1 月 1 日、8 日、20 日，2 月 2 日、21 日。

29.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5, l. 2；S. 费奥多罗夫，“优秀生与突击队员集会”，《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2 月 23 日；V. 保科娃，“论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 年第 5 期：第 41 页。

30.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3, l. 166.
31.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 37, 以及 f. 197, op. 1, d. 1026, l. 36. 1935 年 11 月, 各院系被要求督促每位学生做到“今天要比昨天好, 明天要比今天好”。M. 洛普申斯基, “官僚主义还是形式主义”,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4 月 9 日。
32. P. I. 阿塔帕尔马科夫, “争取在第二学年取得更优异成绩”,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1 月 15 日。
33. TsGA IPD, f. 197, op. 1, d. 725, l. 23. 教学委员会报告称: “若学年初平均成绩为 3.5 分(满分 5 分), 现在平均成绩已达 4.2 分; 学生突击队遍布各处”; 三十名最优秀学生被送往本校研究生院或红色教授学院。I. 阿塔帕尔马科夫, “争取在第二学年取得更优异成绩”,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1 月 15 日。
34. 季托夫, “我保证以优异成绩完成第二学年学业”,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2 月 11 日。
35. 《斯大林主义者》, 1935 年 6 月 21 日; N. 古尔维奇与 F. 辛, “斯达汉诺夫式学生应具备何种特质”, 《斯大林主义者》, 1935 年 10 月 25 日; P. Sukhanov, “我是如何获得杰出供述的”,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2 月 11 日。
36.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5 月 25 日。
37. V. Volkov, “文明观念(1935-38 年): 苏联文明与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 《社会学研究》, 第 1-2 期(1996 年)。
38.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5 月 25 日。
39. 《斯大林主义者》, 1935 年 6 月 21 日。
40. 日丹诺夫, 《六月全会的成果》, 22-23.
41. I. 多伊彻, 《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9 年), 379-94 页; R. 丹尼尔斯, 《革命的心: 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 311-21 页。
42. S. 科恩, 《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 A. A. 克诺夫出版社, 1973 年)。
43. R. 麦克尼尔, 《斯大林: 人与统治者》(纽约: 纽约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12-13 页。
44.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408, op. 1, d. 1175, l. 55, 以及 f. 408, op. 1, d. 174, l. 49。
45. 迄今为止关于集体化最全面的研究仍是 M. 列文, 《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 集体化研究》(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75 年)。关于西伯利亚背景, 参见 J. 休斯, 《斯大林、西伯利亚与新经济政策的危机》(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46.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725, l. 226。
47.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725, l. 226。
48. 关于改造农村的乌托邦计划, 在 R. 斯蒂茨的著作中有讨论, 《革命的梦想: 俄国革命中的乌托邦愿景与实验性生活》(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84-86 页。
49.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725, ll. 226-27。
50. 波波夫呼应了当时苏联专家们(不全是马克思主义者)表达的一些观点。参见当代的 M. 库巴宁, 《农民经济分裂过程的阶级本质》(莫斯科, 1929 年); S. 所罗门的讨论, 《苏联农业辩论: 社会科学中的一场论战, 1923-1929》(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 1977 年); 以及 T. 考克斯, 《农民、阶级与资本主义: L. N. 克里斯特曼及其学派的农村研究》(牛津: 克拉伦登出版社, 1986 年)。
51. 关于集体化早期阶段的官方记述, 参见 M. 波格坚科, 《论苏联农业全面集体化开始阶段的历史》, 《历史问题》

istorii, 第5期(1963年); N. 伊维尼茨基, 《论全面集体化的开始阶段(1929年秋-1930年春)》,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 第4期(1962年)。

52.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725, l. 227。这接近少数党的领导人表达的观点。参见《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0年), 223-25页。

53. J. 休斯, 《捕获俄罗斯农民: 斯大林粮食采购政策与“乌拉尔-西伯利亚方法”》, 《斯拉夫评论》5(1994)。

54. M. 艾布拉姆斯, “末日启示: 主题与变奏”, 收录于 C. 帕特里德斯和 J. 威特赖希编,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与文学中的末日启示》(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4年)。

5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27。

5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27。

57. L. 维奥拉, 《斯大林时期的农民叛乱: 集体化与农民抵抗文化》(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年)。

58. 多位西伯利亚党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悲观情绪。参见 S. 基斯利岑, 《瑟尔佐夫方案: 20至30年代苏联社会中反苏维埃抵抗形成史》(顿河畔罗斯托夫: 逻各斯出版社, 1992年), 第135页; J. 休斯, “世袭主义与斯大林体制: 以 S. I. 瑟尔佐夫为例”, 《欧亚研究》48(1996): 561。

5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34。

6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34, 227-28。

61. R. W. 戴维斯, 《苏联集体农庄, 1929-1930年》(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0年)。

62. 关于这些观点可能的来源, 参见《第十六次党代会》, 第155-56页; S. 瑟尔佐夫, 《迈向新的经济年: 1930年8月30日在俄联邦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修订速记稿》(莫斯科, 1930年), 第4页。

6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34。

64. L. 维奥拉, “农民的噩梦: 苏联乡村的末日启示幻象”, 《现代史杂志》62(1990): 747-50。

6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个人档案集,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张 227。

66. 关于达尔文主义在苏联的接受情况, 参见 M. 布布利科夫, 《生存斗争与社会性: 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莫斯科, 1926年); F. 杜钦斯基, “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7-8期(1926年)。

67.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 227-228。

68.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参见 A. 别桑松, 《古拉格的兴起: 列宁主义的思想起源》(纽约: Continuum 出版社, 1981年)。

69.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 228。

70.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 228。

71. 瑟尔佐夫, 《党代会前夕》(莫斯科, 1930年), 第51-52页。

72. 关于列宁格勒干部在集体化中角色的官方表述, 参见 I. 伊万诺夫, “列宁格勒工人在对口帮扶地区农业集体化中的帮助”, 收录于《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列宁格勒工人》(莫斯科-列宁格勒, 1963年); N. 格鲁申, “为西伯利亚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工人”, 《苏联历史》, 第6期(1965年)。

73.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 224。

74.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725, 页 225。

75. I. 鲍里谢夫, 《青年中的小资产阶级影响》(莫斯科, 1928年), 第94-95页; A. 叶夫多基莫夫, 《为青年而斗争》(列宁格勒, 1929年), 第70-73页。

76. 表达类似波波夫批评意见的党的领导人被标记为“派别分子”，而非“反对派分子”。这意味着他们仍有挽回的余地。参见 B. 斯塔尔科夫，“‘右派派别分子’”，载于 A. 阿法纳西耶夫 编，《*他们没有沉默*》（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25 页。

77. 疾病名称被误拼为 *tsiklomia*，但上下文表明指的是循环性精神病，或俄语中的 *tsiklofrenia*。参见 B. 兹洛特尼茨基，《*医学词典*》（华沙，1971 年）。关于导致政治意识丧失的心理崩溃的医学解释，参见 P. 米列利宗，《*神经病患者的卫生*》（克拉斯诺达尔，1927 年），第 9 页。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话语中医学隐喻的作用，参见 E. 奈曼，《*公共中的性：早期苏联意识形态的体现*》（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08 - 249 页。

78.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79.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80. A. 尤利娜，“库兹巴斯两万五千人工作队在西伯利亚西部集体农庄建设中（1929 - 30 年）”，收录于《*西伯利亚工人阶级史*》（克麦罗沃，1970 年），第 3 辑；V. 斯梅什利亚耶夫和 P. 索洛维约夫，《*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列宁格勒工人，1926 - 1937 年*》（列宁格勒，1965 年）。

81.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82.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N. 马卡舍娃，“N. D. 孔德拉季耶夫与 20 世纪前五十五年的经济思想”，《*经济学与数学方法*》第 2 期（1992 年）；V. 巴尼特，“长波告别：孔德拉季耶夫与行情研究所，1920 - 28 年”，《*欧亚研究*》47（1995）。

83.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84.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85.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86.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87.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29 - 230。

88.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6。

89.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好*》，322 - 33。

90.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1.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4。

92.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3.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4.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4 - 235。

95.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6.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7.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5。

98.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 233。

99. K. 克拉克，《*苏联小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 年）。

100. 关于集体化期间的镇压，参见 L. 维奥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 1930 年剥夺富农、大规模驱逐和特别安置中的作用”，《*卡尔·贝克福斯与东欧研究论文*》，第 1406 号（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2000 年）。

101. 共产主义大学的另外两名学生费多托夫和巴甫洛夫也在 1930 年被指控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达尼洛夫卡村（西伯利亚兹纳缅斯克区）与非党人士召开的讨论粮食收购运动进展的会议上，他们批评生产计划不切实际，诋毁集体农庄，并声称富农被征税过重。”

对他们活动的政治评价是明确的：“费多托夫和巴甫洛夫散布富农情绪，肆意破坏粮食收购工作。”两名学生都承认犯了错误，并宣布他们现在支持“毫无保留地、毫不动摇地执行第十六次党代会的决议，进行无情的斗争”。鉴于他们的“全心全意[俄语原文：chistoserdechnyi

102. 的悔过”，并考虑到他们是工人，共产主义大学仅对他们发出了简短的训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TsGA IPD），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237。
103.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233。
104.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233。
105. 关于在“斯大林 1931 年信件”前不久对托洛茨基的谴责措辞，请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第 2 卷，第 278 页；M. 格林斯基，《同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作斗争：十月革命后党内斗争历史概述》（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 年），第 25-28 页；S. 戈尼克曼，《十年：联共（布）内托洛茨基主义史纲》（哈尔科夫，1928 年），第 163-165 页。
106. 《平反：30-50 年代的政治审判》（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50 页。
107. 相关背景请参见 J. 巴伯，《1928-1934 年苏联知识分子正统观念的确立》，《过去与现在》第 83 期（1979 年）：第 141-164 页；G. 恩捷因，《苏联的学者官僚：M. N. 波克罗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78 年），第 160 页。
108. 《真理报》，1931 年 9 月 1 日，引自 J. 巴伯，《危机中的苏联历史学家，1928-1932 年》（纽约：霍姆斯与迈尔出版社，1981 年），第 126 页。
109. V. 斯大林，《全集》，共 13 卷（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49-1952 年），第 13 卷，第 86-88 页，第 101-104 页。
110. 《无产阶级革命》，第 6 期（1931 年）：第 3-12 页。在斯大林的信之后，托洛茨基主义被定义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B. 波格丹诺夫等人，对 V. 拉尔采维奇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的书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 7-8 期（1932 年）：第 243-244 页。现在，“忽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活动”而考察其个人是不可接受的。D. 波列塔耶夫，《打着两条战线斗争旗号的托洛茨基主义走私》，《苏维埃国家》，第 1 期（1932 年）：第 136 页。
111.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1 年 12 月 28 日。
112.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76。
113. 关于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参见 A. 德波林，《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斯大林将德波林的体系描述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哲学领域右倾错误的范例”。《真理报》，1931 年 1 月 26 日。P. 沃斯托科夫在《后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斯拉夫世界》，第 11 期（1932 年）：第 289-297 页。
114.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285-288。
115.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181。
116.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69，以及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187。
117.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77-78，以及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185-186，282-284。
118.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卷宗 1131，页 78。
119.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卷宗 1131，页 120 及后续页。
120.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32，页 28-29。
121.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80。
122. 无论如何，秋欣的“神经质的教学方式”为他被清洗提供了理由。“我们必须派他去实际工作，”学生们争论道。“没有其他办法来检验他的改正[俄语原文：ispravlenie]。”两年后，这些开除的理由将被评判为过于温和。1934 年 12 月 28 日，秋欣被带到同一论坛，回答同样的指控，但这一次他被作为“危险的反对派”清洗。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24，目录 2b，卷宗 937，页 11。
123.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725，页 273-280。

124.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73。
125.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 197，目录 1，卷宗 1448，页 62-66，以及卷宗 1132，页 29。
126. TsGA IPD, f. 24, op. 2b, d. 937, ll. 107 - 8.
127.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3 年 10 月 29 日。克里乌林被清洗，并非因为他曾对反对派怀有某种同情——许多人或许都可如此描述——而是因为他坚持其异端立场：“最近库瓦德林非常明确地扔掉了他的党证，以抗议党对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的政策。”TsGA IPD, f. 566, op. 1, d. 267, l. 16.
128.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3 年 10 月 29 日；TsGA IPD, op. 1, d. 912, l. 21.
129. J. 伯格-巴尔齐莱，《苏联革命的悲剧》（特拉维夫：人民出版社，1968 年），第 110 页。
130. TsGA IPD, f. 197, op. 1, d. 722, l. 9.
131. G. 贝科夫，“布尔什维克干部熔炉的十五年”，第 42 - 43 页。
132. TsGA IPD, f. 24, op. 2b, d. 1026, l. 142；《平反》，第 150 页；“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载于 B. 尼古拉耶夫斯基编，《权力与苏联精英》（纽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65 年），第 46 - 48 页。
133. 《第十七次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莫斯科，1939 年），第 518 页。
134.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516.
135.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497.
136. I. 斯拉维娜，《历史的神经》（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根纳季·法贝尔出版社，2006 年），第 152 页。
137. 这种强调救赎的做法并未持续多久：1935 年，彼得松因季诺维也夫主义被清洗，两年后温德里奇被处决——未能揭露彼得松是他的罪行之一。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54 案卷，第 200-201 页。
138. 斯大林，《著作集》，第 13 卷，第 210 页；P. 波斯特舍夫，《从第十六次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4 年），第 152 页。有关分析，参见 J. 哈斯拉姆，《对斯大林的政治反对与俄国恐怖的起源，1932-1936 年》，《历史杂志》第 29 卷，第 2 期（1986 年）。
13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 17 全宗，第 3 目录，第 922 案卷，第 16 页，转引自 A. 格蒂与 O. 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毁，1932-1939 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13 页。
140. 《工农政府法律和命令汇编》，第 36 期（1934 年）：第 283 页；《消息报》，1934 年 7 月 11 日。这项改革在 F. 本维努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改革”，1934 年》中有讨论，《欧亚研究》49（1997）。
141. P. 所罗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刑事司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66 页。
142. W. 莱昂哈德，《革命之子》（芝加哥：H. 雷格纳里出版社，1957 年），第 22 页。
143. P. 科涅奇尼，《建设者与逃兵：学生、国家与列宁格勒社区，1917-1941 年》（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29-130 页。
144.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4 年 12 月 5 日。
145. N. 茹科夫，《基洛夫遇刺案的侦查与审判》，《历史问题》第 1 卷，第 1 期（2000 年）：第 40 页。
146. M. 伊尔明斯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莫斯科：韦切出版社，2002 年），第 174 页。
147. A. 兹维亚金采夫与 Yu. 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二十世纪俄罗斯与苏联检察官，1922-1936 年》（莫斯科：罗斯彭出版社，1998 年），第 455-456 页。
148. 关于尼古拉耶夫的审讯，参见茹科夫《基洛夫遇刺案的侦查与审判》，第 34-35 页。
149. 《苏联最高法院公报》，第 6 期（1991 年）：第 19 页。
150. A. 基里林娜，《不为人知的基洛夫》（莫斯科：“奥尔玛-新闻”出版社，2001 年），第 295 页。
151.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471；《苏共中央通报》，第 7 期（1989 年）：第 69 页。

152.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4年12月2日。
153. V. 列利亚夫斯基，《提高阶级警惕性》，《斯大林主义者》，1934年12月11日。
154. N. 津科维奇，《领袖与战友：监视、诬告、迫害》（莫斯科：奥尔玛新闻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155.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4年12月4日。
156. 伊尔明斯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174-76。
157. 格蒂与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158。
158. B. 布留哈诺夫与E. 绍什科夫，《不可赦免：叶若夫与1936-1938年的叶若夫现象》（圣彼得堡：彼得罗夫基金会，1998年），第49页；B. 斯塔尔科夫，《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载J. 阿奇·格蒂与罗伯特·T·曼宁编，《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新视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叶若夫的崛起既源于他担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党的最高道德委员会——也源于他作为党监督基洛夫遇刺案调查的职位。1936年，他将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党的干部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交织在一起。契卡的第一任负责人捷尔任斯基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他的副手雅科夫·彼得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任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伊万·阿库洛夫是组织局成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苏共中央通报》，第7期（1990年）：第93页。关于叶若夫的崛起，参见A. 波利扬斯基，《叶若夫：斯大林“铁腕”人民委员史》（莫斯科：韦切出版社、阿里亚-艾夫出版社，2001年）；A. 格蒂，《叶若夫先生前往莫斯科：一位斯大林主义警察首脑的崛起》，载W. 赫斯本德编，《现代俄罗斯的人类传统》（特拉华州威尔明顿：SR图书出版社，2000年）。
159.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
160. A. 雅科夫列夫等，《卢比扬卡：斯大林与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1936年12月》（莫斯科：罗斯彭出版社，2003年），第592-593页。
161. 《真理报》，1935年1月23日；N. 彼得罗夫与K. 斯科尔金，《1934-1941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莫斯科：兹维亚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481。
162. 布留哈诺夫与绍什科夫，《不可赦免》，51。
163.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475。
164. N. 罗森费尔特，《斯大林的特别部门：关键来源的比较分析》（哥本哈根：C.A. 赖策尔斯出版社，1989年），第25页；C. 胡珀，《亲密的恐怖：1930年代苏联的家庭政治》，载C. 基尔与E. 奈曼编，《苏维埃早期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注38。
165. V. 伊万诺夫，《骑士团的使命：二十世纪末至四十年代苏维埃俄罗斯镇压机制（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北部材料）》（圣彼得堡，1997年），第67-69页。
166. R. 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年），第86页。
16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17全宗，第3目录，第948案卷，第95页；《三十年的斯大林政治局》（莫斯科：AIRO-XX出版社，1995年），第64-65页。
168. 乌里希是一位1914年获得法律学位的“职业革命家”，革命后加入国家安全机关。乌里希的固定地址是大都会酒店205号房间——作为签署全苏大部分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旅途中。A. 霍列夫，《乌里希法官》，《红星报》，1989年4月8日；N. 奇斯季亚科夫与N. 马斯洛夫，《为非法服务：V.V. 乌里希与司法的扭曲》，《武装力量共产党人》，第7-8期（1991年）：第219-222页；《工农政府法律和命令汇编》，第36期（1934年）：第284页。
169. R. 瑟斯顿，《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怖 1934-1941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第240、461页。数千起

处决在 1934 年 12 月的省报内页上报道。V. 马斯洛夫与 N. 奇斯季亚科夫,《斯大林镇压与苏维埃司法》,《共产党人》,第 10 期(1990 年):第 105 页。

170. “‘成千上万的人在苏联看到了他们希望的体现’——罗曼·罗兰与 И. В. 斯大林 1935 年 6 月 28 日谈话记录》,《史料》,第 1 期(1996 年):第 147 页。

171.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第 467-468 页。关于此事的前史,参见 G. 范登贝格,《苏联与死刑》,《苏联研究》35 (1983): 154 - 59.

172. Yu. 谢多夫,《无辜被处决者》,《劳动报》,1990 年 12 月 4 日。

173. Yu. 谢多夫,《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基洛夫?》,《劳动报》,1990 年 11 月 25 日。

174. 《平反》,191 - 92.

175. 《平反》,191 - 92.

176. 考虑到前一个时期席卷全国的暴力,如果领导层愿意,基洛夫遇刺的反响本可以不那么戏剧化。利用年龄和名声赋予的豁免权,行为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正是提出了这一点:“报纸将基洛夫遇刺渲染成政治事件。我拒绝接受这一点。一定是嫉妒或某种个人冲突导致了这起死亡。为什么要堆起尸体,我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法制》,第 1 期(1991 年):第 69 页。

177. 《平反》,194 - 95.

178. 关于党中央信件在列宁格勒的反响,参见 K. 博特布洛姆,《安德烈·日丹诺夫的生平与时代,1896-1948 年》(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6-127 页。

179.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55 案卷,第 21-24 页。

180.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76 案卷,第 6 页。

181.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55 案卷,第 24、27、36 页。

182. 《平反》,129.

183.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725 案卷,第 20 页。

184.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第 1816 全宗,第 2 目录,第 5095 案卷,第 132-134 页。

185. 听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描述 1930 年形成的右派-左派反对派集团的活动,人们会以为一群撒旦教徒正在活动。10 月 20 日,一名告密者告诉奥尔忠尼启则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洛米纳泽——奥尔忠尼启则的门徒“声称我们正走向一场巨大的危机,领导层力不胜任,因此左派必须行动。”显然,奥尔忠尼启则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道,“这意味着他们想取代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他们自称什么吗?政治局!”通过将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描述为对农民和工人阶级漠不关心,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暗示他们是叛徒。作为回报,奥尔忠尼启则将他们的纲描绘为反革命爆发。两个布尔什维克团体都使用了相同的形象和意识形态,但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调和。

任何涉及政治议题的共产党人私人聚会,仅仅因为其私密性质,就可能变成黑弥撒。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小反对派分子的报告列出了令人困惑的策略:他们仿效官方结构,伪装成真正的党,并喷吐谎言。1930 年 10 月 22 日晚,三名这样的违规者——加尔佩林、努西诺夫和卡夫赖斯基——被传唤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否认今天见过彼此”。被目击者反驳后,他们承认在卡夫赖斯基的公寓见过面,但声称“这不是一次协商会议 [с о в е щ а н и е]。我们曾一起吃苹果。”那他们谈论了什么呢?“畜牧业。”奥尔忠尼启则恍然大悟,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异己分子 [异己]

分子。”在 1933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反对派团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斯基里亚托夫提出了类似的主题：“这些人会面并讨论我们党的工作和我们的缺点，不是为了帮助党，而是为了改变党的路线。”这是不能容忍的：“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在任何地方坚决捍卫，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私下谈话中。”

由于阴谋分子几乎在每个街区都在开会，党员们需要磨练自己的本能。副国防人民委员阿尔克斯尼斯“知道有一个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看到了它，感受到了它……众所周知，这些人私下会面

在私人公寓里，一起喝酒……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集团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更具洞察力和敏锐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都能够认识到，例如，农学家瓦维洛夫领导着“政治中心”，这是众多反革命黑色弥撒之一：“瓦维洛夫的集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辞藻……他们假装忠诚的态度，假想入党……以掩盖他们真实的想法和观点。”

然而，有趣的是，当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描述他被处决的父亲及其朋友们的活动时，他也诉诸于黑色弥撒的形象。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故事展开如下：1937 年 6 月，就在即将到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前——据说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受到老近卫军的挑战——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聚在一起，其中包括皮亚特尼茨基、卡明斯基和菲拉托夫：“谈话的主题是斯大林，他的领导方式，党内难以忍受的局势……人们一致认为：必须将斯大林从领导职位上撤下来。在中央委员会全会期间，必须谴责恐怖政策并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以‘一杯茶’[一杯茶]为名的委员会——菲拉托夫出卖了他的同志们——被斯大林知晓，随后内务人民委员部摧毁了所有参与者，包括告密者。”值得注意的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证实了对老党领导层的指控——反对派是真实存在的，其叛乱意图是严肃的。这更有趣的是，因为他所提及的事件被证明是虚构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种关于抵抗的幻想，它挪用了官方的恐惧症并反转了其价值。 《三十年代斯大林政治局》， 102 - 3 页；RGASPI, f. 17, op. 2, d. 514, ll. 50, 58 - 60, 引自 E. Van Ree, 《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二十世纪革命爱国主义研究》(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133 页；I. Kantor,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Moscow: Ogonek Vremia, 2005), 401 页；Ia. Rokotinskii 等, 《刽子手的审判——尼古拉·瓦维洛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囚牢中——传记随笔》(Moscow: Akademia, 1999), 54 - 55 页；A. Antonov-Ovseenko, 《暴君的肖像》(New York: Khronika, 1980), 292 页。我在 I. Halfin 的著作中更详细地探讨了黑色弥撒的主题： 《亲密的敌人：妖魔化布尔什维克反对派, 1918-1928》(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250 - 60 页。

186. 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换言之，问题是谁有权使用与革命相关的词语和表达。任何阅读 1930 年代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材料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官方话语与异议者话语之间的亲和性。想想一些异见青年协会的名称——例如，“革命斗争联盟”、“民主青年联盟”——这些名称明显受到列宁主义传统的启发。任何采用这类名称的团体都挑战了政治局作为革命传统唯一继承者的权威和合法性。1932 年 11 月和 12 月，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存在“非法学生组织”进行“积极的反革命活动”。经过持续到次年春天的深入调查，当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部门负责人菲利普·梅德韦季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宣布

揭露了一个反革命学生组织集团。“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列宁主义者联盟”、“俄罗斯民族民主进步党”和“列宁之路”分别设在电工技术学院、民用航空学院和赫尔岑师范学院。这些团体的名称本身就体现了黑色弥撒的颠倒逻辑。正因为官方和非法纲领是彼此的复制品，所以没有讨论或收编的空间。只有一个实体能够体现工人阶级。通过暗示斯大林的政治局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列宁之路”指控其背弃了职责。作为回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学生组织描述为“反革命的”。针对“列宁格勒反革命学生集团”的指控语言，可以追溯到1930年针对孟什维克破坏分子的案件（在引言中讨论过），并预示了十年后期针对托洛茨基主义恐怖分子的指控（见第2章）。

根据梅德韦季的说法，学生团体“通过计划推翻党的领导（他们的最低纲领）以及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随后恢复资本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找到了共同点。”列宁主义者联盟和俄罗斯民族民主进步党谈到了恐怖主义。“列宁之路”则更具体，“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的旗帜”。调查人员在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卡申教授家中搜出的该团体宣言中，包括呼吁“改组政治局并对主要苏维埃机构进行类似变革”、“禁止斯大林和其他几位政治局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全面恢复党内民主”。实现最后一个目标需要“每年召开党代会，在此之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讨论，期间所有党员都能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一系列改革将影响经济、学校和政治。在政治局改组后的两个月内，将消除饥荒，正常规划将成为工业企业的常规做法，工人将获得“现实的工资”和“充分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权利”。围绕学术劳动的压抑气氛只有通过“结束行政和政治上的反动……尤其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出版“所有学术成果，除非其公然反革命或唯心主义”才能解除。

官方的“革命”政党与其非法翻版在话语上的不可分割性，解释了为什么叛乱学生集团模仿了布尔什维克长期使用的组织方法。学生集团梦想着与工厂工人和红军士兵建立密切关系，希望吸引有资历的领导人，并赞同保密和密谋。还有什么比同一个学生发出的“党内的革命”而非“反对党的革命”的呼吁更令人困惑的呢？如果一个学生在加入“列宁之路”之前获得了党证——正如卡申被建议的那样——那是因为要成为一名反对派，首先必须是一名共产党员。有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甚至难以区分官方和非官方：尽管梅德韦季想声称大多数叛乱学生是“异己分子”，但他承认“其中一些人是党员和共青团员。” G. 里特- 尔斯波恩，《战前十年青年的社会交往形式与苏维埃政权的设定》，载于 T. Vihavainen 编，《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与价值：俄罗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St. Petersburg: Zhurnal “Neva,” 2000），349 - 54 页；R. Ganelin 编，《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如何被送去处决：关于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卡申生与死的文献》（St. Petersburg: Nestor, 2006），63 - 82 页。

187. TsGA IPD, f. 197, op. 1, d. 1448, ll. 85 - 88。
188. K. Clark, 《政治史与文学时空体：一些苏联研究》，载于 G. Morson 编, 《文学与历史：理论问题与俄罗斯案例研究》(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3 页。
189. 为了鼓励普通党员参与 1933 年的清党运动，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下令放置特殊箱子，匿名投稿人可以在其中存放关于任何人格或过去行为的证明。Konecny, 《建设者与背叛者》，127 - 28。
190. Iakovlev 等, 《卢比扬卡》，650。
191.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来信》，53 页。
192. 《平反》，164, 166。
193. 《真理报》，1934 年 12 月 23 日, 1935 年 1 月 16 日；《苏共中央通报》，第 7 期 (1989): 70 页。
194. O. Kutafin 编, 《宗教裁判官：斯大林的检察官维辛斯基》(Moscow: Respublika, 1992), 142 - 43 页。
195. 《平反》，168。
196. Getty 和 Naumov, 《通往恐怖之路》，163 - 64。
197. 《平反》，159 - 60。
198. 《平反》，161。
199. 《平反》，168。
200.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来信》，56 页。
201. 《平反》，154 页；Conquest, 《大恐怖》，89。
202. 《平反》，161。
203.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4 年 12 月 24 日。
204. V. Ivanov, 《骑士团的使命》，68 - 69。
205.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922, l. 9, 1935 年 2 月 2 日。
206. TsGA IPD, f. 1816, op. 2, d. 5092, l. 61。
207.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922, ll. 17 - 21。
208. Kononov, 《重建党的工作的初步成果》，《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3 月 29 日。
209. TsGA IPD, f. 408, op. 1, d. 18, ll. 25 - 27。
210.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26, ll. 8 - 9。
211. TsGA IPD, f. 197, op. 1, d. 1655, l. 19。
212. R. Prede, 《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佳斗士》，载于《以 I. V. 斯大林命名的共产主义农业大学学报》(Leningrad, 1935), 4 页。
213.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26, ll. 10 - 14。
214. TsGA IPD, f. 24, op. 2b, d. 1256, ll. 94 - 95。
215. 《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1 月 21 日。
216. TsGA IPD, f. 1816, op. 2, d. 5091, l. 132。
217. TsGA IPD, f. 566, op. 1, d. 255, ll. 25 - 26。
218. TsGA IPD, f. 566, op. 1, d. 255, ll. 51 - 52。
219. TsGA IPD, f. 197, op. 1, d. 725, l. 270ob。
220. 《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1 月 17 日；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08, ll. 8 - 19, f. 1816, op. 2, d. 5091, l. 142, f. 197, d. 725, ll. 253 - 56, 265, and d. 1447, ll. 91 - 92。
221. TsGA IPD, f. 197, op. 1, d. 1448, l. 88。
222. 很少被简单地视为回归到无意识状态——启蒙过程是不可逆的——共产党员必须为他们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普通同志可以说他们的错误是由于“思想空白”(思想空白)或“思想短视”(思想短视)造成的，那么老党员就没有这样的选择。在中央委员会

在 1930 年 12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阿列克谢·李可夫承认他的反对派言论是在“头脑清醒、记忆可靠、完全理解自己所讲内容的情况下”作出的。帕维尔·波斯特舍夫在 1938 年 1 月 14 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称，无论他犯过什么错误，“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这一主张反而加重了他的困境。卡冈诺维奇恰如其分地反驳道：“你必须为你的政治罪行在中央委员会面前负责。”李可夫和波斯特舍夫最终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反革命分子被枪决。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 108, 166.

223.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57。
224.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张 28 - 31。
225.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75 - 76。
226.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55，张 29。
227.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38，以及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448，张 14。
228.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70 - 71，以及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104。
229.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86。
230.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75。
231. 加涅林， 《你们这是在对我做什么！》 33.
232.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142。
233.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142。
234.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54。
235.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0，张 4。
236.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57。
237.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55。
238. 维·别林斯基， 《全集》 （莫斯科，1953 - 59 年），第 7 卷：第 313 页，引自伊·帕佩尔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现实主义时代：行为符号学研究》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5 页。
239. 另一位因反对主义而受污名的历史学家奥齐普作出了更深刻的忏悔，希望能在阿尔沙夫斯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我犯了绝对愚蠢的错误，没有公开否定我作过的一两次季诺维也夫派演讲，”她懊悔地承认，“我被恐惧吞噬，担心这样的行动会被解读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保住领导职位的欲望。”但正如随后堆砌在她身上的指控所暗示的，奥齐普的道歉适得其反：“奥齐普的内心是反对派。她占据了党内的高级职位——我们说的是列宁格勒！——她肯定极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性格暴躁的奥齐普用尽全部精力与党作斗争”；“奥齐普是个两面派；基洛夫遇刺后，她等到我们第三次会面时才进行自我批评。”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55，张 45 - 46。
240. 曾经属于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政党，然后在 1920 年代中期支持托洛茨基，这就足以确保在 1935 年被清洗。雅科夫·所罗门诺维奇·马泽尔，一位苏联各民族历史讲师，在过去几年中至少被开除过四次，但他在恢复党籍的申请中一直很成功。马泽尔总是能够说服党，正如他那个富裕的犹太企业家家庭正在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一样，他正在有意识地转向拥抱马克思主义。“我与家人分开生活，”马泽尔再次试图解释，但他从犹太复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不被相信。“我们早该摆脱这个异己分子了，”学生们宣称。简短的审问证实，在 1918 年波兰占领明斯克期间，马泽尔的妹妹移居到了巴勒斯坦。更糟的是，马泽尔的父亲也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上台，基洛夫的刺客据称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海外的亲戚意味着一个人可能是潜在的间谍。即使是普雷德

为马泽尔进行的犹豫不决的干预，也没能帮助这位讲师获得体面的听证。马泽尔被清洗、逮捕，并流放到雅库特。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张 270。

241. 利·伊万诺娃，《苏联历史学的起源：1917-1929 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干部的培养》（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8 年）。关于大清洗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命运，见阿·利特温，《*无权思想：大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命运概述*》（喀山：鞑靼图书出版社，1994 年）；罗·盖内林，“斯大林与战前年代的苏联历史编纂学”，《*新卫士*》，第 6-7 期（1998 年）；阿·杜布罗夫斯基，《*历史学家与政权：苏联历史科学及封建俄国历史概念在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状况（1930-1950 年代）*》（布良斯克：以伊·格·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命名的布良斯克国立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4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托姆辛斯基、佩切尔斯基、戈尔洛夫斯基、梅拉梅德、马雷舍夫、奥尔洛夫和德米特里耶夫，第 1 卷，张 244。
243. 克·施特帕，《*俄国历史学家与苏维埃国家*》（新布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51、107 页。
24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78。
24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78。
24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75。
24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71。
24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44。
24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75。
25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68。
251.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74。
252.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全宗 1816，以及目录 2，案卷 5091，张 110，以及案卷 5095，张 31。
25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71。
25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72。
25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张 272-73。
25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第 21814-36 号，针对蔡德尔等人，第 1 卷，第 1 册，张 275。
257. 1934 年 10 月 28 日，中央委员会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权力，将“社会危险分子”从大城市流放到各省并置于直接监视下，“或将其关押在劳改营中，期限最长为五年”。特别委员会是一个法外机构，仅由秘密警察官员组成。除了苏联检察长名义上的参与外，没有司法官员、法官或律师参与。姆·克卢索夫，“古拉格系统作为权力要素”，见弗·德米特连科、格·库利科娃、利·亚鲁希纳编，《*苏联的权力与社会。镇压政策（1920-1940 年代）*》（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1999 年），第 204 页。
258.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张 31-32。
259.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的人*》，48。关于对“社会异己分子”的平行清洗，见利·里梅尔，“恐怖的缩影：或列宁格勒的阶级斗争：1935 年 3 月对‘异己分子’的流放”，《*东欧历史年鉴*》，第 48 期（2000 年）。
260.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张 14。
261.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的人*》，48。
262.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张 16-17。
263.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张 17。
264.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张 14-27。
265. 关于清洗和社会净化的预防性方面，见彼·霍尔奎斯特，“作为技术的国家暴力：极权主义中的暴力逻辑”，见阿·韦纳编，《*人类花园的景观改造：二十世纪人口管理的比较*

框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彼·哈根洛，“‘社会有害分子’与大恐怖”，见希·菲茨帕特里克编，《斯大林主义：新方向》（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关于作为“社会预防”措施的流放，见《环节》（莫斯科：1991年），第1辑，第517-20页。

266. 阿·盖蒂，《大清洗的起源：重新审视苏联共产党，1933-1938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267. 关于该主题的当代、引领潮流的电影化处理，见莉·卡加诺夫斯基，“斯大林主义电影中的视觉快感：伊万·佩里耶夫的《党证》”，见克·基尔和埃·奈曼编，《早期苏维埃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268. 《平反》，192。

269. 盖蒂，《起源》，第61页；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816，目录2，案卷4408，张1，以及全宗197，目录1，案卷982，张192。

270. 审查伴随着清洗，清洗从1月开始，并断断续续持续了整个一年。《斯大林主义者》，1935年1月17日，27日。

271.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1026，张8-9。

272. 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982，张240-41。

273. 《斯大林主义者》，1935年6月2日。当报告党证丢失时，某个采德林采用了警察调查员的口吻：“1934年11月7日，我带着两个孩子去参加周年纪念游行。在七月三日街拐角处，我被游行的人群赶超；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军大衣衣襟被猛地向后扯；两颗纽扣被扯掉了。由于负责孩子们的安全，我只能在从人群中脱身之后才能检查口袋。就在那时，我确定我裤子左边口袋里的党证被偷了。”采德林毫不怀疑是敌人拿走了他的证件；小偷本该更喜欢他的钱包，“但钱包还在右边口袋里，没被动过。”采德林因“事件发生后四天才报告抢劫”而受到批评。中央国家当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816，目录2，案卷5092，张30-31。

274. 《斯大林主义者》，1935年9月17日。

275.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9月9日。

276. TsGA IPD, f. 197, op. 1, d. 1655, ll. 82-85。

277.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9月23日。

278. 盖蒂，《起源》，67-79。

279. N. 列别杰夫，“敏锐地保卫党免受所有敌人侵害”，《斯大林主义者》报，1936年3月2日。

280.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6年10月8日；TsGA IPD, f. 197, op. 1, d. 725, l. 23, 及 d. 986, l. 6。

281. 关于全国层面以及列宁格勒具体审查情况的概述，参见《党的建设》，第2期（1936年）：第9页；《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年1月18日，2月27日。

282.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9月17日。

283.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9月23日。

284.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10月7日。然而，阶级问题很快被搁置：1935年12月29日，政治局宣布必须废除所有基于学生社会出身的限制。RGASPI, f. 17, op. 3, d. 974, l. 137, 引自盖蒂和瑙莫夫，《恐怖之路》，186。

285. 《斯大林主义者》报，1935年10月25日。另一名学生，某个安东诺夫的阶级背景和性质也引起了怀疑。审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回忆道：“当我们要求出示证明时，它们显得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与他家乡省份当局的通信

被证明无效，我们不得不派遣我们自己的调查员前往现场。”情况立刻明朗化：原来在1917年，安东诺夫曾“自愿加入克伦斯基的军队。当红军成立时，他逃离了队伍，返回了他的

富农经济。”安东诺夫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敌人：“一个高利贷者，‘在春天拯救农民于困境’，却在收获后要求双倍回报。”将年轻的安东诺夫送往大学的党组织书记被指控认可其‘中农’的自述，从而使其得以虚假身份就读于共产主义大学。TsGA IPD, f. 1816, op. 2, d. 4922, l. 57。

286. TsGA IPD, 叶廖缅科个人档案, 702117, (5), 11. 10 – 11。

287. TsGA IPD, 叶廖缅科个人档案, 702117, (5), 1. 5。

288. 关于列宁格勒安全机构的历史, 参见 V. 别列日科夫, 《彼得格勒的 检 察 官 们: 1918 – 1954 年契卡-国家安全部领导人》(圣彼得堡: 俄-波罗的海信息中心 BLITS, 1998 年)。另见两篇论文: L. 拉斯卡佐夫, “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政治体系形成与运作机制中的作用 (1917 – 1941)” (博士论文, 圣彼得堡, 1994 年); S. 库德里亚夫采夫, “1930 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期间的党组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 (基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材料)” (博士论文, 雅罗斯拉夫尔, 2000 年)。

289. V. 伊万诺夫, 《使命勋章》, 72 – 73。

290. RGASPI, f. 17, op. 120, d. 184, 11. 63 – 66, 引自盖蒂和瑙莫夫, 《恐怖之路》, 198。

291. 在全国范围内, 被清洗者中有 8.7% 遭逮捕; 叶若夫给出的相应数字是 15,218 次逮捕对应 177,000 次开除党籍。(然而, 应当指出的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提供了一个较低的数字, 被清洗者中仅有 2% 被捕。) RGASPI, f. 17, op. 120, d. 177, 11. 20 – 22, 引自盖蒂和瑙莫夫, 《恐怖之路》, 198。

29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案卷编号 21841-36, 针对扎伊德尔等人, 第 1 卷, 1. 275。

293. 《苏共中央通报》, 第 2 期 (1991 年): 第 205 – 206 页。

294. V. 申塔林斯基, 《自由的奴隶: 在克格勃文学档案中的巴别尔、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克柳耶夫、普拉托诺夫、高尔基》(莫斯科, 1995 年), 第 352 页。

295. 《身后平反: 回归真理》(莫斯科: 法律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第 415 – 16 页。

296.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控制党组织的论证, 参见 A. 拉祖米欣与 T. 索科洛娃, 《领袖、主人、专政者: 文集》(莫斯科: 爱国者出版社, 1990 年), 第 51 页; O. 赫列夫纽克, 《1937 年: 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苏联社会》(莫斯科: 共和国出版社, 1992 年), 第 228 页。在某些案例中, 区委书记试图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活动置于管控之下, 指出其“运作中的违法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了反击。仅举一例: 莫斯科沃斯克列先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指示下属在接受区委询问时不得透露任何信息。“强调调查工作的保密性”, 他对下属如是说。在此案例中, 内务人民委员部取得胜利, 敢于挑战安全机关的当地党组织第一书记戈尔布利斯基遭到逮捕。而在相反的案例中——取自斯摩棱斯克省别雷区——党委领导成功推动清洗了干预其事务的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维诺格拉多夫。A. 瓦特林, 《地区规模的恐怖》(莫斯科: ROSSPEN 出版社, 2004 年), 第 83 – 84 页; R. 曼宁, “一个乡村地区的大清洗: 重访别雷区”, 载于格蒂与曼宁编, 《斯大林主义恐怖》, 68。

297. 若被捕者中不同比例的人员此前已被最终定罪, 1935 年的定罪人数比逮捕人数超出 7.4 万余人。显然, 数千名在基洛夫遇刺前已被羁押的人员, 在政治指控下被重新定罪。格蒂和瑙莫夫, 《通往恐怖之路》, 156 – 57。

29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 全宗 1816, 目录 2, 案卷 4408, 页 123 – 31。

299. 1935 年 8 月至 1936 年 1 月间，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 930 名季诺维也夫分子和 81 名托洛茨基分子。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第 359 页注释 21。

300. 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69.

301. *《环节》*， 第 1 辑，第 400 页，403 - 404 页。关于一个家庭在三天内变卖家产前往哈萨克斯坦的类似故事，参见 V. 加罗斯、N. 科列涅夫斯卡娅与 T. 拉胡森编， *《亲密与恐怖：1930 年代苏联日记》*（纽约：新出版社，1995 年），第 335 - 338 页。

302.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26，页 15。

303. *《列宁格勒真理报》*， 1936 年 1 月 3 日。

304. 大清洗的数据层面也显示出分期界定的模糊性：

	<i>起诉 处决</i>
1934	78, 9992, 056
1935	267, 0761, 229
1936	274, 6701, 118

数据清晰说明了为何 1939 年被视为大清洗的终结点：当年逮捕和处决人数骤降。这也解释了历史学家对大清洗起始时间的分歧：若以逮捕为标准，则 1934 年 12 月基洛夫遇刺是起点；若以处决为标准，则 1937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才是决定性开端。V. 波波夫，“苏联时期的国家恐怖（1923 - 1953 年）”， *《祖国档案》*， 1992 年第 2 期，第 28 页。

305. “根据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改组工作”，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4 月 1 日。

306. 斯大林镇压机器内部形成的同盟关系超越了行政划分。部门间冲突从未停止，但党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体系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因此，政治局内部存在激烈（尽管记录不足）的斗争：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斗争（常涉及后者保护重工业部亲信的举措）；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与地方机构之间的斗争。1935 年 1 月 26 日，雅戈达攻击时任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任的梅德韦季：“你雇佣了破坏市内肃清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工作的叛徒。”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扎科夫斯基与更具法制观念的当地调查人员之间也存在冲突。O. 赫列夫纽克， *《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1930 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青年俄罗斯出版社，1993 年）；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67 - 69, 211.

307. 当德米特里耶夫被捕时，1935 年 6 月 17 日的中央委员会规章——要求检察官“对每项无依据逮捕承担个人责任”——仍然有效。直到 1936 年底，司法系统才承认“在调查托洛茨基分子、右翼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时，我们不应干预”。 *《历史档案》*， 1992 年第 1 期，第 127 页； *《镇压：检察官的命运》*（莫斯科：法律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30 - 32 页；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221.

30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8，页 7；尤·斯捷措夫斯基， *《苏联镇压史》*（圣彼得堡，1997 年），卷 2：第 10 页。

309. 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第 69 - 70 页。中央委员会于 1935 年 8 月 23 日明确禁止

秘密警察地方分支机构干预审查程序。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8，页 7。

310. 尼古拉耶夫所谓的同伙在这方面是个例外：清洗他们的党委会是在他们被捕后才召开的。基里琳娜，《未知的基洛夫》，292。

311. 《真理报》，1936 年 3 月 18 日。

312.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 年 3 月 17 日。

313. S. 杰米多夫与 S. 福尔德，“卢津与‘民族法西斯中心’事件”，载于 J. 道本、M. 福尔克斯与 H. 伍辛编，《数学史：研究现状》（圣迭戈：学术出版社，1996 年），第 137 - 148 页；P. 库兹涅佐夫编，《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诞辰百年纪念》（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83 年）。

314. 攻击卢津的文章发表在《真理报》，1936 年 7 月 2 日、3 日、9 日。另见《科学与技术战线》，第 7 期（1936 年）：125 - 126 页。

315. S. 杰米多夫和 B. 列夫申主编，《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件》（圣彼得堡：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1999 年），32 页。

316. 杰米多夫和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件》，79。

317. 《数学科学成就》（1937 年）：第 3 辑，277 页。

318. 《“工业党”案件（1930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7 日）：审判速记稿及案件相关材料》（莫斯科：国家联合出版社·苏联立法出版社，1931 年）；K. 莱温，《党与叛徒》（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31 年）。

319. A. 列文，“公共运动的解剖：苏联政治史中的‘卢津院士案件’”，《斯拉夫评论》第 49 卷，第 1 期（1990 年）：91 页。

320. 《科学与技术战线》，第 7 期（1936 年）：125 - 126 页。

321. 杰米多夫和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件》，150, 134。

322. 杰米多夫和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件》，26。

323. 杰米多夫和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件》，150, 177。

324. 杰米多夫和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134。

325.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262 - 63。

326.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68, 68 - 69。

327.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71 - 72。

328.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134, 150 - 51。

329.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177, 194 - 95。

330. 《真理报》，1936 年 8 月 6 日。

331.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197。

332. 杰米多夫与列夫申，《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卢津院士案》，203.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 1936 年 8 月 5 日的判决是宽容的：“我们希望卢津能够利用公开且一致谴责的契机，调整自己的行为。”《苏联科学院通报》，第 8-9 期（1936 年）：第 7-8 页。

第二章

1. 由于 1936 年初，地方党层面对付反对派的现有形式被认为效率低下，斯大林的办公厅组建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政治司由十三个部门组成，按其目标进行区分；其中与本章最相关的第一个部门，被指示针对党内异端。V·伊万诺夫，《使命团：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末苏维埃俄罗斯镇压机制（基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北部资料）》（圣彼得堡，1997 年），第 369 页注 36。

2. 关于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于共产主义审判，参见

P·斯坦纳，《波希米亚的沙漠：捷克小说及其社会背景》（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0-183页。

3. B·斯塔尔科夫，“未举行的审判”，《欧亚研究》46（1994）：1304。
4. B·阿纳尼奇与V·帕涅伊亚赫，“强迫合著”，载于F·佩尔切诺克、A·多布金与M·索罗金娜编，《纪念文集：F·F·佩尔切诺克历史文集》（莫斯科：凤凰出版社，雅典娜出版社，1995年）；B·阿纳尼奇与V·帕涅伊亚赫，“作为史料的‘学术案’”，《历史札记》第2卷，第120期（1999年）：第343页。
5. B·施图德尔，“消除错误还是消除个人？作为自我技术的斯大林主义党务实践”，载于B·施图德尔与H·豪曼编，《斯大林主义主体：1929-1953年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个体与体制》（苏黎世：苏黎世克洛诺斯出版社，2006年），第209-210页。
6. 《平反：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政治审判》（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7. 作为“政治局国家安全部事务特别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叶若夫在1935-36年冬季已将自己提升至雅戈达之上。B·布里汉诺夫与E·绍什科夫，《罪无可赦：叶若夫与1936-1938年的叶若夫恐怖》（圣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基金会，1998年），第50页。
8. 《平反》，217。
9. L·贝伦特，“‘腐朽教授’与大恐怖”，载于W·拜茨等编，《1938年莫斯科：大恐怖情景》（莱比锡：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萨克森分会，1999年）。
10.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载于B·尼古拉耶夫斯基编，《权力与苏联精英》（纽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65年），第62-63页。
11. 1936年2月至5月间，仅列宁格勒就有1945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被捕。参见V·伊万诺夫，《使命团》，第359页注20。
12. 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保护党员的法律框架开始瓦解。司法委员尼古拉·克雷连科曾对法学生表示：“我们的刑法典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其中一些条款不再适应我国新的社会关系。”1937年3月，维辛斯基对律师们说得更加直白：“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的话，在每个社会的生活中都有法律必须搁置的时期。”因此，逮捕的“集体”批准程序被简化：党委书记通常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备忘录首页上写上“经与局成员核实后批准”或“让我们电话批准逮捕”。A·格蒂与O·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历史问题》，第10期（1994年）：第21、26页。
13. 截至1936年底，共有1800人作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成员”被捕，据称他们活动于列宁格勒的四十二个不同“反革命集团”中。V·伊万诺夫，《使命团》，124；《苏共中央通报》，第8期（1989年）：第83页。
1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号21841-36，指控扎伊杰利、托姆辛斯基、佩切爾斯基、戈尔洛夫斯基、梅拉德、马雷舍夫、奥尔洛夫与德米特里耶夫，第16卷，第1页。
15. A·兹维亚金采夫与Yu·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二十世纪俄罗斯与苏联检察官，1922-1936年》（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54-255页。
1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号21841-36，指控扎伊杰利等，第16卷，第3页。每个案卷应包含逮捕令、搜查笔录、搜查时取得的材料、个人文件、囚犯问卷、审讯笔录、线人材料以及判决书。
17.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德米特里耶夫个人档案689577，（3），第6页。
18.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德米特里耶夫个人档案689577，（1），第1页，以及197全宗，第1目录，第982案卷，第10页。

19.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6 案卷，第 20 页。
20.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德米特里耶夫个人档案 689577，（3），第 5 页。
21.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3 案卷，第 218 页。
22.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037 案卷，第 103 页。
23. 中央国家档案馆人民革命史研究所，德米特里耶夫个人档案 689577，（3），第 2 页。
2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案卷号 21841-36，指控扎伊杰利等，第 16 卷，第 5a-b 页。
25. 关于以证人身份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却被列为被告的个人案例，参见 A·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年），第 49 页；R·加涅林编，《*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是如何被送上刑场的：关于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卡申生与死的文件*》（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审讯员对委员杰列夫佐夫说：“你没有被逮捕；你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被动员来协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军队中的托洛茨基阴谋。”《*镇压权：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外权力（1918-1953 年）*》（莫斯科：库奇科沃波列出版社，2006 年），第 215 页。
26. 《*苏共中央通报*》，第 9 期（1989 年）：第 44 页；《*文学报*》，1987 年 7 月 5 日。
27. J·贝格尔-巴尔齐莱，《*哈-塔*》。《*苏联革命的悲剧*》（特拉维夫：人民出版社，1968 年），第 133 页。
28. 《*未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遗产*》（莫斯科：历史遗产出版社，1992 年），第 40-41 页。
29.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第 15、26 页。由于必要的原始资料访问受限，撰写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方法的历史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将仅限于一些初步观察。在内战期间，被告能够反驳调查人员；他们的审讯笔录只包含否认，而不像 1930 年代那样出现从否认转变为供词的情况。例如，1919 年在契卡关押期间，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能够“否认加诸于我的各种指控”。他的观点引起了审讯者的兴趣，他被允许详细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1930 年 8 月对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审讯笔录只包含回答，问题从未被记录下来。这位著名的民俗学家被指控旨在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德国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他坚持“无罪”的立场，没有被击垮。普罗普在 1934 年的日记中写道：“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似乎获得了保持自我的力量。”还有：“由于我回答时的冷静和一贯性，我在审讯者面前占了上风。”然而，在 1929-31 年的作秀审判中，已经出现了大清洗方法的明确警告。

在沙赫蒂事件中，使用睡眠剥夺和隔离室来获取供词。被告工程师斯科鲁托解释了他初步调查中承认破坏行为的原因：“我几乎不知道自己签了什么……我被威胁搞得心烦意乱，所以我签了……我试图在审判前撤回它，但是……但是……？”尽管严厉的审讯方法在 1930 年代初已根深蒂固，但试探性的证据表明，在叶若夫崛起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谨慎地确保其材料的真实性。1934 年 12 月 13 日，一位名叫盖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内线扎因奇科夫斯卡娅（她在红军军官团中活动）的最新报告边缘写道：“这是一个年老、愚蠢、发疯的女人的胡言乱语。”1935 年之前一直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布兹尼科夫声称：“据我所知，我和我的同事在审讯中都没有使用威胁或骚扰手段。”1934 年 9 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清除那些使用“特殊技术”的小组成员，并“惩罚他们，无论他们是谁”。雅戈达在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职员会议上的讲话让许多调查员记忆犹新：“调查工作是否进行正确吗？不，是不正确的，甚至是犯罪的。无法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系统性的、耐心的揭露被告的工作被要求他认罪所取代。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名囚犯在监狱里坐了两个月，却没有出现任何关于他证词的笔录。突然，出现了一份包含认罪内容的详细笔录。人们会问自己，早期的证词在哪里？……‘是的，我们说服他认罪了，’这类情况的答案如此。首先，这直接违反了法律规范。其次，这使得被告能够撤回证词并指责调查。审讯者有时会对被捕者大喊大叫——这是出于无能。”当伊萨克·巴别尔在 1936 年问雅戈达：“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请告诉我，当一个人落入你们手中时，应该如何行事？”回答是：“否认一切，无论提出什么指控。说‘不’，一再说‘不’，我们就无能为力了。”1936 年初，针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大规模报复的初步步骤遇到了来自 NKVD 领导的抵抗，他们认为几乎没有可以公之于众的证据。NKVD 的政治部似乎倾向于进行有限调查：将反对派地下组织定义为伊万·斯米尔诺夫和少数其他老资格托洛茨基分子——案件就此了结。然而，于 2 月 27 日被提名负责监督 NKVD 的叶若夫，并不会就此罢休。他将 NKVD 副首脑雅科夫·阿格拉诺夫召到他的别墅，交给他斯大林关于“调查人员错误”的笔记，并命令他“揭露这个仍大部分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团伙”。受到鼓舞的阿格拉诺夫在 7 月 23 日亲自对几位前反对派分子进行了新一轮审讯，获取了关于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活动的认罪。年长且持怀疑态度的 NKVD 领导层坚持认为阿格拉诺夫获得的信息是“胡扯”（*чепуха*）和“垃圾”（*ерунда*）。“这不可能，”雅戈达在审讯笔录的页边写道，“这一定是谎言。”在他看来，新资料是“彻头彻尾的伪造”（*липа*）。斯大林打电话给雅戈达，威胁说如果他继续拖延，就要“打他的鼻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

列索夫：《选集》（莫斯科：莫斯科市档案局，2002年），472-473页；A. 马丁诺娃，*《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生平道路：学术活动》*（圣彼得堡：布拉宁出版社，2006年），110、122页；R. 梅德韦杰夫，*《论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0年），229页；E. 莱昂斯，*《乌托邦任务》*（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7年），123页（斯科鲁托案）；*《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1993年），第1辑，100-101页；O. 苏韦尼罗夫，*《1937-1938年红军的悲剧》*（莫斯科：泰拉出版社，1998年），186页（愚蠢的女人）；F. 阿什宁和V. 阿尔帕托夫，*《“斯拉夫学家案”：30年代》*（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222-223页；D. 雷菲尔德，*《斯大林及其刽子手：暴君与为他杀人的人》*（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259页；M. 伊尔明斯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莫斯科：维切出版社，2002年），270-271页（雅戈达的讲话）；*《关于巴别尔的回忆》*（莫斯科：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271页；V. 维诺格拉多夫，*《亨里希·雅戈达。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总政委。文件汇编》*（喀山，1997年），121页；*《历史问题》*，第2期（1995年）：17页；布里汉诺夫和尚什科夫，*《无可辩白》*，150；*《平反》*，178。

30. *《布托夫斯基靶场》*（莫斯科，2004年），第8辑，194页。

31. V. 伊万诺夫，*《使团骑士团》*，137。施泰因曼，一位在德米特里耶夫被捕三个月后被捕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回忆说，对他唯一的证据是某个格拉巴尔的证词：“格拉巴尔是否真的提供了这份证词，我不知道；他们要求我确认它。”然后格拉巴尔撤回了他的指控：“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我根据格拉巴尔随后否认的证词被捕。显然，整个事件是一次挑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施泰因曼案卷宗号 3830-09-36，第15页。

32. 在 NKVD 列宁格勒总部内有一个特别火葬场，焚烧搜查中查获的材料。历史学家卡申（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全部个人档案在他 1937 年被处决后被销毁。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的

斯拉文案中，二十六个装有手稿、笔记本和其他著作的文件夹被烧毁。在列宁格勒，发现了一份文件，命令监狱管理部门销毁与某个人监禁相关的所有文件：他的档案、他的个人卡片、载有他姓名的字母名单——都必须化为纸浆。然而，这些例子是例外，而非规则：NKVD 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其活动保持详细记录，并创建了大量记录清洗活动的文件。安全机构因感知到威胁而秘密运作，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大规模处决感到不安。尽管已知列宁格勒 NKVD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立即销毁了囚犯的个人材料，但大部分调查材料得以保存至今。I. 斯拉维娜， 《历史的纤细神经》（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根纳季·法伯尔，2006 年），141 页；苏韦尼罗夫， 《悲剧》，151，173；《布托夫斯基靶场》，第 8 辑，141 页；加涅林， 《你对我做了什么！》51。

33. 参见 C. 金兹堡，《作为人类学家的审判官》，载于 《线索、神话与历史方法》（纽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 年），159 页。
34. 阿纳尼奇和潘内亚赫，《作为历史来源的“院士案”》，339 页。
35. 大多数 NKVD 审讯在夜间进行。幸存者证实，审讯室没有窗户以及刺眼的灯光会产生方向迷失的效果。J. 贝格尔-巴尔齐莱，《午夜闪光》[午夜闪光]（特拉维夫：阿姆·奥维德出版社，1962 年），37、39 页；R. 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8 年），200 页。
36. A. 魏斯贝格，《沉默的阴谋》（伦敦：汉密尔顿出版社，1952 年），232 页。
3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扎伊杰尔等人案卷宗号 21841-36，第 16 卷，第 9 页。
38. 魏斯贝格，《沉默的阴谋》，218。
3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扎伊杰尔等人案卷宗号 21841-36，第 16 卷，第 9-10 页。
4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扎伊杰尔等人案卷宗号 21841-36，第 16 卷，第 10 页。
41. 在 1939 年 11 月 16 日写给苏联检察长的信中，被捕的剧院导演梅耶尔霍尔德提到他的审讯者“可怕的捏造”（*ЧУДОВИЩНЫЕ ВЫМЫСЛЫ*）。B. 索佩尔尼亚克，《分期死亡》（莫斯科：盖亚出版社，1998 年），253-254 页。
4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马泽尔案卷宗号 46960，第 57 页。
43. 贝格尔-巴尔齐莱，《哈-特》。拉杰亚赫，135。
44. D. 博戈莫洛夫和 A. 拉祖莫夫，《列宁格勒殉道录》（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1998 年），第 3 卷：579 页；V.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莫斯科：AST 出版社，2001 年），136 页。
45. 例如，军官洛帕京被审讯了二十八次，但他的个人档案中只有三份审讯笔录。另一位高级军官格里亚兹诺夫被审讯了七十一一次，只有一份笔录存世，日期是 1937 年 10 月 15 日。即使这份笔录也是伪造的：我们知道在那天格里亚兹诺夫并未被传唤到审讯室。苏韦尼罗夫，《悲剧》，181。
46.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49。签名常常是在胁迫下获得的。作家皮利尼亚克的亲笔签名出现在他审讯笔录的每一页底部以及他的答案下方，尤其具有启发性。笔迹并不总是与皮利尼亚克的相符。在一个案例中，同一页的同一位置出现了两个签名；在另一个案例中，签名贯穿了句子的中间，表明它是在一张干净的纸上签署的，文字是后来添加的。V. 申塔林斯基，《自由的奴隶：在克格勃文学档案馆中》（莫斯科：帕鲁斯出版社，1995 年），203 页（皮利尼亚克）；A. 利特温，《作为历史来源的苏联政治案件侦查档案》，载于《20 世纪俄罗斯历史文献出版问题》（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2001 年），334 页。
47. 《平反》，182。

48. 瓦特林, 《地区规模的恐怖》, 15, 26.
49. E. 施奈德曼, 《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 逮捕、审讯、枪决》, 《星》, 第1期(1996年): 86页。
50. 《镇压权》, 219.
51. 索科洛夫, 《恐惧的人民委员》, 129.
52. 魏斯贝格, 《沉默的阴谋》, 238.
53. F. 贝克和 W. 戈丁(化名), 《俄国的清洗与逼供》(伦敦: 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社, 1951年), 53-54页。被告几乎总是屈服,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抵抗多久。1938年3月, 诗人尼古拉·扎博洛茨基被连续审问了四天四夜, NKVD 审讯者轮番上阵。来自马里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维·皮金娜在1941年向斯大林抱怨说, 她在第一次审讯中站了三十六小时, 第二次站了五十八小时。即使是被定义为“证人”而非“被告”的人, 也可能被迫靠墙站立两天, 不得睡觉。据称, 有些情况下被告可以控制审讯的持续时间。例如, 1937年9月1日, 对“德国反革命地下组织”成员迪特里希的审讯据称是“应被告要求”终止的。A. 埃卡特, 《消失得无影无踪》(伦敦: M. 帕里什出版社, 1954年), 175页; N. 扎博洛茨基, 《我的监禁史》, 《往昔》(莫斯科, 1990年), 第2辑, 310-332页; A. 普罗斯库里主编, 《归还的名字: 时评文章集(两卷本)》(莫斯科: 新闻社代理处, 1989年), 第1卷: 291页; L. 戈洛夫金娜, 《在俄罗斯新殉道者与忏悔者封圣背景下阅读档案-调查案件的特点》, 《阿尔法与欧米茄》, 第4期(2000年): 211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多布罗尼茨基案卷宗号 P-52593, 第59页(迪特里希)。
54.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 1924-1944 年决议及指导性信件汇编》(莫斯科, 1946年), 91页。
55. 《工农政府法令汇编》, 第12期(1934年): 第4条。即使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调查材料也要由 NKVD 地区中心检查, 有时发回下级部门进行“补充调查”(до следованию)。审讯笔录用红铅笔做标记, 表明有人监督其内容。语法错误被更正。在一名莫斯科女反革命分子的审讯笔录中, “他说”前面出现了问号, 而不是“她说”。程序必须遵守。某舍马托维奇的档案被退回他的调查小组, 因为缺少关于征用他打字机和相机(在他被捕时被查获)的证明。舍马托维奇本人已被处决。瓦特林, 《地区规模的恐怖》, 54.
56. 尤·斯捷佐夫斯基, 《苏联镇压史》(圣彼得堡: 标志-SP 出版社, 1997年), 第1卷: 173页。
57. 瓦·伊万诺夫, 《骑士团的使命》, 105-6; 关于镇压和受害者平反的法律和规范性法案汇编(莫斯科: 共和国出版社, 1993年), 110页。关于1939年因违反法律起诉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 参见尤·佐洛托夫编辑, 《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乌里扬诺夫斯克: 印刷之家, 1996年), 第1卷: 914页。
58. 历史学家仍然无法接触关键文件, 例如警察机构之间的通信、地方当局的指令和基层调查员的报告。然而我们知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根据秘密指令和部门命令运作的。伊·多布罗沃尔斯基, 《古拉格——其建造者、居民和英雄: 俄罗斯, 在狂热主义和殉难之路上》(莫斯科: 国际人权协会, 1998年), 16页。

59. 约·伯杰, 《一代人的沉船: 约瑟夫·伯杰回忆录》(伦敦: 哈维尔出版社, 1971年), 75页。

60. 阿·沃伊特洛夫斯卡娅, 《“追踪我这一代人的命运”》(未发表手稿, 约1990年), 74页, 104页。司法拷问的兴起必须与中世纪欧洲对异端的迫害联系起来。爱德华·彼得斯表明, 拷问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 因为它最终能拯救异端灵魂, 并为宗教裁判所提供急需的异端同伙名单。根据塔拉勒·阿萨德的说法, “由于持有异端观点的罪行无法独立于被告供词而得到证实, [拷问]必须在确认罪行存在之前进行。”讨论不同时代和地点时, 这两种论点都符合我的主张, 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拷问不能脱离对灵魂的关注来理解。民族复仇的组织者(例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或社会预防(例如, 纳粹政策)对供词不感兴趣, 因此认为拷问浪费时间。然而, 另一方面, 在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政权中情况并非如此。大卫·钱德勒表明, S-21的司法拷问“涉及背叛统治意识形态和对隐藏阴谋网络的怀疑。如同中世纪一样, 定罪主要依据囚犯的供词, 没有其他证明手段。”参见爱·彼得斯, 《拷问》(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6年), 66页; 塔·阿萨德, “关于中世纪基督教仪式中身体疼痛和真实的注释”, 《经济与社会》第12卷(1983年): 305页; 大·钱德勒, 《来自S-21的声音: 波尔布特秘密监狱中的恐怖与历史》, 第1版(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21页。关于为现代政权服务的拷问, 参见维·丹尼尔, 《烧焦的摇篮曲: 暴力民族志章节》(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6年), 135-153页, 达·雷贾利, 《拷问与现代性: 现代伊朗的自我、社会与国家》(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 1993年), 160-176页。

61. 康奎斯特, 《大恐怖》, 208。

62. 罗·欣格利, 《俄国秘密警察》(伦敦: 哈钦森出版社, 1970年), 162页。

63. 布托夫斯基靶场, 第8期, 194页。

64. 斯·科特金, 《磁山: 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年), 335-336页。

65. 奥·苏维尼罗夫, “战前岁月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历史问题》, 第6期(1991年): 31页。

66. 《苏维埃国家与法》, 第3期(1965年)。

67. 伯杰-巴尔齐莱, 《哈-特》, 《埃拉格迪亚》, 136。

68. 魏斯贝格, 《沉默的阴谋》, 250。

69. 魏斯贝格, 《沉默的阴谋》, 210。

70.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 “追踪”, 70页。

71. 伊尔明斯基, 《人民委员雅戈达》, 176-80。

7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 第16卷, 第16-17页。

73. 哈尔芬, 《亲密的敌人: 妖魔化布尔什维克反对派, 1918-1928年》(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2-43页。

7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 第16卷, 第30-31页、37页、40-44页。

75. 同样的对名字的执着也适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雇员。1939年2月至3月所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必须填写的问卷长达十四页, 八十道问题分为五个类别: (1) 你自己, (2) 你的妻子/丈夫, (3) 你的父母——你的以及你妻子/丈夫的; (4) 你的兄弟/姐妹以及你妻子/丈夫的兄弟/姐妹; (5) 认识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苏维尼罗夫, 《悲剧》, 147。

76. 我在此依据索·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中提出的方法。

77. 布尔什维克更名城市和使用化名及绰号的倾向，进一步突显了布尔什维克在多大程度上以乌托邦神话为导向。1920年代初，地图上有两个地方出现了相同的名称：托洛茨克（第一个今天叫恰帕耶夫斯克，第二个叫加特契纳）。1924年，伊丽莎维特格勒变成了季诺维也夫斯克（今天的基洛沃格勒），尤佐夫卡变成了斯大林诺（1961年起叫顿涅茨克）。1925年，察里津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被归还的名字》，第1卷：189页；伊·施皮尔雷恩，“关于改名换姓：社会心理学研究”，《劳动心理技术学与心理生理学》，第4期（1929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名：人名学问题》（莫斯科，1970年）。更名的主题已被几位俄罗斯文化研究者探讨。例如，参见罗·雅各布森，“移位词、语言范畴与俄语动词”，载于《著作选》（巴黎：穆顿·德·格鲁伊特出版社，1971年），第2卷；尤·洛特曼和博·乌斯宾斯基，“神话-名字-文化”，载于尤·洛特曼编辑，《三卷本选集》（塔林：亚历山德拉出版社，1992年），第1卷：60页，73页；亚·埃特金德，《鞭身派：教派、文学与革命》（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1998年），51-52页。关于其布尔什维克重生，特别是在人名和化名背景下，参见博·科隆尼茨基，“‘革命名字’：1920-1930年代俄国的人名与政治意识”，《革命的俄国》第6卷（1993年）；阿·里伯，“斯大林，边境之人”，《美国历史评论》107（2002）。

78. 凯·克拉克，“政治史与文学时空体：一些苏联研究”，载于加·莫尔松编辑，《文学与历史：理论问题与俄国案例研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223页。

79.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语言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普遍属性与“托洛茨基分子”作为个体属性之间的张力。用古典术语来说，命名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德米特里耶夫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个陈述旨在将个体德米特里耶夫定位在潘秋欣或曼德尔施塔姆等其他个体之中，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那么这个陈述就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德米特里耶夫是完全不可分割的，那么德米特里耶夫和潘秋欣之间，或德米特里耶夫和曼德尔施塔姆之间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没有将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归入同一群体的本体论基础。而如果“德米特里耶夫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个陈述旨在将托洛茨基主义定位于德米特里耶夫内部，那么我们就开始拉扯一根线，它很快就会将个体拆解成属性的集合，因为“德米特里耶夫”将证明只是普遍性的难以解释的集合体。通过将形容词解读为名字，反之亦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员将个体与普遍性联结起来——这只有在词语与事物不分的神话宇宙中才可能。

8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第16卷，第27-28页。

81. 科夫曼被捕的情况在伊·哈尔芬的《我灵魂中的恐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247-251页中有所讨论。

8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第16卷，第32-35页。

83. 1935年12月2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份通告指示，流放者“可以在被允许居住的当地机构和企业中从事其专业工作。”RGASPI（俄罗斯现代史国家档案馆），全宗17，目录3，案卷374，第108页，引自盖蒂和瑙莫夫，《恐怖之路》，185。

8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第1卷，第23页。

8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21841-36号，第1卷，第24页。他还“想要现在承认”曾在两位顽固的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诺夫之间传递过信件。

8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 21841-36 号，第 1 卷，第 25-27 页。
8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 21841-36 号，第 1 卷，第 36-37 页。
8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 21841-36 号，第 1 卷，第 50 页、66 页。
89. 马雷舍夫自 1935 年起一直被关押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监狱，但他将于 1936 年 6 月返回列宁格勒面临新的指控。
9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 21841-36 号，第 1 卷，第 32 页。
91. 由于阴谋论话语的无处不在，恐怖主义阴谋被视为普遍现象。格·里特波恩，“无所不在的阴谋：论 1930 年代苏联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意象”，载于安·盖蒂和罗·曼宁编辑，《**斯大林主义恐怖：新视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年）。
92. 《**第十七次全联盟共产党（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34 年），522-523 页。有趣的是，斯大林承认可能存在一条界线，将前反对派成员之间非官方的、看似无害的聚会与实际的阴谋区分开来。他只是声称这条界线是多孔的，如果它还没有被跨越，那么将来肯定会被跨越。尽管机关将高层官员之间的批评性谈话解释为“反革命集团”存在的证据，但斯大林在 1932 年 12 月 17 日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评论了“艾斯蒙特、托尔马切夫、阿·斯米尔诺夫等人的案件”：“这个案件……不那么明确。”他用一次饕餮狂欢的形象来描述其敌人结盟的基础：“这件事从头到尾浸透了一系列酒宴。我们有艾斯蒙特-里科夫反对派围绕伏特加，托姆斯基的，是的，是的，围绕猎野猪，斯米尔诺夫的咆哮和吠叫，以及各种莫斯科流言作为甜点。”《**苏共中央通报**》，第 11 期（1990 年）：63-74 页；阿·克瓦尚金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1928-1941 年**》（莫斯科：罗斯潘出版社，1999 年），196 页；RGASPI（俄罗斯现代史国家档案馆），全宗 74，目录 2，案卷 38，第 80 页。
9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案件第 21841-36 号，第 1 卷，第 34 页。
94. 恩·什塔克尔伯格，“‘青年历史学家小组’与‘学术案件’”，载于费·佩尔切诺克、亚·多布金和玛·索罗基纳编辑，《**纪念文集：F. F. 佩尔琴科纪念文集**》（莫斯科：菲尼克斯出版社、雅典娜出版社，1995 年），第 28 页。研究过 1930 年“学术案件”的阿纳尼奇和帕尼雅赫表明，被捕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拉托诺夫在被捕当晚作证时仍坚持使用他惯用的语言。然而在监狱待了几个月后，他的供词中充斥着官方语言。因此，他开始使用“联系”（связи）、“偶然联系”（случайные связи）、“意识形态政治观点”（идеи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等表述。阿纳尼奇与帕尼雅赫，《“学术案件”作为历史文献》，第 344 页。
9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64 页。
9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4、58 页。
9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47 页。
9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36-37 页。
99. 甚至连明金的母亲也加入了这场语言斗争：面对她认为应为儿子遭受迫害负责的那个人，她质问扎伊杰尔“是否恰好自己也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34、24 页。
100. E. 金兹堡，《**旋风**》（伦敦：柯林斯出版社、哈维尔出版社，1967 年），第 53-54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作家沙拉莫夫在 1937 年 1 月被问及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V. 沙拉莫夫，《**新书：回忆录、笔记本、信件、侦查案卷**》（莫斯科：EKSMO 出版社，2004 年），第 967-968 页。
101.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50 页。
102.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42。

10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 卷，第 225 - 228 页。
10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5 卷，第 228 - 232 页。
105. A. 雅科夫列夫等， *《卢比扬卡：斯大林与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 年 1 月 - 1936 年 12 月》*（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2003 年），第 762 - 763 页。
106. *《平反》*，157.
107. 格季与瑙莫夫， *《通往恐怖之路》*，398.

108. 斯措夫斯基， *《苏联镇压史》*，第 1 卷：第 205 - 206 页。当囚犯面对指控者（其中许多也是囚犯）进行当面对质时，指控与反驳使得证据无法呈现——这是一场道德对决。仲裁者通常是资深党员，他们运用自己的经验和卓越的政治直觉来区分说谎者与讲真话的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对维塔利·普里马科夫（红军最杰出的军官之一）“在与加尔卡瓦当面对质时，竟敢厚颜无耻地直视整个政治局的眼睛，称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无辜布尔什维克”感到惊讶。“三四天后他承认……接受了秘密任务，潜伏下来坚持到底。他在为战争爆发时扮演重要角色做准备。”共产主义民间传说中包含若干戏剧性的对决。1936 年 9 月，当格里戈里·索科尔尼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室与尼古拉·布哈林对质时，他确认，在他和被告审视了平行托洛茨基中心的活动后，他们一致同意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索科尔尼科夫描述了当时的气氛，提供了日期，指出了在准备指控时在场的所有人。布哈林被逼到绝境，尖叫道：“格里沙！你一定是疯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索科尔尼科夫回应道，“我对所说的话负责，你很快也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再举一例：政治局成员弗拉斯·丘巴尔被安季波夫揭发，后者不仅是他的同事，还是他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之一——两家人经常来往。指控内容荒诞不经，连斯大林都为之动容：“丘巴尔在哭；在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声称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честный человек*）。”为了澄清事实，丘巴尔和安季波夫被带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办公室当面对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场。“坐下，听听关于你的陈述，”贝利亚对被告说，但当安季波夫开始陈述时，他的老朋友勃然大怒：“这是一条我曾捂在胸口的蛇！他是个挑衅者！”这样的声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丘巴尔很快就被逮捕了。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的兄弟，本人也是中央委员，于 1941 年 7 月在一次当面对质期间自杀。指控者万尼科夫说，他与希特勒签订了协议，如果德国获胜，他将成为苏联政府首脑。在政府办公室，在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面前，卡冈诺维奇扑向万尼科夫。“恶棍！无耻之徒！你在撒谎！”他喊道，旁观者急忙上前制止他。很快，他被要求到门厅等候，同时他的案件正在讨论中。这个非正式的审判法庭刚开庭不久，一个人冲进房间宣布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已开枪自杀。

尽管存在如此可怕、无望的情景，许多囚犯仍将当面对质视为证明自己清白的最佳机会。然而，成功率并不高。1937 年 7 月，皮亚特尼茨基被允许与一些揭发他的人当面对质——最初的名单包括阿布拉莫夫、梅利尼科夫、切尔诺梅尔季克、贝拉·库恩和克诺林——他得知自己未能证明自己无罪。其他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大清洗期间，当面对质没有为任何人洗清罪名，有时只是帮助拖累指控者。N. 切鲁舍夫， *《1937 年：红军精英在各他：红军精英在各他》*（莫斯科：维切出版社，

2003 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165，案卷 58，第 13-14 页；N. 津科维奇，《*最封闭的人们*》（莫斯科：“奥尔玛出版社”，2002 年），第 219、533-534、632 页；《*归还的姓名*》，2：66。

109. E. 金兹堡，《*旋风*》，73-75。
110. E. 金兹堡，《*旋风*》，76-77。
111. 兹维亚金采夫与奥尔洛夫，《*被革命钉上十字架*》，473。
112. 参见海登·怀特与马丁·杰伊在 S. 弗里德兰德主编的《*探索再现的界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方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 年）中的交流。
113. 在 1921-1953 年间，786,098 人因政治罪被判处死刑；其中 681,692 人是在 1937-1938 年间被判处的，这意味着每八名政治囚犯中就有七人是在叶若夫恐怖时期被处决的。在此期间，超过 6,500 名列宁格勒党员和 142,000 名全联盟党员被清洗；被开除者中有 25%至 40%最终落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手。索科洛夫，《*恐惧人民委员*》，第 203-204 页；P. 科内奇尼，《*建设者与逃兵：列宁格勒的学生、国家与社区，1917-1941*》（蒙特利尔：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3 页。
114.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踪追迹*》，第 66 页。
115. A.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审判调查员*》，《*环节*》（莫斯科，1991 年），第 1 辑，第 403-407 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踪追迹*》，第 77 页。
116. 娜杰日达·A. 约费，《*回到过去：我的生活，我的命运，我的时代：娜杰日达·A. 约费回忆录*》，F. 乔特译（奥克帕克：劳工出版社，1995 年），第 97 页。
117.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审判调查员*》，第 403-407 页。
118.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审判调查员*》，第 407-408 页。
119.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审判调查员*》，第 416 页。
120. 参见康奎斯特，《*大恐怖*》，159-60。
121. B. 麦克洛克林，《*记录死亡人数：1937-38 年莫斯科大规模杀害外国人的研究*》，《*视角*》，1999 年 5 月，第 30 页。1940 年 5 月 26 日司法部第 00649 号命令规定，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才能调查其线人犯下的违法行为。苏维尼罗夫，《*悲剧*》，189。关于线人证词在法庭上的使用，参见特鲁索夫与库尔佳夫采夫，《*苏联的政治司法*》，255。
122. V. 伊万诺夫，《*骑士团使命*》，72。1930 年 10 月 1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 20,000 名线人领取薪水，其中一些定期提供情报，另一些则提供部分情报。没有确切数据，但该数字在三十年代后期有所增加。索科洛夫，《*恐惧人民委员*》，第 21 页；P. 哈根洛，《“实质上是契卡分子，精神上是契卡分子”：1930 年代的常规警察与政治警察》，《*俄罗斯世界手册*》，第 2-4 期（2001 年）。
123. B. 巴扎诺夫，《*克里姆林宫，二年代*》，《*星火*》，第 42 期（1989 年）：第 22 页。
124. 《*致权力机关的信：1928-1939 年*》（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2002 年），第 317 页。
125. V. 伊万诺夫，《*骑士团使命*》，第 214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2，案卷 577，第 9-10 页，引自格季与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第 422-423 页。告密未必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卑劣的责任。有时这是一种召唤。剧作家季亚科夫在 1936 年被雅戈达的机构招募，代号“啄木鸟”，是一名不知疲倦的线人。“让我强调一下，我从未被迫这样做，”他在 1950 年写信给国家安全部部长说。“我完全是自愿告密的——我一直认为帮助机构揭露苏联的敌人是我的责任。我帮助揭露了中央黑土地地区拉斯卡佐夫区和科兹洛夫区的反党机会主义领导层……并提供了一些兽医进行破坏活动的材料……1936 年，《*斯大林格勒真理报*》刊登了我针对托洛茨基分子布德尼亚克（‘路障’工厂厂长）的讽刺小品文。后来我得知他被处决了，我的小品文被钉在他的侦查案卷上。”季亚科夫还向

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反苏煽动：“我报告了斯大林格勒话剧剧院演员戈列洛夫（他假装疯了，但在 1941 年被判刑）进行的系统性敌对煽动，以及 1936 年报社编辑部宴会上某个捷连季耶夫对著名苏联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进行的敌意活动。”

季亚科夫在告密中找到了“道德满足感”。他那关于永恒追捕的言辞表明，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取悦当局的愿望：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人民服务，有良知的公民应该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服务。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种哲学。艾梅被招募监视她的学术导师瓦维洛夫教授，却告知了她她的任务。艾梅被揭发并被指控“政治两面派”，随后自杀。申塔林斯基，《自由的奴隶》，第 216 - 218 页；N. 克列克宁与 M. 鲁达科娃，《叶莲娜·卡尔洛芙娜·艾梅》，载于《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农业大学杰出学者》（下诺夫哥罗德，1997 年），第 110 - 116 页。

126. 布托夫斯基射击场，第 8 辑，第 189 页。
127.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第 32 - 33 页。一些党的头目不允许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接触存放在党务档案中的个人档案，从而阻碍了他们的调查。Iu. 鲁布佐夫，《领袖背后：L. Z. 梅赫利斯的政治与军事活动》（莫斯科：节奏-埃斯特出版社，2003 年），73 页。
128. 《悲剧命运：苏联科学院被镇压的学者》（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 年），74 页。
129.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踪觅迹”，62 页。尽管秘密线人被要求在监控集体活动时保持低调，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也雇佣了全职间谍。在她的回忆录中，沃伊特洛夫斯卡娅提到一个自 1928 年以来就一直跟踪她的幽灵：“我对他如此习惯，以至于不再注意他。这个家伙过去常在阿斯托里亚酒店（我们当时住在那里）的入口等我，站在我任教学校的窗户下，总是出现在我要进入的任何房子的大门口。有一段时间他的任务暂停了，但在 1935 年，我认出了我的老间谍[监视者]，在街上、电车上、大学附近跟着我。”
130. A. 特鲁索夫和 V. 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的政治司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8 年），245 页。
131. 苏维尼罗夫，《悲剧》，187。
132. 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政治文件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54，页 2 - 3。
133. 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1: 226。
134. V. 伊万诺夫，《教团的使命》，143.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人员受指示向被告出示对其不利的证据。巴别尔在 1939 年被允许阅读他的档案，尽管他“必须在深夜快速阅读，因此几乎没有记住什么”。当瓦尔拉姆·萨拉莫夫（20 世纪 20 年代末热忧的托洛茨基分子）于 1937 年再次被捕时，他可以阅读与其案件相关的材料——它们堆在审讯员的桌子旁：“我愉快地查阅了我 1929 年的旧档案。里面包括逮捕令、审讯记录、附有证人证词的案卷，以及一张有我亲笔字迹的纸——我拒绝接受判决——三年劳改营然后五年流放。”这种宽大处理很快将结束：1937 年 3 月 27 日，一份题为《关于进行调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指令指出，“调查人员不必要地向被指控的托洛茨基分子出示对其不利的材料，包括指控他们的人的证词——这是一个不明智且不合时宜的做法。”紧随其后，同年 7 月 30 日的另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指令，将线人的报告排除在被告审阅范围之外。这些材料不再附入案卷，而是保存在单独的文件夹中，甚至在法庭上也不得出示。沙恩塔林斯基，《自由的

奴隶》，74页；瓦特林，《地方规模的恐怖》，140页；沙拉莫夫，《新书》，151页；V.伊万诺夫，《教团的使命》，136；《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1989年）：71-72页；《星火》杂志，第39期（1989年）：7页，及第45期（1990年）：23页；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1：226。

135.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审判审讯员”，420-421页。
136. 赖赫曼被判处八年监禁，但只服刑了一部分。
137. 魏斯贝格，《沉默的阴谋》，231。
138. 尤·波格丹诺夫，《绝密：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30年》（莫斯科：维切出版社，2002年），123页。
139. 苏维尼罗夫，《悲剧》，152。
140.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政治受难者纪念簿》，1：896。
141. 营地的每位公民都有权向政府请愿。L.格沃兹季科娃，《斯大林时期库兹巴斯（30-40年代）的集中营》（克麦罗沃：克麦罗沃国立大学，1994年），60页。
142. S.菲茨帕特里克，“请愿者与公民：1930年代苏联俄罗斯的公开信写作”，《斯拉夫评论》第55卷（1996年）：81页；L.里梅尔，“边境线上的阶级与民族：大恐怖期间苏联公民的请愿”，载于M.西弗特，《拓展俄罗斯历史的边界——阿尔弗雷德·J·里伯纪念文集》（纽约：中欧大学出版社，2002年），333-334页。
143. 博戈莫洛夫和拉祖莫夫，《列宁格勒殉道录》，3：569。
144. 贝格尔-巴尔齐莱，《正午之光》，65-66。
145. V.伊万诺夫，《教团的使命》，207。1938年，中央委员会得知叶若夫掌权期间，上诉书很少有人审阅。一位服务于古比雪夫党组织的指导员报告说，他过去每两三个星期就向各地区党委书记通报关于大量未审阅上诉的情况。作为回应，特别会议被安排来审核这些上诉，但每当会议日期临近时，传唤至地区委员会的申诉者们，“都会在会议开始前几个小时收到通知，称会议将无限期推迟。”Getty和Naumov，《通往恐怖之路》，512-13。
146. Getty和Naumov，《通往恐怖之路》，482-83。
147. Berger-Barzilai，《Zohar be-hatsot》，60-61。
148. Voitlovskaja，《“循迹”》，93页。
149. 《平反》，182。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所依据的基础不时受到质疑。罗伯特·艾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将他的供词归咎于胁迫。当他的调查员拒绝他公平对待的要求时，愤怒的赫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威胁道：“迄今为止，我只请求宽恕，但没有触及实质内容。不久，我将描述‘马德里法庭的秘密’。我可能很快会死，我可能成为一具尸体……但总有一天尸体会说话。”我的第三个例子，马尔捷米扬·柳京，于1936年11月4日向斯大林抗议：“对我使用的调查方法是完全非法和不可接受的；每次审讯时，我都受到威胁、侮辱、像野兽一样被吼叫，当我的证词不被接受时，甚至没有给出任何有根据的理由……我不会为我没做并完全无辜的事情请求宽恕或减轻处罚。但我不能，也不打算平静地忍受针对我的违法行为，并请求保护免受其害。”《归还的名字》，2：96-97；《压迫权》，217-18；《真理报》，1988年8月5日；《文学报》，1988年7月29日；《归还的名字》，第2卷：200-201页；B.斯塔尔科夫，《马尔捷米扬·柳京：我绝不跪下》（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2年），46页。
150. L.沙因，《调查员手册》（莫斯科，1949年），11页。

151. Voitlovskaia, 《“循迹”》，66-67 页。

152. 阿什宁和阿帕托夫, 《斯拉夫学家案》，64-65。

153. 阿什宁和阿帕托夫, 《斯拉夫学家案》，64-65 页。根据党的说法, 同意供认是通往救赎之路的一步。拒绝签字意味着一个人是顽固不化的罪犯。列宁格勒作家马泽尔在 1937 年写道: “作为一名前候补党员, 我认为抗拒调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审讯员利用我对他的信任, 设法从我那里获得了虚假的证词。”斯坦纳, 《波希米亚荒漠》174 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马泽尔案, 案卷 46960, 第 57 页背面。

154. 当剧院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尔霍尔德向莫洛托夫发出上诉时, 他的信读起来像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梅耶尔霍尔德在解释他为何供认托洛茨基主义时提到了心理压力: “当审讯员以所谓的心理攻击来补充他们的身体压力时, 我被如此巨大的恐惧攫住, 以至于我存在的根基都暴露无遗……我的神经似乎就在我身体表面之下, 我的皮肤柔软敏感如同新生儿, 我的眼睛随时准备流出无尽的泪水(这是无法忍受的身体和精神痛苦的结果)……当人们害怕时, 他们会暴露出真实的自我。恐惧在一个人的习惯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而这个缺口揭示了一个人的真实本性[natura]。”梅耶尔霍尔德承认“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 ……我陷入了一种由反复出现的想法带来的深度抑郁: ‘我似乎罪有应得!’”当他确信自己有罪时, 他发现专家们准备好帮助他构建针对自己的案件: “我的自我分裂成两半: 一半在寻找我的‘罪行’, 而另一半……则在虚构一个。调查员运用他的技巧和经验帮助我编造[罪行]; 我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当我的想象力枯竭时, 调查员们联手……炮制笔录。有时会准备三四个不同的版本。”这很快使梅耶尔霍尔德变成了一个废人: “我什么也吃不下, 连续四个月无法入睡, 在饥饿和失眠之间, 伴随着夜间的心悸以及无法控制的歇斯底里哭泣和发热性颤抖发作, 我看起来老了十岁; 忧心忡忡的调查员开始给我喂食和治疗。这对我的身体有帮助, 但我的神经依然脆弱, 我的意识模糊[zatumanneno]且迟钝[pri tupleno]。我意识到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头顶: 调查员不断坚持, 威胁道, ‘如果你不写点什么’——他的意思是编造什么? ——‘我们会再次殴打你。只有你的头和右臂会保持完好, 其余部分都会变成一团无形、血淋淋、被撕碎的肉。’于是我签了所有的东西。”《苏联文化》，1989 年 2 月 16 日。

155. 囚犯们不断进行自我盘问。波利诺夫, 一位科学院成员, 于 1937 年 5 月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而逮捕, 他被真正逮捕原因的问题所折磨: “我回顾了我最近所做的一切, 在脑海中寻找无意的[nevol' nye]错误, 试图回忆我所有的谈话、会议、活动……但想不出任何过错。”《悲剧命运》，82。

156.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连斯基的调查员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不能效仿只惩罚已犯之罪的沙皇政府……我们必须预防犯罪,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安全!”申塔林斯基, 《自由的奴隶》，162。

157. 阿什宁和阿帕托夫, 《斯拉夫学家案》，67-68 页。自由主义法学期望被告提出异议; 调查机构的职责包括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 囚犯不再是自主的主体——他或她被期望成为审讯员的镜像。任何不愿意认罪的行为都被冠以“抗拒”之名(soprotivleniie), 该术语表明犯人自我状态已无可挽救。尼娜·叶夫根尼娅·图哈切夫斯卡娅于 1939 年 11 月 1 日被告知: “当你拒绝向调查员吐露真相时, 你便证明

自己是在抵抗。”一位名叫阿尔图索夫的犯人在 1937 年 5 月 27 日使用了类似表述：“多年来我犯下了可怕的罪行；这可耻的叛国行为使我抗拒调查。”1. 康托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莫斯科，2005 年），第 433 页；索佩利尼亚克，《分期死亡》，46 - 47。

158.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迹而行》，第 64 页。
159.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迹而行》，第 67 页。
160.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循迹而行》，第 71 页。
161.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81 - 82。
162. 高尔基，《与波格丹诺夫、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罗连科未刊通信集》（莫斯科：新文学观察出版社，1998 年），第 208 - 213 页。
163. 《非虚构》，《青春》，第 5 期（1988 年），第 1 - 2 期（1989 年）；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1: 168。
164.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利奇科夫，科学院的一名教师，像邦奇-奥莫尔斯基一样，在 1934 年被判处十年劳改营。虽然他在 1939 年 5 月向日丹诺夫发送的上诉严厉谴责了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有趣的是，利奇科夫依赖于公开展示审判的揭露，他将其视为表面价值来论证他的案件。这位恳求者坚持对比旧的、腐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器和叶若夫有原则的秘密警察，后者最终揭露了过去的公正：“日丹诺夫同志，我想提醒您，我的定罪发生在 1934 年 12 月之前，当时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由梅德韦领导，正是在基洛夫噩梦般的暗杀后揭露了他的真实本质[истинная сущность]的梅德韦。……由于布哈林分子破坏者，我被惩罚了六年；我现在要求重新审查我的案件。”通过暗示 1933 - 34 年使用的犯罪方法已成为过去，这样的投诉在大清洗期间加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体合法性。阿什宁和阿帕托夫，“斯拉夫学家案，” 246 - 54。
165. 阿什宁和阿帕托夫，“斯拉夫学家案，” 214 - 16。巴拉诺夫斯基于 1933 年 10 月 4 日被捕。
166. 苏韦尼罗夫，《悲剧》，188, 192。内务人民委员部依赖监狱告密者——“密探”（Уткин），用当时的语言说。一些囚犯称他们为“挑衅者”（Провокаторы）；其他人则屈服于他们的优越意识。密探让当局及时了解他们狱友的态度，同时试图说服囚犯合作。牢房对话的记录——它们稀少而珍贵——打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隐藏一面的窗户。正如所料，交战条款给了被告更多的回旋余地：人们经常听到告密者恳求被告。

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被捕时，他达成协议并被安置在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的牢房中，以获取这位著名将军的供词。1938 年 10 月 26 日，以下对话被录音并转录：

布柳赫尔：身体影响我全身疼痛。我昨天和贝利亚谈过，显然叶若夫也会和我谈。

特工：叶若夫？

布柳赫尔：是的。我动不了

特工：决定在你被捕之前就做出了。你为什么被捕？很多证词。这意味着你所有的否认都是无用的。浪费时间。

布柳赫尔：但我不是间谍

特工：别假装无辜。你可以说，“我承认这是真的。”布柳赫尔：没有人招募我。

特工：会有人告诉你何时以及如何被招募，以及关于什么。关于这一点有明确的指示

布柳赫尔：我不是组织成员。不，我不能认罪

特工：你想最终去列福尔托沃[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吗？

扮演忏悔者的角色，密探希望能建立信任，就像今天的辩护律师与被告所做的那样。他的主要任务是让被告接受他的罪行，并在他应得的惩罚之前减轻他的痛苦。

即使在这里，指控的实质（存在疑问）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罪行的权力（没有疑问）之间也有区别。在这份记录中，被告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寻求补救，他希望这仍然可以说服（与贝利亚交谈后，他寄希望于叶若夫），而密探则暗示他在做白日梦——当局已经对案件做出了裁决。布柳赫尔一直否认他的罪行，但当他反复遭受酷刑时，他最终供认自己是反苏维埃军事法西斯阴谋的成员。1938 年 11 月 9 日，他在监狱中被殴打致死。

被降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亨利希·亚戈达向他的狱友弗拉基米尔·基尔雄倾诉，尽管他一定知道后者是一个密探。这种行为对拒绝将内务人民委员部视为敌人的忠诚共产党员来说完全合理。基尔雄随后向祖尔本科少校报告说，亚戈达声称自己对针对他的具体指控无罪，但不会否认自己的罪行，因为“这会落入反革命的手中”。在密探的估计中，亚戈达精神失常。他不断哭泣，呼吸困难。显然，牢房中的囚犯在审讯时所说的话与实际话语有很大不同。在两种环境中适用截然不同的规则，尽管必须记住，两种类型的相遇的记录也与实际话语有非常不同的关系。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只给了调查人员声音，密探的记录也捕捉了囚犯的真实声音。因此，即使这些秘密记录也受到官方价值观的影响，这就更加引人注目。

“关于 1937 年司法和党组织提出的指控的审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 《军事历史杂志》，第 2 期（1993 年）：74；索科洛夫，《恐惧部长》，76 - 78；《镇压权》，215。

167. 为了获得他的 GPU-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者的批准，被告必须将他的旧世界观翻译成新的苏联普遍阴谋语言。1933 年被捕后不久，莫斯科法学教授吉杜利亚诺夫被说服供认他曾属于“民族主义中心”。他作证说，该团体提倡“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原则，并准备在德国军队占领俄罗斯时夺取莫斯科。吉杜利亚诺夫将查普雷金（中央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卢津（莫斯科国立大学数学教授）和弗洛伦斯基（一位兼作牧师的著名物理学家）列为他的同伙：第一个是据称的中心主席，第二个是其外交部长，第三个是其意识形态家。在他从哈萨克斯坦流放地（1934 或 1935 年）寄给检察官办公室的信中，吉杜利亚诺夫强调，从肉体压力到说服的转变使他确信要编造这个幻影组织：“只要涉及强迫，我就不动。然后 GPU 尝试了另一种方法。我被温柔和善意地对待，我被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牢房，并得到更好的食物。”莫斯科 GPU 的全权代表舒佩科“告诉我，我是一个受害者 [ж е р т в а]……我只应该相信他。他是我的法官、我的调查员、我的原告和我的辩护人。舒佩科还

说，如果我倾诉并把自己交给 GPU 的怜悯，他就会释放我并允许我回到我的研究。为此，我必须供认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调查员向吉杜利亚诺夫解释说，“他的自证其罪越严重，他的供词和悔恨就越真挚和真诚。”为了证明他可以被拯救，吉杜利亚诺夫必须将自己写入反革命秩序。他的狱友，一位名叫科列奇茨的农学家，“向我解释了他所谓的‘GPU 的伊索式语言’……并指导我应该说什么。”将 GPU 语言翻译成熟悉的东西后，吉杜利亚诺夫终于能够产生正确的叙述。作为一名法律历史学家，他在调查中认识到“一个净化的过程，类似于中世纪所说的 *purgato vulgaris*，以及后来的 *purgato canonica*。”这个 *purgato canonica* 是教会法的一个程序，其中，不是调查员证明被告的罪行，而是被告必须通过将他置于怀疑之外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现代形式中，这意味着供认一切：“用如此博学的历史类比如催眠自己……我屈服于挑衅。由于我相信需要解除自己武装的论点，并且因为我希望取悦 GPU，我开始‘努力’。他们越要求我证明我的悔恨，我就越诋毁自己。”

他的法官和辩护人舒佩科过去常常传唤吉杜利亚诺夫到他的办公室，“通过引导性问题和提示，推动我朝他选择的方向走。”一旦回到牢房，被告有时间思考他被告知的关于民族主义中心的可怕活动。这种智力劳动的成果是“舒佩科自己所谓的‘文学创作’，我在书面描述中称为‘本质的’[*сущая*]和‘诚实的’[*истинная*]真相。”最终，吉杜利亚诺夫写了审讯者想要的一切：“将自己完全交给 GPU 的力量，我成了民族主义者审判的舞台导演和悲剧演员，这些民族主义者在 GPU 的随意下变成了民族法西斯主义者。”沙特林斯基，《自由的奴隶》，152 - 55.

168. 语言处于许多审讯者和囚犯冲突的中心。沃伊特洛夫斯卡娅回忆说，“调查员争辩说，在反革命的语言中，事情听起来是一种方式，但[他]，苏联权力的代表，理解[我的]话是另一种方式。”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乌加罗夫的说法，一些囚犯的麻烦在于他们试图坚持他们的旧语言：“布哈林试图说服我们，既然领导右倾偏差的三驾马车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上从未被指定为中心，被捕右派对存在右派反革命组织中心的暗示是错误的。严重的问题不是他们被称为什么以及是否在会议记录中注明，”而是他们真正是什么。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说法，存在一个真正的右派中心，“即使没有被指定为这样。外部指定的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在当前背景下没有任何意义。”沃伊特洛夫斯卡娅，《追踪》，80；盖特和瑙莫夫，《恐怖之路》，386.

169. 苏韦尼罗夫，《悲剧》，204.

170. 当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拘留中，被告将他们的“个人品质”（*личные качества*）归咎于他们的罪行，希望能得到更多时间来重新锻造自己。以下是穆拉洛夫如何证明他长期拒绝配合调查：“我非常容易激动，容易生气。被捕时，我生气了。”1943 年被指控有反苏倾向的卡普勒也归咎于他的气质：“我以不正派、波西米亚人的方式行事。言行轻率[*легкомысленен*]，我自以为了不起[*зазнался*]。”囚犯阿尔图索夫在 1937 年 5 月 27 日向调查员解释说，他

因对新经济政策现实的“失望”感而拥抱德国法西斯主义。“性格”（*Х а р а к т е р*）是偶然和环境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无论是善是恶，“本质”（*Н у т р о*），相比之下，是灵魂最根本的特征。《归还的名字》， 2: 30（穆拉洛夫）；索佩利尼亚克，《分期死亡》， 82-83（卡普勒），46-47（阿尔图索夫）。

171. 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历史》（纽约：兰登书屋，1953年），144。

172. 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历史》， 145-46。

173. 贝克和戈丁，《俄国大清洗》， 86。

174. 苏韦尼罗夫，《悲剧》， 154。

175. 《反苏右翼和托派集团案》（莫斯科，1938年），777-78。魏斯伯格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可以清楚地记得导致我崩溃的心理过程。我想与审问者妥协，但很难克服多年来的习惯，在此期间，我认为我的个人诚信高于世界上的一切。我绝望地寻找一些心理上的理由来为我的软弱辩护，[我的审讯者]在使我屈从于党纪的想法中提供了它。”魏斯伯格，《沉默的阴谋》， 208。

176. 苏韦尼罗夫，《悲剧》， 203。

177.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 50。

178.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 42。

179. 克里维茨基，《我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39年），219-25。

180.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 164。

181. 瓦特林，《地区规模的恐怖》， 133。

182. 斯塔尔科夫，“未举行的审判”，1305。

183. 《苏共中央公报》，第10期（1989年）：72-73。

184. 供词也可被理解为一个觉醒时刻、一次皈依、对自身采取正确辩证观点的开始。1939年，著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向贝利亚描述其审讯官如何帮助他重获自我意识并克服写作瓶颈：“由于与人民的可怕隔离，我的创作源泉枯竭了。我试图从囚禁中、从盲目而自负的隔绝状态中挣脱的努力，既可悲又无效。解放在监狱中来临。在监禁的数月里，我比此前一生思考得更多，理解得更多……我清晰地看到我那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圈子的腐朽与堕落……被悔恨与渴望洗净自身的念头淹没，我向审讯官们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巴别尔尽力将其个人经历嵌入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中。他寻求救赎的过程涉及一个美学工程——通过自我表达寻求自我转化。他的任务是双重的：创作一部优秀的、社会现实主义的敌人形象小说，并在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供词中化身小说的主题。巴别尔恳求贝利亚“至少允许我以美文形式记下我的书稿计划……我最近意识到人们需要

阅读的是毫不留情的文学性自我揭露[*с а м о р а з о б л а ч е н и е*]。”巴别尔谈论的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供词？“我从未完成我的小说，”他指出，“它变成了司法调查的笔录。”其他作家也运用其才华撰写供词：梅耶荷德的证词长达三十页以上；米哈伊尔·科尔佐夫写了三十一页，然后又添了四十页，再加十七页。沙塔林斯基，《自由的奴隶》，第38页，第69-70页；索佩利尼亚克，《分期死亡》， 152, 249。

185.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林达·阿什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18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21841-36号案卷（针对蔡德尔等），卷1，第8页。

18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13a 页。
188. 苏韦尼罗夫, 《悲剧》, 181。
189. 《苏共中央通报》, 第 8 期 (1989 年): 第 79-80 页, 第 86 页。
190. 《平反》, 181。
191.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记录。莫斯科, 1936 年 8 月 19-24 日》 (莫斯科: 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 1936 年), 第 111 页。
19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69-70 页。
193. 《历史问题》, 第 10 期 (1992 年): 第 34 页。加米涅夫的侄子在 1935 年 3 月 11 日作证说, 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 在与党的领导层斗争中必须使用恐怖手段, 效仿“民意党”在对抗沙皇制度斗争中使用的方法。雅科夫列夫等, 《卢比扬卡》, 630。
194.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信》, 第 40-41 页。
19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0-72 页。
19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3 页。
19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3-74 页。
19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4 页。
19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9 页。
20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8 页。
201.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5-77 页。
20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78 页。
20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蔡德尔等), 卷 1, 第 82-83 页。
204. 雅科夫列夫等, 《卢比扬卡》, 757-59。
205. 雅科夫列夫等, 《卢比扬卡》, 763。斯大林花费大量时间审阅检举材料。在阅读针对农学家瓦维洛夫——农业领域的“破坏活动庇护者”——的材料时, 他用彩色铅笔标记了一些句子, 并在其他句子下划了线。在页脚处, 他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И. Ст.”。尤·瓦维洛夫与雅·罗基强斯基, 《投身烈火的知识: 农学家 N. I. 瓦维洛夫生平的几页》, 《俄罗斯科学院通报》, 第 7 期 (1996 年): 第 632-633 页。关于斯大林的总体“间谍狂”, 参见 A. 达林与 F. 菲尔索夫编, 《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 1934-1943: 来自苏联档案馆的信件》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32 页。
206. 《平反》, 196-210。
20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扎伊杰尔等人), 第 6 卷, 第 6.3 页。
20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1841-36 号案卷 (针对扎伊杰尔等人), 第 16 卷, 第 1a 页。
20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全宗 17, 目录 2, 案卷 981, 第 50 页; 布里汉诺夫和尚什科夫, 《无可辩驳》, 37。
210. 《1930 年代的斯大林政治局: 文件汇编》 (莫斯科: AIRO-XX 出版社, 1995 年), 第 148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全宗 85, 目录 27, 案卷 93, 第 12-23 页; 格季和瑙莫夫, 《通往恐怖之路》, 432, 277。
211. 斯塔尔科夫, “未举行的审判”, 第 1305 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全宗 17, 目录 114, 案卷 627, 第 17 页; 苏韦尼罗夫, 《悲剧》, 147。N. 彼得罗夫, “苏联安全机构人员的转变”, 《俄语世界研究》, 1922-1953,” 《俄语世界研究》, 第 2-4 期 (2001 年)。
212. 《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 20 年》 (莫斯科, 1938 年); 《忠诚与真理: 全联盟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篇章》 (雅罗斯拉夫尔: 尼乌安斯出版社, 2001 年), 第 242 页。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叶若夫比雅戈达更严厉, 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叶若夫没有被称为“黑莓”或“刺猬” (ягод а, 俄语中意为“浆果”); 关于他名字的持久双关语是 Е ж о в ы е р у к а в и ц ы 字面意思是“刺猬皮防护手套”或“铁腕”。苏韦尼罗夫, 《悲剧》, 147。
213. 据叶若夫所言, 在国家事务中, 安全方面的延误就是犯罪。教官瓦采季斯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课间休息时被捕。课程指挥官走进教室告诉学生: “你们的讲师刚刚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当红军某课程负责人柴可夫斯基被捕时, 他还处于“卧床状态”, 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苏韦尼罗夫,

《悲剧》， 《悲剧》， 135 - 36.

214. 《平反》， 182 - 83.

215. 《苏共中央通报》， 第 8 期（1989 年）：第 93 页。

216. 兹维亚金采夫和奥尔洛夫， 《被革命钉上十字架》， 483.

217. 责任概念的转变是突然的，并非没有反对者。不久前，在 1936 年 3 月 31 日，尼古拉·克雷连科曾警告斯大林不要过度指控反革命罪行。这位司法人民委员列举了最近摆上他案头的大量批评政权的案例，但指出“很难说这构成了有意识的反革命宣传”。他认为，法院、检察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第 58 条第 10 款的解释如此宽泛，以至于“抱怨【*брюзжание*】和污言秽语【*нецензурная ругань*】都变成了反革命”。为限制过度指控，克雷连科建议限制司法机关对第 58 条的运用：“即使发表了形式上反革命的言论……除非说话者有反革命过往，否则没有必要提起诉讼。”在 1936 年 4 月 16 日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支持克雷连科的立场，并建议发布一项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最高法院的联合指令，将第 58 条纳入正轨。该法令从未颁布：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的反革命案件数量从 1935 年的四万三千件下降到 1936 年的三万两千件，但在当年秋天叶若夫巩固权力后急剧上升。 《苏联领导层：通信集》， 329 - 30.

218.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 130.

219. V. 豪斯托夫，“1930 年代后半期苏联的政治侦查”，载于 《俄罗斯的政治侦查：历史与现状》（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经济与金融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4 页。1940 年对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屠杀是将整个群体转变为不可救药敌人的例子。考虑到这些人员是“顽固不化”（*закоренелые*）和“不可救药”（*неисправимые*）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求政治局授权对他们进行肉体消灭。波兰共产党万达·巴尔塔舍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这些军官是苏联真正的敌人，”巴尔塔舍维奇写道。“我遇到的那些人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他们。除了消灭他们，别无他法。”苏韦尼罗夫， 《悲剧》， 第 218-19 页；P. 所罗门，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刑事司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3、185、239-42 页；N. 列别杰娃， 《卡廷：反人类罪行》（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96 年），第 139 页。

220. O. 赫列夫纽克， 《在斯大林的阴影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生涯》（纽约：M. E. 夏普出版社，1995 年），第 50 页； 《斯大林主义者》， 1936 年 9 月 21 日。关于如何决定处决党员，我们只有零星的信息。斯大林在 1930 年代初通常支持公审，他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一封信中要求对孟什维克破坏者进行严格调查，并补充说“孔德拉季耶夫、格罗曼和其他几个恶棍必须枪毙”。但处决党员是另一回事。列宁曾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让你们之间流血”，在整整十五年里，党一直遵循他的告诫。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称，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 1932 年建议判处反对派分子柳廷死刑时，党的领导层表示反对。在卡缅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处决前不到六个月，政治局谴责了

托洛茨基主义集团成员仅被判处八至十年徒刑。同一天（1936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指示维辛斯基，对据称在列宁格勒活动的“季诺维也夫恐怖组织”成员不要适用死刑。这一禁忌在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的决议中被打破，该决议规定，所有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应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并对他们适用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要求“枪决”的法律。R. 塔克，《*掌权的斯大林：1928-1941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纽约：诺顿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尼古拉耶夫斯基，《*权力与苏联精英*》，第79页；L. 科舍廖娃等编，《*1925-1936年约·维·斯大林致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件*》，文件汇编（莫斯科：青年俄罗斯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雅科夫列夫等编，《*卢比扬卡*》，723-24, 756。

221. 恐怖集团成员被分为“组织者”和“执行者”。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多布罗尼茨卡娅案卷编号P-66671，第204页。

22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卷，第51页。

22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35页。

224.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31页。

22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31-32页。

22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38页。

22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39页。

22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41-42页。

22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44页。

230. 政治史文献中心，伊扎克个人档案715144，第50页。

231. 政治史文献中心，伊扎克个人档案715144，第43页；全宗197，目录1，卷宗982，第13页。流亡学者如今发现自己被怀疑为托洛茨基充当来自国外的代理人。1936-37年间，大多数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人以及三分之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被捕。即将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检察官的鲍里斯·波泽恩对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与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间谍机构勾结。是的，我们刚刚揭露了[爱沙尼亚人]伊扎克，但我们能确定已将他们全部抓获了吗？”《*历史档案*》，第1期（1992年）：118-22页；《*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部分（莫斯科，1994年），第503页；《*历史档案*》，第1期（1992年）：118-22页；《*真理报*》，1989年9月12日；《*消息报*》，1989年9月13日；政治史文献中心，全宗197，目录1，卷宗983，第233-34页。

232. 政治史文献中心，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个人档案779885，第11-16页。

233. 政治史文献中心，阿尔塔帕尔马科夫个人档案779885，第4页。

234. 他的住宅搜查记录表明，“在其被捕时，没收了一把非法持有的纳甘牌左轮手枪。”内务人民委员部怀疑巴拉尼克对手枪有类似尼古拉耶夫的用途。调查人员通常试图确定犯罪中使用的武器，尽管这些武器从未找到（除了许多党员合法持有的左轮手枪）。格林贝格是一名据称的德国阴谋集团成员，他在1937年夏天作证说，他所有的武器和炸弹都沉没在芬兰湾附近的一艘小船里，“离叶拉金岛不远”。政治史文献中心，巴拉尼克个人档案822877，第1-3页；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多布罗尼茨基案卷编号P-52593，第116页。

235. 政治史文献中心，巴拉尼克个人档案822877，第3页。

23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109页。

23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110页。

23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107、143页。

23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6卷，第110页。

240. 政治史文献中心，叶连科个人档案702117，(2)，第5页。

241. 《*致权力的信件*》，305。

242. 《致权力的信件》，306-7。
243. 《30年代斯大林政治局》，149-50；《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1989年）：138页；《苏联文化报》，1989年2月25日。
244. 《苏共中央通报》，第8期（1989年）：100-115页。
245.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5a卷，第22页。
246.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5a卷，第7页。
24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1卷，第120-32页。
24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5卷，第33-42页，引自第5a卷，第7页。
249.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1卷，第68-69、78、81、122页。
25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伊杰尔等人案卷编号21841-36，第5a卷，第12-13页。
251. RNB,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5a, ll. 15, 18.
252. RNB, Case no. 21895 against Val' ner, Iea, and others (archive no. 22068), (1), 1.

270. 个人罪责与个人惩罚的重要性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杀的态度中显而易见。反革命分子本应被定罪并处决，而不仅仅是被杀死或以其他方式丧命。193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被捕并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的记者莫吉良斯基试图上吊自杀。报告言简意赅：“莫吉良斯基，6号牢房的囚犯，被允许进入院子晨间放风。趁守卫尼基廷科进入走廊[并有一瞬间视线脱离他的机会]，囚犯跑进厕所，用毛巾上吊。其行为被发现，他被解救下来。”两周后，莫吉良斯基被依法枪决（1938年2月28日）。因为死亡是个人化的，所以身份必须得到确认。在无数证明判决执行情况的文件中，有一些要求核实被定罪者的姓名或其确切出生地点。缺少一张核实身份的照片也可能导致处决中止。在收到死刑判决后，囚犯会被拍摄“侧面和正面照片”。病人不会被处决；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等到其康复。 *布托夫斯基试验场*， vvp. 8, 85, 70, 210, 254。

253. D. 沃尔科戈诺夫， *《斯大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9），1，245。
254. 我在此遵循 M. 达顿的分析， *《中国的治安与惩罚：从父权制到“人民”》*（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263。
255. RNB,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5a, ll. 9, 13, 14。一位自己最终入狱的检察官坚称，囚犯唯一的希望是“活到他们出庭的日子，然后说出他们知道的一切——或者越狱，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向斯大林同志和叶若夫同志解释事情是如何扭曲和腐败的，然后去死。”同样地，一位名叫泰罗夫的旅政委于1937年9月7日写信给叶若夫：“再见。我的良心在您、党和国家面前是清白的。我将因一次虚假的告发而死。我只向您做此声明；至于我向调查人员所作的供词，我将无力反驳它们——我没有那份意志。如果我受审，我将确认我的证词。”

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后来谈到一项政策，即承诺赦免那些公开认罪的人。其中一位调查人员阿夫谢耶维奇在1956年7月受审时承认，当他负责监视普里马科夫，直至后者于1937年7月受审时，“我反复在普里马科夫耳边说，如果他认罪，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拯救。”但这项政策并非普遍适用。别兹博罗多夫对他的囚犯，一位名叫沃罗比约夫的总工程师说：“无论你是否承认反革命活动，你都会被处决。”在审讯苏联空军军官安德里亚诺夫时，尤希莫维奇告诉他，他的罪行看起来是确定的，并推测

法庭很可能会判他死刑，但补充说认罪可能会救他。他的狱友回忆说：“安德里亚诺夫很困惑”：“他不停地哭，不知道在法庭上该如何表现，是认罪还是揭露他的供词是如何被诱出的。最终他认了罪并被判处死刑。”

《惩罚：检察官的命运》（莫斯科：法律文学出版社，1990），52；苏维尼罗夫，《悲剧》，242，184，190。

256. RNB,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5a, ll. 20-22。当施泰因曼在法庭上说他从未拿过左轮手枪时，法庭主席反驳道：“有些人用左轮手枪，有些人用笔！” RNB, Case No. 3830\09-36 against Shteinman, l. 16。

25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档案，f. 197, op. 1, d. 983, l. 271。

258. J. 卡西迪，《受审的敌人：早期苏联法庭的舞台与银幕》（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119，163，180-81。这些干巴巴且极其简短的结案陈词，可以与列宁格勒中心成员审判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词相比较。1935年12月，一些被告人希望戏剧性的告白能证明他们的悔意。列文知道他不能请求宽恕。“在政治上我已不复存在，”他庄严地承认。“请作为一项仁慈之举给予我生命[*proshu o zhizni kak o miloste*]。”曼德尔施塔姆也知道标准的道歉是不合适的：“我不会绕圈子说话，也不会涉足历史。尽管我不是反革命恐怖分子，但我堕入了怎样的深渊啊！……你们的回应必须是枪毙我们所有人——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都会为这样的决定鼓掌！”即使在坚决认为自己的罪行应处以死刑的同时，其他被告人也退回到道德重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修辞中。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的儿子，哈尼克请求法庭给他时间来弥补他严重的罪行。索科洛夫承诺“洗刷掉这个污点”。鲁缅采夫请求法庭“将我带回劳动者大家庭。我发誓我将无私地工作[samootverzheno]。”只要法庭对他“宽宏大量”（*snizkhodite' Ino*），托尔马佐夫保证他将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伊尔明斯基，《雅戈达人民委员》，176-80。

259. 《苏俄刑法典》。（莫斯科，1927），9；B. 斯塔尔科夫，《叶若夫人民委员》，载于格蒂和曼宁，《斯大林时期的恐怖》，23；P. 所罗门，《1917-1934年的苏联刑罚政策：一个重新解读》，《斯拉夫评论》39（1980）：196-203。

260. RNB,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5a, ll. 28-29.

261. RNB,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5a, l. 30.

262. Slavina, *Tonen' kii nerv istorii*, 325-26.

263.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完全独立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且不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的军事法庭相混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对待囚犯的方式有所不同。即便在1936年这个相对温和的年份，军事审判庭也没有作出任何一项无罪判决，也没有退回任何案件要求补充调查。在大清洗期间，几乎所有遇难的共产党大学人员都是由该机构定罪的。据乌里希向贝利亚提交的报告，在1936年10月1日至1938年9月30日期间，军事审判庭共判处36,157人；其中30,514项判决明确为“枪决”（占83%，即每六名被定罪者中有五人）。在1937-38年，约25%的案件由司法机构审理（其余75%由非常规行政机构审理）。1937年2月20日，乌里希指示所有法学家和法院，凡作出无罪判决的反革命案件，无论军事法庭层级如何，均应移送最高军事审判庭。军事审判庭最资深的法官之一尼基福罗夫斯基回忆道：“我们的良心和法律意识指引着我们审判反革命分子，

我们毫无保留地完全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1卷：第522页；维克托罗夫，《未经“机密”标注》，第202页；布里汉诺夫与绍什科夫，《不予宽恕》，第78页；皮利佩茨，《信仰与真理》，第251页；苏维尼罗夫，《悲剧》，249, 257-58；《军事法庭——苏联武装力量司法机构》（莫斯科，1988年），第121页。

264. 维克斯伯格，《检察官与猎物》；夏利特与贝尔恩，“追寻维辛斯基”。

265. R. 奥弗里，《专政者：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俄国》（伦敦：企鹅出版社，2004年），第292-299页。

第三章

1.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184页。
2.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037卷宗，第15页。
3.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037卷宗，第135页。
4.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155页；第408全宗，第1目录，第52卷宗，第26页。1936年夏，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领导层在编制被捕教授名单时，依据的是“零散信息和传闻”。教员祖布科夫在6月15日指出：“学生们问：‘拉尔采维奇在哪里？’党委必须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党委并不知情。1936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哲学系主任G. 季米扬斯基和该学院前教师、时任塔什干中亚大学教员的L. 赖斯基。1930年代中期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许多学生交好的O. 苏维尼罗夫回忆道：“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附近事件的传闻。”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08卷宗，第88页，第255卷宗，第27页，第21b卷宗，第37-39、43-46、50-51页，以及第209卷宗，第174页；O. 苏维尼罗夫，《1937-1938年红军的悲剧》（莫斯科：特拉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5. 《苏联大学生》，第6期（1936年）：第1页；《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年6月5日、6日、11日。
6.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77卷宗，第22页。
7.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7卷宗，第131-134页。
8. 关于列宁格勒对斯大林宪法的反应，参见K. 博特布洛姆，《安德烈·日丹诺夫的生平与时代，1896-1948》（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142页。
9. 当外国记者问及为何这部被誉为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不允许存在多党政治制度时，莫洛托夫解释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我国阶级斗争已接近消除，因此没有必要建立旨在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囚犯们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雅戈达持有不同看法。据称他曾说：‘我国的专制统治与关于苏维埃民主的声明形成鲜明对比。宪法是对民主的嘲弄[nasmeshka]。’”《致权力阶层的信：1928-1939年》（莫斯科：ROSSPEN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B. 索佩尔尼亚克，《分期死亡》（莫斯科：盖亚出版社，1998年），第57-58页。
10.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6月25日。
11.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063全宗，第1目录，第7卷宗，第27页。
12. 《社会与权力：1930年代：文献叙述》（莫斯科：ROSSPEN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13.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206-207页。
14. 《阶级斗争》杂志（*Bor' ba klassov*）于1936年更名为《历史杂志》（*Istoricheskii zhurnal*）。
15.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150页。

16.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年6月8日、9月26日。关于大清洗前夕如何理解“民主”，参见M. 卡列耶娃，“关于苏联民主的文献综述”，《苏维埃国家》，第5期（1935年）：第144-145页；“彻底贯彻始终的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2期（1936年）。
17.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262页，以及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328卷宗，第6页。
18. M. 米京，“论苏联阶级的消灭与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5期（1936年）：第14页。
19.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95卷宗，第26-27页。
20.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6月17日。关于消灭阶级斗争的纲领性声明，参见P. 切列梅赫，“论苏联阶级的消灭”，《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1期（1936年）；A. 斯捷茨基，“论苏联阶级的消灭”，《苏联大学生》，第6期（1937年）：第17-35页。1917年以前，知识分子，或至少其革命派，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评价甚高。但革命剥离了该词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承载者的积极含义，仅留下“知识分子”作为自私的知识特权阶层的消极含义。此时，知识分子充其量是工人阶级可疑的盟友，最坏情况下则是危险的第五纵队。党着手培养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来自自身队伍、无条件忠于苏维埃制度的“新知识分子”（*novaia intelligentsiia*）。知识分子的“平反”通过斯大林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真理报》，1936年11月26日）以及具有导向性的出版物（如D. 扎斯拉夫斯基，“苏维埃知识分子”，《科学与技术战线》，第7期（1936年）：第13-20页）得以实现。
21.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54卷宗，第58页。
22. R. 西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1936年）：第89页。
23.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10月8日。
24. 《布尔什维克》，第8期（1936年）、第10期（1936年）；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7卷宗，第106-107页。
25.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年6月12日。
26.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210页，以及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76卷宗，第87页。
27.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54卷宗，第15页。
28.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6月13日。
29.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9月2日。
30.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6月29日。
31.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2卷宗，第52-55页。
32.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262页。
33.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年3月16日。
34.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6卷宗，第6页。
35. E. 西特诺夫斯基，“资产阶级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7期（1936年）：第23页。
36. 《真理报》，1936年6月17日。
37. I. 科德姆斯基，“论我们的党小组会议”，《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10月25日。
38.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88卷宗，第7-8页，以及第983卷宗，第142页。
39.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026卷宗，第12页。
40.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152-157、188页。
41.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6卷宗，第10页，第1026卷宗，第12页，第1037卷宗，第86页，以及第1037卷宗，第65页。
42.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037卷宗，第65页。
43.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宗，第166页。
44.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6卷宗，第36页。
45.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037卷宗，第36页。

46.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037 卷宗，第 42 页。
47.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92 卷宗，第 191 - 192 页，以及第 1037 卷宗，第 30 - 32 页。
48. P. 科内奇尼，“图书馆的流氓及其他：列宁格勒的法律、秩序与学生文化”，《社会史杂志》30 (1996)：112。

49. 大清洗的狂欢逻辑在各个领域都显而易见，因此我在此仅以政治警察、党和军队的相关证据为限。随着清洗的推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罗网捕获了大量本部门的调查人员。据某来源称，1936 - 38 年间被枪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不下 20,000 人。由于每一轮镇压都整层地撂倒调查人员，这最终印证了“革命之剑”公正无情地斩向人民的敌人。在共产党大学的领导层因积极进取的调查人员而被送上绞架后不久，这些十字军战士便步其受害者的后尘，被定罪为“炮制审讯罪”。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行动负责人扎科夫斯基被定为“人民公敌”，并于 1938 年 8 月 29 日被处决。负责审讯共产党大学的赖因戈尔德·伊扎克和雅科夫·帕尔瓦德雷的调查人员——夏皮罗、阿尔特舒勒和拉索欣——不久后也被处决。

政治机构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一个人在党内等级体系中地位越高，被捕的几率就越大。在 1934 年选举产生的 1996 名第十七次党代会代表中，最终有 1108 人被捕，848 人被处决；该次大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未能善终。苏维尼罗夫指出了另一种权力倒置现象：虽然大清洗期间违纪的普通士兵几乎从未被判处死刑，但军官受到军事法庭的判决要严厉得多。1938 年，每五名受审军官中就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大清洗的狂欢化特征近来成为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和迈克尔·埃尔曼之间争论的主题。对菲茨帕特里克而言，与大规模受害者相关的概念谜题可以通过细分来解决：民众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层粗鲁专制；而领导人成为受害者，则是因为民众有了报复的机会。在她看来，“狂欢”是对斯大林主义后一种特征的恰当描述：基层对上级的清算。此处狂欢被解读为一种通过社会史视角诠释的集体抗议。埃尔曼在批驳这一观点时指出，“阶级斗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恐怖分子及其受害者都不能合理地被视为阶级或其代表，斯大林主义社会在社会层面也并非同质或趋向同质。”埃尔曼选择强调大清洗的威权特征，力图表明狂欢化的外省公审是由金字塔顶端精心策划的。为了争取基层民众支持其政策，斯大林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外省官员的破坏活动。

这两种研究路径共享同一史学框架，都呈现出对狂欢的功利主义观点：它要么服务于报复，要么服务于政治控制。我采取非还原论的观点，认为狂欢关乎当代对权力本体论意义的理解。在斯大林主义世界中，英雄与叛徒之间仅有一线之隔。凭借无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并因此被提升至普通工人群众之上，共产党要员为自己谋取了特殊地位。同时，他高于群众的结构性地位也使他容易受到以下指控：他被权力所诱惑。在此背景下，狂欢确保了一种机制，使权力位置始终保持空置；任何被怀疑过分依恋其作为解放阶级代言者地位的官僚主义者都会立即

被清除。权力位置与行使权力者之间的距离从未弥合，而共产主义得以宣称自己忠于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完全平等的承诺。参见 И. 博戈莫洛夫和 А. 拉祖莫夫，《*列宁格勒殉道录*》（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1998 年），第 3 卷：577 页。《*真理报*》，1988 年 9 月 2 日；H. 彼得罗夫和 K. 斯科尔金，《*1934–1941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莫斯科：兹韦尼出版社，1999 年），199，501 页；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瓦利内尔等人案 21895 号（档案编号 22068），(1)，叶 271；《*绝密*》，第 4 期（1992 年）：6–7 页；B. 伊万诺夫，《*修道会使命：20 世纪末至 40 年代苏维埃俄罗斯镇压机制（依据西北地区材料）*》（圣彼得堡，1997 年），191 页；B. 巴卡京，《*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社，1992 年），30 页；B. 斯塔尔科夫，“老近卫军的后卫战”，载于 A. 阿法纳西耶夫编，《*他们不曾沉默*》（莫斯科：政治读物出版社，1991 年），217 页；“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命运”，《*苏共中央通报*》，第 12 期（1989 年）：82–113 页；《*历史档案*》，第 2 期（1994 年）：40 页；苏维尼罗夫，《*悲剧*》，252。关于史学研究，参见 S. 菲茨帕特里克，“老鼠如何埋葬了猫：1937 年俄罗斯省份大清洗场景”，《*俄罗斯评论*》第 52 期（1993 年）；M.

埃尔曼，“1937 年苏联外省公审：狂欢还是恐怖？”《*欧亚研究*》第 53 期（2001 年）：1223 页。理论视角参见 C. 勒福尔，《*民主与政治理论*》（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 年）。

- 50.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 年 11 月 20 日。
- 51. 列宁格勒州立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37，叶 38–39。
- 52.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叶 47–48。
- 53. 《*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6 月 25 日。
- 54.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37，叶 128。
- 55.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106，叶 202。
- 56. TsGA IPD，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937，叶 28。
- 57.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94，叶 109。
- 58.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248。那年夏天斯莫尔尼区被撤职的十七位党委书记之一普列姆，暂时仍保持自由之身。《*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6 月 29 日；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叶 20。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斯大林主义权力运作研究路径，都无法公正地描述大清洗期间党员干部的遴选过程。诚然，官僚机构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推荐通常会被接受，但民主礼仪得以保留，投票通常进行。中央统治，但它是通过合法化话语进行统治的。1936 年 4 月，列宁格勒语言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尼基福罗夫被提升至瓦西里岛区党委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他推荐日巴列夫接替自己。然而，这位历史研究小组负责人、自 1926 年起入党的日巴列夫，过去有个污点：1930 年，作为农村党委书记，他因“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的夸大行为”受到训斥（尽管伊万诺夫斯克监察委员会不久后撤销了这项处分）。虽然日巴列夫显然是领先候选人，但他的候选资格可以受到质疑。利夫希茨指出：“虽然一个好的党委书记必须是每个同志都能自由分享最珍贵想法的人，但日巴列夫习惯于‘凌驾’于群众之上。”多罗费耶夫附和道，认为日巴列夫过于软弱，不适合提拔到书记职位：“他喜欢绕开死结而不是斩断它们。”科甘希望扩大讨论范围：“我们只讨论一个人，这违反了党内的民主。其他候选人呢？”提到了两个名字：列格基和孔佐娃。孔佐娃立即以“太年轻”为由被否决，列格基成为日巴列夫唯一的竞争对手。列格基本人对

自己的名字被提及感到尴尬：“你们不可能是认真的。大家都知道我在 1933 年被清退出党。只有毫无瑕疵的共产党员才能领导党委。”尼基福罗夫指出：“尽管列格基对自己候选资格的反对没有根据，但他在党委已有足够职责。”进行了选举：79 名学生投票支持日巴列夫；列格基尽管不愿就任，仍获得了 17 名学生的支持。区党委达到了目的，但其偏好被基层视为建议而非命令。TsGA IPD，全宗 5063，目录 1，案卷 7，叶 17。

59.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262。
60.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37，叶 154，案卷 1026，叶 9，及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叶 5。
61. 《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7 月 2 日；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152，及案卷 1037，叶 97 - 103。
62. 共产主义大学初级教员奥尔洛夫于 1936 年 3 月 6 日被捕。列宁格勒宣传部主任科尔佐夫在近两个月后的 1936 年 6 月 2 日被捕。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叶 33，45。
63.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37，叶 139 - 40，154。
64.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26，叶 59。
65. A. 格蒂和 O. 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 - 193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94 页。
66.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150。在本文所述事件发生前几个月，学生卡纳采夫抱怨几乎无法见到普列杰：“他的秘书沙吉娜不会让你接近他，即使你一天内返回十次，她也会说他很忙。”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08，叶 43 - 44。
67.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 年 8 月 15 日。另见《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人民公敌》（莫斯科，1936 年）。
68.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道路——背叛与变节的道路”，《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9 月 2 日。
69.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28，叶 7。
70. 《真理报》，1937 年 2 月 27 日。沉默意味着与敌人团结一致。红色教授学院的拉比诺维奇不得不在 1937 年 12 月解释为什么他的兄弟“在 1927 年其支部讨论第十五次党代会关于清除托洛茨基的决议时什么也没说”。雷科夫被指控“在当代问题上表态不够清晰”（*Н е ч ё т к о*）。“他没有发表赞扬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演说”，1936 年对他的指控如此写道。TsGA IPD，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88，叶 53；“‘人民公敌’形象是如何塑造的”，《苏联档案》，第 4 期（1990 年）：87 - 88 页。
71.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281。
72. 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叶 279。
73. “警惕性——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品质”，《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9 月 2 日。
74. J. 斯科特，《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 年），6 - 67 页。住在安内科夫孤儿院（人民公敌子女收容所）的十七岁学生沃洛佳·莫罗兹撰写的公审评论是批判性的，甚至对斯大林及其亲信充满讽刺：“一个陷入昏睡[列宁去世时]的人，十二年后醒来会发现什么？他会为期间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他找不到旧的领导层。在政府中，他会发现一群没有胡须的白痴，他们对革命的胜利毫无贡献，还有一群为了个人安逸而出卖同志的年老恶棍。”昔日‘红军传奇的指挥官、革命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才华横溢的作家、记者、工程师、导演、外交官、政治活动家——全都消失了。这整个荒谬之事始于 1934 年，当时基洛夫遇刺。刺客与季诺维也夫有关联，

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反革命中心的其他组织者加米涅夫等人。这些人受到公开而无情的审判。指控很严厉：希望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谋杀、纵火、间谍活动等等。人民“要求”判处罪犯死刑。毫无疑问，人民是在某人的压力下提出这种要求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某人是谁。我只能想象被告们的状况，他们是党的元老，经历过流放、监狱和艰苦奋斗，却突然面对这个——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现在面临的死亡，为了他们被那些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人所毁灭吗？我保证，如果列宁还活着，他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斯大林呢？不幸的是，斯大林只是列宁的一个门徒，而且是一个糟糕的门徒。法庭“公正、真实且严厉”地认定，季诺维也夫集团是出于对苏联的刻骨仇恨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但他们怎能对他们曾为其幸福而奋斗的那些人怀有如此仇恨？！如果他们真的犯了罪，那么[他们这样做]也只是因为对权力的贪婪。‘我比斯大林差吗？’季诺维也夫大概暗自思忖。确实，就才智而言，季诺维也夫并不逊于斯大林。他们都是聪明人，做过很多好事！但他们还是被枪决了。事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大规模逮捕开始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德罗布尼斯、穆拉洛夫、李可夫、布哈林——这太可怕了！前领导层被捕，他们的老朋友为了自保而大喊：‘间谍去死！人民公敌去死！’而这就是所谓的公正！”尽管语气如此，年轻的莫罗佐夫还是试图在体制内寻求纠正：“也许我所写的一切都是谎言。然而，我必须从一个憎恨现状的个体的特定视角看待事物。如果斯大林和叶若夫——我曾向他们求助——帮助了我，也许我本来会一直是一个认真、有活力的劳动者。”

当他得知父亲死于西伯利亚集中营后，年轻的科利亚·列米佐夫给叔叔的信中批评更为严厉：“你挖掘的隧道是用你们的头骨铺就的。你们正在用你们的骨头建造一个虚假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被一层厚厚的谎言所掩盖但时间会过去，勇敢的人们会

站出来，将真相公之于众。”1937年6月13日，一个名叫维诺格拉多夫的人在给苏联政府首脑加里宁的信中似乎也挑战了官方意识形态：“仅仅说一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即使是真的……也会立即被捕。”但这位抗议者要求发言权，以便更好地赞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搜捕行动：“我不否认我们国家有间谍、破坏分子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雇员。但也有数百万人看到了我们的缺点，感到他们无法保持沉默。”*Pis'ma vo vlast'*, 362; *Butovskii polygon* (Moscow, 2004), vyp. 8, 137.

75. P. Konecny, *Builders and Deserters: Students, State and Community in Leningrad, 1917-1941*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1.

76. V. Shentalinskii, *Ruby svobody: V literaturnykh arkhivakh KGB* (Moscow: Parus, 1995), 200.

77. L. Siegelbaum and A. Sokolov, *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1.

78.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137.

79. N. Werth and G. Moullec, *Rapports secrets soviétiques: La société russe dans les documents confidentiels, 1921-1991* (Paris: Gallimard, 1995), 11-19; N. Werth, “Les *svodki* de la Tcheka/OGPU: Une source inédite,”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no. 64/1 (1994): 17-29.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情报报告突显了民众对官方政策的负面回应，但它们更多地告诉我们官方的看法，而非民众态度本身。该政权倾向于将每一种不满都定性为异议，把每一个无组织、未经深思的批评性评论都转变为政治反对行为。P. Holquist, “Anti-

Soviet Svodki from the Civil War: Surveillance as a Shared Feature of 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Russian Review* 56 (1997): 445–50; R.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Stalin’s Russia* (London: Penguin, 2004), 307, 309.

80. TsGA IPD, f. 408, op. 1, d. 1180, ll. 3–22. 甚至个人崇拜也可能在私下受到质疑，无论是斯大林的还是托洛茨基的：“过去有一群人崇拜沙皇；现在他们崇拜斯大林。”“如果托洛茨基掌权而不是斯大林，情况也不会有太大不同。”“托洛茨基是第二个拿破仑，但他们不让他施展才华。”TsGA IPD, f. 408, op. 1, d. 52, ll. 4–28.

81.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14, l. 1.

82.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14, l. 3.

83.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14, l. 1.

84. 据赫列夫纽克所言，“反抗被压制是因为人们害怕失去什么。”托尔斯泰同样认为“人民太软弱，国家太强大”，而申卡尔丘克则将这种消极性归咎于苏联人民的非政治性。戴维斯认为，人们没有去以卵击石，而是更喜欢利用官方语言“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合理目的”，而菲茨帕特里克则假定存在着被动等待官方政策过去的一般民众。O. Khlevniuk, *1937 god: Protivostoianie* (Moscow: Znanie, 1991), 5; N. Tolstoi, *Stalin’s Secret War* (伦敦: J. 凯普出版社, 1981年), 第13页; S. 辛卡尔丘克, 《30年代苏联的公众舆论》(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经济与金融大学出版社, 1995年), 第19页; S. 戴维斯, 《斯大林俄国的大众舆论: 恐怖、宣传与异议, 1934–1941年》(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67页; S. 菲茨帕特里克, 《日常斯大林主义: 非凡时代的普通人》(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222页。斯蒂芬·科特金在其著作中批判了那种认为行动主体受官方话语之外信念驱动的分析方法, 参见: 《磁山: 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年)。

85. 私下抱怨相当普遍。学生们为国家经济政治状况感到困扰。1936年7月, 当红色教授学院的罗森曼抱怨食品供应恶化时, 警惕者称其批评为懦弱之举。“我不该说基洛夫时期比日丹诺夫时期更好”, 她忏悔道。但她的道歉招致更多指责: “你的意思是, 为何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愚蠢批评是一回事, 用党的矫正目光庇护犯错的自我则是另一回事。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档案馆, 全宗566, 目录1, 案卷254, 页66–67。

86.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档案馆, 全宗408, 目录1, 案卷52, 页33–38。

87.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档案馆, 全宗408, 目录1, 案卷52, 页33–38。

88. 《愿将所有人逐一点名: 基于古拉格侦讯档案与营地报告的材料》(莫斯科, 1993年), 第110–111页。

89. 伊利亚·哈尔芬与约亨·黑尔贝格, 《史蒂文·科特金的》《磁山》与苏联主体性》, 《东欧历史年鉴》卷 *Geschichte Osteuropas* 3 (1996): 331–42.

90. 共产党人视隐私为资产阶级拜物。1937年1月1日,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学院的波尔季亚金娜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自夸: “我具有良好的社会本能, 从不将自己封闭在私人生活的外壳[*личная жизнь*]中。”托洛茨基分子谢尔盖声称: “几乎无法呼吸。我们生活在玻璃房中, 最细微的举动和言论都被监视。”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则抱怨“国家对个人的专制压迫感强烈, 人们连最低限度的自我表达能力都不具备。”《致政权书信集》第325页; 维克多·谢尔盖, 《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 1901–1941》(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3年), 第275页; 申塔林斯基, 《自由的奴隶》 *Raby svobody*, 200. 关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私人领域的地位, 可参见奥列格·哈拉霍夫金《揭示与隐藏: 苏联俄罗斯私人生活谱系学》, 收录于

《思想与实践中的公共与私人》杰夫·温特劳布与克里什南·库马尔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安妮特·胡珀《亲密性的恐怖：1930年代苏联的家庭政治》，载于克里斯蒂娜·基尔与埃里克·奈曼编，《早期苏维埃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约亨·黑尔贝格《发声：斯大林时期俄罗斯的肯定与异议语言》，

91. 《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研究》 *Kritika* 1 (2000): 95–96.

92. 1933年4月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共产国际文件全宗566，目录254，案卷65–66页；A.曼科夫，《三十年代日记》（圣彼得堡：欧洲之家出版社，2001年），第95–96页。关于1930年代中期学生批评苏联生活的更多例证，可参见P.阿法纳西耶夫（兽医学院）与V.卡塔耶夫（师范学院）的日记，收录于松井洋子《青年对斯大林革命的态度，1929–1941》，《日本斯拉夫研究学报》18 (2001): 73–74.

93. 若说曼科夫尚存疑虑，尤利娅·皮亚特尼茨卡娅则近乎自我谴责。在她的丈夫——共产国际领导人、著名布尔什维克——被捕后，皮亚特尼茨卡娅陷入深重的个人怀疑。她怎会与反革命分子同床共枕而不自知？这对其警觉性意味着什么？1938年3月，皮亚特尼茨卡娅告诉国家检察官：“我的情绪与思想迫使我必须与社会隔离。我告知他已经自我隔离了整整九个月，但彻底而正式的隔离处置将是合宜的。”B.皮亚特尼茨基编，《各各他：根据第603号侦查档案材料，关于索科洛娃-皮亚特尼茨卡娅，Ю. И.》（圣彼得堡：调色板出版社，1993年），第75页。

94. 《共青团真理报》，1935年9月20日。“对人民敌人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维辛斯基于1938年写道，“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准则之一”。G.古因斯，《苏联法律与苏联社会》（海牙：马蒂斯·尼霍夫出版社，1954年），第30页。

95. N.列比娜，《苏联城市的日常生活：规范与异常，1920–1930》（圣彼得堡：夏日花园-涅瓦》杂志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96. “‘准备服从党的任何决定……’（A.M.潘克拉托娃1937年的两封信）”，《祖国档案》，1999年第3期：第66–67页。

97. 1937年12月12日被捕，她被指控参与右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定罪后于1938年8月26日处决。“‘准备服从’”，第67–68页。

98. J.赫尔贝格，《革命在我心中：斯大林时期的日记写作》（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99. 斯大林政权旨在集体化自我。共产党员当然仍是主体——就他们被要求自愿拥护党的权威而言——但他们被阻碍培养自主意识。对人的官方定义凌驾于个人自我认知之上。在1935年的审查中，列宁格勒党委撤销了名叫莫斯科维切娃的教师的党证，并将她流放至伊万诺沃。在1936年写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莫斯科维切娃写道：“我的生活从未如此平静过，”——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员将他认为体现独立思想的内容全部斜体标注。“一个人可以没有党证却是布尔什维克，也可以揣着党证却是混蛋。我在这里才一个半月，但中央来的人已经愿意听取我的意见。他们明显更信任我，而不是那些靠党证混日子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视察员。诚然，我的纪律性有所下降，而且我并不总是清楚党今天在做什么。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将心贴近党。”莫斯科维切娃认为，她能就自己内心是否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拥有独立见解——正是这种对个体自主性的信念（比她的任何过错和违规更令当局恼火）引发了官方谴责。甚至情感也必须与集体同步。

当布哈林在 1933 年抱怨挥之不去的不信任导致他产生强烈的孤独感时，党委会反将他一军：“你的疏离感是毫无根据的。根除它们！”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1200，张页 141；“‘忏悔是坦率的吗？1933 年 N·I·布哈林的党内清洗材料’，《苏共历史问题》，第 3 期（1991 年）：59 页。

100. P·布鲁克斯，《*困扰的忏悔：法律与文学中的罪责言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 年），162-63 页。

101. 《*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2 月 5 日、1935 年 2 月 11 日、1935 年 4 月 21 日、1936 年 1 月 15 日。

102. K·里格尔，“‘技艺群体中的罪孽忏悔：通过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视角解读斯大林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载于 B·斯图德、B·昂弗里德、I·赫尔曼编，《*斯大林时代的自我言说：1930 年代共产主义中的身份构建*》*trente*（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2002 年），117 页。

103. B·斯图德，“‘清算错误还是清算人？作为自我技术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实践’”，载于 B·斯图德、H·豪曼编，《*斯大林主义主体：1929-1953 年苏联与共产国际中的个人与体制*》（苏黎世：苏黎世克罗诺斯出版社，2006 年），207-08 页。

104. 《*斯大林主义者*》，1937 年 4 月 13 日。

105. 《*斯大林主义者*》，1935 年 2 月 5 日、1935 年 2 月 11 日、1935 年 4 月 21 日、1936 年 1 月 15 日。

106. J·卡西迪，《*受审的敌人：早期苏维埃舞台与银幕上的法庭*》（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 年），125 页、127 页。自我批评仪式在 B·昂弗里德“‘忏悔与自我批评的仪式：斯大林主义干部的形象’”*《历史共产主义研究年鉴》* 第 2 期（1994 年）：148-64 页；L·埃尔伦“‘1930 年代苏联’党公开性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被误解的口号及其影响’”，*《东欧历史年鉴》* 第 50 卷第 2 期（2002 年）：186-94 页。关于将自我批评视为仪式，参见 A·格蒂“‘斯大林时期中央委员会的自我批评仪式，1933-38’”，*《俄罗斯评论》* 58（1999）。

107.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07，张页 69。

108.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07，张页 67。

109.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54，张页 65-67，及案卷 255，张页 69-71。

110. A·布勃诺夫，“‘彻底恢复教育学及教育工作者的权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 10 期（1936 年）：33 页。

111. 《*历史问题*》，第 5 期（1993 年）：11 页。

112. V·罗戈温，《*被枪决者的党*》（莫斯科：V·Z·罗戈温，1997 年），29 页。反对派的忏悔——他们恢复党籍的基础——如今被宣布为不真诚。在 1938 年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下属之一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揭露了外交副人民委员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十年前的忏悔是伪造的，从而动摇了后者声称自己已真正悔改的依据。“我不认为这份文件证明克列斯廷斯基脱离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拉科夫斯基在 1938 年的公开审判中作证说。“这不是一时的迷恋。这是一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斗争，是托洛茨基分子与党之间的斗争。”虽然共产党员能够为了党的统一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意识形态逆转，但拉科夫斯基现在准备将这种戏剧性的逆转呈现为精心策划的举动。“怎么能期望，”他接着谈克列斯廷斯基时说，“强迫自己坐半小时或一小时写一份文件，就能让整个过去、整个意识形态、所有习惯和联系都消失？”维辛斯基得出了恰当的结论：“因此，被告克列斯廷斯基在此引用作为其与托洛茨基

及托洛茨基分子决裂证据的信件，您认为不过是一种策略，一份必要时可用作‘不在场证明’的文件？”“是的，”拉科夫斯基回答。“克列斯廷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从未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 《反苏右翼和托洛茨基分子集团案》（莫斯科，1938年），153-54页。

托洛茨基主义不再归因于外部环境，而是被解释为灵魂的一种根本特质。1938年春天卡什克廷中尉的活动提供了大规模重新评估反对派过去罪行的又一惊人例证。作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卡什克廷访问了沃尔库塔劳改营，以确定在“温和的”雅戈达领导下实施的惩罚是否足够。根据他的审查，被监禁的托洛茨基分子首先与其他囚犯隔离，然后被系统地带到苔原上以小组方式枪决。1938年4月至5月期间，沃尔库塔劳改营的2901名托洛茨基分子被即决处决。值得注意的是，不到一年前，劳改营囚犯曾成功组织了一次绝食抗议，最终以劳改营当局在大多数问题上让步告终，显然是受莫斯科命令。反对派命运变化的速度指向了归因于他们的罪行性质的剧烈转变。J·伯杰，《一代人的海难：约瑟夫·伯杰回忆录》（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71年），96-97页；V·罗戈温，《1937》（莫斯科：V·Z·罗戈温，1996年），303页；《希望逐一列举所有人》，126-27；《古拉格中的抵抗：回忆录·信件·文献》（莫斯科：回归出版社，1992年），148-49页；M·B·，“‘沃尔库塔的托洛茨基分子’”，《社会主义通报》，第10-11期[1961年]；《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1989年]：75-78页；D·达林、B·尼古拉耶夫斯基，《苏维埃俄国的强制劳动》（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5年），260页。

113. 此处的讨论得益于A·莱文“‘一场公共运动的解剖：苏联政治史中的‘院士卢津案’’”，《斯拉夫评论》第49卷第1期（1990年）：99-101页。

114. K·克拉克，“‘作为斯大林主义文学语境的乌托邦人类学’”，载于罗伯特·塔克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诠释论文集》（纽约：诺顿出版社，1977年）。

115. L·马克西莫维奇，“‘崇拜：苏联文化中象征性词汇札记’”，《自由思想》，第10期（1993年）：40-41页；D·费尔德曼，《权力术语：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苏联政治术语》（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2006年），39页。

116.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6月17日。

117. V·索科洛夫，《恐惧部长：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莫斯科：AST出版社，2001年），124-25页。

118. E·托皮奇，“‘马克思主义与诺斯替教’”，载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社会哲学》（诺伊维德：卢赫特汉德出版社，1961年）。

119. 大清洗时期自我语言中明显存在诺斯替教语言。因此，历史学家明茨在1937年形容叶若夫“冲动”（*porvisty*）——这是赞美之词。早年认识叶若夫的德里祖尔用类似语言赞美这位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充满活力[*zhivoi*]，机敏[*iurki*]……他是我们红军部队的灵魂[*dusha*]。”《真理报》，1935年11月21日；索科洛夫，《恐惧部长》，93-95。

120. E·康德，《判断力批判》（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127页。

121. J·冯·格尔登，《布尔什维克节日，1917-19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146页。

122. E·R·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

123. 1937 年 3 月，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对身体感受作为认知媒介的作用进行了尖锐辩论。激情是正确判断的推动因素还是限制因素？“苏联人不仅需要激情洋溢和热烈的[*goriachee*]演讲……还需要客观评估案件的所有细节，以便能够有意识并有说服力地得出结论，”中世纪史学家格列科夫指出。但阿尼金有不同看法：“为什么要说激情与客观性相矛盾？”在他看来，只有激烈的批评/自我批评会议才能触及“现象的本质”（*sushchnost' iavlenii*）。至于卡申试图“将列宁颠倒过来”，舒斯特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必须全身心地理解列宁，他的言语必须被整个身体所体验——这样你就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教条主义者[nachetnik]。”R·加涅林编，《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如何导向枪决：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卡申生与死的文献》（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出版社，2006 年），138 页、151 页、156 页。

124. 《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6 月 29 日。

125. 《真理报》，1935 年 3 月 6 日；V·斯大林，《著作集》，13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49–52 年），第 6 卷：46 页，第 11 卷：58 页。

126. B·格罗伊斯，《斯大林主义的总体艺术：先锋派、美学专政及其超越》（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 年），61 页。

127. 《斯大林主义者》，1936 年 6 月 25 日、1937 年 4 月 1 日。该引文属于伏罗希洛夫。RGASPI，全宗 17，目录 165，案卷 58，张页 1，引自 I·坎托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莫斯科：星火时代出版社，2005 年），391 页。

128. 《真理报》，1933 年 5 月 25 日，1936 年 1 月 27 日。雅罗斯拉夫斯基轻蔑地评论道：“1933 年的清洗表明，党的许多部门对党的历史最基础的事实都知之甚少”，这种对历史研究更多关注的隐晦呼吁由此变得明确。当他们未能通过党史考试时，某些党组织中有多达 30% 的同志被降级为“同情者”。《真理报》，1933 年 8 月 29 日；阿布拉莫夫与 A. 亚历山德罗夫，《建设时期的党》（莫斯科，1934 年），第 72 页。

129. 《文学报》，1988 年 3 月 16 日，第 13 版。

130. 《真理报》，1929 年 12 月 21 日。

131. И. 斯大林，《著作集》（莫斯科，1952 年），第 7 卷：第 391 页。

132. S. 塔尔博特 编，《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0 年），第 47 页。比较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联共（布）简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 年）与其后来的《联共（布）历史》（莫斯科，1933 年）。

133. J. 卡迈克尔，《斯大林的杰作：三十年代的公审与清洗——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巩固》（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6 年），第 73–74 页。

134. S. 苏哈列夫，“历史舞台上的假面舞会（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辩护者贝利亚），”《苏共历史问题》，第 3 期（1990 年）：第 103–6，112–14 页；B. 波波夫与 B. 奥波科夫，“贝利亚主义。续篇，”《军事历史杂志》，第 7 期（1989 年）；A. 雷宾，“在 И. В. 斯大林身边，”《社会学研究》，第 3 期（1988 年）：第 8 页。

135. 关于奉承斯大林在 1917 年个人作用并谴责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合法主义立场”的早期史学路线表述，参见 H. 波波夫，《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概要》（莫斯科，1932 年），第 4 页。关于早在 1934 年 1 月就计划出版斯大林全集的情况，参见 RGASPI，f. 81，op. 3，d. 255，l. 217。

136. H. 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苏共历史问题》，第 11 期（1988 年）：第 57 页。1935 年 8 月 31 日，政治局正式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和党的宣传鼓动部联合出版斯大林著作全集。参见 И. 曼科夫斯卡娅与 Ю. 沙拉波夫，“个人崇拜与党史科学，”《苏共历史问题》，第 5 期（1988 年）：第 66–67 页。

137. 《真理报》，1934年4月5日。
138. M. 涅奇金娜，“1934-38年党和政府关于历史教学与历史科学的决议中的M. H. 波克罗夫斯基问题，”载于《历史札记》（莫斯科，1990年），第241-45页。
139. 《斯大林主义者》，1935年1月21日。
140. B. 克诺林，“对教科书《联共（布）简史》的评注，”《宣传员》，第21期（1934年）：第44页。
141. “每个共产党员的最重要任务，”《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5月11日。
142.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725，第15-18页，案卷1132，第154页；以及全宗24，目录2b，案卷1256，第90-91页。
143. 关于1934年后斯大林崇拜地位的上升，参见B. 恩克尔，“1929-1939年的政治统治与斯大林崇拜，”载于S. 普拉根堡编，《斯大林主义：新研究与新概念》（柏林：柏林施皮茨出版社，1998年），第177-78页。
144.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875，第2-3，10-11页。关于1930年代的斯大林崇拜，参见J. 普拉姆佩尔，“个人崇拜的空间诗学：斯大林周围的圈子，”载于E. 多布伦科与E. 奈曼编，《斯大林主义景观：苏联空间的艺术与意识形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6页。
145. S. 苏哈列夫，“《简明教程》的先行者：人物与文件，”《苏共历史问题》，第8期（1991年）：第115-16页；A. 阿尔季佐夫，“迎合领袖观点（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史教科书竞赛），”《半人马》，第1期（1991年）：第125页。
146.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875，第32页。
147.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875 [1935年]，第21，30页。
148.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994，第172页。
149. P. 萨莫伊洛夫与C. 博卢切夫斯基，“在工作中取得一系列成就，”《斯大林主义者》，2月4，1936。
150. R. 塔克，《掌权的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纽约：诺顿出版社，1992年），第540页。
151.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1655，第22页。
152.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986，第11页。
153.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566，目录1，案卷21b，第9-16页。
154. “若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苏联大学生》，1936年第7期：第10页。
155. 曼科夫斯卡娅与沙拉波夫，《个人崇拜与党史科学》，第68页。
156. 高加索党组织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由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托罗舍利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比利斯分院院长别季亚奉贝利亚指示撰写。N·鲁宾，《拉夫连季·贝利亚：神话与现实》（莫斯科：奥林匹亚出版社，1998年）。
157. G·马尔戈林，《关于某次生产会议》，《斯大林主义者》，1937年3月8日。
158.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566，目录1，卷宗21b，第9-16页。
159.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566，目录1，卷宗277，第105页。
160. A·尤尔恰克，《万物永恒，直至消逝：最后的苏联一代》（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4页。
161. 《斯大林主义者》，1936年4月9日、2月23日。
162.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卷宗987，第101页；及全宗197，目录1，卷宗994，第243页。
163.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卷宗1694，第1页。
164. 中央国家当代史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卷宗983，第233-234页。
165. TsGA IPD, f. 566, op. 1, d. 277, l. 22.
166. 他的历史学家声誉已经受损，瓦维林不得不在1936年9月请求党委员会原谅他未能意识到季诺维也

夫在 11 年前的党内斗争中与托洛茨基勾结：“在辩论之后，随着关注集中注意力……我被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季诺维也夫主义者仍在争吵的事实误导了。现在我知道，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攻击是为了转移同志们对准备联合进攻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这种邪恶力量的融合使得雅罗斯拉夫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例如，在 1938 年 1 月 14 日向叶若夫报告，调查已经确定，当地‘右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与德国、波兰和日本的情报机构，以及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叛乱-恐怖-破坏组织联合，从而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反革命阵线。’TsGA IPD, f. 197, op. 1, d. 1007, ll. 91-92; V. Pilipets, 《以信仰与真理：联邦安全局历史篇章》（雅罗斯拉夫尔：纽安斯出版社，2001 年），第 241 页。

167. 据托木斯克国立大学的加拉甘所述：“每一个前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人民公敌。”“季诺维也夫主义”同样境况不佳，被表述为 1917 年叛国行为的直接延续。1936-1937 年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流水线作业：托木斯克土地上“大恐怖”纪事（托木斯克：水瓶座出版社，2004 年），第 64-65 页。

168.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2, l. 31, 和 d. 1132, l. 34。

169. TsGA IPD, f. 566, op. 1, d. 324, l. 8。

170. TsGA IPD, f. 566, op. 1, d. 277, ll. 20-21。

171. TsGA IPD, f. 566, op. 1, d. 21b, ll. 56-67。

172. TsGA IPD, f. 566, op. 1, d. 320, l. 16。

173.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5 年 5 月 9 日。

174. 给权力的信，303。

175. 斯大林主义者，635，1937 年 4 月 3 日。

176.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28, l. 9。

177.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1, ll. 189-94。在一次讨论中，关于《真理报》一篇题为“看他们堕落到了何种地步”的文章，在红色教授学院，一位名叫尼基丁的教师未能明确说明“人民的敌人一直以来都是颠覆性的。”尼基丁承认“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有初步的复辟倾向：在 1917 年之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体，在 1923-24 年它是小资产阶级的偏差……[并且]最终，它蜕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描绘托洛茨基恶意以不同历史形式出现的模式的问题在于，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分阶段考察托洛茨基主义时，”尼基丁犯了“未能足够清楚地展示托洛茨基主义本质”的错误。TsGA IPD, f. 566, op. 1, d. 280, ll. 61-62。

178.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l. 231-32。

179.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 229。

180. 尽管德里兹进行了恶毒的运动，区委员会选择将特罗菲莫夫视为一个犯错的同志，而不是狡猾的敌人。委员会对德里兹有一些尖锐的话：“你未能证明特罗菲莫夫的案件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个宣传员犯的错误不足以将他归类到这一类别。”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l. 301-2, d. 986, l. 54, d. 994, ll. 233-37, 和 d. 1000, l. 64。

181. 《平反：30 至 50 年代政治审判》（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 年），202 页。

182. 《反对派公报》，《反对派公报》，第 65 期（1938 年）：第 3 页；罗戈文，《被枪决的政党》，第 107 页；塔克，《斯大林掌权》，370-71。

183. 先塔林斯基，《自由的奴隶》，190。

184. 《反对派公报》，第 56-57 期（1937 年）：第 6 页。

185. 阿·托尔斯泰，《祖国》，《消息报》，1937 年 6 月 12 日。

186. 《反对派公报》，第 56-57 期（1937 年）：第 6 页。

187. 截至 1941 年 1 月 1 日，马加丹劳改营（东北劳改营）中有 4173 名“右派托洛茨基组织成员”，

而“白军军官”和“地主”仅有 266 人。内部敌人显然被等同于反对派。 《马加丹真理报》， 1994 年 11 月 29 日。

188. 罗· 菲尔勒普-米勒， 《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与面貌》（伦敦：G. P. 普特南出版社，1927 年），第 141 页。

189. 《红色图书管理员》，第 4 期（1924 年）：第 137 页。

190. 《社会与政权》，55. 关于图书馆清理，参见 《文学阵线：1932-1946 年政治审查史》（莫斯科：俄罗斯乡村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兹·沃多皮亚诺娃、季·姆·戈里亚耶娃等编，《苏联政治审查史：文件与评注》（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1997 年）。

19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269 张。

19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281 张。

193. 普拉姆佩尔，《消除模糊性：1930 年代苏联审查实践》，《俄罗斯评论》，第 60 期（2001 年）：第 532 页。

19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11，第 139 张。

19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256-257 张。

196.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413 张。

19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第 21-22 张。

198.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11，第 276 张。

199. 《历史问题》，第 6 期（1993 年）：第 28 页。

20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4376，第 16-17 张。

20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271 张。

20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9，第 182 张。

20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08，第 99 张，及案卷 276，第 118-121 张。

20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03，第 22 张。

20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31，第 16-19 张。

206.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79，第 14 张。

20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11，第 143 张。

208.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408，目录 1，案卷 161，第 8-10 张。

209.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11，第 223 张。

21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283、411 张。

21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24，目录 2b，案卷 586，第 449 张。

21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31，第 16-19 张，及案卷 328，第 6 张。

21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03，第 38 张。

214. 叶尔莫拉耶夫，《苏联文学中的审查制度》（纽约：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1996 年），第 57 页。

21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第 31 张，案卷 1103，第 34 张，及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95，第 37 张。

216. 德赫斯特与法雷尔合编，《苏联审查制度》（梅图钦：稻草人出版社，1973 年），第 iii-v 页。

21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4376，第 16-17 张。

218.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案卷 208，目录 1，第 19 张。

219.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2，第 228-230 张。

22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111-112 张，及案卷 1655，第 20 张。

221. 《旗帜》，第 5 期（1988 年）：第 55 页。

22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111-113 张。

22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89 张。

22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6，第 10 张。
22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233-234 张。
226.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4376，第 93 张，及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26，第 19 张。
22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233-234 张。“世界文学中存在着永不褪色的 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形象，”语言学研究所的亚辛斯基指出，“当代的伪君子——就是那些潜入党内的恶棍、谄媚者和所有其他敌人。无论他们戴着什么面具，我们都必须能够识破。”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063，目录 1，案卷 7，第 10b 张。
228. 胡珀，《亲密的恐怖》，第 64 页。
229.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150 张。
230. 《德国帝国军队手中的俘虏：约·维·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讲话》，《史料》，第 3 期（1994 年）。
23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77，第 143 张。
23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3，第 91-92 张。1936 年秋，语言学研究所党委得知某个党小组发生争执。“不友好的关系”导致四名知识分子学生被斥为“社会异己分子”。难道他们不是在苏维埃制度下长大的吗？在语言学研究所党委的判决中可以听到阶级分析的消亡：“仅仅因为学生出身于小商人、手工业者或知识分子家庭，就把他们归入政治上不可靠者的阵营……这等于在帮助敌人。”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063，目录 1，案卷 8，第 45-46 张。
23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案卷 254，第 66-67 张。
23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案卷 254，第 65-66 张。
23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07，第 33-34 张。
236.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80，第 93 张。
23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88，第 68-69 张（1937 年 12 月 27 日）。
238. 阿·托尔斯泰，《祖国》。
239. 加涅林，《你们对我做了什么！》139.
240. 被揭露的教授遭到同事谴责、逮捕并处决。加涅林，《你们对我做了什么！》114 - 15, 122.
241. 《红星报》，1937 年 6 月 14 日；《真理报》，1937 年 12 月 21 日。
242. 安·维辛斯基，《斯大林宪法与检察机关的任务》，《社会主义法制》（1937）：6.
24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20，第 45 张。
24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20，第 30-31 张。
24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2，第 25 张。
246. 《平反》，191 - 92.
24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2，第 112-113 张。
248. 国家文学档案馆，1936 年对扎伊杰尔等人的第 21841 号案件，第 16 卷：第 16-17 张。
249.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77，第 19-20 张。
250. 《苏共决议与决定》，4: 74.
25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982，第 209-211 张，及案卷 1000，第 53 张。
25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55，第 63-68 张，及全宗 1816，目录 2，案卷 5091，第 35 张。
253. 姆·伊利明斯基，《人民委员雅戈达》（莫斯科：维切出版社，2002 年），第 176-180 页。
254.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131，第 110 张。
255. 《悲剧命运：苏联科学院遭镇压的科学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70 页。
256.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295，第 44-45 张，全宗 566，目录 1，案卷 303，第 38 张。
257. 坎托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378, 380.
258. 坎托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398.
259. 坎托尔，《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404.

260. 《军事历史杂志》，第5期（1990年）：第46页。

261. 姆·法因索德, 《俄国如何统治》(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3年), 第159页。
262. 《党的建设》, 第2期(1937年)。
263.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68-80张。
264. 《真理报》, 1936年1月15日;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408, 目录1, 案卷59, 第3-10张。
26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408, 目录1, 案卷59, 第12张。
266. 《斯大林主义者》, 1936年6月13日。
267. 《斯大林主义者》, 1936年6月4日。
268.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037, 第128张。
269. 《列宁格勒真理报》, 1936年10月24日; 《斯大林主义者》, 1936年10月8日;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986, 第20张。关于“同情者”概念的重现, 参见《列宁格勒真理报》, 1936年5月8日。
27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026, 第3-5张。
271. 《斯大林主义者》, 1936年5月25日。
27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史文献部,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983, 第141、152张, 及案卷986, 第22-24张。
273. 《列宁格勒真理报》, 1936年10月30日。
274. 弗·辛, 《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主义者》, 1936年6月25日。
275. TsGA IPD, f. 408, op. 1, d. 18, ll. 6, 14.
276.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l. 126-27, 146, 150-51, 201.
277. M. Voslensky, *Nomenklatura: Anatomy of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trans. E. Mosbacher (London: Overseas Publications, 1984), 238-39.
278. S. Lovell, *Summerfolk: A History of the Dacha, 1710-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3 n.240.
279. TsGA IPD, f. 197, op. 1, d. 725, ll. 167, 169.
280. TsGA IPD, f. 566, op. 1, d. 324, ll. 31-33.
281. *The Case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ite Terrorist Centre Heard before the Military Collegium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S.S.R. Moscow, August 19-24, 1936* (Moscow, 1936), 66.
282. ALM, Case no. 21841-36 against Zaidel', etc., vol. 16, l. 48.
283.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 102.
284.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37, l. 46.
285.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37, l. 103.
286. A. Orlov,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135-36.
287. Orlov,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135-36.
288. PANO, f. 6, op. 1, d. 12, ll. 2-4.
289. W. Tomasik, "The Motif of Male Friendship in Stalinist Mytholog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43 (2001): 70.
290. K. Rosiianov, "Beyond Species: Il' ya Ivanov and His Experiment on Cross-Breeding Humans and Anthropoid Apes," *Science in Context* 15, no. 2 (2002); E. Naiman, "Discourse Made Flesh: Healing and Terr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viet Subjectivity," in I. Halfin, 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Making Modern Political Identities* (London: Frank Cass, 2002).
291. 由于党的领导层存在可疑的性道德, 一首粗俗的诗歌在1920年代流传: “俄国已变成妓院, / 布尔什维克的管弦乐队咆哮, / 各种渣滓正在跳舞 / 没有内裤的苏联康康舞。”性变态只是大规模堕落的一个症状, 其整体信息是明确的: 党未能兑现其创建一个纯净自足社群的承诺。一个腐化的组织不值得尊敬, 共产党人要求的虔诚态度也遭到嘲笑。因此出现了如下这样的小调: “我买了一支蜡烛, / 放在列伊奇的小弟弟上, / 燃烧吧, 我的蜡烛, / 让他小弟弟的记忆永存”(Я купил,

купил свечу, / Поставил на хуй Ильичу. / Ты горни,
моя свеча, / В память хуя Ильича)。这里的戏仿不仅体现在内容上，
也体现在形式上。作者是人民中的一员，他的歌曲被风格化为流行的押韵诗。当讽刺语言渗透到党内斗争中时，
其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例如，被认定为季诺维也夫分子手笔的《酒鬼之歌》，将斯大林领导层称为“妓女”
(бляди)。其中提到了时代性颠倒的威胁：“我们将喝光所有的钱 / 但留下手风琴。 / 嘿，妓女们， /
我们会让你们跳舞”(Всю пропьём / Гармошку оставим. Эй
бляди— / Плясать заставим)。经安全部门解读，其含义是：“我们将与中央
委员会共舞一段时间，但终有一天我们会定下调子。”那会是什么调子？是革命禁欲主义、审慎和节俭的调子—
—即苏联机关人员早已背弃的老布尔什维克价值观。

表面上看，我们在此处理的是外部批评。民主元素指出党的道德堕落并承诺复仇与逆转。但必须考虑其中
强烈的模仿元素。在戏仿党的活动时，批评者也明显认同官方语言。巴什基尔地区“爱情事务同志互助”小组的
成员填写“调查表”，领取“会员证”，并撰写记录成员性行为的“议定书”。而在维亚特卡，一项军事命令规
定了性招募。来自斯大林格勒地区的青年组织“农村妓女委员会”(Сельблядком)直接针对党的
狂欢活动。该组织新成员获得的证书是用当地党委的打字机打印的，模仿了发给共产党全权代表的委任状风
格：

例如，“本证书持有者被派往农村组织卖[淫]事务[блядовое) дело]。所有组织必须提供女
孩和床铺予以协助。”当地区苏维埃副主席接到下乡任务时，被发给一张“性满足券”，要求“居住在村里的女
性”满足其需求。这些幻想游戏中对享受的矛盾态度显而易见，因为其作者似乎无法决定是拒绝党的领导层的放
荡生活，还是希望加入其中。高级官员的享受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忠诚信徒通过它向自己展示了他们
与完全纯净这一幻想之间最内在的关系。领导层在以资产阶级方式享受生活，但这种享受方式却矛盾地重现于共
产主义社会的核心。D. Rayfield, *Stalin and His Hangmen: The Tyrant and Those Who Killed
for Hi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268; J. Berger-Barzilai, *Ha-T. eragedyah shel ha-
mehapekhah ha-sovvetit* [苏联革命的悲剧] (Tel Aviv: Am Oved, 1968), 124; G. Rittersporn,
“Formy obshchestvennogo obikhoda molodezhy,” 361–63.

292. G. Agabekov, *ЧК за работой* (Berlin: Strela, 1931), 234.
293. Sokolov, *Наркомы страха*, 18.
294. Shentalinskii, *Рабь свободы*, 364–65.
295. Sokolov, *Наркомы страха*, 71.
296. Marc Jansen and Nikita V. Petrov,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5–1940* (New York: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172.
297. *Бутковский полигон* (Moscow, 2004), вып. 8, 144.
298. N. Zen' kovich, *Самые закрытые люди* (Moscow: Olma Press, 2002),
54.
299. S.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505.
300. A. Knight, *Ber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7;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 С, no. 2 (1991): 158–59.
301. Knight, *Beria*, 29, 95.
302. Montefiore, *Stalin*, 506–7.

303. 关于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性堕落的幻想在斯大林时代一直存在。作为犹太民族主义者被捕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重大案件侦查处副处长列夫·施瓦茨曼，供认“与继女发生性关系，并与儿子有同性恋关系”。而在克里姆林宫长期负责斯大林个人警卫工作的尼古拉·弗拉西克，被迫作证说1940年他和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廖贝舍夫经常在他的别墅里与“放荡的女人”幽会。艺术家弗拉基米尔·施滕贝格1955年告诉法庭，他甚至难以估计弗拉西克有过多少女人。施滕贝格常常下午去朋友的别墅打台球喝酒，结果发现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女人。以下是施滕贝格记忆中保留的情人名单：尼古拉耶娃、雷赞采娃、多库金娜、洛克季奥诺娃、斯皮里娜、韦希茨卡娅、格拉杜索娃、阿韦里娜和维拉·格拉西莫芙娜。“我想弗拉西克也和谢尔巴科娃[可能是 A. C. 谢尔巴科夫的妻子]上过床，还有戈罗德尼切娃的姐妹们——柳达、阿达、索尼娅，和克鲁格利科娃、谢尔盖耶芙娜（科兹洛夫斯基的妻子）及其姐妹，还有其他我不知道名字的女人。”最终，弗拉西克勾引了施滕贝格的妻子，并且懒得向他的新朋友隐瞒这个信息。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和阿纳托利·苏多普拉托夫，*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301; J. Brent and V.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 1948–1953*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281.
304. Zen' kovich, *С а м ы е з а к р ы т ы е л ю д и*, 389.
305. Sokolov, *Н а р к о м ы с т р а х а*, 19–20.
306. 关于谣言，见 R.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Norton, 1996); O. Figes and B.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7. *The Žižek Reader* (London: Blackwell, 1999), 61.
308. A. Vatlin, *Terror raionnogo mashtaba* (Moscow: ROSSPEN, 2004), 116.
309. Pilipets, *Veroi i pravdoi*, 246.

第四章

1. *Pis'ma vo vlast': 1928–1939* (Moscow: ROSSPEN, 2002), 263.
2.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声称完成了根据德国哲学只有无限的神圣心智才能做到的事——他们获得了“理智直观”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理智直观代表主体自我反思性、表演性的实现，它指主体对其自身既作为意义生产者又作为所生产内容的直接、独特的意识。1930年代中期的弥赛亚语义学也可以解读为未来主义者愿望的圆满实现：不仅要创造新词，还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根据1930年代活跃于列宁格勒的奥贝里乌左翼文学团体的观点，词语可以是“自足自证的” (*самоценное самовитое слово*)——即“词语本身” (*слово как таковое*)。丹尼尔·哈尔姆斯在1933年10月16日写给克拉夫季娅·普加乔娃的信中说：“这首诗已经变成了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把它从纸上拿下来扔向窗户，窗户会碎裂。”I.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PR B68–72); J. Fichte, *Science of Knowledge*, ed. P. Heath and J. Lach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8; D. Burliuk et al., “Пощечи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вкусу (слово как таковое),” and A. Kruchenykh, “Декларация слова, как такового,” both in V. Markov, *М а н и ф е с т ы и п р о г р а м м ы р у с с к и х ф у т у р и с т о в* (Munich: Fink Verlag, 1967), 50–51, 59–60, 63–64; A. Aleksandrov, *Х а р м с : П о л ё т в н е б е с а* (Leningrad: Sovetskii pisatel', 1988), 483–84.
3. K. Fedin, “Счастье быть молодым,” *П р а в д а*, 1938年1月27日。

4. “Сталин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подрастающ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no. 4 (1937): 4.

5. TsGA IPD, f. 566, op. 1, d. 288, l. 49.

6. O. Suvenirov, *Tragedia RKKA 1937–1938* (Moscow: Terra, 1998), 290.

7. *Бутковский полигон* (Moscow, 2004), вып. 8, 84–85.

8. TsGA IPD, f. 197, op. 1, d. 263, ll. 43–44; A. Getty, “Afraid of Their Shadows: The Bolshevik Recourse to Terror, 1932–1938,” in M. Hildermeier, ed., *Stalinismus vor dem Zweiten Weltkrieg: Neue Wege der Forschung* (München: Oldenbourg, 1998), 186.

9. D. Balmuth, *《俄罗斯审查制度, 1865–1905》* (纽约: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9 年)。

10. 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在他的 *《苏联文学审查制度, 1917–1991》* 中错过了帝国和苏联审查制度的区别。 (纽约: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 1996 年)。

11. “我希望同志们能从我的错误经验中学习,” *《苏共历史问题》*, 第 6 期 (1991 年): 第 88 页。

12. 感谢 J. 普兰珀的《消除歧义: 1930 年代苏联审查实践》一文, *《俄罗斯评论》* 第 60 卷 (2001 年 10 月) 提供的这一解读, 以及我在分析斯大林弥赛亚语义学时借鉴的诸多内容。

13.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1106, ll. 195–96. 弗拉基米尔·卡申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讲课时指出, 1919 年多个省份 (乌克兰、西伯利亚) 的农民曾反抗苏维埃政权。当有人指出这是“诽谤”时, 这位历史学教授指出: “如果学生们重读列宁的著作……可能会发现他提到农民可能支持反革命。”阿尼金嘲讽这种诠释的灵活性: “难以置信的是, 在教授群体中竟有人试图说服我们列宁的引文可以这样或那样解读……从革命意义上或从反革命意义上。”卡申遭到告发、逮捕, 最终被处决。R. 加涅林编,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如何被推向枪决: 关于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卡申生与死的文献》* (圣彼得堡: Nestor 出版社, 2006 年), 第 107–108、150 页。

14.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24, op. 2b, d. 1015, l. 17。

15.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725, ll. 120–21。

16.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566, op. 1, d. 277, l. 143。

17.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566, op. 1, d. 288, ll. 68–69。

18.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197, op. 1, d. 1037, ll. 95–97。

19. L. 瓦西里耶娃, *《克里姆林宫的妻子们》* (莫斯科: Vagrius 出版社, 2004 年), 第 109 页。

20. 苏维尼罗夫, *《悲剧》*, 119。

21. J. 卡西迪, *《审判敌人: 早期苏维埃法庭在舞台与银幕上》* (迪卡尔布: 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191–92 页。

22. I. 坎托尔,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战争与和平》* (莫斯科: Ogoniek Vremia 出版社, 2005 年), 第 446 页。

23. N. 佩尔, *《守恒定律》* (圣彼得堡: Borei 出版社, 1994 年), 第 102–3 页。

24. *《致权力的信件》*, 384–85。

25. M. 伊利明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莫斯科: Veche 出版社, 2002 年), 第 226 页。

26. 伊利明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226。

27. 伊利明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225。

28. 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f. 566, op. 1, d. 296, l. 25。

29. TsGA IPD, f. 197, op. 1, d. 1737, ll. 1–2。

30. 苏维尼罗夫, *《悲剧》*, 108. 高等文化并未逃脱这种过度意图主义。在 1937 年作家联盟管理委员会的第四届全体会议上发言时, 德米特里·彼得罗夫斯基焦急地说: “不要跟我谈论混乱 [混乱 (sumburnost’)]”

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发现的。这是一个代码，针对某人并包含一个不可错过的信息。问题不在于帕斯捷尔纳克形式的复杂性，而在于他决定利用这种复杂性来对抗我们。” D. 贝科夫，*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7），217。

31. 《致权力的信》，300。
32. TsGA IPD, f. 566, op. 1, d. 209, l. 182, and d. 277, l. 27.
33. TsGA IPD, f. 566, op. 1, d. 21b, l. 55.
34. TsGA IPD, f. 566, op. 1, d. 288, l. 42, and d. 209, l. 182.
35. TsGA IPD, f. 5063, op. 1, d. 8, l. 32.
36. TsGA IPD, f. 566, op. 1, d. 208, ll. 146 - 51.
37. TsGA IPD, f. 197, op. 1, d. 263, ll. 43 - 44.
38. 《遗传学和选择的有争议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109.
39. A. 克瓦什翁金 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1928 - 1941 年》（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1999），59.
40. 苏韦尼罗夫，《悲剧》，32.
41. 克瓦什翁金 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146 - 47；《平反：30 - 50 年代的政治进程》（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242 - 44.
42. 苏韦尼罗夫，《悲剧》，32.
43. TsGA IPD, f. 984, op. 1, d. 126, ll. 38 - 39.
44. “接受一顿打”（送去挨打（*povesti na shlepku*））是一种特别讽刺的死亡威胁，因为它援引并在某种意义上嘲弄了 1930 年代初的矫正言论。苏韦尼罗夫，《悲剧》，190；布托夫斯基射击场，卷 8，231.
45. 苏韦尼罗夫，《悲剧》，190；布托夫斯基射击场，卷 8，231.
46. K. 克拉克，《苏联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H. 根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载于 N. 科列斯尼科夫 和 W. 斯米尔尼夫 编，《重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麦克马斯特会议论文集》（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1994 年）。
47.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6, l. 68。
48.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他的《小说的终结》中预言了完满主体的出现，发表于《论诗》1928 年：“显然，一旦我们进入强大社会运动和有组织群众行动的时代，个人在历史中的效力就减弱了，小说的影响力和力量也是如此。小说总是通过传记联系组织的一系列现象，并由传记尺度来评估。小说的未来命运不过是传记作为个人存在形式的瓦解史；不仅仅是瓦解，而是传记的灾难性毁灭。因为今天，欧洲人被驱逐出他们的传记，就像台球被击到台面上，它们相互作用的法则，就像台球的碰撞，由一个原理支配：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一个没有传记的人不能成为小说的核心，而小说同时，如果对个别人脸的兴趣——情节及伴随的一切——丧失意义，小说也就无意义。此外，对心理动机的关注（颓废小说已经感知到其即将到来的末日，巧妙地试图以此生存）已被连根拔起，并在那些每小时都在变得更残酷的现实力量面前，因心理动机的无力而丧失信誉。当代小说同时被剥夺了情节，即特定时间个人的行为，和心理学，因为它不再构成任何行为的基础。”引自 A. Wachtel, “Meaningful Voids:

《普拉东诺夫和马列维奇中的无面性》，载于 C. Kelly and S. Lovell, 编，《俄罗斯文学、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年），268 页。

49. P. Steiner, 《波西米亚的沙漠：捷克小说及其社会语境》（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 年），183 页。

50. RNB, 红皮书纪念集 *列宁格勒殉道录*, 复制件 *多布罗尼茨基案* (P-52593, l. 227)。

51. 据 Ryklin, 在 1930 年代, “人学原理的侵蚀……是彻底的”, 而个体化是“卓越的罪过”。M. Ryklin, “言语视觉的变形”, 载于 D. Ross, 编, 《春与夏之间：晚期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概念艺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年），137 页。

52. TsGA IPD, f. 566, op. 1, d. 293, ll. 12 - 13。

53. TsGA IPD, f. 5063, op. 1, d. 8, l. 141。

54. TsGA IPD, f. 5063, op. 1, d. 8, l. 141。

55. Ts. Feinberg, 《谢尔布斯基教授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 25 年工作经验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莫斯科，1947 年），15 页。

56. D. Healey, 《革命俄罗斯中的同性恋欲望》（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 年），175 页。

57. L. Graham, “鲍里斯·赫森的社会政治根源：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史”，《科学的社会研究》15 (1985): 708。

58. 《悲剧命运：苏联科学院受迫害的科学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 年），58, 69, 74 - 75 页。

59. Suvenirov, *Tragediia*, 163, 69.

60. Suvenirov, *Tragediia*, 166.

61. Suvenirov, *Tragediia*, 188, 270.

62. 《真理报》，1938 年 3 月 5 日；R. Tucker and S. Cohen, 《大清洗审判》（纽约：Grosset and Dunlap, 1965 年），157 - 58 页。

63. TsGA IPD, f. 566, op. 1, d. 288, ll. 68 - 69。

64. TsGA IPD, f. 566, op. 1, d. 254, l. 59。

65. TsGA IPD, f. 566, op. 1, d. 254, l. 10。

66. *布托沃刑场*, vyp. 8, 120。

67. TsGA IPD, f. 566, op. 1, d. 277, l. 47, and d. 280, l. 62。

68. V. Rogovin, *1937* (莫斯科：V. Z. Rogovin, 1996 年)，108 页。

69. 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试图将自杀呈现为个人绝望的行为。他起草了两封遗书。第一封写道：“斯大林同志和叶若夫同志！请相信我，我与反革命无关。我是党的忠实儿子。”第二封写道：“我虚假地指控了自己。我无法再忍受了。伊克拉莫夫。”但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人将自杀呈现为拒绝生活在选定兄弟情谊的意义框架之外。马尔蒂米安·柳廷的女儿回忆了他的最后日子：“父亲被开除出党后，他很少离开家。我们对他非常小心，担心他的神经会崩溃并自杀。他常常重申：‘如果我不在党，我就没有理由继续活下去。’”如果在自由主义的观点中，自杀是自憎的终极表达，那么在共产主义观点中，它是自爱的表达。正是因为决心作为一个好共产党人直到最后一口气，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更喜欢“政治自杀”而不是肉体自杀，他认为肉体自杀是轻松的出路。1937 年 7 月 6 日，他拜访了他的老战友伊尔科·齐夫齐瓦泽，后者在前一天被开除出党。“我们为党做了什么？”皮亚特尼茨基对这位失宠的朋友说。他在 6 月 24 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自杀性演讲——

他在向齐夫齐瓦泽解释时说道，“是为了中央委员会6月24日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那番自杀性演说，“那是一次预谋的行动。为了党的纯洁与统一，我准备牺牲我的生命，并且在必要时，牺牲我妻子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根据斯大林的官方宣告，自杀被视为有罪的标志。这就是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对扬·加马尔尼克自杀事件的评论：“我的第一副手昨天开枪自杀了。为什么，他没有说。听说他将被解除指挥职务[因与反革命分子有联系]，他不假思索就开枪自杀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尚不确定，但悲伤的念头涌上心头。”以下是两位高级军官就同一问题的对话：“叶夫根尼[·加马尔尼克]可以找个更好的时间自杀。他不去作证，反而选择自杀。”参见A. 普罗斯库林编：《归还的名字：两卷本政论文集》（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208页（伊克拉莫夫），第2卷：第193-94页（柳廷），第2卷：第65-66页（皮亚特尼茨基），第2卷：第215页、第257页（加马尔尼克）。关于分析框架，参见K. 平诺夫，《早期布尔什维克俄国针对集体自我的暴力与社会整合问题》，《批判》4（2003）。

70.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566，目录1，案卷290，页码22。

71. P. 所罗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刑事司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9-42页。来自功能诊断研究所的普列特涅夫被指控于1938年害死了捷尔任斯基。1929年3月8日，苏联文化负责人克伦采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回忆道，作为“反苏右翼托洛茨基集团”成员的普列特涅夫，是在捷尔任斯基心脏病发作后立即参与治疗的医生之一：“几小时后，他让捷尔任斯基独自返回住所。这位契卡负责人弯腰查看床铺时倒地身亡。众所周知，心脏病发作后患者不应移动，尤其不能行走和弯腰。”这种过度意图论——一切都不会出错，每个结果都有相应的动机——与此前那个尚未实现的十年的观念相去甚远，那时许多事情看似偶然。这让人想起埃尔德曼1925年的《委任状》《委任状》中那些不连贯的对话。到剧终时，观众意识到剧情已升级为角色对舞台上随机词汇和物品的荒诞反应的连锁反应。言语与其所指之间的丝毫脱节，导致剧中一个角色问道：“如今任何事情真的都有原因吗？”克瓦什金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第391页；卡西迪，《受审的敌人》，第144页（埃尔德曼）。

72. V. 格列科夫，《1937-1938年对共青团领导层的迫害》，《历史问题》，第11期（1990年），第142-43页。另见L. 奥维奇尼科娃和A. 斯特罗卡诺夫，《宣布为人民公敌……》，《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6月16日；D. 波利亚科娃和V. 霍伦日，《亚历山大·科萨廖夫：‘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3月17日；A. 戈洛夫科夫，《不肯弃自己》，《星火》，第7期（1988年），第27-28页。

73. 《摘自科学院院士B. И. 维尔纳茨基日记》，《绝密》，第8期（1990年），第11-12页。

74. 马耶维奇，《幽默与讽刺》，《新闻工作者》第4期（1923年）；A. 列日涅夫，《走向讽刺复兴之路》，《文学报》，1929年4月22日。

75. A. 卢纳察尔斯基，《让我们欢笑吧》，《八卷本选集》（莫斯科，1964年），第3卷：第78页。

76. 卢纳察尔斯基，《论笑》，《选集》，8：538。

77. R. 伯根，《谢尔盖·爱森斯坦：冲突中的一生》（伦敦：华纳图书，1997年），第180页。

78. V. 布柳姆，《讽刺会复兴吗？》，《文学报》，1929年5月27日；G. 雅库宾斯基，《论我们时代的讽刺》，《文学报》，1929年7月8日；V. 博伊切夫斯基，《苏联讽刺之路》，《苏维埃土地》（1931）：143-49。

79.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97，目录1，案卷725，页码122-23。

8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85，案卷222，页码60-62。

81.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页码 192。
82. J. 彼得斯，《斯大林主义下的讽刺：左琴科的《蓝书》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载于《斯大林时期的文化》，编者 H. 京特（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 年），第 212–13 页。在 1917–1949 年“滑稽与讽刺期刊”目录所列的 128 个条目中，仅有 5 个出现于大清洗时期（1936–39 年）；1930 年代出版量的下降无法解释这种匮乏。《1917–1949 年苏联期刊》（莫斯科，1958 年）。
83. И.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载于 И. 爱伦堡，《九卷本选集》（莫斯科，1967 年），第 9 卷：第 16 页。
84. 苏联官方幽默作家被指示避免任何歧义。参见 Я. 沙菲尔，《关于讽刺小说的问题》，《印刷与革命》12（1929）：31。
85. A. 盖蒂和 O. 瑞莫夫，《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9 页。
86.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部，全宗 5063，目录 1，案卷 7，第 22 页。
87.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2，第 56 页，以及案卷 908，第 50 页。克雷连科于 1936 年 3 月 31 日向斯大林报告：“送达我案头的许多案件……涉及反革命笑话。”克瓦尚金等编，《苏联领导层：通信集》，327。
8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第 272 页，以及案卷 1000，第 69 页。
8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725，第 264 页。
90. A. 雅科夫列夫等编，《卢比扬卡：斯大林与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 年 1 月–1936 年 12 月》（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年），第 585–586 页。
91. 苏维尼罗夫，《悲剧》，85。
92. 《致权力机关的信函》，315。
93. M. 科尔佐夫，“在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于《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 年），第 223 页。
94.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共产国际档案部，全宗 197，目录 1，案卷 1037，第 100 页。
95. 在大清洗期间，敌人再也无法掩饰自身，这使其显得可笑。关于“恶棍叶努基泽”，斯大林在 1937 年 6 月 2 日军事高级指挥会议上说道：“他懂得如何装成一个乡下傻瓜并开始哭泣，于是这个瘦高个子[verzila（俚语，指高个子笨蛋）]就被人相信了。”这种天真属于过去，听众们欢快地笑了起来。斯大林举的下一个例子，军官奥尔尚斯基，也被揭露为反革命分子并遭逮捕。总书记指出，奥尔尚斯基曾被推荐为一个“头脑清醒、自制力强、意志坚定的人”，这番描述引起了阵阵大笑。敌人完全暴露无遗，显得滑稽可笑。斯大林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当需要一名武官（attaché）时，verzila] 他就被人相信了。”attaché，敌人提出了七个候选人。六个是傻瓜，第七个是他们自己人——在傻瓜中他显得杰出。”再次，观众咯咯笑起来。随着大清洗的结束，欢笑的来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严肃的谴责语言被蔑视，警惕者的洞察力被嘲笑。在对近期清洗作出负面评价时，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允许自己大量使用幽默。窃笑和咯咯笑，他 1939 年的观众显然赞同他轻率的语气。谈到 1937 年 11 月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逮捕，梅赫利斯指出：“在这个人身上被编织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白军士兵，参与反苏维埃叛乱的参与者，一个富农，当然，还与人民敌人勾结——以至于人们无法接近他！（笑声）。”梅赫利斯提到另一个受害者，“因他父亲的反革命过去而被清洗——父亲在这名共产党员指挥官只有十岁时去世，是一家糖厂的厂长助理。什么反革命过去！”笑声

再次响起，赫鲁晓夫加入：“我们特别部门的人仍在使用这些流氓收集的旧材料，声称这是‘好东西’。”对这番演讲的反应更加热情——“普遍笑声。”再次上台，梅赫利斯抨击了党监察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叶若夫时期的挑剔：“如果受到审查，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迫害，直到坟墓。在问卷和口头报告中，他必须报告何时受到审查，为什么，审查何时解除，由谁解除。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将受到更严重的审查。”这里记录了一阵“爆发出的笑声”。听众嘲笑内务人民委员部——这在几个月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最可笑的是安全机关的字面意义，他们荒谬的过度严肃。隐喻，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某种差距，重新出现，并随之而来一种特定类型的幽默。N. 切鲁舍夫，*1937年：红军精英在各各地*（莫斯科：Veche出版社，2003年），292-93页，298页；*历史档案*，第3期（2005年）：75页，77页。

96. I. 伊文托夫，“胜利者的笑声：二十年苏联讽刺，”*当代文学* 7（1937年）：223-42页；V. 加罗斯，“莫斯科1936-1938：恐怖的笑声，”载于*Die Russie et d'allieurs*，*马尔克·费罗杂录*（巴黎，1995年），72页，80页。

97. T. 李森科，“集体农庄实验室-农业科学创造者，”*春化处理*，第5期（1937年）：22页。

98. L. 科舍列娃等人，*I. V. 斯大林致 V. M. 莫洛托夫的信件 1925-1936年，文件集*（莫斯科：Rossia molodaia出版社，1995年），231页。

99. V. 皮亚特尼茨基，*针对斯大林的阴谋*（莫斯科：Sovremennik，1998），132-33页。

100. B. Grois，“狂欢的极权主义，”in *《巴赫金文集 iii》*（莫斯科：Labirint，1997），76-80页。

101.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莫斯科，1936年8月19-24日*（莫斯科，1936），139-40页。

102.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66.

103.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70.

104. *《恢复的名字》*，1: 191.

105. J. 马戈林，*非人境遇：苏联集中营中的五个鼻子*，N. 别尔别罗娃 与 M. 朱尔诺 译（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49），119，304.

106. *布托夫斯基靶场*（莫斯科，2004），第8辑，144.

107.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咒语式话语”，参见 E. 奈曼，《话语化为血肉：苏联主体性建构中的治愈与恐怖》，载于 I. 哈尔芬 编，《*语言与革命：塑造现代政治认同*》（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2002），299.

108. 叶尔莫拉耶夫，《*苏联文学审查制度*》，43-45；V. 列别杰娃，《1930年代苏联文化中的极权与大众元素》，*《俄罗斯历史研究》* 42（2003）：81-84.

109. 叶尔莫拉耶夫，《*苏联文学审查制度*》，46.

110. V. 伊万诺夫，《*教团使命*》，108.

111. A. 瓦特林，《*区级规模的恐怖*》（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152.

112. *布托夫斯基靶场*，第8辑，199.

113. 伊利明斯基，《*人民委员雅戈达*》，270.

114. A. 沃伊特洛夫斯卡娅，《*追寻我这一代人的命运*》（未刊手稿，约1990年），74.

115. A. 韦斯伯格，《*沉默的阴谋*》（伦敦：汉密尔顿出版社，1952），223.

116. 韦斯伯格，《*沉默的阴谋*》，237，245-46.

117. *《社会与权力：1930年代——文献叙事》*（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179; A. 考夫曼, 《营中医生: 在苏联的十六年》[《营中医生: 在苏联的十六年》](特拉维夫, 1971), 63.

118. O. 苏维尼罗夫, 《国防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前年代》, 《历史问题》, 第6期(1991): 31.

119. V. 索伊费尔, 《科学与权力: 共产党人在苏联对遗传学的毁灭》.(莫斯科: 切罗出版社, 2002), 523. 当他们在6月9日收到雅基尔的求饶信时, 政治局成员们潦草地写下了他们的评语: “猪与娼妓, 约·斯[大林].”“一个极其精确的定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用自己的笔补充道。卡冈诺维奇则超越了所有人: “对于一个杂种、渣滓和婊[子], 只有一种惩罚——死刑。”咒骂与消灭被告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参见《苏共中央通报》, 第4期(1989): 56.

120. 韦斯伯格, 《沉默的阴谋》, 223.

121. 关于资产阶级与女性的同一化, 参见 I. 哈尔芬, 《强暴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奠基神话》, 《俄罗斯评论》1 (1997).

122. F. 德雷津 与 T. 普里斯特利, 《对俄罗斯猥亵语言的系统研究》, 《俄罗斯语言学》第6卷(1982). 关于咒语语言的文献, 参见《大俄罗斯咒语: L. N. 迈科夫文集》(圣彼得堡, 1862); P. 伊万诺夫, 《巫术、低语与咒语》; V. 托波罗夫, 《关于在时间中保存传统的一种方式: 神话诗学视角下的专名》, 载于《斯拉夫民族志问题》(列宁格勒, 1979).

123. 与此同时, 内务人民委员部正在仔细追踪每一条针对苏联领导人的亵渎言论, 这是《亵渎君主罪》的现代版本。那些在“身体不恰当部位”刻下斯大林纹身的年轻人被起诉。当告密作家费多罗夫报告苏联作家协会的一名成员在大楼前“撒了泡尿”(pomochilsia)时, 一项调查随即展开。《布托夫斯基靶场》, 第8辑, 139; V. 卡韦林, 《尾声》, 《涅瓦河》, 第8期(1989): 52.

124. 这一原则在 B. 乌斯宾斯基, 《古罗斯文化中的反行为》中得到分析, 载于《文化遗产研究问题》(莫斯科, 1985).

125. 韦斯伯格, 《沉默的阴谋》, 245.

126. 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在狱中不得不穿树皮鞋代替军靴; 他的下属普特纳和普里马科夫则穿着旧衣服, 不许理发, 也不许刮脸。《俄罗斯军事档案》(莫斯科: 佩列斯韦特有限责任公司, 谢列拉有限责任公司, 1993). 第1卷: 54-55.

127. 苏维尼罗夫, 《悲剧》, 32.

128. 苏维尼罗夫, 《悲剧》, 202-3.

129. 苏维尼罗夫, 《悲剧》, 194.

130. 索科洛夫, 《恐惧人民委员》, 129.

131. M. B. 施赖德, 《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 一名肃反工作者的笔记》(莫斯科: 回归出版社, 1995), 141.

132. 苏维尼罗夫, 《悲剧》, 195.

133. A. 兹维亚金采夫 与 尤·奥尔洛夫, 《被革命钉上十字架者: 俄罗斯与苏联检察官, 二十世纪, 1922-1936年》(莫斯科: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63.

134. J. 伯格-巴尔齐莱, 《午夜闪光》[《午夜闪光》](特拉维夫: 阿姆·奥韦德出版社, 1962), 41.

135. 伯格-巴尔齐莱, 《午夜闪光》, 41. 在嘲笑遗传学教授科尔佐夫时, 他的揭发者将其反革命理论宣言描述为一头蠢兽的声音。当巴兰被要求前往摩押地诅咒以色列人时, 他被他的驴阻止了, 因为驴看见了站在路上的耶和華使者。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耶和华开了驴的口，驴便说话了！当他最终到达摩押并俯瞰以色列营地时，已知晓真相的巴兰祝福了以色列而非诅咒它。现在来看当下的类比：“如果从前，在圣经时代，巴兰的驴能用人说话，那么如今科尔佐夫证明反过来也是可能的。”他的“遗传学预言”就是驴话。I. 普列津特 与 A. 努里诺夫，《论优生学先知 N. K. 科尔佐夫及其优生学战友》，《社会主义农业》，1937 年 4 月 12 日。背景参见 N. 罗尔-汉森，《一厢情愿的科学：T. D. 李森科农业生物学在科学政治中的延续》，《奥西里斯》，第 23 卷（2008）：166 - 88。

136. 诅咒和谩骂是象征性逐出教会的传统形式；在东正教传统中，祝某人像狗一样死去，等同于祝他死时得不到最终赦免。B. 乌斯宾斯基，《俄罗斯表达性短语的宗教-神话层面：历史视角下俄罗斯脏话的语义学》，载于 M. 哈勒 等编，《符号学与文化史》（哥伦布市：斯拉维卡出版社，1988），242。

137. A. 维克斯伯格，《检察官与猎物：维辛斯基与 1930 年代莫斯科公审》，简·巴特勒 译（伦敦：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1990），82。

138. 《真理报》，1938 年 3 月 10 日。

139. 塔克 与 科恩，《大清洗审判》，530, 533, 545 - 46。

140. 克瓦什奥宁 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357 - 60；RGASPI，全宗 329，目录 2，案卷 6，页 41 - 44。

141. 《苏联文化报》，1989 年 2 月 16 日。

142. K. 扎列斯基，《斯大林帝国：传记百科词典》（莫斯科：维切出版社，2000），192。

143. 盖蒂 与 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388。

144. 苏维尼罗夫，《悲剧》，188；瓦特林，《区级规模的恐怖》，55。

145. 《镇压》：《检察官的命运》（莫斯科：法律文学出版社，1990），176。

146. 苏维尼罗夫，《悲剧》，165。

14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第 21841-36 号案卷（针对扎伊杰尔等），第 16 卷。

148. D. 沃尔科戈诺夫，《1930 年代：今日视角》（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94。

149. F. 丘耶夫，《与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莫斯科：泰拉出版社，1991），415。

150. “作家与统计学家眼中的古拉格群岛”，《论据与事实》45（1989）：5。

151. V. 伊万诺夫，《教团使命》，167。

152. 《社会与权力》，191。

153. 《社会与权力》，201。

154. 《悲剧命运》，60。

155. 《致权力的信》，382。

156. 盖蒂 与 瑙莫夫，《通往恐怖之路》，486。

157. V. 邓纳姆，《斯大林时代：苏联小说中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25。

158. 党将政治与爱情、婚姻和“妇女问题”联系起来。1935 年 1 月 17 日，一位名叫波塔波娃的人揭发红色教授学院学生德罗兹多夫虐待妇女：“一天读报纸时，他转向他的[犹太]妻子说：‘看看希特勒，这个狗娘养的，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人的！[vot Gitler, sukin syn, kak vashego brata kroit]’。被告为自己辩护道：‘是的，我确实时不时打我妻子，在那样的时刻忘记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依据说我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显然是女性逻辑的案例！’德罗兹多夫担心他的政治觉悟可能会受到质疑；相比之下，厌女症只是小事一桩。他受到了训斥。

特罗菲莫夫的相关案件——他是同一所学院的三十七岁讲师——展示了在 1930 年代，爱情罪行与政治罪行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尽管诉讼主要涉及性和爱的问题，但被告试图表明，他的指控者一定与敌人有联系。莫斯科市委会以如下措辞叙述了女性投诉：‘阿佩利安斯卡娅同志通知了她工作单位（一家汽车厂）的共青团支部，特罗菲莫夫——她在莫斯科公路运输学院的老师——邀请她到他的公寓，给她喝酒，并占有了她，承诺娶她。早上他改变了主意，以她不是‘处女’为由为自己辩护。当他发现阿佩利安斯卡娅怀孕时，特罗菲莫夫决定摆脱她。他使用学院党委的信笺，两次用左手给她寄送证明，告知她‘特罗菲莫夫已离开该市’。此外，有一次，当阿佩利安斯卡娅晕倒时，他从她的钱包中拿走了他的信件，希望能消除所有将他与她联系起来的书面证据。’在 1937 年春天，特罗菲莫夫不得不在列宁格勒红色教授学院的党会议上回应这些指控：‘说我占有了公民阿佩利安斯卡娅是谎言，’他说。’她试图把我拖到婚姻登记处去……不要相信她告诉你的任何事情。如果她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我就会被逮捕！’特罗菲莫夫指控说，阿佩利安斯卡娅胆敢揭发一位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这使她类似于‘人民的恐怖分子敌人’。在他的一份书面陈述中，他将她的罪行与‘人民敌人季诺维也夫的罪行’相提并论。

但特罗菲莫夫作为党员的赌注适得其反。“你和她睡过没有？”叶菲莫夫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不知道她是共青团员，”被告回应道，暗示他不知道她应该被视为同志。“阿佩利安斯卡娅烫了卷发，涂了口红”——她看起来更像一个“不可靠的庸人”，而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公民。同事们大多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指出特罗菲莫夫“的政治教育变得庸俗。他身上连一丝党性都没有。”学生舒米廖夫说：“特罗菲莫夫对当代女性的看法是庸人的：他打发她走，然后召唤她来满足他的兽欲，然后又把她扔出去，如此反复。”“阿佩利安斯卡娅在特罗菲莫夫身上看到了一位年长的同志，一个共产党人，”埃姆丁指出。“但他试图把这个共青团女孩推入敌人的阵营。”林奇克总结道：“无视斯大林宪法将女性视为平等公民的事实，特罗菲莫夫的行为像腐烂的渣滓，而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只有祖巴廖夫比较宽容：“日常生活行为问题复杂而令人困惑特罗菲莫夫出身工人，没有党纪处分——我认为我们应该带着这个考虑来处理这个问题。”但这是少数意见。特罗菲莫夫被清洗，并被送到生产岗位去“疗养”。TsGA IPD, f. 566, op. 1, d. 255, l. 37, d. 277, ll. 43, 46, and d. 280, l. 61.

159. S. 沃尔夫松，《*家庭与婚姻的历史发展*》（莫斯科，1937 年），第 220 页。
160. 该信日期为 1929 年 2 月 1 日。Kvashonkin 等人，《*苏联领导层：通信*》，63.
161. RGASPI, f. 613, op. 3, d. 161, l. 30.
162. A. 扎尔金德，“从阶级观点看性行为规范”，《*苏维埃社会条件下的性问题*》（列宁格勒，1926 年），第 45–46 页，第 56 页。
163. V. 马克谢耶娃 编，《*纳雷姆编年史，1930–1945*》（莫斯科：俄罗斯之路出版社，1997 年），第 88 页。
164. 《*联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71.
165. RNB, 案件编号 21841–1936 对 Zaidel 等人，第一卷，l. 267.
166. N. 克雷连科，“社会主义与家庭”，《*布尔什维克*》18 (1936): 73.

167. B. 科洛尼茨基, “‘革命姓名’: 1920 和 1930 年代的俄罗斯人名与政治意识”, 《革命俄罗斯》6 (1993): 225 - 26.
168. Suvenirov, 《悲剧》, 86.
169. R. 康奎斯特, 《大恐怖: 斯大林在 1930 年代的清洗》(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1968 年), 第 279 页。
170. 《真理报》, 1932 年 7 月 9 日。
171. 《共青团真理报》, 1936 年 6 月 6 日。
172. A. 马卡连科, 《家长之书》(莫斯科, 1937 年), 第 26 - 27 页, 第 35 页。
173. C. 凯利, 《同志帕夫利克: 一个苏联男孩英雄的兴衰》(伦敦: 英国格兰塔出版社, 2007 年)。
174. RGASPI, f. 17, op. 3, d. 979, l. 8; Suvenirov, 《悲剧》, 101.
175. I. 德鲁日科夫, 《告密者 001》(莫斯科, 1995 年), 第 149 页。
176. 《致权力的信》, 295.
177. TsGA IPD, f. 566, op. 1, d. 288, ll. 69 - 70, and d. 331, ll. 23 - 24.
178. TsGA IPD, f. 197, op. 1, d. 725, ll. 270 - 71. 如果党发现这些关系是情感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 就会忽略与可疑分子的亲属关系。1924 年 5 月, 当一名叫图马舍娃的学生被指控接受资产阶级家庭的经济支持时, 她承认: “我仍与母亲保持联系, “但她坚称所讨论的母女关系不是意识形态的: “纯粹是有机的——我可以说是心理上的。”当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原姓罗森菲尔德)在十二年后被审问与兄弟 N. 罗森菲尔德的关系时, 他解释说他的兄弟在情感上依恋他, 但在意识形态上不是, 因此不应被指控思想错误: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政治观点的人。我从他那里只看到对我的个人同情, 我将其解释为庸人的亲属感情, 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观点。”PATO, f. 17, op. 1, d. 370, l. 54; Iakovlev 等人, 《卢比扬卡》, 649.
179. TsGA IPD, f. 566, op. 1, d. 288, ll. 69 - 70, and d. 331, ll. 23 - 24. 例子不胜枚举。1936 年 1 月, 红教授学院的学生盖尔曼被抓住“在关于父亲职业的问题上误导党。”盖尔曼是第一个承认的: “我知道——从巴勒斯坦回来, 我就必须了解我的家庭在做什么。”“我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 “他现在意识到, “是揭露我父亲在 1919 年大屠杀后保留了他的生意, 并将此信息上报。”克里夫科来自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他的父亲在 1937 年底被捕。在一封情绪化的信中, 克里夫科向当局保证: “如果我注意到父亲有敌对态度,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虽然我没有被告知父亲被指控什么, 我……知道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 定罪已经通过, 所以他一定罪有应得。我的亲属感情被苏联公民对祖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更大责任感所征服。”TsGA IPD, f. 197, op. 1, d. 992; 《致权力的信》, 394.
180. 《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 32 期(1935 年 6 月): 第 473 - 77 页, 第 252 条。
181.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l. 209 - 11, and d. 1000, l. 53. 得知儿子被捕后, 老雅戈达写信给斯大林: “我们生活中许多在革命期间的幸福年月, 现在被我们唯一在世的儿子 G. G. 雅戈达对党和国家所犯的严重罪行蒙上了阴影。他不但没有证明对他的信任是正确的, 反而成为了人民的敌人, 因此他必须承担应得的惩罚。我现在 78 岁了。我半失明, 无法工作。我一直试图以忠于党和革命的精神抚养我的孩子。

什么话语能传达我和我 73 岁的妻子所遭受打击的全部重量，这与我们的最后一个儿子所犯的罪行有关？……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在他个人生活的过去十年里，他一直远离父母，我们不能对他有任何同情，也不能承担责任，尤其是因为我们与他的行为毫无关系。我们这些老人请求你确保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幸福的苏维埃国家度过我们所剩无几的生命，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道德和物质境地，没有生存手段（我们没有养老金）。我们请求你保护我们这些生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和地区委员会的各种压迫。” D. 雷菲尔德，《*斯大林与他的刽子手：暴君及其杀手*》（纽约：兰登书屋，2005 年），第 288 - 89 页。

182.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 1.
183. Иу. 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圣彼得堡：Znak-SP 出版社，1997 年），第 437 页。
184. 《*古拉格中的抵抗：回忆录。信件。文件*》（莫斯科：归来出版社，1992 年），第 150 - 54 页。
185. 《*卡累利阿的古拉格，1930 - 1941：文件和资料集*》（彼得罗扎沃茨克：俄罗斯科学院卡累利阿科学中心，1992 年），第 72 页。
186. 《*布托夫斯基靶场*》，第 8 期，第 346 页。
187. 《*布托夫斯基靶场*》，第 8 期，第 335 页。
188. V. 韦尔曼，“谎言如何得胜”，载于 L. 古尔维奇，《*拥有记忆的力量：那些经历过镇压地狱的人的故事*》（莫斯科：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91 年）第 145 页。
189. 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2: 215.
190. V. 伊万诺夫，《*勋章的使命*》，165.
191. 《*消息报*》，1991 年 7 月 4 日。
192. A. 雅科夫列夫等人，《*古拉格的孩子，1918 - 1956*》（莫斯科：ROSSPEN 出版社，2002 年），第 227 页。
193. 雅科夫列夫等人，《*古拉格的孩子*》，276 - 77.
194. P. 索洛明，《*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莫斯科，1938 年）。
195.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3, l. 226.
196.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 207, and d. 1132, ll. 31, 34.
197. D. 波利亚科娃，“只要心灵为荣誉而活……”，载于 A. 阿法纳西耶夫 编，《*他们没有沉默*》（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 年），第 369 页。
198. B. 布里汉诺夫和 E. 肖什科夫，《*不予原谅：叶若夫与叶若夫时期 1936 - 1938*》（圣彼得堡，1998 年），第 175 页。
199. L. 卡加诺夫斯基，“斯大林主义电影中的视觉快感：伊万·佩里耶夫的《*党证*》，”载于 C. 基亚尔和 E. 奈曼 编，《*早期苏维埃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6 页。
200. 《*各各他*》，*皮亚特尼茨卡娅*，1938 年 5 月 27 日。
201. TsGA IPD, f. 1816, op. 2, d. 5091, ll. 23 - 24.
202. TsGA IPD, f. 566, op. 1, d. 255, l. 53, and f. 1816, op. 2, d. 4408, ll. 8 - 19, d. 509, l. 55.
203. 《*平反：1930-50 年代的政治审判*》（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 年），第 151 - 52 页。
204. 《*社会与权力*》，186.
205. TsGA IPD, f. 197, op. 1, d. 982, l. 62.
206. TsGA IPD, f. 566, op. 1, d. 320, l. 14.
207. 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437. 另一方面，那些未能报告其离婚配偶反革命活动的人会立即被拘留。只有怀孕、生病、年老或负担着年幼子女的女性才被豁免，即使她们也必须保证不离开当前居住地。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8 年 10 月 17 日的 000689 号命令放宽了这些规定，并指出

逮捕不应自动进行：“只有实际知道反革命活动或协助此类活动的妻子才必须被逮捕。”见 《关于镇压和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立法和规范性法案汇编》（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3年），第88页；雅科夫列夫等人，《古拉格的孩子》，234-35, 307.

208. 斯捷佐夫斯基，《苏联镇压史》，421. 在大清洗期间，列宁格勒的结婚/离婚比例为10比4。
V. 伊万诺夫，《勋章的使命》，第376页，注释120。

209. 显然，在大清洗的世界中，很难区分政治与私人关系。以列宁格勒图书馆员、当地工会学校讲师约瑟夫·雅科列维奇·扎克的案件为例。内务人民委员部暗示扎克与科学院的雅科夫列夫关系密切——此人被认为是恐怖地下组织头目之一——扎克于1936年4月3日被捕。扎克和雅科夫列夫在革命前曾同在文科中学学习，“自幼为友”。根据审讯笔录，两人“在1930年代每年会面两到三次”，扎克承认他早在1925年就知道雅科夫列夫支持季诺维也夫。“关于雅科夫列夫近期的阴谋活动，”扎克坚称自己一无所知。

毫无疑问，这两位犹太裔老练革命者关系密切。但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亲密关系？他们是朋友、同志，还是可能是同谋？使扎克与雅科夫列夫关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如何被被告妻子们编织的叙述所过度决定。

扎克对雅科夫列夫的私生活了如指掌。在回答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者的直接问题时，他承认认识雅科夫列夫的现任妻子孔德拉季耶娃，以及我们在赖赫曼审判中遇到的神秘举报人“K——娃”。但他似乎与雅科夫列夫的第一任妻子萨夫琴科关系更为亲密。他们的关系可追溯到艰难的1920年，“当时我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这不是互利关系，因为萨夫琴科作为前反对派成员，早在1935年初就被驱逐出列宁格勒。不过扎克坚称，她内心仍是个共产党员，“将被派往西伯利亚视为党对她的考验”。当母亲的命运再次恶化时，扎克承担起雅科夫列夫与萨夫琴科所生十五岁女儿的监护责任：“1936年1月，安东尼娜来找我，说她母亲被开除党籍并被捕。我开始在经济上资助她，给她买鞋，给她早餐钱，定期为她准备午餐，监督她的学习。”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再次回忆这些事件时，扎克的语气更为温暖：“安东尼娜可以说是接生在我手中的。我无法拒绝为一个我视如己出的孩子提供庇护。”

由于我们只能猜测的原因，扎克与雅科夫列夫第二任妻子的关系恶化了。也许孔德拉季耶娃想与被捕丈夫的朋友们划清界限。或者，我们可以用嫉妒本来理解。在这个场景中，扎克表现为忠于朋友的过去而非现在的人。尽管如此，孔德拉季耶娃在1936年3月30日作证称：“扎克与被流放到阿尔钦斯克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萨夫琴科关系密切。”孔德拉季耶娃将萨夫琴科迁往西伯利亚描述为“流放”（*ssylka*），而非“派遣”（*komandirovka*），从而强调其搬迁的惩罚性质。此外，这位备受尊敬的列宁格勒机械制造学校讲师被孔德拉季耶娃诋毁为“神父女儿，强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雅科夫列夫被捕时，“她评论道：‘这带有尼古拉一世宪兵的味道。’”孔德拉季耶娃也没有放过扎克：据她的证词，他据称非常清楚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并鉴于党对他的信任，被后者用于恐怖主义活动。

4月13日，扎克的妻子柳博穆德罗娃被传唤作证指控自己的丈夫，

她声称“不知道扎克受雅科夫列夫指派执行的任务”。当被告知，根据孔德拉季耶娃的说法，“你丈夫至今仍与活跃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萨夫琴科有联系”时，她请求表示异议：“扎克给萨夫琴科的最后一封信肯定是在她被捕前写的，不晚于 1936 年 1-2 月。”柳博穆德罗娃也不接受她和扎克正在抚养季诺维也夫后代的说法：“安东尼娜与她姑姑同住，虽然她确实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并]溜过来[在我们家]做作业。”总体而言，柳博穆德罗娃支持丈夫的叙述：扎克与被捕者个人关系密切，但他对任何政治不当行为一无所知。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提出雅科夫列夫在 1928 或 1929 年某个时候交给扎克的两个笔记本的问题时，扎克与雅科夫列夫的关系变得格外尖锐。这些笔记本应被描述为私人材料还是公共材料？虽然被告谈论“日记”，但他的恶意诋毁者更喜欢使用更具威胁性的“文件”一词。在 1936 年 4 月 29 日的审讯中，扎克坚持家庭浪漫的语言。他作证说，雅科夫列夫在与萨夫琴科离婚过程中把他的“日记”交给了他：“雅科夫列夫自文科中学时代起就保存着这些日记；其中包含描述他与女性关系的私人笔记。”据扎克说，他最终应作者要求归还了这些日记：“雅科夫列夫告诉我他会销毁它们，因为里面有令人不快内容。”

当此事在 1936 年 6 月 23 日的审讯中被提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为其增添了政治色彩。审讯者在措辞问题时始终使用官方语言；然而，在记录扎克的证词时，他显然至少保留了一些囚犯的语言。难怪笔录读起来像聋子之间的对话：

问：雅科夫列夫是否将瓦西里耶夫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文件——以日记形式存在的文件——永久交给你了？

答：是的，1928 或 1929 年某个时候，雅科夫列夫带了两个笔记本到我的公寓，在没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交给了我；他强调要求我保管这些笔记本，解释说他们不想让它们落入前妻萨夫琴科之手，当时他与她关系紧张……我把雅科夫列夫的材料放在抽屉里，一直保存到 1932 年底或 1933 年初。

问：雅科夫列夫是否告知了你这些笔记本的内容？

答：他给我时说这些是个人笔记本，私人性质的笔记，以及他自学生时代起收集的各种书籍摘录……

问：你如何解释雅科夫列夫冒着自己暴露和整个反革命组织暴露的风险——其活动在其中有所描述——将文件（日记）托付给你的事实？

答：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完全互信的基础上。雅科夫列夫确信我不会……阅读他的文件——日记。

扎克坚称孔德拉季耶娃关于他“在雅科夫列夫被捕后销毁了他交来的材料”因为他感觉脚下的土地在燃烧的证词绝对是虚假的。她为什么要这么说？扎克声称最初与孔德拉季耶娃“关系正常”。当她在 1935 年春天出院并得知丈夫被捕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那时“她说她揭露了我与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联系”。

在案件的政治重建中，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头号阴谋家，与

他认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保持联系，并保管季诺维也夫地下组织的档案。当反对派在 1928 年被定为犯罪时，雅科夫列夫将笔记本交给了他的同谋扎克，认为后者不会受到怀疑。在将案件重建为个人戏剧时，交易确实发生在 1928 年，但这个日期与雅科夫列夫的离婚有关，与党内政治无关。在这种重建中，笔记本涉及雅科夫列夫的爱情生活，而非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在争夺雅科夫列夫人格的争论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强调政治以定罪。扎克则倾向于将事情保持在个人层面，以洗清他朋友和他自己的名誉。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针对扎克的案件号 P-224041，第 11-13、16、24-26、36-38 页。

210. 涅克拉索娃因未及时举报胡托罗克的托洛茨基主义言论被大学开除。“这是双重处罚[*dvoinaia mera*]，”她申诉道。“我从未属于反对派。那兹洛宾斯卡娅呢？！她的丈夫是反对派成员，却允许她继续学业。”但她的同龄人并不认同这种辩护思路。“当讨论你的案件时，你总是扯出其他名字，”维尔希克厉声说道。“共产党员不应该这样做！将兹洛宾斯卡娅或任何其他人的问题，与你的案件分开提出。”“确实，”博恰罗夫同意道，“为什么你在我们清洗比留科夫或布鲁克时没有提到困扰你的事情？你的罪行是政治性的——你知道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年半却保持沉默！——你的判决有宣传价值[*pokazatel' noe znachenie*]。”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566，目录 1，卷宗 255，第 58 页。

211. 皮达可夫在 1928 年正式脱离反对派后，被安排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那里他起草了苏维埃工业发展计划。有趣的是，他与季季亚季耶娃的婚姻，与米亚辛夫妇的婚姻类似，在反革命指控被针对这对夫妇时破裂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1936 年 7 月 27-28 日夜以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季季亚季耶娃。在狱中，她作证说她的丈夫皮达可夫是乌克兰托洛茨基中心的负责人。皮达可夫被召到叶若夫的办公室，了解了针对他的材料，除了对一项指控外，他声称无罪：“我忽视了前妻的反革命活动……并对她的熟人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1936 年 8 月 7 日，被告写信给他的上司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我灵魂的每一根纤维都在愤怒：我感到尴尬和痛苦，如此卑鄙的活动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我读到的关于季季亚季耶娃的内容绝对令人无法忍受。她所做之事在第三或第四层意义上是对我个人的背叛。”作为一个革命者而非庸人，皮达可夫对于妻子原来是托洛茨基分子比她告发他更为不安——他并不指望敌人会更好：“就个人而言，我很痛苦。但我向你保证，这种卑鄙行为只会加深我对这些人的仇恨，并激励我为斯大林和党工作。”皮达可夫表示希望亲手动决前妻。当叶若夫驳回这个想法时，皮达可夫恳求他将这个建议转达给中央委员会并在媒体上发表。

如果她的政治声誉无瑕，妻子可以成为政治联络人。请注意在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失势的苏联工会领导人——的案件中，政治与个人亲密关系的非常奇特的混合。就在 1938 年 8 月 22 日自杀前不久，托姆斯基写信给斯大林，说他不会提供将他推向反对派方向的人的名字：“如果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身份，直接问我的妻子，她会说出他们的名字。”索科洛夫，《*恐惧人民委员*》，57；《*苏共中央通报*》，第 5 期（1989 年）：第 71 页；L. 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第二版（纽约：兰登书屋，1959 年），第 381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85，目录 1/c，卷宗 136，第 48 页；克瓦什奥宁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336。

212.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566，目录 1，卷宗 255，第 63-68 页，及全宗 1816，目录 2，卷宗 5091，第 35 页。
213. R. 瑟斯顿，“大恐怖时期的苏联家庭，1935-1941 年”，《苏联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1991 年）：第 565 页。
214. 雅科夫列夫等，《古拉格的孩子》，307。
215.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1816，目录 2，卷宗 5091，第 55 页。
216. 《致权力之信》，418。
217.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566，目录 1，卷宗 331，第 2 页。
218.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566，目录 1，卷宗 310，第 23-25 页。
219.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197，目录 1，卷宗 993，第 107 页。
220.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197，目录 1，卷宗 1000，第 18 页。
221. 中央国家档案馆党务档案，全宗 197，目录 1，卷宗 1132，第 6 页。
222.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TsGA IPD），全宗 197，目录 1，卷宗 1103，页张 92、105-6。
223.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TsGA IPD），全宗 566，目录 1，卷宗 280，页张 13；卷宗 311，页张 15-17。
224. 在给被监禁的丈夫伊万·阿尔图索夫（契卡老战士，1937 年被捕）的信中，因娜·米哈伊洛夫娜将丈夫捧上了天。尽管信件语言温柔且充满爱称，亲密情感却以政治话语表达：“我亲爱的、心爱的阿图尔卡！今天是我们遭遇不幸（阿尔图索夫被捕）的第十天，黑暗的夜晚笼罩着我——我看不到阳光，也看不到任何绿色，只有下雨时才感觉稍微好些。亲爱的，我所有的心念都与你同在！我只有一个希望：愿你安好，愿你像男子汉一样承受一切。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查清谁是谁。我手持叶若夫的照片，凝视他清澈纯净的眼睛，陷入无尽的困惑。他怎能相信你做了错事？他本应保护像你这样理想的人，共产党员中最优秀者，一个有着水晶般灵魂的纯洁之人，一生从未说过半句假话。我常常对着他的照片说话，拿在手中说：‘你做了什么？你为何要这样对待最优秀者中的最优秀者？你能否及时查明真相，惩罚那些真正应受惩罚的人？’”5 月 23 日，她再次写道：“阿图里克！今天我经过内部监狱的建筑。瞥见你所在的屋顶，我感到如此难受，被恐惧吞噬，几乎要晕倒。我想大喊我就在这里，我温柔地爱着你，我担心你脆弱的心脏，担心你的健康！他们给你牛奶吗？我知道你没有肥皂，没有牙刷。这一切如此折磨我，我不得不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照片重新挂到墙上。”又一夜过去，因娜·米哈伊洛夫娜第三次提笔：“早上好，亲爱的。我马上去库兹涅茨基桥（监狱所在地）。看看他们是否为你收钱会很有趣。回忆你善良的双眼，我对你涌起巨大的、玫瑰色的柔情——你是如此甜蜜。你知道，我今天平静下来了，决定完全依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无法忘记你对他的好评，你对这位忠诚同志的特别关心。只要他亲自过问——他会明白你是被卑鄙之人牵连，我对此毫不怀疑。”显然，因娜·米哈伊洛夫娜知道她的信件会被审阅。事实上，她很可能希望被审阅，而且是被叶若夫本人审阅。那么我们是否应认为这些信件不真实？还是说它们捕捉了一种个人柔情、政治联结以及“爱情无法在党的道德权威指导之外绽放”这一信念的独特混合？参见 B. 索佩尔尼亚克，《分期死亡》（莫斯科：盖亚出版社，1998 年），第 52-53 页。
225. R. 塔克，《掌权的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纽约：诺顿出版社，1992 年），第 535-36 页、545 页。

226. “压抑假说”与“生产假说”术语源自 M. 福柯, 《性经验史》(纽约: Vintage 出版社, 1978 年), 第一卷第 10 页。
227.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苏维埃大学生》, 1936 年第 7 期, 第 11 页。
228. 讨论反对主义时, 通常忽略那些在事件发生时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同志的回忆: 无意识者的头脑无法记录真相。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566, 目录 1, 卷宗 323, 页张 1。
229.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1037, 页张 65。
230.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983, 页张 156。
231.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982, 页张 9, 及全宗 24, 目录 2b, 卷宗 1256, 页张 90 - 91。
232. I. 哈尔芬, 《亲密的敌人: 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妖魔化, 1918 - 1928》(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190 - 97 页。
233.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983, 页张 273。
234.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994, 页张 114, 及卷宗 1007, 页张 91 - 99。
235.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1134, 页张 57。
236.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566, 目录 1, 卷宗 255, 页张 9。1935 年 12 月 11 日, 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了“党的档案系统化委员会”。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566, 卷宗 255, 页张 9。
237. V. 伊万诺夫, 《修会使命》, 72。
238.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816, 目录 2, 卷宗 5095, 页张 16 - 25。
239.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816, 目录 2, 卷宗 5094, 页张 122, 及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1448, 页张 82。
240.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722, 页张 22 - 31。
241.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722, 页张 56。
242.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卷宗 1141, 页张 4 - 6、16 - 17。
243.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24, 目录 2b, 卷宗 1428, 页张 222。
244.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24, 目录 2b, 卷宗 937, 页张 17。
245. 中央国家文学与艺术档案馆 (TsGA IPD), 全宗 566, 目录 1, 卷宗 280, 页张 13 - 17。
246. TsGA IPD, f. 566, op. 1, d. 276, l. 128.
247.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07, l. 20, and d. 1026, ll. 4 - 5.
248.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 109.
249.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09, l. 7.
250. TsGA IPD, f. 1816, op. 2, d. 5094, l. 86.
251. TsGA IPD, f. 408, op. 1, d. 52, ll. 1 - 2.
252. TsGA IPD, f. 1816, op. 1, d. 4992, l. 4.
253.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1, l. 41.
254.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3, ll. 35 - 37. 在卡梅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于 1936 年被定罪后, 如潮水般的信件淹没了共产主义大学的办公厅, 要求查询某位同志的详细情况。人民农业委员要求道: “查一下我们的雇员利布科夫斯基的档案。他在自传中关于 1922 至 1926 年间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记述存在矛盾。我们需要了解利布科夫斯基对反对派的态度。”另一份查询来自党的机关: “扬丘诺夫斯基承认, 他在中亚工作时‘偶然’遇见了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维特科夫斯基, 他们曾在共产主义大学一同学习。我们需要知道在 1926 至 1929 年间的学生时代, 扬丘诺夫斯基是否属于任何反对派团体。请尽快回复; 扬丘诺夫斯基在此担任政治指导员, 身居要职。”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3, l. 96, and d. 1131, l. 30.
255. TsGA IPD, f. 408, op. 1, d. 1175, l. 58.

256.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41, ll. 13, 18.
257.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41, l. 3.
258.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41, l. 8.
259.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2, ll. 90 – 91, 113 – 25.
260. TsGA IPD, f. 408, op. 1, d. 1175, l. 57, 113 – 25, and d. 174, l. 46.
261.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48, ll. 48 – 49.
262.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48, l. 45.
263. TsGA IPD, f. 197, op. 1, d. 994, ll. 59 – 61.
264. TsGA IPD, f. 408, op. 1, d. 174, l. 118, and d. 1175, ll. 15 – 28.
265. TsGA IPD, f. 566, op. 1, d. 331, l. 29, and f. 197, op. 1, d. 1000, l. 5.
266.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09, l. 2.
267.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00, ll. 5, 8, 19, 32.
268. TsGA IPD, f. 197, op. 1, d. 1000, ll. 17, 26.
269.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4, l. 28.
270. TsGA IPD, f. 197, op. 1, d. 1134, l. 28.
271. TsGA IPD, f. 1816, op. 2., d. 4414, l. 2.

第五章

1. 大清洗的核心假设是，敌人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阵营外部，也潜伏于内部，并且他们伪装得异常出色。如果找不到敌人，那就意味着人们不知道如何找，或者根本不想找。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安德烈耶夫指出：“当党开始在各个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机构中揭露敌人时，科萨列夫同志却告诉我们共青团里没有敌人。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警告他，共青团里不可能没有两面派的敌人。那么最终发生了什么？”

共青团里的敌人是由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的，而不是科萨列夫。”克里缅特·伏罗希洛夫同样天真，他在1936年认为他的红军相对纯洁。1937年春，图哈切夫斯基和几乎整个总参谋部被捕后，他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我早该知道，这些无赖、这些小老爷、这些渣滓，必然也存在于红军的行列中，”他承认道。重要的是，不要急于将安德烈耶夫和伏罗希洛夫的这些言论解读为处心积虑的谨慎。大清洗的语言将清洗过程中的过度热心描述为“自我保险”(*podstrakhovka*)——一旦暴露，这种行为受到的惩罚不亚于意识薄弱的过失。参见 A. Proskurin, ed., *Vozvrashchennye imena: Sbornik publitsisticheskikh statei v dvukh knigakh* (Moscow: Agentstvo pechati Novosti, 1989), 1: 283 (Alekseev); N. Cherushev, *1937 god: elita Krasnoi Armii na Golgofe* (Moscow: Veche, 2003), 147 (Voroshilov).

2. *Sovetskoe studenchestvo*, no. 3 (1937): 1 – 3.
3. O·赫列夫纽克，“大恐怖的目标，1937 – 38”，载于 J·库珀、M·佩里、E·里斯编，《苏联历史，1917 – 1953: 纪念 R·W·戴维斯文集》（伦敦：圣马丁出版社，1995 年），第 159 – 60 页。
4. 《1937 年 2-3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资料》，《历史问题》，第 11 – 12 期（1995 年）：第 15 页。
5. K·博特尔布卢姆，《安德烈·日丹诺夫生平与时代，1896 – 1948》（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3 – 54 页。
6.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30 – 50 页。另见《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 年 2 月 17 日。
7. 《斯大林人》，1937 年 3 月 18 日、4 月 25 日；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408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1 卷，第 16 – 20 页。

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49 页。
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30 - 31 页。
10. 《斯大林人》，1937 年 4 月 3 日。
11.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6 卷，第 213 页。
12. 《斯大林人》，1937 年 4 月 25 日。
13.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3 卷，第 37 页。
14.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25 - 27 页；
《斯大林人》，1937 年 4 月 25 日。
15.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 年 4 月 12 日。
16.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3 卷，第 32 页。
17. 《斯大林人》，1937 年 4 月 3 日。
1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3 卷，第 59 页。
1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6 卷，第 24 页。
20.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41 页。1937 年
对学生进行指责的压力相当大。红色教授学院的历史系学生霍赫洛夫在 1937 年 12 月因“在担任克鲁普斯卡娅学
院学术项目主任期间未能充分研究其下属干部”而受到审查。由于他的疏忽，他给出的积极个人鉴定不得不被改
为消极鉴定。”1938 年，趋势发生逆转，早先给出的消极个人鉴定的评分被描述为“夸大”。中央国家十月革
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88 卷，第 72 页，以及第 324 卷，第 45 页。
21. 《斯大林人》，1937 年 3 月 18 日。
22.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3 卷，第 45 页。
23.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694 卷，第 25 - 27 页。
24.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3 卷，第 155 页。
25. 几个月内，关于雷姆尚的证据将被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的桌子上；她的刑期不详。
26. 《斯大林人》，1937 年 4 月 13 日；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103 卷，第 68 - 80 页。
27.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6 年 7 月 29 日、9 月 30 日、10 月 2 日、12 日、24 日；中央国家十月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4 卷，第 92 页。
2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3 卷，第 233 - 34 页，第
983 卷，第 147 页，以及第 1026 卷，第 9 页。
29. 《斯大林人》，1936 年 10 月 25 日。
30.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026 卷，第 19 页。
31. 《真理报》，1937 年 3 月 20 日；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1737 卷，第 1 页。
32. 《斯大林人》，1937 年 3 月 18 日。
33.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566 全宗，第 1 目录，第 277 卷，第 94 - 98 页。
34.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 年 5 月 27 日。
35.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 197 全宗，第 1 目录，第 986 卷，第 137 页。
36.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 年 4 月 5 日；I·加利古佐夫、A·格里戈里安，“认真对待学生的声
明”，《苏维埃大学生》，第 4 期（1937 年）：第 26 页。
37. 伊万诺夫，《修会使命》，131。
38. 伊万诺夫，《修会使命》，第 191 页；V·巴卡京，《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社，
1992 年），第 30 页。
39. 《绝密》，第 4 期（1992 年）：第 6 - 7 页。但请注意以下顺口溜：“叶若夫、贝利亚、雅戈达—
—/斯大林用一个替换另一个/但契卡充满了野兽/现在依然如此”[叶若夫、贝利亚、雅戈达——/被斯大
林替换，/而契卡野兽横行，/依旧如此]。F·科恩，“苏联政治顺口溜镜像中的恐惧”，载于《苏联体
系的政治人类学》（莫斯科：俄罗斯文化语言出版社，2003 年），第 203 页。
40. 伊万诺夫，《修会使命》，136。
41. 伊万诺夫，《修会使命》，第 202、204、239 页；博戈莫洛夫、拉祖莫夫，《列宁格勒

殉难录》，第3卷：第588页。关于数据概览，见M·伊里奇，“列宁格勒的大恐怖：定量分析”，《欧亚研究》第52卷，第8期（2000年）：第1515-34页。

42. A·瓦特林，《地区级恐怖》（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43. 博戈莫洛夫、拉祖莫夫，《列宁格勒殉难录》，1：44。
44. 赫列夫纽克，“大恐怖的目标”，第162-67页。
45. C·胡珀，“亲密关系的恐怖：1930年代苏联的家庭政治”，载于C·基尔、E·奈曼编，《早期苏维埃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46. P·科内奇尼，《建设者与逃兵：列宁格勒的学生、国家与社区，1917-1941》（蒙特利尔：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47. 《列宁格勒真理报》，1937年3月16日。
48. 《党的建设》，第2期（1937年）。
4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209卷，第162页。
50. 《致政权的信件：1928-1939》（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5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188全宗，第1045卷，第2页；A·克瓦什奥宁等，《苏联领导层：通信集。1928-1941年》（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63页。
52. 加涅林，《你们在对我做什么！》114。
53. 《致政权的信件》，437。
54. V·I·维尔纳茨基，“1938年日记”，《民族友谊》，第3期（1991年）：第222、233、264页。
55. 《斯大林人》，1937年3月5日，以及1937年2月期间出现的文章。
56. P·斯坦纳，《波希米亚的荒漠：捷克小说及其社会背景》（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57. 《斯大林人》，1936年10月8日。
5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131卷，第8页。
59.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132卷，第72页。
60.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1132卷，第73-74页。
61.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2卷，第228-30页。
62.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197全宗，第1目录，第983卷，第89页。
63. V·博布列涅夫、V·梁赞采夫，《刽子手与受害者》（莫斯科，1993年），第369页。
64.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第566全宗，第1目录，第310卷，第15页。
6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613全宗，第1目录，第3卷，第105页；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64全宗，第1目录，第74卷，第29背页，以及第78卷，第

18。

66. 瓦特林，《地区级恐怖》，121。
67. 《布托夫斯基靶场》（莫斯科，2004年），第8期，第199页。
68. 正如斯大林那句名言：“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材料是真实的，这也是面包。”《苏共中央通报》，第4期（1989年）：第54页。
69. 1935年在被捕边缘，洛米纳泽自杀身亡。不到两年后，奥尔忠尼启则也自杀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07卷，第267-69页，引自《共产党人》，第13期（1991年）：第56-57页；《30年代的斯大林政治局》（莫斯科：AIRO-XX，1995年），第155-56页。
70. 关于告密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见S·波波夫，“告密体系”，《克利俄》，第1期（1991年）；S·科罗廖夫，《俄罗斯的告密：社会哲学随笔》（莫斯科：进步-多媒体出版社，1996年）；V·科兹洛夫，“告密现象”，《自由思想》，第4期（1998年）：第100-112页。

71. О·赫列夫纽克, 《1937年: 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与苏联社会》(莫斯科: 共和国出版社, 1992年), 172.
7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第613全宗, 第1目录, 第3卷, 第138页。
73.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针对扎伊德尔等人的第21841-36号案, 第16卷, 第109页; G·贝科夫, “关于我所犯的错误”, 《斯大林人》, 1935年10月14日;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 第197全宗, 第1目录, 第1037卷, 第131页。

74.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 第 197 全宗, 第 1 目录, 第 983 卷, 第 226 页。
75.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 第 566 全宗, 第 1 目录, 第 323 卷, 第 8 页。
76. 赫列夫纽克, 《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 182.
77.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 第 566 全宗, 第 276 卷, 第 1 目录, 第 54、172、182 页。
78.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 普列德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18 页。
79. R·沙尔莱, “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法律文化”, 载于 R·塔克编, 《斯大林主义: 历史解释文集》(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77 年), 第 161-63 页。关于帕舒卡尼斯及其法律思想的背景, 见 A·哈姆斯, 《商品形式与法律形式: 论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的法律理论》(弗莱堡: Nomus 出版社, 2002 年); M·黑德, “一位苏联法学家的兴衰: 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与斯大林主义”, 《加拿大法律与法理学杂志》第 17 卷, 第 2 期(2004 年): 第 269-94 页。
80. I·斯大林,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草案的报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莫斯科, 1936 年), 第 62、65 页; 塔克, 《斯大林主义》, 542-43.
81. *Pravda*, Jan. 20, Apr. 9, 1937.
82. Tucker, *斯大林主义*, 542-43.
83. N. Smirnov, 《被镇压的司法》(莫斯科: Gelios ARV, 2001), 52 页。
84. Smirnov, 《被镇压的司法》, 54.
85. Smirnov, 《被镇压的司法》, 55, 56, 60.
86.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1 页。
87.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f. 566, op. 1, d. 278, 第 16 页, 和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87-88 页。
88.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87-88 页。
89. Rezunov 毕业于莫斯科法学院, 1930 年抵达列宁格勒。他在该市的主要职位是在苏联建设和法律研究所, 担任副所长 Undrevich 的副手。在 1931-35 年间, Rezunov 还在共产主义大学兼职授课; 那时他与 Prede 建立了密切联系。Bogomolov 和 Razumov, 《列宁格勒殉道录》, 3: 536-37.
90.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2-13 页。
91.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31 页。
92.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5-19 页。
93.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95 页。
94.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44 页。
95.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87-88 页。
96.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24 页。
97.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09-10 页。
98.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15-19 页。
99.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21-23, 82 页。
100.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90-91 页。
101.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Prede 的个人档案 440381, (1), 第 26 页。
102. 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f. 197, op. 1, d. 983, 第 271 页。
103. “双面人 Dridze 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主义者》, 1937 年 6 月 21 日;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103, 页 88。
104.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7 年 4 月 25 日;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103, 页 37。
105.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103, 页 92。
106.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134. 页 12。
107.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92。
108. TsGA IPD, 全宗 197, 目录 1, 案卷 1103, 页 92。
109. “两面派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主义者报》, 1937 年 7 月 5 日。
110.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犯协会

到 1935 年夏已被废除。1937 年，老布尔什维克遭到系统性追捕。“我该怎么办？”一位白俄罗斯权贵惊呼。“叶若夫又派了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的指标。我该从哪里找人？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部消灭了。”N. 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苏共历史问题》，第 11 期（1988 年）：66 页；《哲学问题》，第 12 期（1988 年）：93 页。

111.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8。
112.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140。
113. 普雷德在这里使用了一个熟悉的术语, *过度保险者*, 被定义为 《真理报》 为一个无情的反苏官僚,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福祉。M. 科利佐夫, 《论虚假揭露者与诽谤者》, ” 《真理报》, 1938 年 1 月 17 日。
114.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119 - 22。
115. 作为其诠释才能的证明, 普雷德附上了他揭露潘丘欣的文章副本: 《加强对机会主义的火力》。《高校学员报》, 1932 年 1 月 1 日。
116.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97。
117.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97。
118.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96。
119. TsGA IPD, 普雷德个人档案 440381, (1), 页 116 - 17。
120. RNB, 针对 R. Ya. 普雷德的案件编号 23262, 页 11。
121. RNB, 针对 R. Ya. 普雷德的案件编号 23262, 页 5。
122. RNB, 针对 R. Ya. 普雷德的案件编号 23262, 页 284。
123. RNB, 针对 R. Ya. 普雷德的案件编号 23262, 页 141 - 43。
124. RNB, 案件编号 23262, 针对普雷德, R. Ia., 第 11 - 12 行。
125. RNB, 案件编号 23262, 针对普雷德, R. Ia., 第 15 - 16 行。
126. RNB, 案件编号 23262, 针对普雷德, R. Ia., 第 164 - 65 行。普雷德的证词遵循了既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NKVD) 蓝图。关于类似的恐怖阴谋, 包括对日丹诺夫活动的仔细研究, 参见 RNB, 案件编号 P-52593, 针对多布罗尼茨基, 第 110 行。
127. RNB, 案件编号 23262, 针对普雷德, R. Ia., 第 148 - 53 行。
128. RNB, 案件编号 23262, 针对普雷德, R. Ia., 第 154 - 58 行。
129. 关于拉济维洛夫斯基 1939 年 4 月 16 日受审时的证词, 参见 O. 苏维尼罗夫, 《1937 - 1938 年红军的悲剧》 (莫斯科: Terra 出版社, 1998 年), 第 208 页。
130.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3262 号案卷, 针对普列杰, R. Ya., 第 285 页。
131. R. 梅德韦杰夫, 《论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 (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 1990 年), 第 432 - 433 页; 《历史档案》, 1993 年第 3 期: 第 88 - 89 页; B. 斯塔尔科夫, “未举行的审判”, 《欧亚研究》第 46 卷 (1994 年): 第 1304 页; L. 拉兹贡, 《在公开案件面前》 (莫斯科: Knizhnyi sad 出版社, 1991 年), 第 17 - 18 页; 《军事历史杂志》, 1990 年第 1 期: 第 83 页; 《苏共中央通报》, 1989 年第 4 期: 第 50 页。
132. M. B. 施赖德尔, 《内部看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名契卡人员的笔记》 (莫斯科: 回归出版社, 1995 年), 第 37 页; 《平反: 30 至 50 年代政治审判》 (莫斯科: 政治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第 40 - 41 页; 《苏共中央通报》, 1990 年第 10 期: 第 85 页; Yu. 斯捷佐夫斯基, 《苏联镇压史》 (圣彼得堡: Znak-SP 出版社, 1997 年), 第 1 卷: 第 159 页。
133. 《真理报》, 1989 年 9 月 1 日。
134. B. 斯塔尔科夫, “未举行的审判”, 第 1304 页。
135. 瓦特林, 《区级规模的恐怖》, 41 - 42。
136. 瓦特林, 《区级规模的恐怖》, 第 113 页, 注 159。
137.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3262 号案卷, 针对普列杰, R. Ya., 第 288 页。
138.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 23262 号案卷, 针对普列杰, R. Ya., 第 23 - 26 页。
139. V. 莫洛托夫, 《日德托派代理人破坏、颠覆和间谍活动的教训》 (莫斯科, 1938 年), 第 22 页。

140. 瓦特林, 《*区级规模的恐怖*》, 60.
141. 根据叶若夫及其同伙的说法, 持枪的恐怖分子无处不在。来自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斯特尔在1950年代受审时讽刺地指出: “如果我们考察计划实施恐怖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就会出现一幅多么疯狂的画面: 据说在五一节和十一月七日庆典期间, 红场上挤满了数十名, 甚至数百名‘恐怖分子’。他们计划在列宁墓前游行时, 向站在墓顶向人民致意的[党政领导人]开枪。然后还有各种类型的恐怖分子, 他们监视着莫扎伊斯克公路, 等待机会向载有高级官员的汽车开枪——据说他们也在最后一刻被阻止了。” *布托夫射击场*, 第3辑, 第345-46页。
142.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第23262号案卷, 针对普列杰, R. Ya., 第196-97页;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普列杰个人档案440381, (1), 第146-51页。
143.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111页。
144.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101页。
145.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95页。
146.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6, 第195页。
147.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101页。
148.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011, 第48页。
149.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34, 第126-28页。
150.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42页。
151.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03, 第114页。
152.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197, 目录1, 案卷1116, 第129、132页。
153. 《*致当局的信*》, 382.
154.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566, 目录1, 案卷310, 第2-4页, 以及案卷324, 第31-33页。
155. 中央国家档案馆政治迫害受害者个人档案库, 全宗566, 目录1, 案卷331, 第30页。
156. 《*关于政治迫害与受害者平反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汇编*》(莫斯科: 共和国出版社, 1993年), 第36页。
157. 《*消息报*》, 1992年6月10日。在1937年和1938年, 这些三人小组下达了688,000项判决, 占苏联所有刑事判决的87%。据当时的人作证, 三人小组在一分钟内可以审查多达两起案件。格季和瑙莫夫, 《*通往恐怖之路*》, 470; 《*苏共中央通报*》, 1989年第10期: 第80-82页; *布托夫射击场*, 第8辑, 第65页; G. 韦塞拉亚, “三人小组决议: 枪决”, 载于《*自由*》, 1994年第2-3期: 第79页。
158. A. 科库林、N. 彼得罗夫和V. 肖斯塔科夫斯基编, 《*古拉格, 1917-1960*》(莫斯科: 国际“民主”基金会, 2000年), 第96-104页。
159. 《*列瓦绍夫纪念公墓*》(圣彼得堡: DEAN出版社, 2002年), 第4页。
160. J. 伯杰-巴尔齐莱, 《*哈-特*》. *苏联革命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特拉维夫: Am Oved出版社, 1968年), 第128-29页。
161. 博戈莫洛夫和拉祖莫夫, 《*列宁格勒殉道者名录*》, 2: 78-79, 3: 554-55, 588. 帕尔瓦德雷, 共产主义大学的讲师, 以及爱沙尼亚反革命组织“方坦尼基”的潜在成员, 也因“在索洛韦茨基营地从事托洛茨基主义工作并意图在释放后继续这一活动”而被处决。RNB, 案件编号21895, 针对瓦尔纳、叶阿等人, (1), 第269页。
162. 普罗霍罗夫, 运营这个信息网络的特工, 确认了每份此类报告的签收并在下方签名。博戈莫洛夫和拉祖莫夫, *列宁格勒殉教录*, 3: 551-52.
163. *希望将所有人一一点名: 根据古拉格调查案件和营地报告的材料* (莫斯科, 1993年), 11-12页。

164. 关于桑多尔莫赫处决的最详细记述见 B. 约费, “1937 年索洛韦茨基处决”, 载于 *最后的地址: 纪念索洛韦茨基悲剧 60 周年* (基辅: Sfera 出版社, 1997 年), 第 1 卷: 28 – 30 页。另见 I. 丘欣, *卡累利阿-37. 恐怖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彼得罗扎沃茨克: 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N. 巴伦, “生产与恐怖: 卡累利阿古拉格的运作, 1933 – 1939 年”, *俄罗斯世界笔记* 第 43 卷, 第 1 期 (2002 年): 139 – 80 页。

165. 内务人民委员部担心并非每个人都能应对如此可怕的工作。大多数“特别任务特工”(特别任务特工)都是成熟的官员, 无一例外是党员。当在 1930 年代末审查莫斯科处决者时, 一名处决者被描述为“适合该任务”, 而另一名“认真对待职责”。彼得·马尔戈, 一名特别勤奋的处决者, 被其内务人民委员部上级评估如下: “认真对待工作。完成了许多特别任务。”彼得·雅科夫列夫获得更高的评价: “他对工作态度积极。热衷于事业[*热衷于事业*]。能干且精力充沛。承担执行操作任务。足智多谋且守纪律。”其他处决者引起了担忧。诸如“需要了解更多”、“自我提升不足”、“天性孤僻”和“因职责性质而疏远党和社会”等评论时有出现。这些人需要“个别关怀”, 以免他们从内务人民委员部自愿和尽责的处决者变成施虐狂或精神病患者。中校叶梅利亚诺夫不得不退休, “由于长期操作工作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少校马赫, 另一名莫斯科处决者, 在患上“神经心理疾病”后被调职。 *布托夫斯基靶场*, 第 8 卷, 90 – 91 页; B. 索佩尔尼亚克, *分期死亡* (莫斯科: Geia 出版社, 1998 年), 275 – 78 页。

166. 由于最近关于 1930 年代末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审判的揭露, 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和纳粹做法之间的相似性。每一位大屠杀研究者都会想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如何应对大规模处决的后勤问题。一名叫哈里托诺夫的调查员作证说, 有称为“夺魂车”(夺魂车)这些卡车本应运送囚犯去处决, 但在途中用毒气杀害他们。自 1938 年起被拘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伯格解释说: “没有其他方式处决这么多人。”根据另一位当代人切斯诺科夫的说法, 卡车确实配备了特殊的消音器, 可以将废气引导到囚犯所在的车厢, 但这只是预防骚乱的措施。切斯诺科夫不知道这种杀戮技术是否曾被使用。

由于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毒气的证据出现在 1930 年代末的材料中, 我们不必担心当证人被要求回忆历史用叙述和判断覆盖的事件时出现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 在其他苏联来源中从未提及毒气处决, 这与苏联个别化处决的做法相矛盾(纳粹的工业化杀戮涉及消灭而非处决)。1937 年参与莫斯科大规模处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希申声称, 严格遵循了官方程序: 每个罪犯都在律师和医生在场的情况下被枪决: “我们无法知道判决是否公正——那不在我们的权限范围内。但在执行判决时从未违反法律。” *布托夫斯基靶场*, 第 8 卷, 76 – 77 页, 79 页。

尾声

1. R. 瑟斯顿, “苏联大恐怖中的恐惧与信念: 对逮捕的反应, 1935 – 1939 年”, *斯拉夫评论* 45 (1986): 226.

2. 学者们倾向于将苏联资料中出现的大多数意识形态修辞视为廉价的、战略性的表层，必须被清除以便发现斯大林主义镇压背后的真实动机。即使暴力行为不被归因于有意的虚伪，它们往往最终被呈现为源于社会和政治恐怖，且不合理。因此，阿奇·格蒂将大清洗描述为“话语的终结或完全否定……除了武力之外无法统治的迹象。”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清洗行动太系统化、太意识形态驱动，不可能暗示“盲目愤怒和恐慌”。A. 格蒂和O. 瑞莫夫，*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480页。

3. 被指控就意味着被定罪。1937年5月被捕的科学院成员鲍里斯·波利诺夫的审讯员告诉他：“你可能无辜这一事实不起作用。如果你被逮捕，我们会找到你有罪的证据——我们不能破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切尔尼戈的1956年证词，1938年审查海军军官谢奇诺夫档案的委员会没有发现被告是破坏者的证据，但坚持这一指控，仅仅因为“谢奇诺夫已经被捕为人民的敌人”。*悲惨命运：苏联科学院被镇压的科学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81页；O. 苏韦尼罗夫，*红军悲剧1937-1938年*（莫斯科：特拉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4. *《历史问题》*，第2期（1993年）：第20页。

5. E. Van Ree，*《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二十世纪革命爱国主义研究》*（伦敦：劳特利奇·科松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6.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70。

7. 关于布哈林审判的细节，参见尤·穆林，“布哈林案件是如何被伪造的”，*《近现代史》*，第1期（1995年）。

8.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96, 393。

9.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97, 396-97。

10.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91, 390, 371-72。

11.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405。

12.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408, 383。

13.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98。

14.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99。

15. *《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件》*（莫斯科：政治读物出版社，1991年），第184页；“原谅我，科巴：尼·布哈林的一封未知信件”，*《史料》*，第11期（1993年）：第23-25页。

16. Getty 和 Naumov，*《通往恐怖之路》*，376。

17. J. Berger-Barzilai，*《哈-特》：苏联革命的悲剧*（特拉维夫：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35页。

18. 参见，例如，B. Levytsky，*《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恐怖》*（纽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4年）。

19. M. 福柯，*《权力/知识：1972-1977年访谈选及其他著作》*（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7年），第131-32页。

20. 关于俄罗斯媒体典型的告诫“不要指责受害者！”参见L. Fink，“不能指责受害者！”*《一周》*，第46期（1988年）。

21. *《真理报》*，1936年8月21日。

22. *《平反》*，255-56。

23. 表面上，叶若夫是根据自己的请求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职务的。他为此向中央委员会发送了一封信，指责自己疏忽大意和“缺乏应有的契卡警惕性”。贝利亚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解冻期。他1938年11月26日的法令终止了叶若夫规定的效力

关于“特别行动”：叶若夫于1937年7月25日至1938年9月21日期间颁布的十八项尤为严苛的指令被正式废止。为确保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与法定规范不再存在偏差，各内务部办公室均配发了《刑法典》副本。司法体系重获部分自主权：自1939年1月1日至6月15日，检察院将内务部移交案件的超过50%以“补充侦查”为由退回。1938年12月26日的另一项检察院决议，暂时恢复了袋鼠法庭受害者及其亲属的申诉权。布托夫斯基靶场（莫斯科，2002年），第5辑，334页，（莫斯科，2004年），第8辑，214页；苏韦尼罗夫，《悲剧》，220-223页；F.阿什宁与V.阿尔帕托夫，《斯拉夫学家案件：三十年代》（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223-224页。关于叶若夫下台背景，参见M.帕里什《“铁腕政委”N.I.叶若夫的垮台，1938-1940》，《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14卷，第2期（2001年）：71-104页。

24. G.科斯特尔琴科与B.哈扎诺夫《叶若夫生涯的终结》，载于《历史档案》，第1期（1992年）：123-131页。
25. B.布柳汉诺夫与E.绍什科夫，《罪无可赦：叶若夫与1936-1938年叶若夫恐怖》（圣彼得堡，1998年），157页。
26. 《平反：往事实录：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及其他三卷本资料》（莫斯科：罗斯彭出版社，2000年），第1卷：308-309页。
27. M.巴赫金《小说中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载于《对话性想象：M.M.巴赫金四篇论文》（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250页。
28. 苏哈诺夫卡内务部监狱（1939年1月1日开始运作）是叶若夫的主意，他也成为首批囚徒之一。毫无疑问，叶若夫在此备受折磨，因为狱中采用了五十二种不同的酷刑。叶若夫被撤职、贝利亚上台后，对内务部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审判。中央内务部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安全部特别处）、各共和国级别内务部长及军事内务人员，均由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和军事法庭审理。这些审判的大部分史料至今仍对研究者封闭。在个别案例中，内务部侦查员未经正式审判即被枪决（以特别程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审判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委员会或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及其他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成员被指控参与反革命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级人员则被指控“违反苏维埃法制”。许多审讯人员被依据刑法第58-7条起诉，罪名包括“非法逮捕苏联公民”“伪造调查材料”以及“对囚犯使用暴力”。沃尔科戈诺夫记载了1939至1940年间不少于两万三千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雇员被枪决，但这一数字存在争议。贝托夫斯基靶场，第8卷，第144页；E.格涅金，《走出迷宫》（纽约：新文学评论出版社，1982年），第13-27页；苏韦尼罗夫，《悲剧》，第225页；D.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约·维·斯大林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560页。
29. M.詹森与N.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纽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O.赫列夫组克，《政治局：1930年代的政治权力机制》（莫斯科：ROSSPEN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30. 布里亚汉诺夫与绍什科夫，《无可辩解》，138-39。
31. V.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莫斯科：AST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32.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86。
33. 布里亚汉诺夫与绍什科夫，《无可辩解》，147。
34. I.哈尔芬，《亲密的敌人》，65-68。

35. 《苏维埃司法》，第1期（1936年）：第3-4页。
36.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72.
37.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72.
38.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73.
39.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73.
40.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23.
41. T. 德劳瑞提斯，《叙事中的欲望》，收录于《爱丽丝不在》（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06页。
42. R. 斯科尔斯，《寓言与元小说》（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6页。
43.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74.
44.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8.
45.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210.
46.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86.
47.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69-70.
48. “身心平行论”，《苏联大百科全书》47（1940）。
49. I.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及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办法》（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7年），第14-17页，第26-27页，第32-33页。
50. 《消息报》，1937年2月5日；《历史问题》，第4-5期（1992年）：第16-18页。
51. V. 申塔林斯基，《在革命禁猎区狩猎》，《新世界》1998年，第12期，第179页。
52.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9.
53. 布里亚汉诺夫与绍什科夫，《无可辩解》，55.
54. R. 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与后果》（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8-59页。
55. G. 齐特里尼亚克，《叶若夫的死刑案：刽子手肖像的几笔勾勒》，《文学报》，第7期（1992年）；D. 利哈诺夫与V. 尼科诺夫，《我清洗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绝密》，第4期（1992年）；布里亚汉诺夫与绍什科夫，《无可辩解》，132.
56.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19.
57. 詹森与彼得罗夫，《忠诚的行刑者》，201.
58.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第153页；布里亚汉诺夫与绍什科夫，《无可辩解》，154-55.
59.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153.
60.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第151页；V. 申塔林斯基，《自由的奴隶：克格勃文学档案中的巴别尔、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克留耶夫、普拉托夫、高尔基》（莫斯科：帕鲁斯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61. 索科洛夫，《恐惧的人民委员》，141.
62. C. 列维-斯特劳斯，《符号的效力》，收录于《结构人类学》（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63年），第193页，第197页。
63. J. 西格尔，《命名女巫》（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9-30页。
64. 参见萨特为H. 阿莱格所作的序言，《问题》（伦敦：考尔德出版社，1958年）。
65. 关于大清洗作为献祭，参见K. 克拉克，《苏维埃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77-78页。
66. P. 布鲁克斯，《困扰的忏悔：法律与文学中的罪责表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67. M. 扬波尔斯基，《象征的生理学》（莫斯科：新文学评论出版社，2004年），第694页注379。
68. 扬波尔斯基，《象征的生理学》，380.
69. M. 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污染与禁忌概念的分析》（伦敦：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6年），第122页。

70. M. 尼尔松, 《希腊宗教史》(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64 年), 第 87 页。
71. J. 哈里森, 《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纽约: 子午线书籍出版社, 1955 年), 第 98 页。
72. 《半人马》, 1992 年 7-8 月, 第 103 页。
73. 我在此的论点借鉴了 P. 霍尔奎斯特, 《“无情的行动, 大规模恐怖”: 1919 年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消除运动》, 《俄罗斯世界手册》第 38 卷, 第 1-2 期(1997 年); F. 赫希, 《民族志学者、统计学家与苏联的构建》, 《斯拉夫评论》56 (1997)。
74. V. 列宁, 《全集》(莫斯科, 1963-77 年), 第 35 卷, 第 204 页。
75. 苏维尼罗夫, 《悲剧》, 74。
76. Z.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列宁格勒真理报》, 1936 年 8 月 21 日。
77. V. 罗戈温, 1937 (莫斯科: V. Z. 罗戈温, 1996 年), 第 123 页。
78. M.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琳达·阿什尔译(纽约: 格罗夫出版社, 1986 年), 第 104-5 页。
79. A. 维克斯伯格, 《检察官与猎物: 维辛斯基与 1930 年代莫斯科公审》, 翻译: 简·巴特勒(伦敦: 韦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 1990 年), 第 82 页; 《真理报》, 1938 年 3 月 10 日。因此, 赖赫曼、扎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参与大规模处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获得“列宁旗帜”勋章就不足为奇了。当拉蒙·梅卡德于 1961 年抵达莫斯科——此前因刺杀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监狱服刑二十年——时, 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该国的最高荣誉; 他是仅有的二十一位非苏联公民获此殊荣者之一。一个用冰斧砸碎反对派领袖头骨的人能获得如此荣誉, 这表明这并非一起刺杀。托洛茨基是公敌, 而非私敌, 是 *hostis* (公敌), 而非 *inimicus* (私仇)。杀死他不是罪行, 不是仇恨与功利的象征, 而是一项必要的、公开的、道德上合理的行为。人民敌人的死亡不具任何意义, 也不涉及任何超越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党在最终忏悔时, 坚持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 许多在 1930 年代被处决的人被正式恢复了党籍。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世俗的背景下这可能令人惊讶, 但死后恢复党籍是有意义的, 因为与被选中的兄弟会的精神联系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在将死者重新纳入其队伍时, 党承认他们的死并非徒劳: 他们是人, 有名字和声音, 因此应被铭记。如此一来, 他们终究成为了牺牲品(“迫害的受害者”)——使同志们看清个人崇拜的危险。C. 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B. 叶菲莫夫, 《我的世纪》(莫斯科: 格拉夫出版社, 1998 年), 第 90 页。
80. 《真理报》, 1937 年 6 月 7 日。参见 P. 施泰纳, 《波希米亚的荒漠: 捷克小说及其社会背景》(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